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

第一编

武装割据上井冈

一、吹响武装割据的号角

1 农讲所里论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1/3。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一个总队，两个中队，六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五届农讲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5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当时我们经常唱着《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
齐奋斗！齐奋斗！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记得1926年夏的一天，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

打倒地主和军阀。毛泽东同志的亲临指导，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问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毛泽东同志关于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对我们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影响。我们毕业回到各地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农民自己的革命武装梭镖队，向着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反革命武装团防局，展开了刀对刀、枪对枪的斗争，使农村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当时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所以在1927年，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手无寸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提出的刀对刀、枪对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思想，是何等英明、正确！

（摘自王首道：《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3页。作者当时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2 武装反抗反革命

马日事变后，敌人的屠杀，激起了我们的无比愤慨，内心充满了为牺牲者复仇的怒火，但在这时，省委的负责同志都已离开了长沙，我们无法工作。找与黎夏青商量，决定到武汉去找党中央。

1927年6月10日，我们离开长沙。因手头拮据，买的是统舱票，没有座位。我们就将雨衣垫在舱板上，以便睡觉时当褥子用，把绒毯当被盖。轮船驶到岳阳城陵矶时，反动军警上船检查，对我们很注意，查这问那，但没有查出什么破绽，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到武汉后，有次我穿雨衣外出时。无意中发现省党部发的代表证就在雨衣口袋里，不禁大吃一惊，才知道我们在城陵矶原担着很大的风险，结果是因为敌人疏忽，我们才脱离虎口的。

1927年6月下旬，毛泽东召集湖南各地被迫来武汉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我也参加了。毛泽东讲话的大意是，湖南省委的某些同志。在事变前既不进攻，又不撤退，犹豫不决，等挨打。他号召大家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去，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刀枪。进行武装斗争。‘于是我与黎夏青决定离开武汉，返回湖南。

在石门南乡恢复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于1928年初成立了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我任党代表。

（摘编自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5页。作者时任中共慈利县委委员；建国后，曾任青海省省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3 浏阳遇险

1927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

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上前面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走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同了，走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作者谢觉哉：选自《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146页，作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过长征；建国后曾任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4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而党内居于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又推行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惨痛的教训。“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志在武汉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就曾号召：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党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夺取政权，他指出，民众运动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须知政权是枪杆子里出来的。当时，翟秋白曾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历史结论，说明在敌人十分强大的城市，中国革命难以取胜，他认识到应当把革命的希望从城

市转向广大的农村，认识到农民及其武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伙收起义后，他在文家市召集受到挫折的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

当时井冈山上王佐、袁文才的农民武装就是“绿林朋友”。毛泽东同志曾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还让我们讨论，王佐的武装在井冈山能长期存在，而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工农革命军进军途中，在宁冈古城举行了著名的“古城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要作战略性的转变，千百万群众是我们的基础，要以罗霄山脉中段为依托，建立后方，轻装上阵，还要建立地方武装，收缴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有了群众和地方武装，我们的军队就不会孤立。毛泽东同志还说，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六县，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龙山等重要屏障，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边界六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意义决不限于六县，对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是有很大意义的。

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同志还主持制定了施政大纲30条。相当完整地体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成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建设的初步蓝本。但1928年4月以前，边界土地革命还未深入，3月间湖南省委又将正规部队调在湘南，致使边界陷敌一个多月。这再次证明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对于红色根据地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4月底，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龙市会师，成立红四军，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政策，才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很快就使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鼎盛的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团及各县干部大力经营永新。当时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具备了大力经营永新的条件，宁冈全县是我们的，部队一部分到了莲花、安福、吉安。所谓大力经营永新，就是要在全县深入土地革命，层层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工农兵政府和地方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把田地分下去，各项政策贯彻下去，在永新，我们半月内分兵发动群众，建党，扩军，成立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很快形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后来红军大队前往湘南，敌人11个团进攻永新，毛泽东同志仅以三十一团一个团的兵力，充分依靠地方赤卫队、暴动队和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用四面游击的战术，将敌11个团困在永新县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

当我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赣敌朱培德部一个营在反动地主武装配合下占据了宁冈新城。毛泽东同志一面指挥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一日数惊，疲惫不堪；一面集中主力回茅坪休整后，

深夜急袭新城，次日一战全歼守敌。这些战斗就初步创造了运用十六字诀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成功战例。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对部队说到井冈山以前一个“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讲了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他还说：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你一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们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其后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我军先是向西佯攻酃县，诱引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两个团，又乘胜猛追40里，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还有1928年8月间困敌永新的战斗等，也都证明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队伍中存在林彪一类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想，还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以及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思想和干扰。当时湖南省委所执行的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尤为严重，1928年3月，湖南省委取消前委，解除毛泽东同志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随军挺进湘南，策应湘南暴动，造成了边界根据地的大部被敌人攻占和破坏。同年6月底，正当红四军成立后，连续打胜仗，边界红色区域发展到全盛的时候，湖南省委又派杜修经到井冈山，命令红军向湘南挺进。结果又造成湘南八月失败。这两次毛泽东同志都事先提出正确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湘敌兵力强大，未可轻动，而赣敌比较薄弱，红军应该着重向江西发展。特别是6月30日十永新召开的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决定抵制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并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信件，向省委申述正确的意见，主张红军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继续巩固和扩大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由于杜修经一意孤行，乘红军主力到了湖南酃县，而毛泽东同志又远在永新之际，导扬二十九团不安心经营边界根据地，恩返湘南家乡的错误意见，强迫军委领军南下攻取郴州，结果造成二十九团惨败，红二十八团团团长王尔琢同志牺牲。8月失败，不只是杜修经的责任，朱德、陈毅同志也有责任，朱德同志是军长，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要是他们坚持不听湖南省委的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经是无法把部队拉走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早在湘南暴动时期，左倾盲动主义者便提出“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的口号，鼓吹要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湘南暴动在湘南特委推行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一度乱烧乱杀，严重地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地区就坚决抵制了上述盲动主义的主张，没有乱烧乱杀。杜修经（应为周鲁——编者）来到龙市，责怪我们为何没有把龙市烧掉。他说这么好的地方，你们都下烧掉，那么怎么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呢？毛泽东同志说，房屋可以住人，为什么要烧掉呢？你们以为这些小商人，把他的房子烧掉了，就变成无产阶级了吗？农民要不要交换物资呀？这么一说，杜修经无法回答，所以龙市始终没有烧。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繁荣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同志还颁布了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草林圩场和大陇圩场，在交流物资，活跃经济上，就起了重大作用。这样就有利于争取

和团结中间阶层。在党内生活中，毛泽东同志说，我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多数不同意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在井冈山时期与党内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表现了既坚持正确意见，决不盲从错误的领导，但又遵守党的纪律，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典范。

（摘自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19 页，作者当时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湘赣边特委书记、红四军二纵队党代表、四纵队司令员、政委等职；建国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5 文家市会师定方向

1927 年 9 月 9 日，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了！

“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革命的怒潮汹涌澎湃。起义队伍高擎革命的大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展开了英勇顽强，气吞山河的斗争。

9 月 11 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在铜鼓起义，11 日，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毛泽东同志检阅了起义的部队。然后率领三团向白沙镇挺进。白沙镇三面高山环抱，中间是一片洼地，另一面是一人多深的茅草水坑地，靠山脚只有一条人行路，是铜鼓通往浏阳的要道。部队到达白沙就同敌遭遇。三团一连冒着弹雨，迅速地抢占了镇右侧的一个小山包。团部命一连掩护二连，从镇的左翼迂回到敌人后面，包围敌人。随即，三团发起攻击，直插敌阵，一下冲垮敌人，乘势抢占白沙镇，毛泽东同志高兴他说：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12 日，三团直扑浏阳东门市，在东门市不远的十二墩与敌相遇，经厮杀击溃敌人，毙敌排长一名，乘胜夺取东门市。由于我们一团在长寿街失利，右路失去配合。敌新八军两个团迅速向三团迂回过来，夹击我军。三团在正面受敌火力压制，侧翼又遭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全体官兵与敌人激战 6 小时之久，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从马鞍山脚下向上坪撤退。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的同时，湘东各县的劳动人民纷纷响应。9 月 11 日，长沙郊外农民起义，捣毁反动的团防局，缴枪 80 多支；9 月 12 日，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上的重镇——株洲的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缴获敌人 10 余支枪。平江起义农民，镇压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曾攻打平江县城。但在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遭受挫折以后，各地群众起义，也被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就这样，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工农革命军的主力 and 各地群众起义遭受挫折以后，部队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9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在上坪，召集三团负责人开了紧急会议。他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

各路起义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于 9 月 19 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胜

利会师。师部驻在街后的里仁学校。学校门口的上方挂着一面工农革命军的鲜艳红旗，门的两旁由两名卫兵站岗。

文家市是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群众对我们很热情，我们一到市里也立即开展了群众工作，不少干部亲自提着白灰桶，到处刷写标语。下午，听杨立三同志喊：“长工，你来，润之同志来了，他找你。”那时，我们都亲切地称毛泽东同志为润之同志或毛委员。在里仁学校里，我向他做了汇报。他问得很详细，如“官兵的思想动向怎么样，士兵都有哪些想法，战斗情绪如何，生病的多不多，等等。最后，他和我讲，今晚要召开前敌委员会，你和立三同志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9月19日晚上，毛泽东同志在部队宿营就绪之后，不顾长途跋涉和战斗的劳累，当晚就在部队驻地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由于作会务工作，对会议情况了解的比较具体。会开了一整夜，是个“定向”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形势，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起义部队遭到挫折，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目前我们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要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才能保存我们的力量。在农村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并发展革命力量。

那么，到什么地方比较适宜呢？

毛泽东同志拿着一份从学校借来的地图，指着湘赣边界山形最宽的部分，用生动形象的譬喻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最适合做我们的落脚点，我们要到那里去当“山大王”。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由北而南，形成江西、湖南两省的分界线。其北段，地势不如中段险要，太靠近大城市，敌人统治力量比较强。南段，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险要，崇山峻岭，峭壁林立，林丰树茂，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由于离大城市较远，是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而革命一举一动又可以影响到湘赣两省的南部，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里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井冈山地区，是积草屯粮、养兵集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

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大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觉得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了，这叫什么革命呢。毛泽东同志耐心地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真理。卢德铭总指挥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和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之险。

经过工作，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却遭到了师长余洒度的极力反对。他看不到革命形势的变化，看不到向农村转移的重要意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幻想在城市一举取得成功，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实质是军事冒险主义。对余洒度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据理力争，并进行了严肃批评。特别是在卢德铭同志投了赞成票之后，大多数同志因仰慕卢总指挥的才干和为人，纷纷举手赞同，他的支持，对向罗霄山脉进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后，毛泽东同志由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请到里仁学校新斋第二间房子

里休息。睡觉的地方，仅有一张门板。杨立三同志见毛泽东同志脚趾溃烂，便问他是怎么溃烂的？他说，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杨立三同志十分感动，并说：我早就在报上看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去他们总说我们“过火”，实在恼气的要命。你那篇报告，对我们湖南做农民运动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第二天清早，天气晴朗，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沐浴着一片金色的光辉。工农革命军有1500多人集合在这里，以十分激动和急切的心情，等待着毛泽东同志的来临。

“毛委员来了！毛委员来了！”只见一个身材魁梧，大约30多岁的人，脸晒得通红，身穿老蓝市的农民衣服，脚穿草鞋，在师、团长的陪同下，满面笑容地向队伍走过来了。

值班干部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并大声宣布：“现在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同志向大家挥手，亲切地说，同志们，请坐下吧！接着，他根据前敌委员会会议精神，向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再没有第二条活路。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走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还满怀信心的说，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现今我们有湘、鄂、赣、粤四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

最后，毛泽东同志就打长沙问题又做了说明，他指出，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的地方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发展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到罗霄山脉中段去找一个好的落脚点。

毛委员的话通俗易懂，使大家在困难之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记得后来我曾江西《红色中华》上写文章说秋收起义我们被打败了。毛泽东同志看到后，对我说：“长工，虽然我们打了几个败仗，但我们还有千把人，这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革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领导我们进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开始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从此，中国革命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了不起的转折点，我们要感谢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只有他走在我们的前头，解决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这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本本”上没有的。过去巴黎公社在城市，俄国十月革命也在城市。十月

革命是先建立苏维埃，后建立红军。我们则不同，是先建立红军，发展之中成立苏维埃。这个说来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可不容易啊！是多少烈士的鲜血，多少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换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发展马列主义，谱写的崭新的篇章。

这天上午，工农革命军与群众告别后，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怀着坚定的信念，高举红旗，离开文家市，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

（节选自《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9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一团党代表；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二、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 开辟井冈山之路

湘南起义发动了群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了“左”倾盲动主义，乱烧乱杀，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虽然占领了湘南10多个县城，但最后遭到失败。退出湘南，就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从这时以后，我们这支队伍才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

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原来计划参加南昌起义，但当它开到南昌前，起义军已经南下。后来，这支部队就参加了秋收起义，由毛主席率领，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来的部队会台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于是开始有组织地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方向从此更明确了。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指出，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贯的。当时毛主席就指出，要在农村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要搞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党组织，有群众运动，还要有适当的地形条件。在建军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比如，经济民主、官兵薪晌平等制度，任何人不能随便浪费一文钱等等。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起了很大革命作用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也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很多制度。比如，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在井冈山上就规定的。而且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不单纯是打仗，除了打仗，还要宣传、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政权，还要筹款。此外，在井冈山上，还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像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

在井冈山时，战斗很多，都订得很漂亮。敌人有十几万，打了一年多，还不能打败我们。周围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们知道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当时红四军中的井冈山部队三十一团是在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点很强，也会做群众工作。南昌起义部队二十八团战斗力强，但群众观点差些。以后两个团的作风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统一起来，大家都

会打仗，都会做群众工作。因为群众基础加强了，所以常常打胜仗，成为红四军以后的优良传统。

正在井冈山打了许多胜仗的时候，湖南省委却派代表来，要指挥我们去打郴州。当时本来不应分兵冒进，但省委下命令一定要打，只好去打。结果郴州虽然打开了，但因为方向搞错了，最后还是遭到很大损失。红四军二十九团大部打散了，二十八团也跑了一个营，后来虽然拉了回来，但王尔琢同志因此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这说明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瞎指挥的坏事情，不是后来才有，当时就有了。

（摘自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朱德选集》第127—128页，朱德当时力红四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

秋收起义的组织和发动是艰难的，而引兵井冈也不是容易的。江南的秋阳，炎威尚烈，在山岭丛林中穿行，道路崎岖，举步艰难，疟疾、痢疾蔓延，部队病员增加。疲劳和疾病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更危险的是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武装把我们看作洪水猛兽，尾追堵击，穷凶极恶。

屋漏又逢连阴雨，篷破又遇顶头风。部队经江西萍乡的桐木、小枳，22日到泸溪镇宿营。第二天清早出发时，由于侦察不力，情况不明，遭到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伏击。我们仓猝应战，损失数百人。在部队危险时刻，总指挥卢德铭同志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抢占路旁的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不幸中弹牺牲。

部队在泸溪冲破敌人的堵击后，继续前进，9月24日（即1927年——编者注）下午到达莲花县甘家村，这时已摆脱了敌人。此时，毛泽东同志从当地党的负责人甘明山、贺庆国等同志的汇报中，了解到，在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城失利，70多人被捕，30多人牺牲。于是，召开地方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攻打莲花县城。25日早晨，在甘家村召开了军民大会，枪决了从萍乡抓来的6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打击了反革命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会后，部队立即出发，中午到达莲花县城，此时正大雨滂沱，部队未待休息即发动进攻，不到半小时就攻克莲花县城，守城的一个保安队大部逃跑。进城后，打开监狱，解救了被捕的党员和群众，打开伪县政府的积谷仓，分给贫苦群众。26日清晨，毛泽东同志在县城召开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座谈会，对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随后，部队继续出发，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三湾处在湘赣边界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交界的地方。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可算是大村子了。

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同志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但仍是起义前的编制，有的团、营官多兵少，枪多人少，这样的组织不利于作战。在部队成员中，多数是各地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许多党、团员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遭受反动派的摧残迫害，他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背井离乡参加革命队伍。

到部队后，经受艰苦战斗环境的考验，受到革命的思想教育，斗志更坚定了，这是部队的主流。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和艰苦环境面前，悲观动摇。有些人甚至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里去？”思想相当混乱，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在有的部队中一些军官旧习未改，仍施军阀主义淫威，动不动就打骂士兵，严重影响官兵团结，削弱部队战斗力。很显然，不改变这种状态，长期的艰苦环境难以适应，革命的艰巨任务肯定无法完成。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大刀阔斧地解决了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整编中他着重办了三件事：

一是整编组织，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二个营七个连，另设军官队和卫生队。把多余的干部编入军官队，把战斗员和伤员分开，部队更精干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对动摇不定的人，在做大量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自愿原则，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给3元至5元的路费，开具证明允许离队，并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

二是在部队建立各级党组织，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党在北伐军中建立组织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这是一个重要措施，比北伐时党建在团上是一个大的进步。因为，连队是部队的基层作战单位，部队的作战、训练和生活，多是以连队为单位的部建在连上，就可以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的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后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决定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为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对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成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可靠工具，具有决定的意义。

在整编中重新任命了干部：团长陈浩；一营营长员一民，党代表宛希先；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军官队队长吕赤；卫生队队长曹 ，党代表何长工。

三是实行民主制度。毛泽东同志决定废除军阀军队旧制度及其影响，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部一样。为了保障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士兵的群众组织。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举者不得超过委员会人数 $1/3$ 。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领导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官兵对立的关系，有利于加强官兵团结和提高战斗力。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总结的，“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正是由于整编，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编后，我担任卫生队的党代表，专门收养病号和伤员。当时正赶上季节性的传染病，部队又整天打仗，住不好，吃不好，生活很苦，可是大家没有叫苦、发牢骚的，

不少伤病员仍坚持于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它建立了一套政策，这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向宁冈县古城进发，10月3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到达古城。当天，毛泽东同志在文昌宫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营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还有中共宁冈县委龙超清、龙国恩、萧子南等同志，会议历时两天，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我上午参加了半天会议，下午接受侦察任务外出了，会议结论我没听到，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会议讨论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这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豪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却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会议还确定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

会后毛泽东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送给他100多支枪，和他交朋友，并且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文才部队工作。后来又派我去做团结、争取王佐的工作，要把王佐、袁文才都转变为好同志，把他们的部队改造成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群众，广泛争取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不仅使我们在井冈山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吸取许多营养。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毛泽东不是一上井冈山就有现在这个水平的，我是摸索试探前进的，我们的经验是打出来的。这固然是毛泽东同志谦虚，事实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党和革命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无数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几十年革命实践的产物。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井冈山原来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非常厉害。地主武装怎么也整不倒他。他的作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说，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很好，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干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些做法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

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把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终于燃遍了全中国。

（节录自《何长工回忆录》，第99—107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卫生队党代表。）

3 跟毛委员学用兵作战

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它位于湘、赣两省边界，敌人统治较弱，而且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便于我们积草囤粮，聚集力量。这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毛委员率领我们上山后，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士气为之一振。

但是，那时我们许多人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因而对这支幼年的革命军队，怎么去和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反动政权的强大敌人作战，怎么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怎么以根据地为依托，战胜敌人，壮大自己，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一系列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建军和作战方针的问题，认识非常模糊。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老一套，以为打仗嘛，过去没少打，有些人还进过军事学校，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作战经验；再说，我们有党的领导，政治质量高，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要攻就攻，要守就守，还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

1927年10月间，李宗仁、唐生智之间的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混战一团。边界各县敌人守备空虚。毛委员决定趁机发展根据地，命令我们下山攻打茶陵。他因工作繁忙，这次没有亲身率领我们行动。

茶陵县城的守敌是“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一部分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我们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赶跑了敌人，占领了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可是过了49天之后，问题来了。湖南军阀暂时向南京方面妥协，敌八军军长吴尚腾出手来，派他的独立团团团长俞业裕率部配合罗定，向茶陵进攻。独立团是八军的主力团，人员充实，装备又好，仅重机枪就有12挺。再加上罗定的七八个连，足有20个连约2000多人。而我们算上后来赶到的第三营，一共也只有7个连，人数不多，装备也差，别说重机枪，连轻机枪也只要一挺，步枪的子弹也不多。和敌人硬碰显然是要吃亏的。但是那时的团营连指挥员，甚至连我们这些排长在内，大部分是军校或旧军队出身，习惯于过去的作战方法：一提打仗，就是拉开架子打硬的，守就是守，攻就是攻。当时也有人主张撤退，可是有人立即批评说：“撤退？我们是革命军，要有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些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能打倒呢？革命者永远要勇往直前！”这话听起来也对，于是就和敌人打起来了。

战斗是从拂晓打起的。敌人一下子扑到城郊，十几挺重机枪，打得我们阵地上烟雾腾腾。我们的步枪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就成排成连地冲过来。我们打得很顽强，许多同志几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山头丢了，又奋勇地夺回来。但是终于寡不敌众，只好趁着夜幕降临，在交替掩护下撤出战斗。

撤离了茶陵，到湖口整点一下部队，人员损失不少，仅我们排就伤亡了七八个人；弹药也消耗很多。休息了一会，部队忽然改变了前进方向，向南走下去了，行军速度也猛然加快。我们心里不由一阵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正在疑惑，忽然传来了命令：“毛

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翌日清晨，我们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心里估计：可能有重要指示，昨晚的闷葫芦也可以揭开了。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毛委员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四周环视一下，说：“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心里一跳，屏息静声，紧张地凝视着他。他用手指着队前的几个干部：“你们的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欺上瞒下，想带你们去投降军阀方鼎英！”这话使我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部队向南走，为什么毛委员连夜赶来。大家都愤恨地唾骂那些叛徒。毛委员当即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逮捕交革命法庭审判；然后。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的苍市。

在苍市，毛委员先安定部队情绪，说我们作战勇敢顽强，这很好。接着问我们这仗该打不该打？我们想，弄出这样的结局，看来是打错了，可是不打又怎么办呢？心里没有底。毛委员接着说，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他还讲到走路的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上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当然我那时还不能深刻领会毛委员的战术思想，可是已经开始知道老打法行不通了，应该改变。

究竟怎样转变呢？还是毛委员亲自带着我们打仗，才使我们逐渐明白的。记得几天之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部队集合在苍市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委员交代任务。他说：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都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我们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遂川和遂川以西的大汾镇，都是驻的反动民团。我们在大汾镇打垮了民团三四百人，消灭了一部分，接着就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部队分散开来，以连排为单位，到四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我带一个排在城郊和藻林一带活动。每天以班排为单位，打着红旗，挨村逐镇地展开宣传，打土豪、筹款、组织革命政权。并按毛委员教导的办法，抽出枪支和好战士，去帮助地方党组织赤卫队。这是我们第一次作群众工作。看到了广大群众那种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过了阴历年没多久，大约是1928年2月间，又像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委员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带回井冈山中心区域。这时朱培德部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红色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宁冈县委根据毛委员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后来敌人发现我方尽是赤卫队，没有

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委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使用优势兵力（一团全部，二团一个营）吃掉这股敌人。

深夜，毛委员亲自带着部队，赶到宁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天才大亮。敌人和往日一样，正在城东的操场上练操。毛委员带我们隐藏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没顾得拿就逃向城里。第一连袁一民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迫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我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攻南门的三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都被我们顶回去了，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是片稻田，又遭着我们二团一个营的伏击。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没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部分民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我们收拾了。

傍晚，我们开了个祝捷大会，然后浩浩荡荡胜利回山。这真是胜利凯旋，很多人扛着双枪，身后是一长列俘虏。行列里，时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和歌声。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在茶陵吃败仗的情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

“这就是蚀本不干，赚钱就来！”

……

宁冈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毛委员亲自率领下进行的战斗，也是秋收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它的全部进程也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军事课：湖南敌人来进攻了，我们便巧妙地转到江西遂川，分散兵力，积极发动群众。等敌人重兵赶来，又迅速集中兵力休整，命赤卫队袭扰宁冈敌人。我们休整好了，敌人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敌人彻底歼灭。毛委员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战斗，生动活泼地体现出来了。同时，也使我们较深刻地体会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用兵作战。

1928年春，正是敌人内部暂时稳定时期，湘赣两省反动派不断派兵“会剿”我们，战斗十分频繁。在这个情况下，毛委员的指导思想是：在敌人内部尚未发生破裂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步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布四处，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正因为我们照这样做了，所以在敌人不断“会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连续取得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趋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发展了，战术水平也有了提高。

在1928年井冈山斗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委员为了教育部队，把过去的作战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是当时作战原则的概括；是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这不仅武装了我们的思想，指导了当前斗争，取得一

系列的胜利，而且奠定了我军作战原则的基础。这些原则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节选自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87—194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二连排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

1927年冬，我们跟随着毛泽东同志到了井冈山附近地区——江西永新县属的三湾，把部队整编好了。但那里没有什么根基，住下来之后，立即要着手建立根据地。毛委员派特务连、军官队和一部分伤病员到井冈山山区去开辟工作；其余的分成三路，向井冈山附近的宁冈、永新、遂川、莲花、茶陵、万安、酃县等地去活动。临行之前，毛委员召集我们讲了话，指示我们：要向群众作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并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他还要我们用郭亮同志（郭亮为湖南长沙县人，工人运动领导者，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工农部长、省总工会委员长、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在湘赣人民中有很高威信。1928年3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编者。）的名义出布告。

我所在的二连和三连一路，由团长和党代表率领，开往酃县、安仁、茶陵一带。

一路上，按照毛委员的指示，用郭亮同志的名义，在街头巷尾到处张贴布告，又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张贴“打倒上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打倒帝国主义”“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军队”“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起初，群众看到我们这些颈上系着红布带的军人，摸不清我们的来路，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是共产党的部队回来了，人们便走出家门，拥到布告、标语下面，看着、念着。

当时反革命力量很大，我们两个连只有100多人，只能一边走。一边宣传，不敢多停留，在安仁县城，我们打了一个大土豪，没收了一大堆资财。在茶陵开监放了犯人。就这样，在几天时间里，穿过了三四个县城，回到了山区。

虽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由于当时部队刚建立不久，纪律松，办法少，又远离毛委员的领导，闹出了不少事情。

在安仁县城打土豪时，没收了许多资财。按说这些东西应该分给贫苦群众，可是谁也不知道该这么办，只考虑怎样公平合理地分给全体士兵，研究了几次，还是采取绝对平均的办法：把部队带到空场上，两个连混合起来，排好队站在一边，墙那边放着一堆堆事先搭配好了的东西，有皮袄、鞋子、被子、毯子，甚至还有草篮子、鸡蛋等等。军官们有的负责分东西，有的负责监督。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就喊起来：“第三伍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伍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11月下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我们走到大井，一、三连也赶到了。这时才听说毛委员要我们下山去打茶陵，大家兴奋极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大垅。等整理好队伍之后，毛委员就给我们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现在蒋唐军阀混战，反动军队都拉走了，山下县城空虚，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接着，他说：“你们马上就要出

发了。我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说到这里，毛委员用手指了指脚，脸带微笑，诙谐地说：“可是我的脚不让我革命，这真叫没办法。”原来，他的腿上长了疮，行动不便。

我们又一次离开毛委员，下山去了。

一路上很顺利，打茶陵也没有遇到对手，一下就占领了。没几天就成立起县人民委员会。并且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是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样搞法，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曾旅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去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

我们在茶陵的所作所为，很快传到了毛委员那里。他写来指示：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派谭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并指示部队中要加强政治生活。

毛委员的指示下来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样式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在茶陵诞生了。

正当我们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红色政权诞生的时候，蒋唐混战停止了，湖南的敌人吴尚派了一个团，开到了茶陵，企图把我们一举消灭。当时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游击战术，体会不深，也不能灵活运用。因此，竟和敌人展开了拼消耗的阻击战。顽强的战斗一直坚持到黄昏，周围敌人仍在陆续增兵。部队在茶陵无法立足，只好撤回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碣市。

有一天，毛委员又来到我们这里，召集大家讲话。他开头就说：“你们茶陵这一仗，打得很勇敢。”听到毛委员称赞我们，谁都高兴得不得了。接着他又说：“你们在茶陵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这个不好。”

这时，毛委员开始给我们详细地讲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记得大意是说：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 we 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讲到这里，毛委员停了一下，随即伸出了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是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是打土豪筹款子；第三，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在茶陵所犯错误的老根子，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把前进的道路照得透亮。从此，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糊涂了。

在碣市那次讲话中，毛委员还再一次向我们讲解了三大纪律，要我们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后来，我们都把三大纪律，背得滚瓜烂熟，并且认真地照着它做。连里党支部还把它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以后，毛委员集合部队讲话的次数更多了。每一次都要给我们讲解当前的形势、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道理、井冈山的地势，和周围群众的生活情形……在讲解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同时，毛委员还经常教给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记得他说过：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東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

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

又有一天，毛委员把部队集合起来说：上次你们从井冈山西边的茶陵来，这次我们一到东边的遂川去。那个县里敌人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都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部队随着毛委员下山了，迎着深冬的寒风，走着崎岖的山路，向遂川挺进，我们的军装虽已磨损得破烂不堪，然而几个月前由于失败而带来的张惶、不振的情绪早已一扫而光。个个精神抖擞，步伐雄壮，都想到山下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

队伍经过黄坳，来到大坑。这里完全下像我们在山上时所想象的集镇的样子，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

按照毛委员的指示，我们打开土豪紧锁的大门，里面真是五光十色，什么都有。光是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鸡、腊鱼和各种各样的油炸果子。就有好几大缸。土豪们已经把过年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了，可是，走到穷人家一看，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里，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以外，啥都没有。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同志们都气鼓鼓的。立即把土豪家搞了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搞到的那些资财，全部送到穷人家里。

来到遂川，情况和大坑相仿。我们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他们多半都不理睬；把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接受。于是我们就从小处着手，先分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以后，我们加强宣传，打破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我们。

工农革命军爱护群众的行动，很快传开来。两三天里，穷人们都陆续回来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也繁忙起来。由班、排干部组成小组，每个组部有红布做的小旗子，旗子上横写着三个大字：宣传队。红旗到处，群众团团围住，静听红军战士讲话。因为我会湖南客家话，小组就常推我出来讲。也不知怎么的，一看见站在前面这许多穷人，自己在家受苦的事，一下就涌上心头。我高声说：“我在家跟你们一样，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没命地干活，也吃不饱肚子。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得打倒土豪劣绅，要分他们的田，要组织起革命委员会来跟他们斗啊！……”这么一讲，小组的同志和群众就一起呼一阵口号，然后我们就带着群众到土豪家里去分东西，用具、衣服、谷子，连猪也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分给穷人。穷人们欢天喜地地抬着东西，回到自己家里去。

没几天，县城的局面打开了。毛委员就派我们到郊区去开展工作。我们连被派到离城 20 多里的和尚坪。在那里活动了近 20 天，毛委员从城里传来指示，要部队回遂川过年。

走的那一天，群众都来送行。时间虽短，却已和群众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

除夕那天，毛委员宣布放假三天。每人发给几块银元，除夕夜里还举行了大会餐。我们二连在一个古祠堂里摆上一张张方桌，不分军官士兵，团聚共乐。街上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军民沉浸在欢乐中，整个遂川城灯火辉煌，彻夜不熄。

我们就这样欢欢乐乐地过了第一个胜利年。休息几天之后，除了留在遂川城和郊区工作的少数部队以外，又分成好几路，下乡去开展全县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筹各项工作，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营里有，连里也有。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按级上送。直到毛委员那里。行动委员会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只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件事让行动委员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以后成了一条纪律：凡是好东西要尽先分给群众，任何人都都不准擅自拿打土豪得来的东西。

遂川全县就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土豪劣绅打倒了，反动政权垮台了，贫苦群众站起来了，工农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了，赤卫队、游击队保护着革命胜利的果实。

我们从左安回来以后，毛委员亲自领导着大家，总结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三四天以后，又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开展工作。我们二连这次是去遂川西北的五斗江。出发前，每个人都穿上了灰色的新军装，戴上八角形的工人帽，还发给一套白布衬衫袄，连子弹带、干粮袋也换了新的。系在颈上的红布飘带，也换成印有“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布袖章了。

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工农革命武装，就这样在毛委员亲自领导下，在井冈山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建立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它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着井冈山四周的广大农村，到处点燃起革命的烽火。

（作者赖毅：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186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二连排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 毛委员发展我入党

沪溪失败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连师长余洒度，在这严重的斗争面前，也畏缩了，到达酃县水口后，终于作了可耻的逃兵。与师长逃亡的同时，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也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革命部队正在烈火中经受着锤炼！

就在这支革命部队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展开了最紧张的工作。那时，我是一营二连一班的班长。每天行军，我都看到他那魁梧的身体，出没在战士们的行列中，今天在这一连，明天又在另一连，他和战士们谈话，问他们在家是做什么的？怎样参加革命队伍的？问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

最初，一连有些同志不认识他，以为是老百姓，便要拉他挑担子。毛泽东同志笑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见过他的战士们说：“不对呀，他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呀！”那些战士们都

惊奇地围到他身边，看着他那和蔼的笑容，谁都从心里和他更亲近了，纷纷向他诉说自己的经历。

当时连队中很大一部分人，原是大革命时期在各地搞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革命组织受到反动派的摧残，家乡站不住脚，便跑出来参加了革命队伍。这些经历过失败和艰苦斗争，并且从反动派的刀口下跑出来的人们，对于目前迭次的失利和艰苦生活，并不放在眼里，对他们来说，能够继续革命，能够拿着枪杆和反动派干，就是十分幸运的事。可是大家都还为一件事苦恼着，那就是当革命组织遭受破坏时，人都跑散了，谁也没有带组织介绍信，因而原来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现在都失掉了组织关系。

毛泽东同志自从在文家市收集秋收起义的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军以来，每天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正是为了了解部队情况，和考虑如何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严重的逃亡现象清楚他说明了：武装必需掌握在坚定的革命干部手里；另一方面，还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作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的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这样才能巩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非常鲜明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候，由于党缺乏经验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虽然共产党员们在黄埔军校、在北伐军队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却始终没有抓住军权，也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和群众保持最广泛的联系从而掌握群众，因而，一旦反动派倒戈相向，共产党员们不但抓不住军队，反而不得不被他们从各个岗位上赶走，甚至遭受迫害。

毛泽东同志恰恰是在这个紧要关头，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调查研究了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情况，从而察觉了问题的症结，采取了坚定的措施，那就是开始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且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

就在沪溪失败后、部队中弥漫着严重的失败情绪的时候，在一次行车的途中，副班长刘炎同志和我谈话，问我家庭的情况和个人经历。我猜想他是党员，便告诉他，我原是造纸工人，在搞工会工作时加入了共青团，后来从家乡逃出来，到修水找到了这支革命队伍。他听光我的叙述就说：“好吧，我们找找看。我想党代表一定是党员，去向他要求入党吧。”后来，连党代表果然把我找去，对我说：“你要求入党，那很好。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努力争取入党！”

没隔几天，党代表又找我谈话，这次叫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部队开到酃县的水口休息下来。第二天下午，党代表就秘密地通知我：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

会议的地点选在靠近水口街的一个大祠堂里。我和五班长李恒同志跟着党代表上了阁楼，屋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其余的大都是各连的班长。毛委员也来了，正在和几个同志低声谈话。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桌上放一盏煤油灯，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我知道要举行入党宣誓了，心里不禁激烈地跳动起来，一生中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等人来齐了，毛委员便站到方桌旁边宣布说：“好吧，我们就开会！”

先由各个入党介绍人（都是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个新党员的简历。

接着，毛委员便走到排列在最前面的六个新党员面前，依次地询问了很多问题，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心中又紧张又激动。

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

毛委员点头说：“很好。”

接着，毛委员又把那三个大家从没有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以后，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

会场上充满严肃的气氛。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我们宣誓。他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宏亮、庄严的声音，在这间破旧的小阁楼中回荡。

宣誓结束了，会场里活跃起来。同志们互相勉励，老党员谆谆嘱咐，都使我十分感动。特别是毛委员讲的话：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要严守党的秘密……这许多嘱咐，都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心底。

临走时，我听到毛委员叮嘱各连党代表们说：“回去后，支部要抓紧发展工作。以后，各连都要像今天这样，分批地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在那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经不起斗争考验的动摇分子纷纷背叛革命、脱离党的时候，就在这漆黑的夜晚，在一个古老的祠堂的阁楼上，毛委员亲自发展了我们一批工农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节选自赖毅：《毛委员在连队建党》，见《星火燎原》

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176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二连班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6 “根据地就是红军的屁股”

我确立根据地的思想是在参加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我们的动员口号是“打到广东去，组织第二次北伐”。当时是要把广东作为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同志率余部艰苦转战，沿途一直在寻找革命立足点。1928年1月湘南起义，1个多月，夺取了宜章、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几个县的政权，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带动了周围10多个县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到了3月下旬，起义军遭到敌军七个师的进攻，由于敌人的强大，又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严重影响，脱离了群众，致使我们无法在那里立足，被迫放弃了湘南地区。潮汕和湘南的挫折，使南昌起义的部队来不及进一步探索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同志比同时代其他领导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上了井冈山后，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当我们上井冈山时，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我们上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了“家”了。按陈毅同志的说法，不再像“釜底游魂”了，这是令人喜悦而又意义深远的变化。

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领导下，部队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同湘南起义

时相比，工作内容有了发展。湘南起义时，部队打下一个地方，夺取了政权，也参加做群众工作，但那时的工作重点是扩大红军，较多从军事上着眼。上井冈山后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结合得更紧密了。我记得所有的部队都要做社会调查。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表报，叫做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建立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这些做法，不仅是直接地参加建设根据地而且对提高部队阶级觉悟、政策观念，以及纠正单纯军事观点，也有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对部队进行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说，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时的时候，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的屁股。毛泽东同志深入浅出的比喻，很有说服力。

毛泽东同志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了。我们在实践中觉悟到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部队中存在的流寇思想、乡土观念、无政府主义是树立根据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些人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有些人怀疑老在山沟子里哪能打出天下，还有些人觉得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土豪打完了，没有猪肉、鸡子那些好东西吃了，所以总想打到外面去，打到城镇中去。8月失败给我们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部队里存在这些错误思想，是部队易于接受盲动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我在二十八团任连长，我们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都被带到湘南去了。进到了湘南，第一仗就是打郴县，仗打得还好，郴县打下来了。开始以为敌人是许克祥的部队，一打才知道是范石生的部队。潮汕失败后，范石生曾给朱德同志以帮助，现在打他的部队，这从政策上讲是不妥的。所以打下郴县朱德同志又高兴又不高兴。郴县打下来，派第三营担任第一线警戒，第二营为二梯队。黄昏时，敌人反攻了，攻得很凶，三营顶不住了，二营营长袁崇全却见死不救（前面已经提到，他随后叛变了）。三营给团部写报告请求增援，报告送到了团参谋长手里，他正忙着收集胜利品，把报告装进口袋也没有看。后来二营支持不住垮下来了。其他部队也都退出来了，当时部队不会夜战、巷战，在县城里东南西北也辨别不清。在郴县缴获了两房子的枪支弹药，全部丢掉了。第二十九团乡土观念严重，战斗一失利，队伍就散掉了。只有第二十八团拉出来了，拉到了资兴，后又转到了桂东。这就是“八月失败”。

由于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去了湘南，敌人趁机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当时第三十一团分兵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人来了4个团，占领了宁冈茅坪，并进攻黄洋界。我守山部队只有一个营，在五大哨口严阵以待，并于黄洋界哨口迎头痛击敌军。不久，敌军内讧，撤退了，我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不出去，不仅二十九团不会散掉，而且可以好好地打个大胜仗，把根据地扩大到吉安、安福、萍乡、平江、浏阳一带。

毛泽东同志对于这次失利是有预见的。他在7月4日起草的《中共湘赣

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上，特别提到部队拉出去不利。指出“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不愿作艰苦的群众工作，充满冒险主义的遗毒”。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们在郴县作战大利转战到了桂东之后，就带了一个营来接我们。他很注意做第二十八团的工作，出发时交代了第三十一团，见面后不要讲第二十八团的缺点。第二十八团在受到挫折后，情绪低落，听到毛委员来接了，非常高兴。部队一见面，非常亲热，有的同志说，这是第二次会师。经过这一次的教育，多数同志对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以及根据地同武装斗争的关系，认识深刻多了。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0—74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连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7 总结“八月失败”的教训

关于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一事，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了。我看，这次失败同湖南省委很有关系，湖南省委对井冈山不大相信，湘南特委某些人本身有本位主义，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于是杜修经、龚楚才能把二十九团、二十八团拉走。二十九团垮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党的领导不强。我记得在全国解放后，1958 年的时候，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起这次失败的事，我曾说，对八月失败的详情不了解，当时陈毅同志是军委书记，是否他应负责？毛泽东同志讲，陈毅同志有个检讨，事先写了信给他，事后也写了信给他，不能怪他。主要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问题，军队内部也有责任，二十九团的龚楚，还有些人附和他，结果去了湘南，就失败了。我认为，当时不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才有这次失败。为这件事，我从永新县城跑到宁冈旦城义跑到酃县城，一天一夜跑了 120 多里。那时，特委在永新开了一个会，要我带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去通知他们不要到湘南去，我追到酃县才见到他们，在一个大庙里开干部会，陈毅同志主持的，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信。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而打茶陵，即回来。因为当时我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的。我与他们不熟，所以才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信。他们讨论了毛泽东同志的信后，即往回走了，走了 40 里到沔渡，要过河时，他们又不走了，二十九团把枪放下来，坚决不过河，非要南去不可。我说，你们往南去，要报告党代表，陈毅同志就写了信，我就回来了，结果没有挽回得了，至于事后陈毅同志有报告，我就不清楚了。龚楚后来叛变了。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茨坪住的时候多。当年前委开会多半是在王佐的营部。毛泽东同志在桃寮、茅坪、龙市等地也都住过。

毛泽东同志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那是向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我记得就是在茨坪的一个柜台上写的。那时一个店铺，一进门右边就是一个柜台，柜台可以睡人，又当写字的桌子，毛泽东同志睡在柜台右边，我们睡在里边的地上。我们警卫排都是睡地铺。当时生活确是艰苦，吃红米、南瓜、酸菜，能吃上一餐狗肉就算是很了不起了。当时毛泽东同志写的长篇著作都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写成的。例如，红四军在新泉时，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过一份报告。我记得这个报告就在几个地方写过，一个地方写一段，最后在新泉完稿的。所以，毛泽东的有些著作，硬说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写的，那就很

难说了。毛泽东同志在长汀给中央写的一个报告，是在3月12日打开长汀以后，住下来才写成的。在战争环境里，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天都不容易的，敌情不允许你多住，需要经常转移，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住上三几天，一般能住一两晚上就不错了。这些说明了，总得住下来，有一定时间，才能写东西，有时去外面的石头上也可以写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也不是用钢笔，主要是用铅笔写。

那时，是用铁皮箱给毛泽东同志装文件的，贺子珍同志管剪报纸，文件的底稿也都是放在她那里。行军的时候，一条扁担，一头挑着文件，一头挑着报纸，毛泽东同志那时什么书报都看。杨至诚同志是副官长，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先找报纸和书籍，不管什么报纸和书籍都要搜集起来给毛泽东同志看。毛泽东同志抽烟，当时买烟很困难，贺子珍同志经常交待杨至诚同志到外面买烟。当时，毛泽东同志身边的勤杂人员吴光荣有两大任务，一是收集报纸、书籍，二是买烟。

当年，毛泽东同志曾给我们讲过，井冈山比南京好，他说，井冈山周围800百里，有草林、营前、大汾、黄垌、沔渡等10个城镇，有山有水，腾云驾雾；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我们的井冈山大，蒋介石占京为王，我们占山为王。他的意思就是要坚持根据地，坚持斗争。

（摘自江华：《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48—550页。作者当时力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委，最高法院院长等职。）

8 掌握政策，联系群众

1927年春，我在湖南省平江县龙门区农民协会任特派员。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被“还乡团”、“挨户团”血腥镇压下去。农民协会被敌人捣毁。革命者有的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被迫背井离乡、逃往他方，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工农红军前身）经过我的家乡，我便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支秋收起义的队伍。

根据原来的行动计划，部队准备攻打长沙。但是在行军的中途，因收编的邱国轩队伍叛变，我军受到较大的损失。随后绕道谷罗尖并改称为工农革命军，到浏阳文家市集中整顿。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他详尽地了解了湘赣两省的政治、经济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情况，对下一步战略行动做了深思熟虑的布置。他提出：在湖南和江西两省交界的地方有一条由北在南的大山——罗霄山脉，它的北段地靠长江，有武长和南浔两条铁路，离大城市大近；而它的南段，地形又不利于屯兵割据。只有它的中段正处两省接合部，相距长沙和南昌都较远，加上军阀的派系争斗，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于是，他率领这支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适合中国特点的“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道路。我就在这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

1927年9月20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清晨，太阳还未升起。风尘仆仆的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向部队干部、战士讲话。他身穿旧粗布长衫，脸庞消瘦但神采焕发，用浓重而又洪亮有力的湖南方言，深入浅出地给我们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接着，他以坚定的口气说，现在革命暂时进入

了低潮，这不要紧，用不了多久，又会像北伐战争时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的。为什么呢？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我们党有了自己的武装，这是一支穷人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穷人占绝大多数，有他们的拥护和支持，革命终究要胜利的。问题是我们这支军队要紧紧地依靠人民，要为穷人办事，要遵守群众纪律，勇敢作战，在斗争中建立起一支真正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同志讲到前几天部队中敌人埋伏、打了败仗的事，他说，世界上哪有不打败仗的军队？胜败是兵家常有的事，是难以避免的。我们这支部队才刚刚组建，还十分缺乏战斗经验，这需要有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毛泽东同志最后鼓励我们：现在，我们人数还不多，但是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抱定了为穷人办事的宗旨，人民就支持我们，老百姓就拥护我们，就一定能打出一个工农革命的新天下。

但是，军队怎样才能同人民打成一片，在群众中生根，当时我们并不懂得。在向井冈山行进的途中，毛泽东同志利用休息时间，到班排同大家谈心，耐心地教育我们怎样做好群众工作，与广大群众紧密结合。他说：耳闻是虚，眼见是实，群众是从观察我们的行动来识别新旧军队的。旧军队对老百姓烧杀抢掠，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要付钱，损坏了老乡的东西要照价赔偿，说话态度要和气，更不许打人骂人。这些事情虽小，要一一做到并不容易。但是只要认真做下去，人民就会了解我们，拥护我们。毛泽东同志谈的这些问题，后来形成“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正式作为红军的纪律；后来又发展充实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光荣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国民党进行反动欺骗宣传，在井冈山新开辟的地区，群众因不了解工农红军，大多外出躲避。我们有时行军经过一些村庄，几乎连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交代我们，进入这些地区，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尤其要珍视爱护。如果部队借住群众的房子，出发前一定要打扫干净，门板要上好，柴禾要捆好，缸里的水要挑满。灶内的柴火没有烧完的，要把灰扒出来，再在灶门口浇些水，防止因刮风引人烧了房子。吃了老乡的米、油、盐，都要按市价算钱，等老百姓回来，看到水满缸，柴成堆，样样完整无损，就会了解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是两样的，就会亲近我们而不害怕我们。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去做了。我们这些细小的行动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互相传说着毛委员的队伍不打骂群众，说话和气，平等待人。很快，周围的群众都晓得了，他们逐步地感觉到了工农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有一次，我们的队伍准备出发，毛泽东同志走过来问我：“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了吗？”我说：“屋里没有人，周围也找不到一个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叫文书写一封信，和钱一起压在床垫下边，或是放在桌子的抽屉里，群众回来就会发现的，下次再见到我们就下会躲起来了。”毛泽东同志想得非常周到，他是怕坏人把钱拿去，又怕刮风把钱吹散。后来有一次，部队订下桂东的一个村子，开始老百姓都跑光了。我们进村后一一按照毛委员的嘱咐办。第二次再进这个村子时，老年人大部留下了，我们向老人们进行口头宣传，同时都自觉地用实际行动维护群众的利益，严格地遵守纪律。当我们第三次再路过这个村子时，不但全村男女老少一个都没有走，而且全部出来欢迎我们，并向我们痛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有的人还主动给我们带路，向我们介绍敌人的活动和土豪劣绅的情况。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

这支人数不多的年轻的队伍，真正如鱼儿遨游在大海之中。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罗霄山脉中段这块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不断发展，终于成了中国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同志一贯高度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把它形容为党的生命。他反复教育我们，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的阶层、团结的群众越广泛越好，集中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并实行的对待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把富农与土豪、地主相区别的政策，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革命失败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左倾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包括中小商人不加区别地当作大资产阶级予以打击和剥夺。对此，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把“保护商人做买卖”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他亲自草拟标语，部队抄写后在大街小巷广泛张贴、宣传，影响很大。在井冈山的茨坪街头，至今还可师到当年红军留下的写有这方面内容的标语口号。1928年1月，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提案中，专门写进了“禁止盲目烧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内容。1929年1月红四军的布告中，也明确地写有“城市商人，积殊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为了保护商人利益，毛泽东同志还经常告诫我们，部队行军经过市镇，要在街上宿营，不得占用商人的柜台、帐房。你占了，他就没法做买卖了。正由于红军实行了正确的政策，那时井冈山根据地的城镇集市，熙熙攘攘，生意兴隆，不但有利于调剂人民生活，便于组织红军的供应，更重要的是，使城镇上很大一部分群众由怀疑、反对红军，转变为拥护我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一段话写了当时的情景：“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

毛泽东同志在带领红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团结争取农村中间阶级。1928年春天，我在红军三十一团教导队任区队长。有一次，毛泽东同志指派我带领区队到永新西乡打土豪、筹粮筹款，行前他详尽地给我交代了任务和方法。他说，这次去打两家上豪，部队行动要隐蔽、迅速，乘夜出发，走60里路，天亮前赶到目的地。完成任务后要把土豪的财物分给群众，还要开群众大会，个别谈心，向群众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宣传红军的政策，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按毛委员的嘱咐办了，打了那两家上豪，召开了群众大会，把东西分给了穷人。离开村子时，我看到有栋房子修得很好，向当地群众打听，得知这一户每年要卖几十担谷子，有两头水牛，有地出租。听到这个情况，我没有再深入调查，就把这家的东西也分了。回到驻地，毛泽东同志听我汇报经过，特别仔细地询问这几家上豪的经济状况，有多少人吃饭，收租多少，雇长工多少等等。在谈到第三家的情况时，毛委员问我，这家雇多少长工？他们自己参加劳动吗？我说没有仔细了解。毛泽东同志便耐心地向我指出，如果这家有人参加劳动，根据他们的经济情况，应是富农而不是地主土豪，我们不应分他家的财物。富农虽然也有剥削行为，但自己参加劳动，与地主有区别，而且也受国民党的重税盘剥，可以争取他们不反对或者少反对我们，或者暂时中立，这对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是有利的。我们的政策是打土豪不打富农，即使是土豪，有的兼做商人的，我们也只没收他家里的财物，商店里的东西不能没收。以后再打土豪，

事先要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打错一家影响很大，以后不调查清楚就不要打。”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教育。当时由于湖南省委执行左倾政策，湘赣边区颁布的土地法曾规定没收一切土地，使富农也受到打击。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1929年4月，兴国县的土地法，正式改为“只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育我们，革命总是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只要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就可以争取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壮大红军队伍。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初，部队人数不多，战斗频繁，经常减员，兵员补充困难。所以，除了革命的贫苦农民外，也吸收了一部分游民和俘虏，其中有些人还抽大烟，工农出身的战士对他们很反感。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同志教育部队：中国社会情况复杂，各地都有抽大烟的、赌钱的、当妓女或卖唱的，还有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等等，对这些人要作具体分析。其中很多人是为生活所迫而走上邪路的，要帮助、教育、改造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首先是要关心、接近和了解他们。当时，我们营部有几个俘虏过来的战士，出身很苦，但抽大烟。我们营首长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嘱咐，耐心地教育他们，并把他们编成一个侦察队，派到敌占区，出入烟馆收集军事情报，起了有益的作用。在革命队伍里，他们很快戒了烟，革除了不良习气，锻炼成为优秀的红军战士，有的在敌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对待俘虏兵，我们也采取了自己选择去路的办法，愿走的发给路费。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办法可以揭穿敌人散布的“红军见人就杀”的谣言。对于愿意留下的，红军表示热情的欢迎，而且在各方面都不歧视他们。经过耐心的教育，他们懂得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这样，同是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中打仗怕死，今天在红军却变成了勇敢的战士，同时，由于这些士兵的补充，更加扩大了红军的队伍。

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经常同部队谈话的内容。他告诉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而敌我友中间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比如在朋友中间有中立的，也有少数动摇分子；在敌人中间也有少数可以争取的对象。这都要靠我们过细地调查研究，才能弄清楚团结谁、争取谁、打击谁。

当时我们这些红军干部和士兵，大都是没有念过书，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下会写，不知道如何做好群众工作，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耐心地教我们，搞调查研究，要注意分清对象，讲究方法。对贫苦的基本群众，要问清他们家里有几口人吃饭，多少人下地劳动，租多少亩地，收成多少，交租后还剩多少。帮他们把这个帐一算，他们就会感到你是贴心人，把苦情告诉你。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向商人小贩调查就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要笼统地问他是不是受剥削，而要问他买卖是否兴隆，多数人会回答你现在买卖不好做，国民党的税很多，日子难过。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揭示国民党剥削人民，卖国投降，军阀混战，使人民遭殃的罪行，还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当地的社会情况，据此决定我们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放下架子，当群众的小学生。干部到群众中去，不要带传令兵、秘书。如果你摆官架子，群众就不愿接近你，更不会同你谈心里话。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是人民的儿子，是群众中

的一分子，什么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摆在特殊的位置。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井冈山的日日夜夜，他经常独自到老乡家去，进行仔细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疾苦。他在外出调查时，从不摆官架子，不带勤务兵，群众都把他当成自己人，敢将心里话讲出来。他还经常到战士中去，和大家促膝谈心，亲如家人。有一次，部队在行军途中买了些玉米棒子，每人分了一个，毛泽东同志拿了个最小的，在路边拣些柴烧了烧，同战士们围在一起边吃边谈。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那种动人的情景。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红军把做群众工作作为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每到一地，除少数人布置警戒、安排住房外，大部分同志深入到附近的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开展宣传工作。红军的影响不断扩大，军队和人民的关系真正像鱼和水一样，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地存在和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摘自张令彬：《胜利的源泉——回忆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十一团教导队区队长、教导队代队长、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官长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 创办大陇圩场

井冈山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基本没有被破坏，群众基础好，这些都是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这里距大中城市较远，经济落后，这给新生的红军在给养上带来极大的困难。蒋介石为了摧毁刚刚建立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调集湘赣两省的军阀部队，连续进行三次军事“会剿”与经济封锁并用的手段，企图困死英雄的井冈山军民。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和残酷的局面，毛委员提出大力发展农村工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他亲自找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红三十二团团团长袁文才等领导干部，研究在宁冈县大陇镇建立红色圩场，开展红区和白区经济贸易。以此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红军面临的困难。

大陇镇在宁冈县西南，是黄洋界山下的一个小镇，它和湖南的酃县、茶陵，江西的永新、遂川、莲花等县接近，地理位置比较好。该镇原有百来户人家，有一条小街，有十几家小杂货店，在这里建立红色圩场、用于井冈山周围各县镇的人民群众和小商小贩开展经济交流，进行买卖交易。

当时，由于敌人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食盐、药品、医疗器械、布匹和棉花等物品奇缺，这些东西在根据地内有钱也买不到。根据地的红军指战员开始还能吃上红米饭、南瓜汤，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时，只能用无盐煮的竹笋干和野菜来充饥了。数九寒天，毛委员、朱军长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仍然穿着起义时穿的两件单衣。红军战士们只好披着夹被站岗放哨，夜晚用篝火和干稻草来取暖防寒。由于生活艰苦，衣被单薄，伙食很差，营养不足，伤病员明显增多。刚刚组建的红军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和药品少得可怜，靠白区地下党援助困难也不少。受伤和患病的指战员，只能靠乡间的郎中（中医）来诊断，靠服中草药来治病，使一些本应抢救过来的伤病员没有抢救过来。我记得当时红军医院收了一个叫袁明贤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只需做个简单的手术，可那时不仅没有麻药，连消毒用的食盐水都找下不到，致使伤口发炎，伤势恶

化，抢救无效而死亡。

毛委员发现这些情况后，几次指示湘赣边特委财政部和宁冈县委，抽调一些搞经济有经验的负责同志，认真抓好农村工农业生产和白区城乡的经济交流工作，号召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采取各种措施，利用各种渠道，组织根据地内外群众开展物资交流，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解决食盐、药品和棉花等物资奇缺的问题，改善军民生活，活跃农村经济，支援根据地斗争。毛委员对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明确指示：井冈山地区不仅出产大米，还有大批木材、竹子、茶油和工业用的桐油等土产，你们要设法将这些东西偷运到赤白交界的地区去和白区的小商贩，以及那里的人民群众换回我们需要的物资。并指示地方政府，组织工作队到人民群众中广为宣传，说红军要在大陇镇开办红色圩场，进行苏区和白区的物资交易，促使农村经济发展，克服军民生活困难。边界周围各县镇的商人和老百姓听说大陇镇开设红色圩场，都很高兴，很拥护。每逢农历的一、四、七，他们都带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来逢圩。红色圩场一开张，井冈山农村的经济便开始活跃起来，一些根据地内奇缺的物资和生活用品，在这里常常可以买到。对缓和井冈山根据地物资供应上的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色圩场建立起来以后，毛委员又指示湘赣边特委和宁冈县委要制定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地方政府根据毛委员的指示，抽调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同红军战士，赤卫队和暴动队的队员一起组成许多个宣传小组，深入到赤白交界的农村和街道去，向商贩和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宣传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宣传工农红军的纪律是秋毫无犯，买卖公平，红军保护商人行动自由和生命财产安全，说明他们来大陇红色圩场做生意，会受到政府的保护等等，同时还用红土泥水、石灰水、锅底灰水在道路、街道两旁的墙上，刷写许多各种颜色的标语口号：如“自由交易、公买公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繁荣经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等。

后来，由于反动派的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军民急需的食盐、药品、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又出现严重缺乏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彻底揭露反动地方武装、土豪劣绅和好商的造谣和欺骗宣传，毛委员指示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采取走亲访友、亲串亲的方式，向商人和群众宣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是保护中小商人的，根据地内买卖自由，交易公平，到根据地做生意，不纳捐，不抽税，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群众和商人的利益的。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会做损害群众和商人利益的事。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宣传，特别是边界的人民群众和到过井冈山根据地做生意的商人的实际感受，使他们对工农政府和红军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识破了反动派和好商的欺骗宣传的阴谋。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城乡经济贸易，毛委员指示：县、区、乡政府要派出地方武装，打掉酃县和茶陵反动派为封锁根据地所设的哨卡。反动派的哨卡被打掉以后，红色圩场又兴旺起来，白区的人民群众和商贩又背的背，挑的挑，推的推，三五成群地携带着根据地需要的各种物资，踊跃地到红色圩场来逢圩。根据地的商人和人民群众也同样带着自己采集的山货和农副产品到圩场去交易，换回他们自己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的物品。

大陇红色圩场开辟后，白区的商贩和人民群众一致反映：“我们来到红

色大陇圩场做生意，感到什么都比白区新鲜，心情格外舒畅，红区和白区真是两重天，红军和白军完全不一样，白区和红区人民亲如一家，我们哪怕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支援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井冈山根据地人民群众说：毛委员真英明，大陇圩场开设得好，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了难关，而且促进了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摘自赖春风：《毛委员领导我们建立红色圩场》，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04—509页。作者当年参与创办大陇圩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群雄会井冈

1 朱毛雄师会井冈

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同志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创立了革命根据地。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派我去找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并且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相机和邻近地区革命力量取得联系。

到长沙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秋收起义经过向省委作了报告。当时，省委指示不必再去找衡阳特委了，由他们联系，而要我绕道粤北去联系革命力量。我遵照省委的指示，辗转来到广州。正巧又赶上广州起义。从广州到韶关的火车不通了，情况非常混乱。我在旅馆老板的掩护下，躲过反革命的搜捕，10天后，方搭上火车在一个夜间来到了韶关。接着又辗转来犁埠头，找到朱德和陈毅部队。见到朱德后，我把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后的情况，以及我意外地找到此地来的经过，向他们报告了。朱德同志高兴他说：“好极了。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了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前些天刚派毛泽覃同志（毛泽东同志的胞弟）到井冈山去联系了。”他接着详细地询问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情况。第二天，我便离开了他们，赶回井冈山。

不久，朱德和陈毅同志率一部分直属部队开进耒市，住在耒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过了三天，毛泽东同志带一团回来了（毛泽东奉党中央指示率部队开往湘南支援湘南起义——编者）；朱德同志的主力部队，也从安仁、茶陵一带开来了。宁静的山中平原顿时显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同志一到耒市，我们便向他汇报了情况，并且说：“朱德和陈毅同志就住在前面小庄子里，在等你回来。”毛泽东同志一听，就站起身来对屋里的干部们说：“你们不要走，一同去看看他们吧。”

这是1928年4月底的一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新，满野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照得溪水盈盈门光，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日子。大家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后，轻快地走着，不约而同地注视着他的巨大稳重的背影。是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井冈山上竖起第一面红旗，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今天，两支革命武装会师了！井冈山的武装更加壮大了！

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听说毛泽东同志来了，忙到村边来迎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他们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那么热烈，那么兴奋。

进到屋里后，他们互相把周围的干部向对方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们！”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谈了一阵军情以后，毛泽东同志热情他说：“趁‘五四’纪念日，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个热闹的庆祝大会，两方面的负责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说着，转过身对我说：“何长工同志，你负责准备一下吧。”他详细地指示了该准备些什么，最后特别强调他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新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到处是一片爽朗的笑声。

山明水秀的蓉市，今天更加美丽可爱，山茶花更红，菜花更黄，溪水更清，秧田更绿。在蓉市南边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和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的云霞似的红旗簇拥着。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标语板，插满主席台两旁。

一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点钟，离这20里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1万多，群众也不比部队少，仿佛一个人海，歌声、笑声、讲话声，汇成喧闹的浪潮。

10点钟，由党、政、军、工、农、青、妇、学、商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大会开始！从树顶直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声整齐嘹亮，远近的山峰都传来回音。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说：“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来开大会庆祝两个部队的胜利会师，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接着他宣布：“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他说：“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只有敌人在那里难过。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消灭他们呢！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依托，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最后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的利益。接着，毛泽东同志从主席团席位上走出来讲话了。他指出这次会师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分析了红军部队的光明前途。他说到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革命的思想，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总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这一部分。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有强，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我们手心里玩。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真把大家说得心花怒放。

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的问题后，各方面的代表也都讲了话。大家都满腔热情地祝贺新成立的工农红军第四军。

会师以后，井冈山地区红军的声势更加浩大，革命的人民都更加向往井冈山。长沙南昌的学生，安源煤矿工人，醴陵等县的农民……大批地向井冈山聚集，连蒋介石的军队，也成营、成连地拖着枪来投奔红军。

井冈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最坚实的堡垒。

（摘录于何长工：《井冈山会师》，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 213—222 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等职。）

2 双雄相会力无穷

井冈山没有朱毛会师，也不能成为大的力量，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只有几百人。王佐、袁文才的部队，我们给他们武器，他们接受我们的编制，但是他们不走，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守住井冈山，不让井冈山变成国民党的。我们答应了这个条件，他们才改编成第二团。秋收起义的部队到三湾改编后叫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谁当团长呢？想找一个有名的人当团长，就让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当团长。其实郭亮不在这里，已被国民党抓住了。为什么用他的名字呢？因为全省群众都知道总工会的委员长是郭亮。我也是知道团长是郭亮才判断这个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我才到那里去。那时我在攸县工作，站不住脚，跑到长沙没找到党的关系，跑到武汉也没找到，只好回攸县。回攸县还是不行，就到了茶陵，因为我曾在茶陵学徒两年。我在茶陵学徒的那一家，还是收留了我，但是也明确告诉我：“我知道你是干工会工作的，国民党抓住要杀你的头。你来这里，只能在里面干活（印刷、装订），不能到柜台上。”这种形势过了一两个月也就变了，没什么事了，晚上可以出来同参加过工会的或一般店员接触。所以当第一团到茶陵贴布告，知道了是郭亮的部队，我就到团部去接头。记得是宛希先同志和我接的头。我告诉他，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里的名字叫夏总工。他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说，我们这里的总工会、党支部是夏天成立的。所以叫夏总工。他说，你还是叫原来的名字谭震林吧。我说，那也可以，反正这个名字国民党也知道。

朱德、毛泽东两支队伍会台后，力量就大了。以后又进行了改编，朱德带的编为二十八团；宜章暴动后，改编了一些地方武装，其中宜章的胡少海部，到井冈山编为二十九团；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叫二十一团；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叫三十二团。就这样，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

井冈山朱德、毛泽东会师后，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上来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两个师打败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这句话是朱德针对打败这两个师讲的。这两个师，一是杨如轩，一是杨他生，红军占了永新城，开了个永新会议。红四军军委、前委、永新县委和永新周围的有党的工作的几个县的负责人都到了，即莲花、茶陵、攸县、安福、吉安、泰和这些县都有人参加了那个会。那次会议决定首先把筵西这块地区建设起来，建设一个大的根据地。可是这时湖南省委又派了杜修经同志来传达湘南特委的建议，叫红四军再打湘南，把湘南变成革命根据地。当时毛主席明确指出：湖南，特别是湘南，我们不能占，这是湖南军阀与广东军阀斗争的一个主要交通线。你占了，广东军队也得来，湖南军队也得来，你打谁？打不赢。他说，我们最好是打江西，因为江西的驻军是客军——云南军队，没有地方正规军。当地部队的军官都是当地土豪劣绅本人或他们的子弟，你到哪一个县都要惹他们的。像湖南的何键是醴陵

人，谭延闿是茶陵人。谭延闿家的房子就被我们烧了，因为那时主张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湖南省委的杜修经到了龙岗一看，说：“这么好的地方你们还不烧掉？”毛主席问他：“烧掉了干吗？烧掉了我们连盐、火柴都买不到。不烧，这些商人还可以做生意嘛。”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说：“我说不要烧，留下来有好处。因为房子农民可以住，为什么要烧掉？”一次我们打下一个大墟场，叫高陇，任务是找报纸。因为那时毛主席要决定部队的行动计划，他要看报，考虑全国形势，了解各个军阀和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主要看《大公报》，当然其他报纸也看，以便研究对策。毛主席还提出要保护邮电、学校、商业、医院、医生，为此还公开贴了布告。

如果没有朱毛会师，我们就不能打下永新县，就不可能提出建立赣西根据地。这个决定后来为什么又垮了呢？还是杜修经传达了湖南省委的决定，要红军再开到湘南去。因为当时前委是湖南省委组织的，前委是要执行省委的决定的。朱德、陈毅部队就左湘南了。朱毛会师增加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去湘南打了一仗失败了，但没有这个会师红军就不能够发展。

后来，彭德怀同志 1928 年在于江起义后站下往脚，也来到井冈山。这时井冈山上已有 3000 人口，靠下边挑粮食上山。宁冈粮食也不多。大家挑粮食，朱老总也挑，而且扁担上还写“朱德”二字。1928 年冬天过年，朱德同志写了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侬穿吃一样；白军里将校尉待遇不同。”上面还有四个字，我忘了。现在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写的，这不是事实。

所以，井冈山根据地的意义要讲清楚，没有井冈山，革命力量是集中不起来的”朱毛会师的意义要讲清楚，没有这么大的一支红军就打不了大仗。

（摘自《谭震林同志谈井冈山和朱毛会师》，见《星火燎原》杂志 1982 年第 2 期，战士出版社出版第 3—4 页。作者当时任中共湘赣特委代理书记、书记等职。）

3 宁冈瑞金两次会师

1928 年 12 月 11 日（应为 12 月 10 日——编者），红五军和红四军胜利会师了。

会师大会在宁冈新城外一个广场上举行，场上临时搭起一个台子，我们整队入场，依次排列在台前等待着，忽然，场内迸发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是毛泽东党代表和朱德军长来了，大家部睁着大眼望着他们，毛泽东、朱德同志都穿着一身灰军衣，头上戴着缀着红五星的军帽，脚穿草鞋，含笑向我们挥手，他们那亲切、慈祥和充满胜利信心的笑容，真是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领导同志一起走上台去，没想到台子搭得比较简陋，走上去人多了一些，一下子把台子压垮了，我们就立即动手，把台子重新搭好。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地议论开了，说什么：“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这话大概被朱德同志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子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人群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会上，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当他说到：今天我们红四军和红五军胜利会师了，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了。全场掌声雷动，大家都感到毛泽东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毛泽东同志接着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了红四军和红五军，将来我

们一定还会有几十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围攻，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彭德怀同志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地学习红四军的宝贵经验。接着，朱德、滕代远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

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之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地从红四军派了党代表到红五军各大队来帮助工作，帮助建立和巩固各级党代表制度，传播红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红五军还派士兵到红四军访问学习了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红五军的政治工作活跃起来了。

这时，蒋介石反动派慌忙调兵遣将，纠集湘、粤、赣三省敌军 20 来个团的兵力，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反革命“会剿”。面对这一严重的形势，毛泽东同志召集了红四军、红五军高级干部会议，分析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了必须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垮敌人对井冈山的包围和封锁，红军除坚持在井冈山根据地打击敌人的进攻外，还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在更广大的地区内开展游击战争，来调动敌人，从而粉碎敌人的“会剿”。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地区出击，扩大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防务由红五军担任。

1929 年 1 月间，敌人乘我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发展之际，纠集十几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攻。红五军经过英勇激烈的战斗，给予了敌人严重的打击和大量的杀伤，后敌人利用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侧面上来，前后夹击黄洋界哨口的红军，最后李灿带着部队，用绑带接成绳子，一个个地从岩石上吊下去，100 多人转移到敌人后面打游击，黄洋界哨口失守。红五军主力，因敌众我寡，若再坚持下去，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同志决定红五军撤离井冈山。

下山的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我们便从悬崖陡壁处下山……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敌人不甘心失败，令其反动军队前截后追我们，我们下山后就向大汾圩挺进，当时天下大雪，山陡路滑，走到离大汾圩只有几里路远的时候，我们侦察到敌人有一个营和一个靖卫团在大汾圩阻击我们，彭德怀同志很坚决，部队在突围之前，他向我们作了战斗动员。他说，这是我们突围的最后一个口子，我们一定要打垮敌人，冲出去，和红四军会合。今天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一个接一个的走，只要冲出去了，本军长自有办法。我们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枪一响，只听得杀声震天，红军战士一个个奋勇冲杀，经过一场恶战，敌人的封锁终于被我们冲破了，我们胜利地冲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从大汾圩突围出来后，我们就向赣南地区进发。一路上我们积极打击和拖住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红四军东进闽赣边的战略行动。3 月间，红五军到达桥头、平江寨一带，在这里得到了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补充了部分兵员，充实了力量。这时侦察到于都驻有赣敌刘士毅部的一个营正规军，领导决定以奇袭消灭这股敌人，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等，解决了枪弹缺乏的困难，战斗以后，即乘胜向东发展，打到了安远。当时我们同红四军已中断了联络，打开安远后，才从敌人报纸中，知道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已攻克了福建长汀，正向瑞金方向前进，四五月间，我们红五军到达了瑞金，和红四军再次会师了。

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同志和红四、五军领导同志开会，分析

了当前革命发展形势，讨论了红军的任务。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指示，决定红五军迅速返回井冈山，恢复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会议的决定，很快地在我们排以上干部中间传达了，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懂得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了解到有了根据地，部队才有地方进行休整和补充力量，以便继续战斗，夺取更大的胜利，更明确了井冈山根据地对整个斗争的重大关系。因此，全体指战员一致拥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决定。

在我们临行前，毛泽东同志亲自指示从红四军中拨给我们一部分物资、药品，要我们带给井冈山地区的人民群众。

部队从瑞金出发，连日兼程行军，每天都走八九十里，甚至 100 里以上，行至信丰、南康地区，领导上为了照顾生病的同志，决定动员他们留在游击区休养，病愈后再归队，游击队的领导同志也非常欢迎。领导虽然如此关怀，但是谁也不想留下来，大家都希望早一天到达井冈山。

部队在信丰地区休整了几天，地方党组织派县委组织部长郭一清带来 170 多个青年参加红军，领导上决定和原来的保卫队合并成立军政治部保卫队，并指定郭一清任党代表，我任大队长。

我们离开信丰后，继续向井冈山进发，一路上我们行动迅速秘密，敌人捉摸不到，当我们到达黄垌时，很快地将遂川“地头蛇”肖家璧的地主武装打垮了。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转战，4 月底，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和毛泽东同志交给的任务，又重新踏上了井冈山的土地。反动派把山上的房子烧光了，群众一见红军回来非常高兴，这时和井冈山的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李灿、何长工、王佐等又和我们亲热地相会了，重新恢复井冈山根据地。

部队回到井冈山后，彭德怀同志给大家传达了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红五军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指示，慰问了井冈山的人民，并将王佐部队和李灿部队合编为第五纵队，由王佐任司令员，何长工任党代表，李灿任副司令员。

（摘自李寿轩：《从平江到井冈山》，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98—602 页。作者当时任红五军第五纵队十二大队中队长，大队长，军政治部保卫队大队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留守井冈山

1928 年 8 月初，红军第五军离开平江进占了江西之修水、铜鼓。湘、赣、鄂三省反动军队又集中了 10 余团向我军“会剿”。经过两个多月的打圈子战术（敌称之为盘旋战术），才把敌人拖疲击退。在铜鼓之幽居，以滕代远、王首道同志为芮的领导下召开了湘、鄂、赣三省边区县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边区党委特委，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这次会议，总结了平江起义取得胜利的几条经验。第一，主要是由于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第二，是由于有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的热情支援；第三，特别有井冈山的革命旗帜作榜样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指引——这不是偶然的，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井冈山起了收容阵地和继续指导全国武装斗争的作用：总结了秋收起义、南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运动的丰富经验，而成为指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旗帜，是湘、鄂、赣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指路明灯。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我们才有胜利的前途。这次会议也反对了乱烧乱杀的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将红五军所部同地方游击队混编为三个纵队和一个军属特务大队。一纵队在平江地区；二纵队在例阳、万载；三纵队在铜鼓、修水坚持游击战争。黄公略任第二纵队长，并临时指挥各部。我和睦代远同志带五个大队，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红四军在宁冈会师了。到达宁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详细讨论了“六大”决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通过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使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也是毛泽东同志初次对我的传输。因此到现在尚记忆犹新。

在当时，湘赣两省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山区“会剿”形势已经形成。我红四军物质又极为困难（油、盐、药物，特别冬衣），红四军只有离开井冈山向外地发展，否则没有其他较好办法克服困难和搞乱敌人的“会剿”部署。可是，部队伤病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安置，派部队留守，就势必分散主力（当时红四军大约4000余人），不利于主力行动和作战，如不留部队据守，对坚持湘赣边区（井冈山）根据地斗争也是不利的。以一部分兵力防守井冈山，就可以吸引住敌人“会剿”的主力，对于当时红四军向赣南行动是有利的。红四军前委根据当时情况正确地决定，将红五军部分留守井冈山，并编入红四军，我为副军长，坚守井冈山根据地。

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才三天，湘、赣两省白军约10余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经过三昼夜激战后，湘军攻破我黄洋界和八面山阵地，直逼大小五井；赣军攻破我白泥湖阵地，直迫茨坪，情况十分严重，唯有遂川方面之小行州阵地未被攻破，原前委决定红四军在敌围攻井冈山时，从外侧翼打击敌人，全无消息，为了免遭覆灭，我们便率领收容起来的六七百人，再加伤、残、病、弱共千余人，从井冈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围，在左安又一次遭敌伏击，突破重围，经过数昼夜艰苦战斗才脱离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当时饥饿交迫的困境是无法形容的）。但是敌人仍继续追击，堵击、侧击，我军经崇义、安远、会昌等县境，约月余才到达兴国之莲塘、东村地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和二团。这时，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和群众的掩护下，对于敌情比较明了，并且得到了两天休息。在这次长途战斗行军中，所部仅剩300余人，从而也深深体会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哪里有地下党组织或者地下党员时，哪里的群众对待红军的态度就显然不同。略加休整时，白军刘士毅旅又追逼占领了莲塘。我军乘夜脱离了白军追击，而奔袭干部城，消灭了刘旅留守部队一个营和民团共约千余人，待刘旅急转回救时，我义转移攻占安远县城，消灭了该城民团数百人。当时，仍准备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根据地，在安远县城的反动县署搜得文件获知红四军攻占了长汀的消息，为了配合红四军的行动，我军又北进占领瑞金（滕在于都负伤休养）。这时红五军部队从300余人，又发展到了700余人。不久，在瑞丰与红四军又会师了，时值1929年3月，在瑞金我在毛主席处看到了中央的2月来信，其大意是认为当时形势特别严重，要红军采取分散潜伏活动；毛朱离开部队，减小目标。我当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虽然情况紧张，但是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越是时局严重，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就越不能离开军队，所以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原稿在主席处），经毛主席略加修改，由红四军前委转给中央了。

（节录自彭德怀：《往事回忆》，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下)，第 586—589 页。作者当时任红五军军长，红四军副军长；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四、新型人民军队的初创

1 伟大的开端

秋收起义开始于 1927 年 9 月 8 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干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第四团丘回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例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从省委去铜鼓的路上，被敌人扣留，后来虽然机智地脱了险，但起义部队战斗已经失利。他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庐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 1000 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失败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门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从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

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的艰苦性，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武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哟，便停下来收集夫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围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更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明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准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人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它一直对

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7—144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团参谋、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

2 挽救革命武装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湖南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军阀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群众。这时，平江、浏阳等县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情况，未能攻进长沙城，退了下来。他们一边寻找上级党联系，一边整编队伍。队伍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贺老总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张启龙同志任党委书记。南昌起义暴发，他们想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但是贺龙、叶挺同志率领大军出发已久，联络不上。他们沿途又遭受到一些挫折，和反革命武装的阻挠，便一边派入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一边转战在湘赣边。我们参加独立团时，张启龙同志亲自找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去了，由彭商仁同志代理党委书记。

几天后，独立团从高安出发了。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了铜鼓。这是一座偏僻的山城，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祠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祠堂就是我们团部的所在地。肖家祠堂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当时在新兵训练处工作，就住在小河对面的另一个祠堂里。

我们独立团在铜鼓休整近一月。这期间，“八一”起义后从武汉赴九江途中在黄石港上岸的警卫团，转移到武宁、修水，和我们联系上了。在山口——铜鼓、修水之间的一个小镇子，召开了“山口会议”。独立团原来只有一、二两个营，会后补充了我们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编为独立团第三营。

正在这个时候，部队中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情，毛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只身从湖南来到了我们部队！毛委员的头发很长，上身穿白线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听说，毛委员在来铜鼓途中，曾经遇险，一度被敌人扣留，所幸身上带了几块钱，才设法得以脱身，来到部队。记得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在肖家祠堂举行会餐。饭前，毛委员和全体干部见了面，并且讲了话，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毛委员接着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号召我们举行秋收起义。

过了中秋节，我们就出发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原警卫团改编为第一团，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我们独立团改编为第三团，第四团则是收编军阀夏斗寅的残部。部队的任务是总攻长沙，计划是：一、四团由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二团自萍乡、醴陵先打浏阳，再攻长沙；三团从铜鼓出发，与二团同时打浏阳，会攻长沙。

我三团首战攻克白沙市。这时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

门前的洋油灯，仍然闪着黯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长途奔波，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这时已是9月中旬，大气渐凉，毛委员身上那件细布短褂，自然抵不住仲秋的晨露，只好披上一件白布夹被御寒。我团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这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缺乏弹药，没有给养，1/3的战士发疟子，打起摆子来，不用说打仗冲锋，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当时，党的绝对领导还没有树立起来，革命的武装斗争也还没有经验。我们到达东门市时，部队很疲劳，突然遭到敌人强烈火力的袭击，我团败退排埠。王兴亚同志率领的二团，因不明情况，孤军向浏阳进攻，并占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败我团后又回头打浏阳，遂使二团陷入重围，背城面水死战，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至于打平江的一路，前面刚到长寿街与敌人打响，未经改造的四团便发生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也垮下来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了。我团退至文家市，才与一团会合。

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挫折。在最艰难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坚定、沉着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他讲话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干。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毛委员的话，坚强有力，驱散了同志们心头的阴影，再一次鼓舞了我们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毛委员在文家市收集了败退下来的部队，向南退却，当通过卢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剩下不到千把人了。到达永新县三湾，毛委员就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整顿纪律。原来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下设一、三两个营，没有第二营。毛委员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让他回到农村去工作。这样，留在革命部队的同志，便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在毛泽东同志胜不骄，败不馁，意志坚决，毅力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向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沿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阔步迈进！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呆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震山峦。毛委员亲自率领着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宁冈地界。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碛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地方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小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时，他决定派游雪程、徐彦刚同志和我三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不久，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原来，我们三人在水口离开部队以后，毛委员便率领团部及一、三两营向大汾移动，在大汾遭到反动地主武装——江西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率领三四百条枪的袭击，因猝不及防，部队被

截做两股，毛委员率领团部及一营就上了井冈山。

毛委员率团部和一营在井冈山上整训休息，巩固部队，加强战斗力。同时趁机消灭小股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这时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觉得有了个家，军队可以养精蓄锐，进退自如了。

井冈山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山上虽然有不少竹木山货可以换取粮食及生活用品，但为敌人封锁，贸易往来完全断绝，部队多了，不能在此久待，这时茶陵恰好是座“空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只有当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几百人。（当时江西的反动地主武装叫做“靖卫团”，而湖南的反动地主武装则叫做“挨户团”。）我军奉毛委员命令，稍事休整后，瞅准一个机会，顺利地进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

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磨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不能够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刘辉霄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朝清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刘珍、王怀等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指示了在一定条件许可下开展地方工作。毛委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已经在英明领袖的头脑中形成了。

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又有了一定的安置，毛委员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12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这里的农会已经成立，我们进村时，农民们正在开会，分土豪的东西。我们为了保密，加以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确实有些累了，没有过多地打听消息，便找地方住下来。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袁营氏派来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当时我还有个打算，不愿意老呆在井冈山后方，想跟随毛委员回大部队工作，故将带来的一个班战士打发回井冈山，自己设法留下来了。我们一行八九人，紧赶慢赶，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得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好在茶陵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沿途有农民赤卫队放哨，我们一边询问情况，一边继续前进。不久，夜幕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不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大家立刻商议轮流放哨的次序和时间，毛委员把他和我两个人安排在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夜已深沉。枪声逐渐稀落、疏远。战斗的结果怎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回旋在我的脑际。根据傍晚传来的激烈的枪声判断，敌人不会是“挨户团”团总罗定的队伍，他们是没有重机枪的，也许是茶陵的土豪劣绅搬来了敌人的正规军，向我们进攻。当然，茶陵城内我军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一营驻守近一个月，打过两次胜仗，既熟悉了地形，又获得了战斗经验。现在生力军第三营赶来会合，武器弹药都有了相当的补充，再加上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持，必然会使敌人大吃苦头。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这更加使我感到迷惑了。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这很使人怀疑。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忽然，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的村子附近发现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条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样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看看正在值班的毛委员，他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判断情况。

天将拂晓，我们盼望已久的赤卫队队长才返回村里，报告说：我军已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水口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去追赶部队。早饭也来不及吃了，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临时把放在岸上的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促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水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遇到3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委员，真是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委员一面亲切地安慰了他们。一面将自己用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向茶陵县城进攻的敌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的部队。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

我们紧紧跟随着毛委员，急行军奔波了30多里路。大家的肚子实在饿了，加上收容了3个伤病员，要找民夫和担架，于是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一面找民夫，绑担架，一面草草搞了点饭吃。毛委员在忙迫中间我：“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罢，我就要毛委员的警卫员到村头去放哨，监视来路有无情况。

经过一阵短促而又紧张的忙乱，总算绑好了3副担架。民夫们抬上3个伤病员，一行10余人继续向水口前进了。谁曾想到，毛委员和我们竟变成了我军撤退的最后“收容队”和“掩护队”了。

我们赶到水口，天已黄昏。部队正在休息。当晚，毛委员就召集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毛泽潭同志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只听到

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具体内容就不大清楚了，紧接着，毛委员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砦市开拔。

三营从桂东来到茶陵，刚刚和一营会合，就碰上这样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伤亡较大。部队十分疲惫，极需补充、休息，总结经验教训。毛委员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路，一边行军一边休息。从一开始出发，毛委员就亲自下到连队里了解情况，分别和连上的干部们谈话，边走边谈，在一个连队里谈完了，又转到另一个连队的行军行列里。毛委员这种灵活及时、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深受到感动。到达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毛委员又召集各负责同志继续开会。深夜，散会以后，毛委员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连夜取捷径走小路赶回砦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要他们回去预先准备一下，以便部队到永新一带去活动。

我到砦市不久，毛委员带领部队回来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从此党、军队和地方组织取得了统一的行动。

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把事情的真象弄清楚了。原来，部队退出茶陵城，不回井冈山而去水门，是由于团长成皓和他的副团长、参谋长等人的叛变阴谋。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贪生怕死，利用茶陵一战对我军有利的情况而进行叛变。成皓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因此成皓企图把部队拖主投降方鼎英的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毛委员下了井冈山，及时赶上部队，揭穿了成皓等人叛变革命的阴谋，把部队带回井冈山附近。从水口到砦市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正是毛委员团结同志们向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毛委员根据党的决定，随即将成皓等人撤职，任命原三营营长张子清同志为团长，朱三卿同志为参谋长。

这样，新生的幼年红军所遭遇到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被毛泽东同志挽救了。

（摘自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见《红旗飘飘》第14集，第8—18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三团排长、教导队副队长；1955年被授了上将军衔。）

3 铁的军队铁的纪律

秋收起义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向井冈山进军。那时候，因为战斗连遭失利，又没有根据地立足，部队不得不冒着暑热、拖着伤员病号连续行军，士气十分低落。那真是最困难的时期。整个革命形势处在低潮，需要我们这支弱小的、被失败情绪严重侵袭的部队继续把革命火炬点燃下去，那要经过一番多么艰苦的工作啊！

就在这时期，毛泽东同志除了将部队进行改编，建立党的组织，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外，并且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要部队担负武装宣传队的任务，向群众宣传我们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军队，是一支与旧式军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军队。如果下让老百姓了解我军特点，使他们感到我军与旧军队有截然的区别，我们便无法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也就无法存在。当时我们的旗号，虽然已经改为工农革命军，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但部队的服装

样式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显然的区别。旧军队留给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我们虽是工农革命的军队，但由于部队成员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旧的习气还未清除，新的纪律还未建立，因此，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不利军民团结。

毛泽东同志根据群众的反映，每大都和部队讲话，沿途也写大字标语，要求大家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经他经常谆谆告诫，情况有些好转。可是环境困难，战士们肚子饿了，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一个鸡蛋的事还很多。向地主土豪筹款，大家乱拿一阵，有的还拿到贫农和小商人的头上。特别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不听指挥，乱说乱动，侵犯群众利益。那时党员的理论水平不高，也无法说服和制止这种行为。这些日子行军，毛泽东同志常常走在队伍中间，一边和战士们聊天，了解情况，一边给他们讲些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

部队沿湘赣边向南行动（记不得是什么日期了），路经大汾，遭到敌人的伏击，担任前卫的三营被隔断，继续南去；一营和团直属部队集合起来，决定上井冈山。当晚，就在金竹山下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子宿营。

第二天早晨，部队在村边大路旁集合。天气很好，衬着朝霞，层叠的山峰，密密的树林、竹林，显得分外壮丽清秀。我们知道这里就是井冈山的边沿，今天就要进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由于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人数更少了，有些孤独之感；另一方面，上井冈山，能有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这时候，毛委员走到部队前面，站在路边石坎上开始讲话。乱哄哄的三四百人，顿时肃静下来。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

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为什么要规定三项纪律，他又进行了解释。这一宣布，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到现在还铭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就在前几天，我们班有人曾经在行军休息的时候，到老百姓地里拾过一个露在地面的红薯。经毛委员这一宣布和解释，我才明确地认识到这是违犯纪律的行为。

1928年初，我们从茶陵撤回井冈山，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这期间，毛委员又宣布了城市政策。在这以前，我们曾犯过一些错误，把商人、小贩的货物也没收了，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秤也拿来了。毛泽东同志发觉这些情况后，立刻作了纠正。他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而要保护工商业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没收封建剥削的部分，商业部分，连一个红枣也不能动。如果有些特别坏的上豪、恶霸，必须没收他的商店的活，就一定要出布告，宣布他的罪状；没收地主的财产也要出布告，宣布他的封建剥削罪状。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尽量召集群众大会，散发给群众，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敢于组织起来同封建势力、剥削阶级作坚决的斗争。除了订出了这项城市政策外，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还不断地找群众谈话，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反映，

然后将这些反映，归纳起来，对部队进行教育。

没过几天，毛委员又在遂川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他特别解释说：“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总比不赔好。”他提出的要求合情合理，简明扼要，大家很容易接受，并且也容易做好。当我们把毛委员的指示贯彻到行动中去以后，某些群众的不满情绪也就随之消失了。过去部队一到，群众便逃之夭夭；经过我们广泛宣传和实际行动证实以后，群众再看到我们，不仅不跑，还主动帮助我们调查土豪地主坏分子，配合我们开展工作。从此完全改变了我军同群众的关系。

1929年春，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万分艰苦的战斗生活里，毛泽东同志手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大家一直严格地遵守着。后来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虔南）。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在沟里、村边洗澡，结果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

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刻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添上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厕所）”。因为群众对我们最有意见的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当我们一纠正过来，群众便立刻和我们接近了。

自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了，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大过一个，俘虏大量增加。这时毛泽东同志便将八项注意，增添为十项注意，即增加了宽待俘虏（包括释放俘虏、不搜俘虏腰包、不虐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两项。最后，又将大便找厕所等两项删掉，变为八项注意。从此，项目便固定下来，只是在新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例如将“打土豪要归公”，最后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后改为“下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拿群众像针那样小、像线那样细的细小的东西，等等。

几十年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正确处理军内关系、团结人民群众、争取敌军诸方面，起到了伟大的作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订的过程，也体现出毛泽东同志领导工作的方法：适应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某个工作任务、斗争形势、群众的习惯和要求，而提出非常明确、通俗易懂、看来很平常但政治意义却很重大的几条，作为人民军队行动的指针，因而可以很快地为广大官兵所领会、所掌握，并贯彻执行。这样，比讲长篇大道理起作用快得多，好得多。这些领导工作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来认真学习的。

（节选自陈士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见《星火燎原》第1卷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1—265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第三纵队副大队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 改造绿林武装

1928年初，我们住在遂川城里。一天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向我说：“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我问：“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笑笑说：“又不是去打架，要许多人干什么！你先去打前站。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听说要我自己上山，心里真有几分犹豫。王佐是井冈山上的一支地方武装，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两个领袖。如今虽然打的是农民自卫军旗号，反抗旧势力，但纯粹是私人武装，阶级观点模糊，流寇思想、游民习气很重，靠着封建的红帮关系维持他们的内部，完全是闯江湖的一套。我单人独马，怎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呢？

“不要怕，”毛泽东同志看出我有顾虑，便鼓励我说，“去了以后，困难是有的，要边工作，边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参谋长张子清同志在一旁说：“毛委员的意思，要迅速改造这支部队。他们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如果山上出了问题，我们就有后顾之忧。毛委员已经直接做了许多工作，宁冈县委也跟袁文才谈妥了。你去吧，按照毛委员的话去做，一定成功。”

毛泽东同志给了我许多指示，他特别强调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一句话），巩固了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上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我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着他亲笔写给王佐的信，背起一个小包袱，就出发了。

井冈山，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一座高峰，南北90里，东西80里。周围有7个县，15个市镇，山上有一片平地 and 许多梯田，王佐带领一支人。就住在山区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带领一支人住茅坪。他们一个山上，一个山下，把守了通山的7条道路。

工农革命军开始进入井冈山地区的时候，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有戒心，不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当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评了这种思想，特别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武装。为此便通过地方党的关系，对王佐、袁文才进行了说服教育，并且送给了他们一些枪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王、袁早已熟悉了。因此我上得山来，一说是毛委员派来的，王佐便以宾客相待。

王佐这人，只有30来岁。身个不高，白面胖胖的，两条眉毛浓黑，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支新式的驳壳枪。他有一身的好武艺。听说有一次十几个敌人把他包围了，他拿着一条板凳，就打出了重围，然后摸过一条竹竿，嗖地一下，跳上了房顶。他原来是文盲，这时已能读一般的文件了。他读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信，连声叫道：

“好！好！欢迎，欢迎！”

说了一会儿话，王佐即命人摆酒设筵，说要为毛委员派来的人接风。

他们的生活作风，颇像当年的绿林好汉，大碗饮酒，大块吃肉。虽是靠山为营，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饮酒中王佐盘开了我的“家底”。毛泽东同志曾嘱咐过，说他们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谈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遵守着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条原则，我毫不掩饰他讲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王佐听了面带笑容。看来他对我坦率的回答，颇为满意，随即也将他自己的出身、经历说了一番。最后感慨他说：“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当过裁缝，种过田；因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才起来闹革命。”接着他谈起这几年的战斗生活，谈到他的劲敌尹道益。

尹道益，是井冈山7县的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支反动武装，也是我们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听得王佐一说，我便应道：“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尹道益收拾掉。把7县的地主武装反动民团肃清。”

第二人，王佐集合起队伍，当众宣布说：“弟兄们！毛委员给我们派来了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他的言词流利，富有煽动性。

他手下约有四五百士兵，多是上籍人。他们实行季节性和临时雇佣性的兵役制。无事窝兵务农，有事揭竿而起。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善爬山。听人说，他们下得山去，若是被打散厂，便会自动地跑回山来。他们对我的到来，并无敌意，这就使我增强了信心。

可是，事情要比预料的还困难得多，王佐的戒心很重，借故说，在司令部不方便，便把我安置在高他一里路之外的一处小房里，并且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照顾我，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王佐还特别嘱咐我说：“你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莫要随便走动，以免发生意外！”这话，听起来是客气，实际上，是给我的警告：不准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我没有来以前，他们摆香堂，拜把子，是公开的活动。我来以后，因为知道我们党反对这些，他们就瞒着我搞。最初几天，我也很小心谨慎，只要他们不让我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们开会、筵客下请我参加，我就当做不知道。

每天吃罢饭，看看书。看厌了，就出门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站在门前的山峰上，向四处望：山峦巍峨，古木参天，绿竹满目。再远处：东有秦岭帐，西有金狮面，南有金竹山，北有旗锣洞，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这里真是革命军养精蓄锐、发展壮大的好地方！可是，眼下有个王佐在此，要争取他，还不知道要做多少工作。“既不能缓，又不能急”，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原则。每当想到这句话，心里总是很着急。

为了消除王佐对我的戒心，我便经常到他家里去坐坐。有时还帮他办些家务事。趁机向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宣传些革命道理。王佐对我到他家里去，并不反感，认为我这人“爱朋友”、“讲交情”。这就开了方便之门。我便通过他的家属，对他做了些宣传工作。渐渐地，王佐也主动来接近我了。

王佐有三个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飞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总是和这些人商量。而经常在他身边的，又是刁、李二人。他们是王佐的左右二将。这两个人性情豪爽，重义气，颇易接近。当我发现这个门路后，又主动地和他们接近，找他们谈心，很快就搞熟了。谁想，有一天刁飞林突然提出要和我“饮鸡血酒”。

这事就使我为难了。饮鸡血酒，就是磕头结拜，不答应，怕伤了他的情面；答应了，显然是有害的。不过，对这样的事，我也早有准备，便婉言地暂时推开了。

原先王佐最担心的是怕我会拆他的台。过了一个时期，他见我并没有拆台的意思，又加上他母亲、刁飞林等人从中说了些好话，疑心便渐渐消退了。

有一天，他来和我商量收拾尹道益的办法。

尹道益一向很轻视王佐，他仗着人多势大，每次和王佐打仗，总要穷追一气。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建议王佐，设法把尹道益引上来，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听了，两眼眨眨转了几转，两手一拍，叫道：“着！此计甚妙。不把这个贼予灭了，我决不甘心！”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选择一个夜晚，率领部队下了山。

尹道益的司令部，驻扎在永新县东乡的拿山，从那里到茨坪，中间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垭，叫旗锣垭。据说，从前井冈山出过个翰林，这里是举旗鸣锣接翰林的地方。我们估计，尹道益不迫便罢，要追，一定经过此地。因此，我和刁飞林带一个连埋伏在这里，王佐和李克昌带一支人马，赶到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回头便跑。尹道益不知是计，带领民团，猛追出来。

大将中午，他们追到了旗锣垭。先头部队追上了山，尹道益的指挥部驻下吃饭休息。

我们埋伏的部队看见尹道益上了圈套，一个猛冲，打了下去。他们有的在吃饭，有的把枪放在一旁睡觉，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着，顿时慌作一团，纷纷四散奔逃。尹道益当场被打死。刁飞林把他的头颅斩下，用包袱包好，收拾了胜利品，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大已大黑。早有人报给了上佐。他连声问道：“真的把贼子除了？”

“请看这是什么！”刁飞林展开包袱，把尹道益的头抛在地上。

王佐端过灯一看，拍着手大叫道：

“着！就是这个贼子，就是这个贼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说罢便令人摆酒设筵，庆祝胜利。

这一夜，山灯火通宵没熄，如同过年一般。王佐喝了个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

其实，这个小伏击战，对我们工农革命军每个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在王佐的眼里，却是了不起的事。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上尹道益的头颅，到各村各镇去游行示威。一连闹了几天。部队情绪也高了，出出进进歌声不断。只是他们唱的多是些山歌、小调。我对王佐说：“你们歌唱得不齐（没当面说不好）。”王佐说：“你不是会唱歌吗？找些人来你教教。”于是，便从各连抽调出三名士兵，组织了一个“学歌”小队。这当然是个好机会，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从此打开了接近士兵的大门。

打完尹道益，王佐提出要扩充部队。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建议王、袁两支部队合编成一个团。

王佐也有此心，便说去和他们“老庚”商讨。

他所说的“老庚”，就是袁文才。这人是知识分子，参加过大革命，思想比王佐进步些。他是客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同志曾对他做过一些争取上作。王佐既然愿意改编，他那一关就不难通过了。

一切条件成熟以后，便在大垅举行了庆祝合编大会。正式宣布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根据他们自己的提议：袁文才为团长，王佐为副团长（实际上领兵的是他）。党任命我为该团党代表。宁冈、遂川县委发动了当地群众，对他们进行了热烈的慰问。袁文才、王佐带头举行了宣

誓：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提出口号：向第一团学习。

这时井冈山四周，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形势很好。在这钟情况下，王佐要求给他们派遣干部。就在这个进步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又派了二十几个干部，先后来到了这个新生的团队，分别担任各营、连的党代表。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处）。从此，党的政治工作，便在这支部队里生了根，占下了阵地。

毛泽东同志对改造这支部队，是费了不少心血的。他利用一切机会，亲自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解形势，讲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并借古喻今以教育他们。王佐最高兴跟毛委员谈话。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从茨坪路过，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向我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

对于我们的工作，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很及时，很具体。经常给我们指出工作的重点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后，他又指示说：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要继续加紧部队的政治工作。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就是如何使这支为少数人掌握的武装，变为党绝对领导的人民武装；使绿林作风、游民习气很重的游击队，变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在部队内部的关系方面，要以革命的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来代替封建的关系。……

从第一团来的二十几个同志，都是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分析研究了部队的特点，做出了工作计划。首先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同时开始建立了政治课、文化课的制度。通过新；日事物的对比教育、环境（即时事）教育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连队的一切制度和建设，都以第一团为榜样。并组织下级军官和士兵去第一团参观。第一团是秋收起义后改编的一支部队，思想觉悟很高。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树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去参观的人，无不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

王佐虽然没去参观（他是不轻易下山的），但听得他手下人称赞第一团，他也说：“咱们向他们学习，他们怎么做，咱们怎么做。”于是士兵委员会、纪律检查组便先后组织起来。

士兵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王佐看到这一切，也感慨他说。“共产党真是会领兵，照这样下去，怎能不打胜仗！”

3月，井冈山上的部队应湘南特委的要求，出发去支援湘南起义。新生的第二团也光荣地踏上了征途。这是它走向较大规模作战的开始，也是它在政治上得到进一步改造的良好时机。

每到一处，群众夹道欢迎，送茶送水，十分亲切。这是王佐和他手下的人从来没见过过的，每逢有人欢迎，王佐就把两手举得高高的，使劲地鼓掌，并不时兴奋地回头向我说：“党代表，党代表，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

王佐从来没出过远门，没见过大市面。出了山，他看见一切都是新鲜的。

部队住下以后，他到街上去逛，眼更不够使了。东看西看，看到电灯也奇怪他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

晚上，他兴奋地谈着自己的见闻，谈着人民如何热烈地欢迎他，自言自

语他说：“三十年来，住在山区里，真不知道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这样好的地方。将来，我们在山上搞起这样的城市，那该多好！”

这时候，我便向他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更美好的生活。同时对他讲，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全国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点头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

这次下山，王佐原来是有顾虑的，担心回不了井冈山，担心部队垮了。王佐的滁口一仗，在湘南第七师配合下，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获了很多枪支，王佐的信心高了。特别是不久以后，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对他更是很大的鼓舞。

回到井冈山后，一天吃罢饭闲谈，他突然问我：

“党代表，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入党？”

听他这话，以及他从湘南回来的许多表现，可以看出他内心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半年多来党的政策对他的感化；同时，红军的日益扩大，人民拥护党、拥护革命军的真诚行动，也使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便向他解释入党的条件，鼓励他今后更好地靠近党，把心交给党。他听了连连点头。

改造王佐这个人，是不容易的，改变这支部队的一套旧制度、旧作风，更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组织士兵委员会。很多连长反对，他们说：“什么都要士兵讨论，还要官干什么！”连队公布伙食账，有的连长发脾气说：“公布什么账，我贪污啦！”士兵唱歌演戏，有的连长说：“这是兵营，还是戏班子？”为着这些，营连的党代表不知说了多少话，磨破嘴皮地和他们谈。特别是提出废除打骂现象，开始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有的甚至说：“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不打不骂怎么成！”

我们说服了王佐、袁文才，并要他们下命令，不准打人。这样，公开打人的现象渐渐地减少了，但又出现了许多变相的打，如扭耳朵、扭眼皮、罚跪。为了彻底纠正打骂士兵的军阀残余习气，各连党代表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当时打入最凶的是七连副连长。一天行军中，有个士兵犯了个小错误，他当即拿绳子绑了起来。该连的党代表说服无效，路上别的连队党代表看见了，就鼓动士兵一齐喊口号：

“反对绑人！”

“反对军阀残余！”

那个副连长在群众的压力下，和其他同志帮助下，只好认错，把人放了。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事后找党代表作检讨。

随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多，便加速了部队的改造。许多旧习气、旧作风也慢慢改变了。加上边区的发展，土客籍广大群众拥护党、拥护革命，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士兵。士兵的进步，推动了袁文才、王佐进步；他们两个人以及许多下层干部的进步，也影响着部队。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外部到内部，许许多多因素，促使着这支部队迅速改变着它的面貌，从落后变先进，从游击变正规，从分散变集中。……

虽然也有个别流氓习气重的人拒绝改造，逃跑叛变了，但绝大多数的人都走向了革命道路，做了新人。王佐、袁文才也先后入党。1929年部队扩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王佐做了副司令。原来在王佐手下的名号兵，在红军长征时也做了团政治委员。

这支旧部队的新生，为后来改造旧部队创造一个好的范例。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到井冈山后一个英明的措施。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201—212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兼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湘赣特委委员、前敌委员会常委等职。）

5 一桩错案

毛泽东同志率工农革命军上山后，为了争取改造袁、王，除了对袁文才做了许多工作外，还对王佐做了许多工作，用通俗而意义深刻的话来帮助他，启发他，还给了他一些枪。给他枪，起了下少作用，使他相信我们，把我们看作是帮助他进步的朋友。

毛泽东同志为改造袁、王部队做了许多工作以后，根据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去袁文才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等职务，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王佐的部队共派了三十连党代表，一个营党代表去做政治工作。在他的部队里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2月，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会师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部编为第一营，王佐部为第二营）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部队的成份也逐渐起了变化，把一些年轻的农民吸收进来，把一些“老油子”送回地方去安置。同时，王佐在1928年春还入了党，是毛泽东同志批准的。

1928年冬，江西省委送“六大”决议来井冈山。“六大”决议中有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大意）：对土匪要争取其群众，杀戮其领袖，接到“六大”决议后，毛泽东同志找了几个负责人，先开了个会，作初步传达。会上毛泽东同志还逐段逐句地念了“六大”决议。当念到上述这两句话时，由于当时王佐也在场，毛泽东同志突然不念了，说“休息一下”。毛泽东同志考虑决议中这条政策，在井冈山对袁、王怎样执行。后来，在小范围里开了个会，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我，还有永新和宁冈县委负责人等参加。毛泽东同志说，决议是对的，但要根据具体情况执行，要对袁文才、王佐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认为，袁文才这个人本来就是党员，不能杀。王佐这个人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豪绅对立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还谈到，由于王佐得到了改造，欢迎和拥护了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下了家。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认为王佐也不能杀，没有理由杀他。

王怀和龙超清以前是袁、王的对头，在会上，主张杀。毛泽东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反复强调执行“六大”的决议，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应机械地执行。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们两人，决定将他们两人分开，让袁文才跟随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王佐留在井冈山，协助红五军守井冈山。会上也决定宁冈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刘辉霄（土籍人，和袁文才合得来）随部队走。袁文才后来随部队行动，在进军途中，却又跑回来了（刘辉霄也跑回来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回来，后来才知道他是怕随军行动生活艰苦，缺乏斗争的坚定性。在这一方面，袁文才是有错误的。

1930年2月间，彭德怀同志带了红五军到了永新。彭把袁、王部队电调到了永新。这时有入又把袁、王的问题提出来了，并主张要缴袁、王的枪，王怀和龙超清竭力主张杀袁、王。结果在2月24日晚上，枪杀了袁文才，王佐逃跑淹死在永新河里。王佐死后，其哥哥王云隆就叛变投敌，敌人给了他井冈山特区主任的职务。杀害袁、王那天晚上，在我听到打枪后，别人才告诉我这个决定。那时我已不在特委工作，到安福任县委书记。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摘自陈正人：《创立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5页。作者当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副书记，安福县委书记；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等职。）

6 改造“双枪兵”

1928年9月底的一天，驻桂东沙田村的毕占云一个营，举起义旗，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投奔我军来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的：“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红军进攻湘东南，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驻桂东沙田。毕占云深受第一次大革命的影响，来到这里，又受湘军歧视，对湘军心怀不满，对我们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朱德、陈毅同志在川军中的影响，官兵们想找出路，再加上我们在桂东的宣传，书写标语，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他们同我们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他一个连。根据毛泽东同志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我们对他们下仅不打骂、不侮辱、不杀害、不搜腰包，还特地杀了一口猪款待他们，经过三天教育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他们回去之后，下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蔑和欺骗宣传，而且还当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都说红军好。有的甚至还跑到毕占云那里劝其反水，参加红军。毕占云身为营长，虽饱尝军阀们大鱼吃小鱼之苦，但一下子拉到红军这边来还瞻前顾后，举棋不走，正在他走钢丝的时候，朱德、陈毅同志指示我给他写信，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劝其早日起义，弃旧图新，站到人民这边来。当他接到信的第三天，就带一个营的人马起义参加我们的队伍了。

接着滇军张渭，因受了朱德同志在滇军中的影响，从江西的樟树镇也带一个营起义到我们这里，后来编为红四军的独立营。

对于他们弃暗投明，毅然起义参加革命，加入红军，我们军民由衷地欢迎，热烈祝贺这支部队的新生。但是怎样改造他们呢？这在我军初创时期，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毛泽东、朱德同志决定同我们一起，参加变革如何把起义部队改造成为真正工农红军的实践，并把这一具体任务交给了我。

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说：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湖匪武装，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又改造过王佐部队，积有点经验。这次的任务还是得由你来完成喽。一听说叫我完成这一任务，心里着实有些发愁。我沉思片刻，把两手一摊，说：不好办。王佐部队和毕占云、张渭起义部队不同。王佐同志的部队是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底子素，好改造。而这两支部队，除少数兵痞外，他们虽然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生活贫苦，有的被生活驱使，卖身当了雇佣军；但大部分是被国民党抓来、逼来当兵的。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此话虽不全面，但这是对旧军队的写照。特别是吸食鸦片成风，不少人成为“双枪兵”，使他们由旧变新，由白变红，转变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真正的工农红军，对我们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笑着坚毅他说：“难是自然，万事开头难”，“我们要走出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路子来。”

我受领任务之后，着手对这两支部队的改造工作。几天以后，毛泽东、陈毅同志又来到我们营地。一见面我就叫起苦来，说：“这些兵油子到底要不要？我还是那句话，难改造。”毛泽东同志听后严肃他说：怎么不要？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吁了。不要是消极的，要积极改造，若改造不好证明我们没本事。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是艰巨的，可是要记住，中国有三山五岳，地方部队、山大王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可影响一大片。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以至全国解放后，都是有用的。

我思想上通是通了，但怎样改造呢？我建议说：“把这伙烟鬼关他20天，烟枪缴掉算了。”毛泽东同志摇了摇头说：“那还行？那样办说明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了。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于是他和陈毅同志坐下来跟我商量怎样改造这两支部队，以及改造的具体办法。毛泽东同志说，你当戒烟“所长”，从戒烟入手，在思想上打通。为此，必须讲清我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这样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时，陈毅同志插话说，对抽大烟还可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多弄点烟叶子，逐渐取而代之。同时，多搞点文体活动，这方面的时间多了，想抽烟的时间就少了。

“是说服，还是压服，两种办法，两个前途”。毛泽东同志的话，使我沉思在改造王佐部队的回顾之中，在毛泽东同志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对王佐部队改造的胜利，激励着我去完成改造这支旧军队的任务。我按照毛泽东和陈毅同志的指示和过去的经验，开始了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开头一段还好，过了些日子，不少人的大烟瘾犯了，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有些烟瘾特大的，还跑到我面前苦苦哀求：“让我吸一口大烟，死了也不冤枉。”我说：“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烟鬼的臭名死掉。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时，就会觉得甜了。这一难关一定要突破！”我们把住戒烟这一关的同时，还注意改善伙食，增加文体活动时间，动员干部带头戒烟，同时特别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把时事政策教育作为中心的一环来抓。此时，陈毅同志亲自给部队作形势报告，对大家教育很深。我们还讲了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商业政策等等。到农村，请老农讲阶级教育课，弄清苦根甜源。这样一来，政治思想教育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大家心地豁然开朗，把吸大烟与不吸

大烟提高到了红、白军本质不同上来加以认识，人民的军队只要手中的钢枪，不要自杀的毒枪；鸦片枪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而只能招致失败。随之，其他劣根陋习也逐渐被改造。

为了把这两支部队彻底改造好，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把部队拉出去，在行动中改造，在斗争中锻炼，在群众中受教育。这样内外夹攻，上下结合，使其加速改造进程，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指示我带这支部队去莲花县黄陂九都，迎接平江起义的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的五军一部分同志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于是我们利用部队经过毛泽东同志亲手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教育大家。部队每经过一个地方，我们都把这支特殊部队的情况告知地方党组织和群众，让他们帮助、教育这支部队。当经过三湾时，群众争相慰问，犒劳部队。有的群众还讲述了他们以三岁讶子去换五斗谷的悲惨事例，启发和教育我们的部队，勉励我们保卫好红色政权。人民群众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毕占云同志还在这卫讲了话，他激动他说，我们是起义过来的部队，也要在这著名的三湾改编，在这个开始奠走了新型人民军队基础的地方使我们新生。广大干部战上也深感红军和白军的本质不同，于是他们逐渐地扔掉鸦片枪，克服各种恶习。

接着又在莲花的路口打了一仗。原来这里麇集着永新北乡和莲花的反动靖卫团，据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同志报告，有300余敌人。我说蛮好的，这是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好机会，也是对部队初步改造成果的检验，对送上门来的“肉”，不“吃”就不好了。我们合计了一下实力，加上赤卫队共有800余人，决计打他一下。当即作部署，战斗从拂晓发起，没多久就解决厂问题。大家战斗英勇，首战告捷。既消灭了敌人，又锻炼了部队，还甩掉了烟枪。但不幸的是莲花县赤卫大队长夏炎同志，以身殉职。我们正在开追悼会，忽然哨兵跑来报告，武功山那里黑压压的来了队伍。我们正在诧异，……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来迎接的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所率领的红五军上井冈山的部队。次日夜晚，我们假打莲花县城，牵制了敌人，掩护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率领红五军上井冈山。

12月中旬，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的信，说红五军已到达宁冈新城，要我们回去参加红五军与红四军的会师联欢大会。此后，为了进一步改造这两支部队，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还亲临部队作报告，用深入浅出的道理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分清敌我，从根本上提高觉悟。

就这样，在毛泽东、朱德同志的关怀和指示下，使这两支部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毕占云、张渭部队分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在以后的征战中，为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和开辟湘鄂赣以及建立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都凝结着这两支部队的血和汗。张渭在红四军下山去开辟赣南根据地的途中，不幸为国捐躯。在长征中不少同志成为红军干部。全国解放后，我和毕占云（当时已是中将）在北京久别重逢，我们回首往事，感慨不已。他十分感谢党对他们的教育，使之迈向革命的道路。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第197—203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等职。）

7 军事理论宝库的奠基石

中国共产党在1924—1927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和当时还在革命中的

国民党合作创建革命的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完全的人民的军队，开始于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农对于蒋介石、汪精卫领导国民党叛变革命所给的答复。但是，使这个起义终于获得结果，并成为人民革命胜利的最初出发点的，乃是毛主席领导工农武装向井冈山的进军。南昌起义后所保存的一小部分军事力量，是在和毛主席所直接领导的武装及根据地汇合以后，才得发挥其在长期革命中的作用的。

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完全归功于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战略思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将采取何种形式？有人仍然追求以大城市暴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有人仍然幻想是北伐形式的再现。如果大都市暴动的胜利方式不可能和北伐形式不能再来的话，则井冈山的红旗打得久吗？井冈山斗争的归宿是什么呢？这是当时有些人的疑问。毛主席根据国内外革命经验和新的条件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在全国作波浪式推进的方针。有的同志最盼望所谓“天天扩大”和很快的夺取大城市，怕谈长期的艰苦奋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条件之下，纵使不想长期奋斗，事实上长期奋斗仍继续存在下去。为了进行长期战争，必须选择根据地作为斗争的依托。在选择根据地时，毛主席每每着重当地受盲动主义影响较小，党与群众的基础保留尚多，而地势又很好，以及高大城市较远而统治阶级力量较薄弱的地方，而且毛主席还亲自带队作巡回式的选择。毛主席第一次选定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以后又选定赣西南 9 个县作为第二个根据地。以后又汇合闽、赣、粤三省边区建立中央红军根据地，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地方范围提到全国的规模，以后转到陕北，坚持陕北根据地作为反日、反投降斗争的基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坚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斗争，直到打败敌军才东渡黄河。这里我们看出毛主席一贯的重视根据地，坚持根据地斗争的顽强性。中国革命的过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形式既不可能是大城市首先暴动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北伐形式的重复，而是采取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波浪式推进的方式，使中国革命在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根据地的斗争思想，成为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毛主席认为是根据下述条件而产生的：第一，中国是被各帝国主义侵略与分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第二，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内部不统一，存在着长期混战；第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几种经济并存，并未形成支配全国的经济中心，许多地区经济上保存自给自足状态，使根据地斗争在经济上的坚持虽然十分困苦但成为可能；第四，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第五，中国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毛主席更经常着重他说明党的领导正确这个主观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根据地斗争思想是根据上述特点而产生的中国所特有的战略思想，其主要内容在于先建立各种小块大块农村根据地，通过正确的土改政策与广大工农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在于使各项政策取得大小规模的试验；在于让军事上作各种准备与进行长期的锻炼；在于在组织问题上、干部问题上能作各种准备；在于向全国人民发出革命的号召，动员和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斗争，逐步壮大革命力量，争取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在于使党取得经验以增强党的主观掌握能力，以便能顺利地应付和领导全国的大小事变，我党有了如上所述的毛泽东式的科学的根据地指导思想，因而打破重重困难，带领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之路。教条主义者看不起中国的历史，不研究中国的历史，切断中国历史，或者落在

中国历史的泥坑中爬不起来。教条主义者也即“左”倾冒险主义者，看不起农村，更不承认农村可以作为中国大革命胜利的起点；他们听见毛主席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主张，如下称之为保守主义，便称之为是落后的农民意识的反映。但事实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根据地思想的战略意义的伟大。

讲到组织军队与建设军队，毛主席坚持党对于军队的政治领导，坚持党的支部设在连队，提出“一切工作经过支部的口号，指出南昌起义部队下建设连的党的支部，而把支部放在回，是一个大的错误，以致使党不能深入群众去掌握军队。毛主席主张在部队中任何角落贯彻党的领导，反对在部队中划出不接受党的领导的除外部分；坚持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阶级的政治的界限，坚持革命的政治领导与政治工作制度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教育与说服广大指战员，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人民军队必不能巩固，不能提高其战斗力。毛主席主张在军队中建立为巩固军队纪律与战斗力并加强官兵团结的民主制度，宣布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废除枪毙逃兵以及用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等比喻来强调军民合作。毛主席主张建设一支有政治工作能力、有群众工作能力、有纪律、有文化、又有战斗力的新式的人民军队，这样的军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初步实现了，而巳是通过毛主席本人亲身研究、检查和帮助连队工作，以这样的深入而艰苦的政治工作去奠定基础的。

讲到中国人民军队的作用及其作风问题，毛主席提出部队是党的政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部队的军书斗争应善于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只有使用部队去参加上地革命，去参加工农运动，才能使部队壮大，才能使部队质量提高，才能使部队与人民密切结合、而休戚相关。毛主席指出：任何企图使部队离开群众运动，提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部队除打仗外下应做别的事的主张，这是极其错误的军事主张，信它的话必使红军陷于孤立无援而失败。毛主席提倡一种群众工作作风。组织部队指战员参加群众工作，参加一个乡一个村的群众工作，对一个乡一个区一个县的地方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具体调查，以获得必需的社会知识，作为教育部队、决定部队行动的帮助。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军队隶属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不仅是一支武装的军队，而且是一支政治宣传的军队。

讲到战略战术问题：毛主席主张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要根据我军当时的敌我情况作具体分析，来进行新的建设与新的创造“毛主席痛恨凭主观办事、发空洞议论而不具体分析情况的作风，屡屡嘲笑书生用兵必败无疑。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面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进行了伟大的思想创造，解决了以弱小的红军而能战胜强大敌人的最困难的革命课题。我们回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提出十六字诀，提出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对付敌人；提出游击战争应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提出红军战略应分别统治阶级内部破裂时期与其内部相对稳定时期而有所不同，反对分兵冒进，反对被动保守；提出主动影响时局，主动调动敌人，以及在不利情况下避免与强大敌人作战，同时又主张制造和抓住敌人的弱点，于敌人以汗灭的打击，从而建立了保持我军有生力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从不断战斗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歼灭战思想。毛主席主张选择地形，布置战场、利用我方手中掌握的地理条件，配合其他有利条件，以达到以我们的劣势去歼灭优势的敌人。把人民军队的各种条件和力量充分利用，充分发挥，而避开敌人的长处，善于打击和利用敌人的弱点，是毛主席的革命战略的精髓。这些有系

统的科学的战略、战术的主张，在井冈山时期即能够正确的提出，当然是为一般军事家所梦想不到的。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的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的创造。一般军事家对进攻问题永远只是进攻问题，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对防御问题永远只是防御问题，同样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而进攻与防御这两个战争的基本方式，落在毛主席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与新的角度。例如退却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相一致的完全的败退形式，又可以表现为形式与内容从矛盾到统一的以退为进的胜利的进攻形式。

前者是一般战争规律，为一般军事家所熟悉；后者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规律，超出通常范围，是一般军事家所不能了解的。又如一般军事家谈战略、战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其中能背诵几页战史便算高人一筹。毛主席谈战略、战术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军队能够打胜强大敌人，这是有具体内容的，连血带肉的，与长期战争相联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从解决新的问题中，提供新的经验和创造新的原则。毛主席的军事学说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军事规律，是以井冈山斗争为起点。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为尔后 20 多年的军事斗争打下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概括能力，可以前知，可以预见事变，于此又得到证明。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上，也创造出保持军队主力与挽救危局的典型的例子。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在 1928 年 8 月以前是一个胜利的发展局面，由于 8 月红军主力向湘南冒进，以致遭受失败。这是一部分同志违背毛主席的坚持井冈山根据地以应付敌人“围剿”的指示，毫无准备地向湘南冒进的错误所造成的。毛主席于红军主力南进后，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遭受极大困难，乃决计亲率一营兵力迂回往湘南寻找主力，终于与进军湘南的主力汇合于桂东县城近郊。南进部队于失利情况下，得到毛主席率队亲来汇合，其兴奋与感动的情绪是难以言词形容的。毛主席于两部汇合后，亲自主持行军宿营及检查部队的给养状况，并注意当地农民斗争的指导。这样，使主力部队得到保全，而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局势也从八月失败中挽救过来。从一个极小的局势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局面扩大，可是中间遇着障碍，由于部分同志的错误又把一个扩大的局势弄坏，又要由毛主席以极大的坚忍与明智，把这一弄坏的局势根本挽救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所创造的又一领导范例。毛主席不仅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而且是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屡次考验中，领袖与统帅的卓越领导能力不能不被发现，不能不取得党与人民的深切爱戴。

讲到根据地的坚持与反“围剿”的战略转移问题，毛主席在领导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的行动决定上，更创造了极为卓越的领导范例。1928 年冬敌方进行“围剿”井冈山的更大规模的部署。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方针问题，先后下下数十次会议作了反复而详尽的讨论。例如分析了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及其失败的可能性；分析了反“围剿”的有利条件及其不利的条件；分析了主力在井冈山就地退敌与向敌区进军调动敌人以保持根据地的各种可能；提出了各种进军路线，各种反对敌人阻击的计划。毛主席对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作了动员和部署。毛主席解决保持

老根据地和发展新根据地问题。光全表现出他对党与人民的利益极其负责的态度，除对主要的战略问题紧紧掌握外，同时不放松每一细节的考察。这样的严密部署与精细打算，故能领导全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其结果是进军赣西南，扩大和创造了新根据地，而留守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与部队经过反“围剿”后仍能坚持下去，成为尔后湘赣边区大根据地的基础。

（节录自陈毅：《学习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2页；作者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五、艰苦转战 保卫根据地

1 黄洋界上炮声隆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这是毛主席咏黄洋界作战的诗词《井冈山》。通过它，使我们更加认识到这一保卫战的重大政治意义。

黄洋界是通往井冈山上大小五井的要道，左翼是一片深谷；峡谷左侧又是陡不可攀的高山。右翼则是陡坡，山上是茅坪通往井冈山的孔道。从山岭上往下看，尽是飞鸟难越的悬崖陡壁。扼守住黄洋界，就把从酃县来犯之敌给阻住了。

井冈山通往山下的道路，包括只能够攀缘爬上去的山道，统共不过9条路。山上约有2000余居民，都是从南北朝时代移居来的客家人，耕种着收获稻谷不到万担的水田。红四军据此，在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下，依托着永新、莲花、宁冈、酃县、遂川等地，在党所领导的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持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为向湘、赣和鄂南、粤北发展的良好根据地。在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守住井冈山，就表明中国革命的红旗招展，买办地主阶级是压服不了中国革命的，这就是扼守黄洋界一战，打垮从湖南来犯之敌的重大历史意义。

1928年7月中旬，湘敌吴尚第八军乘我军分布在永新、莲花福一带作群众工作之际，侵入宁冈。我军立即取道永新拿山向宁冈之敌进攻。敌在我根据地群众包围之中，耳目不灵，仓猝经永新莲花边境逃回茶陵。我军仍决定从酃县向茶陵进击该敌。当二十八、二十九团进至酃县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下顾边界特委和四军军委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建议，17日强使二十八、二十九团进击湘南，说这是“正确路线”。毛委员乃不得不亲率二十一团一、三两营阻击从吉安进攻永新之赣敌第三军、第六军共11个团之众。当时以毛

委员为指挥中心组成党的三路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亲率二、三两连驻石灰桥，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阻击从天河进攻宁冈之敌，并指挥各路行动；北路以宛希先为书记，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第一、第七、第八三个连，位于水新北乡，背靠天龙山，阻击从北面进犯永新之敌一个师；中路行动委员会以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辖团部特务连和三营九连，在永新城外阻击从吉安天河来犯之敌。在群众掩护下，用游击战，一面作战，一面作群众工作；在永新30里以内，相持达25日之久。敌在我群众包围之下，如盲如聋，不敢进犯永新城。迫我二十八、二十九团在湘南“八月失败”，赣敌知道我主力不在，乃发起几路猛攻，我乃逐渐转移至预先指定的小西江区会师，北路部队则星夜绕经天龙山、潞江、茶陵高坑回至集中地。当部队集中后，毛委员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作战经验和部署任务。在会议进行中，由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传达省委要红四军向湘东发展的指示，并谓湖南敌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要红四军配合贺龙同志往常德、益阳发展的行动，以便夺取长沙云云。……他讲过话后，毛委员当即提出几个问题问他，大意是：长沙的工人运动怎样？斗争怎样？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白军士兵工作怎样？有哗变的吗？商人有罢市的表示吗？……袁代表都不能回答，只好说这次未把各方情况搞清楚，下次来一定答复所有问题。正在这时，驻地有一农民运送二十八、二十九团炊事担子，匆忙回家来，毛委员当即找来询问，才知道主力在郴州夫利的消息。因此，会议讨论行动方针，决定毛委员亲率第三营，往桂东沙田一带迎接二十八团回井冈山。第一营仍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莅晨，第三营出发了。为了不使敌人尾随第三营之后，第一营乃在宁冈、永新，茶陵边界游击。3天过去了，湘敌吴尚第八军抢赣敌之先，从酃县直趋黄洋界，进攻井冈山。企图趁我主力未回之际，逼我于井冈山外围，在失去依托，极为不利的地势条件下作战，达到消灭我军的目的。我第一营得到情报，于8月28日星夜兼程从茅坪撤守井冈山。此时山下平原尽落敌手，从茅坪上井冈山60里，荒无人烟，山路崎岖，异常难行。可是，每个战士们都知道这回急行军，是回到井冈山老根据地，坚守后方，待主力集中后，相机歼敌，再图发展。所以士气仍很高涨。沿途笑声呀，歌声呀，不绝于口，当有人唱起“打倒地主呀，天天吃南瓜”的滑稽小调时，轰然的笑声，立即响彻全营。

29日下午3时，部队到达五井（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镇），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即召集连级以上干部开会。何党代表向大家说：“目前是全国革命低潮时期，广州暴动失败了，海陆丰苏维埃区、湖北黄（安）麻（城）、湘东、湘南暴动都暂时受到了挫折，湘西未发动起来，全国目前只剩下井冈山这一小块红色政权。现在湘赣两省敌人全面向我进攻，企图趁我主力不在之际拿下井冈山。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坚守井冈山。只要这一小块根据地还保存着，这面红旗下倒，就向全国人民证明，反动统治阶级永远消灭不了革命！”他的话简短而有力，激励着每个干部，誓死坚守井冈山，决不让敌人得逞！接着，团长部署作战任务，以第三连去警戒黄垌、五斗江通遂川之敌；王佐部警戒白泥湖、罗浮通永新之敌；金州是通我主力方向，有酃县地方武装警戒；一、二连派一个排担任通茅坪的警戒。各路都有群众掩护。其余担任扼守黄洋界的作战任务。

会议完了后，又参加营长陈毅安同志召集的排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

敌情与上述军事政治任务，具体指示作战布置与方法。我回一连后，又召集各班讨论，个个战士莫不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会后，我向营部去汇报情况，走到营部时，适逢营部通讯员在上井中井山泉流下来的小溪里，捉到20多条小鱼虾，加上一点干笋（井冈山产竹），点了一锅汤。还有一把青椒，放在火上烧一烧，加点盐巴一捣，盛了一碗，营部20多人就此聚餐了。我在这里饱尝了一顿粗红米饭后，又到团党代表那里，看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没有。一进中井，看见党代表和团长住的敞屋内（当时不进居民的内房住的）只有两条板凳支着个门板，上面放着军毯。这时，党代表正在阅读“列宁主义概论”（即斯大林著，“关于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党一章，并与团长和其他几个同志讨论在阶级斗争中如何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到了共产主义政权衰亡了，党亦自然衰亡等问题。他见我来了，就指示我，在作战时，要加强战斗鼓动工作。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匆忙的几小时内进行的。进行完毕，即率部队向黄洋界进军。

部队一到黄洋界，连、排长察看地形，分配任务后，即率战士们加固原有工事，挖掩体，搞好射击依托，搬大石块作炮弹。天黑了，大伙割些茅草，找好一块平地铺上睡觉。好在大伙的心是热的，因此，虽然在二千几百公尺的高山上，睡在一起，任它寒风吹啸，猿猴鸣叫，大家盖着垫着茅草，紧紧地挨着，也就不觉得寒冷了。只有放哨的燃着一支小香，燃完一支，轮换一班，其余的战士倒地熟睡，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战斗。

8月30日清晨，空中罩着薄雾，在小井准备好的饭送来了。吃完饭，天色大亮，雾也消了，敌人还无动静。原来是路窄行走不便，天雾看不清山上，只好挨到八点钟光景，才向我攻击。我军在山上，注视着山下敌军，历历入目，只待敌走到20至30米内时才射击。路窄山险，敌人疏散不开，只能一个一个挨次鱼贯向上爬，尽管后面吹着冲锋号催着，还是爬不快。我军战士屹然不动，待敌走入有效射程内，指挥员才一声号令“放！”敌兵一个个地倒下去了。因为我军弹药不多，有的只有一排（五发），最多的也不过二排（用小竹筒塞满子弹带，表面是看不出有多少弹药的），乃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用大石块滚下去，砸死砸伤敌兵。同时一粒子弹往往不是打倒一个，而是可以打倒好几个敌兵，死尸滚滚而下，逼得敌兵无法前进。敌机枪好似对空射击，发挥不了作用，瞄高了，无效果，瞄低了，又使敌兵无法前进。就这样，从上午、中午到下午，敌军更换进攻部队四次冲锋，我军都严阵还击，把它打得落花流水，敌死伤达100多人，被打垮了一个团，丢下许多尸体，毫无所得，只好星夜逃回酃县去了。我军除消耗一点子弹外无一伤亡，胜利地完成了黄洋界的保卫战，便于次晨乘胜尾追，各中心地区的地方武装相继出动，收复失地。湘敌失败后，赣敌便不敢进犯。我军依然把井冈山的红旗插满山下四周，迎风招展着。

8月23日，毛委员率领三十一团第三营在桂东沙田与二十八团会师，除留少数部队坚持龙溪十二洞的游击斗争外，主力经崇义回井冈山。9月13日与堵击我军之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战于遂川，缴枪数百，占领遂川。9月26日回到井冈山。10月1日战胜深入宁冈之赣敌周浑元旅于贺家壁。11月9日又战胜赣敌一个团于古城和龙源口。我先头部队直趋永新城，因敌顽抗，乃退回宁冈，敌人不敢越出永新河一步。至此，第二次“围剿”乃被我军彻底粉碎。“八月失败”的被动局面开始转为主动局面了。

（摘自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前后》，见《红旗飘飘》，

第 14 集第 39-48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连党代表；建国后任农垦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常务委员等职。）

2 毛泽东的“空山计”

我们在井冈山的斗争有几十月了，敌人不断向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侵犯。记得在 1928 年的秋天，湘赣敌人各一部向我发动进剿。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军二十八、二十九团于 7 月中离开赣边，到湘南去了；8 月间，毛党代表带领三十一团一部，去桂东方向迎还大队。三十一团团部带一部分部队，及袁文才、工佐部队留守井冈山；另一部分部队在永新、莲花一带打游击，阻止敌人进犯。这时，湘赣两省的敌人见我内部空虚，井冈山上有许多伤病人员，留守机关很多，防守兵力仅一个营，于是乘我军毛党代表和大部队没有归还之际，向井冈山发动了进攻。

我们得到敌人进攻的消息，山上一时轰动起来，同志们议论纷纷，也有一部分同志表现得情绪不安。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召集了在山上的机关、医院的负责人及伤病员代表会议，讨论应付敌人进攻的对策。我那时没有随大队南下，留在井冈山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守，一是撤。有的同志认为，山上兵少粮缺不能守，主张把伤病员分散在深山和老百姓家里，队伍撤退山下去打游击。有的同志认为，山上虽然兵少粮缺，守住井冈山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在湘赣边区进行了革命斗争，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和我们打成一片，有的地方农民分了田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组织了赤卫队和少先队。井冈山下市镇、乡村的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敌人如果向山上进攻，他们必然会扰乱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的物资接济，阻止敌人，这一力量是不可轻视的。加上我们守山的地形有利。我们守山，不是为山守山，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井冈山，它是我们在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起源，如果把它丢了，影响很大，更何况红军的伤病员没有地方隐蔽和安置，部队士气必然要受影响。总之，大多数同志举出种种理由，想出各种办法，主张守，不同意撤。最后，何挺颖同志作结论说，我们要坚守井冈山，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毛党代表在下山以前，就决定要我们保存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要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团结、批评一切不稳定的、对革命根据地认识不足的同志。到会的大多数同志也主张要坚守井冈山，这是合乎前委和毛党代表指示精神的，我们应该执行这个指示。同志们在会上一致通过：坚守井冈山。

几天以后，湘赣敌人于 8 月 30 日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黄洋界在井冈山的北面，高 15 里，除了一条重重迭迭的道路，四周都是悬崖陡壁，无法攀登。我军在山上、哨口筑有坚固的工事，这种工事虽然没有钢筋水泥，但它有粗大的木枕，和几尺深的厚土坯，结结实实，是能够抵御一般火器的。当时我们缺少地雷，就想了个土办法：把竹子削成尖尖的竹钉子，埋在山坡上、溪沟里。头一天，敌人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攻到黄洋界的工事外围地区，我们凭险据守，用机关枪扫射，用手榴弹打击，杀伤敌人很多。敌人在外围中，被我们埋的那些竹钉子刺伤的不少，使他们的进攻不能得逞；战斗到晚上 7 点多钟就停止了。第二天清早，敌人继续向我们进攻，气势比头一天更厉害，上午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下午，敌人密集冲锋越来越紧，共有好几个团的兵力，比我们多十几倍。我们的工事渐渐难以支持了。我军原有

一门迫击炮，因为炮弹少，一直没有使用。这时，我们便把它架起来，出其不意向敌人密集的队伍猛击。敌人遭到突然轰击，损失很大，往后败退。我军乘机奋起追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狼狈逃窜。这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

我军以少胜多，使敌人大为震动。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给湘赣边界的群众和红军战士以很大鼓舞和深刻的革命斗争教育。同志们深深感到毛委员的伟大和英明，有的同志说：“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留守的人这样少，还有些伤病员，敌人可就上下了山；这倒有点像诸葛孔明的空城计哩。”另一个同志接口说：“我们这不是空城计，是毛委员给敌人摆的‘空山计’。我们也编段戏唱唱倒不错。”这个提议立刻得到大家的赞同，几个人就仿照京剧“空城计”，你一百我一语凑起唱词来。最后凑成了一段戏文，还给它起个名字，叫“毛泽东的空山计”。

这段唱词是：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以后，我们山上文娱活动又多了一个项目。一到休息的时候，就找些破洋铁皮子敲敲打打，弄床毯子一技，就唱起这段戏来。

（摘自杨至成：《艰苦转战——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见《红旗飘飘》第14集，第21—24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一营连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湘赣边三占永新

湘赣边界党的“一大”的召开，是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大会后，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一大”起着根本的保证作用。

这时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边界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十八个团。”红四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井冈山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占永新城的辉煌战绩，胜利地粉碎了数倍于红军的湘赣两省反动武装对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进入了边界的全盛时期。

五斗江战斗——占永新。

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震动了敌人。蒋介石把红军的存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驱使赣敌向井冈山“进剿”，妄图将红军扼杀在摇篮里。1928年5月初，盘踞在永新城内的赣敌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分兵从龙源口、拿山向我进犯。5月上旬，红军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在朱德同志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避敌正面、攻击侧面的战术，打败敌人

的进攻，消灭敌第八十一团。这一战役共进行了攻打黄坳、奔袭五斗江、占领永新城的三次战斗。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战役。这一战役击破赣敌对我根据地的第二次进犯，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占领永新以后。部队休整了两天。5月9日，召开了欢迎红军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要打土豪分田地，军民合作，消灭民团土豪，收缴民团枪支。同时还交代了政策，农民自由来往，商人自由买卖，公买公卖等。在群众大会上，选举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委员，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

占领永新县城后，除我二十八团休整待战外，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永新境内的石灰桥、高桥、象形、天河、南洋等地、分兵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政权，组织革命武装，收缴地主武装。一直搞了20多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发动群众的结果，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发展了我们的军队，对敌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过去敌人一向轻视我们，骂我们是“土匪”，是“乌合之众”，现在不得不极为重视。因此，“围剿”和反“围剿”之间的空隙缩短了，战斗频繁，我们休养生息，做群众工作的时间就少了。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常常逼得我们一夜要换几个地方。这时，每个人除了背一支枪以外，还要提一个石灰桶子，到处写标语，发动群众，打土豪。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指导组织了许多工作队，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是我们的三大任务。

草市坳战斗——二占永新。

我军一占永新半月之后，5月中旬，江西军阀朱培德的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亲自率四个团，从吉安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第一攻击目标就是永新。敌人重兵压境，红四军为求全歼敌人，根据毛泽东同志“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主动撤出永新退至宁冈。敌人踌躇满志，洋洋自得，向主子朱培德发电告捷，并将师部和许多军需物资由吉安搬至永新，准备以永新为据点向龙源口、古城、蓉市进犯。

我红四军在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犯。这一战役共进行了佯攻高陇、草市坳伏击、飞兵再战永新城三次战斗。

我军这次奔袭草市坳，二占永新城的战斗，把我军的作战水平又大大提高一步。会师以后，我们两支部队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讲究“快”，快跑、快打、快结束、快转移。因为我们的队伍小，打了以后，敌人的援兵马上就要过来。当时，凡是领导者心里都明白，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里，小范围内我们包围敌人，大范围内敌人包围我们；白色区域是个面，红色根据地是个点。特别在初创时期，井冈山的点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点尚未取得联系。二占永新城还提高了我们急行军的能力，训练了快速部队，发展了快速战术，飞兵奔袭趁虚而入，出其下意，攻其不备。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专门进行了总结。以后在打长沙战斗中又活用了长途奔袭，诱敌出城，歼敌主力，化装进城等战术。

龙源口大捷——三占永新。

红军二占永新的胜利和湘赣边界割据局面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当时，正是南京方面统治集团暂时稳定的时候。于是蒋介石调动湘赣两

省的军队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第一次“联合会剿”。湘敌第八军吴尚部五个团，企图由茶陵向宁冈推进，赣敌第九师杨池生部、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共五个团，从吉安向永新推进，企图分进合击，攻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了这次战斗，导演出一场以少胜多，以弱击强，灵活机动，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根据敌人“会剿”情况，首先命令红军于5月底主动退出永新城，集结于宁冈休整，伺机歼敌。

敌人这次“会剿”的主力是江西的“两只羊”（即杨池生和杨如轩部）。他们原是云南的队伍，装备好，受过正规训练，战斗力强。这次进攻由杨池生担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永新城。根据敌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及时部署了歼敌计划，决定三十一团一营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我们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进攻之敌：三十二团的一个连埋伏在武功潭迎击敌人。朱德同志为前线指挥，率领军部直属队和机关枪连、迫击炮连扼守在新七溪岭蛤蟆湖。毛泽东同志为总指挥，部署和指挥整个战役。三十一团三营，在睦村至酃县方向的湘赣大道上，监视与牵制湖南方向的敌人；三十二团对遂川、酃县方向采取佯动。同时发动宁冈等县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作战。

6月23日，战斗打响了。战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下午4时，敌人3次冲锋均被我打垮。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人腹背受击，全线崩溃，缴枪就俘。残敌向永新逃窜，红军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永新城。这一仗我军歼敌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龙源口大捷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湘赣敌人的第一次“联合会剿”，也是第四次击溃赣敌对我根据地的进犯，红军乘胜三占永新城。

龙源口大捷后，红军二十九团全部换上了步枪，原有梭镖交给了地方武装。从此，“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的红色歌谣便传遍了井冈山。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永新县禾川中学礼堂召集红四军班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开会。会议总结了龙源口大捷的经验，研究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问题。会后立即开始分兵。我二十八团去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去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境。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用大力造成党与群众的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能够做较长时间的抵抗而不伤元气。

回首往事，更清楚的看到，毛泽东同志领导边界军民胜利的作战，是和游击战基本原则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充实分不开的。在创造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始终注重对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在工农革命军进入湘赣边界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和部队讲过井冈山“山大王”朱聋子的故事。朱聋子曾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强敌相对，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为红军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在兵力使用上的“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的经验，指出：“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

毛泽东同志不但指导红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战争经验，而且善于把战争经验不断升华，形成战争指导原则。在攻打茶陵和攻打遂川的战斗中，在新城和五斗江战斗中，不断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逐步地形成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龙源口大捷则是毛泽东同志十六字诀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成功运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指出：“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括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括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后来，1929年5月5日，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作了如下的概括：“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红军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形成，是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原则，结合当时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举，是对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宝贵贡献。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第153—159页、164—171页。
作者当时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党代表等职。）

4 跟随毛委员战斗在井冈山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奉毛泽东同志的命令，攻克了茶陵县城，我们占领茶陵县城后，前后打了三仗。一次是该县挨户团袭击我们的营房，被我们打退了，一次是罗定带着保安队拂晓袭击我们，也被我们打退了，第三次是国民党吴尚第八军的一个团（团长叫俞那喻）他来势汹汹，但不敢冒进。我们在茶陵住了一段时间，打了几仗，子弹不多了，仗打得很激烈时，我们正在为弹药发愁，我们的三营回来了，他们背了很多子弹。因为他们从遂川大汾与一营一连、团部分开后，到了湘南，会到了朱德同志的部队，朱德同志用计从范石生那里弄了许多弹药装备。三营一到，便把子弹分给我们，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和三营并肩作战，一直打到晚上，敌人没有前进。我们与敌人相持打到半夜，奉命撤退。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下来接我们。他得到情报，知道团长陈浩靠不住，陈浩和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等人想拉部队逃跑依附国民党。毛泽东同志赶上我们后，召开了前委会，揭露了陈浩一伙的问题，把我们接上井冈山。

打下茶陵成立了县政府，开始是委任谭梓生当县长，他是云南人。部队没有去发动群众，县政府是老一套办法，收税、告状、过堂，陈浩他们乱搞，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及时纠正，指示部队要发动群众，重新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这是我们第一次建立的工农

兵政权。

部队回到井冈山后，在龙市召开了大会，毛泽东同志总结了部队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宣布了陈浩等人的十大罪状，我记得有一条是他们反对游击战争，主要是他们想投降方鼎英，有这个企图，并没有拖去队伍。正式把他们抓起来是在一个晚上，在龙市的一个商店里，前委开会，陈浩等人到了，讲完话后，几个士兵跑进去把他们捆了起来，送往部队看守，关在袁文才那里，以后把他们处理了。

部队真正做群众工作是从遂川开始的，开始时群众有点害怕常跟任红军后面，你走到哪里，他也走到那里，一路上群众都问：“埃先生来了没有？”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由军队包办，把谷子发给群众，把东西送到群众家里，照顾贫农。初来怕打开仓库被流氓抢去，流氓就会发财，把粮食送去也没有人要，因为群众害怕。毛泽东同志批评了，说这是包办式的，恩赐式的。恩赐式就是你给他，他不负责任。后来就打开仓库让群众去挑，经过你的手去发，群众不要就送上门，群众很受感动。在遂川分东西由恩赐式改变成抢夺式。当初群众还是不太敢，那些流氓、地痞就来了，我们就放手，打开仓库，由群众去抢，东西很多，一个房子要抢半天。红军筹款主要是抓土豪罚款。那次在遂川筹的款子最多，因此，在过年前我们每人都发了饷，都是发银洋。

部队做群众工作搞出经验也主要是在遂川。当时，成立了宣传队，发动群众，到处都写标语，好大的一个字，用石灰写在墙上。那时周鲁还没有来，盲动主义错误还没有在这里贯彻，因此，在遂川没有烧好多房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口号是，烧群众要烧的屋，杀群众要杀的人。

苏维埃的名字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老百姓不懂，就叫埃先生，那时就是苏维埃，没有工农兵三个字，工农兵政府是在茶陵搞的，以后就没有了，都叫苏维埃政府。

2月中旬，我们从遂川回到宁冈打新城。毛泽东同志亲自部署了战斗，叫朱云卿写命令，记得命令的头一句是：“与我数量相等之敌盘据新城……”

二团袁文才的部队埋伏在新城对面山上，他们发明在洋油桶里点爆竹，乒乒乓乓响，当机关枪，四面山上埋伏了人，满山红旗，敌人被我们包围后，想突围。敌人从西门突围，开门向七溪岭逃跑，我们埋伏在那里，消灭了很多敌人。那时，我们没有攻城，也没有攻城技术。如果敌人不开城门逃，我们还打不进去，好高的城墙。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打新城取得全胜，全部歼灭了守敌，占领了新城，活捉了一个县长，然而我们部队伤亡也很多。

1928年3月，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那时，“钦差大臣”满天飞，湘南特委奉了湖南省委的命令，要把部队调到湘南去，当时湘南特委书记是陈佑魁，是个大胖子，周鲁是个书呆子，来到龙市，执行“左”倾盲动错误，说这里烧杀不烈，宣布撤销前委，成立师委，由何挺颖当师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当师长，后来毛泽东同志说笑话，叫我当师长，我从来没有当过师长。何挺颖也说，我没有经验，部队带不住。当时，江西省委要工农革命军留在江西，湖南省委又争着要工农革命军去湘南。毛泽东同志为此事写了个报告给中央，说我不好办，不知道听哪个好。这个报告是我抄的，抄了二份，由湖南、江西省委各转一份给中央，另一份由姓余的交通员装在竹筒里带走，他走的时候，把缴来的金子打成一个金饼，带给中央做经费。

3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去湘南途中，毛泽东同志在酃县中村给部队上课，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上课时，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大城市里

头什么叫马路、工厂……讲得很通俗，上了几次大课，没有讲反对盲动主义，因为中央还没有命令，没有指示反对盲动主义，怎么反法，周鲁来传达意见，说这里是“右倾机会主义”，要部队将前委改为师委，他都没有表示有意见。这时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不照办可以，怎么能公开反对？公开反对是不可能的。在中村上几天大课，主要是要提高思想认识，禁止大烧大杀。那次在酃县烧了些房子。周鲁来井冈山说要饶杀，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两军会师后，我们取得了龙源口大捷。当时，二十八团迂回部队一直打到龙源口附近，正面新七溪岭没有进展，打不进去，有一个要害处通不过去。迂回部队冲到龙源口，又迫到永新县城，红军第三次占领了永新县城。龙源口一战红军取得了大胜，后来流传着“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6月底，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井冈山（应为巡视员——原书注），硬说井冈山不搞烧杀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反对乱烧乱杀，说我们只能烧群众要烧的屋，杀群众要杀的人，不能乱来。杜修经要调井冈山的红军到湘南去，说这是湖南省委的指示，说湘南形势好，要红军到那里去。毛泽东同志坚持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认为湖南敌人兵力集中，有吴尚第八军在那里，我们的部队不应该去湘南。边界特委书记当时是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他是杨开慧的哥哥，他也附和湖南省委的意见。

湘南特委要调红军去湘南，恰巧二十九团是湘南农军，也闹着要回湘南家乡去，这种情绪又得到二十八团的同情，部队开士兵委员会会议，讨论很热烈，大家发表意见，都说要回湘南去。朱德、陈毅同志说服不了，他们来了两次信给毛泽东同志，说士兵委员会要去，主要是二十九团闹着要回湘南，没有办法。毛泽东同志回信大意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建设我们要坚持，现在形势发展很好，敌人进展很慢，我们坚持在井冈山有利于粉碎敌人的进攻，到湘南去不利，因为湘南敌人力量强大，我们部队去了以后，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你们要争取说服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不要去湘南，要留在井冈山，坚持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毛泽东同志是在永新西乡回信的。结果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代表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委书记杨开明也同意，朱德、陈毅同志未能说服部队，因此，两个团都去了湘南。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二十九团到了郴州后遭敌围攻，农军全部失败，二十八团知道孤军深入不利，才退往井冈山，部队到达上犹崇义一带时，营E袁崇全叛变，竟把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打死了。

朱德、陈毅同志带着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酃县九都一带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西乡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在永新西乡里田、夏幽一带，永新县委刘真，也在那里。贺子珍当时是永新县委的工作人员。进攻我们的敌人是湘东保安司令罗定的部队，我们的部队在前方阻击敌人，敌人不敢前进，天天来侦察，敌人走几里又退回去，每进一个地方，反动派就烧房子，我们一看起烟，就知道敌人来了，敌人连续进攻了三天，才到里田。毛泽东同志带我们住在夏幽，和敌人相隔10里，赤卫队在夏幽放哨，看到敌人就报告，大家劝毛泽东同志走。他说我们不走，坚持一下。10里路敌人走了三天，第三天才进来。敌人知道了我们的虚实，攻到夏幽的坪里，没有好多兵。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吃饭，他的勤务员吴光荣煮了鸡蛋，安了个土炮在路上，跑来叫他吃饭，一下子土

炮响了，“轰！”毛泽东同志听到炮声，叫吴光荣把饭拿来，一看是煮鸡蛋，没有吃就走。到一个地方，敌人还没有来，在一个山脚下，又叫吴光荣把饭拿来吃。我们在夏幽只有一个警卫班，约八九条枪，警卫班在山上警戒，敌人从那边上来，在山上看见了，马上打枪报告。

敌人从里田前进三天才到夏幽，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虚实，说明我们有群众基础，是个空城计。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1928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

黄洋界保卫战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山上，到桂东迎接二十八团去了。当时是湘赣两省敌人“会剿”，酃县这边是湖南敌人的三个团（应为两个团——原书注），都在黄洋界山底下攻，爬不上来，没有打好久，我们的炮兵来了，五发迫击炮弹，响了两发，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湘赣两省敌人有矛盾，你进我不进，官兵之间也是对立的，那时说：“白军里将校尉等级各自不同，红军中官兵夫吃穿一律平等。”而我们守黄洋界只有一营兵力，部队又没有好多子弹，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果当时湖南省委不把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宁冈的斗争局面一定更稳定，井冈山的形势一定更好。毛泽东同志带领二十一团一个营在桂东县城与二十八团会合。

三湾改编时，我被编在军官队，上山后在大井训练了一个时期，主要是搞军事训练，练习持枪，练跪、立、卧三式射击，还经常搞演讲会，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马日事变”事件等。第二次打茶陵时，一离开井冈山我就不在军官队了，到一团宣传队当队长。宣传队有五个人，归政治部管，宛希先是政治部主任。1928年1月，打下遂川后，我调前委当秘书。3月，前委改为师委，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任师长，我在师委工作。部队实际上师为名义，就是一个团，没有师的架子，何挺颖的师委书记，也是名义而已。

我在前委当过秘书，不要想象前委有什么办公室、办公桌，像现在这样，一个机关怎么组织，怎么分工，谈不上。前委就是几个写子的，油印的。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发报，也没有通讯员之类，写个信还得跑路，靠自己两条腿。文件起草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起草，文件起草好后，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没有什么文字圈阅那一套，简单极了。写字就是用铅笔，毛笔也很少，只有毛泽东同志有毛笔。

毛泽东同志在龙市住在一栋楼房里，有楼梯上去，他往前面，我们住在后面。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就是在龙市完稿的。他起草了很久，不是在一个地方起草的。当时我是秘书，是叫我誊正复写的。住在那里还有位副官和茶陵来的三位女将，搞抄抄写写。我还记得清楚《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是我抄写在很薄的竹纸上，字写得很小很密，一共写了两套。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是在龙市发出的。中央派来一名交通员，此人是湖南水口山工人，中央派他送信到井冈山来，住在龙市。我们送他走的时候，把文件卷在伞把子里面带走的。

1928年5月，特委成立以后，前委和特委一起在茅坪办公，没有几个办事员，前委书记是毛泽东同志，特委负责地方工作，前委是军队、地方一起管。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下山。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在

茨坪一栋房子的楼上，召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会议讨论出发路线，说要学历史上“围魏救赵”的办法，红军主力到赣南去，这样就可以引开敌人，解井冈山之危。因为湘赣两省敌人已经向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围魏救赵”的比喻好像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大家都赞成，打赣南，把敌人引出去打。何挺颖当时发表的意见最多，讨论出发走哪条路线时，研究了很久，有两条路，一条是从荆竹山走，一条是从小行州去。大家觉得要使敌人迟一点发觉，防止敌人追击，如果让敌人过早发觉，对我们行军不利。最后确定走小行州那条路比较隐蔽。部队下山时，发布了四言体布告，它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

（节选自谭政：《难忘的井冈山斗争》，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453页。作者当时任工农革命军政治部宣传员、宣传队队长，红四军前委秘书、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六、战争生活杂记

1 毛委员处理一桩人命案

1927年12月，湖南之敌进攻茶陵。当时，我作为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任常委职务。在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茶陵县城，我遵照组织上的通知，回到井冈山奢市归建。不几天，我被调到工农革命军（后改为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任区队长兼军事教官。这个教导队是毛泽东委员，根据斗争需要，在井冈山奢市亲自创办的第一个红军培养基层干部的训练机构。

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同志，是四川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秋收起义前被派到农民自卫军（后编为第三团）工作。秋收起义后，三湾改编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第八连连长。他高高的个子，待人热情，作战勇敢，是位优秀的干部，在学员中很有威信。

1928年春，工农革命军奉命去支援湘南暴动。毛委员率第一团和教导队开到湘南郊县中村圩。在这里一边打土豪、一边整顿部队，并打听湘南局势的消息。

工农革命军武器弹药缺乏，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同志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从战友徐彦刚那里得到一支名为“曲尺”的手枪。伯钧同志非常高兴，曾向吕赤队长夸耀他有一支手枪。但这支枪扳机有毛病，不能击发，吕赤队长就说：“你那枪打不响还不是半斤铁！”吕赤、徐彦刚、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陈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学员，可说都是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所以常常开开玩笑。

我们到中村圩的第二天，吕赤队长带领一个区队去附近打土豪，做群众工作。我是值星官留在家里，伯钧同志也留在家里修理他那支手枪，据说他学过军械，他鼓捣了半天，结果把枪真的修好了。快开晚饭时，吕赤队长满怀喜悦的胜利归来。他披着大衣，走进我们住的店铺，跨过二门，刚步入天井，伯钧同志听说吕队长回来了，就拿着修好的枪，兴高采烈地从他住的房内跑出来，迎着吕赤队长说：“队长，队长：手枪已经修好了，这枪可不再是半斤铁了。”他边说边试着扣动枪机。哪知平时横竖打不响的枪，这时，

子弹却上了膛，“叭”的一声，子弹从吕赤队长双眼间穿进，从后脑出来。枪响时，我正在吕赤队长身旁，见他倒下，急忙上前将他抱起，他已停止了呼吸。伯钧同志和听到枪声赶来的同志都惊呆了。领导上立即收缴了陈伯钧的手枪和子弹，并将他禁闭起来，听候处理。

事情发生后，大家都非常悲痛。伯钧同志除了万分悲痛外，更是悔恨自己。他和吕赤队长感情好，友谊深，他知道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看样子他在等待着最严厉的处罚。按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陈伯钧要不要为吕赤偿命，大家议论纷纷。

毛泽东委员知道后，也非常痛惜，他了解吕赤和陈伯钧都是好同志，伯钧打死吕赤完全是误伤。伯钧同志十六七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即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的战斗中，作战勇敢；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时，他任排长，斗争坚决，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占城会议后，毛委员曾选派他跟着游雪程、徐彦刚三同志最先去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的农军。毛委员去茶陵处理陈浩事件时，也选派陈伯钧和毛泽覃等同志随行。陈伯钧同志可说是工农革命军中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毛委员对他很赏识和信任。如今他打死吕赤同志，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到底怎样处理为好呢？人人都在关心着。

毛泽东委员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毛委员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来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陈伯钧同志一个适当的处分。蔡、张两人都觉得毛委员说的道理令人信服，便立即回到教导队给大家做工作。

过了两天，全团接到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大家想，可能要宣布处理这件人命大事了，心情都很紧张。集合后，才知道是要听毛委员讲政治课，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因为没有课堂，全队就集合在中村南面的一块权田里。刚开春，田里没有放水，大家都席地坐在禾兜上。毛委员面前有一张长桌和一条长板凳。他挺立着魁梧的身躯，用亲切而洪亮的声音讲着话。他说：今天讲课前，宣布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教导队长吕赤同志被陈伯钧打死了，大家都很悲愤。但念陈伯钧同志不是有意，而是误伤，就不叫他偿命了，我们革命正需要干部。培养一个革命干部很不容易，已经死了一个，是没有办法再活了，就不要再死一个了。我们大家在对吕赤同志表示哀悼外，一定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

毛委员叫陈伯钧站到队伍前面，警卫员拿出已准备好的约两尺来长的竹板，对陈伯钧执行打一百板手心的处分，党支部又宣布给予陈伯钧留党察看3个月。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满，陈伯钧同志和大家都心服口服，接着毛委员开始上政治课，题目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同志们都以敬佩的心情，聆听毛委员讲的革命道理。

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毛泽东同志这种处处从革命利益和革命大局出发的高度原则性，和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至今仍记忆犹新。

陈伯钧同志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毛委员和同志们的期望，他

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

吕赤同志、伯钧同志和敬爱的毛泽东同志都已安息于九泉了。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光辉业绩却永远留在活着的人们心中！

（作者陈士榘：原题为《要不要他偿命——毛委员处理一桩人命案》，选自《星火燎原》杂志 1985 年第 5 期，战士出版社出版。作者当时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红军连队的民主生活

井冈山时期条件很艰苦，不像现在出版书、出版报纸有现成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同志针对部队存在的某一个倾向，发生的某一个具体问题，召集我们讲话。我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内容，对党员和士兵群众进行教育。具体内容有：第一，形势教育。在开士兵委员会会议时，党代表经常要作形势报告讲国内国际形势。在支部开会时，党代表也要讲形势，讲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讲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报告的内容，都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来的。第二，进行土地分配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群众纪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方面的教育。对到底怎样分配土地，怎样掌握分配时的政策等，讲得都很具体。那时，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方法和我们党代表讲了后，我们回来就向班排长和广大战士进行传达，使大家都能掌握。所以，在井冈山一个班可以单独活动，到了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分配土地。

在井冈山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以说是直接的、具体的。他每次讲话的内容都很通俗、生动、具体，大家容易理解和掌握，效果也很好。他讲话鼓动性大，比喻通俗，战士和群众都喜欢听。四军下山后，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兴国县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讲完话准备回去时，群众热烈鼓掌，希望毛泽东同志再跟他们讲几句话。当他第二次离开时，群众还是掌声不息，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毛泽东同志先后共讲了四五次才离开会场。

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靠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以管连长。大家发扬民主，共同管理连队，这样威力就大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士兵委员会里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的管理，杜绝了贪污的现象。那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由于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就没有再发现了。

由于被敌人封锁，服装、弹药、粮食、油盐都很困难。就拿油来说吧，煮菜要用油，点灯要用油。山上只出产品茶油，也很少很少。有时下山活动的部队打土豪搞了点油，就成了宝贝。我们上山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向部队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不办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等用，但只准点一根灯芯。部队都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一到夜间，熄灯号一响，战士们就都熄了灯，只有连队一盏灯亮着。

开始我们还弄不懂，毛泽东同志有那么多事要考虑，这么一件小事，为

啥还要亲自作规定？后来才明白，在物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怎么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使这有限的物资用得时间更长一些，以度过难关，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善于区别大小事情，善于在一定的情况下抓住主要问题。像一根灯芯，看来好像事小，但在当时他也要亲自抓，这件事可给我们教育很深，至今不忘。在处理大小事时，总爱用它来检查一下。

（摘自朱良才：《红军的连队生活》，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33—436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连党代表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警卫记事

湘南暴动起来后，少数敌军往北逃，地主豪绅也跑了，有的逃到亲戚家里，以后都被我们抓回来了。那时，我们家乡芭蕉圩是耒阳的第十三区，我就在区苏维埃赤卫队任小队长。那时暴动犯有盲动主义的错误，我们把一个很大的供奉敖山王的庙宇烧了，抓到的地主豪绅电被我们杀掉了好几个。

我们耒阳人跟着部队退出湘南，男男女女有二三千人，部队到达宁冈龙市，听说毛泽东同志派了人来接朱德同志的部队。在龙市，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进行了会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辖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第十一师，辖三十一团、三十二团；第十二师，辖三十二团、三十四团。我们耒阳的赤卫军编在三十三团。我们是在拿山整顿的，编成连营团。我上山的时候是耒阳八区十二乡鹅山的赤卫队长。在拿山整顿的时候当了班长。打了黄垌后凶湘南暴动来的起义农民上万人，毛泽东同志分析，退到井冈山的是革命坚决的人，但粮食问题不好解决，要湘南来的一部分人回湘南去坚持本地斗争。三十三团也准备回湘南去。我不想回去，就去找原区委书记吴子云同志，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随三十二团回湘南，被敌人五马分尸牺牲了。我跟他谈不愿回湘南，他同意我的要求，他给我开了介绍信，要我去军部，到了军部，陈毅分配我到特务连手枪队。主要任务是保卫首长，我在手枪队当副班长，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部队较少，主要是在特委做地方工作。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为什么不回湘南去。我说不愿回去，要参加主力打仗。他说，我们需要主力部队，也需要地方赤卫队，你参加了主力部队也好。

井冈山会师以后，我调到军部特务连手枪队，负责保卫首长的安全，我有机会接近朱德军长和毛委员。

朱军长在湘南暴动时我就见过，那是1928年3月份，正当南方相当暖和的时候，朱军长的部队在耒阳敖山庙打了一仗，来到芭蕉圩。我是区里的赤卫队长，听说朱军长来了，就跑去看他。当时，朱军长脚穿草鞋，身背斗笠，背着一支驳壳枪。在四川、云南时，朱军长时常打游击战争，打了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提出来的。有很多东西是毛委员总结出来的，十六字诀可能是毛委员总结的，有可能是朱德提出来的，整理可能是毛委员，这不是他个人的智慧，这包括了集体的，也包括了朱老总的智慧。

毛委员非常重视宣传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跟我们讲，不要以为机关枪、大炮厉害，当然大饱和机关枪能打死人。如果我们光用大饱和机关枪跟敌人

打仗，那么，我们是打不过国民党的。因为我们的大饱和机关枪，没有他们的多，我们要用宣传工作来同敌人进行斗争。宣传工作不是打死几个人的问题，宣传工作做好了会打到敌人的司令部中去，打到敌人的最高指挥部去，这个威力是很大的。所以，一些传单，一条标语，不可小视，它可以瓦解敌人，分化敌人。

有一次毛委员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在会上，我们都主动向他反映，我们湖南人讲的话，江西和福建人，听起来都比较困难，往往听不懂，毛委员听了反映就跟我们讲，说话不懂这个问题容易解决。他说哑巴是不会讲话的，可是，有人打了哑巴，他就会作手势，使人家知道有人打了他。当哑巴肚子饿了的时候，他也会做手势叫人家知道。毛委员又说，哑巴不会说话，但是能够想办法使人知道他的意思。我们何况不是哑巴，为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自己讲话的意思呢？毛委员还说，这里面耐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把话讲得慢一点，把话多重几次，并且用几种意思表达一句话，比如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群众慢慢就会懂得我们的话。他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后来，我们遵照他说的去办，解决了困难，宣传了群众。

部队每到一地，宣传队要作调查工作。即使是半天也要进行调查，毛委员亲自领导前委专门搞了一个调查表。我们根据这个表的内容，进行调查。我们的军队很遵守纪律，如果群众跑掉了，吃了群众的米，就把米钱放在米桶里，用了群众的油，就把钱放在油罐底下，还写上道歉和解释信，这样群众发觉后，群众拿着钱后会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一条很重要。旧军队都是欺压老百姓的，拿了老百姓的东西也不会留钱。俗话说，出门莫遇兵，有理说不清，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与旧的军队完全不同。这给群众的教育、感动很大。

（摘自王紫峰：《井冈山斗争历史的一些回顾》，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55—459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军部特务连手枪队副班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在毛委员身边

我的家乡在湖南茶陵。由于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剥削农民，农民恨之入骨，纷纷起来反抗，参加秋收暴动。暴动后，我们回到茶陵，有好几个青年被地主豪绅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我们家乡，我们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因此，我就离开了家乡，出外寻找革命部队。

第一次，我跑到广东，第二次跑到湖北，第三次，跑回茶陵。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心里有些害怕，后来问他们，才知道是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是打土豪的，我很高兴地参加了。

开始我在第三营，营长伍仲豪，是浏阳暴动来的。我到部队不久，毛委员同我：“你回不回家？”我说：“不回家，回家就被土豪劣绅杀掉。”他说：“很好，就留在我这里。”

司务长开始叫我当伙夫，我不会煮饭做菜，就说：“煮饭搞不了，煮菜也搞不了。”司务长笑着说：“你这个孩子是个饭桶。”我说：“慢慢学嘛！挑水总可以！”司务长就分配我烧水。我给毛委员送水，从这时候起，我就接近毛委员。他很关心我，问我：家里有什么人？读书没有？我说：“没有

读书，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亲自教我学政治，教我识字。

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跟随在毛委员身边的还有一个秘书，叫谭政，还有邓华等人，他们是写钢板，印文件的。还有伙夫，一个马夫，叫谢今古，后来改名叫黄达。他参军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常哭鼻子，流口水，大家嫌他脏。毛委员说：“这个孩子很可怜，没有衣服穿。”把他安排当马夫，管理毛委员骑的一匹小黄马。

当时，部队没有特务连、警通排、警卫班。特务连是站岗、放排哨，作外围警戒工作；警通排是做送信和做内围警卫工作；警卫班是跟毛委员在一起的，直接保卫毛委员。特务连八九十人，后为100人，有一部分是赤卫队编入的，系农民出身，经过一定挑选方可编入。警通排分一、二、三班，30多人，每班12人，少的也有7至9人。警卫班12人，班长杨梅生。是永新人，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有文化，以后提升了排长，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一个班长是浏阳人。以后我当了一班长，杨梅生当了二班长，杨得志当了三班长。1928年成立红四军后，我们还有四挺机关枪，两支长枪，一支马枪，一支驳壳枪。马枪有盖板的，非常轻巧，在什么地方宿营时，我们把枪挂在墙上。

我搞了两个月的伙夫后，就调到警通排搞警通员，毛委员交给我的任务是：打开那里就要找报纸、找书、找文件给他看。找到后，用包袱布包起来，背回来给他查阅，他不要的书或文件，也由我烧掉，要的就留着。记得在遂川一个大地主家里抄到一车书，毛委员看了说：“好极了！”我们看不懂，不知道什么书，五四运动的书，义和团的书，他都要我背回来，特别是报纸，他说：“你给我把报纸收来就行了。”他把报纸搜集起来，进行归纳和分析形势。我记得在酃县、桂东还搞到很多书。

在井冈山生活非常艰苦，井冈山很潮湿，我们睡在地板上，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边上用一根木头拦一下，这样稻草不会乱。每人只有一床灰毯或夹被，没有棉被。

毛委员和战士一样艰苦，战士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战士们穿什么，他也穿什么，不同的是他有很多书、报纸、文件。他只有两套单衣，一套穿着，一套放在包袱里，平常做枕头用。冬季，井冈山很冷，他的床上只有一床夹被。战士们为他准备了两床灰毯，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伴随在他身边，夜里给他烧开水喝。毛委员经常住在茅坪八角楼的楼上，在龙市，他住在一个药铺子里面的楼上。

他的住房和行李很简朴。他的书籍、报纸、文件是用井冈山当地那种有盖的“皮箩”装的，遂川街上有油纸卖，皮箩里面就用油纸垫着防潮。后来，用铁皮箱子装文件，行军时由战士们挑着，他行军时还有几件行李，一个包袱，一盏马灯，马灯是毛委员用来查地图用的。井冈山雨雾多，他有一个斗笠。打开遂川后，我买了，一把红雨伞给他用，每当住下来时，我们常给他挂上地图，是井冈山地图或全国地图、江西地图，以便他研究和部署战斗时用。还有就是用来办公用的笔纸墨砚，加上几个喝茶的土碗。

那时生活艰苦，吃的更差，后来部队越来越壮大，粮食显得不足。有的战士抽烟，连黄烟也没有，有的抽树叶。毛委员要我们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就自己挖春笋、冬笋、寻野菜、蘑菇、地皮子，或到小河里捉鱼，上山打野猪等，井冈山的野芹菜满山都能找到，我们一捆捆地挑回来，要是放上几条小鱼一起煮，味道还很鲜呢！毛委员有时看

到大家吃得好一些，他非常高兴。毛委员这样关心战士，又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使大家非常受感动。

1927年冬天，毛委员住在宁冈茅坪洋桥湖村的贫农谢槐福家里，一天正下大雪，谢槐福当时身上只有一件破单衣，在家冷得发抖，毛委员见了拍拍他的肩说：“槐福呀，天冷了，你要守衣服呀！”谢说：“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哩。”毛委员听了，就一面从自己身上脱下刚发的一件棉衣给他披上，一面说：“槐福，现在外面正在下雪，你就穿上吧。”谢见毛委员自己只穿了两件单衣，说：“毛委员，你自己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呢？”毛委员说：“我不冷，我习惯了。”说罢就给谢穿上棉衣，扣上扣子。谢穿上棉衣后，就给毛委员送去了一个火盆，毛委员见了说：“我不冷，我没有烤火的习惯。”谢槐福刚走，毛委员就把火盆送还谢，谢和爱人又送去，毛委员又送回。谢见毛委员不收，说：“毛委员，你不收火盆，我也不要你的棉衣了。”说罢，就要脱棉衣。毛委员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好吧，火盆我收下，木炭我付钱。”谢不要，以后毛委员还是付了钱。谁知毛委员收下火盆后，立即送到了另一个贫农魏大娘家。谢槐福还不知道，一直以为毛委员烤了火。半个月后，毛委员问谢还有没有木炭，谢一听很高兴，毛委员又付了钱，而已不要谢挑，自己挑起来就走，谢一看毛委员挑了木炭向别处走去，很奇怪，谢的爱人说：“毛委员自己没有烤火，不知给了谁家烤火了。”谢就跟着毛委员，见到毛委员把木炭挑到魏大娘家，才从魏大娘家知道毛委员半个月前就把火盆给魏大娘用了。

1928年5月间，毛委员住茅坪八角楼，有一天，赤卫队员在龙目潭捉到一条27斤重的娃娃鱼，送给毛委员，毛委员当时按价付了钱，以后做了菜，毛委员请几个赤卫队员一起吃。吃饭时，毛委员问赤卫队员：“这种鱼生活在什么地方？”赤卫队员回答：“这种鱼我们叫狗鱼，水中能生活，地面也能生活。”毛委员说：“这是两栖动物。”赤卫队员又说：“这是茅坪地区的特产。”毛委员又说：“这种鱼吃什么东西为生？”赤卫队员说：“大的吃小的，水里的动物它都吃，如小鱼、小虾、小蚊等它都吃。”毛委员听了便笑着对赤卫队员说：“这种鱼要多订多吃。”赤卫队员没有理解就问毛委员：“为什么要多打多吃？”毛委员说：“这是水中的恶霸。”又说：“在我们人民头上也有狗鱼，这就是土豪劣绅，他们剥削穷人，压迫穷人，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必须把地主、土豪劣绅打倒！水中的鱼要求得解放，就必须打倒水中的恶霸！”大家听了非常高兴，这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对当时土地革命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毛委员历来反对枪毙逃兵，打骂士兵，虐待俘虏种种军阀作风和肉刑制度。1927年底至1928年春，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作风都有。记得有一次一个副官犯了错误，参谋长朱××要战士打他30板屁股。毛委员知道了进行批评，他说：这不行，天大的错误不能用肉刑，按法令办事，该杀头的杀头。由于毛委员的教育，士兵也同军阀作风作斗争。记得一个浏阳人，对士兵打骂很厉害，后来战士们起来反对，他也不敢打骂士兵了，开始有枪毙逃兵的现象，毛委员想了个办法，订出制度来，谁不说服教育士兵，枪毙逃兵，就撤消职务。有一次一个团长枪毙逃兵撤消了职务，后来他改了，又恢复了团长职务。由于毛委员不断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参军的人多了，我们军队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强。毛委员经常给我们说：“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有钱人不会去，都是穷苦人民，俘虏兵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能杀，不能虐

侍。”被我们俘虏过来的兵感到在我们这里与国民党当兵是两个世界，很受感动。记得有个营长被我们俘虏过六次，前五次俘虏过来，他要走，让他回去，第六次被俘了，我们仍然是不杀他，不虐待他，可他觉得没脸见红军，自己枪毙了。

1927年12月，我们在遂川打垮了肖家壁，这天晚上，我们住在朱砂冲下面一个村庄宿营。我在河边放哨，看见一只老虎，我急忙打了一枪，连长以为敌人来了，立即出动部队，知道情况后，要整我，说我乱放枪，排长骂我，班长又骂我。那时还有动不动打人，拳打脚踢的现象，战士都害怕“点名”，一“点名”，就有人要挨整了。“点名”时，人人提心吊胆，后来毛委员知道了，就说：“这还了得呀！阶级兄弟呀！”他强调要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走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

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这样就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团结。当时部队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块，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块，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块。我缴了几条枪得了几块赏银。后来被毛委员知道了，他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不准这样，主要是鼓励战士的情绪。”以后，这个规定就取消了。

毛委员一贯主张官兵一致，平时都称同志，战时就称职务。他常说：“军队不能像农民一样一盘散沙，一个个的小家庭。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统一指挥，无指挥不成军队。打仗时士兵要服从指挥，平时官兵平等。”

（节录自尤开富：《在毛委员身边的日子里》，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61—466页。作者当时为警通排警通员、班长；1955年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5 峥嵘岁月稠

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当时有句谚语：打倒“刮民党”，天天吃南瓜。由此可以想见，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奋斗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记得在1928年的冬天，我们还是穿着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从军长、党代表起，都是一样苦，因此士兵们没有什么怨

井冈山的物质生活是这样艰苦，战斗是这样的繁重，我们还能坚持下来，主要的是依靠党和毛党代表的正确领导，在党外依靠士兵委员会，依靠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长官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开会说话有自由，长官不对，他可以在会上提意见；一切不必要的礼节都把它取消了，使官兵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士兵中有经济委员会管理伙食，一切经济账目公开；有时打到土豪还能打打牙祭，吃得好些；在活动较好的地区，有时每天能从油盐菜金中节余一点零用钱（名叫伙食尾子），每人每天匀得六七文钱。这样的办法在我们连队是有效果的，特别是那些新来的俘虏兵非常满意。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打仗是不勇敢的；到了我们军队就勇敢了，和我们一样能吃苦，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精神得到了解放。毛党代表说过：红

军是一个大火炉，俘虏过来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制度，就是军队也需要民主，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将是破坏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军队内民主性越大越好办事。回忆我们从南昌起义的时候，在潮汕失败后，回到粤闽赣地区，士兵中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现象，不管怎样严格约束，甚至于要枪毙，他们都不在乎。到达井冈山以后，毛党代表提出了建军方针；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以来，队伍的精神面貌与过去截然不同了。

我们红军的官长，是能以身作则的。冬天，我们还没有穿上棉衣，领导上想尽办法，打土豪，和利用关系到白区买来了棉布、棉花，在茨坪后方组织妇女和留守机关人员缝制棉衣。毛党代表很重视这项工作，亲自参加缝棉衣，和群众一起铺棉花。棉衣做好了，送到部队里，战士们穿上暖和的棉衣，心情是多么兴奋呵！一个领导人，不仅要管全局，就是一些看来细小的事情也要亲自动手，这说明我们共产党的领袖是如何的勤劳和关心群众。

这时候，山上很缺粮食，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样多伤病员和群众，没有粮食怎样过日子？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前委和毛党代表决定动员部队到山下运粮上山，供给伤病员及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员。这一指示下达后，同志们立即响应号召，军首长和各级干部亲自带头挑谷上坳。黄洋界山高十五里，从山脚挑粮食到山上的五井，大约有30多里山路，一天挑两次。同志们不辞辛苦，累得汗流浹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着粮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担子休息，不一会儿，就看见我们的营长胡少海同志，肩上横扛着整麻袋粮食，从山坡下走上来，精神勃勃，看不出一点疲劳的表示。接着，来到半山上的人越来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在互相搬手劲；也有些同志把汗湿的衣服脱下来凉一凉，他们的背上有着磨起来的红块、小泡大泡，而他们毫不在乎他说：“不要紧，起点泡算什么？我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还怕这点泡泡？”这是多么英勇顽强的气概呵！有的同志还编起了顺口溜：挑谷上坳，粮食有靠，为着伤员，不怕起泡。……休息过后，挑粮的队伍继续爬山了，有的担着箩筐，有的背着口袋；也有的把粮食装在裤腿里，夹在脖子上……真是各色各样。同志们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好像一个长蛇阵。歌声嘹亮，震荡山谷。有人说：“我们打仗能跋山，挑谷也能跋山；不管山多高，还是要赛跑。”胡少海同志说：“我们今天挑粮食，等于打仗，我们又胜利了。”

在井冈山上，不仅粮食困难，医药同样是困难的，中药都用不上，那时伤病员的困苦是难以言喻的。毛党代表率领大队南下时，要我留在井冈山上，管理伤病员的上作，这个任务比打仗还难。我看到伤病员在床褥呻吟，辗转不安，十分痛苦。这些情况，我是有责任的，必须尽力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万般无奈，同志们提出要我到永新去找毛党代表请示。

前委驻在永新城外一个村庄里，7月下旬，我到那里时，毛党代表到农村去了。两天以后，他才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就走进他住的一间小平房里。毛党代表正在油灯下看文件，见我进来，他站起身说：“你来了。听说你等了两天。”我当即向他汇报了伤病员的情况。毛党代表非常关心伤病员的情况，静静地听我谈完以后，他说：我们好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这不单是个伤病员问题，而要看作是一个战斗问题；如果不医治好伤病员，传到部队去，就会在战士中起不好的影响，大家就会有顾虑，这就影响战斗了。所以说，对

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毛党代表接着问：“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我回答说，要解决钱和药的困难。他说，“好，你们到团卫生处去商量一下，分他一点药。钱，现在是困难，部队的菜金还没有；管他怎样，也要由团经理处想办法，给一些让伤病员用。”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说要两百块大洋。他便写了个条子，命三十一团团团长去办。随后，他还谈了谈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我回去转告伤病员，嘱咐他们安心疗养。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辞别了毛党代表，到了三十一团团团长那里。团长见了我很热情，亲切地询问着伤病员的情况。他看了毛党代表的条子，就叫传令员找来团经理处、卫生处两位处长。结果，卫生处的药虽少，为了照顾井冈山上的伤病员，他们尽可能分出一些碘片和其他必需药品；而经理处的钱很困难，想尽办法才搞到160块大洋，还等了两天才拿到手，足见那时我们的经济是多么困难。

我回到井冈山上，把这次出去的经过谈了谈，伤病员们都很兴奋，说毛党代表真是我们的好领导。他们表示：我们一定把伤病养好，赶回前线杀敌，以报答毛党代表和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我把带回来的钱，60元用作伙食费，100元交王佐营长利用关系到吉安买药，渡过了难关。

在井冈山这一段时间，毛党代表不仅在生活上很艰苦，在工作和学习上也是很刻苦的，真是我们的榜样。他非常关心时事，记得还在井冈山会师时，我们刚到大砦，一见面，他就问我们带报纸来没有，我们从参谋处找来几种报纸，他如获至宝，把这些报纸都拿去了。有一天我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看“资本论”，研究马列主义学说。他时时刻刻不忘记学习，经常看书到深更半夜，工作稍有空隙，他就学习，即使在行军中，骑在马上也要看书，马袋里满满的都是装的书。他看书很仔细，重要的地方点圈划线加批语，加以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所以，他作文章也好，讲话也好，都是引古证今，渊博得很，深刻、透彻、明确。凡是重要报告和文件，都是他亲自撰写，如《井冈山的斗争》就是在1928年11月25日写的。同时，他还写了一些诗词。毛党代表在战斗环境中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是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和学习的。

我们到井冈山地区将近一年了。湘赣敌人围攻我们好多次。我们执行了毛党代表的作战原则，打垮了三次进犯宁冈七级岭的两杨（杨池生、杨如轩）滇军，从敌人手里得到不少弹药和器材，补充了我们部队。大队南下回来后，经过整顿，同志们的觉悟提高了，部队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湘赣的群众已发动起来，有的地方分了土地，成立了苏维埃；同时平江暴动的部队也到了井冈山，革命声势壮大了。但敌人是不肯坐视革命势力的发展的，湘赣两省又调集大军，向我们“围剿”。为保卫井冈山，扩大根据地，有效地打垮敌人的“围剿”，毛党代表留下平江暴动来的队伍守山、亲率红四军于1929年1月中旬离开了井冈山，到粤赣闽边界进行游击运动战，以分散敌人的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毛党代表和红军每到一处，红旗就在那一片大地上飘扬起来了。

（摘自杨至成：《艰苦转战——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片断》，见《红旗飘飘》第14集，第21—27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连长、井冈山留守主任等职；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第二编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高屋建瓴开创中央根据地

1 挥师赣南闽西

1928年12月上旬，平江起义的红军第五军来到井冈山会师，12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在茅坪召开胜利的会师大会。这时得悉三省“围剿”已开始组织，何键任总指挥，驻萍乡。蒋、桂两派军阀矛盾虽然很深，但还未表面化，买办、豪绅、地主阶级之间暂时是一个稳定时期。在“反共”的旗帜下争夺领导权。我军在红四、五两军会合后的形势下，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可能和必要把主力转移到敌包围圈外去打击敌人。毛委员决定：派红五军固守井冈山，红四军除留下王佐部队外，全部在敌人未逼近时，转移至敌后上。有人主张转至湘鄂赣边界去，毛委员考虑到该地区狭小，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便利，我军回旋地区太小，不宜前去。另有人主张去湘南，毛委员考虑到敌人交通便利，当地群众斗争已受挫折，亦不宜去。最后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转移至赣南地区。其理由是：

（1）赣敌除刘士毅部系本省军队外，其余都是外省军队，曾被我军打败过，敌人力量较弱；（2）在赣东北有方志敏同志的游击区域和红军部队，在吉水东固一带有江西独立第一、第二两个团，可互相支援配合；（3）江西的自然经济的成分比较大，交通不便，农民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易于发动起来；（4）有江西、闽西、浙西、粤北广大的回旋地区可资活动，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量可资支持，这样，便在军内、党内、部队干部中以至战士中进行教育，全军莫不拥护这一英明的决定。

部队在出发前，接中央指示，成立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有指导所在省委工作责任之前敌委员会。毛委员还曾亲自拟好四言布告和党的宣言，宣布我党我军主张，待一切安排妥当后，红四军4000余人，于1929年1月1日在毛委员、朱德同志的率领下，经上犹、崇义至大厦，向赣南进军了。这一壮举成为尔后建立中央苏区的前奏。

部队在赣南活动了一个多月，打了几仗以后，于1929年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又由赣南进入闽西。由于全体指战员深深了解这次行动的重要意义，因此；不管天黑得伸手不见掌，不管山路上的荆棘和棱石扎伤了脚，同志们还是互相帮助，继续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前进。

我们一直摸到下半夜，才到达入闽的第一个宿营地——四都。这是个重山环抱、两条大路交叉的小镇。没有敌军驻守，但我党的地下组织。条件尚好，部队想在这里稍事休整。不料第二天早上9点钟，驻长汀的敌人郭凤鸣部就以一个团的兵力，沿着大路气势汹汹地向我进犯。看来他是想以逸待劳，讨个便宜。

郭凤鸣是土匪出身，闽西封建割据的三个土皇帝之一。他依仗一旅兵力盘踞瑞、汀一带，恣意横行，奸杀抢掠，无所不为。当地人民一提起郭凤鸣，莫不恨之入骨，但又敢怒而不敢言，怕红军走后遭到报复。因此不消灭这条地头蛇，就鼓不起群众的革命斗志，更谈不到开辟根据地。

然而要消灭郭匪的一个旅兵力，却并不容易。我们只来了两团零两个营，又是初次入闽，人地生疏，武器弹药奇缺。再加上行军苦战月余，没有得到休整；而敌人却是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这个仗看来是有些难打。

毛党代表立即召集了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的领导干部进行研究。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利用我军健攻的特点，主动迎击，打乱敌人的进攻步骤，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就可稳操胜券。

10点钟左右，部队全部出动。林彪同志率二十八团居左，伍中豪同志率三十一团居右，我们特务营（指毕占云领导的特务营——编者）紧随军部居中，齐头向前推进。

四都北10多里外有个小山头。敌人刚到那里，发现我军突然出击，被迫仓皇展开。我们乘敌主力站脚未稳，向山上猛扑。敌人招架两下，就向长汀方向撤退。我们特务营奉命追击，紧钉着猛打，不让敌人中途集结，一直追到胜华山脚下的波溪才停下来。

随后军部和主力都赶上来了，县委也派人来接头。部队原地起锅煮饭，休息待命。说是休息，谁能安静下来呢？入闽首捷和县委来人，使战士们异常兴奋，仨一群俩一伙地纷纷议论：

“就算郭凤鸣是三头六臂，也逃不出咱们红军的手掌。”

“早晓得敌人跑得这样快，我就不浪费那颗子弹了。”

正听着战士们闲谈，忽然来了通知：开军委扩大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我急忙跑去。同志们都斜卧在小溪旁的草坪上，晒着初春的太阳，感到浑身轻松。毛党代表却仍然十分忙碌。自离开井冈山以来，他一直没有很好休息过。环境艰苦，情况复杂，天天行军作战，许许多多重大问题都要他作出决策。打仗，昼夜不眠指挥战斗；行军，徒步和部队一齐走，忽前忽后地和干部们研究问题。一天难得睡上两三个小时。经过长期劳累，他很消瘦，眼圈也发青了，但他仍然精神奕奕地倾听县委来人的汇报。

那位同志谈的情况，和入闽前所了解的基本相同：闽西党的基础较好。1928年，几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每个农会会员还保存着“三毛钱的驳壳”——匕首，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地下斗争。而敌人呢，官兵关系恶劣，生活腐化，士气消沉：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三个匪首，各霸一方，互不相让。毛党代表听完，笑着说：

“群众基础好，敌人内部又不统一，是开辟根据地的大好条件。进攻长岭，占长汀，彻底消灭郭凤鸣，大家意见怎么样？”

“熟透了的桃子，不吃才是傻瓜哩！”

是谁说了句风趣话，大家都笑起来了。

长岭，距长汀五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它是长汀南的重要屏障，我军攻城的必经之路。上午一仗，郭凤鸣被我敲掉半个团后，就亲率部队占据此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进攻长汀。

次晨8时，我主力部队按计划分左右两路向长岭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打败了郭凤鸣匪军，消灭3000多人，把郭凤鸣也打死了，并乘胜占领了长汀城。红四军首次入闽，像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上的枷锁。这一胜利，迅速地改变了闽西的整个形势，动摇了反动派的统治，也大大鼓舞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情绪。各种革命活动更积极地展开了。尤岩县委星夜在全县张贴标语：“欢迎红军来龙岩，打倒陈国辉！”这些标语一直贴到陈国辉旅部里，吓得陈国辉连夜调一个团到白土，预防民变。

武装力量也积极活动，永定溪南、金丰的武装攻进了湖雷，赶走了敌人。这样，从各方面牵制敌人，发动群众，以策应红四军入闽。

那时，闽西特委设在上杭城水南。红四军打下长汀后，住了半个月。特委派子恢去找毛泽东同志，中途听说红四军已去江西，乃折回。待委将闽西党群组织、斗争情况及敌我情况，写了一份详尽的书面报告，派人送给毛泽东同志，并要求红四军再来闽西活动。不久，特委就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说红四军将要再度入闽。特委接信后，立即通知各县，准备起义响应。

1929年4月间，红四军第二次来到闽西。当时陈国辉、张贞等匪军正和广东军阀打仗。红四军便迅速占领了龙岩城。在城里展开了宣传活动，街上贴满了标语、布告。毛泽东同志亲自在龙岩第九中学向学生讲话。又拨了一二百条步枪给龙岩县委，装备龙岩游击队。这一来，龙岩地方武装的实力便空前地增强了，更有力地配合主力展开了活动。

当天，红四军又顺利地攻占了坎市；第二天进驻湖雷；第三天进入永宁城。在永定城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向群众演说。会上，群众起而控诉反动派的罪行，情绪激愤。

红四军一到永定，陈国辉匪军一部便从广东撤回，回到了龙岩。红四军立刻回戈进击；谁知陈匪见势不佳，悄悄撤走了。不久，陈国辉部队全部返回，上杭卢新铭匪军也进驻白沙。为诱敌计，红四军从龙岩城撤退，转向上杭进发，迅速消灭了白沙的卢新铭一个团。白沙战斗一结束，红四军立即回头攻打龙岩城。陈国辉部3000多人全部覆灭，陈匪只带了几十个随从逃脱。从此闽西局面大定，闽西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特委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保护商店，肃清反革命，建立革命委员会、赤卫队、少先队等问题。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对开展各地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间，闽西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在蛟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在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抓住重点向四周波浪式地发展，引导群众投入土地革命斗争，在低潮时期有组织有计划的退却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毛泽东同志讲话时，赞扬了闽西的革命斗争。在他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以后，便高声地向全场代表问道：

“能不能巩固？”

大家都满怀热情地回答：“能！”

毛泽东同志又侧着头问道：“有什么条件？”这一回，把大家问住了，会场上一片沉寂。

这时，毛泽东同志拿起粉笔，就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六个条件：

- 一、闽西苏区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
- 二、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 三、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
- 四、闽西的粮食可以自给；
- 五、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

六、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他又告诉大家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方向明确，问题深刻，大大提高了闽西党的水平，也鼓舞了大家的斗争信心。

会后，毛泽东同志派了许多有经验、有能力的军事、政治干部，参加建设闽西红军的工作。8月，正式成立了红四军第四纵队（红四军初入闽时，只有三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一支队是由上杭的蛟洋及龙岩自上等地的游击队编成，二支队由永定的溪南里、金丰、湖雷等地的游击队编成。

9月间，四纵队曾配合一、二、三纵队攻下上杭城。在这里，红四军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12月初，再克长汀。然后，部队就在连城的新泉一带整训。

毛泽东同志在部队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总结了两年多来的建军经验，起草了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草稿。然后在12月间，于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四纵队也选派了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全体指战员都参加了整训，直接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学习了红四军的优良作风。这次会议，对四纵队由地方武装迅速成长为主力红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红军主力来到闽西，闽西六县全面起义，大大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蒋介石便组织了“三省会剿”，令江西的金汉鼎、福建的刘和鼎、广东的陈维远等部，向闽西苏区逼进。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前委决定绕到敌人后面去，转移敌人目标。1930年初，红四军四个纵队便从古田出发，向北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开展游击战争。

从红十二军的建立和红四军四纵队的发展，可以看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地方武装，逐渐上升为主力军，地方主力又编到中央主力去，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建设方面的基本方针。闽西主力红军的编成，显示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也可以看出，没有主力的带动、培养，地方武装要发展成为主力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同志一向很重视培养地方武装，除了给枪支、派干部外，特别注意从实践中锻炼他们，让主力红军带他们去打大仗，让他们听惯枪声，见惯大炮；有把握的小仗，让他们去打；有缴获的地方，让他们先去；训练、行军，都让他们和主力在一起。这样，从装备到战斗经验都不断充实、丰富，地方武装的发展就非常迅速，战斗力也就很快提高了。

闽西苏区和红军，就是这样地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在他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辉煌的革命思想的指导下，飞跃地发展壮大起来。虽然后来一度受到立三路线的破坏，可是有着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闽西党和人民，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终于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继续向前迈进。闽西苏区，终于成为中央苏区的巩固的一部分；闽西的革命武装也健康地发展和壮大起来。

（摘自刘型：《黄洋界保卫战前后》，见《红旗飘飘》

第14集，第49—50页，刘型当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一连党代表；毕占云：《三战闽西》，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9页，毕占云当时任

红四军特务营营长、二纵队四支队支队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邓子恢、张鼎丞：《闽西的春天》，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第30—35页。邓子恢当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张鼎丞当时任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长、红军营、团长，中共永定县委员会主席；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主席、省军区政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

2 红都庆典

1931年11月的一天，我光荣的被选为红四军特务营的代表之一，到红色首都瑞金去参加庆祝“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仪式，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

还没有到会场——松山岗子时，前面的欢笑声、歌唱声已飘了过来；远看数百面红旗像红色的海浪在滚动……一切都显示出节日的景象。走近会场一看，成千上万的群众早已挤满了。岗子尽头，坐东南朝西北的主席台口的两旁，装饰着翠绿的松柏树枝，中间还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的上沿有醒目的庆祝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的字样；台上正中高挂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一群捧着鲜花的儿童团的孩子们，面对台口在歌唱；一个小女孩舞动小手在指挥，头发上的大红蝴蝶结，被风吹得一飞一飞的，简直像活的。赤卫队、青壮年、老人们也穿上了打土豪时分到的新衣，喜笑颜开，逢人就打招呼。到处充满兴奋、欢乐，人人都是喜气洋溢。我们中央红军各部队的代表，便整齐地排成六个方块，坐在人群的后面。

下午3点钟，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讲话了。他告诉我们：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和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个幸福的时刻。我紧抱着怀里的枪，仰着脸，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那颀长的身躯，和那温厚、纯朴的脸，听着他那平静而充满自信的声音，我觉得浑身都充满力量。就是他，创造和教养了我们红军，并指挥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消灭了几十万敌军；从而建立、巩固和扩大了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是他，将领导着我们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记下了他的话，并以雷样的掌声表示对自己领袖的热爱。

接着，朱德总司令等首长也相继讲了话。当会议主席宣布大会结束时，整个会场立时欢腾起来，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大家都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而兴奋、而欢四季……

游行开始了。我们红军战士们穿着灰色军衣，领口缀上黑边红底的领章，胸前佩着椭圆形红色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符号，戴着八角帽，手持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排成六个方队，整齐、雄壮、精神抖擞，以刚健的步伐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通过主席台时，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们频频招手，全场群众也热情地向我们欢呼。这是领袖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和奖赏。我们把手臂甩得更直，步伐也更加整齐和有力。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不仅能消灭敌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且还能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

保卫新政权。接着通过主席台前的有儿童团、红军大学、赤卫队等等。当我们离开会场很远时，不时听到人群中“苏维埃政府万岁！”的呼声，如波涛奔腾，久久不息。

入夜，半弯明月爬上了东山头。我提着五星红灯，随着队伍，赶到松山岗子上去参加“提灯晚会”。啊！会场里，简直是一片灯的海洋。“灯”把我们围住了，人们向我们红军“提灯”队伍问好，还有的燃起了鞭炮。

灯，各种各样的灯。六面都画着人民胜利图的跑马灯，团团直转，惹得一群孩子哈哈大笑。一条数丈长的龙灯，弯弯曲曲忽上忽下，像游动在自由的大海中。锣鼓的声音吸住了我，往人群里一看，原来是一群技巧熟练的舞花杆的人们。一阵悠扬的乐曲又把我引入了另一个场面：人堆里，“老渔翁”正要下网打蚌，“小蚌精”直按手中的电筒，像明珠在夜中闪闪发光。唢呐的乐曲伴着踩高跷的歌舞；坐旱船的姑娘还在唱着：“……今天的人民呀嗨哟，当了家呀划哟……”

人们沉醉在狂欢中。红军指战员和工人、农民群众在灯火和歌声中欢度了自己幸福的节日。

一夜的歌舞，没有使我们疲倦。黎明，我们又精神奋发，走向自己的战斗岗位。在回队的路上，我不时回过头，望着那个被薄雾笼罩着的山头，想着昨天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和狂欢的会场情景，不由得心中万分激动：“红色政权啊，我一定终生为你战斗！”

（节选自刘辉山：《欢庆红色中央政权的诞生》）见《星火燎原》（二），第94—97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特务营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3 随军进漳州

芙蓉山区春茶初发，赣江两岸秧苗新绿，1932年的春天早早地来到了赣南苏区。就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又一个振奋人心的讯息传来：红军即将大举出征了。

那是3月底的一个早晨，刚刚出罢早操，就接到了师里紧急通知，我们连忙赶到军团部开会。会场是一家土豪宗祠的厅堂，宽敞的四壁贴满了标语：“庆祝新的军团部成立，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打到外线去，开辟新苏区！”……

看样子要有大的行动了，可到底是什么任务呢？我们正在猜测，突然会场里一静，接着爆发了一阵雷鸣似的掌声。掌声里，毛主席等首长走上了主席台。还是在莲塘战斗前，部队准备从敌人重兵的空隙中穿插出去的时候，在一个大树林里，毛主席亲自给我们红四军团以上干部讲过战役行动的意图，和隐蔽行军应注意的事项。听过那次讲话以后，我已有半年没有见到他了。他穿一身半新的灰布军装，头发是新理过的，更显得神采焕发、精神奕奕。副团长陈冬生同志轻轻推推我，低声说：“这回，不管往哪里打，胜利又装在口袋里了！”他说出我们共同的心里话。从历次反“围剿”的战争实践里，我们已深深地体验到了这么一条规律；只要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胜利便有了绝对把握。

大会开始了。首先宣布了军委的决定：本来红一军团的领导机关是由方面军首长兼任的，现在决定组织新的军团领导机关，由原红四军军长林彪任

军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四军的首长也有了相应的变动，军长由原十师师长王良担任，政治委员是罗瑞卿。接着，又宣布了新的行动任务；为了利用两次战役的空隙，发展苏区，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决定红一军团（三军、四军）和红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此次东征，毛主席亦随队行动。

远征福建的光荣任务，特别是毛主席和我们一起东征的消息，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以长时间的鼓掌表示了自己拥护这一行动的意愿和情感。

接着，毛主席讲话了。他从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开始，进一步阐明了此次东征的意义和胜利的条件。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畅通海外。当前日寇势力已到达厦门，常有军舰游大海上，并有登陆向内地进犯的企图。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的侵略阴谋是一个直接的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对海外，都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毛主席又说，向东进军，还有一个原因：如果向西打，有赣江梗阻，不便发展；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区作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毛主席还着重讲解了利用敌人进攻的间隙，在巩固苏区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向白区推进、扩大根据地的重要。毛主席说：有人害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敌人占了我们这个家，因此反对集中兵力向白区进军。其实，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苏区已经巩固，人民的力量强大，不懂得敌人正是害怕我们打到白区去。敌军总是跟着我们的主力走的。我们在外面打的胜仗越多、越大，敌人就越是注意我们主力，就越能保卫和扩大苏区！

毛主席的这些高瞻远瞩、精确透彻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了此次战役行动的意义和必胜的条件，进一步加强了胜利的信心。

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毛主席的指示，胜利的预感，和郊野和煦的春风一起，在我们心底里激起了巨大的欢乐。归途上，我们催马扬鞭，纵情谈笑，连归途也仿佛近了许多。

4月10日红军攻克龙岩，一举消灭了福建军阀张贞部的一个多团，进占了龙岩城，把继续东征的进路打开了。打下了龙岩，大军当即离开苏区，向东南挺进，连下合溪、芝田、水潮、龙山，直逼漳州西侧的天宝山下。

在天宝山敌我展开一场激战，敌军守山的一个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增援的队伍也被打得狼狈而逃，天宝山天险落入我手，吓得守漳州的敌人连夜逃向泉州、厦门。漳州成了一座空城。

漳州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入城的准备工作是在极其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师部确定我们团为人城的先头部队，要我们切实做好准备工作。

1930年我们曾经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打进过江西的吉安城，对于毛主席的城市政策和一向重视城市纪律的作风有一定的体会。这次又进入了这个更大的城市，自然应该认真地准备。

1932年4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入城。全团的司号员作为前导：在团直属队后面，五个步兵连和重机枪连排成四路纵队。快进城门的时候，一声口令，红旗高扬，军号齐吹，部队合着脚步高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实在整齐雄壮。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都满脸带笑地望着我们。还听见有人在小声地议论：

“好整齐的队伍哇！怪不得张部败了呢……”

“还说人家是‘土匪’，看红军的气势多雄壮呀！”

“红军的纪律好，听说是毛泽东亲自带领的哪……”

入城的第3天，即4月22日的下午，三军、四军的连以上干部在城内开了一次大会，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报告。毛主席讲解了敌情和向湘南游击的三军团的活动情况，分析了此次东征漳州的胜利意义。记得在谈到这次行动对部队的锻炼问题时，毛主席很有风趣他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打得蛮好嘛！我们从江西跑上好几百里路，一下子打到这里，简直是天兵天将。

最后，毛主席号召我们立即进入第二阶段行动——全路军分散开来，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宣传，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打土豪，给群众分配谷物……大力开辟新区。

从23日起，各军当即按毛主席的指示，分散活动。红三军在漳浦县境，十五军在天宝、南靖一带，四军在漳州、海澄、长泰一带。各部深入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烧田契、分米谷，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

在漳州，毛主席又接见了福建省委的同志，指出红军主力入漳，却不能久住城市；要求闽南党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开辟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并决定将缴获的枪支发给地方游击队，将它扩编为红三团。并留下团长林平同志担任该团团团长。此后，这一支武装一直发展到云霄、诏安一带，创造和发展了拥有几县地区的苏区，并在长征后坚持了这一地区的斗争，最后成了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军此次行动，极大地震惊了一心卖国反共的蒋介石。他以赠送福建全省为代价，将曾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调至福建，对付我军；又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攻我苏区南部，并调集中央军，准备发动对我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毛主席考虑到东征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决定我军回师苏区。就在6月初的一天，我军安排好当地的工作，告别了闽南的同志和群众，怀着胜利的喜悦，跟着毛主席，浩浩荡荡踏上了胜利回师的征途。

（摘录于刘忠：《东路军进占漳州城》，见《星火燎原》（二），第120—130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创立中央红色医院

1932年秋天，毛主席亲自带领红军，在福建漳州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国民党张贞部队一个师。不久，他因身体不适，来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不知是谁，在老古井旁看见了毛主席，把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红军打了胜仗，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这真是喜上加喜，双喜临门，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特别是那些年青的女护士，一个个都咧开了嘴。

我正往外面走，有个女护士悄悄地跟着我，向我要求：“傅院长，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好吗？”我看了她一眼，从她脸上看穿了她的心事，她怕我不答应，又急急地补充一句：“我一定完成任务。”我听了忍不住笑了，对她说：“好吧！有事再说吧！”

快走出医院时，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我母亲在家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连忙叫人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证实后，听说她马上来了个总动员，叫儿女、儿媳妇、孙子、孙女

一起动手，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就好像毛主席要到我们家去休养一样。

这天，天气晴朗，我一走出医院，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山上的苍松、翠柏披着阳光，生气蓬勃，这山、这树，似乎也通了灵性，盛装欢迎着贵客。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进了楼，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就匆匆地上了楼。

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头戴八角红星帽，人很瘦，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他正在和周以栗、陈正人同志谈话。

我走上前去，说：“主席，你来了。”

毛主席见了，站起来，握住我的手，亲切他说：“是啊！傅医生，你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很好，”我说：“主席，你瘦了、身体不舒服吧？”

“还好，就是有一点疲倦。”毛主席说。

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毛主席说：“下忙休息吧，你带我看看你们的医院。”

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都一一和他们握手。这一下大家都心满意足了。

我陪着毛主席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换药室、药房和病房。毛主席见我们的医疗用具较完备，刀子、钳子等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很满意，说：“你们这医院的条件不错。”

在参观病房时，毛主席问了伤病员同志的病情，亲切地慰问了他们。

傍晚，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

这天夜里，我兴奋地回到家里。我进了屋，孩子们都没睡，见了，把我围住了，我母亲、爱人也都来了，问我毛主席身体怎样？住在哪里？……她们真希望见到毛主席，我母亲说：“哪无能请主席到我们家来玩玩就好了。”这一夜，我们一家人谈到深夜才睡觉。

第二天下午，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给毛主席检查身体。检查结果，毛主席因过度疲劳，需要每天进行治疗，还要较长时期的休养。

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的医院，我给他打了针后，他就详细地问我们医院中的情况，从组织机构、医院设备、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我一作了回答。当毛主席听到我们医院只有6个医生时，说：“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应该多训练些军医，我们很需要医生。”

“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起码得几年。”我说。

“几年太长了，一二年就够了吧！”毛主席说。

毛主席又对我讲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我们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必须在短时间里训练出一批红色医生来。”

毛主席又问到陈炳辉在医院中的工作情况，我说：“他工作一贯积极负责，是共青团员。”

毛主席很喜欢陈炳辉，又问到学医的经过，我说：“他原先是学刻字的学徒。几年前有一天，我睡在北山的草地上晒太阳，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走近我，见我睡在地上，奇怪地看着我。我见他身上穿得很破烂，但长得很好，眼睛亮亮的，圆脸，脸上还长一对小酒窝，伶俐得很，就跟他谈起话来。我问他叫什么，他说：‘我叫陈炳辉。’我问他干什么的，他说：‘学刻字。’我问他家住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用手向山下一指，说，‘就

住在你家的隔壁，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原来我们是邻居，可是我还一直不知道。我和他谈了很多。我喜欢他，就问他：‘你喜欢学医吗？’他说，‘学医？喜欢，就是没有钱。’我说：‘我帮助你。’就这样，第二天，他搬到我们医院里学起医来了。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是同学中学得最好的一个，能吃苦，肯钻研，也很聪明，后来就当医生。”

“他还是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医生，”毛主席听了，很有兴趣地笑着说：“这次战斗中，他的工作也很负责，也有能力。你看让他当医务主任怎么样？”

我们医院中，除了我这个院长外，下面就是医生，没有医务主任，下面有什么事都找我，而我又忙不过来，不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现在毛主席给我出了个好主意，设个医务主任，就能加强领导，而陈炳辉确实也能担负这个责任。过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很高兴地对毛主席说：“好的，我们很需要有个医务主任，陈炳辉来于也合适。”

这天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特别强调要我注意培养干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从毛主席的住处出来，我想了很多。这几年，医院里接收了很多伤病员，干部是大大地不足。但是，工作一忙，我只顾完成当前的医疗任务，忘了培养干部；对培养医生，还有个资产阶级观点，认为非经过凡年正规训练不可，不敢打破常规，适应环境需要。这些都是错误的。今后，革命不断发展，苏区又没有别的正式医院，任务越来越重，如果单靠我们几个医生，势必会影响任务的完成。毛主席的意见真是可贵极了。

不久，我们在医院中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训练医务工作人员。我兼任校长。

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亲的愿望，想请毛主席到我们家去坐坐。毛主席竟答应了，他说：“好啊！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

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一家人心里都乐开了花。我母亲那时已70岁了，却变得年青起来，亲自动手，和孩子们一起擦桌子洗碗，我的小孩子维光乐得拍着手，从前屋跳到后屋，嘴里喊着：“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我们想请毛主席吃饭，做什么菜呢？我母亲说了一样菜，我爱人又说了另一样菜，我挑毛主席爱吃的菜加了几样。做完菜，全家人都换上厂干净衣服，又请了几个陪客，等着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我们在门外迎接他。毛主席一见我母亲，紧走几步，还没等我们向他问好，他倒先向我母亲问起好来了，毛主席说：“老太太，你很健康啊！”

我母亲见毛主席这样谦逊，这样平易近人，一点也不拘束了，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说：“谢谢主席，快请到里面去坐吧！”

孩子们拥到毛主席身边，抢着和毛主席握手，这个说：“毛主席，你好！”那个说：“你好，毛伯伯。”维光张着两只手，笑着跳着，大声喊着：“毛伯伯，毛伯伯！”

毛主席见了孩子们，笑容满面，弯下身子拉拉这个孩子的手，又拉拉那个孩子的手，慈爱地回答说：“你们好，小朋友！”

毛主席到了屋里，我把家里人向毛主席介绍了，毛主席和她们都握了手。坐下后，毛主席见我的一个孩子维康较瘦，关切地问：“为什么这么瘦？有病没有？”

“没有什么病，就是身体不大壮。”我母亲说。

毛主席点点头，说：“要多注意他的健康。”

在谈话中，毛主席问到我们的老家，问到我去过的详细情况。

“我们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连璋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家里地少，又都是沙地，收成差，除了交租，每年都不够湖口，后来，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我母亲说。

“这么说，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毛主席说。

“是啊！到了城里，日子也不好过呀！人地生疏，吃没吃处，住没住处，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我给人家挑水、洗衣服，才活下来了。”

“傅医生，你怎么学了医呢？”毛主席又问。

“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他们叫我学医，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挤完牛奶才能上上课。”我说。

“他们叫你做工，才给你吃饭，让你上学。”毛主席说。

“是的，他们还说是救济了我呢！”我说：“临毕业那一年，我父亲死了，家里欠了人家300块钱，年三十，人家来逼债，我没法，想到上海去做工，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每月贴我一些钱，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后来当了医生，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时，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我们激于气愤，签名通电全国，反对英、日帝国主义侵略，英国医生害怕了，逃回了国，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

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话，对我说：“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接着，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但阶级觉悟还不够高，毛主席谆谆教导我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我们才有出路。”毛主席短短的几句话，却帮助我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吃饭的时候，我们请毛主席坐上座，毛主席却请我母亲坐了上座。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母亲说：“保护（长汀土语，意即祝福）主席一百岁，保护红军打胜仗。”

毛主席谢了我母亲。

这一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

毛主席对老人的尊敬，对孩子的爱护，对同志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过后，我们想到这一天，就好像又见到了毛主席。

因为这天我们做的菜大多了，又请了陪客，后来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我们是同志关系，那大你留我吃饭，我吃了，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菜，也不必请什么陪客，这是战争环境，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要铺张浪费。”当时我听了，脸刷一下红起来。毛主席的话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我真是惭愧得很。

那时，每天下午5点钟，我总是走到北山下，去找毛主席出来散步。每次去，毛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名义上毛主席是来这里休养的，实际上他哪天都紧张地工作。我想，这叫什么休养呢？我劝毛主席多休息，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很好。”可是他总做不到，还是照旧工作。我只好每天下午去邀他出来散步，让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

北山上，树木很多，四周静悄悄的，傍晚，除了归窝的鸟儿在天空哇哇

的叫声外，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陪着毛主席在山上山下转，向他介绍这里的山和树的名字，介绍野花和野草的名字，毛主席总是兴致勃勃的，问这问那，又爱深追深问，有时竟把我这个本地人问得回答不上了。

毛主席也常常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山上，我们看到很多松树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毛主席在松树下站住了，用手指着胶汁颇有兴趣他说：“你看，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树受了伤，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人也一样，负了伤，得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是不是这样？”

我在北山上转了十几年，也常看到树身上挂着的这种胶汁，只知道这是树上的分泌物，不知道它还说明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原来是这样！”我说：“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所以我们总是想法使伤病员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使他们增强抵抗力。”

“这很好。”毛主席说。

我们走出树林，又走到几座山头前面，毛主席仰起头，望望这个山头，又望望那个山头。问了山头的名字，又观察了山下的地形，然后健步上了一个山头，站在山顶上，毛主席有趣地问我：“要是有敌人打来，你当指挥员，你准备占领哪个山头打击敌人？”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不禁笑起来。我对军事很感兴趣，但不懂。我看了看几个山头，凭着我简单的常识，我想，总应该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吧，居高临下，便于打击敌人，我就说：“占领那个最高的。”

毛主席却说：“不对。”

毛主席仔细地告诉我，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毛主席讲了很多战术上的问题，我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军事知识非常渊博，对问题的认识，又深又透，讲起来，却又是那样通俗易懂。

我们就这样随便他说着走着，每天从5点钟散步到7点钟，目送着太阳下了山，就往回走。

毛主席回到住处，又开始了他夜间的工作。

有一天，毛主席跟我谈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当时，我们这个医院，虽然自1927年起已经为红军的伤病员服务，但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订阅报纸等便利起见，在名义上一直还保留着教会医院——福音医院的名称。

毛主席说：“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这是个基督教教会医院的名字。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你看怎么样？”

我很同意。

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找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同志，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我想，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和大家商量，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

我到瑞金去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的意见。

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对我说：“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你怎么样？”原来敌人要来打闽西了。

“我跟主席到瑞金去。”我毫不犹豫他说。

“医院呢？”毛主席问。

“搬到瑞金去。”我说。

“好啊！”毛主席很高兴，说：“我到瑞金后，派人来帮你搬医院。”我临走时，毛主席又关心地问：“你的家怎么办？”

“也去。”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其他的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好吧！路上要小心，你母亲年纪大了。”

“你放心吧，主席。”我感激地回答。

第二天，毛主席就要走了。

我和陈炳辉，还有在医院休养的江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陈正人同志，把毛主席送到汀州西城门外，路上，我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毛主席在我们医院中住了4个月，在这4个月中，我对毛主席照顾得很少，毛主席总是叫我去关心整个医院，关心全体伤病员，特别是重伤病员；不要多照顾他。而他对我的教育却是无法计算的，无论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都给了我极深刻的影响。我那年已经38岁了，在这38年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谁也比不上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深；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爱、最博学、最伟大的人。那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几年了，但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那么些日子了，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永远离不开共产党，像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我离不开他！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30几年中没有产生过的，它使我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到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

所以，在这4个月中，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与其说是我护理了毛主席，还不如说是毛主席在政治思想上护理了我。毛主席真是我前进的引路人！我希望一辈子跟在毛主席身边，一刻也不离开他！

在路上，陈正人同志和毛主席说着话，我默默地走着，望着毛主席高大的身材，慈爱的面孔，把这些印到心底深处。

到了西城门外，毛主席和我们握别。

“主席，希望快些派人来，我们好快些搬家。”我握住毛主席的手要求。

“好的。”毛主席说。

毛主席骑上马走了。我们3个人在城门外站着，一直到望不见他的身影时才进城。

过了几天，毛主席派来了中央政府办公厅的傅公侠同志，和我们商议搬医院的事。

医院里的工作人员，从医生到护士，全都愿到瑞金去，这就解决了个大问题。伤病员中，除了痊愈的，可以出院，其他也转移到瑞金去。医院里的东西，从仪器到药柜，从床铺到桌椅，不论是原来医院中的财产，还是我个人购买的东 西，我决定全部搬走，献给革命。傅公侠同志表示很欢迎，因为当时红军中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医院，什么都很需要。

医院决定搬到江西瑞金的杨岗下。傅公侠同志走时，我派陈炳辉同志跟他一起去打前站，安排房子，接收转移去的伤病员，整理搬去的东西，我留在长汀，负责搬运前的工作。长汀和瑞金相距80里路。傅公侠同志派来了

170 个运输员，搬了两个星期，才把医院搬走了。

我全家人也随医院到厂瑞金。正如我所料，老母亲虽然年纪大了，但很乐意搬这次家，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瑞金。

我一到杨岗下，陈炳辉就来了，他说：“这里原先有个大地主，姓杨，我们的医院就搬在他家的祠堂里。这祠堂好大，有好几座房子。”

“哦！带我去看看。”我说。

我们走进杨家祠堂，左边有座楼房，四周还有几座平房。楼房下的大厅作了手术室，旁边是药房，病房都分散在四周。陈炳辉把东西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下一会，毛主席来了。这时他住在离杨岗下 20 里远的叶坪。他知道医院搬来了，马上就来了。

我迎出去，毛主席说：“都搬来了吗？”

“都搬来了。”我说。

我请毛主席进了屋，毛主席看了手术室、药房和病房后，问我：“你家里人住在哪里。”

“在楼上。”我说。

毛主席听了，上楼去看我母亲，说：“我们欢迎你。”

我母亲被毛主席的关心感动得一面笑一面流着泪说：“主席，谢谢你，谢谢你！”

下了楼，毛主席就跟我谈工作，他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交给你，由你当院长，你把红色医务学校交给贺诚同志办，你来办医院。”

“好。”我很感激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我们派郭实秋同志来当政委，他是个老同志，帮助你办医院。”毛主席说。

“这太好了！”我很高兴，我知道郭实秋同志是个老革命，他来了，就能加强我们医院的政治领导。

谈到医院的任务，毛主席说，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这一点，过去在长汀时毛主席也几次强调。因为我们这所医院，是中央苏区唯一的医院，过去不但红军中没有正式的医院，就是附近十几个县里，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医院。

“这个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毛主席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

“我一定好好地给伤病员服务。”我向毛主席作了保证。

最后，毛主席又指示我：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毛主席走后，我和陈炳辉到村里去走了一趟。这里的卫生情况较差，老百姓都喝他塘里的死水，很容易传染疾病，我们决定先在医院旁挖一口井，解决饮水问题，再发动大家打扫环境卫生，并向群众作卫生宣传。

不久，郭实秋同志来了。

中央红色医院，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正式创立了，那是 1933 年初。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那时很多红军的伤病员在农村中医治，没有医疗器械，没有医药设备，有些地方只有碘酒，也没有医生，条件很差。老百姓看病也很困难。我们的医院一成立，红军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很高兴，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医院了！”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当时登了一篇文章

章，题名：“红匾送给傅院长”，祝贺医院的成立。

我们的医院中，不但有西医，以后还来了中医，第一个中医师是从上海来的邓颖超同志的母亲邓老太太。毛主席很重视中医，主张中西医结合给伤病员治疗。

医院成立后，我们就大批接收伤病员，第一批接收了80多人。伤员中，有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王稼祥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炸弹片留在腹中。负伤后住在农村中医治，由于医药条件差，伤口化了脓。他被抬到我们医院中时，情况很不好。我们找了一间安静的独立屋子给他住——和周以栗同志住在一块，采用“保守疗法”，给他排脓、去毒，又给他打针，补助营养，保护伤口。长征后，他被安全地送到了苏联，取出了腹中的弹片，伤口就好了。

伤员中，还有红军第三军团政委蔡树藩同志。在福建沙县与敌人作战时，他的胳膊受了重伤，伤势很严重，从火线上抬到医院时，他痛得咬着牙，不断滋滋地往里吸气。我们给他治疗了二三个月，伤好后，在长征前出了院。

有一天，一副担架抬来了红军警卫营营长方强同志，才20多岁。他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我亲自给他检查了伤口，揭开被子一看，棉衣上渗透了鲜血。我轻轻地解开他的棉衣，衬衣沾在胸口上，鲜血从衣缝里汨汨地向外流。原来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前胸，又从后背钻出去，身上被打了个对穿洞。伤口离心脏只有几分远。当时他透不过气来，嘴里又吐血，伤势十分危险。我给他注射了止血药，又平定了他的呼吸。但是伤口怎么治呢？像这样的伤，过去我还没有治疗过。我突然想到了在汀州北山下散步时，毛主席讲的关于松树流胶汁的事，我耳边响起了几个月前毛主席说的话：“……人也一样，负了伤，有了病，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来恢复健康……”我有了办法，给方强同志的伤口消毒，上了药和敷料，防止感染，又给他打了止血针，同时采用半卧位静养，充分增加他的营养，使他增强抵抗力，派董以湘护士昼夜照顾他。只经过了一个多月，方强同志的伤口就长好了。

对于我们医院中的伤病员同志，毛主席是非常关心的。记得红军第十二军军长伍中豪同志患急性肺炎时，毛主席天天来看他，一来就坐在伍中豪同志对面的小铁床上，有时摸摸他的额角，看看他的体温，有时给他盖好被子，就好像慈爱的母亲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本来肺炎是要传染的，但伟大的阶级友爱使毛主席没顾这些。

（摘自傅连璋：《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毛主席的故事》，见杭州大学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7年内部出版，第414—430页。作者当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 我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1930年6月，毛主席率红四军到闽西，了解到闽西土地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群众的要求，在原来“抽多补少”土地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办法，就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会后毛主席前往汀州。而我当时也正在汀东做群众工作。一天傍晚，我

接到通知要我赶到汀州福音医院后面北山老古井的一座楼房去向领导汇报上作。我到达福音医院大已经很晚，那时才知道是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开始后毛主席听说我带工作组下乡剿过匪、打过土豪、分过田地。就笑着说：“呵，你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哪！”接着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群众发动得怎么样呀？开起会来，他们敢不敢讲话呀？参加开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呀？等等。我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有时边听边问，加以引导，有时又接过话题，分析议论，阐述革命道理。当我汇报到，对于组织农会，人们的态度并不一致，那些穿着比较好，嘴巴能说的人，就不那么热心，他们说：“我们几辈子没有参加农会，不是一样种田吃饭吗？”这些人开会喜欢挤在前面，他们看不起衣衫破烂，不大说话，站在后面的穷苦人，还常嘲骂穷苦人：“你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懂得什么！”毛主席插话说：“真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的人，受苦最深，革命性最强，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一定要认真把他们发动起来。我们不能把工作的基础放在那些穿着得好，嘴巴能说的人身上，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当我汇报到我们还搞不清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等帮会组织的人算不算土匪时，毛主席指出：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的人，除少数会道门头子外，大部分是穷苦人，他们生活困难，没得吃，有时也自发地去抢地主豪绅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土匪，你们不能打，要团结他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孤立和打击真正的地主豪绅。毛主席又形象地用散沙和湖洋泥（即一种叫湖洋田的水田里的胶泥）做比喻，进一步向我解释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甩湖洋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这就团结得很紧，不会散了。毛主席的比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它里面的道理又是那么深刻。我以前仅是凭着我的阶级本能去爱谁、恨谁，碰到比较复杂的情况，就不知如何办好，听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开始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当毛主席知道我是广东人时，又教育我要注意团结本地干部。他说：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情况熟悉，夜晚不打灯也能摸着群众家的后门。你们不熟，群众家的大门开着，你也摸不着。

南阳会议后，闽西的土地革命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对以前已分配土地的地方，又进行了土地的调整，群众普遍比较满意，积极投入了土地革命运动，闽西的红军扩大了，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和发展。不过这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如提出了反富农的问题，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同时，富农的土地财产已被没收。到了1931年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策，在闽西逐渐贯彻，土地革命的政策就越来越“左”，如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以后又开展查田运动，越查越“左”，最后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我在闽西工作4年，直接参加了土地革命，对这些“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深有体会，其中记忆犹新的有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分配等问题。闽西第一次分田时，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后有人提出，按人口分配是富农路线，因富农家里人口多，按人口分配对富农有利，要按劳动力分配，16岁以下的小孩和妇女算半劳动力，只能分配半份土地。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激烈争论。劳力多的农户没意见，劳力少的就有意见，特别是妇女，意见很大。我做妇女工作，整天在各乡、村跑，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贫雇农家里的青壮年男子多数参加了红军，妇女实际

上成为主要劳动力，她们分半份田是很不合理的。再说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生活本来就困难，如按劳力分配，他们分得的土地就少，生活就会更困难。我坚决不同意按劳力分配，但上级规定要按劳力分配，我思想上很想不通。

1931年夏，我参加闽西慰问团到瑞金慰问红军，在叶坪见到毛主席，他问起我们闽西土地革命的情况，我就向毛主席反映说：“现在群众对分配土地问题，讨论很热烈，有的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有的人主张按劳动力分配，还有的说妇女和16岁以下的小孩是半劳力，只分半份土地，妇女和多子女的群众意见很大”。毛主席问我：“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还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最好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毛主席说：“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好！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中农的土地不动，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富农的田多是屋前村后的肥田，贫农的田多是边远山脚的瘦田，分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肥田和瘦田搭配均匀来分，替贫苦的农民设想得周到一些！”我听了很高兴。我们回到闽西后，有些地方已按劳动力分了田，出了不少问题，以后又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

1932年春夏，毛主席在汀州傅连障的福音医院养病，有一天叫我去汇报工作。他问我长汀县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如实地汇报说：有些地方生产搞得好些，群众生活也好些；有些地方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苦，粮食不够吃，靠吃菜干、薯干，吃盐也很困难，盐很贵，又买不到。我们只得动员群众种杂粮，种爪菜来度荒。毛主席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当县委书记，要管好大家的家务。要组织群众多种杂粮、爪菜，晒些菜干、薯干、芋头干、南瓜干、笋干等等准备渡荒。没有盐吃，可以组织群众挖烂屋的旧墙土熬硝盐，过去盐商屯盐的地方的泥土也可挖来熬盐。有盐时，动员群众淹些咸菜，没盐时当盐吃。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编了个顺口溜：“大口小口，每家三斗（指三斗粮食）；大袋小袋，每家三袋（各种干菜）；大缸小缸，每家一缸（指咸菜）”。我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要群众准备这些东西来度荒。

总计我在长汀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县委书记，得到很大的锻炼，各方面都有所提高。1933年上半年，福建省委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我因对反罗明路线思想不通，被调离了长汀县委。

（摘自李坚贞：《我的回忆》，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15—18页。作者当时任中共福建省长汀县委书记。后历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指导员、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华东局、山东分局妇委书记等职。建国后任中央监委委员，广东省委监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6 善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亲自抓宣传队的工作，他非常关心宣传队的工作情况，每到一地，总是要检查宣传队的工作情况如何，对于宣传队做得不好的地方，就给指出来。他检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上课。他曾经批评过我们写怪字，把“工”字写成“𠄎”，把“人”字写成“𠄎”。他讲：你们写的字是给谁看的，工人农民识得多少字？你们写的这些字，工人农民是看不懂的。我们在宣传群众时，也会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可是，

我们自己还不懂得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地主”。以后，毛泽东同志就给我们解释，同时要求我们向群众宣传时解释清楚。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宣传队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对整个红军也都是这样强调的）。他对我们讲：工商业怎样？地主怎样？工人怎样？农民怎样？都要调查清楚。对于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工人农民又是怎样被剥削的，以及一个村庄里的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也都要调查清楚。他还经常和我们一起开调查会。各阶层的调查会，不是台在一起开的，而是分开开的。我们到了县城以后，要开工商业者的调查会，要找店员开调查会。到了农村里，要找农民开调查会。那时，对各方面的人都要进行调查，甚至要进行个别人的调查，除了对贫苦农民进行调查外，对其他阶级的人同样要进行调查，对于在县衙门里做过事的人，也要找他们进行调查。我们在一个地方作了调查后，都要上报。经过调查我们处理了各种问题，解决了各种问题。从而，也使我们更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

调查工作很重要，说老实话，开始我们是不会做调查工作的，不知道要怎样去做调查，即使调查了，也只是一般的东西，不全面不仔细。虽然上级一再强调要做调查，要开调查会。可是，在实际中，我们往往是做得不够的。我们来到赣南的寻邬，在寻邬住了大概有三四天，毛泽东同志把宣传队集中起来，并问我们：“你们在寻邬作了调查没有？”我们回答说：“调查了。”他又问：“你们在寻邬作了调查，那么你们讲一讲寻邬做生意中有哪一类最多？”他这一问，把我们大家都问住了，我们想了一想说：“大概是酿酒、做豆腐的最多吧。”他接着又问：“就算是酿酒、做豆腐的最多吧！那么，你们再说一说，寻邬哪几家做豆腐做得最好？哪几家做的豆腐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做水酒做得最好？”对于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谁都答不出来。只好哑口无言。这时，他笑着给我们回答了上面的几个问题。事后，我们分头去调查了一下，和他讲的是完全一样。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既对我们鼓励了一番，又对我们进行了批评。说我们工作不细致，不认真，走马看花，没有下苦功夫，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至今还没忘记。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学会算帐，并要求我们替农民算帐，因为有些地方的豪绅地主甲小恩小惠拉拢贫苦农民，如：减斗把谷，你就得送只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这样一来，有些贫苦农民往往不了解他们剥削了自己。但经过算帐后，他们就会明白，地主是怎样剥削自己的。并且，就可以了解到自己一年劳动了多少，又得到了多少，结果，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通过算帐，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剥削者，地主不劳动，却过好日子，原来是个剥削者。贫苦农民的觉悟一旦提高了，他们就会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就会跟共产党干革命。

（摘自谭冠三：《在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64—465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军需文书、三纵队九支队宣传中队队长，连、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二、建军原则的确立与红军的大发展

1 中央的两封来信

大约 1929 年 4 月初，红四军前委收到党中央自上海写给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形势做了悲观的估计，指示红四军：隐蔽部队目标，朱毛离开部队，把部队分散到农村去。这个消息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政治部还专门拟了一个到苏联去学习的干部名单，大队以上的主要干部差不多都上了这个名单。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四军前委给党中央写了复信，指出：粤湘两省敌军强大，湘省更因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闽浙三省敌军最弱，我党的盲动主义错误较少，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我们要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红军要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红四军前委在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消除了“二月来信”的悲观情绪在红军中的影响。

4 月 11 日，红四军前委在于部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地区，建立以井冈山为基础的湘赣边苏区。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继续在赣南地区进行了 45 天艰苦的斗争，在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相继建立县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其他县、区群众斗争也有了很大发展。

4 月底，蒋桂军阀在两湖的混战以桂系军阀退出武汉而告结束。江西军阀朱培德又集中 3 个旅向于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进攻红四军。到 5 月中旬，粤桂军阀又开始混战，闽西军阀陈国辉、张贞加入粤军讨桂阵营，其主力开赴潮汕作战，一时闽西空虚，龙岩只有陈国辉的留守部队，闽西特委将敌情变化通告红四军，要求红军再到闽西活动。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避开赣敌的进攻，在 5 月 20 日第二次入闽，在长汀、武平和上杭等广大乡村地区筹款和做地方工作，消灭地主武装。

6 月 19 日拂晓，红四军和闽西红军从北、西、南三面突然向龙岩发起进攻，激战到下午两点，陈国辉化装带着几个人由南面向漳州方向逃跑，陈国辉部第一混成旅 2000 多人全部被歼。战斗结束以后，朱德军长骑着缴获敌人的自行车，到城里各处视察，战士们高兴地争着看军长骑自行车。这时候，闽西已经没有大股军阀部队存在了。

1929 年 6 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城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自井冈山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呢？还是按照北伐军的老一套做法，军队只是单纯打仗，军事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仅仅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呢？在讨论发言中，多数同志，特别是军官同志多主张，仍按北伐军的经验办事。有的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有的主张由司令部出布告，办理民事，命令商会筹款等。在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应走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多数同志主张还是主要搞游击战，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全国总的起义，并认为走这一条路可以改善军队的物质生活。由于领导同志的认识不一致，对这些争论的问题，会上没有得出结论。在组织上经过民主选举，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我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没有发言，回想起来，当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养病，陈毅去

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红四军工作由朱德主持。

红四军在闽西的胜利，使敌人非常震惊。6月，蒋介石命令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会剿”。但是，这三省敌军派系不同，互不协调，行动缓慢。

为了粉碎敌军的“会剿”，并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四军前委决定，朱德军长率红四军第二、三纵队（这时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公安），在7月底从龙岩出发，经宁洋县向闽中前进。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红四军主力向东行进。8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到达大田县城外，大田城筑有碉楼，又有城墙，以红军当时的装备情况，很难攻克。闽中各县城防状况大部这样，加上天气炎热，又正值雨季，病员增多，我们党在闽中没有群众工作基础，筹措给养困难。朱德军长在大田城外召集支队以上负责同志开会，经过研究，决定放弃进军闽中的计划，转回闽西。

继之，红四军进占上杭，部队在上杭休息了半个多月，红四军在上杭召开了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毛泽东、陈毅均未出席，会议只讨论了一般的工作问题，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这时，张发奎和李宗仁联合进攻粤系军阀陈济棠。红四军接到党中央指示：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红军应乘机向东江地区出击，向潮梅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第四纵队留在闽西根据地，军部率第一、二、三纵队向东江进军。10月25日，红军进占梅县县城，驻了一天，因为广东敌军进攻，旋即退出，撤到梅县以南的游击根据地马头地区。根据当地群众报告，进占梅县的敌人只有一个团（实际上却是一个师），在东江特委要求下，10月3日拂晓，红四军再次进攻梅县城。敌人凭城死守，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没有打开，虽然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攻城时，第九支队担任北面主攻，连续发起三次冲锋，部队伤亡了30余人，党代表罗荣桓也负了伤。在这次战斗中，第二十七大队大队长阵亡，这位大队长的姓名我忘记了，只记得他是浙江人，莫斯科步校毕业生，才回国不久，到红四军任大队长不几天。红军撤出梅县战斗以后，前委判断粤敌会继续增兵，不能滞留在东江地区作战，便经江西安远、寻乌逐步转回到长汀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罗荣桓养伤期间，杨立三代理第九支队党代表一个多月。

此时，陈毅同志由上海党中央回到了部队，带回“中央九月来信”。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在11月26日到达长汀，重新回到部队工作。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1929年12月初，红四军第一、二纵队集中在连城新泉，第三纵队集中在龙岩地区进行整训。第九支队进驻龙岩县城，向漳州方向警戒，这是红军又一次进龙岩城。这时，毛泽东在上杭古田村主持了党代表联席会议，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会议开了半个月。第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伤愈以后，去古田村参加了党代表联席

大约在12月下旬，即“古田会议”将要召开的时候，第九支队由龙岩县城开到古田村。红四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靠近古田村。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自12月28日开始到30日结束，共开了3天。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由陈毅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听了陈毅汇报后，表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并代表

中央给红四军写了“中央九月来信”。

在党代表联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听取了各组讨论意见，根据调查及两年来丰富的建军经验，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第九次党代表会主要是通过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全体代表一致拥护这个决议。会上，朱德军长做了军事报告，陈毅同志讲了话。实际上正式会议只开了两天。

“古田会议”总结了1927年8月南昌起义到1929年这两年零四个月时间内红四军的建军经验。会议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必须置于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在政治上，要树立坚强的政权观念和群众观念，克服单纯军事观念和流寇思想；在思想上，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在组织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反对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要把红军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必须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他列举了红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并提出纠正方法。会议的这个决议，完全划清了红军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形成了我军的建军原则，为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会议最后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委员的新前委。

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的地方武装，首先学习和贯彻这个决议，部队受到教育以后，纪律加强了，内部团结更好了，战斗力提高了，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摘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1—80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连长、支队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古田火炬照征程

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的敌人，便对闽西地区联合发动了“三省会剿”。毛党代表立即指挥一、三、四纵队向江西进军。在向赣南进军的路上，进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支队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在检查过程中，有些人是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古田会议的决议给大家有力的武器，各支部都对他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开展了严肃的批判。检查结束以后，各支部又把检查的结果向全体指战员公布，发动大家讨论；并提出了“反对流氓行为”的口号。支队党委和各支部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对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这样，便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随之开展起来了。许多官兵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互相批评。打骂士兵、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便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坏人坏事被揭发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有严重流氓行为的人开展了严肃的批评。

古田会议以后，毛党代表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在这期间，他不断地、适时地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指示。最使我难忘的是下面的两件事情：

记得我们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的途中，一天，部队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我有事到纵队部去。刚到那里不久，我们大

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便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我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党代表却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不要急！我们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你也参加。”

毛党代表那种镇静自如的态度，立刻感染了我。坐下后，他要我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我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他的分析既简单又明确，就像谈家常一样通俗易懂。最后，他问我：

“你看打好，不打好？打有利，不打有利？”

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我立即感到刚才考虑的太简单了。于是急忙表示同意不打。毛党代表又转问在座的其他同志：“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不打。

毛党代表又转向我，仍用商量的口吻问道：“大家都同意不打。我也不同意打。你看下一步应该怎样行动？”

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仔细想了想，才回答：“我看应该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对！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刻去布置吧！”毛党代表微笑着作了决定。

毛党代表完全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态度，而且还要我参加会议一起讨论。这种高度的民主作风，不但启发我认识了缺点，而且使我学会了应该如何分析问题。通过这件事情，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以平等态度对待同志的深远意义。

1930年5月，我们二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正是贯彻古田会议决议高潮时期。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教方法被反掉以后，一部分军官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了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正在这个时候，毛党代表专门召开了一次大队以上的干部会，详细他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

毛党代表在这个报告里，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历史上所有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国民党和一切反革命军队内部，都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为了暂时缓和这个矛盾，迫使广大士兵为他们卖命，不得不采用欺骗、麻痹和镇压的手段。我们的军队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由许多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一个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不论干部、战士，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的，都是革命战士，都是阶级弟兄，因此，必须以革命军队的管教方法来代替旧军队的管教方法。接着毛党代表又把革命军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大意是：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他指出，当了干部就高人一等，那是旧军队的作风。只有深入群众，群众化了，才能和战士真正打成一片，战士才敢接近你，才能把心里话告诉你，才敢大胆地向你提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战士的思想问题和困难，适时地、有的放矢地予以解决。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作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他号召到会的全体干部，放下架子，深入到战士中去。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毛党代表指出，这是测验每个革命干部有没有群众

观点的标准。我们的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的疾苦，解决战士的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部队真正成为一个充满着阶级友爱，充满着阶级感情的革命大家庭，才会使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作战士的表率。毛党代表强调指出，这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我们的干部必须是执行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制法违法，这是统治阶级的作风，必须坚决根除。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毛党代表再三告诫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相信广大群众中有英雄。他说，我们的战士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勇于创造的人。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群众的斗争经验、群众的创造来教育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毛党代表谆谆地教导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要靠自觉，不能靠强迫命令。他反复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讲清，他们就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勇往直前，所向无敌。我们当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也就是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思想觉悟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说服教育。在必须以纪律制裁的时候，也要使被处分的人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切“不教而诛”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讲这个问题时，毛党代表特地给大家讲了三国时黄忠老将大败夏侯渊的故事。他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毛党代表指出，我们的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作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把道理讲清，任务讲明，战士们就可以排除万难，勇往直前。专靠指派命令，不做宣传鼓动，就是执行了命令，也不会得到更大的成绩。第七，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应赏不赏，应罚不罚，是赏罚不分明；有赏无罚，或者有罚无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执行赏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群众公议，组织批准。这样，既能教育个人，又能教育全体。毛党代表讲得既通俗又易懂，而且简明、生动，听了以后长久难忘。毛党代表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贯彻古田会议决议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一直指导着我军的建设，成为我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田会议以后，红四军在毛党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沿着古田会议指出的道路，不断地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不良倾向进行斗争，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飞跃地迈进。在短短的半年中，不但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而且使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部队也发展了。1930年6月，四军在闽西长汀进行了整编，正式组成了红一军团。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这时候，每个排都能够独立执行战斗、发动群众等重要任务，部队士气空前旺盛，战斗力有了显著提高，工作异常活跃，面貌焕然一新。

古田会议的胜利，是我军建军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古田会议的决议，像一把火炬，永远照耀着我军胜利的前程。

（摘自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见196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作者当时任红四军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四支队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扩大红军建制

1930年6月，毛泽东在汀州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整编红军。这次整编，以红四军为基础，把闽西和赣南的地方红军各一部全编在一起，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下辖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红四军以原红四军第一、二纵队为基础，加上闽西地方部队一部组成，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红十二军（缺三十六师）以原红四军第三纵队为基础，加上江西地方部队一部和罗炳辉在吉安起义的靖卫大队组成，罗炳辉代军长（军长伍中豪因病未到职），谭震林任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林野任参谋长未到职，由我代理参谋长。红十二军下辖两个师：红三十四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旷珠权（后叛变）；红三十五师师长龙普林（企图投敌后被法办），政治委员欧阳健。红三军纯系江西地方红军组成，黄公略任军长，蔡会文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全军共约万余人。

1930年夏季，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空前规模的大混战，蒋介石将湘鄂赣的国民党军队大部调往中原战场。各苏区周围敌军兵力不足，只能处于守势，红军乘势广泛进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而这时，中共中央被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他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责毛泽东的“以乡村包围城市”理论是一种错误观念，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他命令朱、毛部队夺取南昌、九江，配合全国各大城市总起义。毛泽东对立三路线自始至终是反对的，并以实际行动不断减轻和纠正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

7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主力由长汀北上，开到江西广昌，以一部绕经兴国，7月20日进到永丰城。从永丰进攻七琴，将守敌击溃，歼敌数百人。接着，红军继续向樟树镇（今清江县城）前进，击溃了敌张辉瓒第十八师两个营，在7月24日占领樟树镇，截断了赣江的水路交通，威胁南昌。但毛泽东和朱德认为红军不宜进攻南昌，没有执行当时党中央要红军“夺取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任务，在樟树镇一边收集船只，动员船工，准备渡过赣江；一边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停了两三天，红军由樟树镇渡过赣江，占领了高安县、上高县、奉新县和万寿宫、牛行车站一带，分兵筹款和做地方工作。红十二军部队分散在高安到牛行车站一带，军部驻高安，后驻万寿宫。

8月1日是南昌起义三周年纪念日，红一军团命令红十二军占领南浔铁路牛行车站的部队，隔着赣江向南昌城放了几排枪示威，以示纪念。随后，红一军团即转移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从而使红一军团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红三军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6月中旬从大冶地区向西南进击。7月下旬，红三军团趁湘敌何键部主力南下衡宝地区和粤桂军阀作战，在长沙外围击溃和消灭了敌人6个团，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长沙。后来因为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撤离长沙，退到浏阳、平江地区。

红一军团指挥机关在报纸上得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派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去和红三军团联络。过了几天，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杨岳彬一起回到红一军团，请求增援红三军团。红一军团遂经江西的万载县向湖

南前进。追击红三军团的湘敌戴斗垣旅驻在浏阳县文家市，红一军团决定在8月20日拂晓，突然奔袭包围全歼该敌。战斗中，红十二军配合友邻担任由西向东的攻击任务。红军击毙戴斗垣，俘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8月23日，红一军团前进到浏阳东北的永和市地区，和从长寿街赶来的红三军团会合。红一、三军团会师以后，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红一军团机关担负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务。方面军下辖红一、三军团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李立三路线的中央又命令红军第二次打长沙。当时，毛泽东虽然不主张打长沙，但是有不少同志认为这是“中央”的命令，一个二军团就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打长沙更没有问题了。其实，红一方面军同长沙守敌相比数量虽稍占优势，但在装备上则相差甚远，就连敌人只用铁丝网构成的简单防线，也无法冲破。9月初，红军包围长沙之后，接连三个晚上进行总攻，都未奏效。后来有人提议，用战国时代的“火牛阵”来冲铁丝网，有的部队竟然采纳了这个提议，买来一些耕牛，把浸有煤油的棉花团绑在牛尾巴上，到晚间用火点燃，冲击敌人防线。结果这些牛根本不听指挥，它们受了惊吓不但不向前冲，反而到处乱跑，最后成了一场笑话而告终。

红军围攻长沙城达半个多月，眼看没有希望攻进城了，蒋、冯、阎军阀之间的大混战又将要结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领导下，及时作出正确决定，红军于9月12日主动放弃了对长沙的围攻，这就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摘自《张宗逊回忆录》第83—88页。作者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十二军代理参谋长等职。）

4 红色电波的升起

1930年12月30日的龙岗战役，红军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9000余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那时，我（刘寅——编者注）因失学，经朋友介绍，临时在国民党交通兵团派往该师的无线电第五分队里“借读”，时间才只两个半月，白军的军衣还未穿上，就随着该师的覆灭，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红军。

龙岗战斗那一天，我和王诤同志（当时他是电台的报务员，也是我的老师）一直在一起。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同到了红三军政治部。没有料到，红军指战员是那样和蔼地对待我们。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亲自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向我们讲解了红军对待白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欢度了胜利的除夕。

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虽已取得了全胜，但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红军总司令部的忙碌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时刻，193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幸运地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

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

毛泽东同志首先转向我们，和蔼而热情他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但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革命武装，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给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虽然毛泽东同志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我们总还免不了有些局促，不知道答复一些什么好，只是感激地点着头。

朱德同志说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陆续地来。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当时我们虽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我们都一致表示：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好工作。接着他又鼓励我们说：“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是革命人民的！”

两位领导同志这样亲切、坦率和充满革命胜利信心的话，以及对我们表示的信赖，使我们内心非常激动，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但它的诞生却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距我们参加红军还不到十天呢！

在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中，因为红军战士还不懂无线电机的用场，把发报机砸毁了。事情反映到毛总政委那里，他立即发出了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新的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这个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当时，追歼谭道源部的半个师，谭道源本人和电台人员都跑了，但派归他使用的交通兵团无线电第六分队的机器却较完整地为我们缴获了。因为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个电台同属国民党交通兵团，机器的程式相似，零件和备件是通用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台了。

加上前一次的缴获，我们已经有了两部半电台的机器装备（一部发信机、两部收信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在红军中建立无线电通信，我们却利用收信机，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供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参考。白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他们在无线电通信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互相询问驻地。

白军在出发前，电台还经常拍发：

“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

“请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

敌军的空中通信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敌军移动和驻址的军事情况，红军作战部门从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个时候的无线电通信兵实际上起着技术侦察兵的作用。

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

训练班的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枪，背包袱，个子大的还替运输员抬蓄电池和挑机器。

学习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有时行军小憩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我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我们的桌椅。一只电码练习器和一只手键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于电他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 1000 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刘寅——编者注）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部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 1931 年 2 月命令何应钦率领 20 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 40 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拗上，20 多大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 月 15 日黄昏，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 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在党的关怀和抚育下，无线电通信这枝幼苗茁壮成长。不到一年的时间，随着红军的胜利，红军各军团都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红线紧密地联在一起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使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这年 6 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王铮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

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信。

（摘编自王铮：《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和刘寅《阳光雨露育新枝——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回忆片断》；见《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

5 开创红军的电讯事业

在1930年底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红军，是没有无线电台的，1930年12月底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役，我军彻底消灭敌十八师张辉斑部时，缴到了一架15瓦的无线电台。可是多系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对于无线电机是不认得的，在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机器及仇恨反动派的情绪下，竟把自己流血牺牲所缴获来的电台机器——发报机，电动马达，充电机，蓄电池……痛痛快快地捣了个粉碎。幸好还剩下架漂亮而完整的收报机没有损坏，经打扫战场的部队搜集上送总部，这就是可资利用的半个电台。

毛委员知道了此事后，认为现代的无线电通信工具，对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用途甚大，立即向各部下传达了指示：凡是在今后所缴获的一切不认识的东西，不得破坏，一律清理，妥为上送。对于被我军俘虏之电务人员和医务人员等专业人材，要清查出来，给以优待，量才留用。

龙岗战役胜利后三天，我军又在东韶歼灭了敌人第五十师谭道源部，缴到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总部的指示，在红军的部队中得到了百分之百的贯彻，这次缴获的电台机件，完整无损，一个螺丝钉也没缺少。两次战役共缴到了一个半电台和俘虏了六名电务人员，这就有了建立红军无线电通信的“种子”了，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关怀之下，创立了红军无线电大队，开始奠定了红军电台的发展基础。无线电大队设大队长，政委；下辖一个电信训练班，一个监护通信排，一个运输排，连同工作人员共约百余人。

我们电信训练班在1931年1月10日正式开学，有“第一流的政治教员”来上政治课，这就是毛委员、朱总司令和总政治主任周以栗等同志，大家对他们的政治课，特感兴趣，同志们称之为：“最有味道的政治课”。记得有一次毛委员来讲课，时间是4月下旬，地点在东固垌上电大队驻地门外的一块小草坪上。毛委员穿灰的已褪色的旧中山服，着旧布鞋。听课的除十几名男生和李赤华、李建华、钟培兰三名女生外，还有工作人员等约30人。因没有课堂和桌凳，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毛委员站着讲。课题是：“革命一定要发展胜利，反革命一定要失败”，由于毛委员讲的生动有趣，使听课的人不但全神贯注，而且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我现在印象还深的有这么几句：“受压迫剥削的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反动派是镇压不了的，无可奈何的。正如：天下雨，无法可止一样……”

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之后，红军主力在闽赣边一带，进行分散以发动群众，执行工作队的任务。我们总司令部于6月中旬从建宁城移驻在康都镇。我们电台的两个干部间发生了矛盾，一个是政委冯同志，一个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机务员涂同志。他俩因派卫兵事发生了争吵，影响了团结。事

情经过是这样：我们刚开到康都街上扎营时，电台的充电机“咚咚咚”的吼叫起来了，这是涂机务员进行充电工作。当地群众不认识这种发出飞机声和乌龟壳一样的充电机是什么玩意，都好奇的挤拢来看热闹，为了保安和防止坏人，涂机务员开始和蔼的一一请老百姓走开，可是一批群众刚刚叫开，另一批又围拢来了。涂同志当时态度表面还和气冷静，但内心却甚为恼火。于是他跑到政委跟前大发雷霆，怪政委没有派卫兵保护。政委见他这种态度，也不冷静，于是俩人就争吵起来。大家劝阻调解也无效。经政委和我们支委几位同志商议决定，晚饭后召开了党的支部大会，总政治部也派了一位同志来参加。会议开了两个多钟头，虽经总政同志和大家批评劝说，但冯、涂二人仍各执己见，结果没有把他俩的矛盾解决。此事，毛委员很快就知道了。政委通知我们说：“明天晚饭后，继续在原地召开支部大会，毛委员要亲自来参加。”毛委员来参加我们的支部大会！有些同志内心顿时惊喜起来，惊的是一位中央委员、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毛委员，工作这么忙，竟抽出时间深入到我们一个连队的支部中来。喜的是：有毛委员来参加会议，冯、涂二同志的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了。次日晚饭后，同志们都很早就到达了“会场”——康都街外南边一条小河边的草地上，等候毛委员来临。冯政委、伍云甫同志和我三个人跟随着毛委员，走向小河边的“会场”。毛委员边走边问伍云甫同志和我：“你们看，他们两个谁有理？”伍云甫同志尚未答腔，我这个沉不住气的人便抢先说：“我看他们两个都不对，不过主要不对的是老涂，他对上级所采取的态度是错误的；而冯政委开口骂人，也是……”我滔滔不绝连珠似的谈出了我的见解。毛委员微笑着点了一下头。而冯、伍二位则未说话。到了“会场”，大家都以敬爱喜悦的心情来迎接毛委员，罗大民（运输员）同志早已摆好了一块平坦的石块，请毛委员坐，可是毛委员并没坐运输员同志帮他预备好的“雅座”，而是和大家一样的就地坐了下来。会议同昨天一样，大家仍推我做临时主席，我宣布开会后，即请毛委员做指示，但毛委员说，他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因此，同志们便毫无拘束地一个接一个的踊跃发言了。大家对冯、涂二同志均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大多数同志都发表了意见，没有新的意见了，我请毛委员做结论。毛委员说：“不是做结论，我只发表一些意见。……政治委员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在军队的代表。政治工作制度，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公开在群众中损害政委的威信是错误的。而政治委员出口骂人，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同志必须珍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和进步，克服无原则纠纷，以利工作之开展……”毛委员就是这样地坚持原则，用充分说理，耐心说服的方法，公正地为我们处理了内部矛盾，使同志们（包括冯、涂二人）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指示。在冯、涂二同志分别做了自我批评后，一场干部间的磨擦，妥善地解决了。当毛委员向大家挥手告别时，熄灯号已吹过一个多钟头了。

（摘自曹丹辉：《伟大的历程——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见《红旗飘飘》第1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2页。作者当时在红军无线电大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反“围剿”用兵如神

1 三次反“围剿”创奇迹

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4800人，到了东固，还有4000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3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打死敌旅长郭凤鸣。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向闽中进军，后来折回来打上杭。那时队伍已发展到4个纵队。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人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1930年6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10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1万人左右，这时约有1.8万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有“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3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10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3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1930年12月30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个月，1931年5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任，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15天时间，横扫敌人800里，五战五胜，打垮敌人16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1931年7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零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20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九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1932年1月10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10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一千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青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

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摘自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朱德选集》，第128—133页。作者当时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1955年被授于元帅军衔。）

2 罗坊会议定决策

1930年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要方面军仍开回去打长沙。周一到宜春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盛情款待，并向他进行了通宵达旦的叙谈，陈述打长沙与打吉安利弊，说明了第一次打长沙进而又出没过站住脚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不足。第二次打长沙，还是缺乏群众条件，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结果，周以栗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和来此的使命，并完全接受了正确路线。

之后，在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了袁州会议。会议决定了不再回师打长沙，也下马上去打南昌，而是要打吉安。此举是战略转变中的重要一着，可使赣西南广大红军连成一片，而进一步“经营江西”革命根据地。袁州会议可以说是红一方面军反对“立三路线”斗争的一个前奏，或者说是思想准备，因为第一次打长沙攻占了又放弃，第二次打长沙为时半月之久未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在启发教育着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

10月5日，一军团夺取吉安后，就召开了吉安会议。之后，于14日移师北上。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同志在沿途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除了开会，毛泽东同志还忙着找干部谈话，继续解决行动问题。我记得总前委是17日在峡江一个资本家的店房里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参加会议的总前委委员、军以上干部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一军团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等；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邓萍（五军军长）、张纯清（五军政委）、何长工（八军军长）、袁国平（八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还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如曾山、曾炳春、李文林等。李井泉、古柏同志作记录。与会者一共不到30人。

会议开了一夜。上半夜对所议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主要问题是：

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白色区域。

会上毛泽东同志有个敌情报旨，谓敌军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等6个师的兵力开到南昌，向樟树蠢蠢欲动。正像毛泽东同志19日在峡江致湘东特委信中所指出的：“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

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1930年7月我们打长沙时，敌人曾嘲笑我们“小丑不能跳梁”，可是偏偏“小丑”抄了他们的老巢，一举攻克长沙城，几乎生擒何键老贼。从此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力量，不可小视。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他们的反动统治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就勾结、“和解”，妄图扑灭革命，对我们方面军渐成“围剿”之势。敌人磨刀霍霍要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具体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诱敌深入”，以弱胜强。同时，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实际上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继续。

三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反，主张不过赣江，还要打南昌、九江，怕丢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三军团的兵源在这一带的占优势，不愿意离开这里。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时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当时“立三路线”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揭开，打南昌，攻九江，取得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份的首先胜利的影响还严重存在，所以会上的争论，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为大家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同志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来分析形势，教育大家。

会议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才休息一下，这时三军团的同志碰了个头，我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势必一、三军团要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赣江西不如赣江东。滕代远、邓萍、张纯清也持有类似的意见。彭德怀同志也感到若再这样坚持下去，一、三军团有可能就要分处赣江东西，则不能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必然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大家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只有袁国平同志的思想还未全通。从整个会上看，我记得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意见一致，一军团的罗荣桓同志发言少，是拥护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地方上的几位同志很少发言，主要是“看会”，看军队同志的态度。曾山同志是很好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是向南得路发展，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还有少数同志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因而峡江会议还留下了这样一条尾巴。这反映在一方面军的历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中。有等待大多数干部、战士觉悟之意，还有斗争策略问题在其中。

总之，我认为峡江会议是一方面军总前委反对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内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开始。

10月25日，总部从黄土岗移师罗坊，同时通知各军主要领导人到罗坊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总前委委员和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以及江西省行委、省苏的负责人。我和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八军团政委袁国平是从军部去的。三军团的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党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是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上，毛泽东首先讲了当前敌情，指出敌人要进攻我军的紧迫形势。因此，我军不能继续按原计划去进攻南昌、九江。并提出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实行“诱敌深入”。要求到会的同志严肃认真地讨论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朱德、周以栗等也讲了话。

在讨论中，大家发言非常积极。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结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以及占领吉安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在目前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我红军、江西苏区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对这些问题，在罗坊会议决议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会议当时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因此，在10月26日就正式形成了罗坊会议的决议案（即《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

但罗坊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军东渡赣江，到根据地内去打破敌人的进攻时，开始时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大。特别是地方上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极力反对把敌人引到苏区来打，反对过赣江。我们三军团参加会议的有些同志，也是不大同意过江的。认为东渡赣江，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给根据地人民危害很大。主张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前来进攻的敌人决战，变敌人的进攻为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因此，说服干部接受东渡赣江，诱敌深入，到根据地内部去作战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为了使到会的同志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许多的说服教育工作。明确地指出，此次蒋介石调集兵力要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战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赤区，大举灭敌，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了，敌人工事也就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朱德、周以栗、彭德怀、黄公略等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一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终于在10月30日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从总前委自撤围长沙至罗坊的这几次会议来看，都是为了克服立三“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是紧密相联的。我认为，从红军撤围长沙至袁州会议，是反立三错误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转变，太平圩会议停止了红军进攻，罗坊会议是这几次会议的继续，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就使总前委的路线完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才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正如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到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我们可以看到，从撤离长沙到峡江，口号还是打入城市。峡江会议在军事行动的总目标上，还没有放弃进攻南昌、九江。直到罗坊会议作出了决议，提出诱敌深入作战方针，这是个根本性的转变，由进攻到退却。罗坊会议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于它正式克服了立三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内的影响，没有罗坊会议，就没有“引兵赣东”，不能“引兵赣东”，就不可能打败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罗坊会议把两个军团和地方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了，诱敌深入，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第286—291页；《何长工谈

罗坊会议前后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第 23 辑，第 182-185 页。作者当时任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

3 伟大的第一步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是在 1930 年年底进行的。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五天内打两仗（1930 年 12 月 27 日至 1931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反动派的 10 万兵马，就被歼的被歼，溃逃的溃逃，全线崩溃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诱敌深入，准备反攻”、“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打好第一仗”和打“歼灭战”等作战方针的胜利。但是，这一方针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古田会议开过刚好一年。一年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古田会议的决议，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发扬了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部队数量扩大了，政治、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土地革命深入了，根据地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县区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赤卫队、红军游击队等群众武装，犹如春风野火，日趋壮大。

蒋介石害怕了，他感到，这片燎原的烈火，是他的心腹大患，如不赶快扑灭，势必焚毁整个蒋家王朝。于是，在结束军阀混战之后，立即掉过头来，兴师 10 万，分兵八路，从江西吉安、福建建宁之线，由北向南，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

对中央苏区来说，反“围剿”战争这是第一次；对红军来说，同敌人这样大量的正规军作战，也是第一次。打不打？怎样打？成了当时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热烈议论的中心。

当时曾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仍用游击战的一套办法来对付；另一种则两眼照旧死盯着南昌、九江不放，要拿大城市。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持前一种意见的人，只看到敌人的强大，而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巨大变化：建立了方面军，有了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持后一种意见的人，不顾当前客观条件，只知进攻，不知防御，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

究竟应当怎样打法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强敌进攻的面前，不是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敌进攻，而是先退却然后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退却并不是消极避战，而是为了“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战胜和消灭敌人。就这样，毛泽东同志在这严重、紧张的关头，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进一步发展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第一次提出了“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的正确方针。

但是，这一正确的作战方针，并不是很容易就为大家所接受的。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不少干部在被说服以前，不是主张退却，而是要进攻，要继续冒险北上，夺取九江乃至武汉，有些人甚至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右倾路线”、“逃跑主义”。某些地方党组织也反对红军退却，他们生怕红军一撤，让敌人进来打烂了坛坛罐罐。因此，说服干部和说服群众，成了当时十分重要和十分困难的问题。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

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

由江西吉安北上的红军已进至峡江，经毛泽东同志的说服，改变了企图，挥戈东下，渡过了赣江，开始向根据地作战略退却。

这时，敌师 10 万，也兼程尾追而来。敌人是力求早日跟我们决战。

当我军撤至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的时候，已经靠近我们的根据地了。这里山峦重叠、形势险要，阵地条件很好。敌人虽有 10 万，但分兵八路，我取其一，仍可以多胜少，各个击破。当时红军内部还不统一，当地人民对我军还有些疑虑。考虑到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决定把退却终点选定在根据地中部，再次动员大家放弃已有的有利阵地。为了更有把握地打好第一仗，为了不是击退而是歼灭敌人，4 万健儿又大踏步地后退了，红旗直指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这时，敌人已进至吉安和建宁一线，布开了阵势，敌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了吉安东南、广昌、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敌毛炳文、许克祥两师控制了广昌、宁都之间的头破、洛口、东韶一带；敌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敌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其中张辉瓒的十八师和谭道源的五十师是主力。这两支部队都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省主席鲁滌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还担任前线总指挥，督率本师经善和、籐田、谭头、南垅向龙冈推进；谭道源师到达源头、上下潮、树坡一带，便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阵地不再前进了。如果把这两个师消灭，敌人的阵线就会被我突破一个缺口，东西的敌人便会被我分割成远距离的两群，“围剿”就可以基本上被打破。

这时我军已在源头正南之黄陂、小布一带集结完毕。当敌人经过长途跋涉，一再扑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锐气大减的时候，我们早已经过几天的休整，劲头十足，从容不迫地整顿了队伍，以逸待劳，准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誓师大

会场设在小布附近的一个宽阔的河滩上。除了红军主力部队外，还到了不少地方武装、赤卫队和群众。河滩上密密层层，万头攒动，红旗招展，枪矛林立。主席台上一幅横匾写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两边台柱上挂着一副大字对联。右边写的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写的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副对联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大家念了又念。许多同志忙着向大家讲解诱敌深入的道理，复述毛泽东同志讲过的许多风趣的比喻，会场上到处是笑声。

毛泽东同志亲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当前的局势是紧张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制胜。哪些条件呢？毛泽东同志举起左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按下那张开的手指，讲了六个条件，并作了详细的解释。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条，

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作战的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讲完六个条件，他又说，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地后退，敌人已经开始掉进我们的陷阱，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六个条件已经开始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毛泽东同志讲得活泼生动，会场上时而十分寂静，时而腾起一片欢笑之声。他那高朗清晰的声音，像洪亮的钟声，在这面临 10 万大敌的会场上空，威武地震响；他的每一句话，都给大家增加了信心，他的每一个手势，都给大家增加了力量。

最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领导大家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口号声像万丈狂涛，震得山鸣谷应。

誓师以后，大家的战斗信心更足，情绪更高，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命令下来了：向北去打谭道源。队伍半夜出动，但没有走多远就停住了，传来命令：在路两侧山梁、树丛中挖野战工事，进行隐蔽。

这时正是 1930 年的岁末，气候很冷。红军指战员们蹲在潮湿的工事里，加上寒风的侵袭，止不住地发抖。但谁也没有烤火，没有抽烟，只是挤在一堆，眼巴巴地望着北方的大路，盼着敌人出动。从日出等到日落，影子也没见到一个，这时候可真尝到“望眼欲穿”的滋味了。

阵地上议论纷纷。打不上仗真是令人恼火。到了晚上，只好撤回了。

第二天，又从半夜等起。从夜半到拂晓，从拂晓到日中，从日中到夕阳西下，空荡荡的大路上，还是一个鬼影没有，急得战士直跺脚。有的说：“毛总政委的肚量真大呀，他就能忍得住。”急是急，没来还是没来，到了晚上，只好又撤回来。

经过两次大踏步的后退，又经过这两次一无所获的撤回，大家肚子里那股气可真憋够了。晚上，有干部到班里去看战士，说了句“大家好好休息！”好几个人都一齐火辣辣地反问：“还休息得不够？”可是不管你怎么急，领导上就是沉得住气。

当时为什么要一等再等、一撤再撤，那样待重等待呢？毛泽东同志在后来指出过，这是打破“围剿”的第一仗，关系非常之大。他说，“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因此必须慎重初战，“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尽管我已诱敌深入，如果发起进攻的时间地点不当，仍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以后的无数战例，都证明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英明和正确。

从 27 日起，等了两天，谭道源始终躲在工事里不出来，眼看不能利用小布以北的有利地形消灭这股敌人，毛泽东同志便按照他事先亲自踏勘选择的

另一阵地，转移目标，准备消灭张辉瓒师。

好机会果然出现了。

尤冈镇有五六百户人家，镇后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两丈来宽的河，河对岸是一座坡度下大的小山。这是个易守难攻的地形，同时极便于我们隐蔽、集中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的兴国，还有我们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作战时可以迂回敌后。方面军总部便决定在这里布下天罗地网，一方面命令连夜赶修工事，一方面派红十二军一部分会同地方武装，去引诱敌人，只许败，不许胜，牵着张辉瓒的鼻子，把它一步一步引到龙冈来。

果然，张辉瓒上钩了。

龙冈山区沸腾起来。这里的群众早已在地方党指挥下进行了坚壁清野，老弱妇孺已经在山谷中安置好了。满山遍野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和妇女会员，男男女女，高举火把，来来往往，十分忙碌。有的扛着闪亮的梭标、大刀，在四面八方的山顶上、大路边站岗巡逻；有的挥着铁锹洋镐，和红军战士一起挖工事、破坏大路。遍山火光如潮，巡逻的队伍像条条火龙穿行于山林之间，到处是紧张的劳动，到处是歌声和笑声。这时候，谁往尤冈山上一站，谁就会被这雄壮的景象所激动。什么样的敌人，能经得住红军战士和苏区群众这两只铁掌的合击呢？没有，永远也不会有！

张辉瓒终于乖乖地随着红十二军钻了进来。12月29日上午10时，其先头部队103团到了龙冈，后续部队正继续跟进。于是，方面军总部当晚就下令围攻龙冈的敌人，红三军及红十二军正面迎击，总攻击的时间是30日上午10点钟。我们红四军则奔袭上固。

第二天早晨，传来出击的命令。部队像一支支离弦的箭射出山坳，只听见一片飒飒的脚步声，如风穿竹林。红四军向龙冈西北斜插过去，越过红十二军的阵线，切断了敌师部和后备旅的联络，与红三军的阵线联结起来。这样，敌师部和两个旅，便完全陷入我们的重围之中。

下午4点钟左右，总部发出了全面攻击的信号，几百支冲锋号一齐吹动，红色健儿连声呐喊：“冲呀——”简直把整个龙冈镇都震得摇晃起来。敌人见情况不妙，企图向西北突围。号称“铁军师”的张辉瓒师，本来是“围剿”军中最能打的部队，和我军先头部队对峙时，虽然处于不利的地势，仍多次出击，互有伤亡；如果这时候他们拼命固守镇前的山头，我们的攻击就会受到一些阻碍。可是，敌人在一天的战斗中，遇到红军的顽强抗击，锐气已挫，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而此时红军生力军陆续赶到，使得敌人完全处于不利地位。突围不仅未能成功，而且乱了营。红军连续猛冲，敌人很快就被打垮了，到处乱窜。满山满谷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地方赤卫队和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锋，一起搜索敌人。只见旗帜飞扬，红缨如火，刀光闪动，整个龙冈盆地像被红色的大海淹没了。

太阳没下山，战斗就结束了。队伍在各个山头上集合，清查战利品，打扫战场。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押着一群俘虏向龙冈镇集中。四周山林里还不时传出稀疏的枪声，游击队员在继续搜索藏匿的敌

敌人整师被歼灭了，可是师长还没有下落。“跑不了”，战士们在议论着。恰好有两个战士互相打着玩，跑到一片丛林前面。树林忽然飒飒地响起来，战士一想，无风树怎么会动，使厉声喊：“什么人！”“快出来！”只见几个敌人抖抖索索地走出来。战士们继续向树林深处搜索，果然，发现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家伙，上身紧裹着一件士兵的棉衣，下身的黄哗叽裤还没有

来得及换。他自称“书记官”。战士们不晓得书记官有多大，叫俘虏一认，原来就是张辉瓒。他见面目暴露，吓得脸色苍白，四肢哆嗦。由于白军无恶下作，人民恨之入骨，苏区群众坚决要求处决这个罪恶多端的“围剿军前线总指挥”。群众的要求实现了。张辉瓒的那条哗叽裤子，后来还被送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品展览馆里展览。有人在他的裤子旁写了一首打油诗：

龙冈惨败，
东固授首。
人亡裤在，
千古遗臭！

这一仗，敌人的“铁军师”师部和两个旅共 9000 人马，一个不漏，悉数就歼，创造了歼灭战的典型。

龙冈战斗结束，部队情绪更高。大家又热烈地讨论起来。

“怎么样，这一仗打得过瘾吗？”

“这还不过瘾？一口吞下 9000 人，敌人连个报丧的都没有。”

“假如还照过去那样分散打游击，这块硬骨头恐怕未必啃得动！”

“毛总政委指挥打仗就是高明，前些日子，谭道源不出来，就硬是不打：要打，就硬是叫他一个也跑不了，这一着真绝！”

地方群众也认识到诱敌深入的好处了。

“老表，这个打法要得吗？”

“要得要得！早知道一下子能吃掉这么多，让我退得再远点也没意见。”

听到这些议论，大家不由得想起战前毛泽东同志在干部会上讲过的打歼灭战的道理。“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张辉瓒是敌人的大拇指，大拇指一断，那个“围剿”军总司令鲁滌平还能抓得住司令旗？

通过实践，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伟大、英明，信心更大了；连前些天发火的传令班小鬼们，这时也都赶前赶后地打听，什么时候毛总政委再来这么一下子？

上次文家市战斗后，红十二师差不多全背上了步枪，后来打下吉安，又接收了不少新战士，他们扛的都是梭标，到这一仗，才全部背上了钢枪。这次战斗，还缴获了无线电台。从此以后，红军便开始使用无线电通讯了。毛泽东同志说过：“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话一点也不错。看，一仗下来：枪也有了，电台也有了。

清点战利品和俘虏以后，部队根据总部的指示，对俘虏提出了三条路：愿参加红军的参加红军；愿回家的都于遣送；愿意再去当白军的也听各人自便。许多俘虏都自愿参加了红军。愿回家的俘虏，每人部发了三块银元，并开给路条。但是，由于白军侵犯根据地时，烧杀奸淫，无恶下作，群众恨之入骨，见红军这般对待俘虏，一时弄不清楚，很不满意，有的把路条撕了，不让俘虏通过。后来，还是红军派宣传员向群众解释，派战士把俘虏押送出境的。红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宽待俘虏的政策，在白军中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1930 年的最后一天，是在胜利的欢乐中度过的。

突然接到命令：全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去打谭道源。不料谭道源一听说张辉瓒惨败，吓得魂不附体，仓皇从源头、上下潮一带撤走。一部向南北坑，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总部命令红十二军任正面，经南团、林他向东韶攻击前进；三军团任左翼，经头陂向东韶攻击前进；红三军任何翼，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克祥部，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东端，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红四军担任总预备队。

一路上马不停蹄，路旁鼓动棚前的宣传员们高喊口号，口口声声只叫“不要跑了谭道源！”跑了一阵，就听到前线枪声大作，先头部队已经投入战斗了。涉过一道小河，远远看见小山头上站着一群人，为首的一位首长，身躯高大，挺立在峰顶上，一只手指着东韶方向，正在向身旁另一位首长说话。那位首长举着望远镜朝他手指的方向隙望着。啊，那不是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吗，大家看见他们，个个勇气百倍，跑得更快了。

谭道源的队伍碰到红军，一触即溃，慌忙又弃东韶逃跑。可惜，包抄部队没来得及赶到，竟让他们逃脱了，只追汗了半数。这次是谭道源侥幸，如果包抄部队能及时赶到，截断其退路，全歼敌人是满有把握的。

就这样，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应用成功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把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了，另外还吃掉了谭道源的半个师。这个胜利，像一声霹雳，震响天下，富田、东固、头陂各地的敌人，都怕被歼，纷纷溃逃。至此，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便黯然收场了。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这一战，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清楚他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指导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无比威力、作战指挥的无比英明。从此，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红军开始了向运动战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并坚实地迈出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伟大的第一步。

（节录自刘亚楼：《伟大的第一步》，见《星火燎原》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3页。作者当时任红
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 毛委员分腊肉

1931年4月间，我在红八军四师二团当团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动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从吉安到建宁，构成一道800里长的战线，分兵四路，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4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召开了军事会议，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明确地提出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由西向东横扫”的作战方针。4月下旬，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从青塘出发，进军吉安东固，迫敌而居，待机破敌。

红军部队到达东固后，我团奉命在东固以南、罗家墟附近的山上修筑工事。当时，生活极端艰苦，餐餐都是红米饭，没有蔬菜，每连每大都派出一个班，在山上挖小竹笋、摘苦苦菜。一天上午，久雨初晴。我正带领战士们

挖工事，红五军团军团长彭德怀陪毛委员检查工事，来到我团防地。

我从1929年12月投奔红军后，开始在红五军四纵队当机枪大队长，后来彭德怀同志让我当了团长，因此，对彭军团长很熟悉。可毛委员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只见高高的个子，穿一身蓝灰红军服，头戴八角红星帽，腰扎武装带，佩挂着一支短枪。见面后，毛委员拉着我的双手，操着浓重的湖南腔说：“你就是叶长庚？刚才路上彭军团长谈了你的情况。”我一看毛委员那亲切的笑容，顿时消除了拘束心理，说：“毛委员，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这团长当不好。”毛委员真诚他说：“是哟，没文化当团长是有些困难，可现在是战争年代，要等学好文化再来当团长、师长怕不可能。红军干部没有文化的还很多，等条件允许了，是要组织他们学文化哟！”毛委员看看彭军团长，彭军团长连连点头。接着，毛委员、彭军团长又询问了修筑工事的进度，战士们的战斗情绪、生活等情况。彭军团长说：“机枪掩体要隐蔽、加固，单兵射击掩体、交通壕还要加深，仗打起来，就会减少伤亡。”毛委员接着说：“是呵，蒋介石气势汹汹，调集了20万大军，向我们疯狂进攻。东固一仗，是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首仗，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把这一仗打好，来个首战告捷，煞一煞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战士们看见毛委员、彭军团长来检查工事，干得更欢了。毛委员来到一位小战士身边，问：“小同志，要打仗了，你怕不怕呀？”小战士响亮地回答：“不怕！”毛委员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对，蒋介石没啥可怕的，红军英勇作战，一定能把它打垮！”

毛委员、彭军团长检查完我团工事，时间已近中午，彭军团长悄悄对我说：“毛政委（毛泽东同志当时是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昨晚开会到深夜，今天天不亮就检查工事来了，早饭还没吃呢，中午就在你团部吃饭。”我一听可抓了瞎，毛委员白天黑夜操劳，难得在我们团吃餐饭，可拿什么来招待呢？猛然间，我想起20多天前行军路过一个小集镇时，我用我自己的钱买了两斤腊肉，一直舍不得吃，今天不正好给毛委员、彭军团长加个菜？于是，我跟团部丁副官交代了一番。

中午吃饭的时候，毛委员、彭军团长的桌上除了和大家一样的一块豆腐、一个炒笋芽外，另加了一盘红烧腊肉。毛委员、彭军团长看了，脸上立即显出不高兴的样了。毛委员看战士们的桌上，对我说：“叶团长，搞么子特殊哟，快把这盘腊肉分给大家吃。”彭军团长也批评我说：“在你团部吃饭，可没让你搞两样菜，咱红军队伍里，可不兴这一套。”我连忙解释说：“首长难得在团里吃一次饭；这点子腊肉，是我自己掏的腰包。你们来碰上了。既然做了，就吃吧！”毛委员听了，半开玩笑他说：“噢，还是你自个掏的腰包，这么说，你请客罗。”说着，他站起来，端起那盘腊肉，走到战士们的桌前，挨桌分腊肉，边分边说：“你们团长请客，大家分吃腊肉。”顿时，我感到脸上一阵热辣辣的……

时间过去了50多年，如今，每当想起第一次见到毛委员，想起他检查工事、分吃腊肉的情景，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作者叶长庚，原题为《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作者当时任红八军四师二团团长的，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5 横扫千军如卷席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部队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迅速分散在广昌、宁都一带发动群众。仅仅三个月，就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的广大游击区和白区，迅速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地方武装，建立了红色政权。

根据地越来越大了，整个江西南部好像怒放的山茶花，红艳艳的，光彩夺目。这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眼中钉。

不久，敌人方面就出现了向我发动新进攻的征候。毛泽东同志周密地分析了敌人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情况，判断敌人正在准备着一个新的进攻，决定我分散发动群众的上力部队，迅速向苏区集结，以便进行粉碎另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这时，整个中央苏区已划分为十个游击区，并统一组成了五路赤卫大军。为了掩护主力集结，各路赤卫军、县区的独立团、警卫营连等地方武装以及各地的少先队，一齐动员起来，向云集苏区边境的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搞得敌人懵头转向，日夜不安。就在这声势浩大、活跃非常的群众武装的掩护下，我主力部队迅速完成了集结，加紧整顿训练，养精蓄锐，准备痛歼来犯之敌。

果然，蒋介石贼心不死。1931年2月，又纠集了2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人从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建宁，构成弧形阵线，压向苏区。经过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敌人也长了一点见识，不敢长驱直入了。它们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办法，推进到富田、东韶、广昌一线之后，便筑起坚固工事，蹲在“乌龟壳壳”里摇旗呐喊，不敢前进一步，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前去攻坚。

敌人这么一来，一些同志沉不住气了。有的说：“敌人既然修了坚固的工事，就下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吃了大亏还来！”有的说：“要打仗就得勇往直前，干革命就得敢于进攻。有坚就攻坚嘛！怕什么！”但是，毛泽东同志既不为敌人的诡计所迷惑，也拒绝某些同志性急快打的建议，他胸中自有神机妙算。

毛泽东同志的神机妙算是什么呢？他分析敌人全部是蒋介石非嫡系部队，内部不统一，除了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以外，其余都较弱。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害怕红军，而且不习惯山地作战。郭华宗、郝梦麟两师也大体相同。红军则经过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兵强马壮，以逸待劳。面对这样的敌我形势，虽然我们还是要先进行战略退却，然后再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但是退却终点已经不需要像第一次反“围剿”那样选在根据地中部，而是选在根据地前部——泰和县东固一带。当时敌人最右翼是王金钰部，由西向东依次是孙连仲、朱绍良部。蔡廷锴部则驻在兴国。毛泽东同志权衡了全局，决定由西向东打，第一仗先打王金钰，以便一胜而震撼全线，然后从敌人后方联络线上猛力横扫过去。这样，战役结束后，就可以在闽赣边境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为打破下次“围剿”进行准备工作。如果由东向西打，打到赣江东岸，战役结束后会没有发展余地；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会贻误良机。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

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毛泽东同志在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考虑好了全战役计划以后，决定将部队摆在根据地前沿东固一带，占据有利地形，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然后出击。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又持重的部署。当时有些同志还不能马上理解，他们担心“高敌人这样近；会下会走漏消息？”“敌人不出来怎么办？”但是毛泽东同志决心毫不动摇，他判定敌人是一定要继续前进的。如果敌人不出来，我们就要想办法迫使它出来，让它离开工事再打。一定要让敌来就我，而不要我去就敌。他坚信，依靠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依靠红军坚守军事秘密，就可以把敌人变成聋子和瞎子，做到毫不走漏风声。为了伺机破敌、首歼王金钰，打下赢得全局胜利的基础，红军就在这里隐蔽了下来，迫敌而居。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其西北方向之九层岭、观音崖尤为险峻峭拔。越过这儿座高岭向北，就是富田。红军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准备敌人一进来，就在这个山坳里聚而歼之。地方党和群众武装也全部动员起来，严密封锁消息，协助红军盘查行人。不管白天黑夜、阴雨晴晦，每一条路口部有暗哨，每一座山头都有人巡逻，东固山区好像围上了铜墙铁壁，一丝风也不透。部队很好地隐蔽在深谷丛林里，充满着热烈而镇定的情绪，进行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上政治课、军事课、擦枪、练武。那时，练兵主要有两项，一是练瞄准，一是抢山头。在山地作战，抢山头对赢得胜利有很大作用。当前的敌人是北方部队，爬山不快，红军部队练好了这个战术动作，就会更有把握地消灭敌人。所以不管机关、连队，天天都练爬山。每天清早起来，连长、指导员就带着战士朝山头跑去；跑到山顶，才回来吃早饭。

吃苦，对于红军来说，本来是家常便饭，饿了，喝点水，紧一紧裤带，也就挺过去了，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可是，现在看着敌人，却打不上仗，在这山沟沟里，一蹲就是十天二十天，心里真有点火燎火烧的。传令班的那些小鬼们老是在作战参谋身前身后转，缠着他，探问消息；电话铃一响，他们就赶过来，擦擦桌子呀，拾掇文件呀，其实一个个耳朵竖得老高，想听得一点出发打仗的消息。不过，急是急，大家的认识比起第一次反“围剿”来，却是大有提高了。没事时，干部们常到传令班去聊天。

“敌人不出来，你们急不急呀？”

“不急！不急！”小鬼们像被揭着了短处一样，急急忙忙地声辩。

有一个小号兵插嘴说：“谁说不急？我就急了！在这里一住二十天，心电好像没个地方搁得下；再老这么隐蔽着不打，我这号也快吹不响了！”

其他同志听了，急忙反驳说：“毛政委说过，一定要等敌人脱离阵地，从运动中去消灭它，不是去攻坚。第一次反‘围剿’不就是这么打的么？”他们早已把这条取胜的法宝，背得滚瓜烂熟。看来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确实已经深入大家的心坎了，而这正是一切重要东西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这时，忽然接到方面军总司令部的通报：敌蔡廷锴十九路军已经从兴国的龙冈头、江背洞之线向北移动，前哨已到达城冈，威胁着我军的左翼；敌郭华宗师已从水南向南进到上坊、南坪、白富，有进窥东固的模样，直接威胁着我军的右翼，与蔡敌对称，形成精击之势。如果我们继续执行原定作战

方案，攻击富田出动的敌人，就必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间仅仅 50 里的空隙，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有人怀疑这种打法，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容易走漏消息和遭到敌人夹击，说这简直是钻“牛角尖”。毛泽东同志认为，情况并没有起决定性的变化，坚持预定的打法并不是钻“牛角尖”。即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我们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完全可以把消息封锁住；两翼之敌虽然迫近，但他们各怀鬼胎，只图保存实力，不会尽力相助，只要我们隐蔽得好，出战突然、坚决、果敢，是完全可以实现预定方案的。因此，决定原来的打法下变，同时派七师及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枫边、城冈、方太、崇贤一带，阻止敌十九路军前进，又命三十五师一个团在潭头附近箝制白沙、白富方向的敌人。

红军像一只敛威屏息的猛虎，雄踞于东固山区，巍然不动，等待着足以致敌死命的一扑！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决赛，敌人在这场决赛中失败了。红军等了 25 天，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走漏消息，而且达到了迫敌就我的要求，白军忍耐不住，终于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摆布。5 月 13 日，敌人从富田的龟壳里探出了脑袋，分三路向东固前进，送上来挨打；中路是王金任直辖的四十六师，已通过了九层岭，到达著龙坑至万寿宫之线；右路是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到达了山坑、中洞。

一听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全军欢呼，齐声赞扬毛泽东同志真是料敌如神，指挥若定。这时，厉兵秣马前后达四月之久的红军，像离弦的箭，突然以锐不可当之势，钻过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的所谓“牛角尖”，朝脱离巢穴的正面敌人猛扑过去。

我们红四军及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九层岭、观音崖的敌人；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经固陂向富田方向攻击前进；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在大山坳一带，牵制上坊、罗坊、潭头的敌人。

九层岭、观音崖怪石峥嵘，悬崖陡峭，易守难攻。敌人已先我到达，占领了这两座山头。夺取这两个制高点，是解决战斗的关键。于是，军部命令部队乘敌立足未稳，立刻发动强攻。

一阵炮击后，红四军战士们一跃而起，立即开始冲锋。敌人被炮打昏了，没提防红军战士突然冲到他们面前，在这次猛烈突击之下很快垮了下去。我军占领制高点后，好像神兵天降，直朝山下压去。敌人那些北方来的兵，山路跑不快，被红军赶得到处乱窜乱躲，有的和石头一起跌跌滚滚，小树被压倒了，枝头上挂着扯烂的布片，枪支弹药遍地都是，满耳是一片“缴枪！缴枪！”的哭喊声。红军乘胜猛追，直指富田。

三军团也在中洞把敌公秉藩的二十八师打垮，残余敌人向东溃散。当我们四军由九层岭向下俯冲时，远远看见三军团的战士们漫山盖野地追击过来。我们四军也同声呐喊，向下猛压，无数面红旗一齐挥舞，无数支军号一齐吹动。那股声势简直像山洪暴发。这两师敌人撞在一起更加混乱，像被围猎的漳狐鹿兔，互相挤轧践踏，不多会就被全部歼灭。战士们押着成群的俘虏，解往东固集中。

“牛角尖”终究钻通了。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我军又旗开得胜，歼灭了敌人一个整师，敌师长公秉藩本来也俘虏过来了。但他很狡猾，知道红军宽待俘虏，便混在士兵群里，领了三块银元逃跑了。

战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预计发展，我军迅速转入进攻阶段，从富田向东，

奋力横扫。一路经过的市镇，都是敌人的后方补给站，大批弹药、白面、大米，原封不动地堆放在房子里，蒋介石这个运输队长真干得不坏。

第二天，下起雨来，山路泞滑，一不小心就摔交。这时候，又传来郝梦麟师连夜窜回永丰城的消息，大家一听又喜又急，只叫“别再走了郭华宗！”顾不得坡陡路滑，一股劲向前奔，跌倒了，爬起来又跑，个个弄得浑身都是泥。传令班的小鬼们一个个满脸泥水，只露出一对骨碌碌的眼睛。遇到下山路，他们抱着枪，身子一挫，嗤溜一下就滑了下去。后来许多战士也都照他们这样干，行军速度更快了。大家乐得直嚷：“老天给我们加油啦！”

赶了两天到了水南。19日大早，矛头指向白沙。走没多远，就听到南面一片枪声。小鬼们蹦跳着叫道：“有门儿啦，拖住后腿啦！”果然，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赶来说，郭华宗刚想逃跑，已经被我们截住，全军立即投入攻击，师部命令赶快占领大路右侧山岭线。

雨过初晴，太阳照射着湿漉漉的山林，熠熠耀眼，大地显得更加清新可爱。大家脚底像驾了清风，攀缘腾跃，跨峰越壑，霎眼间已经高踞岭头了。朝前面山下大路一望，只见敌军狼狈溃退，人马混杂，一片黄糊糊的人流正满山满谷地向东涌去。

部队迅速在山岭线上展开。这时，正面阻击的我军，正卡在山口上。他们朝敌群中发射了第一发迫击炮弹，一声爆炸好像擂起战鼓，顿时两侧山头红旗高举，军号齐鸣，手榴弹像一阵铁雹，炸得黑烟翻腾。红军战士们排空而下，杀声震天。敌人有的顽抗，有的四处乱窜。红军战士像虎入羊群，左刺右劈，横冲直撞。

这时候，突然一个白军士兵从岩石后面钻出来，慢腾腾地走过来，把枪往地上一掷，笑嘻嘻他说：“喏，缴枪了！”说着，拿出杆烟袋，挖了一斗烟，向站在石头上的指挥员们手上递，大家被他这一下搞愣了，你者我，我看你，谁也不接。他见没有人接，便擦着了火柴，嗤啦嗤啦地自己抽起来，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好像这里不是枪炮轰鸣、刀光剑影的战场。他好像来到熟朋友面前，又好像做完了一件事回到了家里。

一个传令兵去问他：“你缴枪这么爽快呀，不怕红军？”

“怕什么！”他慢吞吞他说道：“我本来是张辉瓒十八师的兵，去年腊月底在龙冈被你们俘虏过。我筋没有少一根，皮没有少一寸，你们还给了三块银元让我回家。谁知道半路上又被四十三师抓来啦。一打仗，我就四处瞅机会，想点子往这边跑。”

原来他是第一次反“围剿”放回的俘虏。记得战前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条件时，曾特别提了一条：经过第一次反“围剿”，苏区军民有了胜利的经验，敌人也有了失败的经验。看到眼前这一事实，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大家不禁相视大笑。

这时，枪声逐渐稀疏，战斗已经结束，战士们正在满山满谷搜索俘虏，赤卫队员们忙着打扫战场，转运伤员，处理敌人的尸体。这一仗真是打得干脆、痛快，敌人一个师就这样报销了。我们还缴到了两门山炮。各处来的赤卫队、少先队，还有躲在山里的老大娘，纷纷跑来看炮，到处笑声飞扬。

打了富田和白沙两仗，全局胜负已分。但我军毫未停顿，紧接着又在中村消灭了高树勋二十六师的一个旅，剩下的敌人已经变成惊弓之鸟，全线后撤了！孙连仲残部23日退出东韶，向宜黄逃跑；朱绍良部三个师经广昌向南丰逃走；毛炳文、许克祥和胡祖玉等师也在后撤。

我军马不停蹄，日夜向东急进。战士们十分疲劳，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扑通跌在路旁，还在打呼噜。伙夫挑着担子只能撵部队，没有空隙停下来做饭，眼看着一路上敌人后方补给线给我们“补给”的大批大米、白面和付食品，却顾不上吃。还好，地方党动员群众做好饭摆在大路旁，战士们半睡半醒地边走边吃。遍地枪支弹药和军用器材，也只好留给游击队去打扫清理。接近目的地，一听说敌人又跑了，战士们抖擞精神，撒开两腿又向前赶。公路上尽是稀烂的黄泥，大家顾不得摔交，争先恐后，不太宽阔的公路上，排成十几路队伍向前直涌。

5月27日，大军直逼广昌城下。敌人凭着城外山头坚固的工事，企图堵住红军，掩护主力撤退。这时，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我军毫不迟延，立即冒雨向这些山头发起攻击，敌人阻击的火力也很猛烈，每一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因此打了整整一天，才把城外的敌人驱逐干净，而我们也伤亡了不少同志。

当晚，我们乘胜攻克了广昌城，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在这里又缴获了不少弹药物资，衣服、罐头、纸烟样样俱全。这一仗，只消灭了胡祖玉师一个团，我军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比起前三仗来，便宜不大。

以后红军就分兵两路：红四军北上南丰，追击许克祥、毛炳文；总部率领三军团继续向东，打福建的建宁。

红军到达建宁附近，便从城背后发起攻击，下午3点钟，又以一个师从建宁河下游渡河，迂回到建宁城前面，进行包抄。战斗到下午6时左右，胜利结束，全歼守敌刘和鼎师。这一仗敌我比例是：敌人7000，红军1万。可见毛泽东同志对于集中兵力的原则，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他后来指出：“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那时敌人处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红军则锋不可犯，锐不可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军挟破竹之势，以1万乘胜之师，对7000惶骇之众，也就成了完全的优势了。

我军从敌人后方补给线上，横扫700里，15天打了5仗，消灭敌人3万多，缴枪2万多支，敌人全线崩溃。蒋介石经营数月的第二次“围剿”，就这样被红军痛快淋漓地、彻底地粉碎了。

第二次反“围剿”中迫敌就我、向东横扫的方针之完全成功，使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更进一步地对毛泽东同志这种高瞻远瞩、通观全局的深远眼光和战略思想，大胆持重、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敬佩万分，深深为我们能有这样伟大的天才统帅感到自豪和幸福！

（摘自刘亚楼：《横扫七百里》，见《星火燎原》（二）.第21—33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等职。）

6 巧使敌人就范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遭失败后，仍下死心，再次纠集重兵，进行第三次“围剿”。

但是，红军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和“磨盘战术”，大胆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一周之内，连续三战，三战皆捷。敌军却始终扑朔迷离，不知我军主力所在。起初，我军巧妙地穿

过敌军空隙，大踏步东进以后，敌人依然驱兵向西、向南急进，日夜辗转于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直到我军在莲塘、良村、黄陂给了他们一连串沉重打击之后，才恍然大悟，连忙转旗向东，向着我军主力合击过来。

敌军采取大包围态势奔向黄陂地区。其部署是：陈（诚）罗（卓英）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北长驱疾进；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挺进纵队4万余人，由西南方向逼近；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三师跟踪而进；孙连仲军2万余人由东南，朱绍良的左路军由正北和东北方向猛力进迫。

蒋介石满以为使用如此优势大军，分进合击，抓住红军决战，一举消灭之，是毫无问题了！

这样想有他的道理。当时，我军兵力不过3万余人，而且刚刚经过二次反“围剿”的大战和莲塘、良村等连续战斗之后，军力尚未得到休整。而敌人的兵力超过红军六七倍，且又经过严密部署，从四面八方包围奔杀过来，因而气势十分嚣张。

大敌当前，怎样才能挫败敌人的狂妄企图、达到歼敌的目的呢？多谋善断的毛总政委，沉着地命令部队在大山里休息，他和战友们一起研讨情况，制订胜利的决策。

部队一休息就是三天，这三天真是不简单啊！了解敌情的同志个个心绪忐忑不安，注视着侦察人员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毛总政委在这里，一定有办法制服敌人。毛总政委有时也到外边来散步，大家看到他脸上还是那么笑容可掬，举止十分安详，于是，也就和以往每次面临危急情况一样，把信任寄托在伟大、英明的毛总政委身上了。

红军总部住在杨寨村。连日来，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在总部办公室地图旁研讨军情，时而听取侦察员汇报敌情，谋划着打败白匪“围剿”的通盘大计。

不平凡的三千即将过去，然而情况愈来愈严重。在总部的军用地图上，蓝色箭头形成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情况正飞速的恶化着！……

第二天下午，林彪、黄公略、罗炳辉军长及三军团首长，都齐集总部开会。直开到天将黑时，毛总政委站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随即宣布：“会议暂时停开。各单位按照总部通知的路线，立刻出发。”

部队出发了。总部同时也离开杨寨村，向南翻过凡座山。途中，管理科长问我：“向南突围吗？”我说：“听政委说是向西。”他一听，惊奇地叫了起来：“向西？西边是敌人最强的嫡系部队，加上蒋、蔡、韩纵队，有十几万人马，那不是……”我正要开口向他解释，他又若有所思他说：“毛政委历来料敌如神，多谋善断，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部队走了约20多里路，来到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地方，毛总政委命令部队停下来。这里是一个峡谷的谷底，两旁高山耸立，一道溪流流经我们脚旁，发出淙淙的响声。毛总政委叫传令兵把地图铺在沙滩上，点亮马灯，压着地图纸角，首长们再次围着地图坐下，继续开出发前暂时停开的会议。

峡谷深潜寂静，四周山影狰狞，夜风掠过山上的森林，发出萧萧的音响，更增加了沉重、紧张的气氛。这时候，只有沙滩上那盏马灯，好像明亮的北极星，在黯黑如墨的深夜里，发出耀眼的光辉。伟大的胜利的舵手毛总政委，正坐在灯旁，手指地图，用平稳、清朗的声音向参加会议的指挥员说：“最后得到的情报是这样：这边和那边的敌人，离此地都只有15里地，只有兴国

方向有个 20 里路的缺口，还没有合拢。”讲完这一段话之后，又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讨论。毛总政委最后决定：十二军向东北方向佯动，吸引敌人的注意，诱惑和调动敌人，将敌人牵走；我军主力通过兴国那个缺口，跳出合围圈子，进到泰和附近，隐蔽休整，以便以逸待劳，歼灭敌人，粉碎“围剿”。

叶总参谋长按照毛总政委宣布的上述决定，当即在膝头上草写命令，规定部队行军次序和注意事项。最后，毛总政委又亲自向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同志仔细地交代了任务。要十二军一路上扬旗鸣号、大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由此突围，吸引敌人出击，以调动和分散敌人。

安排完毕，时已半夜。总部立即出发，各部队依照命令规定行动。

我当时被派随十二军行动，负责与总部的通信联络工作。

十二军在罗炳辉军长和谭震林政委的率领下，穿过敌人的空隙之后，一路浩浩荡荡，向北直插。果然，蠢猪似的敌人跟着来了。我们又怕把敌人甩得大远，乃采取走走停停，保持不即不离状态，紧紧地牵住了敌人的鼻子。

行军逾夜，天色大明。敌人的飞机跟上来了，在十二军行军纵队上空嗡嗡乱转，左歪右斜地向下侦察。它这一来，不是给部队增加威胁，而是带来了喜悦！战士们不住的喊：“好啊！我们正愁蒋介石这个蠢猪不知道呢，他倒派来一个义务情报员！”

为了更有效地诱惑、麻痹敌人，上级传来了命令：“拉开距离，旗子打开！”于是，部队的距离更拉长了，一个连拉开成一个营的架子；有红旗的展开红旗，无旗的拿出了各种花色包袱皮，高高的摇晃着。走到尘土多的地方，战士们故意像孩子们那样跳跃前进，荡起浓厚的尘土，漫天飞扬。从空中和远处一看，嘿！红旗招展，烟尘滚滚，人喊马嘶，气魄浩大，简直不是一支不足万人的队伍，而是一支几万人的大军哪！飞机乱转了一阵之后，得意地回去了。战士们向着敌机飞走的方向唾了一口，讥讽他说：“还美哩！送假情报去吧！”

贯彻毛总政委的指示，使敌人再犯一次更大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红十二军的任务。因此，全军上下都一致行动起来，为敌人设下更多的“圈套”：在我军行经的道路上，每逢岔路口，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三军团由此前进”，“四军由此向北”，“……”；一到宿营地，更是忙个不停，只要会写字的，就都拿起粉笔号房子，见门就写：“某团某连住此”。在显眼的地方，还有这样的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有要事！”落款是：“某师某某”，名字是随手编的，番号呢？只要红军有的，随意写就是。

一天，后卫部队送来情报：“白军已经黄压压地跟上来了。”总部也来了指示，说：尾追我主力的敌军已全部被十二军牵着鼻子拖了出来，主力已安全到达预定地区开始整训。看来，蒋介石已经认定：红军主力“北窜”了，正拼命地向我十二军追赶过来。我把这些情况报告罗军长、谭政委，他们笑笑说：“好啊！蒋介石上钩了，那就牵着他的鼻子乡逛几圈吧！”

十二军拖着敌人经白沙、藤田转到乐安的大、小金竹，离东韶十多里路时，发现敌人后续部队已到东韶，我军乃不进东韶，而在东韶以北 10 里的森林地区埋伏起来：黑夜派出一部兵力奔袭东韶，佯攻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到达，怕被我消灭，就在当夜仓皇溃逃。我军当即尾追截击敌人，歼灭敌人后尾梯队一部，从容地收复了黄陂、小布苏区。

十二军收复黄陂不久，就收到总部来电说：我军主力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敌人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蒋介石已下决心

撤退了！

我们多谋善断的毛总政委，巧使敌人就范了，蒋介石又输了！

毛总政委抓住了这个有利战机，向全军发出命令：“全线出击！”英勇善战的红军，在毛总政委的英明指挥下，抓住了企图撤退的蒋、蔡、韩纵队，给了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曾几何时，敌军还耀武扬威、气势逼人，而今在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巧妙地拖、打之下，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被我军歼灭；蒋、蔡等部队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幸免打击的队伍也被拖得气息奄奄，饥疲沮丧。敌军高级将领，饱尝了毛总政委神妙莫测的打击以后，无不懊恼至甚，悲叹无已！这个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那个说：“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这就是蒋家匪帮的高级将领们从失败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了。英勇的工农红军，由于有了党和毛泽来同志的英明领导与正确的指挥，终于在少于敌人7倍兵力的劣势情况下，取得了歼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苏区、壮大了红军的全面胜利。十二军在执行毛泽东同志亲手所制订的作战计划中，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

（作者杨至成，选自《星火燎原》（二），第54—59页。作者当时任红四军十二师教导大队政委、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于上将军衔。）

四、博大开阔的胸襟

1 胜败见英雄

1932年1月，我被任命为中央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我到总政不久，即受领任务，参加2月初打赣州，到前线帮助部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1月9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

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是赣南经济政治军事中心，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敌人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座城市的。而且赣州三面环水，地形对敌人防守有利。但是我们打得很英勇，边打边挖坑道。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所离火线很近。我一直跟着三军团司令部行动。当时，我看了看赣州地形，四面都比较开阔，水陆交通比较方便，而我们则屯兵于坚城之下，为兵家所忌。我军利用坑道用黑色炸药炸城，虽然两次爆炸都炸塌了一段城墙，特别是第二次在东门炸开了一个20余丈的缺口，但因为敌人已有准备，把缺口用人力封死，我军仍未能攻入城内。敌人罗卓英带了3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两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敌人大部队一出击，我红一师大部分插

到西门河川与城墙之间挖坑道的部队被敌人截断了，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幸亏五军团十五军手持大刀及时冲上前去打退了敌人，三军团在南门与东门的攻城部队才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从2月4日开始围城到3月7日被迫撤围，共打了一个月零三天，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了我们一次很大的教训。

1932年3月12日，赣州战役刚结束，中央决定调我到一军团工作。从此以后，我就一直以一军团为家，在一军团任政治委员7年之久，开始了我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

为了确定新任务，中央局内部发生了激烈地意见分歧。3月中旬，中央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开会，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攻打赣州的错误，极力主张红军的主力应向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苏南、皖南等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空虚的地区发展。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同志则仍坚持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方针。据此，军委18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城市。一军团和五军团受领了中路的任务。走到半路，毛泽东同志向我和林彪阐明了他的主张，我们觉得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正确，建议中央军委将我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3月17、18两天中央局开会，批准一、五军团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向一军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意是：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他指出：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同时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气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决定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由他亲自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福建，我们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张贞的四十九师，其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东征动员以后，毛泽东同志一面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一面电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局书记），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开展局面。若单纯在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面的文章很不好做。同时漳州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顾虑的是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所以希望在赣南信丰的五军团尽快东调龙岩，否则一军团兵力单薄，后方空虚。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们一军团从新桥、馆前一线掉头往南，急向白砂、龙岩一线开进。毛泽东同志则到上杭、旧县，向谭震林、张鼎丞等同志布置配合东征龙岩、漳州的任務。4月8日一军团全部（含军团部、四军、十五军）到达龙岩西部约50里地的大池圩，4月9日，部队一面在大他圩休息，一面侦察敌情地形，得知守龙岩的是张贞四十九师的两个团和少量地方民团，战斗力并不强。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军团几个领导人研究后决定，直接向龙岩攻击前进。4月10日拂晓，十五军为先头，四军跟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随即于当天占领龙岩。龙岩之战，歼灭张贞一个多团，给了张贞以迎头痛击。龙岩一仗，为漳州战役的胜利打下了第一炮。

4月11日，在龙岩由毛泽东同志主持，一军团召开了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总结龙岩战斗的经验和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后得知张贞的部队全部退守漳州。我军即由龙岩出发，经和溪、龙山一线，于15日即赶到漳州西北约20多公里的马山。16日我东路军总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马山组织了敌情地形侦察，确定了我军进攻部署。当时张贞防守漳州的兵力力四十九师一四五、一四六两个旅加上地方靖卫团、保安队等共八九千人。两个旅的主力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敌人控制在漳州市内，其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进攻漳州，必先突破这一线阵地。据此，我军确定以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以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人，以三军为预备队。整个战斗几乎都是按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实现的。我们与在城郊大尖山到天宝一线踞险顽抗的敌人一个旅，展开了激烈地战斗。天宝阵地被我攻占后，敌人的防线即全面崩溃，这个旅大部分当了俘虏，被我们消灭得干干净净。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增援，在天宝东南遭我军迎头痛击，又被打回了去。十五军在助攻方向的进展也很顺利。他们在南靖至宝林一线，由左权同志率领四十四师（师长王洪章、政委刘英）打前锋，佯攻宝林桥，强渡芄水，配合主攻部队把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了。张贞吓得赶紧将城中弹药库焚毁，率残部弃城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方向逃窜。4月20日我军遂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我军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1600多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其残部大部分逃到了闽粤交界的海滨城市诏安，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漳州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胜利，首先是我军行动神速，大部队在丘陵地运动，两天赶路150多里，使敌人来不及组织充分的防御；其次是战役决心正确，部署周密。尤其是选择了恰当的主攻方向；第三是我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在龙岩战斗胜利的鼓舞下，士气更加高昂。漳州战役我军也有弱点，以一万五六千人对敌八九千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兵力不够分配，所以只能在漳州西北一线正面进攻，没有能派出一支部队迂回漳州以南，断敌退路，致使残敌4000多人（大多数是靖卫团）得以漏网。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厢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

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他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7—152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迷茫中的关怀和指引

1934 年 4 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与此同时，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面对强大敌人进攻的形势，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不仅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拼命加以反对，荒谬地提出什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六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口号，希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两次建议，留少量红军在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敌后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都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绝。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4 月 21 日，终因敌众我寡，阵地被敌人突破了，高级指挥部才允许部队撤出战斗。我带着一个营留作殿后，掩护全师转移后撤。

当时，毛主席来到了中央苏区南线的赣南会昌县。当时许多人不知道，我们前线的部队更不知道。

那时候，一支新成立不久的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师驻在会昌县的站塘。一大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

在那个时期里，天气沉闷，低空密布着乌云，从东北方向吹来的一股寒风，掠过大地，袭击着人们。这正是红军处境的象征：国民党调动了百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五次“围剿”，并以 50 万大军紧压着中央苏区，在北线，红军主力正在和广昌南下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在南线，红军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的两广军队的进攻，掩护着红军的后方。而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错误路线，却又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把革命引导到十分不利的境地。

在反五次“围剿”以前，我们这支新组成的部队，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运用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曾前后转战于闽西的连城、武平、

永定；赣南的寻鄱、安远、重石、筠门岭、会昌等地。

我们虽然是一支新部队，但是在三、四次反“围剿”中，配合主力部队并在游击队、民兵的结合下，打了许多胜仗。可是到五次反“围剿”时，王明错误路线用教条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来指导革命战争。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用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的口号下，主张打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实行单纯防御。这样，我们就不得被堡垒拴住了腿，以碉堡对碉堡，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防御，短促突击”。不得不在人数多、武器好的敌人面前，十分痛心地消耗着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还是不得不随着这些碉堡的被轰毁，而节节退守。

我们的作战总结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召开的。

会场是在一一祠堂内。那时没有师长，前任师长程子华同志调高了，后任师长周子昆同志尚未到职，我在师里做政治工作，正和一块工作的同志以沉重的心情，检讨着筠门岭战斗的失利。

会议正在进行中，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参谋忽然跑来，打断了我的总结发言，悄悄说：“会昌来了电话，总政治委员——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我猛一听，吃了一惊，心想：“毛主席不是在汀州医院治病吗？（我在福建上杭安乡作战负重伤后，住汀州医院时知道的。）为什么没有去北方战线指挥主力作战？而忽然到南线来了呢？！”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已被当时王明的错误路线调离了红军。

但我又立即兴奋地想到：毛主席来到了！我们一定又要打胜仗了，一定要胜利了！……

在从会场到作战科的途中，我的心情又紧张又兴奋。我走得很快，来到电话机跟前时，我的手臂忽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动了。我拿起听筒来，谨慎地呼叫总政治委员，听筒里传来了安详而亲切的声

“你是谁呀！”毛主席问。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了自己的名字，深怕毛主席听不清楚。

“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什么动向？”毛主席紧接着问。

毛主席的声音，是那样从容、亲切，使我感到一阵温暖，心中的紧张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地把敌情作了报告。

“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部队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毛主席接着又问。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的经过，以及退守后新的防御部署情况，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报告。

毛主席听了，首先鼓励我们。他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一点，这就是胜利！”

听了这话，我感到意外，心里好像忽然照进了阳光，沉闷逐渐消失，代之以兴奋和感动，毛主席很了解前线作战情况，也很了解我们。“毛主席是多么注意研究敌我的情况啊！”我这样想。

接着，我就在电话上请示，毛主席立刻明确、具体地对我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对这个指示，我在当时还没有觉悟到

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后才觉醒：毛主席是在启发一个共产党员，要他认识错误路线是失败的基本原因。

紧接着，毛主席在作战思想上指示我们：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然要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与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订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毛主席每说一句话，我都在内心里喊道：“对呵！这不正是我们前几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打法吗！”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像火花一样，照亮了我的心，使我从当前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关键。

对“反水”群众，毛主席指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教育群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指示已体现了毛主席很早提出的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建军思想。

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呆呆地立在电话机跟前，耳中似乎还响着那安详而亲切有力的声音，从这声音里，我得到无比的振奋和鼓舞。我反复地回想着毛主席的指示，渐渐地，毛主席那高大的身影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一连串的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在1930年。红军从湖南向江西转移。我在安源一个军民万众的大会上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用他那简洁纯朴、生动有力的群众语言，向安源工人和红军战士们讲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讲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政策，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农民结成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力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斗争。毛主席把真理的声音，投到渴求解放的工人、战士们的心坎里。讲话完后，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近郊农民报名参加红军。当时，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由红军调到安源工人纠察队做党代表工作。几天后，我们这个纠察队就跟着毛主席，跟着红军，踏上了战斗的途程。

以后，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行军中、在江西小布的誓师大会上和在福建建宁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又看到了毛主席……

这样，一个印象接着…十印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沉浸在这些难忘的回忆中，觉得眼前分外明亮了，身上充满着对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我的胜利信心大大增强了。

忽然，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对！我应该赶快把毛主席到南线的消息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向大家传达，让大家分享这份最大的愉快。我跑步回到会场。我的喜悦的脸色，立刻扫清了屋子里沉闷的气氛。干部们立刻肃静下来，等着听我宣布好消息。我压抑着激烈地心跳；轻声地说：“毛主席到南线来了！……”

好像初晴的阳光，突然推开了云雾，照射到屋里来了，大家都觉得眼前似乎突然明亮了。我把毛主席的指示，详细的作了传达。这时候，我发觉许多干部兴奋得站起身来，大家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一个个眼睛发亮。全师有名的六十五团善于夜战的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纱布包扎着的伤口的肿痛，激动地举起双手，猛烈鼓掌。于是，一阵雷动的掌声，口号声

响彻了会场。

我们根据自己过去的切身体会，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那艰苦的战斗年代里，毛主席是我们心里的一盏明灯。我们都知道，无论情况多复杂、环境多艰苦，只要有毛主席，只要传来毛主席的指示，就有胜利的把握。

毛主席来了，我明显地觉察到，每个干部的心都踏实了，有了胜利的信念。

干部们带着一脑袋烦恼而来，现在却换了一脸愉快的笑容回去。

会后，我们就召开了师党委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具体布置：前方只放两个营，顶住敌人；其他的部队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部队抽出于部和战士帮助地方苏维埃政府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天，我们带领干部，再一次侦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部队里也进行了动员，打草鞋、擦拭武器，准备打仗，红军战士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了，全体指战员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为了保卫毛主席在会昌的安全，我们带着部队有计划地、更坚决地打击敌人。四五天之中，我们打了五六次小仗，消灭了敌人的一支企图前伸的小部队。敌人在我们不断的打击下，都龟缩在筠门岭，不敢出动了。

同时，在地方上，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农村阶级政策，以贫雇农为骨干，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改变了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因而中农情绪稳定了，和我们靠拢了，基本群众不孤立了。我们抓到边沿地区的“反水”群众，一律放回去，并且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明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利用了。这一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反水”群众逐渐涣散了，看到我们部队出动，也不再嚷叫和通知敌人了。

这是一个多么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呀！毛主席到南线来，才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基本变化，军民的情绪转变了，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大大增强了，农村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变化，这儿几乎丧失的地区得到了挽救。

然而，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5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的魏协安同志和坚守筠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你见到毛委员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一到站塘的当晚，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

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委员，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回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

在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有一天晚上，被关在一起的江西省委李绍久同志悄悄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听他这么说感到吃惊，更加焦虑和疑问：为什么我们党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老弟，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最能团结人，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会认清真理的，历史将会证明真理属于哪一方。”我聚精会神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开始知道党内存在着重大的是非问题，我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1935年1月到达了遵义。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被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我捧着这份珍贵的文献，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东方已经真的破晓了。

遵义会议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红军，也解放了我们许多同志。就在第二天，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都被放出来了，并先后分配了工作，我也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决议文献珍重地装进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

（摘自方强：《毛主席到哺线的一件史实》、《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分别见《红旗飘飘》第14集第77—83页，《难忘的回忆》。作者当时任红二十二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3 逆境中斗争不懈

我自从来粤赣工作之后，就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了，处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不免有思念之情。

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便，我和他住在一起，生活予以关照，工作上多方支持。当时他身体不好，又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特别是蒙受王明路线的迫害和打击。尽管如此，但从他的言谈和行动中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愁闷和不快，他总是那样情绪饱满，豪爽乐观，不计个人恩怨，从全党全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光明磊落，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出路着想。白天，他不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就是到粤赣省委了解情况，或者深入部队做调查研究。筠门岭战斗后，毛主席亲自给在站扩总结工作的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打电话，询问筠门岭战斗的情况。后来，大约是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又亲临站在前线接见厂部队的领导干部。他身着和战士一样的灰色的红军服

装，脚穿一双粗布鞋，和蔼又亲切地同大家促膝交谈，询问敌情、作战经过，询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询问群众情况和地方工作。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找边沿区一些区干部谈话，了解党、政、军的情况。晚上不是找人谈话，就是看书或是伏案写作，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知他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在这当中，我作为军区司令兼政委又是粤赣省委常委和宣传部氏来说，理应向他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及我的看法。我说，领导上不从实际出发，在我调来粤赣军区之前，命令部队在筠门岭一带修了些堡垒，但都是土造，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战斗，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因此，我来这里之后就没大修筑这玩艺。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很感兴趣地问道：

“为什么？”

我说，根据现在的敌我形势，在敌强我弱下，我们仍要搞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必要修人力的碉堡，在乌龟壳里怎么能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制定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又说，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这叫以卵击石。为保存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我们，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还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并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同时还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派小分队化装到敌占区去作宣传，也取得了统战的良好效果。由于“左”的政策，又加上敌人利用当地“铲共团”，欺骗群众，挑拨群众与我们的关系，特别是站扩、罗田那个地方的群众工作比较复杂，因而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不大好，甚至有些对立。一次二十二师在罗田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了。当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特别强调了军民关系，他说，我们所说的游击战，就是农民群众的战争。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做好群众工作，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毛泽东同志的话音没落，我立即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32年，毛泽东同志在住老古井医院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尔后用壁报的形式张贴出来，公诸于群众，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阅读提意见。每天晚上，房子里灯光闪闪，济济一堂，笑声琅琅，边读、边议、边修改。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在兴国和才溪乡、长冈乡的调查，又作了补充修改，这就是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的一个部分，给我们提出了“组织战争，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话如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粤赣省党政军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从部队到群众，从对敌斗争到根据地建设，在毛

泽东同志指示后的短短的时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到敌后去打游击。如在寻乌境内就打了几个小胜仗。消灭、抓获了许多敌人，获得不少战利品。使部队生活稍有改善，还第一次吃到牛奶罐头呢。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前夕，于7月中旬在一个碧空如洗，清风拂面的早晨，他和粤赣省的一些负责同志，从文武坝出发，渡绵江，过五里排和黄坊，健步登上会昌城外高峰——岚山岭。毛泽东同志站在高山之巅，纵览郁郁葱葱、山地起伏的粤赣锦绣河山。他回到文武坝之后，急忙欣然命笔，写下了题为《清平乐·会昌》的激昂诗篇：

东方欲晓， 会昌城外高峰，
莫道君行早， 颠连直接东溟，
踏遍青山人未老， 战士指看南粤，
风景这边独好。 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当时在省委常委中进行传阅、讨论，他以“风景这边独好”的形势教育我们，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斗志来激励我们。

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因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从大局出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身分，时刻关心着战局。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紧张之际，他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曾对当时的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我作过指示。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的内部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说，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为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消除赤白对立，促进陈济棠和我们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昌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就在毛泽东同志从会昌回瑞金后不久，他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就实现了。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5—319、323—324 页。作者当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4 做革命的骏马

1934年春，红校第五期开学了。由于学校人数增多，我们特科连扩大成为特科团，下设电话、炮兵、工兵三个连队。我在工兵连二排当排长。

这一期学员大都是来自部队的连排干部和优秀战士，他们年纪轻，热情

高，干劲大，但对学工兵，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有的学员甚至提出了转学其他专业的要求。就在这时，我们接受了给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修防空洞的任务。

我带领全排学员来到了瑞金城外的沙洲坝。

毛主席的秘书领着我看了四周的地形，在后门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樟树旁边，选定了防空洞的位置。按照韦国清连长再三叮嘱的，既要保守秘密，又要修建得坚固，经得起敌机轰炸的要求，我和同志们商量后，确定以最快的速度修一个掘开式防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破土动工。

太阳刚爬上庄东的屋脊，就有不少人陆陆续续走进了一个临时搭起的棚子。他们穿着各式衣服，看上去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我趁挑土的机会，经过那棚子，朝里面看了一眼，只见毛主席站在桌边，边讲边比画着。喔，毛主席正在给大家上课哩。

太阳正午时，听课的人散了，毛主席发现我们在挖防空洞，便点燃一支香烟，朝我们这边走来。

“小同志，你们好啊！”毛主席边走边向我们招呼。

大家被这亲切的声音吸引住了，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虽然在当时，大家还不知道那就是毛主席，但看得出他是个首长。毛主席走到我们中间，招呼大家歇会儿，同志们立即放倒了工具，喜孜孜地围着毛主席，一起在大樟树下坐下了。

毛主席指着几位小战士问了姓名、年龄和家庭情况。又问大家打仗怕不怕。一说到打仗，大家的话就多了。你一句、他一句，争着把印象最深的战斗说出来，还坦率地相互介绍着，谁在某次战斗中立了功，谁被评为“战斗模范”。毛主席满有兴味地听着，连声称赞说：“好啊！好啊！”

只有坐在毛主席身边的小朱不大讲话，主席拉起小朱的手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朱有根。”

“家在哪里？”

“在赣东北苏区。”

“阿爸和阿妈都好吧？”

“他们都好，还有弟弟和妹妹也都好。”

“你想不想家啊，他们给你来信了吗？”

“来了，不久前还来了一封。”小朱脸上露出了笑容，“苏维埃政府对红军家属照顾得真好，阿爸、阿妈都叫我在学校里努力学习，不要想家。”

“这样好嘛。不过，刚才你好像有点不高兴，是吗？”

“不！”小朱连忙分辩起来，“哪能不高兴呢？刚才谈起了打仗，我浑身上下都舒服，只是想到现在当了工兵，将来打仗的机会少了，心里有点那个——”

小朱的话捅到了不少人的心病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可不是吗，当了工兵，成天同石头疙瘩黄泥块子打交道，真没劲。”

“还是学军事好，毕业后又可以真刀实枪地跟敌人干。”

“唉，将来‘战斗模范，跟咱们是没缘份了。”

主席又点燃一支香烟，等大伙说完了，笑眯眯地问：

“你们知道不知道西游记里有匹小白马？”

战士们有的说听老人说过，有的说不知道。

主席又说：“小白马就是天上的小白龙，虽然本领不小，却心甘情愿变成白马，驮着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回了真经，使唐僧师徒立地成佛。遗憾的是，后来的人却很少想到它。”

我们都在细细品味着这个故事的含意。

“白龙马的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依我看你们工兵也应该做红军的一匹骏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接着，主席又给我们谈起了工兵在战斗中的重要作用，工兵将来的发展，工兵建设的方向。……

主席生动的譬喻和深切的话语，句句落在我们的心坎里。原先不安心学习工兵的那些同志脸红了，露出了羞愧的笑容。一阵阵内疚也涌上了我的心头。当初，我对学工兵不也有过错误的想法吗？

我从内心里感谢毛主席的教导。

当同志们后来知道讲故事的首长是毛主席时，学习和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提前修建成防空洞后，大家又以出色的成绩完成了学习任务，愉快地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选编自黄朝天：《党啊，我的母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6页。作者时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特科团工兵连二排排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5 亲切的教诲

在瑞金参加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期间，我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并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和他在大会闭幕时候作的总结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是他的总结报告中的…个部分。

会议结束以后，我拿着任弼时写的信到中央组织局找李维汉。因李维汉不在，负责马克思主义大学新生入学登记的毛泽覃同志接待了我。

毛泽覃看完任弼时写的信，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刘俊秀同志，李局长不在，这封信我一定转交给他。来，请你先在这上面登记。”他说着，将一本新生登记册递给我。

毛泽覃接过我递还的登记册，看了看，说：“啊——你是永新北乡人。我在永新南乡和县城呆了一段时间。可以说我们是老乡呢。对吗？从弼时同志信中介绍的情况看，你是一个肯学习的同志，就在高级班学习吧。”

我问：“什么时候到学校去？”

“今天下午到这里来集中，我们会派人把你们送到学校。对了，你们学校设在沙洲坝，我哥哥和嫂子也住在那里，有机会你可以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知道毛泽东同志的爱人贺子珍是永新人，所以欣然答道：“好，都是老乡嘛，我一定去。”

我们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二期高级班的学员，有的是湘鄂赣、湘鄂西、赣东北、湘赣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工作干部；还有的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中、小学文化水平。像我这个只读了45天冬塾的大老粗，在高级班中还找不出第二个来。

我在马克思主义大学期间，学习了“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游击战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

课程。聆听子毛泽东同志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根据地经济建设”，朱德同志的“游击战争”，周恩来同志的“国际国内形势”，张闻天同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董必武同志的“西洋革命史”，以及李维汉同志的“党的建设”等讲课。

通过这次学习，我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初步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人生观；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由此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高度的信仰。

一个星期大的上午，我去到毛主席的住地。贺子珍从屋里走出来，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啊，原来是你呀。你是什么时候到沙洲坝的呀？”

我说：“我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早就想来看看你和毛主席，可又怕妨碍你们工作，毛主席在家吗？”

“正在家。你还没有见过他吧？”

我回答：“听了他在‘二苏大’的报告，还听了他的一堂讲课。没有单独见过他。”

贺子珍热情地说：“走，我带你去见他。”

我随贺子珍走进屋里，看见毛主席正坐在小竹椅上与小毛逗乐。贺子珍走近毛主席身边，指着介绍说：“润芝，这位是刘俊秀同志，也是永新人。”

毛主席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问：“你也是永新人？家住哪一方？”

我说：“丰陂乡灌塘村。”

“丰陂乡。”毛主席思忖片刻，问，“那是属西北特区领导的，对吗？”

我点点头：“是的。主席对永新的情况真了解。”

毛主席说：“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在永新也算呆了不短的时间，但在东南特区活动较多，你们西北特区的桃花山还没有去过，真是官僚主义啊。”

毛主席招呼我坐下，又问：“你什么时候到沙洲坝来的？”

我说：“我参加‘二苏大’后，留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级班读书，”

毛主席笑着说：“不错嘛，读大学，还是高级班。你原来读过几年书呀？”

我说：“哪里有几年，只在12岁时读过45天冬塾。”

毛主席问：“学习跟得上吗？”

我回答：“压力很大，但我不怕，用功一点就是了。”

“对。”毛主席鼓励我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文化基础低是会给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的，但只要自己肯下功夫、肯刻苦学习，是一定能跟上的，甚至会成为一个优秀生的，我们共产党不仅要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呢。你说说，不学好文化科学知识，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子吗？”

我站起身说：“主席，我一定听你的话，努力学习。”

毛主席作个手势，让我坐下，问：“我在你们高级班也讲了一课。你讲讲，这么讲行不行？还有什么要求？”

我说：“大家都喜欢听你讲课。因为你讲课有群众语言、有实际例子、有生动的比喻，不但容易听懂，而且记得牢。有些理论很难理解，你打比喻说明，我们很容易听懂。我是个大老粗，希望你再讲课时多用些比喻。”

毛主席点点头：“唔，你这个建议提得好，今后我尽量多用些比喻。不过，有些理论是很难用打比喻解释清楚的，还要靠你们自己很好地钻研、记牢。”

警卫员把饭菜端上桌来。我看要吃中饭了，忙向毛主席告别，却被贺子

珍一把拉住：“就在这里吃中饭。”

我说：“不，回学校去吃吧。”

毛主席走过来说：“你和子珍是同乡，还做什么客呢？就在这里吃吧。”

由于毛主席和贺子珍一再挽留，我只好坐到饭桌旁。桌上只有豆腐、青菜和辣椒3个菜。在吃饭的时候，毛主席问我爱不爱吃辣椒，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家里还有什么人，家里分得几亩土地等情况。毛主席又问我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说：“我是1927年11月入党的。在入党以前，我虽然参加了农民协会，担任了农民协会主席，但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甚至还有一些不好的看法。后来在党组织教育和帮助下，才逐渐对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唉——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接受革命思想竟这么慢。”

毛主席说：“从我国革命的实践来看，农民虽然受压迫、受剥削最深，但他们下会主动地找革命，而要革命来找他们。农民一旦参加革命后，立场非常坚定。”

吃过中饭，我告辞欲走。毛主席和贺子珍很热情地对我说：“有时间再来玩。”这以后，我又到毛主席家里去了4次，每次都留在他家吃了饭。

（选编自刘俊秀：《艰难的历程》（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1页。作者曾任江西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红六军团十六师民运科长。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6 深情关怀赣东北

1933年初，中央电令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大约4月间，受赣东北党组织及方志敏同志的委托，我和邵式平同志带了汇报材料及赣东北省委的报告，随军前往瑞金，向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汇报工作。

我和邵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催马来到中央局所在地。当时，以博古同志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接见了我们。我们先将报告送上，请博古同志看。因为从来没有向中央系统地汇报过工作，所以材料准备得比较详细，报告显得比较长。

博古同志接过材料，随手翻了翻，满脸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当时年轻，一看他对我们不冷不热，就不太高兴，一听他这样说，就冒火了，当即和他顶起来：“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赣东北党是有的嘛，赣东北苏区是有的嘛，赣东北红军是有的嘛，现在就带了一个军来中央根据地！”

我越说越激动，邵式平同志拉了我一把，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博古同志冷冷地说：“好吧。”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那里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走，找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就决定，找毛主席汇报。

我们向沙洲坝走去。群众告诉我们说，毛主席往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很好找。

——说起这两棵树，还有段小故事呢。解放以后，我有一次到瑞金县，

在参观沙洲坝毛主席旧居时，请工作人员拍了一张毛主席旧居的照片，准备送给毛主席作纪念。后来，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我将照片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看照片，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我住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这只有—棵树。”回来后，我将毛主席说的情况告诉瑞金县委的同志，经过调查才知道，毛主席旧居前，原来确有两棵材，后来枯掉了一棵。当我将情况再次向毛主席说明后，毛主席感慨地说：“哦，是这样。兴衰盛枯，在所难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主席见我们来了，高兴地走出屋子来迎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魁梧的身子，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他那温暖有力的双手，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射着深沉、智慧、温暖的光芒。清瘦的两颊，微微流露着一股忧虑和痛苦的神色。

—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我们在汇报方志敏的近况时，毛主席回忆着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方志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6年5月。当时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方志敏同志作为江西农民运动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方志敏到农讲所，要求入学，工作人员见他身体很弱（方志敏有严重肺病），没有收他。于是他去找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着他羸弱的身体，也关切地劝他说：“你不必忙于进农讲所，先回家休养休养，养好身体再来吧！”方志敏坚决他说：“我活一天就应该努力—天，哪怕明知明天要死，也不能放弃今天的责任；明知晚上要死，早上还是该努力。”毛主席见他态度坚决，终于允许他进农讲所了。于是，方志敏成了农讲所的旁听生。

——方志敏同志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1927年3月。这年3月30日，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组织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被推举为组织部长，方志敏同志为执行委员。开会前后，方志敏同志还应邀到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

——在这两次会见中，方志敏曾多次向毛主席请教和探讨中国革命、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5年，方志敏同志壮烈牺牲。毛主席知道后很难过，他老人家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同志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工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像瞿秋白、方志敏、何叔衡、刘怕坚等许多同志，都是在王明路线下牺牲的。

接着，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问到历史、地理，为了讲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他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了？”

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你休息了。”

毛主席看了看西边快下山的太阳，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他换了口气，望着根据地的大好山河，饱含感情他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谈一谈。”他思索了一下，问我们道，“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毛主席一开始就问道：“你们那里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我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反第四次‘围剿’的呀，您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后来，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长征了，这都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结果。其实，那时候，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通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深刻地阐述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毛主席听说红十军调走了，关切地问我们：“主力调走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我们说：准备在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军。

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报告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芮光，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县有独立团（营），乡有大队，村有中队（小队）。至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可是现在，新十军组建不久，我们担心敌人“围剿”时，部队经验不足，可能会受损失。

毛主席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像看见了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指示我们跳到根据地外主，不要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还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新组织的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当时，敌人已开始对我们实行大筑“乌龟壳”的策略了，对敌人的碉堡，我们步枪子弹毫无办法。因此，我们总想有点大炮。

毛主席说：“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都应该支援你们，打完这一仗再说吧。”停了一下，他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我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他的碉堡呢？不可以把敌人引出碉堡来打吗？”

话题说到这次部队调动，当谈到干部、战士的思想动向时，我们说，同

志们还是想回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我们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回答说。

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我略带气愤地向毛主席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挨了他一顿克。”接着，我们便把在博古同志那里汇报时，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严肃他说：“这就不对了。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呢！”

毛主席这种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地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大横起义时，毛主席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

我们说：有。有人想把枪埋掉，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又问，“谁主张埋枪？”

我们回答说：是潘人非。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接着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上海派来的，后来叛变了。

毛主席气愤地说：“难怪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打下景德镇时，毛主席高兴地接着我们的话说：“我知道，我听到你们打下景德镇的消息很高兴。景德镇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打下它影响大着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的作战原则“扎口子、打尾巴、吃补药”等办法时，毛主席开始没听懂，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便向主席解释说：“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打尾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打小仗，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好得很，生动活泼。我们这里也总结了16个字。”

我们说，主席的“十六字诀”更全面、更科学，我们这次到中央苏区来，就准备好好学习，带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谦逊他说：“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都要互相学习。”并问邵式平同志，“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同志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地质的。”

毛主席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地质学家成了军事家。”

当我们汇报到敌人烧了群众的房子，我们军队一到便帮群众盖房子的事时，毛主席站起来，郑重他说：“很好，应该，应该。这一条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到哪里也不忘为群众做好事，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之师。”

在汇报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非常关心，并给我们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的党组织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几百支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个别领导人，追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硬逼着赣东北党组织交出枪支，方志敏同志不同意，还受到了警告处分，当我们汇报到这里时，毛主席用手叩击着桌子，愤怒他说：“岂有此理！”

大革命失败后，在赣东北党的领导人内，又出现了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有的同志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毒害较深，坚持不要搞武装斗争，主张把枪埋起来，领导干部躲到白区去。这是右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一些同志身上，使党内“左”的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有的同志主张大规模搞武装暴动，提出“县县暴动，全面开花”的口号。方志敏同志批评和说服了右的、“左”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同志，确定了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弋阳、横峰两县首先举行暴动。

毛主席听后，称赞说：“对啰，志敏同志这个想法和作法是对的。”他又补充说，“事实后来也证明这样作是对的。”

在谈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时，毛主席幽默地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断了没有？”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1930年下半年，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戈，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接着，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垵要塞……

毛主席插话说：“这里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我接着说：是啊，我们在这里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主席听后，表扬我们说：“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呢！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瞎指挥呢！”

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毛主席问我们：“现在不是派了一个人去吗？”

我们说：“是，派了个曾洪易。”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急切地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左’得很，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损失。”

毛主席听后，许久没有说话。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已被王明“左”倾主义中央所排挤，并对王明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因为当时斗争尚未公开，毛主席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不愿在我们面前有所流露。

当我们谈到曾洪易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时，毛主席激动地站起来，愤怒地指责说：“哪里有那么多的‘AB团’、‘改组派’！”

最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鼓舞我们，叫我们把赣东北根据地建设得更好。

毛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

——就在我们这次汇报后，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

大会上，毛主席又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表扬、鼓励和指导。毛主席高兴他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业、农业、贸易、财经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亲切的鼓励。

毛主席最后告诫我们说：“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选到了罗霄山脉中段……”

我们插话说：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了戈横这块地方。这里地方偏僻，四周多山，有武夷山、怀玉山、障公山、磨盘山。同时，这地方东接浙江、南通福建、北连安徽、西达南污，是四省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好，群众基础又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这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从毛主席房间出来后，我们精神振奋，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心，投入了新的艰巨的战斗。

可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就不让我们回去了，致使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未能实现。最后，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赣东北根据地不仅未能巩固，反而最后被断送了。

在瑞金，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我们本想回赣东北根据地，但中央却给我们另行分配了工作。1933年初，中央决定以黎川县为中心，成立闽赣省。调邵式平同志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调我任在该省活动的三十一师师政委。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糟，根据地越来越小。在一次战斗中，我不幸受伤被捕。以后，在福建辗转了两年。1937年“西安事变”后，我从报纸上看到成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和叶剑英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的消息。在闽赣省根据地时，叶剑英同志曾任过省军区司令员，我部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打过许多仗。我立即写了信与叶剑英同志联系。叶剑英同志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寄来50元钱作为路费。于是，我从福州来到南京，找到了叶剑英同志。在叶剑英同志的安排下，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在党校十三班学习。

有一次，毛主席来党校讲课，课间休息时，他发现了。毛主席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兴奋地回答。

毛主席告诉我：“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毛主席记忆力真好，我随邵式平同志在瑞金向他汇报的事，显然他还记得。

我说：“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毛主席说：“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

“好，好。”我连忙答应着。

我多么想去毛主席那里，我有多少话要跟毛主席说啊！自从在瑞金离开

毛主席后，我即投入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在江西的密林里，在闽北的丛山中，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时，在坚持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是多么地想念毛主席啊！可是，毛主席那样忙，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呢？

设想到，毛主席倒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上。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4点多钟，我随李富春同志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自到窑洞门口来迎接我们。坐下后，我们很自然地一下就谈到了方志敏同志，毛主席无限感慨地说：

“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毛主席接着问我，“赣东北怎么样？”

我告诉毛主席说：“还夸哪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接着，我们谈起了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始终关心着这些同志们，他知道我也惦记着南方的战友，便将南方几个主要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并预言说：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说到“西安事变”，毛主席问我，“‘西安事变’我们主张放掉蒋介石，你想通了吗？”

我坦白地对毛主席说：“想不通，蒋介石和我们打了10年仗，杀了我们那样多人，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了，又放掉。”

毛主席批评我说：“还想不通就不对了。”

接着，他详细地阐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的影响、可能发生的后果、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一个普通干部面前，毛主席讲得是那样耐心、细致，我又一次为毛主席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精神所感动。

最后，毛主席问我：“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我说：“我现在在党校学习，打了十几年仗，现在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好嘛，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他对李富春同志说，“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同志说：“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暮色降临，夜霭低垂，我们起身和毛主席告别。毛主席送我们出门，挥手作别，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毛主席那温暖的窑洞。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因此，我得以有机会经常接触毛主席。

有一次，我们陪毛主席在延河边散步时，毛主席问我：“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

我想了很久，记不起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人，便回答毛主席说：“我家没这个人。我1933年离开赣东北时，也没听说过有这个人。”

毛主席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同志的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有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

说完，毛主席表情严肃地站在延河边，遥望着南方。我们都没说话，陷入了对南方老区的遐想之中。看着毛主席忧虑的神色，我知道，毛主席在记

挂着南方的革命，在关怀着老根据地的党，关怀着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关怀着在南方战斗的同志和战友。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如此牵肠挂肚地关怀着一个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使我深受感动，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北方的深秋已经颇有凉意了，但站在毛主席身边，我却全身充满着温暖。

“方志诚？”自从那次与毛主席谈话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想不出这个人。

全国解放后，有一次，我碰到倪南山同志。他是从红军北上抗日后，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我问他：

“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叫方志诚的？”

倪南山同志说：“没有哇。”

“怎么没有呢？毛主席在延安时还问过我呢！”我告诉他说。

倪南山同志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他哈哈大笑，告诉我说：“啊，有，有！有个方志诚，那就是你呀！”

倪南山同志见我很惊讶，便笑着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一直到这时，我才解开了“方志诚”这个谜。我听了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由得想起了在延河边上，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关怀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情景……

（选编自《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310页。作者曾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江西省省长等职。）

7 我为毛主席治病

1934年9月初，党中央委员会驻在离瑞金三四十里的梅坑。那时我在中央红色医院里当院长。一天，我带着医助钟福昌同志到毛主席的住处去。

由于环境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当时毛主席很瘦，身体不好，组织上原想派陈炳辉同志（医生）去护理毛主席。为这事，中央总务处的袁福清处长和我，已经到毛主席那里去了一趟，但是毛主席不同意，他只要一个医助，袁福清同志和我还是想派个医生去，毛主席却说：“现在部队很需要医生；我们的医生又很少，我自己怎么好用一个医生呢？”我想：虽然我们医生不多，但也有几个，调一个医生护理毛主席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毛主席最后还是没有答应。这样，我只得在医助中东挑西挑，挑了个钟福昌。

钟福昌是共青团员，才17岁，长得挺壮实，整天笑嘻嘻，脾气很好，技术也不错。当我经过反复考虑，挑中了他后，就告诉他。他听了，兴奋得脸都红了起来。

那天，我带着他到毛主席的住处去。一路上，我也为他高兴。能跟在毛主席身边，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我羡慕地看看他，见他很激动，脚步轻快而有点慌张，我一面走一面嘱咐他：“到了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细心谨慎，好好护理毛主席，决不可疏忽大意；有什么困难随时告诉我，我帮助你解决。”这些话，我已经在这几天跟他说过好几遍了，这时不知为什么又说起来。钟

福昌嘴角上挂着笑容，一面点头一面说：“我一定好好护理主席，随时向你报告。”

毛主席住在村里一家老百姓的屋子里，我们一进去，见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写东西，桌上还放着一把小茅壶和几个土碗。见我们进去，毛主席放下手里的毛笔，站起来，让我们坐下，给我们倒了两碗茶，又拿出战斗中缴获的糖果饼干，招待我们。

“主席，我派了一个医助，来照顾你。”我喝着茶说。

“好啊！”毛主席说。

我向他介绍了钟福昌同志的情况，说钟福昌是江西人，在红色医务学校里训练出来的，学习成绩很好。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转向钟福昌，亲切地问他多大年纪、什么文化程度，又问他家中的情况，见他端坐着，也不喝茶，也不吃糖果，像个客人，就拿了一些糖果放到他面前，温和他说：“不要客气，吃一点。”钟福昌一点也不拘束了。又谈了一会，毛主席叫钟福昌回去准备一下东西就来，我俩就走出了毛主席的住处。我对钟福昌说：“你看主席瘦得很，以后吃饭睡觉你都要好好照顾。”第二天，钟福昌背上一个红十字挂包，带了一些必需的东西，就去护理毛主席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中央红色医院里给红军伤病员看病，突然接到张闻天同志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

我不知什么事，急急地赶到他那里，谢觉哉同志也在，我见他俩脸上现出焦急的神色。张闻天同志一见我，就说：“毛主席病了！”

“主席病了！”我惊讶地又问了一句。

“是啊！病了几天了，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同志说。

我听了心一颤，上次去，他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病得这么厉害？我来不及多想，说：“我马上去给主席看病。”

“很好！”张闻天同志和谢觉哉同志同时说。

当时毛主席已到零都去了，离梅坑有180里路。我把医院里的事情交给了陈炳辉同志，把各种急救药品、听诊器、体温表和注射器等等放进药箱，要了一匹马，骑上就往零都跑。

跑了一天一夜，当天傍晚，我到了零都。在毛主席的住处门前，碰到了钟福昌，我来不及跟他多说，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往日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见到我去，高兴了，马上带我去见毛主席。

我急匆匆地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屋里有一张木板搁起来的床铺，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还有一张板凳。床上，冷天当被子盖的毯子垫在木板上当褥子，上面铺一条白洋布单子。毛主席就躺在这张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为了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整年整月不分白天黑夜地操心，劳累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毛主席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睁开眼看到了我，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

我走到毛主席床前，说：“主席，我来了。”

毛主席精神很疲劳，不能多说话。我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进毛主席的嘴里。毛主席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我焦急地等了5分钟，从毛主席的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无情的水银柱升到105度（即摄氏41度），我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

持镇静，给毛主席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当时我们没有显微镜，也没有X光，不能验血和透视，检查只能到这里为止。

为了正确地判断病情，检查后，我招呼钟福昌到外屋，向他了解毛主席病中的情况。

一走出屋，毛主席的文书黄祖炎、警卫员吴洁清等同志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热度很高。”我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

“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钟福昌说。

“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了点米汤。”吴洁清说。

“有时候昏迷吗？”

“不昏迷，头痛得利害。”钟福昌说。

究竟是什么病呢？凭想象和自己十几年的医疗经验，我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一是肠伤寒；一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想到毛主席的胸部既然正常，虽有几声咳嗽，也不利害，不见吐铁锈痰，不像肺炎；腹部虽较胀，但经过灌肠后，松软了，神志也清醒，身上又不见斑点，也不像伤寒。三个可能否定了两个，我判断毛主席得了恶性疟疾，据了解，粤都这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老百姓中已有人患了疟疾，再说这时正是初秋时候，在南方是疟疾流行的季节，毛主席的床上没有蚊帐，可能传染上了这种病。钟福昌同志虽然给毛主席吃了奎宁，但药量不够，不济事。我作了这样的判断后，准备给毛主席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吃奎宁丸。我把这意见告诉了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是很熟悉医药卫生的。他同意了。我给他打了针，两小时后，又给他吃了一片零点三克的奎宁丸。

我叫钟福昌多给毛主席喝开水，多换换额上的冷毛巾，就走出了他的房间。

黄祖炎已把我的背包拿进他的房间里，房里加了一块木板，搁了个铺，让我和他同屋住。这时我才看了看这所房子。这是一家老百姓的住房，一连三间，左边一间是毛主席的卧室兼办公室；中间一间是客厅，警卫员同志和钟福昌住在里面；右边一间就是黄祖炎住的。除了厅稍大一点，两边两间都很小。我走进黄祖炎的房间，坐到铺上。黄祖炎一边帮我拿背包，一边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可把我们急坏了，钟福昌的药又不顶事。”

我躺到铺上，说：“没有化验仪器，这病是不大好判断。”

“是疟疾？”黄祖炎问。

“恶性疟疾。”我说。

“这病好得快吗？”黄祖炎又问。

“会很快好的。”我安慰他，同时也安慰着自己。

我休息了一会，心里老不放心，又起来去看毛主席，见他睡得很安稳，呼吸也很均匀。我踮着脚走了出来。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听到黄祖炎的床板老是 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我虽然赶了一天一夜路，但心里不安宁，眼一合上，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惊醒过来，侧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主席的咳嗽声，心里就像扎上了针一样，更睡不着了，心想：不知退烧了没有？我判断的病情不会错吧？药下得合适吧？脑子里一个劲地翻腾着；有时听不到什么动

静，眼皮就合起来了。

第二天清早，我走到毛主席床边，见他已经醒了。我问：“主席，好一点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用手摸摸额角，说：“头轻了一点。”

我正拿出体温表，要给毛主席试体温，他问：“你睡得好吗？”

“我睡得很好。”为了使毛主席宽心，我撒了个谎，接着问：“主席睡得好吗？”

“我睡得好。”毛主席说。

我给毛主席试过体温，102度，退了点。我心里很高兴，全身都感到轻快，我的判断是对的。

“热度退了点吧？”毛主席问。

“退了点！”我兴奋地回答。

我又给毛主席检查了一次胸、背和腹部，一切都正常。像昨天一样，我给毛主席打了一针，又拿出三片奎宁丸，一天分三次吃。

第三天，毛主席的体温退到100度，额上的湿毛巾拿掉了。当我问到毛主席的健康时，他说：“今天感到又好了一点。”

这天，和前两天进行了同样的治疗。吴洁清给毛主席煮了点稀饭。

我回到黄祖炎的风子里，感到肩上的重担轻了，心里很舒畅。我打了个报告给党中央，报告了毛主席的病况，并建议中央和后方的同志吃一点奎宁，以预防疟疾。

心里轻松了，睡觉也香了。第四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有个人走到我床前，温和地问我：“这几天你累了吧？身体怎么样？”

我睁大眼睛一看，是毛主席！他怎么起床了？我急忙爬起来回答：“我很好，主席，你要多休息！”

“我好了。”毛主席笑着说。

我拿起药箱，随毛主席走到他房中，给他检查身体，一试体温，真是天大的喜事！水银柱稳稳地停在98.4度上（即摄氏37度）。我心里升起一股暖流，全身暖洋洋的，手心里冒出了汗。我捏住这支体温表，看着里面那一管透明的水银，它今天显得格外明亮，甚至发出闪闪的光彩，我越看越可爱，心里不知怎么产生了感激它的心情，好像它变成了一个人，这个人报告了我一个最好的消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钟福昌，告诉黄祖炎，告诉吴洁清，还要报告党中央，让所有关心毛主席病的同志放下心上的石头吧！

我忍不住心里的喜悦，笑着报告毛主席：“你退烧了，98.4度，体温正常。”

“好啊！”毛主席也笑了。

这时，我见毛主席已坐到那张没有油漆过的桌子旁，桌上摆了文件、纸、毛笔，干什么？毛主席要开始工作了？那怎么行呢？连烧了六七天，烧得那么高，六七天只喝点米汤，昨天才开始喝了点稀饭。今天虽然退烧了，两眼已陷了下去，脸上没有血色，又瘦又黄，走起路来都是轻飘飘的。我是一个医生，了解大病初愈的情况，就是一个铁打的人，这时要工作，也支持不了啊！毛主席至少得休息3天！3天！但是，看来毛主席连一天、半天、一小时都不肯休息。他已经在翻阅文件了。我一定得尽到医生的职责，劝阻他。

我走到桌旁，说：“主席，你虽然退烧了，可还得休息几天，现在就工作太早了。”

毛主席望了我一眼，像是想到了一件严重的事情，严肃而又温和地对我说：“休息？做不到的，你知道环境很紧张！”

他见我脸上现出担心的神色，又安慰我说：“我好了，你放心吧！”

一提到环境，我能说些什么呢？可恶的敌人连着向我们发动“围剿”，而且越来越疯狂，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种，把人民永远踩在他们的脚底下。为了击败敌人，毛主席在重病后都不肯休息。毛主席肩上挑的真是一副千斤重担啊！但是，我又想：正因为这样，他应该更加保重身体呀！他却常常只顾工作，白天工作到深夜，深夜工作到天明，第二天睡一会，接着又是开会，看文件，写文章，常常因为紧张工作，忘了吃饭、喝水，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生病的时候忘了按时吃药。为了使革命的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火，烧毁旧中国的黑暗、腐败，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毛主席真是操尽了心。

我见毛主席已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不能去打扰他，没办法，只得悄悄地退了回来。

黄祖炎见我出来，低声地问我：“怎么样，主席的病又好点了吗？”

他这一问，我才想到忘了把好消息告诉他们，我说：“主席退烧

“真的？”

“好啊！”

“傅医生，亏得你来了，治好了主席的病，太谢谢你了！”

我的一句话把大家都引来了，吴洁清等同志围上来，高兴得说出各种各样感激的话。我想：治好毛主席的病是我的职责，我只是完成了一项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我见到大家的脸上现出了几天来第一次笑容，话也多了，低声地开着玩笑，甚至打闹起来，我心里和大家一样痛快。

“主席刚好就在工作了。”我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一下又静下来，担心起来，钟福昌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主席关心别人的身体，自己总是艰苦工作，钟福昌到这里来也改行了。”陈昌奉说。

这几天没注意，原来钟福昌身上背上了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来了。

“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多护理他，我只得干点旁的事。”钟福昌说。

“傅医生，你跟主席说说，请他休息几天。”吴洁清说。

“我说了，没有用。”我说。

“你们知道，主席肩上的担子多重！”黄祖炎说。

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商量好在生活上加倍注意照顾毛主席。我恐怕毛主席工作起来又忘了吃药，从药箱里拿出3片奎宁，叫钟福昌一天3次，按时把药和开水送到毛主席面前。

这天开午饭，吴洁清双手端着一个江西出的土罐，放到我面前，说：“主席叫我给你吃的。”

“什么？”

“鸡。”

“鸡！”我惊讶他说：“为什么给我鸡吃？”

当时我们生活很艰苦，不用说鸡肉猪肉很少见，就是新鲜蔬菜也不常吃。

“主席说你身体不好，要我买了嫩的。”

“主席有吗？”

“没有，主席就叫买了一只。”

“主席吃什么？”

“还是辣椒、酸菜。”

我心里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眼睛一热，泪珠在眼眶里转。我过去得过肺病，身体衰弱，这些，显然毛主席还没有忘记。他自己重病刚好，正需要鸡肉营养身体，但还是像平常一样，吃辣椒和酸菜，却买了一只鸡给我吃。我怎么能吃这只鸡呢？

“吴洁清，我不吃，你端去给主席吃。”

“主席交代了，一定要你吃。”吴洁清为难地说。

他把土罐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走了。我看看土罐里的嫩鸡，满满一罐，鸡汤上面浮了一层黄黄的油，鸡是好鸡，但这时要我张口吃。真是困难极了。想想毛主席，他总是这样关心同志。记得有一次，毛主席叫我去给何叔衡同志看病，当时我们缴获了敌人的一个马达，一到晚上马达隆隆地响，毛主席知道我有失眠症，怕马达声音吵我，特地在很远的地方给我找了一间房子，让我住下。这事深深地感动了我，至今还忘不了。现在毛主席又买鸡给我吃。我想啊想的，忽然想到：这恐怕不只是毛主席对我的关心，也是毛主席对我的鼓励吧！是啊！当我们在工作中做出一点点成绩时，毛主席常常就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记得1933年，毛主席住在瑞金，有一天夜里发烧了，但第二天要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当晚他把我叫去，对我说：“明天我要去做个报告，你能给我退烧吗？”我马上给他检查了身体，开了药给他吃。睡了一夜，毛主席退烧了。后来他竟对张闻大等半开玩笑他说：“叫博医生看病，可以对他下命令，叫退烧就退烧。”

我越想越多，面前的鸡怎么办呢？

这时毛主席来了，我连忙站起来，说：“主席，我身体很好……”

毛主席猜到我要说什么，笑着说：“你吃吧！你吃！”说着就走了。

我只好坐下来吃鸡。满满一大罐，我一个人怎能吃下去呢？我邀黄祖炎、吴洁清等一起来吃，他们一个也不肯来，躲得远远的，我只好一个人吃，这只鸡，我一连吃了3天，9顿才把它报销了。

这以后，我每天给毛主席检查一次身体，试一次体温，都稳定在98.4°。为了防止毛主席重患这种病，我还是每天给他打一针，吃3片奎宁丸。

从第四天起，毛主席就恢复了夜以继日的工作。

我在毛主席的身边住了10天，见他的病痊愈了，饮食也正常了，每顿能吃两碗饭，就准备回医院去。走以前，我走进他的房里，说：“主席，你病好了，今天我想回医院去了。”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工作，对我说：“你不要走吧，我们买条鱼吃吃，过几天一起回去，我也要到梅坑去。”

我知道，毛主席买鱼又是为了款待我，我怎么能再给毛主席增加麻烦呢！因此当天就离开了零都。

不久，我们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零都这10天，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10天。

（作者傅连璋，原题为《毛主席在零都》，见杭州大学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7年内部出版，第180—190页。作者当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

第三编

铁流二万五千里

一、征程艰难挽狂澜

1 刘帅话长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力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1932年8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苏区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1933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苏区，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进一步地贯彻执行，1933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1934年10月，临时中央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五军团，自离开中央苏区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10万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10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3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壩，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守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

险要。我军就依靠绞车渡7只小船，经过9天9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5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1935年6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4个团，旋经天全、芦山、主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苏区，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6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回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台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已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而左路军在张国焘率领下南下逃跑，由于朱总司令等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多次函电斗争，才被迫回师北上。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

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刘伯承：《回顾长征》，见《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14页。作者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智斗“洋顾问”

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他大权在手，刚来到就处理了一个问题。敌人围剿开始时，肖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70来人的警卫连，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肖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了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要对肖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他5年徒刑。

肖劲光是位老同志，曾两次去苏联：1921年与刘少奇同志同去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又被雁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之一的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回国后又屡建战功，这次却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处分。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正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将肖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保护了他。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不仅根本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零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从这一方面看，毛主席的作用和历史性的功绩确是伟大的。

1934年10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了。出发以后，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雨道式”搬家方式，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3000多副，真是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像叫化子打狗似的，边打边走。这样好

容易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部队处处挨打，损伤惨重，大的笨重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只好把千辛万苦从苏区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机、蓄电他和X光机、印刷机和几门小山炮等等，部忍痛埋掉了。有的运输员来的时候思想上就是不大通的，这时就把东西一扔自动跑回家去了。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2/3的兵力。过湘江以后只剩了3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那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狼狈相，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于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是新编人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打散拖垮了。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找来，将他痛骂了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给带垮了，把老婆倒带着。实际情况是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同志，红军长征时本来让她留在苏区，她不愿留下，自己拼着命跟部队走，丈夫又顾不了她，吃了许多苦。可是李德却为此大训她的丈夫周子昆，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部队前进到湘四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5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3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俩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说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12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当时黎平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驻守，但他们在我先头部队未到达之前就弃城而逃，溃兵退到十万坪，驻十万坪之敌也跟着向后逃跑，一直退到五里桥。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狼狈逃窜的情形，同湖南、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情况，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进一步了解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这四个派系名为统一，实则各据一方，时常内江。王家烈虽名为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主持贵州军政，但实际上能够由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两个师而已。还了解到，贵州的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中饱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公开宣布开禁鸦片烟，种罌粟、吸鸦片烟到处可见。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

贫富悬殊，矛盾极为尖锐。特别是军队也抽鸦片烟，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指李聚奎任师长的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我们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一天，我们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里通过，听说我们红一师师部在这里，前梯队也停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那时毛主席也用这个词）没有？他们谈话后，接着就是吃饭。那时招待领导同志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他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了，见上来了肉，竟喊了起来：“嗨，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不断，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她们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向我们提起，所以我们也不便于发问。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同志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

“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毛主席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我们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但一下也纠正不过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大家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30多个县，10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还有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军团的师、团长会议上，给我们讲“短促突击”的战术课，从头一天晚饭后，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讨厌的是他完全凭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确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这些他都全不考虑。所以，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利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摘自《伍修权回忆录》（之一），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第176—179页；《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129页。伍修权当时为李德的翻译；建国后曾任外交部、中联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情报部部长等职；李聚奎当时任红一师师长，195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结合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召开的，从某种意义说，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由于党中央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作出了英明决策，在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这座壮丽的山城，便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象征。

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把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解决党内矛盾，团结全党共同对敌的光辉策略思想，使我难以忘怀。

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主席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不参予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整整两年了。在这段时间内，毛主席对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原则性的斗争，但在组织上又服从中央的决定，没有利用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搞非组织活动。两年来的严酷事实证明，中央革命根据地不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除了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外，主要是以博古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完全听从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瞎指挥所造成的。从撤离瑞金到黎平的两个多月时间里，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的战斗中，损失更大。这种日趋严重的局面，同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以前的形势相比，真是泾渭分明。莫说是全军的高级干部，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参谋人员，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我们进入贵州境内以后，全军指战员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挽救危局的呼声，越来越高。黎平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会后，按照毛主席的意见行事，红军果然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但当时由于敌情紧迫，还未完全摆脱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被动局面，从全国的革命形势看，蒋介石正得意忘形，趾高气扬，猖狂一时，正调兵遣将，加紧向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批判与清算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冒险、逃跑主义的错误，而又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党内矛盾，特别是解决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就成为召开遵义会议的关键。在会议的进程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针对当时我党、我军的现实环境，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紧密结合，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根据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认识程度和觉悟水平，把会议批判的问题集中在军事问题上，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对博古同志的错误，不搞过火斗争，适可而止，对待保留意见的凯丰同志，耐心等待。这样，就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和分裂的危机。所以，遵义会议是进行政治路线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范例。

在改组党中央与军委机构的问题上，毛主席同样从全党、全军最高利益和团结愿望出发，体现了大公无私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在常委分工上，他并没有取代博古当书记，而是根据当时党内形势，推让张闻天同志总负责。军委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领导小组，而日常的军事指挥，仍然继续由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负责。调刘伯承

同志回军委，恢复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对博古同志仍要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并没有把他排斥在外。对李德的生活照顾如同往常，对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采纳，只是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利。这种对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批评其过失的同时，又从政治上热情帮助，组织上给予适当安排，以克服消极情绪，调动其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进行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光辉典范。正因为遵义会议作出了这些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与振奋了全党、全军的革命精神，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被动不利局面。从此，又走向了光辉灿烂的征途。

（节选自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5—177 页。作者当时为中央军委机要人员；1961 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4 猿猴场招见

为了消灭川敌郭勋祺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亲临前线指挥，1935 年 1 月 27 日，他们一方面电令我红一师在黄陂洞阻止敌人南下，一方面令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迂回包围郭旅。当时，我师虽受敌三面包围，但为了土城战斗的胜利，仍英勇抗击敌人的多次进攻。红二团的领导同志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我说，我们在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土城的战斗就多一份胜利的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遂又坚持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鉴于土城鏖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人所阻，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战斗，于 1 月 29 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

当我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同志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来找我们，要我和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到他们那里去。这是我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这次见到我们（耿飏同志因指挥部队过河未到）时，对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这是我们红一师的领导同志第一次听到了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而且还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们讲的。因此印象特别深刻。

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虽然黎平会议决定转兵黔北以后，我军已由原来处处同敌人“决一死战”的方针改为“避强攻弱”、“避实击虚”的方针，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是军事领导上的问题不解决，还难以从根本上保证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所以过了 10 多天以后才传到红一师，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 50 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在

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在遵义会议上当李德受到批评时，林彪又没有发什么言，遵义会议结束后，林彪又同意李德跟一军团行动“体验生活”。因此，虽然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地给我们传达会议精神。当然，这是事后的分析，当时我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机动灵活，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在中央苏区的一、二、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面对强大的敌人，采取了诱敌深入，隐蔽主力，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我军连续取得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也由于继续运用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因此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时毛泽东同志所以又再强调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用意，按我当时的理解，除了要我们不要忘记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之外，着重还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目前军委改变从宜宾到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指我）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接着，毛泽东同志问我：

“你看行不行？”

“行！没有问题！”我回答说。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主席又问：

“你们一师还有多少人？”

“还有3000多人。”我回答说。

“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后来来到扎西，一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其余编制未变。）

当时我和黄甦、谭政同志都为能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指示而特别高兴，回来后立即向师里的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同志讲的办。

（摘自《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129页。作者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5 战土城首渡赤水

四渡赤水之战，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个战役。其中的二渡赤水，歼灭与击溃薛岳、王家烈的4个多师，俘虏3000余人；三渡、四渡赤水，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是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长征史中高超的运

动战典范。但现有史料很少提及中央红军首渡赤水的详情，实际上，首渡赤水是我军在赤水东岸的土城一战失利，毛泽东同志果断改变原定的行动方向，指挥部队轻装渡赤水西进，摆脱了困局，为尔后三次再渡赤水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当时，为了甩掉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尾追我中央红军的不利局面，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力主放弃再回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改为北上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当研究从何处渡江时，根据朱德、刘伯承同志了解川军的实际情况，决定取道桐梓、习水、赤水城，直插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因为这段江面平缓，渡口较多，敌人防守亦弱。

1935年1月中旬，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占领桐梓，发现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已渡过长江，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我军北上。当我军于1月25日到达习水时，侦悉郭师先头部队已进至离我有一天多路程的温水。

在从习水向土城镇行军途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敌若孤军深入土城镇以东的屋基坝、黄金弯一线，我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敌人。

中央军委于27日下午到达土城镇，得悉尾追之敌是两个旅4个回，正向土城方向前进。毛主席当即下决心，命令一军团翌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三军团3个师，五军团两个师占领上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刘湘军阀一个迎头痛击！为了打好这一仗，为北上渡江创造有利条件，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刘伯承参谋长到五军团督战。

战斗在28日早晨打响。我军连续奋战三四个小时，战果未能扩展，当即发现对敌情判断错误。原来以为敌军是两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是郭勋祺3个团，潘佐旅3个团共1万多人。临战前估计刘湘部队的战斗力和贵州王家烈部队的“双枪兵”（鸦片烟枪加步枪）差不多，实际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要比贵州黔军强得多。加之，我一军团上午已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没有形成歼灭战的拳头。

毛主席发觉上述错误后，立即派人通知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在一军团尚未返回的两三小时内，战斗打得很激烈，五军团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遭受很大伤亡。敌人抢占山头，步步向土城镇进逼，一直打到了镇东面的白马山中央军委指挥部前沿。山后就是赤水河，若不能顶住敌人进攻，背水作战，就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命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干部团是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成员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他们生龙活虎，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一个猛冲，打得敌人丧魂落魄，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跑步返回增援的红一军团第二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连续反击，敌受重创，退却固守。三军团牢固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郭勋祺率部退守平川地带。

这一战，干部团立了功，我当时听到毛主席在山头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当一军团全部急行军返回增援后，完全巩固了我军阵地。毛主席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开会。根据当时敌情，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行了。毛主席果断地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力主动，不应与郭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同志赞成毛主席这一决策。毛主席当场指定朱德、刘伯承同志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同志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同志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开完会，已是28日晚上了。我们作战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中央军委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即1935年1月29日3时）的电报，迅速传达到所属部队，各军团于29日拂晓前，按一军团、九军团、军委纵队、三、五军团的顺序撤退，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赤水河以长江支脉为源头，从合江起沿四川、贵州、云南交界蜿蜒南行。河水奔腾湍急，宽处有300多米，窄处亦有200米，要在一夜之间架起能渡几万人的浮桥，谈何容易！然而，背山迎敌的严峻现实，不容许架桥有半点迟缓。周副主席迅速把各军团的工兵连干部召集一起，下达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代的任务，并且亲自安排了每一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完成时间。

架好浮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疏开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地形；二要有船只；三要有木板、门板、竹竿和绳索。周副主席命令各工兵连紧急奔赴赤水河上下游收集船只，向土城居民收买架桥器材，自己则亲自带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上。

这是一个使人焦的、忧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前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波涛滚滚，关系全军安危的浮桥十分艰难地延长着。我是当晚的军委总部作战科值班参谋，彻夜未眠的周副主席，三次带我到架桥现场督促指导，又三次单独派我去架桥点检查进展情况向他汇报。工兵部队在当地群众的热情帮助下，收集到了十几只帆船，编排在河面上，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连接，把各船绑牢，再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天还未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过的轻便浮桥，出现在赤水河上。

陈云同志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们，奋不顾身地把全部伤员抢运了下来，作了善后安置；又把笨重物资投于赤水河中。他在早晨4点多钟就向毛主席报告完成了任务。

天将拂晓，按照毛主席的原定计划，整个部队进行轻装，三军团把笨重的山炮丢进了赤水河。然后，以三路纵队踏着浮桥西渡。

天还未到晌午，我军委纵队和一、三、五军团共3万多人，全部安全地渡过赤水，随即烧毁了浮桥。汹涌的赤水，阻断了尾敌。

后来，在扎西会议上，毛主席总结这次战斗时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主席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大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首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同志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力主动，转败为胜

的指挥范例之一。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要求干部总结自己的经验，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指出：“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首渡赤水之战又证明：只要敢于正视失误，及时吸取教训，坚定信心，勇往直前，便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节录于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77页—182页。）

6 送总司令上火线

我们中央纵队兴高采烈地开进土城，刚安顿好，前头的红一军团就与川军干上了，首长们正准备组织部队增援，后头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枪炮声是从离土城八九里路的青杠岭传来的。青杠岭上，炮声隆隆，敌人拼命向我阵地上拥去，我军阵地屹然不动。但是，敌人的援兵源源而来，山头上的敌人越打越多，我们红军的弹药越打越少，人员的伤亡也越来越多。看着首长们焦虑的神情，我们在心里骂开了：操他个祖宗，老“锤子”也太缺德，堵了路又咬屁股。

这时，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过20来天，毛泽东同志刚刚回到政治局。然而，四川、贵州、云南军阀和蒋介石还在做老梦，调集几十万追剿部队想把我红军在遵义地区消灭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等同志反复研究，决定红军离开遵义，挥师北上。

1935年元月19日。我们离开遵义。24日先头部队占领了土城。快到土城时，我听说毛主席跟总部的工作人员说笑话：土城茅台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呷醉哟。进了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商店摆满了一缸缸的茅台酒，还有许多酿作茅台酒的作坊和厂家。有些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的工场。大伙可乐坏了，这哪里是土城哟，这是“酒城”呵！自从遵义会议的精神在机关和部队迅速传达之后，给了红军全体指挥员以极大的鼓舞。大家正愁找不到一个机会，好好庆祝一番。天遂人意，土城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茅台酒！我们住下后，后勤供应部门的同志已经和店主、厂家办好了手续，把酒抬来了。大家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口缸，从酒柜、酒缸里舀出喷着甘醇清香的茅台酒，也不用什么下酒菜，脖子一仰，“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的同志聚拢着划起拳来。行的拳令倒是现编的：“一定胜利”，“双枪兵倒大霉”，“三年整见天光”，“红四方”……大家都像过阴历年一样高兴。

我们虽然到了赤水河边的土城，形势依然很险恶。我一军团在土城前边的复兴场与川军遭遇后，总部首长本想集中兵力打击川军主力，准备消灭它二、三十团，然后渡赤水河。战斗打响后，才知道敌人不止四五个团，而是九个团。敌情发生了大变化，尾追的川军一部又咬上了。总部首长考虑到红军不能前后作战，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为消灭、重创敌人的一部分，赢得再定大计的时间，果断决定一、三军团迅速回师土城，再加上军委纵队干部团，会同五军团进行战斗，首先解决“后顾之忧”。这一仗打好了，可以打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保证红军渡过赤水河，走活一盘险棋。紧要关头，朱德总司令决心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朱老总要披甲亲征，震动了全体红军，毛泽东同志连抽了几支烟都没有点头。朱老总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借，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说得毛泽东同志点头了。

1月28日上午，久雨初晴。毛主席和总部其他首长决定为朱德同志到作战第一线而举行欢送仪式。那天，我们军委纵队的同志们吃过早饭，来到了

土城街的集合场地。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徐（特立）老、林（伯渠）老等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中央领导和我们一样，手中都拿着一面用小竹棍作旗杆的三角彩旗。我们 200 多人在街道两旁刚排好队，朱总司令他身着灰棉军衣，戴着红军帽，腰束牛皮腰带，别着一支小檐子，身上背着一顶斗笠，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近来。上上下下干净利索。毛主席立即从欢送队伍的排头走向排尾，迎着朱总司令走过去，一边走一边举着旗子领我们高呼：“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消灭川军北上抗日！”“打倒蒋介石！”“打胜仗创造新苏区！”等口号。洪亮的口号声，各色小旗，增添了雄壮、热烈的气氛。

朱德同志快步走近毛主席，毛主席也赶忙紧走几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朱总司令很激动：“不必兴师动众。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毛主席当即说道：“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说话之间，这两位首长手拉着手，走到夹道欢送的队伍尽头。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同志也满脸笑容迎上前，和朱总司令亲热地握手、打招呼。朱总司令一边握手还礼一边高兴他说：“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总坚毅的脸上，露出庄重而又欢快的笑意。

身着灰布棉军装的毛泽东同志，精神矍铄，清瘦的脸上现出淡淡的红色。他和留着长胡子的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同朱总在小声地商讨着什么，忽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我抬头朝首长望去，朱总司令退后两步，向毛主席等同志行了一个军礼。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双手再次紧紧地握着，很有力地摇了几摇。此刻，两位同生死、共患难、肝胆相照、共同把中国革命航船不断扭上正确方向的战友，多少深情的嘱咐、多少无限的期望，集中贯注在这无言胜有声的握手之中。

“请多加保重。”毛主席对朱总司令说。

“请放心。您也要注意保重！”朱总司令说完，猛然把手抽回来，转身朝前走了。朱总走了二三丈远，收住了脚步，转过头，向欢送的队伍扬了扬手。

朱总司令上火线后，亲自率领着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分路向敌人发起了英勇的反击，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为红军渡赤水河赢得宝贵的时间。

后来，毛主席在军情紧急万分的情况下，不顾冷枪冷炮的危险，带领同志们亲自迎接朱总回来。毛主席还亲手向朱德同志敬上一碗茶哩。

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之间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永今后人景仰。

（选自《星火燎原》杂志 1985 年第 1 期。作者许长庚历任通讯员、指寻员、团政委、师副政委、南宁军分区政委、广西军区副政委等职务。）

7 巧布奇兵赢主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土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被排斥在外的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为二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正如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从而在军事上结束了自

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单纯防御和退却、逃跑路线。事实也证明了，遵义会议后，由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正确路线，红军所向无敌，节节胜利。

此后，我们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攻打遵义之西的鲁班场守敌，打了一夜，未彻底解决，又奉命转移到茅台镇。随之，我们又奉命从这里涉过赤水河，奔赴占商，之后，再转回鲁班场，在遵义之西、鲁班场以东，打了一仗，消灭敌人后，又第四次跨过赤水河，南渡乌江，占领息烽，进逼贵阳。

这是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四渡赤水，接连摆下的巧阵。

蒋介石连连吃了几个败仗，极为恼火，特别遵义这一仗，亏了老本，更是怒不可遏。于是，这位惯于孤注一掷的委员长，于3月24日从重庆乘专机直飞贵阳，要亲自“部署一切，统一指挥”。

当蒋介石到达贵阳，正绞尽脑汁部署他的部队时，毛泽东同志再次“调动”敌人的兵力，给敌人摆了三个阵势：

一部分队伍（包括我二师四团）佯攻贵阳；

一部分部队以最快速度向瓮安、贵定挺进；

一部分部队（九军团）在桐梓一带牵制住敌人，摆出决战姿态。

蒋介石疑团莫释，不知红军何处是虚，何处是实。正在这时，他又忽闻侍从室告急，说：共军已到贵阳近郊。蒋介石顿时脸色突变，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的确，这时我们四团已经占领覓儿关，这里离贵阳机场不远，站在高处可以看到贵阳市里的烟囱了。

此刻，正是初春时节，在北方可能还在飘雪，但在这里蔚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烘烘的，鸟啾莺鸣，河水明澈，柳梢初绿，碧草、鲜花无处不吐露着春的气息。但是，我们无心赏春，我们心中清楚，要的是整个新中国的春天。眼前来说，我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化被动为主动，摆脱蒋介石的追踪，北上抗日。临来前，上级明确交代，此行贵阳郊外，是声东击西，虚张声势，掩护主力从贵阳附近折向西南，往云南边境急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我们大造声势，佯攻机场，采用一切手段，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即红军真要攻打贵阳。

于是，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

“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掉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的白军长官！”

我们还把人集合起来呼口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缩在城里也不还枪。

后来听说，这里由于蒋介石原先错误判断，孤注一掷，把能打仗的部队都集中在桐梓一线，贵阳城里只剩下不多的兵力了。当他忽然听到侍从室告急，说红军逼近贵阳城郊时，怎么不急呢？他等待从长官走出房间，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云南省的省主席龙云，要他顾全大局急派增援部队来贵阳，又亲令湘军李温珩率五十三、五十九两个师赶到息烽保驾。蒋介石又怕我们和第二方面军会合，急令何键到常德监视我二方面军，并调湘军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又是重兵阻拦，又是派人奔袭，又下令尾追……直搅得蒋介石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更无心观望贵阳的春色了。

也就在蒋介石心神不安“团团转”时，毛泽东同志又指挥我们乘虚而入，引导大部队进入黔南山区。3月29日，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连克息烽、定

番、长顺、紫云，渡北盘江，占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一路上，红军势如破竹，军威大振，真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势。就这样，我们摆脱敌人，挺进云南。蒋介石在“迷魂阵”中醒来，想重新部署兵力，却为时已晚，鞭长莫及。我们已经长驱数百里之遥，而且进入多山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的队伍再也不像刚离瑞金时，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那时行军作战，许多同志心中无数，有时白天还不能行军，只能昼伏夜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同志昼行夜宿，10里一个小休息，30里一个大休息。在大休息时，有的喝开水、吃干粮，有的打草鞋、补军衣，行军途中，政治鼓动几乎不断，连那伤病员也都忘了病痛，主动跟上了队伍。我们秣马厉兵，说打就打，士气高昂，而敌人，丢盔弃甲，疲于奔命，一筹莫展。

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全局在胸，运筹帷幄，接连指挥我们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连摆巧阵，大量歼灭敌人，使我军取得有利时机，大踏步前进，彻底扭转了形势。毛泽东同志料敌如神，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摘自《杨成武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7页。作者当时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8 娄山关前捷报传

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为全党全军领导的遵义会议，像春天一样给红军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巨大的鼓舞。

遵义会议刚过，全军上下，求战心切。我当特派员是负责搞侦察的，此心更切，总想痛痛快快地打一次硬仗。但部队攻土城、渡赤水、入扎西，不断运动作战，上级都没给十三团具体任务。我心中不断纳闷，到底怎么回事？真是憋得难受。

2月下旬，心中的闷葫芦终于解开了。我们三军团第三次渡赤水后，军团即命令我团为前卫，日夜兼程，直扑桐梓。憋了一个月的劲眼看得以使出，同志们意气风发，不胜雀跃。可惜，当时桐梓仅有一营“双枪兵”驻守，而且不久前曾被我们扫荡过一次，敌人元气未复，那堪我团一击！我强敌弱，战士们都说过瘾，我也觉得遗憾。其时，彭雪枫团长风尘仆仆赶来，说：“小欧，有紧急任务！”随即递过来一张他亲笔记下的电话记录字条，大意是，彭军团长亲转军委毛主席电话命令：速令十二团务必于今日（2月20日）天黑前攻下娄山关，占领点金山。

看了记录，我惊喜得发怔，自言自语：“啊，毛主席亲自命令！”彭团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亏你还是搞侦察的，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毛主席在每个军团都抓一个团作军委预备队，你当了半年预备队了还蒙在鼓里。”

随即，彭团长叫我马上带领三营先行出发。队伍集合后，他又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说：“主力部队要在遵义一带运动歼敌，再夺遵义城。现在，毛主席亲自命令我团在今日天黑之前拿下娄山关。这是关键的一仗，娄山关拿不下，遵义城难夺，几个军团就无力展开歼敌。因此，这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中央说，我团广西同志多，善爬山，能跑路，更能攻坚，又和王家烈打过几次交道，相信我们一定能按时夺下娄山关！”动员完毕，他又进一步交

代我：待后续部队接防桐样后，他带一、二营随后跟来。还说，不要轻视“双枪兵”，这是人家的地盘，天时地利，敌人全占了。

我们广西兵，自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打了许多著名的仗。毛主席每次接见在红七军工作过的同志时都赞扬说：“啊，广西佬，很能打仗！”我想到这里，浑身热血奔腾，力量大增。对彭团长说：“我们保证按时完成夺关任务，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我和三营营长陈新民和黄教导员立即带领队伍出发。这里离娄山关还有四五十里路程，必须全速奔袭。一路上，我们拼命奔跑，脚不停步，气喘如牛。2月的贵州高原，正是春寒料峭时候，整日阴雨绵绵，道路泥泞，十分难走，个个跑得头顶冒烟，身上冒汗。往日行军路上的歌声、鼓动、说笑声全都没有了，只听到战士嘎吱嘎吱的踩泥声和互相催促快跑之声。大家已横下一条心：要夺关、不要命。毛主席的命令，中央军委的赞扬，变成为一股强大的推动力，推动着我们飞速前进。

当日过午，我们到达大娄山下，云雾开始消散，峥嵘群峰渐渐露出了真容。我纵眼望去，山连山，峰连峰，连绵不绝，眼前群山似一堵巨墙拦住了川南黔北的通道，密不透风，只有眼前凹下的一条山槽，像一条乌龙，百盘十弯，蜿蜒而上，通向关口。我心中不禁暗暗喝彩：真是巍巍雄关，名不虚传。关口左侧是点金山，但视线已被眼前群峰遮挡住了，只见它的山尖尖，隐藏在轻纱般的浮云之中，像一个羞羞答答的少女。

点金山是娄山关的支撑架，支撑起娄山关这呆大而长的杠杆，关口是重心。要夺取关口，守住关口，同时要控制住点金山，否则，杠杆就会变成撬板，把你掀下失败的深渊。显然，点金山是敌我必争之地。

我军脚不停步，立即闯关。山道崎岖，怪石嶙峋，十步八步就得拐弯，十分险恶，有的仅能容一人通过，真急煞人！部队在石丛中拐了十几个弯后，视线才稍稍开阔，隐约可见关口了，左侧的点金山也展现眼前。我举起望远镜，一队队敌兵在督战队的驱赶下，跑步下关，又立即散开两边，抢构工事。看来，敌人也已知道红军要抢关，正在紧张地部署防守。陈营长命令部队暂停前进，先观察好进攻路线，再实施攻击。命令刚下，前哨九连已响起了枪声，开始与敌人遭遇了。但仅响了几枪便又沉静下来。我与陈营长和黄教导员隐蔽在一块大石后面，想仔细观察地形，确定进攻路线。讨厌！这里的地势极其复杂，换个角度就是另外一个形态，刚才还看到小路隐没于石丛草木之间，转眼就只见石头不见路，进攻线路确实难选择。陈营长一急，干脆站起身来举镜观望，刚听得他喊了一句：“前面有敌人！”接着是“叭”一声枪响，他即应声倒地，望远镜甩到一边，话也不能说了。

我心头如同塞进了一块石头。黄教导员流着眼泪，向我请求：“特派员，我代理营长，带部队上去，不夺关誓不回头！”我见他脸色铁青得如同眼前的岩石，拳头握得直发颤，牙齿咬得咯咯地响，呼噜呼噜地大口呼吸，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我苦苦思索，没有立刻答应他。眼前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敌人已抢先夺关，居高临下，我军肯定是要仰攻了。我们的战士在山地攻坚战中都是精似猴，猛如虎的，对此我十分信任。难就难在于复杂的地形中作战如何收拢部队，增强突击力量，以取得更佳战果，看来只能现场见机行事了。我对黄教导员说：“好吧！你带九连先上，叫廖连长来一下。”不一会，九连连长廖九凤挽着袖子下来，我只交代他12个字：“单兵跃进，班组收拢，勇猛攻

击。”黄教导员冉明确了任务，攻关就开始了。

说攻击，双方却没枪声。敌人大概有险可据，有恃无恐，先使烟枪，大过烟瘾，敌人使烟枪，我军的钢枪也失去射击目标，战士们舍不得乱开枪。九连上了两个弯，还未跟敌接上火。我就命令七、八连照九连的办法，单兵依次跃进。接着，我带着重机枪连殿后跟上。转过山弯，这里地势稍高，视野平展，重机枪火力好发挥，可控制关口，也可压制住点金山。我叫重机枪连连长黄玉祥，迅速构筑好机枪阵地，火力支援九连。

没料到，重机枪还没架设好，关口上，点全山上，机枪声大作，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落在我们周围石头上，打得石硝迸爆，白烟弥漫。九连正面的两侧敌人，也从石缝、草丛中钻出，胡乱射击。黄连长来不及组织火力，急得大声吆喝。我叫重机枪射手先瞅准敌火力点，压住敌人。不一会，廖九凤连长气呼呼地跑回来，要求改变进攻线路。最后，他眼含泪水，痛苦地向我报告：“教导员牺牲了，还伤了几个同志。”我一听，如雷轰顶，头上像被重击了一下。关还未夺到手，三营主将一伤一亡。与手下败将交手，却是如此开局，实在怒火难捺。我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详细询问教导员牺牲经过。原来，突击队要通过一条不长的石头通道，通道前面有一块球场般大的开阔地。廖连长已带了一个组突了过去，接着通道被敌人机枪封住。教导员带着一个组跟上去，刚到口子就被打倒了。廖连长怕后面部队不了解情况，遭更大的损失，便冒着弹雨折回，报告情况。我听了立即作出判断：一、正面敌人已事先组织好了火力，这仅是第一层，恐怕前边还配置有两三层。正面强攻，虽可突破，但要付出重大伤亡代价；二、敌人防御纵深很具规模，其日的一要阻滞我军进攻速度，二要掩护他们的部队过关。于是，我同意九连改变进攻线路，指着点金山对廖连长说：“从左后侧绕上去，拿下点金山，再往关上压。敌人可能会增兵点金山，如果半途遭遇，就用小分队牵制，不要动摇夺关决心。”这时，机枪连已构筑好阵地，我又命令黄连长：用机枪人力压住敌人，掩护部队再展开攻击。

我目送廖连长率部翻过山背，就从那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显然是与增援之敌遭遇上了。如光打阻击，我九连一连人可顶住敌一个团。可眼下既阻击又攻山，兵力就不足了。于是，我又命令八连连长带上两个排急速支援，专打增援之敌。

我部署刚刚结束。关口正面枪声骤起，原来是关上之敌，由军官督战，缩头缩脑，向我阵地扑来。我心中恨痒痒的：给黄教导员报仇的时候到了。招呼重机枪连连长沉住气，待敌靠近目标充分暴露时，一下子收拾他们。“双枪将”见我不动声色，以为立功时候到了，压着“双枪兵”蜂拥而上，后面三个机枪人力点也狂乱扫射，掩护冲锋。

近了，我向黄连长打个手势，黄连长大喝一声：“打！为教导员报仇！”我六挺重机枪同时开火，手榴弹和各种武器也同时倾泻在敌群之中，敌人纷纷倒下，三个机枪火力点也被同时打哑。敌军官拼命呼叫火力支援，但他们的机枪已难复活。黄连长问我是否乘机冲锋，杀敌夺关，我说还未到火候：一、点金山尚未到手，敌人会从左侧火力支援；二、敌人在关上的火力情况未明，要吸取通道口的教训。我命令按兵不动，光吹冲锋号。

“双枪兵”一听我军号响，吓得魂不附体，没死的纷纷从地上爬起往关上逃去。这样，我估计通道口的威胁暂得解除，便命令七连派两个组试突通道口。结果竟安然无事。于是，我令七连分成小股队伍，突过通道口，逼近

关隘，待九连攻击点金山得手后一举攻关。

十几分钟后，点金山上响起了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这说明我九连已攻到山上。不一会，点金山上展起了红旗，九连侧攻成功了。我重机枪配合默契，即将枪口全调下关口，上下轮着打，打得敌人无还手之力。我九连拿下点金山主峰后，马不停蹄，居高临下往关口压去。我机枪主力刚伸延，七连和八连的另一个排，便配合着九连，从另一侧攻关。八连两个阻击排也抽出一个排去接替九连点金山阵地。整个战场势态我军已尽占主动，眼看关口就要拿下了。

此情此景，使我感慨万分。自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至今已一年多了，没打过这样活的仗，没看见过这样积极的配合协同。遵义会议一开，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又恢复了。

娄山关上的枪声沉寂了，我估计部队已夺取了关口。果然，九连的通信员兴匆匆跑来报告：娄山关口已经拿下，请求指示。我即令机枪连收枪随指挥所往关上移动。我上得关口，四下一瞧，哪有什么关隘，只有两间草屋，那是往来行人歇脚的粥棚，路边倒真的竖有一石碑，刻有“娄山关”三字。我再举目远眺，四围群山空兀，无路可通。南来北往唯此一山槽通道，确实险要。我暗笑王家烈的“双枪兵”无能，要是红军一个团据守，敌人一个师休想过关。

说来就来，我刚令九连回点金山阵地防守，敌人就反扑上来了。

点金山下，娄山关前，黑鸦鸦的人头，向我蠕动。敌人采用的战术，实属罕见：先上的不急于进攻，却拼命地挖坑（单兵掩体）；后上的到了前面也是挖坑。我忽然明白：敌人想以兵多势众，硬挤我出关呢！于是，我下令各连，立即组织反击，不让敌人立脚；反击要突然爆发，迅猛冲入敌群，刺刀见红。

部署完毕，我军所有阵地统一行动。我一声令下，喇叭声响，勾敌魂魄。我军杀声震天，几百勇士在重机枪掩护下，像山洪暴发般冲下山关，白晃晃的刺刀直杀敌阵。“双枪兵”哪见过这等“抓人摊”场面，吓得丧魂落魄。后面的扭头就跑，前面的吓昏吓瘫了，有的连举手缴枪动作也不会了，只会缩脖低头打哆嗦，等着当俘虏。敌人见反扑失利，便命令远处的机枪向半山腰扫来，我们虽受些伤亡，但大部分子弹却打中了他们的士兵。我们的重机枪立即开火压制，敌机枪便不响。

把敌人反击下去以后，我便派通信员向彭雪枫团长及军团报告：黄昏前已夺下娄山关，并占领了点金山。但兵力嫌薄，难以追击敌人，现正对峙中。通信员走后，我即带两挺重机枪上点金山。还没上到山顶，敌人就第二次反扑上来了。王家烈军阀部队这种“顽强”是过去没有的。我不禁诧异起来，就蹲在石头旁，观察其中奥妙。只见一群群敌人，只埋头往上拱。前面的被击倒了，后面的也只是愣了一下，回头看看山下，既不敢往上冲，也不敢往后退，有的像呆鹅似地站着不动，有的装成负伤伏在地上，都成了我们的活靶。我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正好，一个漏“点名”的烟兵送上门来。他连爬带钻，一头扎进离我二三十米远的石缝里，伏着不动。我命令身边战士把他捉来。那战士飞步下去，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提了上来，甩到我跟前：“我们首长要问你、老实回答。”这家伙大概半是吓昏半是烟瘾上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呆了好半天才颤声地说：“我……两天没……没烟抽了，旅长带……带青督……战队，谁不上就毙，上来了打回……回头也……毙，这

次他……封锁了半……山腰，回不去了。”

原来如此，贵州军阀太残酷无道了。我叫机枪组快上山顶，架上机枪专对付敌督战队，借此瓦解敌军。在山顶，四周景物一览无余。关前几百米内起伏地段，一群敌兵在抢构工事；山脚下小洼地里，一个戴大沿帽的敌军官在指手画脚，在他面前，是一队军官，端着清一色冲锋枪，还在不断往山腰扫。我问俘虏：“后边那个，是不是你们旅长？”他揉揉眼屎，仔细看着，怯怯地说：“是，是……的！”我叫过几名神枪手，配合机枪。直瞄准那敌旅长。然后，我们集体喊话：

“白军弟兄们，不要为你们长官卖命了，你们回头看看，他们怎样对待你们！”

这一喊真灵，半山腰上的敌人，个个一齐回头看自己的督战队，整个阵地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敌人督战队慌忙开枪压阵。我决心打下他们的威风，朝我们的神枪手下令：“打！”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子弹像长了眼睛，可恶的敌旅长应声倒地，督战队也倒了一排。我们再次集体喊话：

“白军弟兄们，你们的旅长被我们打死了，我们不打你们，快回去过烟瘾吧！”

这一喊，“双枪兵”就像接到命令，呼啸一声往回跑。树倒猢狲散，连督战队也跑个精光。为了进一步瓦解敌军心，我军信守诺言，不追击，也不射击。

天渐渐黑下来，四野黑寂，只有偶尔一两声冷枪，那是敌人在壮胆。稍远处，隐约可见几星微弱的火星时明时灭，“双枪兵”又要过烟瘾了。我想，敌人白天被打怕了，不敢斗胆跟我们夜战。但关前敌人起码三倍于我，毕竟是个威胁，不可掉以轻心。便决心在大全黑后出击一下，把敌人撵远一点。于是，我命令七连出击。

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战士们龙行虎步，在夜幕下逼近敌人。刚刚甩出一排手榴弹，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四散奔逃。我军未予追赶，一边喊杀一边朝人影处放了一排枪。敌人一下子跑远去二三公里。

这时，彭团长带着二营支援来了。他问了一下战斗情况后，也觉得夜间敌情不会有太大变化，他向我传递了喜讯：军委、军团通报表扬十三团在这次娄山关遭遇战、攻坚战中打得精，打得猛，我见二营上来了，便提出夜间出击，扩大战果。他没正面答复我，反问：“你猜猜关前有多少敌人？”我说，不就是一个整团，1000多。他摇摇头：“哟！我的同志哥，怪不得彭军团长说广西马骝打起仗来不要命，不管是大象还是老虎，照冲照杀。你打了一天还不知道对手有多少？足足一个师四个团哩！”说罢，他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饭盒，命令我们吃饭，各连队的饭也由二营包送了，一人一份。这时，我才记起，整个三营整天粒米未进，顿觉饥肠辘辘。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彭团长介绍整个战局形势。王家烈得悉我军已全部返渡赤水，亦料到遵义难保，但又凭着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的中央军渡乌江给他撑腰，便派出4个团抢占娄山关大险，阻击我军。其中一个团已绕道板桥，驰援桐梓；我军团第十一团已迎击，以截断娄山关之敌后路。其余三个团的敌人，一个团想通过关口，抄捷径增援桐梓；两个团抢关守关。结果，全被堵在关下了。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我军团改变了原订计划，决心改抢道为聚歼敌人。具体部署是：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围歼娄山关之敌，十一团绕道去堵口子，防止敌人逃脱。

听了彭团长的介绍，我极感兴奋：原来，斩关夺寨，仅仅是一个大战役的前奏曲，好戏还在后头。我仰望夜空，恨不得快点天亮，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大仗。奔袭、战斗了一天的疲劳，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夜无事。次日天色微曙，战斗的枪声便从敌阵中响起。敌人急于夺关过关，集中兵力，向关口发起冲击，敌进攻队形，简直是搞分列式，一排士兵后面是一支督战队，接着又是一排士兵一支督战队。昨天傍晚战士们打敌督战队打出经验来了，不到有效射程不开枪，任凭敌人抖抖臭威风。彭团长觉得有点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马上有好戏看。”话刚说完，机枪就先开了火，一下便把敌人最后梯队的督战官打得七仰八倒；接着步枪也猛烈开火，专打督战队，把所有的督战队一片一片的击倒。这么一打，整个敌阵乱成了一窝蜂，可怜可笑的“双枪兵”左右夺路逃命，仍不敢往后退。

彭团长看了这场面，连声叫好，他以商量口吻对我说：“出击一下吧？”我说你来了你下令，我想去冲锋。他一声出击令，两个营的战士呼呼地往下冲。本来敌人士气就不高，怎经得起我军如下山猛虎般的冲击，仅在我们阵地前沿就消灭了敌人好几百。

这时，十二团前来接防，我莫叫其妙，三营伤亡不大，何必换防？彭团长笑着说：“这是真的，但不是撤下去休息，而是去爬山、跑路，兜敌人屁股。谁叫十三团跑路、爬山出名呢，这是彭军团长亲自点名的。”

我们只好服从命令。迅速交防，撤出，迂回奔袭而去。到了预定位置后，十团居右，十三团居左，沿山往回打。三个团的敌人，已被团团围住，即将被全歼。

战斗还未结束，我又受军团之命：带两个连，连夜奔袭鸭溪、刀靶水，接应原五师师长李天佑所部及直属队，并实施侦察。毛主席准备在这一带开辟战场，诱歼大股敌军。于是，我带两个连队，连夜出发

等我完成任务回来，我军已全歼娄山关之敌，第二次攻占遵义城；几个军团已全线展开对盘据在老鸦山、刀靶水、鸭溪一带吴奇伟等中央军的攻击。气魄之大，战斗之猛，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还未有过的。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入夜后，战火映红了天。在这场大混战中，毛主席的运动战战略战术高度发挥，红军打得出神入化。战士们个个吐气扬眉，痛痛快快地打了一场出气仗。在这场大混战中，我带着两个连横扫直扫，战士们打得发了疯似的，见敌就打，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什么章法，有点像三国志中的赵子龙。我们追打了两天，才在乌江边上遇上了正在追击逃敌的十三团。九连连长廖九凤洋洋得意地对我说：“还是打中央军发财，打一次可以换一次装备。不像娄山关打‘双枪兵’，缴的烟枪都比钢枪新。”这时，彭团长也迎上来，兴奋地说：“小欧，你猜这一捶收拾了多少敌人？”我信口说，八九个团吧？他刮我一鼻子：“妈妈地，你成了小保守了，整整二十个团，四个整师！”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军团马上要开攻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的祝捷大会。会上，十三团代表总得说几句话，说些什么好？”我笑他说：“团长，亏你几次进出遵义城，把根都给忘了。没有遵义会议，我们这阵可能被赶下长江喂鱼了，还想祝捷？”他一拍脑袋：“对、对、对，力量源泉出自遵义会议，发挥在娄山关上，就这样，就这样！”

娄山关战斗后，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同志，曾作《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纪念娄山关战斗胜利。这首词，意境深远、气势磅礴，不仅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更是党史军史上难得的一篇史诗宏文。数十年来，我经常背

诵这一名篇，以激励自己。

（节选自欧致富：《我的红军时代》，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74—287页。作者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
十三团特派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二、草地雪山路漫漫

1 挥师抢渡金沙江

1935年4月下旬，我们一方面军从贵州西南的盘县、兴义之间西进到云南境内，攻占了沾益、马龙等城，迅速通过了滇黔公路，向昆明以北的嵩明、禄功一线西进，侦察北渡金沙江的渡口。

当时，由于没有地图，对云南的地形道路很陌生，靠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全军都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位置在哪里，仅靠询问向导探索前进。这时，中央军委指示各部队应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小比例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

4月28日，负责打前站的管理科长刘金定同志和我，带领先遣分队——侦察通信队，直往通向昆明的公路行进。大约走了一小时左右，我俩同时发现西南方向升起一道飞扬的烟尘，正向我们滚滚而来。目标越来越大，大约距我们尖兵班五六百米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汽车来了，是敌人的汽车！”瞬间，刘金定、我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同志，不约而同地发出“向左侧沟里卧下，瞄准汽车准备射击！”当汽车离我们60米左右，排子枪的子弹嗖嗖飞向车轮，敌人的汽车兵已经感到轮胎漏气了，既不能向前，也倒退不了，便刹车停住了。我们立即涌向车前，命令驾驶室里的两个敌人：“举起双手来！”他们高举两只手，哀求道：“请饶命！我们投降！”把这两个俘虏的武器收缴后，我领一个侦察班掀开汽车后面的蒙布，跳上车箱里检查，没有发现武器弹药，但有两个大包皮和若干包装很好的小木头箱子。我先打开一个皮包，翻开一看：地图，云南省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我站在车厢里大声这样说。顿时，车上车下的同志们都兴高采烈地齐声说：这下我们可以知道渡江的地点了，当我们用汽车工具箱里的钳子、榔头敲开一个木箱时，啊！全是小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是云南白药。从说明书看，这是医治跌打损伤特别是止血的特效药品。大家又是一番热闹。真是两件宝呀！我们正需要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敌人就送货上门，真可谓是“雪里送炭”！我们很快就把这两种“珍品”从汽车上卸了下来，放在路旁，改成能挑运走的轻便担子。

刘金定同志审问那个军官，得到的口供是：薛岳到了贵阳，奉蒋介石之命，要率部向云南追剿我军，但没有云南省的详图，也缺乏医治伤兵的药品，于是就向龙云写了一封信，派其副官乘车前往昆明，请求支援。龙云看了薛岳的求援信，批给了云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图10份，白药10箱。这个军官就是薛岳的副官，他在昆明吃过午饭，乘车返回贵阳途中，不料遭我军射击，汽车轮胎跑气，不能动弹，当了俘虏。

太阳下山的时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等中央军委首长，同总司令部直属单位来到附近村庄，同意在此宿营。按照打前站同志划定的区域，各单位依次进驻营房。

毛、朱、周、刘首长进屋以后，刘金定和我立即向他们汇报缴获汽车、

审讯俘虏口供，以及获得的云南地图、白药等情况。毛主席听了特别高兴，风趣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就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当然，你们两个参谋在先头带领侦察通信队发现这一突然情况后，机变行事，处置得当，才使这辆汽车没有跑掉，既缴获了地图、白药，又活捉了军官，打得很漂亮。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对薛岳的那个副官，侦察科要再详细审问，从中了解敌人的底细，汽车兵知道情况不多，如果没有什么油水，就可以释放他走。”我俩把毛主席的指示，向侦察科做了传达。第二天上午，侦察科报告说：对这个军官审讯到半夜，问不出很多新情况，就让他睡觉去了。他趁看管不严，于拂晓潜逃了。

吃过晚饭以后，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刘怕承、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集在作战科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周副主席先让当天值班的孔石泉、王辉两个参谋汇报了当晚我第一、三、五、九军团能够到达的地点，接着要第二局曾希圣局长谈了对敌情的估计与判断，然后叫我对照刚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把军委纵队与第一、三军团从所在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绞平、洪门三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200公里，最远为230公里），用红铅笔描画出来。毛主席听了上述三个汇报后，请刘、朱、周首长谈谈如何部署兵力，迅速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的意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各自的看法。这时，已经深夜11点了，毛主席最后综合了到会同志的意见，讲了三条：

一是，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行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是，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是，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一方面军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如果大家同意这一作战方针，我提议具体的兵力部署如下：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央军委纵队，提议由刘伯承同志率领，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绞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具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绞平、洪门三个渡口是上策，万一敌人先我烧船，能占领其中的一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

北岸。因此，要不怕疲劳，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的轻装营，进至嵩明以南的杨林附近佯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产生错觉，以为我军要攻占昆明城，其主力随军委纵队之后，向西北的金沙江方向跟进。为了阻滞敌人的尾追，不免要受一些损失，为了全军北进的利益，这是必不可免的牺牲，应从政治思想上向该军解释清楚。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毛主席的上述作战方针和渡江决心，为到会同志一致称赞，表示完全同意。

孔石泉，王辉两同志，按照毛主席刚才口述的记录，立即拟写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作战部署与指示的电文。当发给各军团的这一万万火急电报送请周恩来副主席审阅签发时，已经是鸡鸣报晓的时辰——4月29日了。这就是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的由来。

1935年5月1日，毛主席和其他军委首长到达小仓街以后，再次发出了一军团火速抢占龙街渡，三军回抢占洪门渡，刘伯承、宋任穷同志率领干部队一个营加工兵二十九分队抢占绞平渡的指示。但当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达龙街渡口时，渡船刚被敌人烧毁。加上那里江面宽，缺乏架设渡桥的器材，又易受敌机的骚扰，无法渡江；三军团进占洪门渡口后，虽然缴获了两只小船，但每次只能渡十余人，仅北渡了一个团，拖的时间很长，而江水流速又太急，也无法架设渡桥。只有刘伯承、宋任穷同志带领的干部团，于5月3日凌晨抵达江边，缴获了两只木船，偷渡到北岸成功，并消灭了四川军阀的一个连的守敌，完全控制了绞平渡的南北岸。尔后，又在上下游寻找搜获了5只木船。这7只木船，大的能乘30余人，小的只能乘10余人，每次能渡150余人。经计算，昼夜不停摆渡，全军需要5天才能渡完。如不能紧密衔接，则需要的时间更长。而左右两纵队距绞平渡口有两天以上的行程，怎么办呢？只有加重五军团的后卫掩护任务。为了保证主力红军能渡到北岸，毛主席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到五军团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向江边前进，以赢得6天的时间，给主力红军渡江。

当时蒋介石在贵阳，从飞机的侦察报告中，得知我先头部队已抵绞平渡，他心慌意乱，气急败坏，没有预料我军如此神速，其尾追部队被甩得老远。蒋介石急忙飞抵昆明，坐镇指挥，调整部署，妄图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迫我背水作战，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把红军“围剿”于金沙江以南的深山峡谷地带。他除了要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火速前进，天天派飞机轰炸外，于5月3日，急令已经到达团街附近的万耀煌第十三师，全力向绞平渡口尾追我军，保持火力接触，不让我军摆脱，以利周、吴两纵队迅速向该师方向增援。

战争也如同其它事物一样，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并不会按蒋介石的主观意愿发展。第十三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万耀煌又是个老奸巨猾的军阀，蒋、万之间有矛盾。万师虽有3个旅9个团共1万多人，却力图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他的先头部队与我五军团的后卫第三十七团火力接触后，遭我猛烈反击，便于团街构筑工事，固守不动了。万耀煌深知若按蒋介石的命令办，就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我军就会趁机吃掉他；若只与我后卫部

队保持接触，不尽力追击，吴、周两个纵队赶到后，必然说他作战不利，蒋介石就会借机将其吞并。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万耀煌想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于5月4日晚，向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谎称：他派侦察队严密搜索，在前进的方向上，尚未发现共军的任何行迹，故决定在原地休整一天，俟查明共军去向，再尾击而剿之。5日晚上，万又向蒋发电继续谎称：经过一天的侦察，前方仍未发现共军，6日拂晓前如无新的训示，他率部队从团街以南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它方向“围剿”共军。这是万耀煌的退兵之计。其实，他在发出这一电报后，就已经命令部队往后撤了，拂晓前哪能收到蒋的指示呢？蒋介石接到电报后，怒气冲天，向万耀煌发出“限即刻到”的手令，断定飞机侦察共军确实已经从绞平渡到了北岸，令其仍从团街向绞平渡口全力追剿，如再违令，将按军法从事。万耀煌收到这份命令，已经是6日半夜了。他向蒋介石回报说，他率领部队将于7日再向团街前进。从万耀煌先头部队进抵团街，到他部重新返回，延误了3天多时间，加上从团街以南到绞平渡口还有两天多的路程。这样，我军就赢得了必需的渡江时间。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率领军委纵队，于5月3日晚上赶到了绞平渡，在北岸组成了渡江指挥部。军委纵队于4日渡过了金沙江。在相继收到了三军团和一军团不能从洪门、龙街渡江的电报以后，又侦悉万耀煌要保存实力，往回缩的情报，认为利用敌人“给予”的这段时间，可以迅速地把一、三军团调过来渡江。5月5日上午，毛主席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一道来到设在一个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因一支红铅笔指画着一幅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地图，示形而又风趣地对我们几个作战参谋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当然，两者的情况不同。我们听了，都为主席巧妙利用敌人矛盾，果断的指挥艺术叫好！毛主席当即指示我们：命令第一、三军团分别从龙街、洪门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绞平渡汇集。部队按指令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8日中午全部到达北岸。第五军团在完成了掩护一、三军团渡江任务之后，也全部安全地过了金沙江。

我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经过周副主席的严密组织及时调度，依靠7只小木船，用了6天时间，于1935年5月9日上午，全部抢渡完毕。当万耀煌师10日赶到江边时，渡船已在北岸烧毁，一无所获，只好望江兴叹！红一方面军顺利渡江，为北上抗日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蒋介石妄图把我军“围剿”于金沙江以南的计划，则成了泡影。

总政治部宣传队，为了颂扬毛主席挥师安全渡过金沙江，没有受到损失的英明决策，特意写了一首向部队进行宣传教育的诗歌：

白军内部有矛盾，
对我抢渡很便利；
万阀不战龟回缩，
全是为了保实力。
再下手令追剿时，
主席挥师已北进；
江南剩双破草鞋，

蒋贼气得哭丧病。

（摘自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182—192页。）

2 一条棉被一件大衣

1934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多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山是一座高山，河又是一条大河，河面很宽，水流也很急，老远就听到河水哗哗地流。走近河边，见河堤足有三四丈高。我（即傅连璋——编者）骑着马走在这条路上，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高楼顶上往下看了一眼一样，不禁有些头昏眼花。

部队人多，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路又窄，不免有些拥挤。我拉住缰绳，想尽快地让马走过这条窄路，好让后面的同志走。谁知这一带泥土松，马一失脚，立刻连人带马跌下河去，只觉眼前像打了个闪电一样，哗地一亮，随后就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只见自己躺在河边上，旁边聚了一大堆人，都提心吊胆地看着我，警卫员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警卫员扶着我爬上了河堤，我们就跟着队伍继续前进。

我想起了那匹马，问警卫员，他说：“冲走了。你看这水多急！你幸亏掉在河边上，水浅，没给冲走。真把我吓坏了，我现在心还跳呢！”

我听了警卫员的话，笑了，说：“革命嘛，还能不碰到点危险！我现在都好了，你还心跳什么？”

警卫员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谁知道呢！”

我这匹马带着我走了多少崎岖的山路，帮助我减轻了长途行军的疲劳，现在却被淹死了！马上还放着我的毯子和被子！这下可糟了，这么冷的天，夜里没有盖的，怎么办呢？

过了不多时候，毛主席的警卫员来了，他手里抱一条被子，见到我，说：“傅医生，你跌坏了没有？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派我来看你。”

毛主席怎么知道了？还派人来看我！我心里一阵热，急说：“就是头上跌破了点皮，身体很好，你请主席放心吧！”

他把手里的被子放到板凳上，说：“这是主席叫我送来的。”

被子？送给我？这怎么行呢！氏征途中，谁带的东西都很少，毛主席的行李也不多，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就是那一天，毛主席在前面走，警卫员牵了一匹马跟在后面，马背上驮着他的行李和文件箱，我看到毛主席只有一条被子、一条毯子，现在他把被子给了我，就只有一条毯子了。这样的大冬天，宿营地又都是偏僻的冷房子，夜里只有一条毯子，怎么能御寒呢？

警卫员给我搭了个铺，要我躺着休息一会。

我躺到铺上，盖上了这条被子。这是一条白布被子，被面和被里都是用一种布做成的。我把两手伸在被子外面，手一触到柔软的被面，就不自觉地抚摩了几下，一时有股暖气从手上直穿到全身，浑身都暖呼呼的。这是毛主席每天盖的被子啊！现在却盖在我的身上。想想自己，只不过是普通的医生、一个革命队伍里的新战士，却得到了伟大革命领袖如此深厚的关怀！

我越想心里越暖，就好像太阳晒在我身上一样。

1935年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我（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编者）给主席搭好了铺，准备请他来休

息一下。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桌上布满了地图，主席正和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等首长谈话。听说腊子口是甘肃、四川两省“天险门户”，也是我们到陕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因此没吭声就退了回来。

果然，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打下了腊子口。9月下旬，我们又通过了渭水封锁线，继续向六盘山前进。

六盘山是陇山山脉的支峰，也是我们到达陕北的最后一个高山。翻越六盘山那天，出发的时候，天空就布满了黑云。走了不一会，疾风一阵紧似一阵，而也忽啦啦地下起来。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

六盘山和我们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虽然不是最大的，但一上一下也有60里地。刚上山还有点树扶着，快到山顶时树也没有了，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但身体还很虚弱，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只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主席见我这样，就问我是怎么的。我说：“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主席把我扶起来，以为我又犯了疟疾，便叫警卫员曾先基同志把卫生员钟福昌同志找来，拿药给我吃。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要主席先走，我休息一会儿就走。主席见我这样，便说：“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说着便要曾先基同志架着我走。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也想快走，谁知浑身战抖个不停，一步也迈不开。主席又问我：“你是不是冷呀？”我说：“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主席看了看我说：“来，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再喝上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说着就脱大衣。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不，我不穿，我能走。”我知道，主席要是脱下大衣，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我坚持不穿，挣扎着想走，但终因我身体太弱，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主席站在旁边，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呆呆地望着主席，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主席对我说：“好些了吗？”我说：“好了！走吧！”主席说：“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

傍晚的时候，我们走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我躺在铺上想：如果没有主席的关怀，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摘自傅连璋：《长征中的雪里送炭》见《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回忆录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19页。作者当时负责红军总司令部领导人的保健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见《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219页。作者当时任毛泽东的警卫员。）

3 罚警卫员不睡觉

1935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到的第一条大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我们船只很少，大家很着急。毛主席更是忙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

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天快拂晓，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一下船，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我去给他找房子，安排住处。

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没有什么房屋，只有四五个不像样的洞子。洞子里湿得很，没有木板，就连稻草也找不到。我只好把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

过去一到宿营地，搭好了铺，我就和秘书黄有凤同志把主席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品都拿出来，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可今天，一来没有办公桌，二来黄有凤同志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公呢？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这洞子是沙土的，根本挂不上。没有桌子，办公用品也无处摆。这时，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他累了一夜，回来一口水也喝不上，那怎么行呢！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亮以后，主席回来了，派人去叫我。我一进洞口，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我说：“主席回来了。”主席答应了一声，接着问我说：“都弄好了吧！”我指着地下的铺说：“好了！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铺只好搭在地下了。请您先休息一会，水马上就开了。”说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还没有走出洞口，主席就把我叫住了：“办公的地方呢？”我随口答道：“黄秘书还没来到，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您，您先喝点水吧！”主席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向前迈了一步，用严肃的、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心里怦怦直跳，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我这才恍然大悟，飞也似地跑出了洞口。

好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品。摆好办公用品，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便想去取来。我刚想迈步，就听见主席叫道：“陈昌奉！”我说：“有！”“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刚架起来的“桌子”对面。主席说：“我今天要处分你呢！”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这种紧张，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责。我不知该怎么办，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呆呆地望着主席。主席接着说：“我罚你一天不睡觉，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好吧！”就在对面坐下来。主席的办公“桌”上摆满了文件、电报，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我看主席忙的一点空也没有，心里很难过，眼圈也湿起来。心想，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也许不致使他忙成这样。

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是一句笑话；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并微微发笑，我更不知如何才好。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给他凉了一杯，才又坐下来。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主席站起来对我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

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他停了一下，走近我，用手抚摩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好了，快去睡觉吧，两个眼皮都打仗了。”听了这话，我更不愿动了。主席又说：“快睡去吧！”这时候，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当时只觉得像在家里作错了事，父母不责难我，反而说：“好了，以后记住，玩去吧！”一样，心里翻腾的厉害。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

（节选自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见《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3—215页。作者当时任毛泽东的警卫员；建国后曾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4 关怀和爱护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重新主持军委工作、亲自指挥红军作战。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打胜仗。

当时，经常遇到敌人的堵截，也经常遇到敌机的轰炸，我们当警卫员的非常担心首长的安全，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在一起行军，我和毛主席警卫员胡昌宝同志跑前跑后，照顾他们的生活，保卫他们的安全。

一大下午3点多钟，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行军，到达了云贵边境的北盘江一带，人困马乏，正准备大休息，突然窜来3架敌机，疯狂地向地面扫射、轰炸。同志们迅速隐蔽起来，可毛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警卫员胡昌宝同志急忙跑过去，一面催促毛主席赶紧去防空，一面收拾地图。毛主席刚起身，只听，“轰”的一声，炸弹在胡昌宝身边爆炸了。毛主席急忙转身奔过来，俯身望着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胡昌宝，心疼地问：“昌宝同志，很疼吗？”胡昌宝同志艰难地说：“主席，您……没事吧？”毛主席从自己的军用水壶里倒了一杯水达到他嘴边。胡昌宝深知长征途中，一滴水都是非常宝贵的。他吃力地说：“主席，我不……您留着喝吧？”毛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亲切地催促道：“快喝吧！喝点水会好些。”胡昌宝费力地摆摆手，示意毛主席赶快防

毛主席让人找来担架，一看是用硬梆梆的木板钉的，连点铺的也没有，就亲自到附近树林里拣来树叶子，在担架上铺了厚厚的一层，然后把胡昌宝搀扶到担架上，又把自己仅有的一条夹被盖在胡昌宝同志身上，还插些树枝做伪装，并对担架员说：“路上要走慢些，不要颠着。”直到担架走了很远，毛主席才移动脚步。这时，毛主席心情特别沉重，话也很少。

部队继续行军，忽然，一个担架员满头大汗喘着粗气，含着眼泪向主席报告：胡昌宝同志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毛主席听了后，含着热泪来到胡昌宝遗体旁边，抚摩着胡昌宝同志的遗体沉痛地说：“这样一个好同志牺牲了，太可惜了。我们把他掩埋起来，在坟上立个牌子，到宿营地开个追悼会。”这深沉的话语，倾注了毛主席对一个普通战士的无限深情啊！

1935年6月，我们来到四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决定野外宿营。这里的气候炎热，土地潮湿，树木葱茏，杂草丛生，地面上积着多年腐烂的树叶，潜藏着蛇、蝎、蚰蜒等多种伤人的

爬虫，露宿很容易遇毒虫伤害。可怎么办呢？天下无绝人之路，人多智慧多，不知是谁想出了在树林里露宿拴“吊床”的好办法。就是把背包带拴在树与树之间，把夹被或雨布拴在背包带上，大家管它叫“吊床”。这“吊床”真像是“摇篮”，睡起来既安全又凉快。毛主席看到我们这个办法好，就和我们一起拴起“吊床”，一边拴，一边和我们开玩笑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睡‘天床’，小心不要从天上掉下来，把屁股摔两半了。”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主席放心，我们有‘老天爷’保佑，不会摔着。”夜里，大家在树林里，睡在“吊床”上，面对满天星斗，伸直疲乏的身躯很快就进入梦乡，可毛主席却一个一个地为我们检查“吊床”，看到大家在“吊床”上都睡好了，自己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大家都感到舒服解乏，浑身轻松。可吃饭又成了问题。在这缺吃少穿的少数民族地区那有粮食吃，于是，我们就漫山遍野地找起了野菜。万没想到，这富饶的山林竟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野味佳肴，什么黄花菜、紫菜、苋菜、蘑菇、木耳等还真不少，结果没用多长时间，我们就丰收而归。用洗脸盆和刷牙缸煮起来，放少许盐，还真有点味道哩。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品尝着我们煮好的野菜，高兴地说：“小鬼，你们真有办法，看来我们红军是不会饿死喽。”

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开始爬雪山。山下炎热，一片绿洲，百花盛开。山上白雪皑皑，寒气逼人，寸草不生。可当时，我们身上都是单衣，有的还穿着短裤，脚上穿着草鞋，而且早已破烂不堪。毛主席和我们一样，穿着那身褪了色的灰布军装，脚上穿着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身背一块雨布。开始大家情绪很高，一鼓作气爬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左面是积雪的山谷，右面是陡立险峻的雪壁，道路更加艰难了。大家小心地踏着先头部队用刺刀挖的脚窝，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挪动，一不小心，就有滑下雪崖的危险。这时毛主席不断嘱咐大家，要小心谨慎，稳步前进。特别对我们这些“小鬼”，更是关怀备至，一会儿扶着走，一会儿拉着爬。不是我们照顾他，而是他照顾起了我们。行进中，不时有人掉下雪崖，大家就用绑带连起来，把掉下去的同志拉上来。越往上爬，气候变化越大。一会儿大雾弥漫，使人好像腾云驾雾，一会儿狂风卷起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风雪吹在脸上，像刀割般疼痛。同志们打着哆嗦，一步一停，快到山顶时，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卷着积雪，刮得天昏地暗，简直要把人卷走，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毛主席把我们几个“小鬼”叫到他身旁，把他的雨布撑起来，用他那两只有力的胳膊支撑着，像一张巨大的风帆，为我们挡风遮雪。暴风雪在我们周围狂叫着，我们紧缩着身子偎依在毛主席身旁，觉得非常温暖，好像有一股巨大的暖流温暖着我们全身。直到暴风雪过后，我们才继续前进，跟着毛主席胜利地爬过了雪山。

（选自《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6期第19—21页。

作者王恩清长征时为王稼祥的警卫员。）

5 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波罗子一带集结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

17日清晨，师首长叫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到军团部接受任务。林彪军团长一见面就对我们说：“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军团命令你们团为过草地的

先头团……不管过草地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走过去，这是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毛主席很关心这一行动，要亲自给你们先头团交代任务。”他又指着我说：“你先到毛儿盖去接受主席的指示，开湘同志带着部队随后出发。希望你们遵照主席的指示，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我带着骑兵侦察员从波罗子附近飞奔毛儿盖。十数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山峦起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到了毛儿盖，直趋毛主席的住处，见到了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他立即带我去见主席。我边走边打量着这个住处，这是藏民用木头架起来的普通房子，分上、下两层，底层关牲口，楼上住人。上了小木梯，踏上楼板，邓发同志朝里一指：“毛主席就住在里面。”

当面接受主席的指示，还是第一次，心中不禁有些激动。

主席看见我们进来，立即同我握手，叫我坐下，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亲切地对我说。

“你来了，很好！这次你们四团还是先头团。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

稍顿一下，主席又继续说道：“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他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主席详细地告诉我过草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具体地指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又强调地指出：“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以后，主席又询问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过草地的物质准备情况。

我向主席报告说，部队的情绪很高，大家一致坚决拥护中央过草地北上抗日的决定，只要中央，主席一下命令，我们就坚决向草地进军。我们早就有过草地的思想准备，省吃俭用存下了一些粮食，沿途采摘些野菜，估计可以捱过草地。只是衣服成问题，每人只有两套单衣，恐怕抵御不了草地的严寒。

“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

我说已有一个60多岁的通司作向导，已准备了8个同志用担架抬着他为我们带路。

“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抬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主席沉思片刻后继续说道：“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吃一些‘由此前进’、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主席以很严肃的口吻对我说：“四方面军的二九四团已编入你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去做，有困难我们依靠大家想办法解决。主席说很好，并叫我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接受具体的指示。我向主席敬过礼以后，立即去见徐总指挥。

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出来，赶紧去看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她详细地告诉我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我转告同志们不用惦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委实叫我们担心！我们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

离开邓颖超同志的时候，已近黄昏，我再返回主席住处，看是否还有指示。邓发同志问我吃饭没有，经他一问，这才想起今天还没有吃东西，而且还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我们团部的新驻地，我便说还没有吃饭。邓发同志听了，出去走了一趟，又到了主席房内，不一会便端出一个土盘子，里面盛着6个小鸡蛋般大的青稞面馒头，对我说：“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我一听说是主席的晚饭，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眼前粮食十分缺乏，部队都勒紧裤带，把数得出的一点粮食省下来，准备作过草地之用。邓发同志找不到饭才告诉主席，主席叫他把他的晚饭端给我吃。我久久地望着6个乌黑的小馒头，心里在想：主席一顿饭才吃这么一点东西，本来就不饱，如果我再把它吃了，那主席就要饿肚子。想到这里，我真后悔不该说没有吃饭，并决心不吃。但又一转念，不吃，主席是不高兴的，只好吃了两个。邓发同志还要我吃，我坚决谢绝了。这时候，主席从房子里走出来，笑呵呵地对我说：“怎么？不吃了？不吃饱不好工作啊！”我只说：“我吃饱了。”主席以慈爱的眼光看了我一会，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好吧，没有别的事情了，望你们完成任务。”我向主席敬过礼，便离开了主席的住处。

一路上，毛主席的亲切明确的指示，不断地在我耳边回响着。草地艰难困苦的情景像一幅图画展示在我的眼前。是的，过草地是向神秘的大自然挑战，要把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征服，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的袭击，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在等待着我们。但是当我一想起主席的指示：“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就感到我们肩负的任务无尚光荣，只觉得眼前明亮无比，浑身是劲。我满怀信心地想：任何困难是挡不住我们红军前进的。让阶级敌人再次领略领略无产阶级武装部队“硬骨头”的英雄本色吧！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地进行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铭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里。整编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四方面军张仁初同志率领的二九四团编为我团二营，他们把本来不多的粮食、衣服抽出一部分分给各营，大家表示要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钢铁般的团结去战胜草地的困难。

21日清晨，我们红四团，肩负着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遵照着军团首长的命令，开始向草地进军了。

草地的情景，真使人怵目惊心！举目一望，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道路。

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腿。我们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较密的地方，一个跟着一个，艰难地前进。

第一天我们就遭到暴风雨的冲击，河水泛滥，曾一度挡住了去路。黄昏，只得在一个稍高的小山上度过了第一个漫长的夜晚。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是使人难耐，我们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地取暖，特别是风雨一来，衣服湿透，地面是水，战士们只好在风雨中站着，急切地盼天快亮。

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同志们的身体明显地衰弱下去了。有的感到两腿瘫软无力，举不起步。但我们牢牢记住了主席的指示，越困难，大家团结得越紧。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的乘马和所有的牲口都抽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病员，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倒下了。当我们熬过一个夜晚，离开宿营地继续前进时，有的战友就长眠在我们共同躺过的营地上。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宣传员郑金煜同志。他是江西石城人，团部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只有17岁，是一个十分惹人喜欢的“小鬼”。进入草地的第四天，郑金煜同志就一步也走不动了。他对同志们说：“我在政治上像块钢铁，但我的腿不管用，我要掉了！我多么舍不得你们啊！”我命令饲养员老谢，把乘马给郑金煜骑，保证把他驮过草地，并且把我们的干粮匀出一部分给他吃。后来，他衰弱得连腰也直不起来，马也不能骑了，我们就用背包在他身子前后支撑起来，再用绳子把他绑在马背上，叫一些同志轮流扶着他走。到第5日中午，忽然后面传话上来：“郑金煜同志要政治委员等他一下，他有话同政治委员说。”我知道有问题了，便怀着沉重的心情站在路旁等着。老远就望见老谢牵着牲口，步伐沉重地走来，到得跟前一看，郑金煜同志已面如白蜡，双目紧闭。他听见我的声音，强睁开眼睛，以激动得发抖的声音断续地对我说：

“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路线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政治委员，我确实不行了，我看不到胜利那一天了。”说到这里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我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泣不成声。

经过一阵急喘后，郑金煜同志微弱而又坚定地说：“政治委员，希望党的路线胜利，革命快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的家里，我是为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

我压住心头的沉痛，安慰他：“郑金煜同志，你一定能走过草地，同志们一定帮助你走过草地！”随即叫警卫员把水壶交给老谢，交代老谢好好照料他，无论如何要把他带出草地。

可是到了下午，这个优秀的青年共产党员，就在风雪交加的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草地，这残酷无情的草地，夺去了我们多少战友可贵的生命呵！不少同志长期间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把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气都消耗尽了。他们在死前的瞬间还非常清醒，还念念不忘革命，还希望在北上抗日的征途中多跨一步。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坚决执行了军团首长的命令，经过六天的艰难斗争，终于从茫茫的草地上踏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至 26 日胜利到达了草地尽头的班佑。在班佑担任了两天警戒，第三天我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向天险腊子口前进。

（作者杨成武：选自《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170—176 页。作者当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6 达维会师

1935 年 6 月初，部队在四川西北的位川活动，当时我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一天，接到紧急通知，命令我立刻赶到总指挥部去。徐向前总指挥一见到我便兴奋地说：“告诉你个大喜讯：我们马上就要和中央红军会师了！”“真的？”我实在不敢相信。

“真的！”徐总指挥收敛了笑容，神情严肃地说道：“有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你：你师立刻做好战斗准备，为中央红军进入懋功打开通道。会师后，向中央首长汇报我们四方面军的情况，还要掩护中央红军安全通过夹金山，以后的具体行动，将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挥你们。”

接着，徐总指挥又详细地讲解了这次会师的意义。他说：“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率领的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蒋介石调集大量敌军前堵后追，天上还有飞机轰炸。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抢占泸定桥，即将翻越大雪山和我们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时刻！你韩东山是迎接毛主席的第一个红四方面军的代表，说不定将来还得给你上书呢！”

这次谈话足足有两个小时，会师前后应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如何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和搞好和一方面军的团结，指示得非常具体，反复强调了多次。

第二天凌晨，部队开始了急行军，3 天走了 300 多里，挺进到了懋功县城。

达维位于夹金山以北的山窝里。这里四季寒冷，房舍很少。我只好命令部队露宿野地。到达当晚，北风呼啸了一夜。部队轻装行军。衣薄腹饥，可人人心中都燃烧着一团火。

次日拂晓，我指令七四团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出发，一方面警戒灌县之敌，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

三营行进到巴朗地区时，与敌遭遇了，战斗中全营上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冲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消灭敌人，用胜利迎接毛主席！战斗胜利了，营长陈玉清等 60 几个同志都牺牲了，这是会师前的最后一仗。他们没能看见中央红军，可他们用鲜血赢得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来临。

6 月 10 日中午，一个参谋冒冒失失跑进了师部驻地，人未到声先至：“师长，师长，电话，电话！”我腾地跃起：“什么电话？哪来的电话？”参谋手舞足蹈，结结巴巴地报告说：“来了！来了！七四团……电话……和中央红军——会师了！”

喜事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全师驻地，用不着下命令，人们争着抢着清理驻地，挑水做饭，张贴标语。当天晚上，全师上下都“失眠”了。达维镇内外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人们议论着，猜测着，有不少战士站在镇外的几

处高坡上，向着朦胧中的夹金山方向久久地眺望……

此情此景深深地激动着我，使我至今难忘。

“毛主席来了！”

“中央红军来了！”

“欢迎一方面军老大哥！”

6月12日下午，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响彻了达维镇，真是欢声如雷，山应谷鸣。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刘伯承、王稼祥等中央军委首长率一方面军胜利翻过夹金山向我师驻地走来。

我急忙迎了上去，可首长们一个都认不得，我只好一一敬礼。正当我焦急万分的时候，我的老师长陈赓同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陈赓同志在鄂豫皖任十二师师长时我是三十六团副团长）因为我以前听说老师长从鄂豫皖根据地回上海养伤时被捕了，还担心他被害了。这一见面，甭提多高兴了。在老师长介绍下，我才认识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这时，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早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紧紧地握手，热烈地拥抱在一起，人人都满含着激动的泪水，跳呀蹦呀，喊呀说呀……

我领着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走进了一座喇嘛寺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也没休息，亲热地让我坐在身边，关切地询问起部队情况来。首长们询问的可仔细了，从军队的建制、干部的成分、思想状况，战士们的生活、训练、学习，一直问到师团的历史、党组织建设、部队战斗力、军民关系等等。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经历，心情十分紧张，生怕说错了话。首长们看出我的紧张情绪，便和蔼地叫我慢慢讲，周副主席爽朗地笑着，递过一碗水说：“师长同志，讲得很不错嘛，别慌，别慌！”看着毛主席亲切的目光，周副主席和藹的笑容，朱总司令等都在认真地记着笔记，我放松了，把我知道的红四方面军的情况都扼要地讲了出来。最后我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顽强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命地往前冲”时，毛主席高兴地笑了，从座位上站起来：“是啊！这就是红军的作风！我们从江西出发那天起，飞机在头上飞，敌人在地上追，我们还是闯过来了，而且……”毛主席把两个拳头举到胸前，有力地合到一起：“更发展了，更壮大了！嗯？哈哈！”

屋内的首长们都会意地笑了。这笑声里充满了对蒋介石的蔑视，对会师的喜悦，更向往着对明天胜利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接到通知说晚上一、四方面军要开联欢晚会，并指定由我代表四方面军讲话。这下我可呆了，虽说我是师长，可没读过一天书，这样大的场合，当着老大哥部队和中央首长的面讲话，可把我愁坏了。晚饭一口也吃不下，赶快召集干部会议，请大家凑词。结果七凑八凑，足足凑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有了点谱，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我来到了联欢会场。

会场设置在镇外山脚下。前面搭了个简易讲台。台周围悬吊着数盏油灯，为了挡风，在四周挂上了许多军用篷布。

周副主席是会议主持人。他还亲自点燃了一个大气灯，使会场显得更加明亮。开会时，周副主席第一句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联欢晚会，热烈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们……”

当宣布我讲话时，中央首长和一方面军同志们热烈地鼓掌。一股暖流冲击着我，使我激动万分，结果好不容易凑起来的讲话词也忘了。我猛然想起徐总指挥的指示，想起了红四方面军走过的战斗道路，就放声讲起来了。没

想到话刚讲完，我还没来得及敬礼，就掌声雷动，口号声四起了。

“向四方面军学习！”

“感谢四方面军对我们的帮助和欢迎！”

“庆祝伟大的会师胜利！”

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则高喊着：

“向一方面军老大哥学习！”

“向中央首长致敬！”

“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千百人的欢呼声，像松涛，似狂潮，压过高空长风，在无垠的阔野中久久回响。会场内外洋溢着团结、热烈和欢乐的节日气氛。

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相继在会上讲了话。毛主席说：“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的力量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四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谈到了各地红军的历史作用和会师的意义，以及今后任务。

我们师的指战员都是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朱总司令讲话，大家都屏住呼吸极认真地听着，千百双眼睛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到精彩处，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讲话结束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和口号声中周副主席宣布军委文工团的演出开始。晚会持续到深夜。散会后，满山遍野的歌声还久久不息。

清晨时分，太阳从雪山峰顶后升起，整个达维笼罩在彩色夺目的朝霞中。我们二十五师全体指战员早已排列整齐，等待着欢送一方面军同志。

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虽然整夜未睡，可依然精神抖擞地来到队伍前面。我疾步而出，向毛主席敬礼请示。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

“我们走后，部队还得几天走完，你们的任务是把警卫布置好。提高警惕，坚决消灭敌人，掩护部队完全通过。现确定将五军团三七团交给你指挥，我们在懋功要开一个重要会议，等我们从懋功出发，你们再向懋功行动。明白吗？”

“明白！徐总指挥也早指示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七天，坚决完成掩护警戒任务！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好，好！韩师长同志，再见啦。”毛主席再次紧握了我的手，又转身对部队全体指战员挥手喊道：“同志们，再见！”

“再见！”

“再见啦！”

几千人的辞别声在山谷中轰响着，几千顶军帽在手中挥舞着，几千双眼眶里滚动着泪珠，几千颗心脏都在沸腾着、激荡着。那时我们以为最艰难的

岁月已经过去了，黑夜消失了，黎明来临了。全体红军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到了！

这次激动人心的会师，已经过去近 50 年了，有些具体情节，也回忆不起了。但在会师中毛主席讲的这两句话，我却永远忘怀不了：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韩东山：《攻克懋功会师达维》，见《艰苦的历程》（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56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7 严峻的时刻

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 1935 年 6 月中旬，翻越夹金山，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本来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整个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两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乘尾追之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远远甩在后面，堵截之敌兵力分散，尚未完成部署之际，两个方面军协力北上，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打下松潘，攻占平武，然后出甘南，沿文县、武都一线前进，占领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然而，张国焘从会师那天起，就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悲观地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错误地主张向西康或青海等边远地区退却。同时，他把红四方面军当成个人争夺权力的工具，仗恃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还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就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现在又妄图改组党中央和军委，由他当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斗争，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会议明确了红军统一由中央军委指挥，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对他作了大量说服团结工作。但他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当面表示同意北上，会后一返回驻地，就制造谣言，歪曲和攻击中央的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不满意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这就破坏了中央整个的行动计划，使部队在懋功至黑水一带停留了不少日子。后来，在中央耐心帮助说服下，他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的主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集中。是北上抗日，还是退却逃跑？是团结还是分裂？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一个严峻的时刻。

这期间，敌情一天天严重起来，然而部队却一直没有行动。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 8 月初才跟上来。他一到毛儿盖，便无视两河口会议决议精神，继续反对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反对红军北上。说什么：革命高潮的形势尚很遥远，北上对我不利，领导与组织指挥存在问题等等。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服从中央领导，共同北上。经过近 10 天的辩论和斗争，会议做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

决议》，重申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理屈词穷，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不断阻挠，红军已先后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平武、文县；后面，懋功、绥靖、茂县等地，已被敌人占领，各方敌人正步步向我进逼，企图围歼我军。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机立断，出敌不意，把原定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肃洮河以东开进。根据当时各部队所处的位置，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以争取时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朱总司令、张国焘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为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把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前指随右路军行动。

我们走出草地后，经过班佑，于月末进抵巴西。这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藏民村落，村中有一座喇嘛庙。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徐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叶参谋长三人同住一间大屋，我们作战科（一、四方面军汇合不久，作者吕黎平跟随叶剑英被调到四方面军——编者）、机要科就在他们左侧的屋子里。

这期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右路军前锋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走出草地后，迅速包围包座，打敌援兵。部队在劣势条件下英勇奋战，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该师师长伍成仁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这就迫使敌人后续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为我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这时左路军迅速跟上来，共同北上，形势依然对我有利。

但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顾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电要他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他却一意孤行，按兵不动。他先是提出要通过甘肃西部西进青（海）、新（疆），后又提出南下川、康，还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与中央纠缠。在巴西，陈昌浩和张国焘一唱一合，互相呼应，他们还通过电报往返，互通情报。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几里远的牙弄（当时叫阿西）。为了说服教育陈昌浩同志，争取张国焘，9月上旬一连好几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天天步行来巴西开会（周副主席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就在徐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叶参谋长他们住的那间大屋里进行。由于陈昌浩同志态度蛮横，气氛十分紧张，屋里不时传出争吵声。这就是有名的巴西会议。与此同时，在敌情不断变化，眼看我军将要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况下，中央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行动，“不得违误”。这时，张国焘不但继续坚持其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公然违抗中央、军委的命令，竟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折返草地，再爬雪山，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

9月8日或9日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正逢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我回忆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

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企图用武力危害党中央。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会议室，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回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得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阿西)，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张闻天、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紧急商议，断然作出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的决定后，叶参谋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又返回巴西。

当晚，叶参谋长把我和陈茂生同志叫到一起，特别叮嘱：“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别的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叶参谋长照常办公，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后来，他来到作战科，看到没有别人在，便悄声问我：

“吕继熙(当时我的名字)，有甘肃、陕西省的地图吗？”

我当即向他报告说：“在包座战斗中，只缴获了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没有陕西省图。”

叶参谋长说：“你把这份甘肃省图给我。”

我从文件箱里取出地图，交给了叶参谋长。

就在这天深夜，叶参谋长冒着极大危险，乘人们熟睡之际，悄悄起身，以筹粮的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奔向牙弄，跟着毛主席踏上了新的征途。

10日早饭后不久，突然何畏(原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担任新组成的红军大学校长，后来成为可耻叛徒)坐着担架赶来，慌慌张张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队向北挺进了。他手里还拿着毛主席、周副主席署名的要红大立即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煽动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是否派部队去追击。大屋里气氛紧张异常。在这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多数领导同志忧心忡忡，担心会给革命和两支红军造成严重的恶果。因而，沉默苦思更妥善的处理办法，以避免互相动武的局面出现。沉思片刻之后，多数同志以坚定而又严肃的态度，委婉而又鲜明的语言，不同意李特和陈昌浩提的派部队去尾追的主张。我后来听说，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周率领一、三军团向北挺进去抗日前线，这是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我们既无理由也无必要派部队去追击。我们同样都是干革命嘛，哪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这些义正辞严的话，得到在场的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于是，陈昌浩同志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会后，陈昌浩派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张国焘的追随者)，带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去时，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接见了，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严厉地给予批驳，同时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委托，再次对张国焘、陈昌浩等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李特传回来的党中央的精神是：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长征途中发生的这场激烈的路线斗争，虽然到此并没有结束，但党中央、毛主席和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已安全脱险，胜利北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红军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摘自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193—202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

8 远瞩与温馨

1935 年 7 月，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7 月 6 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于 7 月中旬，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

8 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我，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凭垒固守，我军屡攻难克，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战役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作为作战目的。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随即在沙窝开会，正式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党的北进战略方针，是要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苏维埃在西北和全中国的胜利。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彻底击破蒋介石的包围与封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则是实现党的战略方针的基本条件。“一切有意的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都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与攻击、分散相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能巩固与争取胜利，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决议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进一步申明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后来我听说，不论在遵义会议或沙窝会议期间，毛主席都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那时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

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所以，决议上才那样写。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考虑和处理，是正确的。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我们和党中央走右路。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挑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左路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彭德怀率三军殿后，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同志发言。他说：根据中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他认为，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临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路，也是好的。

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和我。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蜗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

而后，毛泽东同志作了结论。大意是：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从桃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三，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可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而向右路军靠拢。我们不应将左路军看成是战略预备队。作战战略预备队它赶不及，不能指望。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最后决定，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本内容，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毛儿盖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改变了夏挑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会后，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途程。

鉴于毛儿盖会议已决定右路军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8月20日、21日，我和陈昌浩连电朱、张，告以中央的新决定。即以岷州为根据地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均不妥当。左路军占领阿坝后，

不必肃清该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速出甘南。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他连续来电，要求南下。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9月8日，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10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務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暗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两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面，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西路军失败后，我化装辗转找到援西军总部，大约是1937年7月间，我和恩来一道回延安。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直至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

（选编自《徐向前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554页。作者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9 陕甘支队锐无敌

长征到哈达铺后，第二天，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党中央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大家到达哈达铺的第一天都好好睡了一觉，改善了一下生活，擦了擦澡，许多同志还理了个发，所以这天我们碰到一起互相一瞅，也都感到对方比过去精神多了，也年轻多了。人陆陆续续快要到齐了。三三两两凑到一起，叽叽咕咕，笑声不断。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进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们仔细一瞅，他们也显得格外的精神。

毛主席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再过几天是阳历10月，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两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是个伟大

的胜利！毛主席激动人心的讲话，使会场上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稍稍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地分析形势，估计形势。接着，他介绍说：

我们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现在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还有 30 多万人，朱绍良（伪甘肃省主席）、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即：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编者）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 1933 年 1 月 17 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主席说：国民党反动派把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

毛主席在形势分析中还谈到四方面军与张国焘。

毛主席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讲到张国焘闹分裂对抗中央时，毛主席还特别提到：在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诙谐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听到这里，同志们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毛主席又挥挥手，要大家安静，并且说：我们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

此时掌声雷动，大家的心里热呼呼的。毛主席又笑笑说：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顿时，同志们都静了下来。

毛主席接着又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

于是在掌声中，毛主席宣布陕甘支队编成三个纵队，即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改编，第二纵队由红三军团改编，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毛主席接着又说：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 8000 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说完，举起一个指头，笑着说：现在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松潘地区，我们是没收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和购买藏民的粮食，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不能侵占工农的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

条重要纪律。

毛主席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毛主席挥舞着拳头结束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

“到陕甘根据地去！”

“前进！前进！”

“和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会师！”

一时间口号阵阵，此起彼伏。

毛主席的指示，坚定了我们胜利的信心，增添了我们斗争的勇气。

在哈达铺休息了两天。在这期间，按照毛主席指示，部队进行整编，我们四团编为一纵队的四大队。第三天，9月23日，我们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奔赴抗日征程的最后一段路程。

陕甘支队出了哈达铺，连续急行军。我们扬言攻天水，却出敌不意地越过武山来到一个名叫鸳鸯镇的地方宿营。算了一下路程，三天跑了200多里，同志们顾不得吃饭，一倒下去，便睡着了。

拂晓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渡过渭河。

我们紧接着攻占了渭河之滨的陇西，缴获了不少东西，战斗一结束，就把这些东西移交给来接防的二纵队十大队黄祯大队长和杨勇政委。

我们又继续前进，忽然正前方远处传来了哒哒哒的机枪声。

这时三纵队——中央直属队在陕甘支队参谋长兼纵队司令叶剑英和纵队政委邓发同志的率领下从后面赶上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毛主席。再一看，彭德怀司令员早就立在山坡上拿着望远镜在观察了。

毛主席看了看远方，又仔细听了听远处传来的枪声。

不一会儿，在急骤的枪炮声中，可以听出哪是步枪、机枪声，哪是手榴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了。

毛主席十分镇静，仿佛登临一个风景点，正在欣赏周围的山山水水。

一会儿，彭德怀同志走了过去，问道：“主席，你看怎么样？”

毛主席笑笑，说：“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我们的小部队才放几枪，敌人的枪炮声顿时停住了，两翼刚才僻僻啪啪扫得正起劲的声音，几乎同时哑了。

“毛主席真是料敌如神啊！”

“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制住了。”

津津乐道的战士们一边走着，一边盛赞着。

毛主席的指挥才干我们真是佩服极了！自遵义会议以后，又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一样，率领我们红军攻关守隘，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个个胜利，哪次战斗毛主席不是高瞻远瞩，“四渡赤水”可说是个典型的例子了。当时，敌人仗着人多势众，耀武扬威，恨不得一口吃掉我们，毛主席对此了

如指掌，带领红军扬长避短，几个来回，就把敌人搞得七零八落，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当然这是毛主席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掌握了战争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结合起来的原因。所以，毛主席在红军中享有很高很高的威信。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我们始终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我们大摇大摆地过了漳县，巍巍的六盘山遥遥在望了。

9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红一大队占领了通渭城。

我们在通渭附近略作休息。越过西兰公路后，我们兵分三路前进。我们纵队是右路，正好碰到比一个团还要多的敌人，但是一接火，他们便逃之夭夭。这些家伙实在不经打，一触即垮。我们越过公路，很快就到达了界石铺。

10月7日下午两点，我们的队伍正向六盘山进发，通信员策马奔来，迫不及待地马上报告说：

“队长、政委，纵队首长请你们马上到前面山上去！”

我与王开湘同志立即跳上战马，快速向前，越过一个山坡，只见纵队首长站在那里，聂政委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凝视着前方；聂政委左边站着的是林彪；左参谋长正举着望远镜在仔细观察。啊，再一看，毛主席也站在山坡上，昂首远望，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袍子，连日奔波疲劳，脸庞显得消瘦多了。他手里握着一根细细的棍子，在空中点着说什么。他的旁边站着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同志、政委肖华同志，五大队大队长张春山同志和政委赖传珠同志。

我们知道，自从离开哈达铺以来，毛主席和我们纵队首长一起，总是带着一、四、五这三个大队走在前面，每天的行军、作战、宿营都是毛主席和纵队首长亲自指挥的，我们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

我与王开湘同志下马敬礼报告。

毛主席这时回过头来笑笑说：“好，都来了，现在说一说。”然后，他指着远方又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主席这时转过身来，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几块，一边问：“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

毛主席爽朗地笑笑，说：“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说完将饼子分给大家。

我们每人从毛主席手里接过一小块，而且都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毛主席一边嚼着饼子，一边说：“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他又转过脸来，看看我与王开湘同志，又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猛，要狠！”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这时毛主席从警卫员手中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倒了一点水在壶盖里，递给我们，说：“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吧，喝完了，就去打！”

“是！”我们接过壶盖，仰起脖子，将盖子里的水一饮而尽。

待我们一个个喝完，我望望纵队首长，问：“首长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纵队首长摇摇头，说：“没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主席痛快地说：“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我们辞别毛主席，骑上马。虽然西北高原的秋风尖利，可心里暖洋洋的，挥鞭策马，一会儿便回到了大队。

同志们一听说有仗打，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还听说毛主席特意提到了我们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鼓励我们发扬过去优良的战斗作风，大家的情绪可高了，在我们召开的动员会上，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青石嘴这一仗，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部队便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我们以飞快的速度，悄悄翻过垭口，正面接近垭口下的村庄青石嘴。

这时，一大队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北边迂回插进青石嘴后边，五大队也迂回到南边，截断平固公路，形成了一个钳形包围，敌人骑七师的这个团（该师的王牌，骑兵第十九团。）便成了瓮中之鳖。

一声枪响，我们大队分路出击，一齐压向敌人。伴随着千百人的喊杀声和枪炮声，一刹那，我们就冲进了青石嘴这个山村，这时敌人正在开饭，几百匹马系在村头来不及解，他们就被我们打死的打死，缴枪的缴枪了。那膘肥、高大的战马，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三十大队胜利会合了，与缴获的花名册一对照，人员、马匹，一点不少。我们大队一清点，还发现多出了10多辆马车的子弹和军装，还有大批的布匹。原来，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东西，这里的敌人刚刚收到，没想到，他们还未来得及享用，就全部“移交”给我们红军了。这些马匹，后来按照毛主席和纵队首长的指示，我们把一部分交给一纵队侦察连，大部分交给了纵队，由纵队组建了红军的骑兵侦察连。我们的骑兵侦察连有了那么多马匹，“气”可“粗”了，以后又逐步扩建，组成了一个骑兵营。至于那些军装、布匹，除我们少量留下一部分外，其余的都按照纵队首长指示上缴和发给了伤病员。至于那些俘虏，经过政治思想教育，说明我们红军的宗旨，凡是觉悟过来了的也都高高兴兴地自动参加了红军。

10月18日这一天，我们刚翻过一个小坡，带路的同志指着前面的一个村庄，说那就是吴起镇时，队伍中顿时沸腾起来了！

吴起镇披着灿烂的阳光在欢迎我们。

（摘编自：《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273—301页。）

10 在通渭的故事

有路军到达哈达铺后，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我在一纵一大队，大队长是杨得志同志，肖华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

在哈达铺时我们借宿在一户农民家里，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儿媳妇的新房给我们住。我躺在老乡的土炕上，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便创览起来。无意中，我发现有张报纸上登着一则消息，说什么“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我大喜过望。国民党的报纸报道的消息是否准确，且不管他，但陕北有红军，而且与敌人战斗着，是毫无疑问的了。

我向房东说明要买下这张报纸，给了他们一块光洋作赔，便用小刀仔细地、从墙上起下了那块巴掌大的消息。

老乡大惑不解，一再问：“有甚用？”我说：“这可比拣个金娃娃还宝贵哩。”

我写上一封信连同那块报纸一起，派人送到军团部转报中央。

9月底，我们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座万余人口的城他，消灭了鲁大昌部。部队在这里休整，我带一个侦察队向六盘山方向侦察。

10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叶剑英、博古、工若飞等同志一齐骑马来到通渭我们大队部。杨得志同志拉上我去见中央领导，一见面，大家纷纷问好，都说“瘦了，瘦了！”杨得志同志把我拉到一边，说：“老耿，怎么招待他们呀？”

我说：“你汇报工作，我来安排招待。”

通渭城内有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我找到老板，让他给办两桌价值十块光洋的酒席。

老板爽快地答应了，但又告诉我，这里比较贫瘠，恐怕办不好。当时，一块钱可以买5只鸡或1头羊呐。

我说：“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解得，解得。”老板保证说。

由于人比较多，本来安排了两桌；到吃饭时，毛泽东同志连说：“合兵！合兵！”当时把会师叫做合兵。于是我们将两桌合在一起。大家连连碰碗，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起酒来。

酒有两坛，碗又大，毛泽东同志兴致很高，和我们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干了一次，微微有些醉了。于是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同志一见有西瓜吃，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同志尝一口。

张闻天同志咬了一口，连叫“太辣！”

毛泽东同志哈哈大笑：“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都被这句话逗笑了。

当晚，中央领导们就宿在我们驻地。为了他们的安全，我没敢休息，与哨兵一起警戒在首长们住的地方。

过半夜了，毛泽东同志披着衣服走出住处，伸手做了个扩胸动作。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一动不动地抬头望着夜空中那璀璨的繁星。

过了好久，巡逻的哨兵向这边走来。毛泽东同志一回头，发现了我，并且一下就认了出来，便说：“那不是耿飚吗？”

我走过去向他敬礼，问道：“主席这么早就起床了呀？”

毛泽东同志指指别的领导住的地方，示意我不要声张，从衣袋里摸出香烟，拉着我说：“走，咱们走远点。”

我们边抽烟边溜达。毛主席说：“你怎么没休息呀？”

我说：“你们都在这里，我们得负责啦！”

他用夹着香烟的手来回摆摆：“咳！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有一个大队嘛，敌人不敢来。”

我悄悄地对他说：“名义上是大队，可总共才4个连哪。”

毛泽东同志笑着说：“怎么？嫌少啦？以后再扩大嘛。”他用手向露出曙光的原野上画了个大圆圈：“就在这儿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我静静地听着，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

“站稳脚跟，再打出去！”

第二天，我们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向六盘山进发了。在那里，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六盘山》。

如果说，一年前红军从江西苏区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更不知道要进行长达一年的艰难奋战的话；那末，当红一方面军到达甘南并得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红军指战员都明确地感觉到：长征就要结束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开始与红一大队一起走前卫，向六盘山方向进发。我仍然负责带一支侦察队作尖兵，为主力开路。

在青石嘴，我们侦察到一个毛炳文部骑兵团。这个骑兵团大概赶了好远的路，在村子里宿营；敌人一点戒备都没有，马匹都松了肚带，卸下鞍具，有的在打滚，有的在溜腿。我们一个冲锋进去，敌人顿时蒙了，少数反应快的骑上骡马逃窜，大部分连人带马当了俘虏。我们用缴获的马匹和装备，成立了第一个骑兵连。

毛主席对我说：“你们总结一下打骑兵的经验。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指敌骑兵）了。听说陕北有‘四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四人）哩。”

我说：“在草地上我们遇到过藏民上层势力的骑兵。乍一看，他们倏忽而来，倏忽而去，速度非常之快。但只要两三个人背靠背围成一圈，专门射击他的坐骑，他就难于施展其伎俩了。我们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同志听得很有兴趣，笑着说：“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打了几次骑兵，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开始主动出击。那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纠缠我们一个多月了；当地老乡都称他们为“马大胡子”，据说剽悍得很。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把这条“尾巴”带进陕北根据地。一、二纵队便集中兵力，在杨城子以西地区把尾追的3个骑兵团彻底击溃，连他们的马术教官也俘虏了。

（摘编自：《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14页。作者与时任红军陕甘支队一纵队一大队参谋长：建国后，曾任同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

三、奠基西北大本营

1 吴起镇反击敌骑

红军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抗日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至此，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下午4点多钟，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领导机关也到达了。毛主席住下后，顾不得休息，立即派人把乡干部请去。了解当地党组织、政府、游击队的建立和活动的情况；了解群众生产和生活，询问附近有没有地主武装，“土围子”有多少人，离这里有多远。还请他们帮助部队买粮、买布、买药品。

当晚，我们十三大队被安排在离镇二里远的一个小村庄——中家湾宿营。尽管连日行军疲劳，但由于到达了长征的目的地，我心潮翻滚，精神亢奋，以至久久难以成眠，便干脆起来去查哨。

西北黄土高原的深秋，夜寒似水。由于村小窑洞少，我们大部分战士只

能露宿在露大的院子里，大家一团一伙地挤在一起，睡得十分香甜。露营，红军战士已是司空见惯了，大家都不以为苦。一轮明净的寒秋冷月，清辉洒照在战士的脸庞上，泛起了胜利的笑容。指战员们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我也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然而，反动派一直对我们穷追不舍，步步紧逼，不让我们有片刻休整的机会。我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又初到寒冷的西北地区，各方面都亟待休整。现在敌人的骑兵追赶来了，只有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尝尝红军的铁腕钢拳。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要打一次漂亮的反击战。

20日上午，中央军委召开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毛主席指出，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到陕北，就要和刘志丹领导的二十六军和从鄂豫皖先期到达陕北的二十五军会合了。现在，甘肃的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的何柱国却对我们穷追不舍。我们的到来，把狼也引进边区来了。我们只能给边区人民带来胜利和幸福，一定要狠狠打击这些恶狼，决不能让他们进入边区。最后，毛主席把反击地点选在吴起镇西北方的头道川。

头道川在吴起镇东北面约四里的地方，它夹在吴起镇正对面大茆染（今胜利山）与另一座山之间，是一条由西向东流向的季节河流冲刷而成的干涸河道，弯弯曲曲，时宽时窄。是一个便于发扬火力、大量杀伤骑兵的好战场。

按照军委部署，一纵埋伏在东西走向，起伏连绵的大茆染山上。二纵的阵地在对面上，四大队负责迂回敌人右侧。

21日拂晓，我十三大队随纵队通过二道川的刘家湾一带上了山顶，进入阵地，负责打敌前头。往西分别是五、二、一大队的阵地。他们负责拦腰突破和断敌后路。往东不远处的一棵独梨树下，便是毛主席和纵队首长的指挥所。

旭日初升，黄土高原的景色是多么壮观！金黄色的霞光，金黄色的沟壑，金黄色的原野，构成了一幅金黄色的画图，与我们南方的绿水青山成了强烈的对比。我无心欣赏这一新奇而壮丽的景色，焦急地等待着战斗的到来。

7时过去了，8时又过去了，依然未见敌骑兵的踪影。突然，一个眼尖的战士喊了一声：“来了！”我朝西望去，远处升起了滚滚黄尘。我和陈赓同志立即登高举起望远镜，果然是敌骑来了，一队队，越来越近了。陈赓同志边看边说：“小欧，看到了没有，像检阅一样，够威风。”我仔细一看，原来每一个方队的骑兵，都是清一色的战马，黄的一队，白的一队，红色的又是另一方队。我轻蔑地一笑：“等会儿，就让他黄红白黑一锅烧，我们南方叫做‘炒杂烩’。”

今天来送死和送“礼”的是东北军何国柱所部骑兵六师。敌骑在师长白凤翔的指挥下，趾高气扬，浩浩荡荡地转川道直奔而来，敌骑自恃装备精良，运动迅速，一个个跃马横刀，气焰十分嚣张。傲慢的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在这里设下了收他们老命的埋伏。

敌骑转眼即至，一队队，有如飞蛾扑火，进入了大队伏击圈。我习惯地朝东向纵队指挥所望去，“叭！”的一声清脆悦耳的枪声像一道闪电，引发了雷霆，震破了敌胆。手榴弹、步枪、轻重机枪铺天盖地一齐打响，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人嚎马嘶。敌人阵脚大乱，前面的妄图往前冲，被五、二、一大队拦腰猛打；后面的紧急驰援，又被自己的败骑冲散。人踏人，马撞马，乱成一片。受惊的战马狂奔乱跳，敌兵纷纷被甩落。有的腿还套在马镫里，硬是给惊马拽着飞奔。川道上荡起了滚滚黄尘，拌着硝烟，弥漫了整个战场。

上空。

敌人招架不住，急忙往西逃窜。我军阵地上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像瀑布般倾泻而下，追歼敌人。一些落马的骑兵乖乖地举枪投降了。跑得快的被从右侧包抄敌退路的四大队一顿好打。敌人无心恋战，往西奔逃。我们追击了一气，两条腿当然怎么也跑不过四条腿，便鸣号收兵。

在返回的路上，看见到处是敌尸和马尸，一些被打伤的马躺在地上嘶叫。各种枪炮、弹药、电台、马匹、马刀，还有炊具、食品，散满川道，真是应有尽有。

这次战斗，我军轻而易举地消灭敌一个骑兵团，另击溃一个骑兵团。缴获战马 200 余匹，除了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配备了马匹外，还建立我军第一个骑兵连。

敌人骑兵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事后，敌师长白凤翔承认：该部所有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等重型武器都在这战役中丢弃，损失驮马、战马各 800 余匹。经过这次战役，敌骑兵在相当长时间内不敢来骚扰。

吴起镇反击战的胜利，是毛主席用兵如神和伟大的战略战术思想又一体现。据毛主席的警卫员后来回忆说：战斗打响前，毛主席在指挥所里与一纵首长作简单指示后，对警卫员说，我要在这里睡一会儿觉，枪声响得再剧烈也不要叫我，等战斗结束时再告诉我战况。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毛主席睡得很香。可见，毛主席对这次战斗，早已成竹在胸。

（摘编自欧致富：《我的红军时代》，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作者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十二大队特派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 长征礼赞

吴起镇战斗之后，有一天，我和王开湘同志由于事先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中央召开的全军干部会议，而这个会为了防止敌机骚扰，确定天一亮，就在吴起镇附近开。于是便从驻地骑着马直奔会场。

天刚蒙蒙亮，会议开始了。

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后走进会场，会场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同志首先讲话，他说：“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

是的，今天在这里开干部会，同志们格外兴奋。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度过了长途跋涉、征战万里的艰难岁月。你们——党的领导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红军的胜利，不知疲倦地操劳着，全部消瘦了，花去了多少心血啊！你们在这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运筹帷幄，把我们从一个胜利引向一个新的胜利，是多么不易啊！要说辛苦，你们最辛苦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和同志们一样，十分激动。

毛主席接着说：

“从瑞金算起，12 个月零 2 天，共 367 天，战斗不超过 35 天，休息不超过 65 天，行军约 267 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 267 天。”然后，他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

共 11 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主席打断口号声继续说：“二万五千里中，红军占领了几十个中小城镇，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立了数百个县、区的苏维埃政府，我们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雷公山、娄山、云雾山、大凉山、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来河、潇水、湘江、清水江、乌江、赤水河、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白龙江、渭水河，经过了苗、瑶、彝、回、藏等兄弟民族地区，我们完成的空前伟大的远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 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 2 万余里，纵横 11 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 11 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我们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深深感到：胜利来之多么不易！

毛主席这会儿打着手势，说道：“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十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现在中央红军又与陕北红军、陕北人民一起，担负着更艰巨的任务，我们今后要更好地团结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

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大家异常兴奋，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 303—306 页。）

3 解救刘志丹

1935 年 9 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方针的正确，劝他们速来与中央会台。电报热情他说：“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 17 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 30 里之大草滩占扎

路高楼庄一带前锋逼近岷州城敌人恐慌之至”，“此地物资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十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北上，并在最后提出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我按中央的指示随九军团行动后不久，中央又调我到国家保卫局任执行部部长。因此，使我有机会直接参加了为刘志丹同志平反的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

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回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

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必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9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志丹同志因公到瓦窑堡去，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信员，通信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信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同通信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捕了。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询问了他的

健康情况。毛主席意味深长他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副主席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喜悦万分。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志丹同志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4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阳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同志的灵柩送回瓦窑堡时，周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毛主席亲自向刘志丹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1943年，志丹同志壮烈牺牲7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筑陵墓。毛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副主席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摘自《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72页。作者当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4 辉煌的“奠基礼”

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经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主席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红十五军团的全体同志，都为这个光荣的会师欢欣鼓舞。大家日夜盼望着的中央红军，现在来到我们身边了。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奠定陕北的局面，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大西北，毛主席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这样：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五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郃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郃县方面前进。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毛主席决定集中会师陕北的各路红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并指示要我们到那边看看地形，再作具体的布署。

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 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晚上，毛主席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以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前线指挥。主席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他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当林彪派人向主席报告情况时，主席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像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设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及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响枪，敌人立刻向北撤，北边—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缴过—次枪，在这个猛攻之下，纷纷瓦解，缴枪投降。—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占领了敌人的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个多营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们派了—支小部队攻了—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了老高。我们向山上看去，只见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等走到我们近前时，周副主席和干部们—握手，详细的询问了第一次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在讲述着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来自鄂豫皖苏区的战士和陕北的战士，都倾吐着渴望会见老大哥的心情。欢乐和友情，笼罩着战场。

—九师师长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个电报接—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六师还没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歼灭了—个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

—气追了25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个多营最后覆灭了。牛元峰也被抓住了。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个师。”直罗镇战役，—次证明了毛主席伟大的、正确的军事思想。—九师全师和—六师的—个团覆灭，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八师、———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七师也退出了郿县。陕北苏区出现了—个新的局面。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胜利品，押解着俘虏，撤离了战场。晚上，当我们路过毛主席住的村庄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点着灯。这些天来，主席够辛苦的了，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着灯呢？

我怀着—种崇敬的心情，走到主席住的窑洞门口，问门口的警卫员同志：

“主席还没睡吗？”

“主席晚上是不睡觉的。”警卫员同志说着把我引进门去。

主席披着件蓝布旧大衣，点着盏油灯，正精神奕奕地工作着。桌上放着那张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可以看出，主席又在考虑新的行动，策划新的战役了。

主席放下手里的铅笔，亲切地伸出大而有力的手，微笑着说：“辛苦了！”

我说：“天这么晚了，主席还没休息？”

主席说：“这样习惯了。怎么样，部队都撤下来了？”

主席简要地讲了讲这次胜利的意义，当前的敌人动向，然后，关切地询问着部队的伤亡情况和伤员的安置。最后嘱咐要好好地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主席对战士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具体细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从主席住的窑洞走出来，夜已经根深了。跨上马走了老远，回头望去，主席窑洞里那盏灯还亮着。

部队移住到杨泉源一带，举行了祝捷大会。中央红军和十五军团，都相互派了参观访问团，进行参观和访问。张云逸、刘亚楼等同志，带着一个剧团，到十五军团来慰问演出；十五军团也派了许多同志到中央红军学习和参观。

11月30日，在东村举行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主席讲到直罗镇战役的意义说：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三次围攻。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日抗战，举行了奠基礼。主席讲到胜利的原因，指出：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

我们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

主席在报告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主席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进攻华北并吞全中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中国；我们的胜利也告诉国民党，我们不允许你们卖国。红军要同全国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主席宏亮的声音，明确生动的言词，句句印在每个红军干部心里。主席的声音，就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它代表每个红军战士抗日救国的意愿。

（节选自徐海东：《“奠基礼”》，见《星火燎原》选编之四，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9—15页。作者当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5 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

直罗镇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负了伤。当时敌人还在拼命的反冲击，侧射火力还很厉害，担架队也还上不来。同志们把我们五六个伤员，暂且安置在较安全的散兵坑里。

阵地上的烟雾慢慢飘散，东方吐露出黎明的曙光，抹红了远方的天际。

枪声，渐渐稀疏了，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群一群俘虏被押解着正走下战场。这时，一个趴在散兵坑沿上的轻伤员，突然高声喊道：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听这话，我忙问：“在哪儿？”他兴奋地说：“你快朝山下面看嘛！”我挣扎着抬起身子，伸着脖子往山下一看：可不是，毛主席穿着青布衣服，顺着山路向这边走来。后面是周恩来副主席和罗瑞卿局长。他们边走边说，察看这个枪声未息的战场。

五六个伤员中间，大都没见过毛主席，所以都昂着头，嘴里还说些什么。看见毛主席向我们走来，都想站起来去迎接，可是伤口疼得厉害。毛主席抢先两步来到我们跟前，挨个地看了我们的伤口，慈祥地安慰着我们。说担架队一会就上来；要我们到医院好好休养，不要老惦记着前方。其他几个首长也是不停口地安慰。我负伤以后，心情很烦躁，经毛主席这一番温和亲切的谈话，心里顿时清爽了许多。我看看其他几个伤员的脸上，也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

同志们都在和毛主席亲热地谈话，我很羡慕，也想和毛主席谈几句，可是因为伤着了喉咙，一张嘴伤口就向外流血。毛主席见我这个样子，急忙摇摇手，不让我讲话。幸好有一个同志，把我要说的话讲了：

“毛主席，前面还在响着枪，你怎么就到这儿了？”

毛主席笑着看了看周副主席和罗局长，然后很幽默地说：“怎么，只许你们到前面来吗？”逗得大家都笑了。

谈话时，毛主席吩咐人去找担架，又取下自己背的那只军用水壶，拔掉塞子，把水倒在一只小杯子里，喂我们水喝。因为我最靠近主席，所以接到的是第一杯。毛主席一手拿着水壶，一手端着杯子，俯下身，将水送到我嘴边。说实话，在这黄土高原上，这水是多么珍贵！自从子弹打穿喉咙，嘴里的唾沫早就咽干了，无时不在盼望水。现在，一见这杯清水，恨不得一口把它喝下去，可是嘴唇刚碰碗边，我看见了主席于裂的嘴唇，不由得迟疑起来。毛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思，像哄小孩一样地催促道：“快喝吧，喝点水会舒服些啊！”我看看旁边的罗局长，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好像说：“你喝吧！”我不忍谢绝毛主席的这种慈母般的爱护；把一碗掺含着感激热泪的清水咽下肚去！

接着，毛主席又一个挨一个地将水送到每个伤员嘴边，直到大家都愉快地喝下为止。

一会，担架上来了。部队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补充，物资十分缺乏，担架都是用硬梆梆的木板钉的。毛主席看了皱皱眉头，便和担架员们说：“来，咱们去捡点东西铺在担架上，让他们躺得舒适些。”说罢，和其他首长一块到附近小树林里去拾敌人丢下的破大衣和破被子，又捡了一些枯树叶。

我们趴在散兵坑里，看着毛主席和首长们在为我们忙碌，心里真过意不去。我不免埋怨伤口：“就怨你，让毛主席受累！”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回来后，亲手在担架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大衣和被褥，真比我们睡觉的铺位还松软。然后，毛主席和首长们把我们从散兵坑里扶起，搀到担架上。又给我们盖好身上的大衣，插上伪装树枝，对担架员说：“走吧，小心些，走慢些！”担架变成了温暖的摇篮。我们舒适地躺在上面，心里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担架队顺着山道缓缓而下，毛主席和几位首长向我们招手，我挣扎着欠

起身子，只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满山遍野，沐浴着一片阳光。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站在霞光灿烂的山巅上，目送着我们向后方走去。

（作者游好扬，选自《星火燎原》选编之四，战士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7—29 页。建国后作者被授予少将军衔。）

6 春风化雨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 135 里，三十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他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 300 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 300 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 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 2500 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 7000 元。我说留下 2000，其他 5000 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摘自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4—48页。）

四、东征回师上延安

1 震撼华北的东征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于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军事行动上，把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苏区、以发展求巩固作为重要任务。

紧接着，在瓦窑堡召开了东征会议。

毛主席在会上做了动员。他阐述了东征的重大意义，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讲了为什么必须东征，为什么不能北征，不能西征，不能南征？他说，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向北不行，那里是大沙漠。向西不行，因为我们是从西边过来的，都知道那里人烟稀少。南边呢，是西安重镇，敌人屯有重兵，因此，只有东征。当时的意图是，如果形势发展好的话，不仅打到山西，还准备打到河北去，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我们听了主席的动员，很受鼓舞。虽然我们的部队比起在中央苏区来是少多了，但毛主席那博大的胸怀，毫不把周围的强敌放在眼里，所表现的一个统帅的雄才大略，使我们眼光远大了。

打通抗日路线，意味着穿越山西。而要到山西就得首先渡过黄河。有人担心过河之后回不来。毛泽东同志认为，只要把渡口掌握在我们手里，没有回不来的道理。

瓦窑堡会议决定东征后，部队开始做思想技术上的准备。首先恢复了一军团三个师的建制，并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率出征。一军团的一、二、四师为右路军，由彭德怀同志指挥；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为左路军，由徐海东、刘志丹同志指挥，待命渡河。

恢复后的红一师由陈赓任师长，杨成武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师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师下面辖一团、十三团，全师约3000余人。

渡河前，毛主席分别把我们师的干部召去，再次强调东征的重大意义，鼓励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完成好这个任务，强调指出：这在政治上、战略上、国际形势上、国内形势上都很重要，讲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周密侦察和策划，我们把渡口定在沟口附近，于1936年2月20日晚8点开始向对岸进发。

我是坐第一批筏子过河的。开始是偷渡。这夜天黑如墨，羊皮筏子一下水，就被往下游流去的冰块碰得直打转。驶进中流时，又打转又颠簸，一下子抛上浪尖，一下子又跌进波谷，那种氛围和感觉，真像后来《黄河大合唱》里唱的那样：黄河在咆哮！我们一面奋力划水，一面“嗨哟，嗨哟！”地叫着号子，在彼峰浪谷和巨大的浮冰中渡过了黄河。

我们登陆不久，敌人就发现了我军企图，于是，一片敲锣打钟报警声伴着枪声响成一片。已过河的小部分部队就开始人力掩护，敌人河防部队刚打

了几枪就被压住了。接着，偷渡改力强渡，信号弹照亮了河面，船工与战士们一齐放开喉咙“嗨哟！嗨哟！”地奋力划水，号子声和着黄河的涛声，响彻在黄土高原的夜空。

渡河成功后，我们占领了三交镇，发出了“东进抗日通令”。当时的山西被阎锡山把持着，他既与蒋介石有矛盾，又不抗日，只是一心当他的“土皇帝”。由于山西铁路全是美国制式的窄轨，所以山西成了阎锡山与外地不相往来的独立“王国”。对于红军进入山西，他就更不甘心了。当他的河防被突破后，急调外号“满天飞”的晋军独二旅前来堵截，这个“满天飞”号称“走到哪里哪里就打胜仗”，是阎锡山8万军队中的王牌。我们先把他们的旅部和一支先头部队击溃，然后冒着大雪将另一个团包围在关上村，连夜展开决战。

“满天飞”确实比较顽固。阎锡山有自己的兵工厂，所以他们打起仗来不吝惜弹药，把防御正面上打成一片火网。当时正值“倒春寒”，白毛风刮得紧，气温奇冷，有的战士被冻伤，有的耳朵冻僵，一抹真能掉下来。我们正面进攻没有得手，便改为侧翼包抄，由一团和十三团从两面对攻，终于冲进村子，把“满天飞”打成“遍地滚”了。关上村在一条大川里，残敌试图突围，几次都被我们居高临下用手榴弹打了回去。聪明些的老兵油子便扔了枪，趁着大雪往沟壑洞穴里乱钻，直到第二天上午，还不断有漏网之鱼被打扫战场的部队从角角落落里驱赶出来。敌旅长只身逃回，被阎锡山撤职查办。“满天飞”就此寿终正寝。

关上村大捷，使部队情绪更加高涨。全军继续向同蒲路进发，在兑九峪与敌人再次交火，歼敌两个团。由于战前情报不准，敌人越打越多，原来敌人不是通报的5个团，而是3个师加1个炮兵旅，共14个团之众。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尽管没能全歼敌人，我们师的几位领导还是满高兴地边撤边议论说：“一天‘吃’两个团，够本了！”

两战皆捷，阎锡山如丧考妣，我们佯称要攻太原，使他更加惊恐，只得老着脸皮向蒋介石求援。我左路十五军团曾攻占晋祠，离太原只有几十里路，阎锡山忙令各部向北集中，晋南成了空虚之地。我们右路军即调兵南下，兵发汾河流域，一举攻占介休。我们在那里大做群众工作，部队得到了很好的补充。之后，部队从介休沿同蒲路南下，一直打到侯马，阎锡山吓得躲在太原城里不敢出来。

这时，早就想染指山西的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求救电报，乘机将大批“中央军”调往山西：一路由潼关向北，一路由娘子关向西，共20万大军。根据敌情这一重大变化，党中央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河西。

我们一师负责回师部队的殿后，在吉县，敌二十五师冒冒失失地追了上来，成了众敌的“出头鸟”。陈赓同志说：“耿飏同志你带一个团把二十五师这个出头鸟收拾了。”还嘱咐我说：“你注意他们的师长，这是个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家伙，只知道往前冲，你去打赢他！”我率队迎击敌人，把两个营放在正面埋伏，两个营兜屁股进攻，先把他们打乱了，然后预先埋伏的两个营奇兵突起，把敌二十五师一个团一口吃掉。那一仗我亲率战士拼刺刀，歼敌800多名，余者落荒而逃。

我们掩护大部队安全渡过黄河后，蒋介石的20万大军才赶到河东，远远地向我们发炮。黄河，已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天险了。

东征75天，歼敌万余，扩红7000，筹集到大量军需，带回延安用了几

年。更有意义的是：抗日先锋军在山西大片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力量开始发展壮大。

（摘编自《杨成武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页；《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28—334页。）

2 河东扩红

红军跨过黄河，冒着严寒的风雪，马不停蹄，入不歇步，日夜向东进发。波涛汹涌的黄河天险，远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背后。

2月23日，我军在关上村歼灭阎锡山的“满天飞”旅一部后，乘胜东进，兑久峪一战，又歼灭阎军约两个团，战斗结束后，我们红一师第三团移住苏家塔。晚上，师部打来了电话，通知阮团长和我，明天一早去军团部开会。我们猜想，一定是新的任务来了。

3月12号一早，我们骑马赶到军团部——郭家峪。进入会场不一会，毛主席和军团首长都来了。主席穿一件灰布大衣，戴着八角帽，精神奕奕，满面含笑。开会前向各级干部询问着部队的情况。问战士的情绪怎样，脚上打泡的多不多，连队的伙食怎样等等。大家一一回答着主席的问话。

自从长征到陕北以来，主席经常随同一军团行动。渡黄河前一天，在柳林子，主席曾经把我们师的师团干部叫去，亲自交代任务。军团的一些重要会议，主席都亲自参加。给我们讲国内外的局势，讲军队的建设，讲战略战术问题，那时，发文件比较少，读书看报的机会不多，开会听报告，是很好的学习机会。特别是主席的报告，每次都能使我们学到许多新的知识和革命道理。我们见主席又来参加会了，有说不出的高兴。

聂荣臻政委宣布开会后，主席给我们作了关于形势任务的报告，讲到“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讲到东征的意义。主席说，国民党反动派不许我们东进抗日，要阻止我们在黄河以西，这个企图破产了。阎锡山吹嘘的铜墙铁壁的山西，我们打进来了。讲到今后的任务，主席指示：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我们要迅速东进，调动敌人，同时要猛烈扩大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

会场是一间大空房子，凳子很少，我们坐的是一些石头块、木头棒。主席生动、明确的报告，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和疲倦。大家都聚精会神静听着主席的话。

这次会议，根据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新的军事行动，着重布置了扩红、筹款和创建晋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总政治部杨尚昆主任，作了专题报告，指示如何扩红，怎么组织发动群众，怎样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还特别强调要走群众路线。

散会后，我们在军团部吃了饭，天将黑时，骑马转回驻地。路上，阮金庭团长和我并马前行，两个人谈论着主席的报告，谈着扩军工作，都掩不住的高兴。我们三团，是长征到陕北后重建的，全团不到500人。三个战斗连队，摆起来，一眼望到两头。阮团长说：“这次扩军，我们团能增添200人，就像个团的样子了！”

我也这样想：人，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我们闹革命的宝贝，只要有了人，有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武器装备是不愁的。

新的行动开始了，十五军团左路，插向太原方向；我们一军团为右路，

逼向同蒲路南段。经过三天行军、战斗，我们红一师到了洪洞、赵城之间绍谭镇一带。

一切准备妥当，我带领四个工作组，出发到了纪落村。我们首要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展开广泛深入的宣传。集上、镇上、老乡们家里，见人就讲。到一村就召集群众大会，写标语，散传单，张贴布告。记得布告上写有这样的话：“民族危亡，同胞们呀，奋起救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对于扩军，我们除了设立参加红军报名处以外，主要的是通过群众工作的开展，个别扩大。利用新兵扩新兵，本地人扩本地人。

经过几天的宣传，群众对我们由疏远到亲近。我们每到一村，就会被人们围起来。问这的，问那的，要求清算地主，要求成立农会。地方党的同志，主动和我们接头，带头参加红军。

就这样，妻子送丈夫，爸爸送儿子，兄弟争相报名，不到10天，我们团扩大新战士325名。同时，我们还协同地方工作同志、师政工作队，组织了12个乡苏维埃和农民协会。惩办了几十家大恶霸地主。筹款5万元，黄金1斤多。真是“人财两旺”。

新战士穿上军衣，领取了各式装备，又学歌，又认字，情绪十分高涨。我们团建立了新的战斗连队。过河以前走起来一眼望到两头的队伍，现在从后头赶到前边，骑上马也要跑很久。看到自己的团队壮大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当时这样想：“我们这个重建的团队，只要再经过几次战斗的锻炼，又会成为一个主力团了！”当时还没足够意识到，建设一支部队，光有兵有枪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全局的思想。直到打拉池会议，我才深深受到了教育。

东征的红军，因为受到蒋介石大兵的阻拦，没能继续东进。4月底，回师西渡，又来到了陕北。到达岔口附近，部队住下休整，5月14日方面军总部在打拉他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会场，是布置在一个庙里，我走进去，首先看到的，是两边柱子上两条大字标语。

一是：“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

一是：“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

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许多首长，都参加了大会。这是一个庆祝东征胜利的大会，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是一次整风会。主席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用这样的几句话概括了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主席讲话中，还批判了东征中某些部队和领导同志的本位主义、自由主义，不顾全大局，不顾及整体的思想倾向。

这使我想起东征中发生的几件事：兑久峪战斗后，为了补充兄弟兵团的突击力量，上级决定从我们团抽调50名战斗员。按说，应该毫不折扣，挑选出最优秀的、身强力壮的战士送去，可是，由于一种私心作怪，选了50名老弱或“调皮捣蛋”的送去。更不该的是，有一次师部命令从我们团调拨5万发子弹给兄弟团，思想上很不高兴，向上级叫苦，甚至说我们不是“运输队”。当时曾受师首长的批评，由于没引起警惕，东征回来，送衣服给友邻部队的时候，又将一些穿过的旧衣服送去，自己部队留下的全是新的。……

回想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整体观念，两眼只看到自己一支部队，看不到整体，看不到全党全军的利益。晚上，小组会议，我作了检讨。主席的谆谆教导，同志们的耐心帮助，才使我深深认识到，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来说，是两大敌人。在主席光辉的思想照耀下，会

议中许多同志，也作了自我检讨。

会议开了两天。主席又作了总结报告。主席说：“这次会开的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这是个害人的东西，打倒了它，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主席还特别分析批判了本位主义、自由主义的根源，指出要克服这种错误，首要的是提高党性修养。主席的报告，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党课，一次永不会忘记的课。如果说，东征扩红从数量上壮大了我们的团队，那么，打拉他会议，又是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了我们。

会议中，周副主席也作了报告，对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问题，统一战线政策问题，向我们作了明确的指示。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全军同志欢欣鼓舞，人强马壮，从打拉他出发，开始了胜利的西征。

（选摘自《星火燎原》5选编之四，第93—100页。作者肖锋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委；1961年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3 为红大选校址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关头。毛主席及时地提出：“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培养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有计划地为党迅速培养大批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1936年6月1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6年7月，红大随同党中央迁到保安。

保安，由于长期受战争的破坏和地主土豪的掠夺剥削，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红大迁来以后，找不到校舍，没有桌凳，一切都极端的困难。毛主席对红大十分关心，他和红大的同志们，一同到城里为红大选择校址。当时城里房屋奇缺，无法找到房子，最后，才把校址选在城南的寨子山下。这里的石崖上有许多像蜂窝似的石洞，由于战争的破坏，石洞的门窗已被全部烧毁，变成了一个个黑窟窿，里边到处是牲畜粪便，而又潮湿阴冷；外边到处是荒草荆棘、石头砖块，坑坑洼洼，使人难以落脚。

毛主席看着这些石洞，对红大的师生们说：“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败家子们是无法破坏的，它火烧不毁，炮轰不垮；这是保安的一‘宝’啊！就在这里建校吧！”

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校舍，困难是很多的。但是，红大的学员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从来都是迎着困难前进的。他们怀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顶着烈日，流着汗水，自己动手，清除杂草荆棘，搬走石头砖块，清除牲畜粪便，垒墙填坑，修通道路，把大洞作为教室，小洞作为宿舍。没有窗子，砍来木棍安上；没有门，把草帘子吊上。大大小小的石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经过几天的艰苦劳动，简陋的校舍建造起来了。几子通向各个石洞的道路修通了，学员们给这些路都起了名叫“革命路”、“红军路”、“抗日路”等等。平日破烂不堪的、荒无人烟的石洞，一下子变了样，到处都能听到歌声笑语。一到夜晚，上上下下的层层石洞里，灯人通明，真像一座雄伟的高楼。当地群众看到后，十分高兴。他们敲锣打鼓，给红大送来一块木

匾，上面写着7个红色大字：“劳动者创造世界”。表示对红大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校精神的高度赞扬。

校舍建好后，毛主席非常高兴，马上把正在阅读的文件放下，亲自前去视察。烈日当空，道路不平，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向红大走来。学员们看见毛主席顶着烈日，前来视察他们亲手建造的校舍，心情都十分激动，高兴地迎上去，簇拥着毛主席视察他们的教室、宿舍。

毛主席乐呵呵地迈着稳健的步子，在学员们的引导下，沿着新修的石板路，一级一级地上，首先来到了教室里。这是一孔很大的石洞，里边收拾得十分整洁。毛主席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他看到用石板架起来的一排排石桌，用石头垒起来的一行行石凳，石壁上的石黑板，便向学员们诙谐地笑着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坐的是石头凳，用的是石板桌、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是石器时代的人啊！”

学员们乐了起来，古老的石洞里回荡着快乐的笑声。

毛主席看着欢笑的学员们，又笑着说道：“你们这些石器时代的人，可是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呀！”

学员们陪着毛主席看了教室，又看宿舍。宿舍也是一个个石洞。这些石洞有大有小，有的互相通着，有的有走廊相连，有的可供几十人住宿，有的只能两三人睡卧。每个石洞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毛主席看了后，非常满意。他高度赞扬了学员们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好了校舍。

学员们扶着毛主席，踏着阶梯上到最高一层的石洞里，简直就像到了几十层的高楼一样。毛主席站在洞口，远眺重重叠叠的青山，俯瞰山下泛滚流动的周河，风趣地说：“你们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回过头来看着欢笑的学员们，“什么时候下山啊！等修炼好了，天下大乱了再下山呀！”

学员们齐声说：“主席，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真经，修炼好本领就下山！”

校舍建好后，学校就算正式办起来了。学员们住石洞，坐石凳，走石板路，吃野菜，尽管生活极端艰苦，但大家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天到晚书声琅琅，谈笑风生。同学们还经常说，以后革命胜利了，条件好了，可不能忘了这里的石洞，这是毛主席为我们红大选的校址啊！

（选自《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2期，作者白黎。）

4 生动的军事哲学课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是1936年1月在原工农红军学校的基础上，于瓦窑堡七里湾成立的，校长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兼）。开始只设第一科（训练师团干部）；7月3日迁至保安县城，成立第二科（训练营连干部）；第三科（训练排班干部）驻甘肃环县本钵寺。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二、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同红大合编。合编后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

红大的教员，主要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及军委领导机关的同志兼任，毛主席给我们讲授哲学和军事。他来讲课，总穿一身灰军装，乌黑浓密的头发显得有些长，也有点乱，大概是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理。他宽大的前额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道地的湖南湘潭话，语言特别生动，通俗他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阐述得很深透，很容易听懂，

给我的印象最深。

毛主席在几次讲课中，系统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有力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指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述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总结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听了毛主席的讲演，我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我们过去在战争中经历的一些问题，在毛主席的讲演中都得到进一步的解答和提高。联系红二十五军作战的经验以及个人感受，我对以下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1. 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符合客观实际

毛主席在阐述战争规律的运用时，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这一科学概念。他说：“战争——从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这就是说，战争规律是战争指导规律的客观基础，战争指导规律是战争规律的具体应用。

如何把握战争指导规律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习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就是把握战争指导规律的根本方法，它反映了战争指导的全过程。第一阶段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也就是认识战争规律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就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行动，也就是应用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行动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不断反复，使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不断深化，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以求在战争中多打胜仗。

毛主席反复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他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红二十五军的全部作战经历也都说明毛主席这一论断的正确。凡是取得的胜利，无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我们所遭受的挫折，也无不是由于对客观情况没有弄准，主观处理不符合客观实际。

2. “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

毛主席说：“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长期的反复。”要打破敌人不断的“围剿”，必须正确处理进攻和防御、消灭敌人和夺取或保守土地的关系，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

战斗的速决战，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最后胜利创造条件。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在红军还处于幼年的时代，就命令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打硬仗、拼消耗，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妄图使全国革命指日成功，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张国焘在鄂豫皖边区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说国民党军队已成“偏师”，目前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继续推行“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方针，结果是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撤离鄂豫皖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必须充分认识“围剿”和反“围剿”、进攻和防御的长期反复，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战胜敌人。

3. 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

毛主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战争的全局，从横的方面讲，它由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组成；从纵的方面讲，它包括战争的整个过程，各个阶段。战争的局部，是战争全局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阶段；而战争的全局则是战争局部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战争中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可以是中央和各战略区的关系；可以是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是战争的全过程与战争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它不仅是战争指导者所应关注和掌握的问题，也是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所应了解的事情。因为虽然是下级指挥员，但也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处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本单位的问题，为争取全局的胜利作出贡献。

4. 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

毛主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里他用舞台和导演的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阐明了客观物质条件和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只有在掌握战争规律和认识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节选自《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7—95 页。作者当时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政委，为红大学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5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历经千辛万苦，几次往返草地，1936 年 10 月，我们终于到了陕北，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

刚到保安的第三天早晨，同志们正准备洗补衣服，三局局长王净同志从外边走来，小声而又激动地说：“同志们，快快收拾一下，毛主席就要来看你们了。”

我们的电台原是属于总部的。长征过草地时在毛儿盖才被派往左路军总指挥部。从那以后，一年多没见过毛主席了。现在听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大家高兴得跳起来。于是大家急忙放下衣服、针线，围着王净同志问这问那。王净同志见大家那高兴劲，连连挥手嘱咐说：“同志们，毛主席忙得很，白天、夜晚都开会、写文章、做报告、给红大讲课，挤时间来看我们，真是太关心我们了。毛主席来了以后，一定要肃静，千万不能像过去那样缠着不放。……”

王净同志这番话，不禁使我回想起在江西苏区时的一些情景。

那时候，毛主席就十分关心通信干部的培养教育，经常到我们电台来，和我们谈话，问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每次来了，我们总是缠着他，舍不得让他走。有一次，毛主席问我们，懂不懂得通信工作的重要性？当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小鬼”，只知道干工作，对于本身业务的重要意义，懂得不太多。毛主席见我们一时答不出，就说：“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块‘鲁班石’一样。”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辛辛苦苦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于是匠人们四出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山，涉过了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用的石头挺合适。搬去一试，正好不大不小。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的。他从此路过，量量桥身，又看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悄悄地按尺码凿好一块丢下，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鲁班石”。毛主席停了停又说道：“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人种，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那以后，我们就常用“要做革命的鲁班石”这句话来鞭策自己。

我正在凝神地回味着过去，忽听得有人高喊道：“毛主席来了！”同志们早已忘记了整队，都向窑洞外拥去。这时，毛主席微笑着走过来。他那稳健的步伐、慈祥的神情，还和过去一样，只是脸比长征路上又清瘦了。他边走边挥着手说：“今天我特地来慰问你们。同志们一路辛苦了！”

毛主席进了窑洞，和以往一样，在我们中间坐下，开始了亲切的讲话，他说：“这一年，你们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这算不了什么，革命的道路总不会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如果有人因为吃了点子苦，就不愿在四方面军工作，那就不对了。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军队，今后，我们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人去工作，和他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讲到革命形势，毛主席说：“现在形势空前好，新的革命高潮就要来了。今后通信工作也要大发展，你们的担子更重了。”

讲到这里，毛主席又笑着问我们是不是还有人不安心工作的。他好像已经了解到，近来我们有些同志的心又动了，想到抗日前线去，不愿在后方。自然，在毛主席面前，谁也不肯说这话。毛主席见大家笑着不回答，就说道：“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在哪里工作，就到哪里去。”他又说：“革命事业总得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谈话，总是那么通俗，好打比喻。讲着讲着，他又打了个比方：“有些人瞧不起挑大粪的工人，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把他们看作下等人，这是很不公平的。拿上海来说，那是个大城市，高楼、大厦，很繁华。你们说说看，这个城市要是没有挑大粪的工人会怎么样？上海不就变成臭海了？……”

同志们听着，都笑开了。不过，大家都深深地懂得，毛主席的这个比喻，和那鲁班石的故事一样，其中包括多么深刻的真理！

（刘泮林：《要做革命的“鲁班石”》，《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7页。）

6 “逼蒋抗日就像女人生孩子”

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胜利会师后，中国革命已处在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斗争的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党中央为了培养大批具有较高军政素质的干部来承担这伟大的重任，1936年6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我们二方面军，由于经过一年来的长征，部队严重减员，进行了缩编，一批团以上干部编余下来，二方面军首长决定把这批干部送到红军大学去学习。那时我是二军团四师十二团的政治委员，9月在甘肃南部成县战斗中负了重伤，虽然伤势还没有好，也确定到“红大”去学习，我听了很高兴。

从陇东到陕北，到处沟梁纵横，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终于来到了党中央和“红大”的所在地保安，从此，我们便在离保安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里，与四方面军的一批干部编为“红大”二期新一科，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

转瞬之间，1936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也从过去那种如火如荼的战斗环境开始稍为安定下来。正当我们安心学习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起来了！这就是中外闻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影响下，被蒋介石逼到西北来打红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顺乎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不愿当亡国奴，甘愿冒“犯上作乱”的罪名，以大无畏的英雄胆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凛然向蒋介石请缨抗战而不成，百般无奈，才实行兵谏，以逼迫蒋介石同意联合共产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么大的事件，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转瞬之间，形势陡然大变。这个消息，一时间震动着我们“红大”所有人的心，我们兴奋到了顶点，大家都睡不着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岁月里，我们同蒋介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南方喊到北方，做梦都想着何时才能等到这一天。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件大事，没一个人不主张把蒋介石杀掉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干部，几乎都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压榨下穷得叮当响，没吃没穿，受不了那种残酷压迫才出来当红军的。不少人当红军后，亲人又被反动派杀害了，人人都同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还是在那个麦场上，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布棉大衣，脚踏一双老棉鞋的毛主席，自来来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红大”的学员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整齐地席地而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次听他讲话，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由于事情关系重大，我们听得入了神。

毛主席在队伍前边一面走动一面讲，还比划着手势。他那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诙谐、响亮、浓重的湖南乡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大家都认真地听他讲，生怕漏掉了一句。特别是讲到我们党中央将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个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桩事情呢？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响应我们党的倡议，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要求蒋介石联合我们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要蒋介石答应他们不再去打红军，被迫捉了蒋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级官员，逼迫他们抗日。我们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去协助他们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就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向蒋介石晓以抗日的大义，调解好这件事，逼迫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当时，蒋介石出于无奈，已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所以毛主席说，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争取，逼迫蒋介石执行。能这样做的话，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毛主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这就好比女同志怀了孩子，今天不生，明天也不生，非到足月有了压力，或是遇到了偶然的状况产生了压力才生的。生孩子也是逼迫出来的啊！你们不相信？他用手指着听报告的一些女同志说，请问她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大家听了，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自己也笑了。

我和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过去都只是听说过毛主席，今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精辟而又诙谐的报告，都兴奋极了。在回驻地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说毛主席讲得多么好、多么透彻啊，也都觉得忽然一下子长了不少的见识。我们从中看到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英明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个法宝使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初到“红大”，我们就受了这样一次生动的斗争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听毛主席一次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摘自杨秀山：《延安熔炉》，见《苦斗十年》（下册）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65—468页。作者当时为红二
军团四师十二团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7 从瓦窑堡、保安到延安

一天下午，我接到组织命令，调我到司令部去工作。我感到很突然，又舍不得和熟悉了的同志们分开，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我背起行李卷，和同志们握手告别，向杨家圪台走去。

在司令部里，一位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贺清华同志，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调你给主席当警卫员。”

“给哪个主席当警卫员呢？”我不由得问道，因为当时军委、苏维埃叫主席的首长很多。

“呵，你还不明白，”他爽朗地笑了，“叫你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毛主席？……”我吃惊地重复了一句，两眼紧盯着他。他肯定地点了点头，接着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的工作……”

主席住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主席不在家，开会去了。李久长同志也是主席的随从警卫员，他告诉我，除了我们四个随从警卫员，保卫主席的还有警卫连的手枪班。手枪班负责警戒放哨，我们的工作照管主席日常的生活及外出时的安全。他最后说：“主席工作很忙，要很晚才能回来，你先休息吧。”

第二天一清早，警卫员李久长从主席住的窑洞里出来，对我说：“主席刚起床，吃了饭还去开会，叫你去见见面。”

我走到主席门前，心里觉得有些不自然。李久长见我犹犹豫豫地，便拉住我的手说：“没有关系，主席很和气，进去吧！”他见我仍然不好意思，就放开我的手，推开主席的窑门，站在窑洞里叫我：“贺清华，快进来呀。”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轻轻地走进窑洞里。

毛主席背靠着墙坐在炕上，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腿上盖着被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正在看着手中的文件。李久长报告说：“主席，这是刚调来的警卫员。”

主席慢慢抬起头来，随手把文件放在一旁，微笑着说：“噢，你叫什么名字？”

“贺清华。”我急忙立正，一面给主席敬礼，一面回答说。而心里更感到难为情；我的个子刚刚比炕沿高一点。

主席又问：“哪个贺字？”

“加字下面一个贝字。”

“从哪里来的？”

“保卫局。”

主席说话的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感到很亲切。他接着问我多大了？家住在什么地方？听说我是延川县永坪区贺家崖的人，主席高兴地说：“永坪，我到过，那里还出石油嘛！”

接着，主席问到我家有什么人、分了土地没有、什么时候参军……在我回答的时候，主席一直很注意地倾听着。最后，主席问道：“调你来帮助我工作，你愿意吗？”

“愿意。就是怕做不了。”

“我这里的事情很简单，你学一学就会了。”主席下得炕来，“好呀，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这里有个陕北人，叫白海山，是瓦窑堡的人，跟我几个月啦，你可以问他。”

初次见到主席，便给予我许多深刻的教育。我曾经想过，革命部队再艰苦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生活上和我们多少总会有些不同吧？事实和我的想象恰恰相反，就说主席身上披的那件棉衣吧，和我身上的粗布棉衣是一样的，领子上也缀着红领章。主席睡觉的炕上，只有一床普通的白布被褥，连个枕头都没有，只是在薄薄的、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下面垫几本书，或者就脱下棉衣卷起来当枕头。窑洞里唯一的陈设，要算炕上那两只用白铁皮做的文件箱了，跟乡下货郎担挑的箱子一样，主席经常坐在炕上，伏在文件箱上看电报，写文件。吃饭的时候，主席和我们一样，吃的是陕北的小米干饭。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活，是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呵。

在瓦窑堡，主席住在第三道城内河滩上一座砖砌的窑洞里。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党的政策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的街头上，纷纷出现了“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回东北去！”的抗日标语。但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在继续进攻我们红军。

端午节这天，老乡们都在欢欢喜喜地包粽子，过佳节。中午，主席正在休息，我们几个警卫员上完了政治课回来，忽然，从瓦窑堡西门外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我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里，报告说：“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主席说：“请参谋长来。”

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头寻找，没有找到张云逸参谋长；大家心里非常焦急，因为瓦窑堡目前没有部队，红一方面军到甘肃一带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去了，只留下一个通讯连和一个保卫队。我们根据枪声，估计敌人来的不少。瓦窑堡已经处在最紧急的时刻里。张参谋长亲自带领通讯连、红军大学的学生以及保卫局等能参加战斗的所有同志，赶到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参谋长从火线上赶回来了，告诉主席说，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而我们只有一个通讯连，红大的学生枪少弹乏，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或手榴弹。这时，周副主席来到了，张参谋长建议说：“主席，敌我力量悬殊较大，最好现在就转移。”

主席很镇静地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并且逐渐向我们逼近了。我们几个警卫员早已把主席的文件、用具收拾好，牵来了小黄马。看看主席，还在和周副主席、张参谋长商谈工作呢。我走进窑洞，请求说：“主席，该走了吧？”

主席慢慢侧过身子，亲切地看着我，不慌不忙地说：“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嘛。”

我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不住，坐不下，摸摸小黄马，看看主席的行装，随后爬上了主席住的窑洞顶上。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部分敌人在向灵虎山冲去，另一部分敌人仗着人众枪多，向西门发动了集中冲锋。我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主席。大家再三请主席动身。主席平静地问道：“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主席，快走吧。”大家纷纷劝说。

主席又细心地在窑洞里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落的文件和东西，然后说：“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河滩，穿过街道走去。敌人的子弹“吱吱”地尖叫着从主席和我们的头顶上空飞掠过去。我的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心急得快要跳出来了，看看主席，他始终是那样镇静、从容不迫的也不骑马，就跟平常行军一样，稳重地迈着步伐，连头都不低一下。当我们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主席所料，敌人正巧进了西门。

刚走出南门，忽然发现从半山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主席立刻向伤员走去。我认出伤员是保卫局的李科长。他的伤势很沉重，由于流血太多，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主席不顾头顶密集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叫把他的担架抬过去，让伤员躺在担架上，查看着伤员的伤口。伤员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的主席的被褥都染红了。这时，伤员慢慢清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一见毛主席站在面前，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还留在后边！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吃力地

摆动着手势，请主席赶快离开火线。主席亲切地安慰了他，转身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说：“路上要小心一些，好好照顾伤员。”直到担架在前边走了，主席才移动了脚步。

我们进入一人深的沟道里，走了不远，突然发现从红石砬山上窜下来十几个敌人。我们立刻紧张起来，紧紧跟随在主席左右，指定几个警卫员保护着主席先走，其他的同志留在后边，敌人不发现我们便罢，发现了就跟敌人拼了。警卫班的同志们都是每人一口马刀，一只盒子枪，这时刀出鞘，弹上膛，准备战斗。幸而我们是沟里，敌人没有发现，在山脚上拐进老乡的窑洞里抢东西去了。

到达阎家砬时，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保卫局的李科长牺牲了。”

主席很是难过，静静地佇立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并且通知他们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长征来的干部。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保安是一座县城，瓦窑堡只是一个镇子，按说，保安比瓦窑堡要红火热闹，能够买到一些食品和蔬菜，给主席改善生活。事实和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保安一带地贫人稀，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夏天穿着短衣裤，碰上这种草，身上就像虫子咬了似的发痛。城里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土筑的城墙已经倒塌了。只是斜靠着山坡有一些窑洞，窑洞里阴暗潮湿，夏天睡觉都得盖上被子。想买点日用品、食品或蔬菜十分困难，连个商店都没有。就在这样的地方，集中着大批机关，有中央局、军委、后勤部门和红军大学一、二科，医院等。

主席住在一孔被烟熏黑了的窑洞里，睡觉的炕是从墙壁上挖进去的，上了炕只能坐着，不小心就会碰到头。窑洞里只有制造得很粗糙的一张桌子和一只木凳子，中央首长到主席这里开会或者谈话，连个坐的东西都没有，我们总是临时跑到警卫班去，搬来用大树身砍的圆木墩墩给首长们坐。

主席的身体很弱，又有病，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在保安，更是夜以继日地开会、谈话、写文章，还时常到红军大学去作报告，深夜才回来。那时我们没有马灯，更谈不到手电筒了，主席经常要摸黑走山路。日常的生活又很艰苦，没有炊事员，没有厨房，只是在窑洞外面架起三块方石头当灶用，四个警卫员凑合着给主席做饭，没有菜，有时要跑很远才能买回一点干豆角、山药蛋。这样下去，必然影响主席的健康和工作，大家心里真急坏了。

这天，我和饲养员聊天，他说起十几里路以外的永宁山一带，老乡家里养的有鸡。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急忙和李久长商议了一下，便动身到永宁山去。结果不但买到两只鸡，还买到一些主席最喜欢吃的辣椒。有了鸡，四个警卫员就忙起来了，有的烧火，有的杀鸡，李久长更是神气，挽起袖子大显身手，做了个“白酥鸡”端了上去。主席看见了，奇怪地问：“呵，哪里来的鸡？”

我把买鸡的经过告诉了主席。主席摆了摆手说：“这次买了，下次不要再买了。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应该特殊。”

我解释说：“主席身体不好，这样下去……”

主席似乎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有意转移了话题，说道：“噢，这辣椒很好吃，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望着主席那瘦弱的身体，我心里一阵激动，急忙走出了窑洞。无论在怎

样艰苦的年代里，我们敬爱的领袖一向保持着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的革命品德。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陪主席在外边散步，来到一片荒地里，主席停住脚步，指着一种枝杆很高，长着圆叶，开着蓝花的野草，对我们说：“这叫冬苋菜，可以吃。”并且要我们经常扯一些，拿回去做给他吃。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主席从不考虑个人的身体和生活，而对于我们警卫员们，却十分关怀、爱护。有一次，我们几个警卫员到二三十里外的大山上背柴，回来就睡觉了。主席办公到深夜，忽然有事情要出去。警卫班的肖冲曾同志正在门口放哨，见主席要出去，就喊我们：“警卫员！警卫员！”主席立刻轻声阻止他说：“你不要喊了。他们今天背了柴禾，让他们休息吧。”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怎么能让主席独自出去呢？主席觉察到肖冲曾很为难，就说：“那么，你跟我去吧。”第二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又感动，又惭愧。

193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轮到我值夜班。夜深人静，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叶子龙同志送来一份电报。借这个机会，我走出去给主席换开水。我回到窑洞时，主席独自坐在灯前，一边看电报，一边微笑着，见我进来，便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主席加重语气重复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听了主席的话，我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坏蛋，也有这么一天，当了俘虏。我扭身就要走出去，好把这个消息告诉李久长他们。主席看到我这种匆忙的样子，笑着招呼我说：“不要走，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我正要走出窑洞，忽然又听到主席那亲切的声音：“贺清华，外边很冷，把我的棉大衣穿去吧。”

我抱着主席的棉大衣，回到住处就喊叫起来：“喂，醒醒，把蒋介石抓住了！”

李久长和白海山从炕头上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对看我直眨眼。我也顾不上解释什么，拖着白海山就去找首长们开会。

“西安事变”的消息冲破了黑夜的寂静，各单位住的窑洞里都透出了灯光，人们的心情激动着，议论纷纷。我们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首长们在主席的窑洞里开会，警卫员们都挤到我们的窑洞里来了，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赶快把蒋介石送到保安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他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主席窑洞里的会议，直开到天亮。不一会儿，我们得到通知说，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点在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我心里想，修飞机场，这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送到保安来。大家都争着要去，商议了一阵，决定李久长留下来保卫主席，我们三个人去修飞机场。

大家正干得起劲，忽然传来“嗡嗡”的声响，转眼飞机来到我们的头顶上，转过来转过去，一会高一会低，机场还没有修好，它哪里落得下来？飞机在天空转游了一会，只好返回去了。第二天，飞机场虽然修的差不多了，可是机场坐落的山沟太窄，两头也是山，飞机还是落不下来。第三天一早，周副主席便离开了保安城。

飞机场停工了。人们再也听不到飞机发动机的轰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里糊糊涂涂的，遇到一个机会，我就问主席：“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

了？不把蒋介石送来啦？”

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爽朗地笑了，然后说：“呵，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代表。周副主席已经到西安去了，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治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怎么？要放掉蒋介石？”我感到十分惊奇。

“是呵，放掉他，一切为了抗日嘛。”接着，主席精确地、通俗地向我们解释了“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亲日派的何应钦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这样，日本人就会趁机侵略我国……在毛主席细致、耐心的教导下，使我们认识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党中央和毛主席团结抗日的政策得到了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集团被迫停止了反共内战。

1937年1月，我们跟随主席离开保安，到延安去。

行军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安寨县一个老乡的家里。我烧暖了主席睡的土炕，收拾好东西，正要走出窑洞，主席叫住我说：“外面人多地方小，睡不下，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吧。”

这怎么使得？和主席睡在一个炕上，岂不影响主席更好的休息？再说，也不好意思呵！主席见我站在一旁犹犹豫豫的，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还害羞？没有关系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经过两天的长途行军，身体很是疲乏，而主席在夜里还要照常工作。我把主席晚上需用的东西准备停当，伸手摸摸炕皮，不算太热。灯影下，主席那魁梧的身体正坐在那里，精力集中地思考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工作，我轻轻地把褥子铺在炕的一边，盖着被子想躺一会，不料却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主席发现我睡着了，大概觉得我的棉被很薄，便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盖着。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主席的声音：“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

我翻身爬起来一看，由于火大炕皮薄，主席身下铺的褥子烤黄了巴掌大一块，中间还烧了个窟窿。我急忙把烧着的棉花弄灭，心里一阵难过，狠狠地责备自己，烧炕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检查炕皮的厚薄呢？只想到怕主席冷，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呢？幸好主席没有被灼伤……

主席看到我焦急的脸色，便亲切地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补就行了。来，换个地方睡。”主席把褥子重新挪动了地方，便又招呼我睡觉，并且要我仍然把他的棉衣盖上。

我躺在主席身旁，心情长久不得平静，主席慈祥的面庞和亲切的声音，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行军的第三天，就要到达延安了。主席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说说笑笑：“今天要到延安啦。在陕北来说，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好得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啦！”主席接着告诉我们，延安过去一直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刚解放这里，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到了延安，一定要很好的注意群众关系。

就要到达延安了，听说能够看到飞机和汽车，我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一个个精神焕发，忘却了旅途的劳累。来到杨家岭沟口，远远望去，河对面的

大砭沟口上人群蠕动，他们等待着欢迎毛主席。

这时，军委总参谋部的曲参谋领着几个人，迎面向我们走来。曲参谋向主席报告说：延安市各界代表前来迎接主席。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有一个代表牵着一匹高大的骡子，骡子头上扎着红布花球，脖子上吊着铮光发亮的铜铃铛，请主席乘骑。主席不肯骑，一边和大家谈着话，一边踏着冰面，步行过了延河。

欢迎主席的群众，有机关干部、学生、战士，扶老携幼的延安市民，以及从延安周围的甘泉、邠县赶来的农民代表，聚集了一万多人，从大砭沟口到城北门排了几里路。毛主席穿着灰土布棉衣，戴着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便掀起狂欢的浪涛。主席清瘦的面庞上，浮现着亲切谦和的笑容，不时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人们更加兴奋、跳跃。“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声、鼓掌声、清脆的锣鼓声震荡着山谷和平静的延水河。

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延安，延安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光芒万丈的灯塔，它指引着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照耀着广大青年，使他们能够冲破重重阻挠，奔向延安，投入党的怀抱。

（摘自贺清华：《随从毛主席在陕北》，见《红旗飘飘》第13集，第35—47页。作者当时为毛泽东的警卫员。）

8 保安聆教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党中央开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以便培养干部，走向抗日前线。

红一师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的有杨成武、谭政和我。

“红大”设在小巧玲珑的环山城镇瓦窑堡。中央调林彪来任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政委。从第二期开始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由罗瑞卿同志任教育长。后来又改称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红大”第一期分三个科。我们这些师以上干部在第一科，科长是我的老上级陈光同志，政委是罗荣桓同志。

瓦窑堡是党中央驻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都驻在这里。6月21日，敌人突然袭击瓦窑堡，中央机关移驻保安县（即今志丹县）。“红大”亦随中央迁在保安。

保安在古代属边陲要塞，北面就是万里长城。从残留的城郭痕迹来看，过去的规模还是不小的。由于时间的湮没，近代已不怎么出名了。只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还被保留着，显出当年的一些繁华来。

我们就以这些山洞为校址。这些山洞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野狼吃过的兽骨，人走进去，扑面乱飞出一群蝙蝠。“红大”一科的学员全是师以上干部，现在全成了清洁工。我们清理好卫生，自制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的同志说：“嗨！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就缺一张兽皮喽！”

毛主席来看我们的“最高学府”后，风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我们参的是马列主义之“禅”，悟的是中国革命之“道”。

“红大”除一科外，还有二、三科，培养初级指挥员。

“红大”的老师很多，毛主席、洛甫（张闻天）、林彪、李德、凯丰、吴亮平、秦邦宪、杨尚昆、李维汉等，都给我们讲过课。周恩来同志以形势报告的形式，负责给我们上时事政策课。

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军委决定调我到四军去任参谋长。

周副主席是用商讨的口气说的，我也就坦诚相见，讲了我的想法。我说：“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我还是留在一方面军好，四方面军我不熟悉。”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约见我。那天是个冬天的晴日，阳光很好，我们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主席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我说：“你讲的是淥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他说：“对头。哎，叫你到四方面军去哩。”

我坦白地说：“周副主席打过招呼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一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同志以劝说的口气说：“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我知道是非去不可了，便问：“请示主席，叫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同志说：“去当参谋长。”

我问：“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同志停下来，看着我：“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我认真地对他说：“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毛主席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他们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我明白了，便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请示怎样开展工作。

毛泽东同志说：“送你两句话：开始跟着走，然后赶上前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右手在胸前做了个一推、再一推的手势。

我说：“那我就按主席的指示办。”

12月8日，罗荣桓同志把一大叠有关毕业手续的表格办妥交给我，几位老同学还搞了点肉，算是送行。1936年12月12日，我到盐池四军军部，就任了参谋长。

（摘编自《耿飏回忆录》第335—343页。）

9 毛主席派我们联系高敬亭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正当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近结业的时候，接受了毛主席亲自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跟随郑位三、肖望东同志到红二十八军参加整训、准备东进抗日的工作。

约略记得是在7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教室里听课，我们五队苏振华队长的通信员来叫我，带我到中央招待所去找郑位三同志。到了郑位三同志的住处，只见肖望东同志和张体学同志早已在座。肖望东同志我头次见面，张体学和我在当“红小鬼”时就很熟悉。我一到，郑位三同志就说：“我们马上就毛主席那里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听说要去见毛主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不多久，我们几个人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处。这是一座用砖石砌成的窑洞，中间是个会客厅，但是什么桌、椅、茶几、茶具都没有。左边一间可能是警卫员或秘书住的，右边一间就是毛主席的住房兼办公室。毛主席的住房里只有一个土炕，上面安放着一个床铺，铺上垫着一条灰色旧军毯。那被子还是毛主席长征时所用的，已经破旧得不像样子了。靠着窗户有一张旧条桌，靠墙放着一张旧“太师椅”，还有一张长板凳，一个旧的木立柜。桌上放着书、文件、报纸、毛笔、砚台，还有毛主席长征时用的一个搪瓷杯，搪瓷已经剥落了不少。此外室内再没有别的摆设了。

毛主席身穿一件旧灰色军装，裤子打了两个大补丁。他满面笑容，操着湖南口音说：“欢迎你们，我在这里专等你们来。”位三同志指着我和张体学同志向毛主席介绍说：“他们两位在红二十五军时，都曾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敬亭同志对他们很熟悉，很信任。”毛主席说：“那太好了。”此时，我还搞不清为什么提起高敬亭同志。

毛主席接着指着郑、张和我说：“你们都是从大别山长征出来的同志。”又指着肖望东同志说：“他同我一道走了两万五千里，才同你们和陕北红军会合。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剩下这批同志，党中央在这里建立抗日的大本营，真不容易啊！”毛主席的感叹很快也感染了我们，想着长征途中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大家都默不作声。

沉默了一会儿，毛主席又说：“可是，我们尤其要记住，还有大批留在南方各个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那些老根据地的军民，不怕敌人的围追、堵截、烧杀、抢劫，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战斗，他们更加艰苦，更加不容易啊！”毛主席这一说，又把我们引向了对远方战友的深切怀念，室内气氛一片肃穆。

“这次请你们四位同志来，就是派你们到鄂豫皖去找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同志。你们四人先去，中央随后再派一些干部去红二十八军工作。”毛主席指着郑、肖二位说：“你们两位为党中央的代表，由你们向他们传达党中央有关抗日的主张和指示。”接着，毛主席又说：“红二十八军有位同志派人找到红二十五军，向党中央转交了一个报告。”位三同志插话说：“是的，那位同志叫何耀榜，是皖西特委书记。”毛主席说：“从报告看，他们与敌人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党中央高度赞扬红二十八军同志们所取得的成绩。”

毛主席对我们到红二十八军去如何开展工作，做了许多具体交代，并强调地说，高敬亭同志在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收集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经过艰苦奋斗，保存了这么一支红军队伍，很不容易。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况，不能用一个样式去套，要很好团结他们，统一在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之下，一道抗日，发展胜利。

毛主席用手拢了拢头发，给位三、望东二位同志递了烟，自己也点燃一支吸着，继续说道：日本帝国主义要想霸占中国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誓死保卫每一寸神圣领土的决心是下定了的，我们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一场殊死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真正成为抗日的主力军，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我们的红军要扩大，还要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到我军，参加到我们党内来。接着，毛主席又为我们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他说，我们估计南方红军游击队还会有一段艰苦的斗争。在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时候，必

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既要讲联合，又要同他们的破坏、捣乱行为作斗争。说到最后，毛主席又回到了我们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党我军内部要亲密团结，我们从延安去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要同那里的同志搞好团结。我们内部的团结搞好了，就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主席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钢壳怀表，看看快到11点钟了，他问：“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大家都说一说。”我们都表示：坚决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毛主席高兴地说：“今天就谈到这里。祝你们工作顺利，一路平安！你们找到敬亭同志以后，尽快报告中央，并请你们代表党中央和我，向敬亭同志以及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老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和革命群众致意，向大家问好！”

我在回校的路上走着，想着：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太重要了，可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一个小干部去执行呢？下午在位三同志住处讨论毛主席的指示时，我就向位三同志提出我的疑问。他说：“高敬亭同志和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长期失去联系，大家觉得最好有一两个高敬亭同志所熟悉的同志随我和肖望东同志一起去，先联系上。毛主席为了稳妥、慎重起见，前两天找原红二十五军在延安学习的高级干部普遍谈了话，征求大家的意见，派什么人去好，如何去法。我就想到你和体学同志。他对你们很熟悉。你们随同去比较合适。”

经过辗转行程，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到达黄安七里坪，见到了高敬亭同志。久别重逢，他分外高兴。这天晚上，敬亭同志在他住的蔡家祠堂里，把他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收集留下的分散人员，成立红二十八军，同敌人坚持三年艰苦斗争的经过，向我们作了详细介绍，还简要叙述了最近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情况。敬亭同志对党中央派郑位三、肖望东等同志到红二十八军来工作表示非常欢迎。

在七里坪召开的祝捷大会上，郑位三和肖望东同志向坚持三年艰苦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全体同志以及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问候。不久，第二批从延安派来的30多名干部也到达了七里坪，我们即会同一起，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协助高敬亭同志将红二十八军改为新四军四支队，组织学习整训。四支队经过整训，战斗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于1938年初春开赴皖东，奔向了抗日前线。

（摘自程启文：《从延安到七里坪——回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一项任务》，作者1961年8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第四编

抗日烽火燃燎原

一、雄才韬略领导抗战

1 洛川会议定方向

全国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洛川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张闻天、凯丰、博古、关向应、刘伯承、肖劲光、徐向前、罗瑞卿、贺龙、李富春、徐海东、张浩、周建屏等同志和我，张国焘和林彪也参加了会议，一共二十几个人。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担任会议记录。

洛川会议是8月22日开始的。毛泽东、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就形势和任务问题作了报告，紧接着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时间比较长、议论比较多的，是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毛泽东同志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已经想到了更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林彪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当时的情况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一年多的时间，部队还没有大的发展，后勤供应方面，武器弹药、粮秣、被服都非常缺乏。这样一个现状，到前方同日本帝国主义硬拼，能拼出什么名堂来，非吃大亏不可！另外，我们开赴抗日前线，根据我军当时的能力和特长，只能是发展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拖住敌人，使敌人进攻时有所顾虑，阻止它长驱直入，以支持正面作战，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进而抑制一下弥漫于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如果只想到前方同日本侵略军拼几下，不重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的力量，怎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到25日，一共开了4天，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统一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上来了。不过，毛泽东同志也考虑到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把关于作战方针的提法作了一些变更，使之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就是：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然只提山地游击战，似乎也窄了一点。所以，我们出师华北之后不久，又改成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事

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我在洛川会议上讲得不多，作了两次比较短的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作战方针，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我所以笼统地提游击战争，是因为考虑到华北那个地方，还有不少的平原地带。我还讲到，出征之后，我们要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得到群众的密切配合，壮大人民的力量。因为秋季即将来临，出征的部队还穿着单衣、草鞋，过冬的服装尚无着落，我想到了部队的供应问题。我发言说，我军到抗日前线作战，士气是高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在经费和武器弹药等物资供应方面问题很大，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所以我提出，要尽量多筹一些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正在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但他们一味拖延，鉴于当前的条件和出征的紧迫，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自己。

经过洛川会议的讨论，对出征以后究竟怎么办的问题，思想上更为明确了。所以，在部队匆匆出征的时候，尽管前方战局混乱，我们对胜利还是很有信心的。

（选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0—343 页，作者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1955 年月被授予元帅军衔。）

2 抗日制胜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并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任何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总之，只有实行人民战争路线，才能发挥中国抗战的真正优势，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直至取得抗战胜利的长时期中，党面临的的就是实施统一战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并制定和实施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原则。

这期间，我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纠正了党内有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领导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提出了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原则，力克服抗旧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和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经验教训方面，据我的亲身体会，毛泽东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有关讲话和 1940 年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几次报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他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说明，关于统一战线中三种不同阶级势力的分析，以及关于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等斗争艺术的论述，至今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对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有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左翼进步势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间势力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右翼顽固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中的抗日派仍采取两

面政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了有倾投降主义。他们看不到上述三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区别，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的正确判断；轻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不了解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民主、改善民生的深远意义，等等。

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的解决也是解决主要矛盾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国际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力量交织的条件下，我党必须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当然，这种独立性又以下损害统一战线为前提，是合作中的独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发展进步势力可以采取“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等策略，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正是这样，我党坚持了已有的阵地，并以这种阵地为基础，以自己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吸引同盟者，实现对抗战的政治领导。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均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原则的实施，使统一战线得到了巨大发展。

第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实施这些策略原则及政策是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一环。

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不可一刻抛开的。针对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以及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根本原则。团结和斗争两者不可偏废，而以斗争为手段，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争取抗战胜利的目的。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民众运动，团结知识分子等等。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是必须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而且，要争取他们，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实行坚决的斗争，并能进一步取得胜利。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削弱、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影响和行为。对于他们中采取两面政策的抗日派，我们则必须相应地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团结其抗日、联共的方面，并同其妥协投降、反共的方面进行斗争。

在孤立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有理原则，是自卫原则、防御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原则，是胜利原则、斗争的局部性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作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有节原则，是休战原则、

斗争的暂时性原则，即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其未实行新的进攻以前，应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

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方面政策。具体表现为：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原则；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对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和抗日派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改善工人生活、发动工人抗日积极性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合理负担（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数量）的政策；坚决镇压汉奸和反共分子的政策；对一切抗日的人们实行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的政策；积极发展工农业和商品流通的政策；实行普及和提高人民大众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的政策；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等等。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正确地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才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毛泽东根据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思想，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在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它包括：实现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原则，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即在土地问题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工商业方面实行节制资本，国民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文化方面，则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等。实现上述原则，就是为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以至在将来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对此，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纲领。例如，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统一，创造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实现工业化，实现民族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等等。

毛泽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是根据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根据“七大”规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的要求而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是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形势下的继续。它表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我党总的政治战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

（摘自王首道：《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见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3页。作者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南下支队”政委）

3 大规模开展敌后游击战

1937年9月，在五台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向我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我军的总部署；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重点控制五台山脉，形成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间的广泛游击战争，配合晋绥军的正面作战。要准备如果敌人占领整个华北，统一战线和发动群众工作，应紧紧围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进行。

11月9日，太原失陷，以此为主要标志，华北的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正如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根据太原失陷后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同志对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作了如下的部署：第一，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寇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山西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如晋西北的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的五台、盂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的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的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第二，估计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部队不至退出山西，刘湘部亦有开入山西的可能，但不能指望他们长期支持战争，而必须以八路军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第三，吕梁山脉应成为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必须立即派主力一部（林彪师）前往开辟工作。一二九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第四，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的方针，自筹枪支、军饷。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团结左翼力量，打击汉奸势力。各师以一部兵力担负袭击敌人的任务，而以大部兵力尽量分散于各要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在大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的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的地区，后工作。“如此作去，期于一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之进攻。”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选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83—589页。作者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4 两篇光辉的著作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两个辉煌的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前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1927年至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战争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形势，把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由战术范畴提高到战略范畴，并具体规定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下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

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毛泽东同志并反复说明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预见地指出，假如敌人对于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缺乏估计，“它就一定要在这点上触一个很大的霉头”。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英明预见。在后一著作中，毛泽东同志针对着国内一些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从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明确地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出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他指出取得胜利的条件是中国人民大联合（这是主要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日本国内人民及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他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严正地指斥了国民党内部的妥协与腐败。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历史也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些论断的正确。

（摘自聂荣臻：《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75—177 页。抗日战争时期作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5 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平型关战斗结束以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我到一一五师去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我即奉命离开总部，到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里跑了约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与师部首长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了座谈，共同探讨我军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在同师部首长商量当中，我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师部首长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我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要我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以便上报。我将报告起草出来后，任弼时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很快毛泽东就批准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了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随后，党中央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离开部队回党中央工作后，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各部

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使部队政治工作得到加强。

（摘自《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1—262 页。作者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6 从山地杀向平原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是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作出的战略性决策。1937 年 8 月，在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之际，党中央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决定我军实行战略转变。8 月 22 日至 25 日召开的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在新的形势下，为了坚持持久作战，发展革命力量，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并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8 月底 9 月初，八路军由陕北出发，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到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寻机歼敌，一面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出师之初，党内一些同志在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上认识不足，想集中兵力打一些大仗、硬仗。国民党当局也要求八路军打正规战。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 9 月 17 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主要负责人，明确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21 日，毛泽东又发出《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25 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力唯一方向”，“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外）”。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上述战略方针原则为出师敌后抗日的八路军的军事行动指明了方向。

9 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 师之后，出师抗日。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正以重兵沿平汉、津浦、正大、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国民党在华北的军政人员弃城溃逃，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城市相继陷落，华北地区一片混乱。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我们 10 月初渡过黄河后即分兵两路袭击进犯太原的日军，10 月 19 日夜袭击阳明堡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 24 架，接着又在正大路南侧晋东南地区的七亘村、神头、响堂铺、长乐村、黄崖底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前后又歼敌数千人。这是我军出师后取得的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证明了党的游击战方针的正确，打破了部队中某些人不相信游击战能有力打击日军的错误观念，鼓舞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胜利信心。

把游击战由山地推向平原是在上海、太原失守后，在创建和扩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步展开的。1937 年 11 月初，日寇占领上海、太原后，在华北一面分兵控制已占城市和交通干线，一面沿津浦路向东进犯。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一二九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11 月中旬，师主力分别在同蒲路东侧、正大路南侧展开，各团以营连为单位，

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抽调一批干部和连队，组成武装工作团，由宋任穷、王新亭和我等几个主要干部率领，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磁县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扩大部队。在地下党的积极配合下，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了。这时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山区，因为山区对开展游击战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山区贫穷，人口稀少，给养和兵员部有困难。为了扩大队伍，坚持抗日战争，必须把根据地扩展到平原去。当时太行山下的冀南平原，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日伪军占领了大部县城，且各地土匪、失散军人等，打着各种旗号拉队伍、霸地盘、欺压百姓，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我地下党组织尚未同北方局取得联系，乃求援于太行八路军。此时，我师正苦战于太行山区，对到平原去开展工作还无经验。为支援冀南党组织打开局面，也为摸索如何在平原进行游击战，师首长于12月派孙继先和胥光义率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挺进支队出太行山，深入冀南平原。挺进支队发现除平汉、津浦铁路及德（州）石（家庄）、邢（台）临（清）公路驻有日军外，大部县城是由“皇协军”、“维持会”占据着，广大农村则由地主、民团和土匪武装统治着。挺进支队在地下党协助下站住了脚并开展了工作，但因力量太小还不能打开局面。根据八路军总部12月17日的指示，师首长又派陈再道和李青玉等原在冀南工作过的一些干部，率七六九团的一个营，组成东进纵队，挺进冀南。东进纵队同胥光义等汇合后，按照党的政策团结广大群众，正确处理了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等部的军事冲突，收编了保安团，在巨鹿、南宫站住了脚，成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和军政委员会，为打开冀南抗日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的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鼓舞了我们开辟平原游击战场的信心。1938年3月中旬，一二九师首长为了加强对冀南工作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到冀南，很快打开了南宫区域的局面，八路军在冀南平原站住了脚。

向冀南平原几次出兵的胜利，证明抗日游击战不但适合于山地，也适合于平原。河北和山东的经验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发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指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5月4日，毛泽东在给新四军领导同志的指示中指出：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够发展游击战的。5月14日又电示新四军：“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从此，敌后抗日游击战进入由山区向平原大发展的阶段。

（节选自刘志坚：《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作者在抗战初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7 抗战时期的交往

东征战役后，我参加红军大学的学习。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办的第一所大学，我是红大的第一期学员。当时红大分为一、二、三科，我在第一

科学习。第一科的学员多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其中有罗荣桓、林彪、陈光、罗瑞卿、彭雪枫、刘亚楼、苏振华、张达志、武廷（朝鲜同志）等等，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的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了消灭战争，就必须坚决地进行革命战争；为了消灭红军，就必须发展壮大红军；为了消灭共产党，就必须发展共产党。我当时听到这样讲法，还不能立刻领会其深刻意义。后来经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并经过仔细思考，我才领会到这几句话的含意是非常深刻的，充满了辩证法。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写《矛盾论》时，又阐明了这一辩证思想，他说：“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在这期学习中，毛主席亲自为我们一科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他几门课，如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分别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同志讲授。毛主席在讲课中既不用资产阶级军事战略学的教科书，也不用苏联的军事课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研究它的规律性，自己编写教材。他从一般战争规律讲到革命战争规律，从革命战争规律讲到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深入浅出，生动具体，多是我们这些学员亲身体会过的，大家十分爱听。在讨论中，他再把我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结合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战例加以概括、充实。他就这样边讲边听取学员意见，边修改自己的讲稿，最后形成了后来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的著作。这是他吸收了全党同志的智慧，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我在这一次学习中，亲身感受和了解到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红大学习后，我参加了红三十一军援助西路军的准备工作，后在湖北省委工作一年，以后又参加了新四军五支队的抗日武装斗争。这正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当时在实际工作中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最主要的是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坚持全面抗战以及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而明确的回答。我列席了六中全会，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受到深刻的教育，会后我即出发到前线，传达和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以后少奇同志又到皖东进一步对六中全会精神作了深入阐述。在毛主席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的指导下，新四军五支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坚决实行这一方针的地区和部队，就遭到失败和挫折。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941年3月，我和戴季英同志从淮南半塔集（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当时各地出席七大的代表正在陆续到达延安。我们到达后去看望毛主席。他和我们互相问候之后，就向我们说：皖南事变你们都知道吧？项英同志就是相信国民党，相信顾祝同，不听中央的话，不相信党中央，把椅子搬到顾祝同脚下坐着，顾祝同脸色一变，一脚把他踢翻了。他还说，你们来开七大，七大要等些时开，你们要先好好学习，学习党的历史。

在延安时，我有较多的机会和毛主席接触，经常听他的报告。他虽是全党的最高领导人，却平易近人。他作报告或与我们谈话，常常是谈笑风生，引经据典，以古喻今。他那渊博的知识，总能吸引、征服听众。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去杨家岭毛主席住处参加谈心活动。这是在他家经常进行的活动，内容不限，谈工作、谈哲学，有时也了解一些同志的个人经历。那次参加谈心的有周恩来、陈云、彭真、任弼时等同志。大家谈兴很浓，直至吃饭时间，毛主席说：到吃饭的时候罗！这是用我的稿费请你们吃饭的。1945年元旦，我和中央党校的同志一起到毛主席家拜年。他正在院子内抱着小女儿玩，见我们来了就谈起来。他说，我们干了20多年革命，没有学会积蓄力量，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这就不愁吃，不愁穿。他们已扩大了1万多地方部队。今年各根据地生产做得好，部队每人每日5钱盐、5钱油、1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还讲了我们都很关心的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南下的消息。他说他们在50天内穿过了两省，顺利地由洛阳以西趁结冰时渡过了黄河。我们1944年秋天，在欢送王震同志南下的大会上，还听毛主席说到要发扬松树精神和柳树精神，南下支队就是以松树的坚定性和柳树的灵活性到敌后去战斗的。

从1941年到1945年的5年中，我有机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参加了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们来延安参加七大的代表都进入了中央党校各部学习。这场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毛主席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1942年1月始），先后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这些报告成为整风学习的主要内容。他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党的实际、个人的实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文风中的党八股三十大敌，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我结合文件学习，针对我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写出了一些心得笔记。其中一篇“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四条标准的反省”一文，毛主席阅后，在1942年8月25日亲笔批文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文章中的错字和标点符号都作了改正。毛主席对干部的教育和关怀认真细致，使我深受教育。在党校一部学习一段后，我被调到党校三部工作。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过程中，经常召开整风学习小组汇报会，研究整风中的问题。关于整风审干的九条方针，就是在这些会议上逐条讨论总结形成的。由于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使整风审干工作得以排除干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与此同时，在全边区和各解放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上自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下到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参加了生产。我们党校三部结合生产劳动进行思想教育，收到显著的效果。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为文艺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座谈会的指引下，延安开展了一系列为群众所喜爱的文化艺术活动，如京剧改革、广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等，党校三部很多同志参加了这些活动。

党中央为了贯彻整风精神，在召开七大以前在延安分地区召开“山头会”，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座谈了历史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并克服了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

中产生的“山头主义”思想。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路线觉悟，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在党的建设方面也是一次飞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在大会上得到生动体现。毛主席的开幕词及《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中的经验教训，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毛主席曾两次讲话，反复阐述了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一看二帮的方针。在闭幕词中毛主席要求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下走决心，全心全意依靠群众去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我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受到的教育和鼓励，终生难忘。

（节选自郭述申：《革命生涯中难忘的导师——回忆毛泽东》，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作者当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新四军五支队政委、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建国后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中央监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等职）。

二、身居窑洞指挥抗战

1 开创晋察冀根据地

平型关大战之后，一一五师转回到五台。

在五台，我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发来的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几个电报。在八路军出师华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这个问题连续发了一系列电报。这些电报，有的是单独发给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的，有的是同时发给八路军各师和北方局负责同志的。有些电报，我们在北进的路上就传阅过，有的是从平型关下来才看到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些电报中，再三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他认为，当前红军的拿手好戏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就要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指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能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他又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河北党应全力发展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势，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以备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后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

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波浪式的发展”——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创建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它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50年代刊，我在一次答复有关方面提出的询问时，曾结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体会，归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我把这个概括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认为这个概括是准确的，并批示同意。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其他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正在展开，我们的成败，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困难很大，究竟在敌后能不能存在？许多困难能不能解决？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惦念的事情。如果我们这里成功了，其他地区也可以这样搞。结果是，我们在敌后牢牢扎下了根，敌人的围攻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初步积累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开始形成一些稳定的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切，自然是非常高兴的。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我们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同志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毛主席还把晋察冀的情况介绍给外国朋友，白求恩是1938年6月来到晋察冀的，我在五台金刚库迎接了他。白求恩告诉我，他离开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同他谈了话。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白求恩到来后，曾对我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庙宇。白求恩的一番话，把我们大家都逗乐了。

1939年1月，我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我们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还分别为它作了序。毛泽东同志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希望我们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来。毛泽东同志的称赞和推荐，对我们是过誉了。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何创时期工作的肯定，使我们倍受鼓舞，看到我们所走的斗争道路是正确的，是中央所希望的。

（摘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487页。）

2 太行山上打豺狼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

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

1937年9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继一一五师、一二师之后出师抗日，到达了山西前线。

1937年11月初，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主席指出，抗战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党内、在全国都要反对投降主义，既要坚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明了持久战的道理和游击战争的重大的战略作用，并且英明地指出了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道路。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以无比的光辉，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

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一面命令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大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起来。太行和大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了。

太行山上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的主力又三战三捷，歼敌数千。敌人感到这块抗日根据地对它的威胁太大，于是在4月初，集中了3万多人，举行九路围攻，企图合击歼灭我军。但是我军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机动灵活地转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并且于4月16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了敌人的一路，以极为勇猛的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然后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歼敌2000余人。这一战，给了敌人九路中的主力一八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人即纷纷回窜。我各部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敌人赶出晋东南。粉碎敌九路围攻的胜利，使我们的脚跟在大行山上站得更稳了。

从1937年冬到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和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大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这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的结果。

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不仅和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和省、县等各级官员，在日寇进攻面前狼狈逃窜，但当我军奋勇抗击敌人，收复失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时，他们却又回头来对我们加以多方的限制和破坏，叫嚣要向我军“收复失地”。我们始终是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夹击之下，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诱降、英美劝降的形势下，加强了反共活动。11月，国民党调整了他们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力量，安排了互相配合着的三路反共大军：一路是以它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条山区的军队，配合阎锡山反对山西新军的活动，从南面、西面压迫我军，企图消灭太行山南部与晋南的山西新军和八路军；一路是以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所部进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钟麟等，企图控制冀西地区，割断我太行和冀南的联系，尔后进取冀南；一路是以石友三部的两个军和冀察游击总指挥孙良诚等部，从东面向冀南、冀鲁豫我军进攻。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开始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国民党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投降活动，我党早有准备。毛主席在1939年下半年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文件中，早已指出了这种形势，要全党作好准备。并且，毛主席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总结了我党过去斗争的经验，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主席的这些著作，武装了我们的头脑，使我们能够清醒地来进行斗争。

在晋东南，我们一方面严正地拒绝了蒋介石逼我退出太行山南部和太岳区的命令，另一方面，集中打击攻我最为积极的孙楚所率的独八旅及阎锡山的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二旅。当蒋系的二十七军向我太岳区进攻时，我一面派人与之谈判，晓以曲直利害，一面给以适当惩戒，制止其进攻。在冀西，对附敌有据，罪恶昭著，人民蓄恨已久的侯如墉、乔明礼等部，实施进攻，将其8000余人大部消灭。在朱怀冰部南撤后，我一面对其保持戒备，仍望其能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转而抗日；一面集中冀南、冀鲁豫及冀中军区、冀鲁边区的部分兄弟部队共25个团，给附敌反共的石友三部以坚决打击，毙伤其3000余人。3月初，在平汉路以东、以西，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部、朱怀冰部的战役，经过4大战斗，将石友三部击溃，余部逃往陇海路边，将朱怀冰部大部歼灭，我控制了邯长路以南、临淇以北的地区。

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胜利。在斗争中，我们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坚决执行“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因而能够扭转严重的形势，稳定局面，使人民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果实得以保持。

以后，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和进攻，继续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无一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因而都赢得了胜利。

1941年以后，日寇更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加之，1942年、1943年连年灾荒，根据地的斗争愈来愈艰苦、愈困难了。

党中央毛主席指出1941年以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全党全军增强团结、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争取胜利，并且宣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和《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强调了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使战争的机构适应战争的形势，要求各个根据地都要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指出这将会发生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立于不败

之地。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指针。

1942年，晋冀鲁豫全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根据地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一样，坚决地实施了“精兵简政”政策。各区都抽调了大批干部，进入党校或组成干部整风队，进行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在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改进了领导方法，更加认识了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更加紧密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周围团结起来。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大反攻。晋冀鲁豫全区军民坚决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勇猛地向敌人展开大反攻，在一个短时期内即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了县城59座，和全国兄弟战略区相互配合，获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所获得的胜利，是党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人民的胜利。毛主席对于抗日战争，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并根据这种分析，确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又根据战争发展的情况，制定了实现这个路线、原则、方针的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这是抗日战争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能够迅速开创，能够粉碎日寇的多次围攻，能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多次挑衅，能够在敌顽夹击下克服严重困难转入反攻、取得胜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军民同命，英勇奋斗的结果。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在长期艰巨的斗争中，无数的事实都教育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丝毫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只有跟着毛主席走才能胜利。

（摘自刘伯承：《我们在太行山上》，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第126—144页。作者当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3 创立冀东根据地

抗日战争初期，党中央就已经注意冀东地区了。

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就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它的如意算盘是，占领了冀东，不仅可以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而且可以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七七”事变前后，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过冀东运送的。

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示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同志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来电报，指示说：以雾龙山（即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

但这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从红军骨干比较多、战斗力比较强的第一军分区抽调了一部分兵力，由邓华同志负责，组成了邓华支队，决定进军冀东。

邓华同志领受任务之后，按照军区的部署，第一步先是开辟平西地区，为挺进冀东取得前进的基地。邓华支队在一分区部队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向平汉、平绥铁路沿线和察南地区发展。邓华同志在写给军区的报告中说，一路所见，群众抗日情绪很高，所到之处，纷纷自动募捐慰劳我军，有的地方连商会、税务局也给八路军捐款送物资，支持抗日；在群众的支持下，他们打击敌伪军，消灭地主土匪武装，发动群众，逐步开辟了房山、涿县、涞水、良乡（今属房山）、昌平、宛平（今属北京市丰台区）等地，在一部分县份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抗日救国会，扩充了部队，组织了自卫队武装。挺进冀东的第一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前进基地。

1938年5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同志任司令员，邓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6月份向冀东进军，连战皆捷，冀东的老百姓在家乡沦亡了几年之后，看到八路军大部队开来，真是喜出望外，欢欣若狂。

1938年7月上旬，在冀东地方党的领导下，冀东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冀东起义声势很大，发展迅猛，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后来经过中外通讯社的广播，冀东起义曾风闻于世界。那次起义，有丰润、滦县、迁安、蓟县、遵化、昌黎、乐亭等几个县。各地武装起义相继爆发，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原来的预料。原定成立6个总队，结果，呼拉一下子搞起39个总队。报名参加起义的总人数突破20万，除去老弱，光编进部队的武装战士就有10万人。

8月份，第四纵队和冀东起义的队伍会师于遵化，并且已经攻克了6座县城，摧毁了冀东广大农村的敌伪政权，还一度切断了北宁铁路。至此，冀东根据地开始显出了端倪。

对于冀东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党中央和北方局曾发电祝贺，并对建立冀东根据地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正当冀东军民落实中央指示的时候，9月中旬，传来日本侵略军要大举“围剿”冀东的消息。在那里开辟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在平原下好坚持，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因此，作出了把部队带到平西整训的决定。党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以及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都曾去电拦阻，指出：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是很不妥当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应尽可能争取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无疑是及时、正确的。但是，有的同志仍然认为冀东的形势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决定部队大规模西撤。结果，正如中央在电报中所预言的，部队西撤遭受了挫折，除了作战伤亡以外，由起义群众为主新组建起来的部队，士气低落，发生了严重的离队现象，撤到平西的时候，10万之众的起义军只剩下很少的人数。第四纵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也受到了很大损失。

部队西撤遭受挫折之后，11月25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来电指示说，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这一电报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认为冀热察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是可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

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1939年2月初，在平西正式组成了冀热察挺进军，由肖克同志任司令员，并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同志组成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随后，成立了由马辉之、姚依林、肖克同志领导的冀热察区党委，由马辉之同志任区党委书记。不久又成立了冀东军分区，由李运昌同志任司令员，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会，由李楚离同志任书记。在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领导下，由李运昌、李楚离等同志在冀东具体组织，逐步进行恢复和发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

尽管冀东的斗争相当残酷和困难，但是创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是可能的。经过冀东军民长期顽强的战斗，我们终于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期望的目标，创立了拥有560万人口的冀热辽根据地，建起了一支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不仅成为敌人咽喉地带的心腹之患，而且为日后收复热河，解放东北，准备了突击力量和前进基地。

（选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405页。）

4 巩固冀中横连东西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4月21日，对一二九师作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一）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当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

（二）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形式。

（三）根据上述的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的有系统的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的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

为贯彻这一方针，朱、彭命令我师迅速分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各铁

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4月下旬，师部在辽县召开会议，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全师主力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平汉路以东），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五支队）组成，由我率领，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率领，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行动，这一部署，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可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月26日，我和刘志坚等同志告别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翻越大行山，横穿平汉路，经四昼夜行军，抵达南宫，与率先在冀南开辟工作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同志会合。

当时，冀南游击战争已经打开一定的局面，晋察冀的游击战争已扩展到平原地区，山东的抗日游击武装亦在平原初试锋芒。冀南、晋察冀和山东的经验，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从而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冀南根据地出现了大好局面。截至9月底，我军和地方武装相配合，解放临清、高唐、临漳、内黄、清丰、滑县等20多个县城，消灭日伪军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收编数十股杂色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建立了51个县的政权，控制了西起平汉线、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我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形成，严重威胁日军后方及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命脉，大大增加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冀中、冀南、冀东根据地，是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

可是，反“扫荡”的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寇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02—633页。）

5 开辟苏北纵贯南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的方针。1938年春，党中央、

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月4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1938年4月在皖南钦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到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年2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30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1939年5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着。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

飞同志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1939年初，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丹阳县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10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以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并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11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二路（原第六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向吴家桥周围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1939年底和1940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寇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磨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乍、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南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体现了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同志会合。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中原局经过前后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大别

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位置上来了。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

1939年12月27日，中央再次强调要“陈毅部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1940年1月19日，中央又指示：“陈毅同志应自江南向苏北发展。”

在此之前，陈毅曾多次和我（管文蔚）谈起北进的问题。他认为，在江南这块狭小地带内，河汉湖泊多，日寇据点多，封锁线多，大兵团行动回旋余地很小。加之顽固派冷欣沿着苏浙皖边区沿山一带重重设防，还有几个师驻在我军部附近，随时都有把我们前后方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北面又有大江拦住去路，逼得我们天天与敌人作战，天天拼消耗。久而久之，我们就可能被消灭。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

他问我：“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过去不是说过北进吗？你欣赏过朱渊的北进意见，中央又早有指示，精神讲得一清二楚。我看，我们就秘密渡江北上。”

陈毅点了点头，说：“情况明摆着，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我同他们已经争议过好多次，得不到解决。不管他，我们还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坚决北进。”

“新四军”北渡，做好苏北二李（指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和副总指挥李长江，他们系受蒋介石嫡系韩德勤的排挤）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丹北抗日武装搞起来后，二李的交际处长季恺即过江与我私下联系，我方韦永义、惠浴宇等同志即多次过江，做二李及其部属的工作，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接受北渡任务后，我们加强了与二李的直接联系。陈毅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曾由我、惠浴宇同志分别陪同，几次进泰州城和二李会晤，晓以抗日大义，阐明我党的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和主要经验的报告，说“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因此转发“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这方面的统战策略，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

1940年6月，陈毅率部北渡长江，全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212页；《管文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8—320页。粟裕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副指挥；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管文蔚时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

6 勇斗凶顽求发展

1940年7月，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卓有远见地明

确指出：“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之前的两个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尖锐地提出了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在日军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充分的精神和组织准备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是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发展趋势提出来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都是很强的。就国内来说，194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以他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皓”（10月19日）“齐”（12月8日）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我党为顾全抗战大局，在驳斥蒋、何、白造谣污蔑的同时，表示可将在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国民党一方面在电台上大肆宣传皖南新四军将要北上的消息，实际上要求日本人封锁长江，阻止新四军渡江；另一方面又调兵遣将，阴谋伺机歼灭新四军于北上途中。

毛主席的重要意见和当时严重的形势虽然引起了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的极大注意和重视，但极个别存有严重右倾观点的同志，并没有很快觉悟。时过不久，1941年1月，新四军9000余人，在泾县的茂林遭到国民党军8万亲人的伏击。血战7昼夜，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及众多干部被捕，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害，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同志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被毛主席称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同志为编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毛主席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罪恶目的，警告日蒋反动派“放谨慎一点”“仔细……自己的脑袋”，大义凛然地指出：“……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

凶残的敌人给我们增加了巨大的悲痛，也增加了我们战胜敌人的力量。

“皖南事变”后，毛主席代表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指示，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指出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政策。

（选编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245页。作者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 盱全局遏逆流坚持抗战

1940年5月间，党中央来电，让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1日，我告别朱瑞、黎玉等同志，离开沂蒙山区，向延安进发。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时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刚到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安顿我们住在小砭沟一带的窑洞里。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们。我将朱瑞同志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要我们先学学文件，议一议，还可向延安的同志介绍些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

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气焰，有增无已。希特勒为进攻苏联，独霸欧洲，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西欧，占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又以闪电攻势，突入法国，攻陷巴黎；接着，迫使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军事同盟，致使大半个欧洲，沦入希特勒魔掌中。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公约》订立。这一世界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公开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将席卷全球。美、英的“东方慕尼黑”计划，仍在继续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侵略战争的步伐，疯狂积聚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横扫”太平洋地区，实现其吞并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在我国内，八路军敌后战场承担着1/2侵华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负担。但蒋介石大打出手，竟然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博得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卖国贼的喝彩。分裂和倒退的乌云遮天，使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局，出现了逆转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精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我们的对策。基本观点是：皖南事变的发生，表明蒋介石向着全面破裂国共关系，准备投降日寇，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破裂只是开始，还不是完成；投降正在准备，并不等于实现。有些同志认为，这一事变的发生，标志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再次叛变，苏维埃时期的重新到来。但经我们反复观察和研究，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民族矛盾仍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亲英美的大资产阶级同日寇的妥协倾向虽有发展，但对立的因素并未消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护国共合作抗日，不少头面人物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国民党军政界，特别是桂系与蒋系的矛盾正在发展；工农基本群众的民族觉悟大大提高，八路军的力量迅猛发展；国际进步舆论，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同声谴责。所有这些都不同于大革命后期的情况，逼迫蒋介石一时不会走到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地步。蒋介石反共成性，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对付这个人物，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既要坚决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投降阴谋，又要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当然，也要做好应付全面破裂的准备，这叫棋先一着，有备而无患。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决不能重演。

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或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他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即有打有拉。两面政策，一打一拉，是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我们拿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我党打退。这是一个重大胜利，赢来了国共继续合作、坚持抗战的新局面。“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事实又一次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64—670 页。）

8 把敌人挤出去

1942 年，是晋绥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一年。

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里都极为重视。1941 和 1942 两年间，日寇即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30 余次，历时总计近 400 天。敌人在频繁“扫荡”的同时，又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在此期间，蒋介石暗中与日寇勾结，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驻在宜川县秋林镇的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下，晋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敌人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本来就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人民衣食不得温饱，部队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和敌人的破坏，不但使晋绥的军民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威胁。

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深深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意义，因此也曾做了许多努力，来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上，我们遵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指示，两年来开荒 30 多万亩，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在军事上，也想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但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以解决最迫切的衣、食问题，因而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注意不够，反击无力。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敌人却仍在疯狂地向我进攻、“蚕食”。于是，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蚕食”，改变这严重局面，便成了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中心议题。

1942 年 10 月，林枫同志从延安回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主席汇报了我们的晋绥地区的情况后，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听过林枫同志的传达，我们都异常兴奋。历史上的无数事实，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复杂的事物中抓住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并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并坚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讨论。

干部会正在筹备中，主席又于 10 月 30 日给我们发来了电报。指示我们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11 月 4 日，分局于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主席的指示和关怀，对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是极大的鼓舞。因此会议一开始就非常热烈、活跃。此时的晋西北，虽是朔风呼啸，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却像一盆火一样温暖着所有到会人的心。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

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的人为了深刻地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经过仔细的琢磨、推敲，有的人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有的说：“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有人说：“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越研究，越了解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就能迅速转变。”

同志们越谈越兴奋，越谈心里越亮堂。有时谈得忘了吃饭，通讯员再三催促也不肯散；有时一直谈到深夜，仍不肯入寝。

会议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晋绥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反复研究讨论拟出许多挤敌人的具体办法……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部满怀信心地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和分局的决定，回到了工作岗位。各地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中央的“九一”指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各地委、分区、军区直属部队，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之后，便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挤敌人。几十个精干的武工队，有的开到游击区，有的插入敌后。每一个敌人的据点，都有武工队来对付。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有时分散，有时集中；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鬼子整得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宁。

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是从群众的对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当这一方针又回到群众中的时候，不但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而且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在执行主席这一方针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智慧，真是令人感动。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可以听到“走！挤敌人去”的呼唤声；都可以看到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挤敌人”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着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很多胜利。在八分区，群众为了断绝芝兰敌人的水源，先在井里放上凡猎死狗。可是，敌人把死猫死狗打捞出来之后，还是照样打水吃。一位老大爷献计说：“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看他再怎么吃。”群众一听这办法好，立刻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了头，妇女剪了辫子。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以后，任凭鬼子怎样打捞，也打捞不净。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再加上我武工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

挤敌人的生动事例是说不尽的。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的创造更是丰富多彩，层出不穷。胜利一个紧接一个，捷报频传，真是大快人心。到1943年，挤掉了敌人据点50多个，摧毁了800多个伪村政权，建立了500多个抗日村政权，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派，改变了1000多个村庄的形势。这一下把敌人挤痛了，1943年，敌八十五大队孤军深入我兴县腹地，进行所谓“反挤”。我们又运用毛主席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

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原则，集中了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方山、临县等处的民兵配合下，将敌层层包围。10月10日，将其歼灭在甄家庄附近。后来又挤掉了敌人据点93个，收复村庄3108个。特别是八分区，“挤”的更为出色。胜利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主席并特别告诫我们，在每一处打胜仗以后，要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报复。主席的指示与关怀，更使全体党政军民信心倍增，对敌斗争更加进一步的发展。

晋绥抗日根据地挤敌人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选编自《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171页。作者时任八路军一二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9 明示规复晋绥区

晋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华北地区四大根据地之一。其范围包括东起同蒲、平绥路，西至黄河，南迄汾高公路，北达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一线。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个地区极为重视。

日寇深感晋绥根据地的建立是它的心腹之患，是它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巨大障碍。所以，它把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诱降，以其军事主力对付我根据地。阎锡山也暗中勾结日寇，积极反共，形成了日顽联合向我根据地进攻的局势。1940年，日寇在受到我军沉重打击后，更加疯狂地以其侵华总兵力半数以上和90%以上的伪军，向我各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报复“扫荡”，企图逐个毁灭我根据地。敌人除在战术上采取所谓的“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手段外，并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继而推行了“蚕食政策”。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日寇对晋绥根据地大、小“扫荡”30余次，历时总共400余天。残酷的战争环境，给晋绥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原来就比较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根据地的面积也日渐缩小，形势相当严重，1942年是晋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

十二月事变以后，我随晋西南区党委一起转移到了晋西北。这年9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原计划派我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剧变，地下交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不行了，于是就留我在中央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工作。1942年夏天，为了加强对晋绥根据地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分局的组建工作。

晋绥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建议、经中央批准，调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12月的某一天，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主席那里，从8点钟一直谈到中午12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深刻，常常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还出了个女皇帝呀！后来，他问到我1927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非常好，当时许多具体事，他都

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他指着茶壶底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像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得很大，像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缩小了，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有时还跑过河来，地区人口缩小到 100 万了。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说，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和阎锡山暗暗地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会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还可以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地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毛主席批评我们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句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得不太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使人听了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午饭。一边吃饭又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带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兴奋地回到了枣园我的住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是晋绥根据地建设的明灯。我在行前把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1942 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西北，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党的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在高干会议上，分局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精神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的讨论，在高干会议上提出了 1943 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时参议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分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以后，经过不到两年的努力，就使晋绥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敌斗争搞得有声有色，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地盘扩大了，人口增加了，财政收入也改善了，有力地发挥了晋绥根据地抵御日寇和国民党的侵犯和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屏障作用。

为什么同是一个根据地，同样是这些人领导，1942 年以前和以后就大不一样呢？1942 年以后，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人口恢复到了 300 万，根据地扩大了，对敌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它深刻说明了在毛

泽东思想指导下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因此，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张稼夫：《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威力——忆毛泽东同志关于晋绥根据地建设的一次谈话》。）

10 向苏浙敌后发展

1944年世界形势大好。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大规模战略反攻，希特勒处于东西夹击的困境之中，日寇已面临穷途末路。中国敌后战场形势也越来越好。我们不但渡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而且连连取得新的胜利。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日的态势，正在转变力敌人的孤立据点被大片抗日根据地所封锁和包围。到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军队已发展到65万，民兵有了200多万，解放区的人口已有9000万。我华中地区就有主力军20万余，地方武装5万余，民兵发展至80万余。

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筹划着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各解放区展开了局部反攻。同时中央决定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以一部南下向湘粤发展；在华中的新四军以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发展东南沿海。

1944年9月9日，日军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9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地区应有新的发展部署，特别是浙江的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随后，党中央又对华中局指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尔后视情况变化，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使我党我军在举行战略反攻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接着，中央确定以第一师（包括第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浙东游击纵队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

党中央这一战略决策的蓝图，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同志1941年2月发出的关于华中三个战略地区（包括鄂豫陕边、江南根据地，苏鲁战区）任务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和闽浙赣边四个方面）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准备出天目山、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创立和恢复芜宁地区和沪杭甬地区以及闽浙赣边区的根据地。而苏鲁战区，应作为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当时由于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损失，华中局同南方几个省委联系中断，华中局曾设想成立江南区党委，以苏中为依托向江南伸进。但此后华中敌后抗日斗争进入最艰苦阶段，而日寇打通浙赣线的计划又未实施，以致这个指示一时未能付诸行动而成为一个远景规划。到了1944年的9月，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苏中抗日根据地经历了1941年、1942年、1943年的艰苦斗争岁月，已经日益巩固壮大，不仅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和巩固苏中地区，而且为向南发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有力量随时执行发展和支援新区的任务。

（二）苏南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的丹（阳）北地区，对1943年3月开始的日伪“清乡”，全体军民英勇奋斗，艰苦顽强地坚

持了原地斗争，到 1944 年，各县建立了具政权和 30 至 60 人的县警卫大队，区乡不脱产的武装组织发展到 5000 多人，逐步恢复为游击根据地的局面。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经历了反“清乡”斗争，在极力困难的条件下，以苏中第三、第四分区为依托，采取逐步增强斗争效果的方针，终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情况逐步好转，在“清乡”中受到破坏的党组织，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苏皖区党委、苏南行政专员公署以及第十六旅，在京沪路以南地区，在艰苦复杂的形势下，坚持武装斗争，深入开展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除胜利坚持原有阵地外，把力量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各分区也已连成一片。这些都为大军南下准备了有利的前进阵地。

（三）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在日伪顽夹击的复杂形势下，艰苦奋斗，不仅建立与坚持了三北（指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地区）游击根据地，保存了浦东原有阵地，而且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并依托四明山向南和向浙赣沿线的金华、义乌、兰溪方向发展。

此外，皖南、浙南、福建方面都保持着若干块游击基地，尽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经过长期坚持，武装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无论是世界大势和整个敌后形势，无论是苏中、苏南、浙东的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向东南发展。

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我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形势到来作出的战略决策。

我对于发展东南，怀有特殊的革命责任感。从 1934 年 7 月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三年游击战争，我先后奉命执行向闽浙皖赣挺进和在皖南、浙江创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由于敌我力量的极端悬殊，我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才得以在浙南和闽浙边保持了战略支点。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关注着那里形势的发展。1942 年六七月，华中局先后派出谭启龙、何克希等一批干部到浙东，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苏中区党委和一师曾给以积极的多方面的支援。我们并一直十分重视保持与浙东的海上通道。所以，中央确定南进是我期待已久的宿愿。1944 年 9 月，我请求由我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华中局、军部同意我的请求并报经军委批准。

年底，我们在长兴西北地区同十六旅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南进的长途行军任务。

1945 年 1 月 13 日，中央军委电令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任命我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政治委员（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叶飞、钟期光两位于四月南来后奉命分任军区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金明同志南来后则主要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华中局并委托我以华中局代表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

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我们：将领导中心设于苏浙皖交界地带，南下部队会合第十六旅首先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然后向敌后新区深入发展，采取巩固的逐步发展的方针，在大步向浙江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发展一切敌后之敌后地区，作为大发展的巩固的基础和将来收复各大城市的有力阵地。总的战略设想是一旦战略反攻时期揭幕，我们能够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使我们在日寇崩溃时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如果那时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则我们能够在东南独立地就地坚持，成为全国抗

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一翼。

苏浙两省是我国的富饶省分，经济文化发达，抗战前是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是日伪统治中心所在的腹心地区，沿海还是英美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域，敌顽都极力想占有这一地区。我军向苏浙敌后发展，实质上是敌顽我三种力量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是错综复杂、尖锐微妙的三角斗争。敌顽之间是又矛盾斗争，又默契反共，甚至公然勾结，他们都想制服对方，又都想借刀杀人利用对方打击和消灭我们。我们既要打击日伪，又要警惕顽方的反共阴谋，特别要防止敌顽对我们的夹击，在斗争中要充分注意和掌握敌顽之间的矛盾。这种斗争又因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发展形势的影响而更加复杂。美国看到胜利在握，对华政策转为扶蒋压我的方针；日寇为了集中兵力准备太平洋战场的决战，正加紧实施对蒋又压、又诱策动内战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则企图利用这种新的形势对我加强压力，并集中精锐部队驱赶我们，使这一地区的斗争蒙上中美日国际斗争背景的色彩。

我们在执行向苏浙敌后发展任务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而再、再而三的拦截和进攻，被迫奋起自卫。从 1945 年 2 月到 6 月，在浙西天目山地区，主要是孝丰（今安吉县丰城镇）地区，我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尤其是第三次作战，歼灭了向我进攻的顽军精锐主力。这三次作战统称为天目山战役或孝丰战役。反顽自卫战胜利后，我们除一部坚持浙西当面地区外，各纵队分向苏南、杭嘉湖、皖南敌后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工作。7 月底，第四纵队部率第十、第十一两支队重渡富春江在第二纵队金肖支队和地方武装配合下，横扫金肖地区的伪军和地方游杂部队，挺进至浦江、金华附近。

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急转直下。8 月 8 日传来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毛主席于 9 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 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总司令命令我军向被我包围的敌人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可是蒋介石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于 11 日发布反动命令，要国民党军向被我包围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却要我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日，中共中央致各战略区电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12 日军部来命令要我们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要道，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号召解放区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日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利用海空优势抢运军队，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央和华中局原来的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的部署，已同这种形势不相适应。同日中央来电改变华中部署，指示“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我苏浙部队当即全力出击，从 8 月 16 日起在浙东、浙西、皖南、苏南，从日伪手中先后收复南汇、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广德、郎溪、高淳、宜兴等县城和大小集镇一百余处及广大乡村。

根据形势的新发展，中央于9月19日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指示我们撤出江南。我苏浙军区部队自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从南进到北撤，历时10个月，我们以劣势兵力，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和艰苦的条件下，打开了局面，胜利地贯彻执行了中央赋予的发展东南的任务，扩大了我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毛泽东同志对天目山战役，一方面表扬我们打得不错，另一方面说，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天目山战役的胜利，还为以后北撤创造了有利条件：政治上使我党同国民党的谈判更为有理，为了停止内战，我们让出了大片民主根据地；军事上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组成华中野战军，遂行更艰巨、更光荣的战略、战役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第302—352页。作者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三、留守与南下

1 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劲旅

1937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我中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在华北战场上闻风丧胆，节节败退。为挽救民族危亡，我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开赴抗日第一线，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肩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为了保卫中共中央，保卫全国抗日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党中央洛川会议决定，从三个主力师中留下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南京政府任命我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整个部队约9000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留在边区的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2月，留守兵团颁布命令实行新的编制序列，将留守部队编为八个警备团，加上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及其所属七七团、富甘独立营、骑兵营和绥德警备区，共约1.5万余人。1942年下半年，留守兵团并入新成立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

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这支部队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劲旅，在清除匪患，抗击日寇，反磨擦斗争和大生产运动中，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历史使命，并向全国各抗日战场输送了2000余名干部，支援了这些地方的抗日斗争。我亲身经历过这段火热的战斗生活，至今回忆起来，是很令人神往的。

留守兵团所属的各部队，有红一、二、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和陕北红军，还有地方武装，确是来自五湖四海。这支部队一方面素质很好，绝大多数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部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很大，

干部、战士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另一方面由于部队来自各根据地，制度、作风不统一，也存在着组织零乱，游击习气，纪律松懈等问题，不团结的现象时有发生。根据这些情况，怎样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毛泽东同志直接关心着留守兵团的建设。他经常过问留守兵团的工作，即使在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我们的汇报，与大家一起研究部队的工作。他经常接见各团的领导同志，了解情况，指示工作，对部队的整顿、生活、学习、战斗、生产，以至一些规章制度的制订，都非常关心，亲自过问。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工作，提起如何抓好这支部队的建设时，他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个方面的、比较松散的队伍建设成一支打不烂、拖不垮、具有根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于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那样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使我充满了建设好留守兵团的信心和力量。

194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总结了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一重要历史文件。这个文件是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实际上大部分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动手写成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政治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一系列思想工作，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之后，留守兵团“是充满着战斗热情、生产热情和学习热情的部队，是富于朝气的部队”。报告着重指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是革命的军队区别于反动军队的一个标志。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彻底维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在抗战中无比英勇，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几十年来，这个文件在我们军队的政治工作方面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技术的学习，不断提高战斗力。留守兵团不像前方部队的战斗那么频繁，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更多的是靠练兵来提高的。毛泽东同志对留守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很关心，我每次去向他汇报部队的训练情况，他都非常认真的听取并适时给予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团以上干部要研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要虚心学习前方部队的作战经验；部队训练要少讲多练，要用启发式。我们引导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掌握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经过几年军事训练和学习，部队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从而在实际战斗中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抗战开始以后，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是十分复杂的。边区内部有土匪为患；黄河以东，日寇与我们隔河相望；边区的另外三面被蒋介石部署的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但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前方主力部队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胜利地保卫了边区和党中央的安全。

在抗战初期，因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国民党和日寇利用土匪扰乱边区。当时除零星散匪以外，边区内共有薛子茂、李钦武、赵老五等43股土

匪，4000余人，2000余支枪。他们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破坏我地方行政机关和群众组织，无恶不作，使边区人民生活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混乱。因此，及时清除匪患，是保卫边区的一项紧迫任务。留守兵团集中力量，采取在战术上“猛打穷追、堵截合击”与在政治上争取瓦解相结合，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几十次大小战斗，基本上肃清了这些土匪。当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土匪已基本被我剿清时，他对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清除了匪患，非常高兴，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电报，通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表彰了留守兵团。

对留守兵团来说，最经常、最复杂的还是进行反磨擦斗争。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每次都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骚扰、破坏和封锁。我留守兵团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磨擦斗争。在进行这种特殊斗争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持“不斗则已，斗则必胜”、“适可而止”的原则。记得1939年阎锡山疯狂反共，进攻我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时，党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和我带着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去秋林镇找阎锡山谈判，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十分害怕，要求把第四句改为“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同志斩钉截铁他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陕北反磨擦斗争中，还有几件事给我印象根深，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同志的高超斗争艺术。

一件事是在1939年至1940年春，正当日寇加紧进攻华北和陕甘宁边区时，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侵占我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座县城和边境6区、43个乡。在这个紧要关头，三五九旅奉命于1939年9月，从山西恒山地区回到陕甘宁边区，驻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的守备力量。当时国民党派驻绥德的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磨擦专家。王震担任绥德警备司令后，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打掉了何绍南的嚣张气焰，他才有所收敛。不久，何绍南跑回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就乘机大肆宣扬，向我攻击。为了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国民党反共伎俩，并把何绍甫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行政督察专员。对于如何处置何绍南，毛泽东同志修改电文时写道：“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措词的：“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这个电报一方面表彰了王震抗日的勋绩，另一方面揭露了何绍南贪赃在法，弃地潜逃的罪行。这就使国民党蒋介石无言以对，收到了以攻为守之效。

另一件事是在1941年：月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和3个保安旅、10个保安队共40余万军队，严重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又让以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谈陕甘宁边区形势》，经他和张闻天等同志审阅修改，译成外文

发表。文章向全世界介绍了自抗日战争以来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详尽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边区周围制造的磨擦事件和修起的三道碉堡封锁线的反动行径，还把包围边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一一公之于众。这就使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完全暴露。

留守兵团组建以后，干部战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个战士平均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衣着都很破烂，有的甚至夏着棉衣，冬着短裤，赤脚履冰雪。战士每个月的津贴费，只有1元钱，连1双布鞋都买不到。部队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而担负的剿匪、河防等任务却又非常频繁。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从1938年开始，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留守兵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就把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在留守兵团各部队都局部地开展了生产运动。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为了适应他们制造磨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需要，采取种种方式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度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他们的手段，是在给八路军的薪饷问题上用克扣、拖欠来做文章，在军粮供应等问题上也制造困难。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这些话一点也不夸张。尤其是1940年，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先后袭来，边区生产遭到严重损失，60万灾民嗷嗷待哺。林伯渠同志和我曾联名致电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这个赈委会竟然不加理睬。事后想想也不奇怪。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是把边区几百万军民困死，哪里还会帮助你救灾呢！

正当我们在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灵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也可以想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在谈到军队的任务时，他又笑着对我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紧接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向全边区党政军民学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边区军民，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东南西北，都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山岗到山沟，从河滩到原野，到处是开荒种地的人群，到处响起赞美劳动的歌声。那热气腾腾的劳动景象，那战天斗地的生动场面，实在令人感动，催人振奋。

敌人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但他们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相反，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通过大生产运动，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做到了丰衣足食，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没有向困难低头，相反，困难被我们战胜了。我们是靠什么战胜困难的呢？我想，主要靠的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全党全军上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紧密团结，加上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困难就向我们低了头。毛泽东同志说：人

是要有点精神的。那个时候，我们一心一意想到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大家都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所以任何困难险阻都没有难倒我们。

在 1945 年我离开延安去东北工作之前，毛泽东同志和我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说，留守兵团是一支好部队，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的。他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充分肯定了留守兵团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功绩。其实，哪一点不是在他老人家亲自指挥和关怀下取得的啊！毛泽东同志在我军建设上的丰功伟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摘自肖劲光：《一支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劲旅——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7—181 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2 在留守兵团“十二月会议”上

1937 年冬，接到延安留守处召开会议的通知后，我们驻陇东的三八五旅、七七团、警备二团、警备七团，全部团以上军政干部，立即动身，经过五六天时间的骑马奔驰，到达了延安城。

我们在留守处招待所的窑洞里歇了一会，便听到王宏坤旅长粗声大嗓地在外面喊：

“呃——！都出来哇！留守处首长来看我们了，快，首长们来啦——！”

尽管我们动作都很麻利，可是，我刚把脚迈出窑洞门，迎面就碰到了肖劲光主任。他身后是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还有几位我叫不出名字的首长。

肖主任询问了我们旅、团里的工作、思想和生活情况，用亲切的眼光看着窑洞内外的听众，说：

“留守处召开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自从我们成立了留守处，毛主席工作那么忙，还经常过问留守工作，还专门叫我搬到离他近的地方来住，要我每天傍晚，吃罢晚饭后，抽空去向他汇报一次留守部队的日常工作。为筹备这次全体留守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毛主席作过多次指示，还亲自参加了筹备会哩！”

我们听了，心里很激动。曹里怀同志高兴得挥着手说：

“同志们啦，我们留守工作实在光荣呀！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啊！”

我们兴奋得交头接耳。肖主任接着又说：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留守工作就更应该努力搞好，让党中央、毛主席放心。这次召开会议的目的，我们在电报中基本讲清了，就是个确定方向，加强团结，制定措施的决策性大会！”

在离开我们住的窑洞时，肖劲光主任特别嘱咐王宏坤和王维舟同志：

“明天好好玩一天嘛！去天主教堂、桥儿沟、小砭沟、枣园，都转转。去宝塔山看看！延安这地方不错呀！毛主席亲自选定了这地方，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驻扎此地，是很有意义的嘛！大家要都去，都去啊！”

第二天，我们在延安城里参观，我们一行人，边看地形，边议论着部队的教育工作。走着议着，直到黄昏临近，才沿着延河畔缓缓地走向住宿地。

离住地没多远了，眼尖的刘随春突然轻声地叫起来：

“看嘛，前面好像是毛主席吧？！”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向前看，果然不错，百多米外，正是毛主席！他穿着一身粗布棉衣，戴着棉军帽，腋下挟着几本书，一只手还握着一大叠文书纸卷，迈着健步，同着五六个穿八路军军装的人，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

看着毛主席走近了，我们一行都恭恭敬敬地立在道旁给毛主席让路。

毛主席却立在我们面前笑盈盈他说：你们是从防区前沿来的吧？我认识你们哩！你，就是那个被张国焘撤过职的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嘛，你是川东游击军的总司令王维舟嘛！你们这几个人都面熟，就是不清楚名字，都自己说说吧！

王维舟同志代表我们一行人站到毛主席身前，指着我们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介绍完团以上干部后，王老不讲了。

毛主席却用手指了指跟随在我们身后的马伕、警卫人员说：你不公平啊！他们不是你们一起的吗？！怎么不说说他们的名姓呀？说说吧，我下次见上也好打招呼哇！

王维舟同志笑着说：“主席，您忙着哩，我们会耽误您事的……”

毛主席说：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开完会，出来走走的。怎么样？防区部队不大好管吧？打惯了仗，跑惯了路，留守下来驻防到一个地区，不发展，没有仗打，问题怕不少吧？

毛主席如此关怀和惦记我们这支留守部队，使每个人都很激动。

旅部几个负责同志乘机简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一下部队的思想动态，着重讲了干部战士想上前方打仗而不安心留守工作的思想问题。毛主席十分认真地听着，温和他说，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呀，不光战士们有情绪，就是我们的高级干部们不也常常闹这些问题吗？当然，闹问题是不对的。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就要做这些人的工作嘛，工作做好了，问题就会少出或不出呀！古语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嘛！上战场痛痛快快地冲呀杀呀，这并不很难的，难就难在你打下了地盘，建立了政权，如何能守下来。就说我们这边区吧，光延安就有这么大一摊子，总要有部队来守呀！日本人想来吃掉我们，国民党表面同我们和了，统一战线了，顽固派们也想来咬一口哩！你们说说，中央能够没有你们这支部队吗？

毛主席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烘烘的。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毛主席接着又说，你们这些旅长，团长，思想是通的，也是很听中央的话的。光你们通了，还不行哟，要使每个留守的干部战士思想都弄通才行哟。你们这次召开留守全会，很好嘛！军队建设上有许多事要抓，方向第一，我看这次会议就是抓方向的大事。就要把政治思想工作，留守部队建设大计，认真研究，好好商量决定。要通过这次会议，给留守部队的工作带来一个新变化呀！

毛主席又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振作革命精神，领导干部要起模范表率作用，把留守部队工作做细做好。临离开时，他同我们一一握手。

寒冬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冷。风沙中，我们都一动也不动地站立着，目送毛主席远去，直到望不见他高大的身影。

这一夜，我们都感到格外的喜悦和幸福！才来延安一天，就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巨大关怀，这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我们这次在延安开的会，就是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历史上著名的“十二月会议”。

会议前后一共开了一个月。1937年12月底召开，1938年元月下旬结束。近百人出席了会议，全是留守部队团以上单位的军政负责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留守部队已经不只是我们七七团和七一八团两个团队，而是经过重新扩编和组建已发展到了11个团的编制，兵力为9000余人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也正式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兵团，并将东西两线地区留守处的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

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人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叶剑英、林柏渠、高自立等，都亲身到会场。毛主席还做了讲演，他代表党中央再三教导我们，留守部队要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留守看成同在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保持红军时期的光荣战斗传统，使整个留守兵团能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

会议期间，毛主席给留守部队制定了一个明确的建军方针：“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积蓄与培养干部！”

毛主席还给留守兵团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战斗任务：“保卫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

（选编自张才干：《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7页。作者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七七团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3 “靠留守兵团吃饭”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任改编后的红军——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积极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但是，10月初来了命令，三八五旅只有七六九团开赴前线，而旅部和七七团留在后方，担任保卫陕甘宁的任务。

说实话，让我这个一贯担任先锋部队的指挥员留守，心理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为此我找过刘伯承、徐向前二位同志，他们耐心地与我谈了话，讲明了留守革命抗日大本营的重要性。我接受了他们的劝告。

陕甘宁边区共有23个县，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政府也被迫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变。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用军事包围、政治打击、经济封锁等卑劣手段，妄图削弱、扼杀并伺机直接发动武装进攻来消灭这块抗日根据地。

边区留守部队总共不过9000余人，任务是很重的。由于国民党当局不给这些留守部队的指挥机关以统一的番号和委任领导人员，因此，我中央军委于1939年9月，将留守部队组成后方留守处；同年12月，把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他是被南京方面委任的留守处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处主任。除了在八路军正式编制内的三八五旅七七团外，又将其它留守部队的杂乱番号实行了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组建留守兵团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留守兵团的任务是：固守千里河防，随时准备抗击东面沿平绥线进攻的日军；严阵以待对付周围国民党 20 余个师的包围；打击边区内几十股土匪的袭扰；加紧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和积蓄干部；保证边区政府和军民的生活供应。

在留守兵团成立后的会餐上，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我曾流露过不愿意留守、愿到前线去打仗的心思，便对我说：“你在后方也可以指挥嘛，可以给前方出点子啊。你们七六九团在阳明山就打了胜仗嘛。都走了，谁给我们中央这些人搞饭吃呀？我对你们肖主任讲了。我今后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呐。”毛主席还打了个比喻：鸟有窠、毛毛有摇篮，革命要有根据地。这次谈话坚定了我做好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信心。

（摘编自《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作者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

4 组建联防司令部

1942 年 5 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调张经武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因生病住院，由高岗代理），林枫任副政治委员。朱总司令找我去谈话，说明组成联防司令部的意义，交代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朱总司令说，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认为：前些时候，国民党就准备进攻边区。胡宗南的军队是 40 万，我们的兵力只有 4 万，形势可够紧张的。他们筑工事，搞粮食，拉民伕，严密实行经济封锁，拉开架子要攻我们。但是，日本人一打浙江，一打云南，推迟了蒋介石的摩擦计划，这边安静了点。现在，苏德战争在继续进行，太平洋战争暂告结束，日本人下一步向哪里打，向北，向南，向西，似乎还没有定下决心。向北，打苏联，可能性很大，蒋介石和英美都巴不得日苏交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蒋介石必然向我施加压力，迫我向北，甚至大举进犯我华中、华北、山东、陕甘宁边根据地，形成第三次反共高潮。那时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的方针是，巩固内部，沉着应变，做好应付最困难、最危险局面的准备。要准备日苏战争爆发，准备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准备胡宗南进攻边区。立足于最坏的可能性上，方能争取好的前途。我们不希望打，力争不打，但蒋介石一定要打，你不准备，会吃大亏的。皖南事变，项英同志不听招呼，丧失警惕，就是证明。中央决定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统一晋西北和边区的军事行动，充分做好应变的准备。如果胡宗南打过来，晋西北的部队马上开来参战，保卫边区；那边可由晋察冀和一二 师调部队填防。

朱总司令还说：我们的面前困难很多，克服困难靠不上别人，只能靠自力更生。1942 年的任务主要有三项：整风，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渡过困难阶段。联防军司令部成立后，要结合备战，抓好三项任务。希望你们带个头，取得经验，推广到各根据地去。

回来后，我即和贺尤、高岗着手组建了联防军司令部。

（选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71—673页。）

5 三五八旅大练兵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6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嚣“解散共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企图闪击延安。形势非常严重。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增强边区的作战力量。6月上旬，三五八旅旅部接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电令，赶回陕甘宁边区。

在此期间，毛主席、党中央一方面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准备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反对，由于边区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国民党未敢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蒋介石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遂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预防国民党再次发动突然事变，三五八旅奉命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旅部驻土家角村，七一五团驻塞子湾、七一六团驻张家湾、第八团驻黑水寺、兰家湾。

10月来到了，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在延安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部署边区部队在驻防的同时开展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发出“边区部队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的号召。会议明确了大练兵运动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准备大反攻。”方针是：“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尤应以技术为主。”基本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

11月22日，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预定105天（15周）的冬季大练兵计划正式执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较为深入，所以练兵一开始就形成热潮。

为了保持群众高涨的练兵热情，各级领导倒要经常催促群众按时作息，叫大家不要紧张过度，要保持体力；还要适时提出新的训练内容和新的训练方式。

首先，改变以往只练战士不练干部的做法，要求真正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新式练兵方法。强调干部和积极分子、骨干要起模范作用，大多数干部在训练场上都参加到班里和普通战士一齐操作，一样守纪律，动作要是没做好，班长叫重来，同样重做，吃得起苦，影响很好。战士们反映，这次练兵没说的，如果还俏皮，就对不起上级。这次练兵内容着重以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为主，改变了过去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学与用、理论和实际一致。三五八旅不少老战士身经百战，有一套实际的作战技术经验，就是不注意学习理论要领；有些青年学生出身的新战士，理论要领学得快，讲得出、背得上，就是投弹不远，射击不准。这就要根据各类人员的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互相辅导，共同提高。教材是过去的经验总结，教材的要领不能忽视，一般要按要领操作训练。但是教材上的要领也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投手榴弹，教材上只有一种正规的投掷法，可是各人用力不同，习惯不同，按统一一种投法，反而成绩下降。有些人就是用抡投、左手投才能投远投准，就不一定非要他改

按正规投法了……

三五八旅这次冬训大练兵从 1943 年 11 月 22 日开始，到 1944 年 3 月 5 日结束，训练时间共 105 天，除去 15 个星期天，新旧历年假 6 天，测验 1 周，实际练兵时间 77 天。在这短短的期间所获得的成绩，若与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军训相比较，成绩确是空前的。

三五八旅的冬训给一二 师开创了一条新式军事整训的路子。晋绥军区于 1944 年 1 月 1 日发出了 1944 年军事教育的训令，规定：技术训练，主力兵团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地方兵团以射击、投弹为主，游击队以投弹、爆破为主。战术训练，以单个战斗教练和班排的战斗教练为内容。夜间训练则要求熟悉夜间行军、侦察、警戒、袭击、伏击和被袭击的处理等各种动作。要求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与对敌斗争相结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做到即学即用，学用一致，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论技术和战术，都要全副武装进行，干部着重于总结实战经验，提高指挥能力，并亲自组织领导好本部队的训练。

接着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指出：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养兵的经验（带兵即管理，用兵即指挥作战，养兵即生产给养），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实行群众运动，结合整风，开展群众性的练兵高潮。

（摘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2—277 页，作者当时任一二 师三五八旅旅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6 决策下华南

1944 年上半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发动全面大反攻，美、英军队已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在太平洋战场，美、英军队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日寇节节败退。日本侵略军企图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先后发动了“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或逃或降，损失兵力 40 多万，丢掉了河南、湖南、广东等省大片国土和 100 多座城市，使 6000 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到 50 多万，民兵增加到 220 万，解放区人口增加到 9000 多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基于对这种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确定了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以一部分力量向北发展，以主要力量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那时，一二 师三五九旅正驻在延安以南 90 里的南泥湾。部队屯垦练兵，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随时准备打仗。旅部设在金盆湾，我担任旅长兼政委，还兼任延安警备区司令员和延安卫戍区司令员。

7 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找我去交代一个任务，让三五九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五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回来找几个团长商议，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

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于是，我向毛泽东同志请求批准我率部队护送。毛泽东同志说：“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再谈。”没有想到刚刚过了一天，毛泽东同志又找我谈话了。当我走到毛泽东同志住的窑洞前时，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来了，很好！”进了窑洞，他招呼我坐下，谈话便开始了。

毛泽东同志先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我报告说：“今年我部开荒种地 35 万亩，可以达到‘耕二余一’，争取上缴公粮 1 万担。最近，贺龙、林伯渠、徐向前、肖劲光同志，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都先后去视察部队，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同志还亲自指导团对抗演习。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一边生产，一边整训，政治工作和军事练兵都有了明显进步，士气高昂，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同志听了说：“你们是兵强马壮嘛！要告诉同志们，仗是有得打的，还有艰苦任务。今天找你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国内外形势谈起，阐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他说，当前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的革命空前有利。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的敌后战场都取得了胜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弃守，大片华南国土沦于敌手。这说明，国民党没有希望了，它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

毛泽东同志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两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篇文章里也说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希特勒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日本法西斯也将一天一天更加困难。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美国的强大海军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把蒋委员长从峨嵋山上赶下来。这样，战争也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军逼进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退罗、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也会下山，内战危险也将十分严重。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毛泽东同志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四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

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对形势分析得那样清楚，把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讲得那样明白透彻，不但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表达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愿望。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接着，毛泽东同志对组织南下支队问题又作了具体指示。他说，三五九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同志着重分析了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要我们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说：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听到这里，我回答说：“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谈话结束，我告辞毛泽东同志出来，已经是夜静更深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党中央正式决定，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我担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同志担任政治委员，王恩茂同志担任副政治委员，全支队约5000人。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之后，南下支队肩负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交付的重任，于1944年11月9日告别延安，开始了南征。

南征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向南发展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我们南征，第一步经山西、河南，于1945年1月底，同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胜利会师。第二步，同五师张体学同志部队一起，渡长江南下，深入敌后，严重打击了盘踞在华南地区的日伪军，坚决消灭了勾结日伪的反动顽军，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下，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系起来。

1945年7月，我们继续南下，于8月底打到广东南雄县境，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我们的东江纵队只离百里路程。这时，时局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所预料到的那种突然变化，即出现了南征前途的“第二种可能”：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提前结束了。过去我们可以利用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全力对付我军，党中央续派南下的第二梯队，也由于形势变化只进到河南就奉命改道向东北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按原定计划会合曾生同志领导的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战略根据地，已不可能实现。南下支队被迫北返，突破了国民党正规军的重重包围、尾迫堵截，日夜苦战，又会合张体学同志部队一起返回李先念同志领导的中原解放区。

南下支队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部署，虽然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实现，但是，它在两年中间，南下北返，经过晋、豫、鄂、湘、赣、粤、陕、甘 8 省境地，跋涉 2 万多里，克服了严寒酷热和高山大河等自然险阻，100 多次血战，英勇地打败了日寇、汪伪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撒播了革命的火种。1946 年 9 月 27 日，南下支队胜利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同志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你们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也可以说是从战争这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的大学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44 年秋，党中央决走三五九旅南征，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回顾这一段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震：《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忆毛泽东同志在组织南下支队前的一次谈话》，作者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 组建南下支队

1944 年的秋天，陕北的延安，正是一派金黄世界。极目四野，庄稼渐渐由绿变黄；山坡远处，不时荡漾着劳动的歌声：

大生产，多打粮，
支援前线打豺狼；
油灯下，纺纱忙，
自己动手做衣裳。

……

城里城外，洋溢着浓烈的革命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人群；欢声笑语，汇织成一支扣人心弦的革命交响乐。

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红色灯塔。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发出了伟大的战斗号令，领导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当时，我在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经常得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8 月间，我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拟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我向党中央请求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终于获得批准。

9 月 1 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会议正式决定：力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派遣王震、工首道、谭余保诸同志率步兵 10 个连（从三五九旅抽调九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及干部 4 个连到 6 个连（由组织部选调，其中要有知识分子，要配备财经工作干部及城市工作干部），挺

进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动身前，将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训练一个时期，主要学习、研究党的方针、政策。

为了组织好这次南征，10月31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彭真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参加南征的各主要领导同志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决定增加派遣三五九旅七一二团随同出发；随军南下的干部到达我中原军区后，由鄂豫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长按工作需要及发展前途分配工作；部队经费由任弼时同志与财经办事处商定解决。

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南征部队组成了，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进入湖南后改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副参谋长苏鳌、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全军共约5000人，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的政治、军事工作。

除南下支队外，三五九旅还留下一部约5000多人，由副旅长苏进、参谋长刘转连、政治部主任李信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

南征，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不辜负全国人民特别是江南人民的期望，部队在出发前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1944年9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南征部队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举办一期一个半月的训练班，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敌后工作的经验。

10月25日，训练班全体同志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当中很多同志不久就要到南方去工作了。大家在学习中出了一个题目要我讲，叫做我们的总方针。我们的总方针从哪里讲起呢，我想先讲一点时局。

毛泽东同志从分析时局的变化开始，深刻阐述了抗战的形势、我们的任务和策略。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现在有两个东西：一个没有希望，这就是国民党。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治腐败，经济衰竭，正在一大天垮下去；另一个大有希望，这就是我们。中国要胜利，日本要赶走，中国人民要解放，只有靠我们。我们一天比一天壮大，不仅数量多了，质量也提高了，全国人民现在都望着我们。同志们要到敌后去开辟工作，和你们闹麻烦的很多：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国民党。对于国民党，你们不能气一上来就要打倒它，要照顾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大敌当前，日本人站在面前。

毛泽东同志接着强调：就我们这一方面讲，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是从抗战以来就定下的方针。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时期，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就需要发展。所以我们就分别派人出去，头一批叫做湘、鄂、豫，就是粤汉、平汉这两条铁路。第二批是长江下游，第三批是山东。现在可以发展的根据地，还有很多地方。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胜利。

毛泽东同志还通过总结党内、军内的历史经验，着重指出加强党内团结和党与人民群众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同志们这次出去，要能够团结广

大党外群众。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同志最后说：我讲的许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整个党和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解放，为我们整个民族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内容丰富，生动具体，不断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特别是那松树和柳树的生动比喻，在我头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

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那是陕北初冬的一个清晨，延河结着薄冰，被朝霞映得晶莹闪亮；宝塔山在淡淡晓色中，显得更加雄伟。在抗日将士出征的日子里，革命堡垒延安，显得分外庄严，令人倍觉亲切。

这一天，部队很早就从延安四郊向离城约三四里的东关飞机场开发。南下支队的誓师阅兵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指战员们现在用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创造的胜利果实，把自己武装起来了。干部、战士们都穿着崭新的灰色棉军装，挂着新的子弹袋，背着新被子和新毛毯。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队队高头大马，排列在队伍后面，更显得威武雄壮。

机场的北面正中，早已搭起一座高高的主席台。台的上端，高悬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的大幅横额，左右挂着两幅特大标语：“中国人民的军队胜利万岁”、“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主席台正前方的旗竿上，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各路队伍聚集在广场上，嘹亮的歌声，伴着着高昂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红旗和鲜花，把整个广场点缀得分外壮观。

9点40分，军乐声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由王震同志陪同，健步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上掌声骤起，一片欢腾。

南下支队第二大队长陈冬尧同志庄严宣布大会开始。

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接受检阅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会场的东边朝着主席台前进。指战员们精神抖擞地从主席台前走过，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并表示他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完成党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

阅兵式后，毛泽东同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讲话。他讲得言简意赅。他说：现在日蒋眉来眼去，一唱一和，日本占领城市，蒋介石占领山头。你们这次就是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请同志们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衷心地祝贺大

家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在大会上，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贺龙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都先后讲了话。

我军人湘以后，为了适应斗争发展的需要和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经报请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简称南下支队）”的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并以原第一大队二营、原支队直属警卫连和侦察连，以及第二大队一连为基础，扩编为第五和第六支队。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我军南进的阴谋，（1945年）3月28日，我军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南进：左路纵队由第一支队二营、第二支队三营和第五支队组成，经钟洞，歼灭据守三眼桥的国民党顽军；右路纵队由军直机关和第一支队一营、第二、三支队组成，经梅仙直下平江。

攻下平江后，我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致电报喜，并报告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3月31日，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电。电文说：

你们占领平江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的根据地（包括崇阳、通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然后继续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在湘北期间，我们曾多次收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来电，询问我们的具体行动计划，并及时给予指示。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采取跳跃前进及留少量兵力在鄂南设立小后方的计划，指示我们入湘后，要相机公开宣传，扩大影响，“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不犯，团结一切好人。”

5月4日，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们：

一、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

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

我们收到电报后一两天，正值王震、王恩茂同志和我、张体学、聂洪钧、刘型等同志会合在一起。我们立即在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决定今后的军事行动。根据敌情，进攻湘北的顽军，这时已大部调至鄂、赣边境，并有继续“进剿”鄂南之趋势，这对我根据地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当即决定，由王震同志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我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6月下旬，我主力部队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这时，江南地区进入盛夏季节，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后，我军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这使所有指战员都感到焦躁不安。大家都思虑着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不到10天中，接连给我们发来了3份电报。来电肯定我们“数月来在湘鄂边区行动是有成绩的”；同时指出：由于“王陵基集中对我，

我主力回旋余地小，已处被动。”中央还提出两个行动方针，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1）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2）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分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中央意见，希望我们率主力大部分，以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建立南方局面。同时告诉我们：为了执行以上任务，扩大华南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将三五九旅留在延安的部队，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张启龙为政委；将延安警备第一旅之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雷经天为政委。第二、三支队共计6000人，作为第二梯队南下，其时已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预计年底前即可到达湘粤之间的五岭地区同我们会合。以后由于日本投降，局势发生变化，第二梯队只进到河南就奉中央命令北返了。

党中央及时发来的几次重要电报，宛如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风，驱散了我们心里的焦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为了贯彻党中央有关南进的指示精神，7月4日，我们在咸宁县的胡家街召开了一次边区党委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边区的工作和部队的军事行动。

会后，我到王震同志的驻地郭家祠，一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由王震同志和我一起率主力继续南下。毛泽东同志收到我们的电报后，马上回电说：“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

南进到新田湾，我们又收到毛泽东同志22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询问我们沿途情况如何？估计何时到达五岭山脉？接着告诉我们：日军为了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五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战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不过至少他要固守广州以及整个粤汉铁路。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任务的。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毛泽东同志最后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要有精神准备，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为了执行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的指示，我们在新田湾只停留一天又继续出发了。

（节录自《王首道回忆录》，第222—235、383页。作者当时任“南下支队”政委。）

8 谆谆教诲勉出征

1944年11月13日。

这是我们团奉命出征、从陇东驻地到延安集结的第四天。

我们这次向豫西嵩山地区出征，中央军委命令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组成豫西纵队。留守部队抽了警备四团和七七〇团为该纵队的三支队和四支队。一支队和二支队均由华北抗日前线的部队抽派，早已进入洛阳以西地区，并已展开了工作。我们七七〇团到延安的一营和二营，分别组成四支队的十团和十二团。我担任了四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是原警备四团政治处主任刘健挺，李迎希同志担任了参谋长，卜万科任十团长，王厚安担任十二团长。

这天从清早开始，我一直忙忙碌碌的，去十团检查武器装备，又到十二团听取他们出征前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情况汇报。

“报告司令员！”参谋张学柱迎头截住我说：“王树声司令员来支队了。他说毛主席要接见哩！……”

“毛主席要接见？！”我又惊又喜，一边加快步子，一边又大声问道：“是现在吗？”

“就是现在啊！”远处传来王树声司令员的粗大嗓音。他早已骑在马上等着我，扬着手直嚷：“老张，快走呀！干不完的事，回头再搞嘛！”

我接过警卫员手中的马僵绳，急忙跃上马背，就去追赶王树声同

这次受毛主席接见的同志，有纵队政委戴季英、参谋长熊伯涛、政治部主任吕振球。还有三支队司令员陈先瑞、政治委员傅忠海。我们一行人，都满怀着喜悦的心情，一路谈笑风生，真有说不出的愉快。

我们在距枣园1里地的哨所前都下了马。然后，大家缓缓地步行进园。

枣园的枣林中掩藏着一幢庄严的平房，这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厅。厅前是一条贯穿枣园的人工渠道——“幸福渠”，这条渠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枣园周围的人民群众，遵照党中央“自己动手、兴修水利”的号召，在中央书记处率领下，动员附近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共同修筑的一条长5公里、可灌溉1200亩耕地的水渠。因为这条渠水的浇灌，改变了过去缺水的状况，庄稼连年获得丰收，群众就把它叫做“幸福渠”。

走过渠上的木板小桥，我们来到了任弼时同志居住的平房前。

只见任弼时同志从室内走了出来，他见了我们笑着前来同我们一行人握手，连声说：

“好哇，好哇，来得好快嘛！对不起，先不能在我这儿坐哩。我们一同去主席那儿坐吧！主席说，你们豫西纵队要出征，中央书记处得去人参加座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哩！一来，中央好掌握情况；二来嘛，有些解决不了的困难，趁你们还在延安，中央尽力帮你们立即解决好啊！”

听到任弼时同志的这番话，我的心激动地直跳。我深深感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最体察我们留守部队指战员的心。我暗暗地在心里说：党啊党，您有毛主席和一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革命家掌着舵，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会所向披靡！党啊党，您对自己的儿女如此关怀备至，我们这些出征的人，一定拼尽全力去为您的宏伟纲领和目标奋斗！

毛主席就住在任弼时同志住所后面，地势比较高。就像一个塬崖，毛主席住所在源上，而任弼时的住所则在崖下。

我们沿着一条走得光溜溜的斜坡小路，不到3分钟，就进入了矮墙环绕、木门半掩的一个开阔的院落。院中，又各自分成3个小院。左方是一排平房式的窑房，那是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办公和住宿处。右方的小院，有

纵横两排窑房，是为朱总司令准备着的住房，因他在前方，暂时还未来居住。在这两个小院中间是一个较大的小院子，地势略微比左右两个小院都高些。这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住宿室、会客室和勤杂人员居住的地方。

我们刚接近毛主席居住的小院，任弼时同志就指示原地等待，他便去直接向毛主席报告。趁此机会，我仔细观看这周围的环境。

这个小院，坐落于山坡腰间。举足可登山顶，俯身能观延河；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地面干燥、洁净，窑房简陋、整齐。相对而言，这里较之凤凰山脚、杨家岭上毛主席原来的住所，更适宜于毛主席日理万机、运筹帷幄的伟大工作啊！

毛主席同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前来招呼我们了。毛主席他仍旧穿着前几年的那身棉军服、棉布鞋。在同我握手时，我见他双眼布满血丝，这是缺少休息、过度劳累的象征。不过，他精神很愉快，面容显现着朝气蓬勃的神采，使我们见到他，立即有一种对革命胜利和光明前途充满坚定信念的情绪！

进入毛主席的办公室，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都在座，并热情招呼着我们。毛主席亲自给我们让着座，指着警卫人员摆上来的茶和烟，还说：这些东西，还都是你们留守兵团同志们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啊！我们刚来延安可想而知想不到嘛，今天，我们阔多了哟！

趁这时机，陈先瑞同志和我都谈起了各自部队在大生产中的丰收数字。

毛主席听后，笑盈盈地说：革命就是斗争，不斗不斗，哪来的这好局面呀？这次叫同志们来开个座谈会，也是商量如何扩大战果，去创造新形势，开辟新局面呀！

毛主席亲自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支香烟，他自己也点燃一支，边吸着烟边询问着出征部队的编制情况、干部配备和武器弹药。周副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也纷纷询问部队的战斗士气怎样？部队中红军老战士和新入伍的战士比例多少？训练后的军事素质怎样？等等。

当讲到军事训练和部队战斗力时，毛主席从座椅上立起身来，用夹着半截香烟的右手伸展开，点着我们在座的10多人，说：你们这些同志，红军时期都是团以上的指挥员。打仗，可是要讲战略战术的呀，实践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哟。你们红军时打仗，敌人都是蒋介石、国民党哪。那个时候，他们也晓得共产党的打法，我们更晓得国民党的几下子。这次出征，敌人方面情况就复杂多了嘛，嵩山地区有土顽，比这陇东的赵老五还顽固哟。又有地痞，还有汉奸。去那里要过黄河，要走洛阳，那些地方都是国统区和沦陷区，你们随时要同日本鬼子打仗，要同国民党顽固派们较量啊！

毛主席停顿了片刻，又点燃一支香烟，继续说：留守工作时间长了，打仗的实践机会相对就少了些。对付日本鬼子还不比国民党顽固派，这些军国主义奴化和豢养下的军人，讲究“武士道精神”。前线报来的材料都说明，日本鬼子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我说呀，你“王大司令”，可得带些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团营以上干部去啊……

王树声同志听到这里，咧嘴大笑着，说：

“主席，前线回来的团营以上干部可不多啊！再说，人家从前边回延安，屁股还没坐热，又让人家去打仗，这……”

毛主席也大笑起来，他磕掉烟灰，说，“王大司令”你就缺调查研究哩！我们这些南征北战订惯仗的人，哪个真想把屁股坐热呀！啊？！包括你在内，去党校学了一个月，就吵吵嚷嚷要上战场。人家不都一个样吗？从这点上讲，

我看肖劲光同志的留守兵团那些五湖四海的人马，就很值得大家学习嘛！三原改编时，他们不也一样擦好了枪要上前方的吗，可是，叫人家留守，人家二话没说，马上收枪刺，立正向后转，到陇东去了，到绥德去了，到三边去了。上前方打仗，能立战功，又升官快，可他们一守就是七八年啊！今天叫出征，一个一个又包包一背，胡子也不刮，马上来延安了。同志咧，前方后方都是一条战线哇，从前方回来，是为了学习，学习好了，还是要上前方的嘛！我看，只有高兴，保险没人吊丧脸！”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副主席、王稼祥、任弼时等首长当场决定，由王树声司令员和戴季英政委牵头，立即从延安“抗大”、“党校”等机关和院校中，调派些有对日作战实际经验的团营以上干部，安排到我们豫西纵队里备支队和团营当指挥员。

接着，毛主席又关切地询问了我们出征的团以上干部们的身体状况和个人生活。

在接见快完时，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说：同志们，这次出征豫西，是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后决定的。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已走了一个星期了。他那支部队是南征的突击队，是去当“开路先锋”的。也是中央战略部署中的一颗石子、一把利剑。王震同志南征，就为今后我们党和军队向中原发展，探了一次路，劈开了一条道！10年前，蒋介石凭借他的几十万军队，欲灭绝共产党和红军，挤我们撤离了江西苏区、大别山苏区；今天，我们没有被灭亡，而是更发展、壮大和成熟了，光在延安和陕北，可不行啊，我们军队很苦、陕北人民也很苦啊！我们要杀出去，要冲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圈！你们去豫西，是和王震南征一个军事部署中的两条不同战线。你们去豫西，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把我们带到了一幅军事地图旁。这时，周恩来副主席走拢来，接着说道：这次王震同志南征和你们出征豫西，都是主席多次考虑后决定的。主席曾向我说：放一支部队到豫百，就可抓住“两线”、控制“四点”啊！

周副主席手拿着一支红色铅笔，边比画边继续说：这是平汉线，这是陇海线。这两条铁路线，不仅是日军密切关注的两大生命线，也是国民党蒋介石一直窥觑的两条交通血脉。

这时，毛主席插话说：你们一下插进豫西，把伏牛山区、嵩山地区全抢到手心中，日本鬼子也不敢近中原，还可以把蒋介石堵在四川峨嵋山。同志们可要想得远点啊，蒋介石本性改不了的，他现在是在坐山观虎斗，想日后，我们共产党人把日本鬼子赶走了，他来收“渔利”呀！你们去那里，稳扎稳打，立下足，建好家园，发动人民起来搞共产主义革命。一旦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了，他蒋介石再想灭共产党和八路军，就更不容易嘛！

趁毛主席抽烟的时候，周副主席又说：还有郑州、洛阳、许昌、开封，这是“四点”。你们把“两线”、“四点”，紧紧攥住。北方，可以同我们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连接一片；南可用鄂豫边地区李先念同志的新四军和抗日人民结成一家。这样，我们党今后大举出兵中原，收复失地，重振革命根据地，就可有一个畅通无阻的桥梁了！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这段极力精辟、透彻的讲解，使我们受接见的人都笑逐颜开、心花怒放了。我的眼前，好像展开了一幅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壮丽图画，我的耳边像震响了全国各个抗日战场上擂动着的排山倒海的进军战鼓……

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和谈话，足足有3个小时。接见完毕，他们又一直把我们送出枣园，尽管我们再三谢绝，请首长们留步，可是，首长们却执意要送行。周副主席还笑呵呵地说：

“好吧，今天就只送到枣园门口；等两天，我们去东关飞机场再好好送吧！”

经过毛主席接见后，我们纵队又认真准备了近一个星期时间。

11月19日，我们正式向黄河方向启程进发。

这天，天气极好，虽不是万里无云，却也是陕北高原冬天少有的一个艳阳天。

我们纵队两个支队，号称上万人的大部队，摆在延安东关机场上，却才两千多人。而且，武器还是10年前老掉牙的“七九枪”、“汉阳造”、“三八大盖”这类“洋枪”，只有少数几支。战士们的军服，比10年前阔多了，整齐多了，可也是大生产中自己动手纺织成的棉布装。有趣的是，这些军服，有的用槐树皮、柳树根等煎水染了绿色、黄色或灰色，服装崭新而色泽各异。不过，人人精神抖擞、气宇轩昂。

毛主席、周副主席、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亲自来送行，中央军委、中央各院校和党政军机关也都来送别，这使我们实在感动，出征人和送行人互相鼓励、祝贺和话别，一时间，小小的东关飞机场，人如潮涌，欢声笑语，震彻天际。

当我又一次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敬礼、当我又一次同中央首长们握手时，心中异常激动，胸中犹如大河奔腾，真有千言万语要向党诉说、向延安倾谈啊！可是，我停立良久，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等到首长们握手送行完毕，我们在熊伯涛参谋长的口令下，迈步向前进发时，我才想起了延安里党政军民都喜欢唱的一首《延安颂》歌曲。于是，我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情思。

我的脚步在迈动，而双眼却不断回顾。我看看玉带似的延河水，望望那雄伟庄严的宝塔山，我难舍难分的心在痛着，我激动的眼泪在滚流，我颤抖的嘴唇缓缓地启动了：

“别了，宝塔山；

“别了，延河水；

“别了，我永难忘怀的陇东——大凤川；

“别了啊，我敬爱的圣地和母亲——延安！……”

（选编自张才干：《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97—419页，作者时任八路军豫西纵队四支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9 要有松树加柳树的性格

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先后组织了四个主力支队，开往河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也由陕甘宁警备二团参谋长改任三支队七团团长。

上抗日前线，这是多少在后方的同志梦寐以求的夙愿啊！我们团的同志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意，劲头十足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出发前，边区要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我们，还听说中央领导同志也来参加，大伙儿就更开心了。

那天傍晚，我们顺着清澈见底的延河，向中央党校的会场走去。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黄昏，晚霞染红了古老的宝塔塔尖，清凉山在金色的夕阳辉映中，显得格外壮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延河，您的流水像妈妈的乳汁一样，曾经哺育过我。马上，我就要离开您了，就像当年离开妈妈的怀抱，奔赴杀敌的前线。

会场里，坐满了来自边区党、政机关的代表，民兵代表和劳动模范，他们代表着边区人民欢送我们开赴抗日前线。7点钟光景，鼓掌声骤然响起，人们一个个地踮起脚尖，朝前面看。哦，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了。

“同志们！”贺老总满面春风地宣布了大会的开始。第一个讲话的是毛主席，会场里回荡起他那浓厚而又亲切的湖南口音。我赶紧掏出钢笔，集中精力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现在的形势很好，抗战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我们要争取今后两年打败日寇！”

多么富有感染力量的号召啊！

“红军战士，都是党的宝贝，都是军队的骨干。今天，党派你们去抗日前线，就要起到红军战士的作用。”说到这里，毛主席停了停，又说，“在这欢送大会上，我送给你们两句话：你们要有松树加柳树的性格，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经受考验。”

毛主席意味深长的讲话结束了。这中间，不仅指示了我们执行斗争任务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也交待了具体的办法。最后的两句话，对我们提出了十分殷切的希望，我反复地琢磨着“你们要有松树加柳树的性格，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经受考验”这两句话的含意。松树，她从不畏惧风霜雨雪的欺凌，倔强峥嵘，四季常青；柳树，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论把它插在哪儿，就能在哪儿发芽，抽枝，茁壮生长。这两句话的含意不就在这上面吗？在斗争中，必须坚持原则，又要机动灵活。胜不骄，败不馁，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选摘自黄朝天：《党啊，我的母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35页。作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五编

延安精神谱新篇

一、渡过艰难的两个中心环节

1 毛主席领导我们整风

1942年初冬，我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属的苏北盐阜军区工作。一天，组织上通知我，说是党中央决定，要从各地抗日前线抽调一部分领导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要我尽快准备一下，日内就得出发。

我们接连走了六七个月才到延安。当时，已经是1943年的夏末秋初了。

按照党中央的规定，我们在中央党校首先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写下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我们在苏北根据地也初步学习过。于是，我就想了，跑大半年的路，牺牲了好些同志，还是学习这些文件呀？在苏北学、到延安学，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再说，我们当时都还缺乏坐下来认真看书学习的良好习惯，特别是整风学习要求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照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又要求我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尤其是要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整顿“三风”，打倒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对此，有的同志就很不理解。比如我们二部有个团长，是个战斗英雄，很会打仗。可这个同志一听要整风，要自我批评，思想不通。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大天钻于弹窝，辛苦得很，有啥好自我批评的，有啥好整的，

毛主席最关怀革命战士的成长。一天，校首长告诉大家，毛主席要到我们中央党校来作报告。

这个消息一宣布，全校立即沸腾了。不管是以前见过毛主席的，还是没见过的，也不管对整风学习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早些到来。我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一夜没合眼。我想起了以前几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在1936年冬，西安事变前夕。那时，我们红二方面军经过二年多的艰苦转战，长征到了陕北。有一天，上级要我带领二方面军宣传队的一些同志去保安学习，当时党中央就在保安。这是陕北高原上一个很小的县城，几乎没有什么街道。有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开大会，我们也参加了，大家都坐在地上。会前就听说毛主席要来讲课。我们宣传队的同志都很激动，大家虽然都还未见过毛主席，但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挽救革命、挽救红军的丰功伟绩是人人知晓的，早就渴望着见见自己的英明领袖了，就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向我们讲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毛主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想起了几年前在“抗大”学习时，毛主席亲自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毛主席总是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我们讲述深刻的革命道理。在分析革命形势时，既充分估计了困难，揭露了敌人的凶残和阴谋，又给我们指出了革命斗争的光明前途，以及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后来，我奉令来到了苏北抗日前线，一次又一次亲身体会到，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拿眼前的延安来说吧，同我离开时的情形相比，实在大不相同了。不但战胜了敌人的重重围困和经济

封锁，而且已经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党一天一天地壮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天一天地发展。这一切，不都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吗！今天，在这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又要给我们说些什么呢？

一清早，我们全体同志就齐崭崭地坐在大瓦窑党校大礼堂里了。突然，听得有人高声地欢叫：毛主席来了！我急忙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眼睁睁地望着大门门！啊，真的，毛主席来了！主席穿着一身我们延安自己生产的灰色的粗呢制服，挥动着巨手，不住地向大家致意，微笑着走进会场。走上讲台！我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一起放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站立在讲台上，我仔细地望着他的脸，3年多不见了，主席好像比以前更加壮实、健康，掌声久久不息，主席不时地抬起手，示意大家停下鼓掌和欢呼。不一会，主席宏亮的声音在会堂里震响起来了。霎时，整个会场就安静下来了。

毛主席一开头就把我们同志的一些想法给点破了。接着，主席说，其实呀，人都免不了要犯错误。比如说我写文章，总免不了要改，要撕，写了又撕，撕了再写，算不算犯错误呀？不错，你撕它干啥？再说小孩子学走路，走几步，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几步又跌倒了，这算不算犯错误？又好比一间房子，不经常打扫行吗？一个人不天天洗脸行吗？这时候，同志们都笑了，我们相互交换着愉快的眼色，有的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认识到自己原先不愿作自我批评的想法错了。

往下，主席又说，同志们，我们的党还很年轻，我们的许多同志，革命经验也还不丰富，这就像刚学走路的小孩，在革命的道路上，难免不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东西，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整风整好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那么我们队伍就整齐了，我们的步调就一致了，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

主席的整篇讲话，是多么的深入浅出，又是多么的语重心长，有如一滴滴的清泉，滴进了我们的心窝。我在心里说道，是啊，是啊，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不也是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吗？有时光凭主观热情，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尤其重要的是，我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未能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和认识。这些，都是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需要很好解决的。

这时，会场上一片肃静，有的低着头，在做笔记，有的激动地望着主席，频频点头，有的在沉思，我们的那个团长，脸孔都红了。

听完毛主席的重要报告，我们当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校出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热气腾腾的局面。一个个都认真地学习文件，自觉联系实际，畅所欲言，放包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连吃饭睡觉都忘记掉了。就说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团长吧，现在，他的精神面貌可大不相同了。他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居功自傲的错误，成了整风学习的先进典型。

在我们整风的过程中，毛主席又几次来校听取汇报，并亲自看了我们所出的墙报，伟大的整风运动，始终是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进行的。

实践使我懂得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通过整风，我党、我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

大提高，使我党我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战牛力大为加强。

（选摘自谭石冰：《毛主席领导我们整风》，《杭州日报》1976年12月25日。）

2 持续八十八天的高干会议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学习的整风文件都由联防军司令部发给，中央党校发给特别许可证听重要的报告，在西北局、联防军司令部参加有关的会议。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内容。三风即：整顿学风以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以反对官僚主义，整顿文风以反对党八股。党中央规定了22个整风学习文件，我们的学习方式以自学为主：完阅读文件、听报告，一律要做学习笔记，笔记的内容不是光摘记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过去工作上、思想上的优缺点。

1942年10月19日起，我参加了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会议一直开到1943年1月4日。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县一级和团一级以上党的负责干部300多人，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

会议的一个议题，着重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少数干部所犯的错误的，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们排斥刘志丹等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推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使边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过去由于边区党内缺乏强有力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不能从理论上澄清问题。这次很多代表以亲身参加过两条路线斗争的体会，对照整风文件着重检查思想和作自我批评，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讨论，学习了《六大以前》的文件，开始了解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这次会议中央领导经常到会，毛泽东同志在开幕会讲了话，还在11月21日到会就整风文件《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作了讲解报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边区的历史教训说明与错误路线斗争的必要；当前的偏向，特别是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的偏向，虽然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

叶剑英同志给会议报告了华北斗争的现状，使到会干部了解敌后斗争的艰苦情况，以及边区与敌后斗争不可分离的关系。贺龙同志向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彭真、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也在会上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的任务提出七整：整党、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政、整学。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讨论，制订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会议指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是执行了党的路线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要发扬优良作风，纠正这种倾向，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更好地执行党与上级的政治任务，更好地进行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

会议进行了 88 天。闭幕会上，毛泽东同志做了领导问题的讲话。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通俗的话，阐明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使我们对什么是领导和如何实现正确的领导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接见了从前方到延安学习的军事干部，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全吐出来，心情就舒畅了。你们再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们心中豁亮了。

我在延安参加了 8 个月整风学习，收获很大。1943 年 3 月，我由延安动身返回部队。在我离开晋西北期间，部队发生了几件大事：1942 年 4 月第四军分区并入第三军分区，领导机关不变、司令员、政委仍由我和李井泉担任。旅直属队由兴县恶虎滩移到临县的松峪；5 月 20 日，三五八旅和工卫旅等部，在兴县东南的田家会战斗中歼灭日军第八十五大队 700 余人；8 月间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10 月，晋西北军区改力晋绥军区；同月林枫从延安带回毛泽东同志“要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绥军区组成武工队 15 个、345 人深入敌后，以后发展到 37 个队，并派出 9 个主力连、19 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展开对敌斗争；1943 年 2 月 20 日，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联防军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摘自《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8—261 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肃反不能“逼供信”

1942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所有干部，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整风学习的高潮。我们在绥德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认真学习整风的有关文件，在领会文件精神，划清思想界限的基础上，根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和成绩，揭露缺点和错误。通过整风的学习、讨论和总结，收获是极其丰富的。

在整风运动中，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防止敌人的破坏，对干部的身世、历史进行审查是必要的。1942 年 11 月，康生在西北公学搞试点，他用逼供信的方法，搞假典型，开展所谓“坦白、自新运动”，执行了一套“左”的东西。1943 年 7 月，康生又向中直机关于部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此，“抢救运动”就更有所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被追查和逼供，制造了大批的冤案和假案，搞得人人自危。因受康生的影响，绥德也搞了“抢救运动”。我因忙于行政工作，开始没有分配我的任务。7 月间，朱德总司令来电报，要我去延安接受新的任务。我到延安后，朱德说：原来准备派你去榆林，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你不必去了。他要我在延安休息几天后仍回绥德。另外，他要我去见毛主席，看他有什么指示。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去枣园。毛主席的住房前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我就在这里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边喝茶，边谈话，毫不拘束。毛主席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我说这项工作主要是地委抓，听说绥德师范正在搞，搞出的坏人不少，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讲

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他又讲，结果，越搞越大。他们沉痛地对我说，我们过去在肃反中错杀的干部很多，这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的很深刻，是对我党多年来肃反工作的总结。我认真地作了记录，回绥德后，向地委作了传达。

当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会的很不够。我传达以后，地委没有停止运动，仍继续进行“抢救”，但方式方法要和缓些。“抢救”的重点仍放在绥师，因为绥师过去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有一个学生在校长白焕亭逃跑时，他也跟着跑了。他跑到榆林后，又在那个校长斩办的响水师范读书，1942年才回来。根据他的情况看，确有可疑之处，决定“抢救”他，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跟着校长逃跑？他说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再追问他，学校这么多人都不害怕，都不跑，你为什么害怕？你害怕什么？你一定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开始时，他不承认，经过一再追问，他承认参加了中统，是校长策划他逃跑的。由于这个问题突破了，大家觉得有文章可作了，就继续追问他为什么回，一定带有任务。他说，因为看到共产党还不错，家里都很好，没有发生什么事，心里就踏实了。另外，回家读书也方便，所以就回来了。对他的交代，我们总是不信，还继续追问。搞了五六天，他最后交代说这次回来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已经发展了三四个人，还带着暗杀和暴动任务。但他讲的有些情节很荒谬，不可能是事实，我发生了怀疑，遂亲自审问，首先向他交代党的政策，要他实事求是，讲老实话。这时；他才讲了实话，他说，参加中统是真的，其它的事，都是编造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审查他的问题是对的，事出有因，但搞逼供信，无休止的追问，就错了，如果不是及早发觉，就可能造成冤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地委书记，引起了他的重视，立即召开地委会议，提出在“抢救运动”中不要搞逼供。这次会议后，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但方式改变了，不搞逼供信了。不久，中央把毛主席在那一时期关于审干问题的谈话归纳为审干的九条方针，于1943年3月15日作为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发给全党。这时，“抢救运动”才被制止。以后，又把搞错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

（摘自袁任远：《征途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40页。作者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兼绥德专署专员。）

4 向大家赔礼道歉

在延安，完全听不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看不见两军拼杀的战场烽烟，但是，延安并不平静。

整风运动，使各种错误思想暴露出来。为了纯洁党的干部队伍、打击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党中央在1943年决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

阴谋家康生利用了当时发生的王实味事件，导演了一幕所谓“抢救失足

者”运动的丑剧，几乎把许多同志都置于死地。

康生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兼社会部长，具体负责审干工作。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对于部队的基本情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极力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在审于中搞神秘化、扩大化。在各机关中一味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比例数字，大搞逼供信。有的同志不同意他们这样搞，就被指责为“没有敌情观念”，甚至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横加迫害，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我们五部的人大部分是从外地来延安的。开始，斗争搞得并不紧张。我们的部长对此大发雷霆，说：“人家别的部都搞出了百分之八九十的特务、叛徒，我们连百分之五十还不到，这怎么行啊！难道就我们五部干净？恐怕还是我们下的功夫不够啊！我们一定要加劲干，迎头赶上去！”此后，“抢救运动”便在我们五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很多同志都陆续受到了审查、迫害。我是从冀中到延安去的，自然也不能幸免，多次受到审查，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折磨。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快就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并立即着手纠正这一错误倾向。首先，毛泽东同志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同志受到怀疑、审查，就明确指出：不可能有这样多的特务。接着，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8月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毛泽东同志还指示，对被审查的人“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吃得饱，睡得好”。毛主席提的这些方针是对康生那套错误作法的根本否定。周恩来同志对这种情况也给予了批评。“抢救运动”开展最激烈的时候，他没在延安，后来，他从重庆回到延安，听了汇报后当即指出：“过去那种作法是错误的！怎么能这么搞法？把那么多人打成特务，哪有那么多特务！怎么能把四川的党说成红旗党？我长期在四川工作，情况我都是清楚的，这个案于一定要甄别！”彭真同志也说：“我这个党校是共产党的党校，不是国民党的党校，怎么会有这么多特务！”……

毛泽东同志不仅亲自动手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还亲自出面向大家赔礼道歉，平反冤假错案。记得那是1945年8月的一天，我们都被集中到党校礼堂开会，说是听毛主席作报告。这一次，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毛主席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正中央给大家讲话。他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特别洪亮。他一边讲一边不停地打着各种手势，还不时诙谐地开句玩笑，无论是语言还是表情都异常生动，以至于让人几十年后也难以忘却。

毛主席的报告整整持续了3个多小时。当谈到“抢救运动”的错误时，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宽阔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毛主席接着说：“错误也有两重性，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毛主席这句幽默、风趣而又含义深刻的活引起了全场哄然大笑，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毛主席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

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好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

毛主席还说：“这次大家都洗了个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改正，坚决平反！”毛主席的话博得了全场一阵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我青见，不少人的眼里噙满了晶莹的泪花。

毛主席说：“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说着，毛主席顺手把坐在他旁边主持会议的同志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全场又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最后，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主席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随后，毛主席又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

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主席答礼。有的同志一面拼命地拍手，一面听任感情的泪水在脸颊上痛快地流淌。“抢救活动”压在人们心中的种种烦恼、苦闷之情也随着这泪水渐渐地流逝了。大家为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方针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摘自《延安整风琐忆》，王德元口述，宫发整理，见《星火燎原》杂志1982年第2期，第54—56页。）

5 带头参加大生产

1941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指导员以上的干部，到北门外中央组织部大礼堂开会。通知只是说开会，谁也摸不准会议的内容，但估计将是一件大事。

李富春同志主持大会，他简单讲了一下会议议程，然后由毛主席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动员报告。毛主席是即席讲话，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但讲得生动活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毛主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现在我军深入敌人后方，各项工作都迫切需要干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培养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使这个地方增加了不少人，加上党中央各部门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的充实，边区部队的扩大，各种人民团体的建立、健全，脱产人员越来越多。革命队伍里的人，都需要吃饭穿衣，可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只有120万，地瘠民贫，生产力很低，养活不了我们这样一支庞大的革命队伍。国民党和他们“委员长”，掌握着全国的军权、政权、财权，但他们占着毛坑不拉屎，不但不领导人民抗战，而且暗地里积极反共，对战功卓越的八路军不发粮、不发饷、不给枪械弹药，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补助一文钱，倒反实行经济封锁，还在边区周围搞磨擦，进行蚕食。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主席诙谐而风趣地笑着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

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这句话话音刚落，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那个时候，正处在抗日战争高潮时期，革命队伍里人欢马跳，全国人民斗志也很旺盛，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把革命队伍解散，我们心里明白，这是毛主席的激将法，所以都异口同声地大笑起来。

毛主席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毛主席用双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了个束手待毙的样子。这个动作十分自然又非常逼真，严肃幽默，妙趣横生，逗得我们又捧腹大笑，肚子都笑痛了。

毛主席继续讲下去：“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搞得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的报告，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散会之后，礼堂里像开了锅似的，人们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共同庆贺伟大的生产运动即将开始。此后不久，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延安和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革命圣地——延安到处是一片新生气象。宝塔山和清凉山下，南川和北川里，出现了一排排崭新整齐的窑洞，傍晚，人们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劳动之后，在平静的延水两岸散步、休息。山谷和田野间，荡漾着雄壮的抗日歌声和那悠扬的、激动人心的“延安颂。”

延安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单位也不例外，叶子龙同志亲自带头，领导我们警卫员、勤务员、通讯员上山背柴，烧木炭，积极开荒种地。

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我们坐在山坡下开生产动员大会，忽然看到主席从窑洞里走出来了，同志们立刻热烈鼓掌，欢迎主席讲话。主席微笑着问：“是开生产动员大会？这很好嘛。”他走到我们面前，接着说：“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主席停了一下，望着两旁的山坡说：“杨家岭山上的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穿衣、吃饭问题。如果能搞起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的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主席讲的话，又具体，又明了，大大地鼓舞了我们的生产干劲，会后，我们很快地组织了生产队伍，制定生产计划，分片开荒种地。大家同时凑了些钱，主席也拿出自己的稿费，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机关合作社。

主席看到我们每天轮流上山开荒，就对我们说：“我不能走远，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我也好开荒种菜。”

我们劝说：“主席工作很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

“不行。”主席坚决地说：“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劳动生产。”

在主席的坚持下，我们和叶子龙同志商议了一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靠近河渠的地方，给主席划分了一亩地。下午，主席休息的时候，拿起锄头挖地去了。我们几个警卫员、勤务员一见主席下地，急忙回到窑洞里，拿起锄头赶上去，和主席一起挖地。主席立刻阻止我们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

我们一边笑，一边在主席身旁挖地。主席身上穿的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还不停地挖着地，愉快地和我们说话，和领袖在一起劳动，这对于我们是多么大的幸福和鼓舞啊。大家劲头十足，很快就把一亩地挖完了。然后，主席又和我们一起，在地里垒了个小水坝，准备引水浇地。

几天后，主席和我们在地里种上了西红柿等蔬菜。蔬菜长出来了，主席和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一起抬大粪，给菜地施肥。主席参加劳动生产的事迹，使老乡们也受到了感动，杨家岭村有个二流子，成天闲逛，不务生产，当他看到主席冒着炎日，在地里锄草、浇水，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跑回家里，提起锄头上山生产去了。中央党校种的地在杨家岭后沟的山上，下午，同学们返回学校时，经过沟口，看到主席正在地里辛勤劳动，感动地站在路旁，热烈地给主席鼓掌。主席站起身子，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同学们更兴奋了，站在地头高唱起“生产大合唱”……

（摘自曹慕尧：《毛主席动员我们搞生产》见《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3期，第48页；贺清华：《随从毛主席在陕北》，见《红旗飘飘》第13集，第54—56页。）

6 陕北好江南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我党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无价之宝。南泥湾精神正是体现和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我当年曾经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有幸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指示。

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指挥中心，是全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总后方。全中国、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热爱它，拥护它，向往它；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却憎恨它，害怕它，千方百计地妄图消灭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1941年以后，调集了侵华兵力的75%，对我各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从1939年到1943年，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调遣了几十万大军，西起宁夏、陇东，南沿泾水，东迄黄河，构筑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对我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既妄想以武力消灭我们，又妄想困死、饿死我们。

当时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怎么办？在这革命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坚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为我们指明了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方向，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出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自

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又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毛泽东同志对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十分重视，向我们指出：在政府、军队、机关三部分公营经济中，军队的生产事业是最主要的部分，因为军队是比较更有组织性，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团。又说：要“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我们部队一手拿起枪杆，提高警惕，保卫边区；一手拿起锄头，生产自给，克服困难，有力量有办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犯和经济封锁，坚持抗战，夺取胜利。同时，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群众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人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三五九旅是在1939年的秋季，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命令，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1941年3月，我们旅全体指战员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遵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率领下，怀着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生产自给，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坚强信心，斗志昂扬地开赴新的战场——南泥湾。

南泥湾的战斗，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亲自指挥的。回顾当时部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情景，有力地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我们这支部队，在党的培育和教导下，具有一往无前，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它能战胜一切困难，而决不被任何困难所屈服。

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在树林里露营，用树枝搭起简陋的帐篷，碰上雨天，哗哗往下淌水，把人淋得十分难受。战士们衣单被薄，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袭，就起来烧火取暖。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从帐篷里传出来的，是一片豪迈的歌声。

经过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几年的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到南泥湾视察，兴奋地赋诗称赞：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

1943年9月，毛泽东同志亲临丰收的南泥湾，视察我们部队。毛泽东同志走进刷得雪白的窑洞，看到桌子、凳子和一切家具都是战士自己做的，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当我们向他汇报部队生产情况后，他高兴他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毛泽东同志这一光辉思想，一直是鼓舞和激励我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巨大力量。

（摘自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02—209页）作者当时任三五九旅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7 毛主席视察南泥湾

1943年7月，南泥湾遍地是一番丰收的景象。一块块绿油油的稻田，一片片玉米、大豆，在微风中摇动。山上的海棠、红枫、栗子树，衬托着山下的田园，使得美丽的南泥湾更加可爱。一天中午，我们正冒着炎热，在玉米地里锄草，从旅部跑来了个通信员，老远就气喘吁吁地喊着：“快点，旅长叫你们回去几个人！”我插上锄，擦了擦头上的汗水，问他：“什么事？”他说：“我也不知道，快走吧！”

这时我在三五九旅旅部当四科长。听说旅长叫快点回去，心想：一定有紧要的事，不然旅长怎么会叫人跑20多里路来叫我们。我们几乎像长了翅膀，一气就“飞”到了旅部驻地——金盆湾。

王震旅长像是刚刮过脸。我们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们回来了。快准备，明天毛主席要来！”

我一听，简直要跳起来，生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又问了一句：“是毛主席要来吗？”

“是毛主席！”王震旅长笑了：“怎么？高兴吧！”

真的太高了，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接受了旅长的吩咐，我们忘了吃饭，愉快地忙起来。有的同志去打扫窑洞，有的去收拾新盖的房子。炊事房的同志，更是个个乐得闭不上嘴，到菜园里去选青菜，到猪圈里去捉肥猪，也有的去抓小鸡。这个说：“咱们要把生产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出来一点，让主席看看。”那个说：“那怎么行？凡是生产的都拿一点，一间窑洞也放不下啊！”

我们三五九旅，原是八路军一支主力部队。三年以前，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从华北抗日前线返回到陕甘宁边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30万大军包围着边区，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毛主席给我们任务：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我们来到南泥湾后，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羊喂牛，自办工厂，把一个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富饶地方。毛主席亲自来看看这光景，该多高兴啊！

这晚上，我们不由得又谈起三年前的情形：那时候，南泥湾遍地是荒草，

晚上睡到树枝搭的小窝棚里，直提心豹子和野狼钻进来。夜晚没有油点灯，开会也是摸黑。粮食不够吃，只好上山挖野菜。每顿饭里都掺和着野菜、黑豆、红薯或南瓜。冬天的棉衣，大都是羊毛捻成的线织的，比麻袋还粗，一个小孔，一个小孔，里头的“棉絮”是牛毛和羊绒，刚做起来还像个样，穿过几天就往下掉，裤腿软软囊囊，活像条没装满的布袋。夏天，每人只有一条裤子，许多同志没裤子换，洗裤子的时候，蹲在河里，等晒干了才爬上岸来重新穿上它。没有袜子，弄块破布包上脚用绳子一捆。没有牙刷牙膏，洗脸时在手巾上放点盐擦擦牙……说真的，当时有不少同志曾怀疑：南泥湾这块穷地方，我们能搞出个名堂来吗？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嘿！哪还能比！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有了。牛羊成群，肥猪满圈。除此以外，还开办了纺织厂、铁工厂、本工厂、农具厂、酱菜厂，真是百行百业，无所不有。我们“大光纺织厂”出的布匹，毛巾厂织的毛巾，肥皂厂制的肥皂，除了自己部队使用外，还拿到市场销售。如今的南泥湾，真像那支动听的歌：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第二天一早，窑洞外刚刚放明，我们就起来了。心里跳着，脸上笑着，一个劲向通往延安的路上看。从延安到我们这儿，大约 60 华里。我们计算着：毛主席吃过早饭出发，要是骑马，3 个多钟点就到了；要是乘汽车，只要一个钟点就到了。

等啊，等啊，一直到快开午饭的时候，还是不见主席来。有的同志说：“主席工作太忙，可能又给什么大事耽误了，不会来了！”有的说：“你别瞎参谋，主席说今天来就一定来！”其实就是说这话的同志，也暗暗担心：可不要真有事耽误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汽车驶来，毛主席微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不禁欢呼起来。主席挨个和欢迎的人握手，并向王震旅长说：“庄稼生长得满好啊！”

随同主席来的警卫员同志告诉我们，主席一路来，一路察看了田里的庄稼。还和在田里生产的同志谈了话。因此，整整走了一个上午。

已经是开午饭的时候了。旅首长请主席到新盖的房子里休息，嘱咐我去厨房准备饭。主席笑着说：“刚刚来到就开饭，可见你们粮食很多罗！”说着也没进房休息，同旅长、政委、副旅长等首长去看新盖的房子，看新开的窑洞。

我顾不得跟主席去走，赶忙往厨房跑去。大师傅已经喜气洋洋地忙开了。不论是炒的、煎的、炖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开饭的时候，把饭菜送到主席休息的房里。我走到主席身边。问还要些什么菜，主席爱吃什么，我们全有。主席笑笑说：“这么多的菜，我尝都尝不过来了。”

我向主席说：“这些菜，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实，这话是多余。旅首长正向主席讲着生产情况哩！

主席问：“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平均五钱油。”王震旅长说，“菜随便吃。”

主席问：“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

“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有时杀口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主席问：“有没有发生柳拐病？”

“没有，一个也没有。”

主席很有风趣他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旅首长一面陪主席吃饭，一面讲着部队的生产情况。告诉主席：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平均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耕二余一。”每人生产的情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

主席听着，不时点头微笑。主席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靠外国进。”

如果说主席在吃饭，倒不如说在谈工作。

主席吃过饭，又和王震旅长、王恩茂副政委、苏进副旅长、李信主任谈了一阵话，然后就走出窑洞到金盆湾附近视察。主席一边走一边说：他在来的路上，就下车看了玉米、豆子、瓜菜，庄稼都生长得很好，只是有的豆子秧上有虫子，要注意灭虫保苗。

主席来到了通信连，见一座座新开的窑洞刷得雪白，问石灰从哪里来的。王震旅长说是从山里取石头自己烧的。主席又问窑洞里的桌子是不是战士们自己做的。王震旅长说，全是自己做的。主席拿起桌上一个学习本，看了上面写的字，摸摸“纸”的厚度，高兴他说：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旅长说：“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主席微笑着说，“同志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王震旅长对主席说，桦树皮用处可不小，不光能写字，同志们还用它做饭盒，做斗笠。说着从墙上取过一顶桦树皮斗笠给主席看。主席接过去，看了又看，称赞做得好。

主席走到厨房，李金山老头正在切菜，两只湿漉漉的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得嘴上的胡子直抖，不知说什么好了。

主席问：“做的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个萝卜汤”。

主席又问：“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

“辛苦罗！”主席勉励他说。

李金山回答主席说，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他辛苦的多。主席又鼓励他说：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生产。

主席从厨房出来，又到养猪的地方去看。老杜头正在圈里收拾什么，看见旅长陪着一个人走来，只是笑了笑。他不认识毛主席，也想不到毛主席会有空到他工作的地方来。主席站在栏外，看着那懒洋洋的一大群肥猪和一窝乱拱乱跳的小猪，向老杜头说：

“老同志，你养的这些猪好肥啊！”

老杜头只顾挖猪圈，没听见主席夸他。这时王震旅长说：“老杜同志，毛主席说你养的猪肥呢！”

老杜头这才知道毛主席站在旁边，他连手里的铁锹也忘了放，赶忙向主

席敬礼，同时回答主席说：“过去没养过猪，养得不肥，”

主席和他握过手，问他多大岁数，家乡是什么地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养猪的工作。

老杜头回答主席说，他干这工作才两年，经验不多，摸索着干的。主席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很光荣。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生活，你说对吧？”

“对，对！”老杜头快活地回答说。

主席最后向老杜头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不远处山坡上，是成群的牛羊，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生长着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苗，还有一块块绿色的菜田。万物在生长，万物都像是在歌唱。

主席走了许多地方，仍是毫无倦意，在旅首长的陪同下，沿着田边的小路，边谈边走，视察着战斗的南泥湾，美丽的南泥湾。……

（作者董廷恒，选自《星火燎原》（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1—56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部四科长。）

8 整风、生产的硕果

在贯彻延安整风精神中，我们团除了针对性地解决了团结问题和安心留守问题外，整个领导作风上通过学习与实践，得到了一次很大的改变。我经常组织团党委成员反复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以及《组织起来》等文件。另外，还学习了党中央颁布的“三个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通过学习，全体党委成员，都增强了党性观念，特别是加强了党风，遇事都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

进驻大凤川之后，我们团党委的主要成员，几乎终年在各营连里“蹲点”，天天同指战员们吃、住、干在一起。这样，我们团的工作，自延安整风之后，不断得到开拓前进，新的模范人物和新的先进典型也不断地涌现。

一营二连自留守以来，一直是一营的优秀连队。尤其是江贤玉同志担任连指导员的时候，认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把党支部团结得像一个人，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这样，该连年年是全团的先进典型，各项工作都走在全团22个连队的前头。自从1943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以后，连队党支部以整风学习为中心，带动冬季军事训练和大生产运动，各项工作更比前几年做得出色。全连的军事训练，如投弹射击、刺杀等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涌现出朱德射击手40多名、贺龙投弹手40多名、高岗刺杀手37名。大生产的各项数字也是惊人的，如养的肥猪，是全团最高数字，达到每人约5头猪之多。出席营、团、旅直到陕甘宁边区各类英雄模范会议的代表达到50余名。

二连全面建设连队的情况，团政治处经常有材料向旅以上组织汇报。因而，迅速得到了旅、兵团部以及军委总政伯部的重视。1943年秋天，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曾做了一个批示：“七七 团二连上面建设连队的做法，是很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我建议，派人去做一次具体和全面的调查、研究，

给该连写个经验总结，报告军委和主席一阅。”遵照谭政主任的指示，留守兵团政治部抽派了两名团职干部当工作组正副组长，组成了“联政”和留守兵团两级联合工作组，来到大凤川。

工作组一行近 10 人，在二连住了约一个半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上级来的工作组没有一点官架子，使二连的战士很受感动。战士们把工作组的同志当贴心人看待，无话不谈、无事下讲。因而，在这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工作组就为二连的全面建设连队情况，写了一个小册子，题为《七七 团的第二连》。这个小册子，把二连近几年来整风学习、军事训练、防务工作、生产情况和生活管理等，写得既概括又具体，既真实又生动，全面地反映了二连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留守工作中生龙活虎般地建设连队的生活风貌和基本经验。

《七七 团的第二连》这个小册子由谭政主任上报给了中央军委。不久，传来了毛主席看到这个小册子的指示。毛主席曾赞扬说：事实就是真理。看嘛，蒋介石的兵，胖子变成了瘦子，成了干柴枯枝；我们八路军的兵，有吃有穿，生龙活虎，瘦子养成了胖子。蒋介石卡我们的脖子看笑话，想叫我们垮台，我们不但未死，还发展了。

随后，总政治部为了表彰二连和推广二连全面建设连队的经验，曾把这个小册子上的材料摘要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并发出了通知，号召抗日前线和留守后方的八路军各连队，都应该参照二连的先进经验，提高军政素质，在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全面建设部队。

（摘编自张才干：《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2—396 页。作者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七七 团团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二、令人难忘的教诲

1 亲切的教导

1935 年 11 月到 1945 年 7 月，我在“工农红军学校”、“西北工农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工作，当时正是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抗日战争的革命转变时期。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有幸多次直接聆听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这是我整个革命征途中极其重要的一页。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愈久，回忆起来就愈是令人心潮激荡，倍增怀念。

1935 年，正当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时，国内斗争形势急剧变化。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从遵义会议、“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到 1937 年 5 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党代表会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经验，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相应的方针政策。全党上下能否胜利实现这一战略转变，能否正确认识新的斗争任务、斗争条件和斗争规律，能否正确地贯彻执行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关系到当时面临的抗日救亡斗争以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

然而这时党内思想是不完全统一的。许多同志对新的斗争任务和实现战

略转变的必要性还认识不深；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经过十年内战的殊死战斗，现在要和敌人言和、合作，不少同志思想上、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来，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存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此外，新到达陕北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但对中国革命还缺乏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等等。这一切说明，从上到下都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学习任务，要重新学习，重新教育训练干部，重新宣传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为此，在党中央领导下，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指导，展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学习运动，形成了为迎接新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勤奋刻苦学习的热潮。

为了总结经验，训练干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就创办了西北工农红军大学，1936年6月改办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7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3月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红大”的政治委员。我当时任党的总支部书记。记得学校开办之初，他找校的领导干部谈话，就明确指出红大的教学重点：一个是讲统一战线，一个是讲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体会到，这就是说，训练干部一定要贯彻党的政治路线，适应革命转变的需要。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红大”和“抗大”的教育，明确地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力求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学习的课程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联共（布）党史等基本理论课程，又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党的建设、各国论、及重大时事政策等现实问题课程。学习的要求既强调钻研领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以研究当前的革命现实问题为中心，学以致用，达到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武器来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目的。当时重大现实问题课程都是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来讲授，如毛泽东同志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同志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朱德同志讲授《党的建设问题》，杨尚昆同志讲授《各国论》，等等。当时放在突出地位的统一战线课程，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都讲授过。在学习方法上，既重视读书，又强调总结实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批判错误路线，改造世界观。参加学习的同志写了许多经验总结和回忆录，其中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写的还汇编成了《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在学习中，研讨辩论的空气是很活跃的。如关于西安事变的正确处理问题、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问题，关于统一战线是战略还是策略问题，都曾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央领导同志也作了大量论述来进行教育。1936年12月26日，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就亲自到保安的“红大”操场给中央机关和“红大”学员作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阐明了党中央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实现，成了中国时周转换的枢纽的大道理。他还风趣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用这个比喻生动他说明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说明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是争取全国各阶层人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作用和威望的提高，对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是不会甘心的，因此又要提防着他，这就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1937年春，毛泽东同志为抗大二期九队题词中，又着重强调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救亡’二

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又深刻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三个基本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发人深思，使大家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不断统一和加深，存在的一些疑虑也逐渐消除。

“抗大”对军事教育十分重视，要求通过学校训练使各种学员的军事素质都得到培养提高。毛泽东同志亲自到“红大”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到“抗大”讲授《论持久战》。学校设置了战役学和各种战术课程，为适应新的斗争任务需要，非常重视游击战术和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在学习军事理论的基础上，还组织来校学习的三个方面军的干部总结交流实战经验，从而进一步提高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学习中强调实地演练，第三期还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过一次千余人参加，行程几万里，为时一周的实兵对抗战演习。“抗大”不仅重视政治、军事教育，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以学。”早在1935年冬，筹办西北红大时，毛泽东同志就亲自把他的警卫员陈昌奉同志交给我，要我带他到红大去学习，他说：“对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要好好地培养，首先要提高文化，不识字的从学识字开始。”1936年4月26日毛泽东同志给“抗大”教育计划的批复信说：“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局限的……如果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么，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着的基础工具了。”根据他的具体指示，“红大”三科开展文化学习，后来抗大干部队的文化教育时间占1/3。学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自然、史地常识等等。毛泽东同志对工农干部战士成长的关心是多么深厚殷切啊！

为了领导革命胜利地走上新的征途，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内，致力于理论研究工作。他到抗大讲授的课程，包括前述的政治路线课、军事战略课和1937年七八月间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以及先后发表的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便都是他学习研究的丰硕成果。他不仅自己研究，还经常组织身边有关的同志进行研究讨论，同时也借以推动学习研究活动。仅我参加过的就有他先后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这两次研究会采取的方式都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先由一个人讲，然后大家讨论。留守兵团的肖劲光和我参加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是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还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重点讨论过关于战略阶段的划分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等，但讨论得最多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并不很多，但讲集中兵力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当然，这里边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

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讲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参加哲学问题研究会的人员还有肖劲光、和培元、艾思奇等同志，合起来也不到10人。（与后来延安正式成立的新哲学研究会是一回事。）每次讨论都是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最后毛泽东同志讲一讲。有时也插话。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内战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毛泽东同志还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一个报告，可惜没有印发讲稿，别人后来给了我一份很不完整的记录稿，其中许多内容都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当时虽30岁，但懂得很少，参加讨论主要是跟着学习，对我以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军事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当时的学习气氛是十分热烈的，如在保安“红大”时，虽然书籍不多，但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随时都可以看到人们三三五五地在讨论问题，星期天也不肯休息。毛泽东同志的学习精神是大家普遍敬佩的，他除了工作和必要的休息外，就是看书学习。工作总结，报告讲稿，他都是自己动手写。有一次他亲自修改了我起草的一个材料，专门把我叫去说我的文章写得太长，主题不突出，还教我怎样写文章。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送来的慰问品中有大批书刊，我经常挑选一些对他有用的书送给他看。他还要我找一本关于内线作战的书，当我找到送给他时，他非常高兴。他也经常推荐一些书给大家看，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刚刚出版，只有毛泽东同志有一本，他就推荐给我们。我们即组织人刻蜡版，硬是把这本书油印出来分给大家，成为大家喜爱的读物之一。还有李达同志的《社会学大纲》一厚本，我们都托人到国民党区买来看。当时物质条件很差，还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学习空气却热气腾腾。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表现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强大生命力，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前奏。一批批干部和骨干经过学习武装了头脑，走上抗日前线，到各地开创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这个时期除了努力学习之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下，还做了大量的增强团结的工作。这方面“抗大”也是一个缩影。

1937年1月26日“抗大”第2期开学。从这一期开始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来校学习。当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早已败露。3月，西路军惨遭失败，进一步说明了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党中央，已经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揭发批判。“抗大”广大学员对张国焘的错误已开始有所认识，但认识不深，在四方面军的学员中，有的对这一斗争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怀疑是整四方面军的干部。少数同志还抱有抵触情绪，甚至有越轨行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抗大”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干部严格区别开来。对四方面军的干部。既要求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深刻认识并自觉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又耐心地教育团结，解除疑虑，消除隔阂。首先，通过课程教育，使他们认识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所得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懂得党的正确的组织原则，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党中央正确路线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界限。其次，让他们同其他学员一样参加党的有关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要求他们结合历史事实和自己的亲身体会，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摆事实、讲道理，自觉清除自己所受

的影响。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深刻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危害的严重性。更明确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对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对四方面军干部所作的正确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强调了“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都感到非常亲切温暖，深受教育和感动。不少同志自觉联系自己的实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即使极少数思想抵触较大，甚至怀有对立情绪的同志，经过党中央既严肃而又耐心工作，也都认识和悔改了自己的错误。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下，积极英勇地投入抗日斗争。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抗日的前线基地陕北，给处在严重的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全国各地的爱国革命人士，特别尾革命知识青年大批奔向延安。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的，决定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于1937年3月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除继续培训红军干部外，还向全国广大的革命知识青年敞开大门，为革命招贤纳士，作为团结革命知识青年的重要基地之一。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抗大”组织他们深入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启发他们重视世界观的改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习和养成革命的传统作风。同时进行军事训练，传授实际斗争知识和经验，为使他们成长为革命干部奠定牢固的政治思想基础，提高实际工作本领。在领导和管理教育方法上除了及时的教育和生活上的体贴照顾外，我们十分注意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发扬红军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的光荣传统。校领导还郑重宣布：在学校里，在抗日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对错误的意见，也是通过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端正认识，达到政治思想一致。校内普遍设立了意见箱，以争取充分及时地反映意见，并且还允许越级上诉。各学员队“救亡室”办的墙报，也是大家交流思想，自由发表意见的园地。这种高度的民主生活，使来自国民党专制统治地区和日军侵略奴役地区的知识青年感到耳目一新，精神振奋，更增添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信赖和抗日救国的胜利信心。在发扬民主的同时，强调坚持严格的集中统一领导和革命纪律，特别强调学校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带头严格遵守纪律。当时学校内曾经发生过一位领导干部因婚姻问题违犯了中央的规定，直接影响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团结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念及这位犯错误的干部对革命曾作出过贡献，是有功绩的，想从轻处理，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纠正了这种姑息迁就思想，强调指出了革命纪律的严肃性，决定给违犯纪律的干部以降职处分，还为此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教育。另一件事是一个队长黄克功为了恋爱开枪打死一个女生，抗大一位负责同志去毛主席处求情，被批评一顿；为了严肃纪律，黄克功这个曾经为红军立过功的长征团级干部被枪决了。这件事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青年学生都深深佩服共产党执法无私，有的感动得流泪！这两件事的严肃处理，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普遍反映：共产党的纪律严明，说到做到，从上到下，无一例外，使他们电接受了深刻的纪律教育。在革命青年大批拥入“抗大”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个别敌对分子混进来进行破坏的情况。如“抗大”第三期就揭露处决了汉奸特务分子吉思恭；无疑的，这对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巩固也是十分重要的。经过“抗大”的学习，革命知识青年成长进步很快，仅第二三两期毕业1000多名知识青年中，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约占总人数的70%。当欢送他们

一批批走上抗日斗争前线时，我们内心充满了由衷的喜悦。这该是多么可喜的收获啊！

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是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红军的三大任务，广泛而又深入地做群众工作，特别是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在陕北搞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解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受迫害、被拘捕的同志，挽救了革命根据地，受到陕北的党组织、红色政权、红军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军政、军民团结是比较密切的，但陕甘宁边区本来就是穷地方，土地贫瘠，生产发展很慢，大量的军队、机关学校住在这里。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就有3万多人，群众负担很重，军队生活也很艰苦、困难。特别是1939年秋，国民党突然停止供应八路军薪饷，紧接着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30万大军加紧对边区的围困封锁。边区生活更加困苦，缺吃少穿，医药及日用必需品都极端匮乏。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小的矛盾，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处理，互相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有所抬头，有的领导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部队的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党中央很重视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亲自抓这方面的问题。记得是在1939年冬天，当时我在留守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有个战士借老乡的锅，老乡不借，有个炊事班到老乡家做饭，老乡把烟囱堵住等等。我为此给边区高自力副主席打电报反映情况，电报中强调了部队的困难和群众支持不够，请求帮助部队一下。我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同志叫我去。进门一看，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力等同志都在，西北局中央书记高岗也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我去的。毛泽东同志见我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我赶忙作检讨并说明没有告状。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同志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我领悟到，军政、军民关系上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检讨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埋怨政府和群众。还有一次是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肖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够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跪。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这多好呀！”毛主席又说：“人民群众敢批评军队，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下会犯大错误，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深深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对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本质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一些人来时的怨气也一扫而光了。回到部队都加强了拥政

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军政军民团结。以后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写信给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和我，指示留守兵团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结合整风运动，整顿留守兵团的工作。克服军阀主义残余影响，加强军政军民团结是这次学习和整顿的一个重要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效果。1943年春节前后，根据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使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工作更进一步深化，更加制度化了。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已成为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在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展的时候，有的同志曾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过高，缺乏足够的警惕，有依靠国民党军队轻敌速胜的思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还存在着企图破坏民族团结抗战大好形势的反动势力，在民族团结气氛高涨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性是摸透了的。1939年，当抗日战争刚刚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就确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并且由“政治反共为主，军事反共为辅”改变为“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当时，我们不少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认识不清，只看到蒋介石在表面上讲了一些好话。一次，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门前作报告时提醒大家说：“蒋介石一讲我们的好话，他策划的反共高潮就会到来。失败了，他又要骂我们一阵再收场”。后来果然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玉明搞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完全依赖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把中央搬到武汉去。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说：“要去你们去，我带留守兵团留下坐镇清凉山，你们去武汉，国民党派几个卫兵，不让你们出来，看你怎样办！”1939年秋，马鸿宾的一个师长马禄带着一个骑兵师，从洛川到榆林，要经过延安。前方发来一个电报。毛泽东同志一听就火了，即指示：“立即复一个电报，不准他们经过延安，只能经过延长过去。如果他们要强行来延安，你们就可以打。”同时还指示，即使他们走延长过去，我们也要作必要的布置，让曹里怀同志（当时任留守兵团参谋长）亲自到鄜县去，组织驻该县的独立营修好工事，作好准备，监视马禄师的行动。后来查明，马军的这一行动，就是要试探我们的虚实，想搞我们的鬼。我从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工作领导人，必须政治上非常敏锐，要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

遵义会议的成功，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逐步实现，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日益发展，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浪潮日益高涨，这一切给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军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本来嘛，第三次“左”倾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危机基本上被克服了。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国民党失败主义所造成的似乎不可解救的民族危机，也有了挽回的希望。在风雨如磐，茫茫长夜的祖国大地上，人们看到了走向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斗争正在召唤着人们，激励着人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摆脱难熬困境的人们，怎能不感到欢悦，不感到振奋呢？生活在全国革命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军民，政治情怀就像高原秋色那样辽阔，那样爽朗。

然而，这时边区军民在物质方面还是非常艰难的。红军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部队体力和军需装备都消耗到了最大限度，需要恢复和重新建设。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有许许多多的事业需要兴办。而边区大部分地区都还是解放不久，人民刚刚从连年军阀混战，恶霸盗匪横行，以及反动统治阶级挑动回、

汉民族武斗，所造成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也需要休养生息。加上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条件，是全国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还有国民党在紧紧围困封锁着我们，东面黄河对岸，又有日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军民们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全国各地革命人士都想尽力支援，但冲破国民党层层封锁阻拦，能够送到的东西很有限，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怎么办呢？还是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的，依靠人民群众，无往而不胜，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

英雄的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于革命的支援是尽了最大力量的。总共才 150 万人口，依靠这贫瘠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经济发展条件，供养着这么多的机关、部队、学校，保障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和各项事业费用。除此之外，还要支援战争，供应军粮、被服、军鞋和各种军需作战物资；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民兵协同作战。有一次，准备打退国民党的进攻，鄯县群众一周内就做了干粮 10 万斤，甘泉县 3 天做军鞋 1000 双。平时还节衣缩食，捐献礼品慰问部队。延安分区曾号召 36 万人民开展“一个馍运动”，也就是至少以价值一个馒头钱的物品慰问部队。至于老农老大娘、妇女、儿童，千方百计给部队送慰问品的动人事例，就数不清说不完。这一切如果不是共产党与人民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是不可想象的。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才有可能在陕甘宁边区站稳脚跟。

当时的困难虽然很大，对我们经历过长征的人来看，已经是好得多啦。革命政治热情饱满的人们总是乐观的，勇于和困难作斗争的。当时边区的军民就是这样，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正视困难，战胜困难。就以抗大来说，那时办“红大”“抗大”，其实是一无所有。我们就依靠两句话：一句叫白手起家；一句叫因陋就简。红大第一期，是 1936 年 6 月 1 日在瓦窑堡开学的，7 月初，随党中央迁到保安县。那时的保安县城，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加上我们到来之前国民党军的反复烧掠，剩下的只有几间土屋，几孔石砌窑洞和一个土围子框框。全城不到 400 人口，住在这些旧屋石窑内还是不够。当地群众流传一首歌谣描绘当时保安城的凄凉景象：“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样的地方办“红大”显然是不行的。幸好城外不远山坡上有好多石洞，我们“红大”一科就以这里为校舍。这些石洞也不知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凿在天然石壁上，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洞内外野草丛生，乱石纵横，有的可能做过羊圈，有的可能曾是兔窝狼窝，败草兽粪，狼藉遍地。我们来到后，先来个大扫除，把洞里洞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再来个上石作业，刷洞壁，抹黑板，砌石讲台、石课桌、石凳子、垒石炕，又打来野草编成草帘于挂在门窗上挡风；再用 3 天时间修了又宽又平的一条大路和 3 条支路，互相串通起来。就这样，没几天时间就把一片荒山野洞改造成了别具风格的边区最高学府。没有多久，毛泽东同志来讲课，他很高兴地赞许我们的劳动成果，勉励大家战胜困难，安心学习。他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中修炼，什么时候下山呢？天下大乱你们就下山。”毛泽东同志的话，既是对我们的表扬鼓励，又是给我们交代了庄严而又重大的革命任务，说得我们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学习劲头更足了。我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感动了解放不久的当地群众，他们特地赠送给学校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表示了对学校的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在我们看来，说明我

们的实际行动已经影响了人民群众建立新的世界观。这可是我们艰苦奋斗所得来的另一个没有想到的收获啊！

1937年1月，“抗大”第二期起，校址由保安迁到延安。校舍虽然比在保安时宽敞多了，但学员大量增加，原来不足300人的大学部，一下子就扩大到1300多人。到1937年8月三期开学以后，革命知识青年还是一批批接踵而来。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办一所“陕北公学”，更多地接纳外来知识青年，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为“陕公”校址，“抗大”本身也要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校舍不够又成为“抗大”亟待解决的难题，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这时，实际负责全校工作的是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他与各方面商量，又经实地勘察，决定拜陕北群众为师，自己动手，在凤凰山开挖窑洞，计划用15天时间挖出150个土窑洞。当时我是政治部主任，开展挖窑洞的政治工作。这是一场紧张热烈的建校劳动，党中央也很重视，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我们的伟大事业”的题词，给大家以很大的鼓舞，我们确定就以题词作为建校工地专刊的刊名。经过充分的动员准备后，10月21日正式开工，全校干部、教职学员、战士全部上阵，校首长也是边劳动边指挥。工地上宣传鼓动，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突击，就沿山坡挖成175个新式窑洞，超过计划25个。窑洞建筑得很好，有土炕，土写字台，洞口安有门窗，窗户糊上白纸，四壁用白灰粉刷，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还便于防空。窑洞建成后，大家又一鼓作气，修筑了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使上山下坡更加坦荡。站在山下往上看，顺着山坡一排排一层层窑洞，鳞次栉比，犹如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其气魄的雄伟壮观，又非保安的石洞可比了。到了晚上，点点灯火闪烁在凤凰山间，与碧空繁星交相辉映，好像银河落入人间，把古老的延安城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姿，生气盎然。当时，国际友人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参观“抗大”都钦佩地称誉抗大为“窑洞大学”。11月15日隆重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大会，党中央特地送了毛主席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到大会讲话，他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他鼓励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努力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是啊，毛泽东同志启示我们，不仅要凭这种精神建设起一个“抗大”，还要凭这种精神驱除日寇，建设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抗大”在继承红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优良作风，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培育学员，从而使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传下去。毛泽东同志在“红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就提出：创办“红大”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在为纪念“抗大”3周年所写的文章里再一次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这三者是造就一个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1937年上半年，有一次林彪到毛主席那里汇报和请示工作，毛主席口头指示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作为校训。以后，这三句话八个字就形成为完整的“抗大”校风。毛泽东同志对“抗大”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说：“抗大”同学毕业后，要能克服困难，联系群众，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主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谁要贪污腐败，不努力工作，那便不成其为“抗大”学生，就是背叛

了“抗大”的纪律。“抗大”的工作是始终贯彻了这些指示精神的。

1940年以后，边区的困难更加重了。日寇对解放区战场的持续的大举进攻，国民党对边区停供、封锁，又在全国发动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都是企图扼杀解放区，扼杀人民民族民主革命。使得解放区的困难加重起来，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怎么办呢？有一次，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后，大家要见毛主席，肖劲光、曹里怀、耿飏、甘渭汉、王维舟、杜平、白志文、袁渊、张才干、贺晋年、阎红彦等同志和我都去了。毛泽东同志正在午休，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他起来了，让我们进去，就和我们亲切交谈起来。当时正是严重的困难开始到来的时候，大家诉说部队物质生活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怎么办呢。困难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给我们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军队解散；一个是自己搞生产。我看还是自己搞生产好，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嘛！”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指出了唯一可行的出路，以后各部队就都搞起生产来。开始还只是开荒种粮种菜，以后生产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路子越走越宽，除了种粮食种菜之外，饲养牲畜家禽，开小作坊、小工厂，纺纱织布，捻毛线织毛衣，上山伐木烧炭烧石灰，自己做木器、铁器、造纸，生产各种日用品……等等；各部队都做到了粮、油、肉、菜及一些日用品半自给、自给，有的自给有余，把多余的交给政府，供应人民。众所周知以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成绩最为突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菜，纺纱捻线，每人开荒种两分菜地。朱德同志种的西红柿吃不了，送给我们大家吃。他还每天早晨到处拾马粪，起得比谁都早。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和大家一样吃粗粮。毛泽东同志的衣服已经补钉加补钉、鞋子烤火烧了个洞，都照样穿。有时我们在他那里学习或开会，到了深夜，他把党中央照顾他的一点点大米拿出来，煮大米饭请我们吃。后来，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指示，号召做好经济工作把人力组织起来，生产自给，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围困，立于不败之地；又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来鼓励大家。党所领导的学习活动和生产自给以后发展成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毛泽东同志称之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环子。他指出要“普遍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么，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以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指示，和其他一系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指示一样，在不长时间里就都胜利实现了。

（选编自莫文骅：《二十年打个来回》，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397页。作者曾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中共党总支部书记，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2 聆听毕业报告

我刚进抗大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全校同学集合在我们三大队的院子里，欢送二期的部分毕业同学到前线去。

会场上，队与队互相拉着歌子，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常。突然，歌声停了，罗瑞卿教育长站在队前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啊！毛主席！全场静了一刹，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二九”

运动以后，还在白区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阅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到校以后，从指导员和老同学的介绍里，我们知道，“抗大”就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创办和建设起来的。教育方针是毛主席制定的；标志着校风的“校歌”是毛主席审查批准的；毛主席还亲自为一二期的同学讲过课……这些天来，我们总怀着这么个心事：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只见毛主席穿着一身旧灰布军衣，微笑着，举着手慢慢走到队前。

毛主席首先向我们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接着，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我们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我们说道：“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毛主席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会场活跃起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

“会！”我们亮起嗓子大声回答。

毛主席又问道：“会不会打草鞋？”

我们又齐声回答道：“会！”

“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毛主席笑了笑，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这次，毛主席讲话时间不长，但这些话却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的内心。这些天来，我们虽然也初步认识到了“艰苦奋斗”这句话的含义，也经受了一些吃小米、挖窑洞、远道背粮食等艰苦生活的锻炼，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意识到艰苦奋斗对一个决心革命的人，有着如此巨大的意义。

寒冬过去，1938年的春天来到了陕北。

经过半年多学习和锻炼，我们抗大第三期就要结业了。考试、鉴定都已做过了；由本大队女同志提议发动的爱护母校的劝募运动正在开展；部分提前分配工作的同志已经整装待发……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只要一声令下，便可以奔赴前方了。但是，人们心里都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毛主席会不会再来给我们讲话？现在就要离开母校、离开延安，分赴敌后了，谁不希望再见见毛主席，再聆听一次他的教诲呢！

毛主席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思，正当我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的时候，消息传来：毛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

4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毛主席在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我们全校的2000多人。

毛主席的讲话是从我们第三期毕业谈起的。毛主席微笑着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主席为我们仔细讲解了在斗争中学习、向实际学习的重要，接着又谈到了敌后各战场的斗争形势。

最后，毛主席又进一步指示我们，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还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无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

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主席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主席的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次讲话以后，抗大便将这三条确定为全校的教育方针，加上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大的传统作风。在尔后毛主席为抗大建校三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少的。”

就在听过毛主席这次报告不久，我们抗大第三期的同学们，带着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走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熔炉，奔向敌后各个战场，开始了向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的新的历程。

（摘自牛克伦：《熔炉》，《星火燎原》选编之五，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623页。作者当时为抗大学员。）

3 翻阅毛泽东的讲话提纲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都迁到了延安。红军大学迁到延安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抗大的工作，抗大的学员和干部有了难以解决、或者思想不通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去讲课、作报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同志讲课、作报告，从来不照本宣科，手中只有一个提纲。每次把提纲上的问题讲完之外，毛泽东同志还允许听众写条子提问，准有下明白或怀疑的地方，写个便条，交给坐在自己前边的同志传递到前面，由值星员汇集起来，交给毛泽东同志，随问随答，生动活泼。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我看过一次。那是1938年的春天，抗大新的一期学生开始入校学习的时候，来自呈国各地大、中城市的进步知识青年，初到延安，进了抗大，一切都觉得很新鲜，绝大多数都是朝气蓬勃、力求上进。可是，也有些学员吃不了苦，生活一段时间后，思想上反映出各种问题，甚至发牢骚讲怪话。学校领导把学生的思想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毛泽东同志决定召集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亲自做思想工作。

当时，为了防空，较大的集会都在城外举行。这次，会场设在凤凰山脚下一个沟岔里。那天我担任值星区队长，负责给毛泽东同志准备桌子、凳子和开水。

毛泽东同志讲话、作报告，每次都是半天时间，中间有一次休息，大约20分钟。毛泽东同志在休息时间也不休息，他往往利用这个空隙和学生们拉话，了解学生们来延安以前在各地情况，也征求大家对讲话的意见，是否听懂了，有什么想法等等。趁着这个机会，我趴在小桌上，翻看讲话提纲。毛泽东同志的提纲是用毛笔写在白毛边纸上，字的大小不一，小的如同花生粒，大的像黄杏或红枣，本来能写三四百字的白色毛边纸，毛泽东同志只写了七八十个字。许多地方涂改了，也没有誊清，看样子是一气呵成的。我特

地数了一下，提纲上列出了 10 多个问题，有的问题下面还分小题，共用五六张毛边纸。其中 3 个问题，“爬山主义”、“劳动大学”、“与工农兵结合”，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标题虽然只有五六个字，可是每个题毛泽东同志都讲出了一大篇透彻的道理。

“爬山主义”这个词汇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那时，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出早操，经常有一个爬山科目。延安城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西城墙就建在凤凰山上，城外东北有清凉山，东南有宝塔山，此外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山，这些都被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身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无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落后，心里不高兴，便发起牢骚来：“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的动作慢了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要把老传统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

“劳动大学”这个名词也是学生发牢骚反映出来的。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因为没有房子住，首先要打窑洞，打好窑洞才有宿舍。口粮是小米饭、山药蛋，每人每天 5 分钱的菜金，包括吃的油、盐、菜和烧的柴、炭。粮食需要各队的学生自己去粮库背，公家既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学生们背粮有的用床单或毯子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自己的长裤子，把裤脚和裤腰扎好，就成了米袋。烧柴需要自己上山砍树，晒些日子再背回来。冬天取暖用的木炭，也要自己烧，自己背。做饭的木柴不够用，要跑到炭窑去背石炭。这样一来，公差勤务很多，占用了星期天，课余时间也难得休息，有的学生讲开了怪话：“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毛泽东同志回答这个问题时，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法宝，叫作“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许多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原来的红军战士，都当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就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数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已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多配。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

毛泽东同志把情况一摆，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解决。学生

们一听，思想很快打通了，原来讲怪话的同学，在讨论会上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强劳动观点，甩掉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环境。

关于“与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讲课中也作了生动的论述。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不只是在那次讲课中谈到了这个问题，而是经常用这种观点对抗大的学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逐步深入的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后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又作了深刻的发挥。如今每读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著述，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老人家当年讲课时的情景。

毛泽东同志的讲课提纲是简要的，但是，其中蕴含的内容是那么广博和深刻。从讲课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份提纲。我总是在思念：那几页薄薄的白色毛边纸，若是被哪位有心的同志留下来，至今仍保存在博物馆里，那该有多好啊。

（见曹慕尧：《毛泽东同志到抗大讲课》，作者当时为抗大学员、值星区队长，现力沈阳军区后勤部军职离休干部。）

4 关心边区党的建设

1937年5月2日至5月15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同全国党代表会议合并召开的。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84名。其中，苏区地方代表120余名，红军代表70余名，中央一级机关代表20余名，列席代表74名。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具体组织下进行的。张闻天同志在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苏区党的任务就是要“使特区（当时苏区改称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并指出：“一切上述的任务，只有存在坚强的党的领导时，才能完成，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力争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在结论中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的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边区党的建设，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

在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后，会议按苏区和白区分别召开，博古同志在苏区的代表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问题》的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逐步撤销陕甘省委、陕西省委和陕甘宁省委，成立特区（后改称边区）党委，各地区党委归边区党委统一领导。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已有党员32413名。此后两年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党员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到1939年底，党员发展到54万多名（包括军队中党员8000多名），在所有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中，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党的各级组织按照中央的规定，建立起工作制度，加强了组织纪律性，党的生活也逐步纳入正规。党洗刷了一批自首分子、腐化分子和堕落分子，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选拔了一批新干部，提高了一批老干部，党的干部队伍加强了。尤其是党员干部开始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学习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自己在1937年3月至8月，在抗大二期四大队学习了5个多月，受到很大的教益。当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抗大的教育工作，他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负责人亲自到校讲课。毛泽东同志讲授哲学，博古同志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等等。毛泽东同志讲的《辩证唯物论》对大家的教育最深刻。他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二三十小时，从3月间讲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4个多月。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大地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后来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这期讲授的《辩证唯物论》的一部分。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70名。其中地方代表122名，军队代表44名，工厂代表4名。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紧要时期召开的。这时国民党的投降、分裂与倒退已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最大的危险。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向边区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的任务，号召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

这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要以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指出这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并且规定了干部教育、普通党员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大会号召在全边区党组织中，来一个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认真的学习，努力的学习，谁学得更多更好，谁就是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最好的拥护者。这次大会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抗日民主的模范区有重要的意义。

（摘自马文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
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1页。作者抗战时期任陕北西部地区党委书记、陇东地委书记兼陇东军分区政委、八路军一二师三八五旅政委等职；建国后任国家劳动部部长、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5 “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1939年1月，组织上调我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月毕业留该院任校务处处长。

这年初秋的一个上午，早餐前，负责学院日常工作的党总支部书记张启龙同志、副院长范文澜同志（院长由张闻天同志兼），把教育处长邓力群、

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我叫去，说：“你们提前用膳，今天请毛主席来学院作报告，由你们接送。膳后你们就赶紧到杨家岭接毛主席。”

延安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条件极差，学院设备非常简陋。我这个教务处长几乎一无所有，要我们去接毛主席，真不知道怎么个接法？老百姓接亲，无车无马无轿子还可以把毛驴打扮一下，我们总不能赶着骡马去接毛主席来作报告呀！我们四人都感到难为情，张启龙同志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知道我们的情况，不要紧，去吧。主席很忙，作报告不是什么紧急事，能不能排上主席的议事日程？你们早点去，如有变化，我们好另行安排课程。无车无马就陪主席走走吧。”

院首长这么一说，我们也就不再作什么打算了。用过膳，我们四人便结伴而行，急切地向杨家岭赶去。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中间横着延水河。我们走了一半路，刚跨上延水河桥头（木搭的便桥），毛主席就和我们桥头相遇了。一见到毛主席，我们都愣住了，他来得这么早，脚下的布鞋面都蒙上了一层灰尘，可见毛主席走得很急。未等我们开口问好，毛主席却抢先问我们：“你们四个风风火火人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同志答道：“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邓力群同志解释说：“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象话。”毛主席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主席环顾了一下四周，很认真他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我们都笑了，谁也不回话。毛主席看看我们，也笑了，一个劲地摇手，说：“那才不象活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官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说得我们一个个点头称是。

毛主席同我们一边走，一边了解学员情况。问我们想要他讲些什么，大家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些什么看法？毛主席迈的步子很稳健，从从容容。边听我们汇报边思考着什么，很快就来到了马列学院。分手时，毛主席一一握着我们的手，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的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毛主席一到学院就登台讲演。他讲形势时，深入浅出的道理、风趣幽默的语言，一下子就把学员们吸引住了。他的讲演时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如今我还大略记得他那次讲演的内容。他讲1940年的形势后，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头目比作狡猾而最讨嫌的狐狸，他们利用德意在欧洲一时的胜利，又得意起来，举两只爪子抓人。一爪叫做军事进攻，一爪叫做政治诱降。这只狐狸胃口很大，想发动太平洋战争。它一是要侵略南洋；一是加紧向中国进攻。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蒋介石就更加动摇。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我们必须估计到，抗战的第四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日军占领了宜昌，上百架飞机轰炸了重庆。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被切断了。蒋介石这个“儿皇帝”断了洋姑娘的奶了。恩来同志从重庆带来的情况说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论调已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国内外形势，现在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呀！毛主席停了停，望着一张张严峻的脸庞，口气一转，说，“形势是严重的，形势也是令人鼓舞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必然导致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必然导致帝国主义的崩溃。中国革命，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够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接着，毛主席又详细地分析了我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形势。同志们听得很入神，越听越激动，一个个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杀敌战场，同日寇决一死战。

报告会一直持续到午顿时间，学院领导同志考虑到毛主席讲了一个上午的话，还要走近十里的路回杨家岭住地，误了吃饭，要我们给主席做吃的，加了点荤菜，可是，我们怎么挽留他都婉言谢绝了，走时也不让送。

（原题为《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星火燎原》杂志 1983 年第 6 期，第 15—16 页。作者韩世福，曾参加过长征，从 1937 年 2 月至 1944 年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军事学院上干队和两北局办公厅行政处任过职。）

6 崇高的赞誉

“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迅速燃遍了祖国大地。蒋介石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主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为了实现党中央对各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统一指挥，必须扩大和发展无线电联络，培养大批新的通信干部，掀起学习文化技术的热潮。

1939 年冬的一天，王净局长把教育股长王进和出版股长林风找到一起，亲切地说：“有件事想了很久了。三局的业务和各根据地的联系越来越广，为了交流前后方的经验，使通信人员更好地掌握手中的武器，我们需要办一个刊物。”业务处长刘寅接着说：“刊物的名字就叫‘通信战士’好。先办起来再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克服！”于是，王净同志亲自担任编委会主任。筹备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延安出版的一些军政报刊上都有毛主席的题字或题词，王进和林风就想：如果毛主席能给我们的刊物题名或题词有多好啊！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了王净同志，王净同志高兴他说：“没问题！你们起草一封信，我送到主席那里去！”随后，他们便向毛主席写了信。信中说：“我们决定办一个刊物，名字就叫‘通信战士’，……请你为我们题写刊名，并最好写一个简短的发刊词。……”

大约过了十来天，毛主席的批复回来了，在三张 32 开大小的毛边纸上，毛主席一连横书题写了 3 个“通信战士”，字字苍劲有力，潇洒豪放。毛主席还在另外那封信上亲笔作了批示：我工作忙，发刊词没有时间写了，祝你们好好地办下去。只写下几个字，供选用。

大家仔细端详着毛主席的题字和批示，感到无比激动。他们把毛主席手书的“通信战士”四个字，精心地按比例做了缩版，刻成了木印章；并跑到延安新市场买来了油印机、油墨、蜡纸和纸张。与此同时，上净同志亲自动手代拟了发刊词。就这样，在1940年元旦，《通信战士》创刊号作为庆祝新年的礼物，以毛主席书写的刊名套红，正式出版了。

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到1941年夏天，《通信战士》终于争取到了铅印条件。刊物的发行范围扩大了，除三局直接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通信部门发行外，延安新华书店还代为承担了总经售业务。王净局长对王进、林风说：“我们的事业越办越兴旺了，刊物改出铅印版后，发行量增大，群众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加以提高，求得新的发展与进步，使刊物成为鼓舞通信战士的号角！”根据王净同志的意见，他们再次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为《通信战士》题词。

信发出后，他们又焦虑不安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已成为中国革命的心脏，毛主席肩负着领导与指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每天除了开会、接谈、写作外，还要处理前线来的数以百计的文电，杨家岭的灯光常常是彻夜不息。毛主席工作那样繁忙，能够答应这个请求吗？！

1941年10月上旬的一天，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延河西川的流水，延店子周围的川地里，丰收的庄稼泛着金浪。这时王净同志从杨家岭开会回来，骑着一匹高大的银鬃白马，挥鞭奔上山坡。王局长飞身下马，走进局部《通信战士》社的平房，欣喜地说：“主席的题词来了！”王进和林风从王局长的手中接过毛主席的题词。这是一张16开纸大小的宣纸，上面竖写着15个大字，笔力刚健，挥洒淋漓。他们手抚题词，幸福的暖流在周身激荡，禁不住不约而同地诵出声来：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

这是对通信工作多么生动形象地比喻啊！是对人民通信战士多么崇高的赞誉啊！前线的电报，飞跨千山万水，把敌人的情况，我军的部署，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延安的电波，射穿千重云雾，把党的命令，首长的指示传到各抗日根据地——这何尝不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呢！此时，王净局长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又回想起当他刚刚参加红军队伍的时候，毛委员就亲切地接见了，鼓励他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在中央苏区时，毛委员亲自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赞扬通信人员是“革命的鲁班石”的情景。

延安八路军印刷厂设在安塞的山洞里，《通信战士》就安排在这里印刷。毛主席的题词送到印刷厂后，很快就制出了锌版，在铅印后的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毛主席的题词就像长上翅膀一样，在广大通信人员中间争相传诵。“当好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汇成了响亮的战斗口号。

（林玉华：《崇高的赞誉》，《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4页。）

7 赴职抗大的一次谈话

1943年春，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那时正忙于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生产规划，检查春耕情况。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入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对抗大的任务，用“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八个字概括，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像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二，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主席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3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力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选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80—681页。作者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8 离开延安前夕的接见

1941年夏，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我们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班第一期毕业后，又筹办第二期，准备在飞机场建房，培训团以下干部。上级通知我当研究班的主任。后来中央办党校，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在宝培山下共度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1944年8月。

我在延安的学习告一段落后，贺龙同志曾考虑把我调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在此之前，李井泉、谭政二位同志已经与我打了招呼。他们说：“老耿，到我们这里来吧！咱们再在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与他们是老相识，他们的劝说多少有点老关系的味道，以为此事必成无疑。

我对他们说，我个人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当然，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在后方蹲久了，我向往前线，向往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活。

我瞅个机会，给毛主席打了十电话，要求见见他。毛主席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便约上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与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1943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我和曹里怀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两人讨论了几条意见，一直没有机会向毛主席反映，这次毛主席召见，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赶到毛主席驻地，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飏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我赶紧拿出我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截子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拿出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突然，他想起什么似地抬头望着我：

“耿飏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噢，是到抗大去的事。这样吧，你直接去找贺胡子谈一下。”

我说：“我怕谈崩了。”

“你这个同志哟！”毛泽东同志爽朗地笑起来：“胡子是个随和人呀，莫怕嘛。我先打个电话给他。”

第二天我便和曹里怀一起去见了贺龙同志。他在我军中名气很大，但由于他在“八一”起义后，一直在二方面军工作，因此我对他了解不多。这次一见面，果然是位和蔼可亲的老首长。刚一见面，他就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我贺胡子同志关系糟糕呀，害得老乡来找我，得由毛主席保驾啦！”

我有些尴尬，赶忙解释：“贺老总，我不是……”

“坐嘛坐嘛。”贺龙同志释然地笑起来，亲手给我递上香烟，而他自己却抽烟斗。

我们与贺龙同志无拘无束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非常愉快。贺龙同志说：“说实话，我是真想把你‘挖’过来，你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哪？我尊重你的意愿。”

他留下我们吃午饭，特意嘱咐伙房多放点辣子，并一再抱歉说：“没得什么好吃的。”还说：“听说你炖狗肉很有板眼，啥时候见识一下哟？”

我说：“一定，一定！”由于心情高兴，我便把“罈子闷狗肉”的办法说了一遍。贺龙同志听完，认真地说：“对头，这和打仗一样的嘛，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你上了前线，就这样干！”

我不但畅谈了意见，还受到了鼓励，对上前线充满了信心。

我的心思，不知怎么让聂荣臻同志知道了。他正在延安开会。聂司令员便把我叫去，让我到晋察冀去。随后，我离开了战斗、生活了7年的陕甘宁边区。

（选编自《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7页。作者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

9 阳光雨露润心田

1944年1月，中央命令我带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到陕北，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到陕北后，部队编为教导第一旅，我任旅长，张仲良同志任政治委员，驻防在延安以南的清泉沟、王家沟一带。

194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仲良同志告诉我，“七大”就要召开了，并且说我是冀鲁豫军区出席“七大”的代表。

盼望已久的“七大”即将成为现实，当然很高兴，但我也成为“七大”代表，倒感到有些突然。我问：“你哪里来的消息？”

张仲良比我大几岁，陕西耀县人，是1931年入党的老政治工作干部。他为人热情，性格爽朗，嗓门很大。他大手一摆，高兴他说：“不是消息，是通知——中央的通知哩！”

这天晚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由冀鲁豫到陕北不久，毛主席把我叫了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中央书记处也在那里办公。据说枣园过去是西北军师长高双城房子。院子很大，长满了繁茂的花草树木，其中有不少很老的梨树。我去的时候是春末，古树新枝，绿草茵茵，春意盎然。毛主席住的窑洞在山坡上，他的左右“邻居”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记得毛主席的窑洞门前有一个石亭，亭前有一座小花园，还有一棵不大的丁香树。花儿开了，是紫色的，很香。花园不远处有一块小菜园，菜的长势很好。毛主席听说我来了，大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亲切、诙谐地说：

“欢迎你呀，杨得志同志。你现在算是哪里人呀？冀鲁豫的，还是我们陕甘宁的呀？噢，对了，你是湖南人氏嘛！”这时，警卫员送来了水。主席让我坐下，对警卫员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

毛主席关切地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说东渡黄河后，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习过，1937年初到抗大学习过，但都因为要打仗，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我说：“您的几次讲演我是听过了。”

毛主席笑了。他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他停下来，指了指堆在办公桌上的书报文件，又说：“你看，我也在学。”

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又问我部队到陕北后的情况。我说：“从前方到后方，从打仗到生产，一开始有些同志不大通。现在好些了。”

“是呀，”毛主席说，“胡宗南在我们周围集结了那么多队伍，我们不能没有准备，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是归‘联司’（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指挥吧？”

“是的。”我说。“贺尤同志和我谈过，一方面随时准备战斗，一方面搞好开荒生产。您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主席点点头，一边让我吃菜，一边说：“总归是要这样吧——军队嘛，当然最主要的是准备打仗，没有仗打，要练兵，也要搞些生产。不靠自己生产，吃什么穿什么呢？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很困难哟！”

毛主席为请我吃饭，专门加了菜，也不过是四样蔬菜和一盘辣椒。实在说，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我说：“主席，您的生活还是应该改善得好

一些呀。”

毛主席笑了：“你是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现在比井冈山时期好得多了。”他指了指桌上的酒，又说，“你看，有酒有菜，暂时还听不到枪炮声呢！”

……

回想起这些往事，更觉得党代表的责任是非常之重的。

1945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仲良等同志骑马赶到延安——“七大”就要正式召开了。

那时延安没有大招待所。即使“七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代表们住的也是相当分散。有住在党校的，有住在部队的。记得我和仲良同志开初便住在我们教一旅设在延安的一个办事处里。

1945年4月23日下午5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开了整整50天。6月11日，选举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记得那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彭德怀同志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站着，久久不愿离去。

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同志关于《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等同志的发言，深深感到全党的思想更统一，认识更一致，团结更坚强了。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更明确，胜利的信念更坚定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摘编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293页。作者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0 “七大”的光芒

在一个春意浓郁的黄昏，我来到了延安。

刚刚走进联防司令部的窑洞，就收到一份重要文件。用马连纸制作的封面上，清晰地油印着“政治报告”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同志准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事前发给代表们阅读，征求大家的意见。

顾不得安顿住宿，我一口气把文件读下去。政治报告的一字一句，都紧扣着我的心弦，越看越有味，越看越入神。正看得起劲，忽然有人说：“该点灯了。”这时，小小的窑洞里，几乎已经没有光亮；然而，我手中的文件好像放射着万道霞光，照亮了我的眼，也照亮了我的心。那天夜晚，我反复地读它，读了很久。

还在1940年春天，我在晋西北的时候，就看到其他地区的七大代表陆续路过那里到延安来。我们一二师也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当时听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了。可是后来上级告诉我们，会议要延期举行。事后才知道，为了开好“七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加强与扩大了中央党校，集中大部分已经来到的代表到党校学习。1941年春

天，首先在党校发起，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党中央又组织了中央学习小组，负责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的问题。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全党高级干部也在 1943 年冬学习了两条路线的问题。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有这些都为开好七大做了充分的准备。这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我党已有了空前的发展，原来的代表名额，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中央决定增补代表。就在这次补选中，我也荣幸地当选了。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

走进杨家岭中央礼堂，首先看到两面红艳艳的党旗，高悬在主席台上，领袖像挂在红旗的正中间。主席台的陈设，朴素庄严，只有几张条桌和十来把木椅。台下横列着几十排长长的木制条椅，那便是代表的席位了。后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惹人注意的是主席台顶端的横联，红底镶着黄字：“在毛泽东旗帜下胜利前进！”

看了这条横联真叫人百感交集。走了不少曲折的道路，终于使我们懂得：只有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地向前发展；而党的正确的路线又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探索出来的结论，是党与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揭幕。会上，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开幕式举行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接着，大会听取了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的报告。经过小组和大会讨论，最后大会批准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批准了新的党章，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始终洋溢着非常民主、非常团结、非常融洽的气氛。大会的每个报告、决议文件，不仅事前均经中央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经过全体代表，各代表团小组、代表团会议详尽地讨论，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大会主席团尽一切可能让每个代表均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那些因故不能到会的同志，也要请他们用书面发言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记得关向应同志当时在中央医院养病，不能参加会议，毛泽东同志就要贺龙同志常常去看他，将会议进行的情况不断告诉向应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样，就使大会的每个决议和报告更臻于完善、丰富、生动、正确。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也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才进行正式选举。经过这样严肃、慎重选举产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完全能够代表全体党员的意志而为全党所一致拥戴的最坚强、最有力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由于大会高度地发扬了无产阶级式的民主，在小组讨论中，人人能各抒己见，个个畅所欲言，有坦率诚恳的建议与批评，也有发自由衷的自我批评，更多的是以亲身的经历生动地证实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各项具体政策的正确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难免也有争论，但是一旦是非辨明之后，又能很快地统一起认识来。对待问题是一切从全党出发，从全局出发，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充满了对党负责的精神。

为了指导会议的进行，在小组讨论期间，毛泽东同志经常参加各小组的会议。他到小组，非常注意听取同志们的发言，从中吸取经验，发现问题，有时也作一些启发诱导，让大家更深一步地去思考。他讲问题时总是那样深

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夹着一些具有风趣的比喻。所以，每当毛泽东同志去哪里参加会议，哪里的会场上总是非常活跃。记得在小组酝酿提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有个小组对于要不要考虑“山头”的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应该取消“山头”，有的同志主张还需要照顾“山头”。当时毛泽东同志也在场，他听完两方面的意见以后，讲了一下他的看法。大意是：我们要反对、要消灭的只是“山头主义”的错误倾向；我们之所以要反对它、消灭它，是因为它是妨害我们党的团结与统一；至于“山头”，它是中国革命具体历史条件形成的，在革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他还表示：这仅仅是他自己的一点意见，至于这样好不好？请大家再考虑一下。后来别的小组内也同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在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为这件事专门讲了一次话。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现出的这种非常团结的气氛，来源于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当时把它叫做整风精神。在整风精神的感召下，许多犯过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的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有的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参加七大了，还有的人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一致的团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表现出的，正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思想开出整风运动之花，结成“七大”之果。

这次大会批准了“论联合政府”提出的党在当前革命阶段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同时又通过了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论解放区战场》，详细阐明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论党》，为我们制定了一条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虽然总的方面是一片大好形势，但在我们争取全国性胜利的斗争中，困难仍然很多。5月31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报告里，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那次报告，讲得非常深透，使人久久难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种可能性，我们要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去想问题，去做准备。他又一次提醒全党注意内战爆发的危险。他教导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抱有丝毫的幻想；我们一面要尽力设法制止内战的爆发，或者推迟它的爆发，但主要的应该是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随时准备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坚决保卫人民胜利果实。

在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详尽地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根本的方针仍然是放手发动群众。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方针的反复论述，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到它的重要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就是组织我们的战斗队伍。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也就是敢不敢组织强大的战斗队伍去进行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手本来是我們自己的，为什么发生放不放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个蒋介石，他不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历来就有的问题。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不让我们放手，陈独秀就不放手，结果大革命失败。在抗战时期，我们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就壮大了力量，取得了胜利。这个方针，我们永远也不能改变。

在那次报告中，毛泽东同志英明地预见到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提出了革命转变的问题。如游击战转到运动战，乡村转到城市，减租减息转到耕者有其田等等。他要我们认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要自觉地准备这种转变，以免在转变关头犯“左”或有的错误。

6月11日，大会闭幕了。毛泽东同志在闭幕词中，把这次会议誉之为“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我们要说：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党的团结的胜利，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团结——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伟大团结。胜利加强了团结，团结取得了新的胜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七大的光芒映照下缔造起来的。

（作者杨秀山，选自《星火燎原》（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29—435页。作者当时为中共“七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三、无微不至的关怀

1 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工作。在职务上虽先后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处长等称呼，但实际上工作内容一直未变，就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经常性的秘书工作。包括文电收发、保管，会议筹办和有关记录、行政等事务，以及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有时也随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总之主要是为中央首长服务，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也较多，因此，工作本身虽然比较具体繁琐，但对中央领导同志卓越的工作作风，印象则是比较深的。

首先是对毛泽东同志认真执行的正确的干部路线有切身的体会。毛泽东同志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在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我党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革命内容上将面临一次伟大转折。当时在陕北的干部确实是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如何使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达到思想认识上高度的一致，以便团结奋斗共同完成伟大的阶级使命和民族使命，没有一条无产阶级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是不可想象的。如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案件，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干部问题上的光辉体现。如何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同样是关于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到达懋功地方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时，当时我已从红九军团调回到中央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一方面军首长同四方面军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领导会见和开会时，我曾担任记录。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都曾耐心明确地向到会同志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讲清了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战略决策，面对毛泽东等同志的精辟分析和英明决断，张国焘当面并未提出过任何象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同意北上的根据。后来他突然擅自南下，并以种种借口欺骗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到1936年6月，由贺尤、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同志终于违反了张国焘的意志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组织西路野战军西征，迎接二、四

方面军，取得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的历史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同志去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红四方面军本来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由于资产阶级野心家张国焘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或采取包围缴械、甚至逮捕的作法。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制止了这种错误的主张，明确地指出：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毛主席还亲切地接见了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号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此，毛主席还分别找过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交谈，我记得曾同许世友同志进行过恳谈，帮助许世友同志转变了认识。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1937年3月，毛主席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以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

总之，红军取得长征的彻底胜利，红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是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政策分不开的。

毛主席“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他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是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锐利武器。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务求置之于死地。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在会上，毛主席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受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一批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使这些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一心一意地为党努力工作。

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那是1938年农历的除夕，毛主席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主席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主席慈祥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

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毛主席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我们的心情一时激动万分，回忆起湘赣苏区的战斗岁月：湘赣苏区当年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工作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后来，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也影响到湘赣苏区。他们派去的钦差大臣把过去的正确作法都诬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还大抓 AB 团，我们起初也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但是，后来看到许多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工农干部都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保卫部门当成 AB 团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搞得人心惶惶。这样，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和张启龙同志商量，认为如果真有那么多的 AB 团，我们在湘赣苏区能站得那么久吗？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在湘赣苏区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于是，我们对王明路线那一套进行了抵制。结果被说成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我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对张启龙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职，开除党籍，还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和工作，1937 年洛川会议后，毛主席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来工作。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毛主席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时，我们都激动他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不留尾巴；对于部的关怀和爱护，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这时，我们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毛主席一再挽留我们同他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很困难，毛主席和大家同甘共苦，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我们吃起来是香喷喷的。尽管窑洞外正是风雪弥漫，我们坐在毛主席身旁，却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

毛主席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看二帮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在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时犯过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抬不起头来，她约了易纪均同志陪她去见了毛主席，她说：“主席，我在罗章龙分裂党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毛主席亲切地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主席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

想负担，使她心情豁然开朗了。毛主席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自己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如博古同志，原来是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抓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毛泽东同志干部路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

在党中央到达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刚确立，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不久又面临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这时党的干部队伍还不足5万人，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高，有的同志还未能看清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适应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形势需要。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党的重要的战斗任务，并着重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延安地区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像革命的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成批地成长起来。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样，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一新，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抗战初期起，毛主席、党中央就在组织路线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六届六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干部学习的机会增多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来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主席亲自在会上讲话，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毛主席了解这个情况，他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学习文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毛主席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真是我们干部的贴心人。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毛主席在这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选”前四卷的就有近100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常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问题。如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宇里“八面威风”但是“十分无用”的偶像，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答。毛主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毛主席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记。

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

毛主席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信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毛主席对于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于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正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策 xxx”的字样。毛主席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主席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对自己的亲属，他也要求非常严格。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

1940年春，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些指示是为了以后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2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影响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新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主席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节选自《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207页。作者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主任、秘书处处长等职。）

2 返回母亲的怀抱

1936年10月下旬，秋高气爽，黄叶纷飞，奉命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率领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万人，于25日从靖远河包口（虎豹口）西渡黄河天险。10月31日，胡宗南的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占靖远一带黄河渡口，把渡口卡住，河东和河西部队，从此就被敌人切断了。

由于河东敌人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推进得很快，宁夏战役打不成了。11月10日，我们收到取消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政委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为副主席的电报。电报还指示，西路军沿河西走廊西进，在甘北适当地区站住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后来来电，指明在永昌建立甘北根据地。

11月中旬，西路军从赵家水西进，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地区发展，到河西走廊去创立甘北根据地。很快地占领了古浪、永昌和山丹，但旋即遭敌反击，仗打得很艰苦。11月15日，我红九军袭占古浪城后，16日拂晓，敌人集中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经两日激战，共毙伤敌2000余人，我亦伤亡严重，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六师政委易汉文等同志，均在战斗中牺牲，我军不得不撤离古浪，部队元气大伤。

到12月上旬，我西路军奋战1个月，歼敌6000多人。但敌人得到不断补充，我军得不到补充，全军由过河时的2.1万人，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命执行西进任务。12月下旬。撤离了山丹、永昌地区，冒着凛冽的风雪向西挺进。12月30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县城。1937年元月，又一举攻占高台。守敌1400多人全部投降。红九军一部，攻甘州未克。不久，敌2万多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追来。敌以一部牵制倪家营子地区我主力，集中力量于1月12日向高台进攻。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带领3000人死守高台，与敌浴血奋战。在战斗危急时，我们收到敌人电报，立即报告陈昌浩同志派骑兵师去策应，我骑兵师的马不是战马，子弹少，未经训练，被敌骑兵截击打垮了。1月21日，高台城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同志看到敌人冲上来要捉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打了自己。在高台同时壮烈牺牲的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同志。

此后，我西路军全部集中于倪家营子地区。从1月23日到2月27日，与优势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总计毙伤敌万余人。我军也伤亡惨重，到突围时，只剩下几千人了。

3月14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回延安。

中央给西路军的最后一份电报，是在出祁连山之前。电报说：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到了星星峡，才知道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还有盛世才办事处的一个处长接我们来了。新疆派飞机，给我们送来了新衣服、新武器、新装备。

1937年5月5日，我们800多人分乘几十辆卡车，离开星星峡。3天后，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据说，共产国际准备了200多辆汽车，运送大批物资、武器和装备给西路军，后来听说在祁连山失败了，就停运了，有的交给了盛世才。1938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从新疆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安排接见。我们怀着喜悦而激动的心情，来到毛主席在延安城内的住处。

毛主席亲切热情他说：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是为党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毛主席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工作上犯了错误，那是张国焘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张国焘。中央也有责任嘛！什么责任呢？

毛主席说：张国焘当中央代表、中央分局的书记，当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军委会主席，都是中央委派的嘛！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

毛主席鼓励我们：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在工作中也许有缺点、有毛病，但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没有错误、没有毛病呢？那种所谓张国焘路线残余的提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我们绝不能这样看。

毛主席谆谆嘱咐我们：你们到延安后，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党、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话，像和煦的春风，吹散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乌云。说实话，自从西路军失败以后，我们像失散了亲人的孩子一样，如今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是最了解她的孩子的；党，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摘自宋侃夫：《祁连山的电波》，见《艰苦的历程》

（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3 — 251 页。作者当时为西路军总部机关电讯干部。）

3 难忘的关怀

1944 年 1 月，中央军委给冀鲁豫军区发来电报，命令杨得志司令员带领一部分部队奔赴延安。军委在电报中，还批准我也一同到延安去。冀鲁豫军区这次调往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是：十一团、十六团、十九团、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等 6 个团。部队穿过大行区、大岳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于 4 月上旬到达延安。

根据军委的部署，冀鲁豫军区来的部队编为联防军教导第一旅，由杨得志任旅长，我任副旅长。整编后，部队开进到甘泉县清泉沟一带驻防。战士们自己动手代木、烧石灰、打窑洞，部队很快就安顿下来，然后迅速掀起了练兵和生产热潮。清泉沟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部队汗来之后，在昔荒凉寂寞的山沟立刻变得生气勃勃。白天，战士们的歌声、劳动号子声、练兵喊杀声，在山谷间回荡；夜晚，层层窑洞的灯光与天上的群星互相辉映，十分壮观。

参加革命以后，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两个愿望：一个是想见见毛主席，一个是想到中央党校系统地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刚到边区时，起早贪黑地忙于带领部队搞营建，这些事情也顾不上多想，部队安顿下来后，我的这两个愿望就又冒了出来。一次和杨得志旅长谈话时，我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杨旅长笑着说：“这是好事嘛，我去向上级反映！”

8 月 24 日，我正在旅部开会，忽然接到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同志打来的电话。张参谋长在电话里高声说：“老赵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在二十六日接见你！贺老总已经安排了汽车，后天早晨去接你。”听到自己蕴藏心中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时，却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下子愣住了，直到张参谋长又重复了一遍，我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杨得志同志把我的愿望分别告诉了张经武同志和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他们又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马上就答应见我。

8月26日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贺老总派来的汽车就开到了我家门口。全家人和许多老战友都来为我送行，嘱托我代他们向毛主席问好。我的二女儿年儿听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叫着跳着也要去。我怕耽误时间，就带她一起上了汽车。

清泉沟距延安将近200里路，汽车在山间大道上疾驰。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汽车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我却嫌汽车跑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毛主席身边，路旁美丽的景致也根本无心观赏。但一想起就要见到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了，自己该说点什么好呢？我的心里不由得又有几分紧张。

汽车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早已等候在门前的工作人员看见我们来了，立刻返身进去向毛主席报告。我刚刚从汽车上下来，毛主席就走出了窑洞，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手，问道：“你是赵承金同志吧？”毛主席拉着年儿的手把我们让进窑洞。刚刚坐下，警卫员就给我倒来一杯热茶，然后又给年儿端来一盘点心。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让我吸，我回答说不会，毛主席自己点着了一支，然后便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有几个小孩……那亲切的语气，就像和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我在路上的那种紧张心情，不知不觉地就消失了。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1937年9月东北军六九一团起义的经过。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他说：“你们从旧军队里出来，站到革命一边，党欢迎你们，人民也欢迎你们。”毛主席还详细询问了吕正操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又说：“你们起义时，你母亲受了不少苦啊。”

毛主席的话，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们起义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不但封闭了六九一团在陕西省的办事处，而且对留在那里的起义官兵家属残酷地进行迫害。他们先后三次抄了我的家，还把我的母亲和两个女儿逮捕起来。当时我远在敌后，对家里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十分清楚，但党中央却很快了解到这一切，立即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去电报，千方百计地把我的母亲和女儿营救了出来。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又亲自安排人员，穿过日寇占领区，把母亲和孩子接到我的身边。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

这时候毛主席又问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听说现在还天天纺线。”我回答说：“我母亲今年六十七岁，她纺线还是跟甘主任学的哩！”原来，我们到了陕甘宁之后，我母亲看到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也想学纺线。贺老总听说了，就派人给送来了两架纺车。开始时，我母亲纺出的线总是不匀，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琪同志到我家作客时看见了，就一面讲解动作要领，一面手把手地教起来。我告诉毛主席，我母亲现在已经成了纺线能手，纺出的线都交给了延安合作社。毛主席微笑着说：“老人家很进步啊，你回去后代我向她问好。”我连忙说：“主席，我来时母亲要我向您问好呢！”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起义后部队的情况，当讲到起义时我带的一个营现在已发展成了九个团时，毛主席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就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你们在敌后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仗打得不错。”我回答说：“我们能取得一些成绩，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党对我们这支起义部队很关心，先后派了谭冠三、旷伏兆、何善远、张国华等同志来担任政治委员，这些同志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可是自己进步不快，心里非常惭愧。”

毛主席安慰我说：“一个人的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抓紧，又不能着急。”

趁着这个机会，我说出了自己想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想法。毛主席解释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还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干部去住校学习。这支部队你带过多年，目前还是留在那里工作好，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嘛！可以自己找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来看看。平时多看文件、多看报纸，也是一种学习。”毛主席还说，除了要学习政治，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还要学习无产阶级的战术思想。现在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接着，毛主席又一句一句地给我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中间还穿插一些战例，讲得深入浅出，精辟而又生动，我听得入了迷。

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中午，我站起身来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说：“你不要走，一定要在这里吃午饭。”我说：“那太麻烦主席了。”毛主席说：“我自己种了点菜，你也来尝尝。”不一会儿，炊事员就端上来六盘炒菜，有韭菜、青椒、西红柿……望着满桌热腾腾的饭菜，再看看毛主席居住的这间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和几把凳子的简朴的窑洞，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看我没动筷子，就亲自夹起一块西红柿放到我的碗里，说：“西红柿很有营养哟！”我一边吃一边称赞饭菜味道好，毛主席笑着说：“自己种的东西，吃起来觉得格外香。”

午饭后，毛主席不顾休息，继续和我谈了起来，问我整编后干部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嘱咐我们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还要努力搞好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我觉得自己耽误了毛主席半天时间，心中很不安，便再次起身告辞。临别时，毛主席送给我一张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照片，并且拿出一包蛋糕送给我的三女儿，说：“这是咱们边区自己生产的，给孩子带回去。”

我回到部队以后，在军人大会上介绍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全旅干部战士都受到很大鼓舞。

（摘自赵承金：《回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见《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6期，第13—14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四分区司令员，驻守边区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 八字电报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些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摘自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9—53页。作者当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5 险境中求生路

我们这支蒋介石最不称心的部队，经过国民党嫡系部队及特务多年的吞并、分化和迫害，已经大大削弱。蒋介石仍不甘心，1943年秋天，在他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不久，又把屠刀对准了三十八军。

1943年10月中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下令，将第三十八军调离郑、

广前线，移驻偃师、巩县地区集结整训。三十八军周围，都是汤恩伯的部队，形成对我军的包围态势。

部队接到命令，撤离前线之前，赵寿山军长曾于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近日来此间周围特务突增，各方造谣，我仍持镇静处事。忽奉命将我部集结偃师、登封间整训，由八十五军李楚瀛部接防，并限于本月月底接交完毕。估计到该地区后三面环敌，尔后行动益险。应如何处理，请指示。”毛主席于10月20日复电说：“皓（十九日）电悉。宜遵命调防，谨慎应付环境。”

赵寿山同志在同前方工委的同志周密地商定各种应变计划以后，即于12月25日离开部队前往重庆。1944年1月2日，工委范明曾将同赵寿山军长商谈决定的九项对策打电报向毛主席报告：

勤（赵寿山代号）兄赴渝前，曾与弟商决今后对策九项，兹略述如下：

子、勤离部切急办理者：（一）反对惊恐失措、悲观失望情绪，提高沉着、乐观、埋头苦干、似若无事精神。（二）健全本身，健全业政关系，减少任何来往及会面。（三）对于造谣中伤之消息，不可道听途说，庸人自扰，并尽量解释之。（四）加强反特反奸工作。（五）反对任何幼稚行动与左倾作风，以争取勤能安全返部。

丑、如勤在渝未归前，渝方以思想裁（问）题为借口，大批开名单要干部：（一）动员与孙（指孙蔚如）有关人士动以利害，说通硬顶。（二）利用各色各样社会关系及方法尽量拖延。（三）先撤退名单中最红的分子，待相机逐渐完全撤退之。（四）尽量缩小组织，进一步埋伏之。

寅、如果勤要留在渝并大批更动人事时：（一）动员孙、孔（孔从周）、申（申及智，时任第十七师师长）等硬顶，要勤归部。（二）一致要孙、孔、申等尽量拒绝人事更动。（三）争取下级兵权，放弃较高官位。（四）以名利拉拢新来分子，争取时间。（五）忍辱负重，争取勤归。

卯、如果勤在渝供职，并发表孙兼或孔、申兼，陈硕儒（现任四集团参谋长职）调（任）等：（一）如孙兼，则拥孙靠申拉孔；如孔升，则靠申和孔；如陈调，则靠申拉孔和陈。（二）极力活动调勤返部任副总司令。（三）继续执行逐渐撤退办法。（四）表面上忠实服从，以免给勤疑惑。

辰、如勤留渝较久，中途敌占洛阳，小部转入敌后：（一）敌大我小，保存力量。（二）敌小我大，集中力量歼击之，以争取早日返部。（三）坚持嵩山游击战争，逐渐向西发展。

己、勤留渝期间，如国共发生大变：（一）全国未动我不动，内部则持镇静。（二）全国虽乱，但国民党力量尚能统治勤部时，则按兵不动，不表示态度，争取勤归，然后再行对策。（三）全国已乱，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勤不能回部时，则随机应变，不打红旗，不当土匪，不给勤怀疑，并保持勤的光荣历史和传统。

午、如调勤为本部副司令，遗缺以本部人员升充之，则表示欢迎，以争取勤能安全返部。

未、如调勤为副总司令或留渝不返，但以外来人任军长时，则拥孙拉孔拉申硬顶，如无效时，则保全下级，放弃上级。

申、如分割建制时，先拥孙硬顶；无效时，则团结内部，忍辱硬拖。

以上意见对策，基本精神安全以勤之安全为第一。此间组织曾一再向勤保证，宁可以放弃部队生存，亦决不会下井投石，致危他之安全。其所以如此，并非此间组织无能行动，实因为内外引起（关系）、我党政策、地区环境以及勤无决心等条件所构成，与其皆勤无补于党策，不如给勤以全信。此信若立，可为我党争取更多更大中间人士及力量。正确与否，尚祈明白指示，以便遵循。

1944年1月6日，毛主席复电说：“冬（二日）电悉，所见甚是。”以后党组织领导我们针对反动派所作的反分化反吞并斗争，大体是按照这些对策进行的。

这年一月，赵寿山军长在重庆受训尚未结束，蒋介石就公布命令，任命其嫡系将领张耀明为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军长于二月间学习结束时，蒋介石亲自“召见”并任命他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调往抗日大后方甘肃省武威赴职。孙蔚如先生曾向重庆方面提出自己到武威去，由赵寿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也被蒋介石拒绝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意赵寿山同志去武威就职，并从延安派了保健医生，从三十八军选派十余名党员干部随去工作，并负责他的安全。

1944年2月2日，毛主席致电党工委范明：张耀明何人，估计张来后对赵寿山部将取何种态度，你们准备如何对待之？望告。2月6日，范明电复毛主席：“此间根据实际情况，对勤（赵寿山）离张来问题对策如下：（一）发动勤部重要干部向孙（蔚如）献书，一面申明重庆此种措施之阴谋性，一面表示今后部队生存及干部安全与存在等均惟以孙是赖，并动员与孙有关人士，说孙以大义、明以利害，争取孙对勤部人事掩护与支持，孙近召集勤部中级干部，公开号召各种干部必须继续奋斗，加倍努力，加强团结，争取张耀明，并表示孙、勤在精神上绝不分家。今后所有勤部干部，若被调动，一律调动到部队用，不准任意脱离。（二）通知各部同志，说明勤兄离部对组织有影响与损失，但不能认为勤兄垮，可就等于党的垮台，勤的离开，就等于党的取消。并号召沉着勇敢，忍辱负重，保持岗位，争取时间，坚持到底。反对悲观失望，动摇逃跑，把勤和组织看成一体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蠢蠢欲动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健全组织，以彻底执行隐蔽精干政策为原则。一面撤退红的分子，一面使组织更形秘密化、据点化，并进而加强斗争与工作。（四）以抗战目的、事业野心、不满重庆及陕人的关系为基础，坚决与张耀明成立统一战线，估计成功可能性甚大。（五）在勤兄同意（下）再选择有军校学籍、未公开、不红的优秀同志，随勤去第三集团军，建立组织并开展工作。”

2月8日，毛主席复电：“（一）各项对策尚妥，可试为之。（二）至必要时，请考虑将大红干部送陕北学习保存。”

赵寿山2月9日由重庆回到西安，张耀明在7日已先到了芝田镇抢任军长职务了。下车伊始，他就大喊大叫，扬言三十八军有共产党，为搞垮这个部队制造舆论，企图彻底清除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他的态度蛮横，盛气凌人。到任没几天，他就在芝田镇军直单位大会上，歇斯底里地狂叫：“我

知道三十八军有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我也知道。要在一周内自首、告密。自首、告密有奖；过期就不客气了！”接着，他又在集合全体指战员讲话时，采取高压手段，声色俱厉，一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这个部队是能打仗的，抗日是有功的。但是，为什么得不到中央补充呢？你们想过没有？老实说，就是因为有共产党。他毫不隐讳地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清党”。你们谁是共产党谁就举手。我要在部队内开展自首和告密运动。你们不要怕，要大胆告发。

正当张耀明在部队里造成极度混乱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周仲英、张西鼎两同志前来河南省洛宁县，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并对各方面做工作。他们从延安动身以前，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这个任务很光荣又很艰巨。三十八军这个部队早就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那里早就有党的组织。三十八军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军内党组织一直是按照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艰苦的斗争。赵寿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几次要求入党，我们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这个军在抗日前线打过许多胜仗，又同国民党顽固派作过斗争，你们去后要肯定他们的功绩，要和他们真诚地一起工作。你们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大力提高部队的思想水平；第二，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大多数官兵；第三，帮助他们学会依靠人民群众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第四，要发展生产。总而言之，搞好思想教育，健全领导，团结部队，坚持敌后抗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彭真同志，关于如何注意统战政策，使部队站稳脚跟等重要问题，也对他们作过指示。

两位同志到达后，周仲英同志首先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十七路军的关心。毛主席指出，西北军这支部队，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和我党有密切往来，是坚决拥护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8年来，坚决对日作战，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部队中许多人是热爱共产党或和共产党诚恳合作的。所以，这支部队已根本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部队，它是一支反蒋、抗日的进步武装。周仲英同志还说，毛主席派我们来，就是要看望在抗日前线的战友。党中央、毛主席对十七路军如此高度的评价，使我十分感动，也更坚定了对顽固派斗争的信念。自己下定决心，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他还传达了党中央对抗战形势的分析。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妥协倒退的势力还存在，危险也还是有的，在部队中还要不断地加强教育，坚持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决不会改变他分化、瓦解、吞并杂牌部队的政策，西北军内部必须加强团结，才能进行强有力的反分化、反控制的斗争。既要注意保存力量，不要被蒋介石吃掉；又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除非迫不得已，还是要维持团结抗战的局面。党中央的指示，使我进一步看清了形势，领会了坚持团结斗争的根本策略思想。

周、张两位同志驻洛宁县上戈镇期间，还对党内外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统一思想、稳定部队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党内外的斗争信心都有了很大提高。周、张到部队十余天后，我听说张耀明扬言要抓“奸细”。我想，张耀明即使知道了人，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身份，多半是虚张声势。但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代表，关系重大，必须确保安全，万无一失，所以就请李慕愚同志把这个消息告诉周仲英同志。使他们预作防备。

几天后，周、张两位同志向我告别，我就要李慕愚派人保护他们离开部队。先送他们到陕县南山尤继贤处，命尤务必确保安全，把他们送到八路军豫西军分区。

（选摘自《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90—315 页。作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1946 年 5 月率部起义 6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6 关怀与勉励

到延安之后的两三天，毛泽东同志就通知要接见我们。这是我渴望已久，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 1939 年，贺龙同志离开冀中时，我就给毛主席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当时在信里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会见毛主席的愿望。来到延安以后，又听说毛主席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但当我来到毛主席跟前时，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主席先开了口。他微笑着说：“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三个字。干吗要把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尽管毛主席的神态、语气，毫无责备之意，但我却感到很不安。毛主席那么忙，为猜测我的连笔字耽误时间，实在是我太疏忽大意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起草报告，签发文件，我都力求写得工整些，以免再给任何同志添麻烦。

这天，毛主席留林枫和我全家在他的窑洞里吃了午饭。因时间关系，未能详谈，毛主席让我们改日再来。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毛主席又派人用一辆大汽车把我和林枫同志接到枣园，吃晚饭时，边吃边谈，一直谈到深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冀中、晋绥，用“挤”的办法，快把日本人挤出去了。现在恐怕要有人来挤你们来了。我说，再把他们挤出去。毛主席说：对！你们冀中有 800 万老百姓，晋绥有 300 万老百姓，加起来力量可不小呢。听了毛主席的话，我又想起了 1939 年正当冀中军民抗战进入困难阶段的时候，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一二师来支援的情景，不觉有一股力量油然而生，真想立即赶回前方，向冀中和晋绥军民传达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当我们告辞出来，毛主席还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我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5 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了。我第一次出席这样庄严、隆重的大会。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开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两个中国的命运》。第二天又听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联想到毛主席在接见我和林枫时的谈话，使我进一步感到：毛主席真是高瞻远瞩，为我们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今后斗争指出了前进的光明道路。

会议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很多，他不只在大会上作报告，还参加小组会。他讲话声音很洪亮，善于比喻，意趣横生，经常引起哄堂大笑。有时表现出深切的无产阶级感情。一次在会上，讲到有的同志过去犯了错误，后来改了，但有的人还歧视他，像赵大爷不许阿 Q 革命……毛主席说到这里，眼圈部红了，大家深受感动。

“七大”开了整整 50 天。6 月 11 日下午，选举完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

团结的大会。”这天大会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他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都非常激动振奋地站在那里，不愿离去。

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9年3月，中央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我从东北来参加会议，会前分别看望了中央的领导同志。我去毛主席那里时，他正在伏案阅读文件。见我进来，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怎样办好铁路》，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事情是这样：1946年春我军第一次解放长春以后，我分管后方运输供应，之后即专管铁路工作。当时，日本是机车轮乘制，苏联机车是包乘制，各有长短。经过在两个机务段的对比试验，实践证明，包乘制在当时比轮乘制优越得多。我便以此为参考写了一篇《论乘务负责制》，发表在《东北日报》上。想不到毛主席在指挥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紧张工作中，对报纸看得这样仔细。其实我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来，毛主席讲“不错”，无非是对我的鼓励。于是我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主席微笑着说，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

七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得很成功。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提出了我党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同志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赞成毛主席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其中有一句是：“一切按辩证法办事。”毛主席很赞赏这句话，在会上几次提到，所以至今我的印象很深。

（摘编自《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508—513页、第556—557页。作者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 善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

毛泽东同志重视在现实的生活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只要是有利于革命的意见，他就积极采纳；做错了的事就改正。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曾经多次听到和见到这种事情。

1943年春天，我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讲到反对张国焘路线的问题，说有一次听抗大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同志说，我当时表示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因此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

我还听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8月，一天，边区政府正在开征粮会议，天降暴雨，雷电交加，把参加会议的延川县县长击死。街上老

百姓中就有人说怪话：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保卫部门要追查讲这个话的人。可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让追查，而是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反感。后来检查发现，陕北这么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19万大担公粮。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他们不满。于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决定把公粮减为16万大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同志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时又善于团结自己队伍中犯了错误的人。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七大”时，他提议要把几位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大着重个人的责任。选举的那天，代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同志不走，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票快唱完了，王明的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仕决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等职。）

四、丰富多采的枣园生活

1 令人感动的几件事

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被宝塔山、凤凰山和清凉山环抱着，静静的延水从她的面前流过，水面上清晰地倒映着塔影，看来是那样美丽。但是，更多人向往她，还是因为党中央和毛主席驻在这里，领导着全国人民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我是1937年1月跟着毛主席来延安的。由于工作关系，主席的重要活动知道得不多，所接触到的只是一些日常生活。但就在这片断的日常生活中，主席伟大的思想作风，无时不在激励和鞭策我们前进。

延安城东约40里，有个拐峁村，驻着我们的野战医院。一天，从黄河东岸转来了一位伤员，子弹打在他的胸部，伤势很重。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医生们虽然用尽一切办法，但是，伤员的生命看来很难挽救了。

伤员时常处于昏迷状态。他不时张动着嘴唇，吃力地、微弱地呼唤着：“毛主席，毛主席……”像有一桩重大的心愿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他偶尔清醒的时候，医生们才弄清楚，原来他参加革命几年了，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多么渴望着能见到亲爱的领袖，哪怕见一面、看一眼也好啊！

医院的同志们一面安慰伤员，一面商议着：毛主席工作非常忙，住得离这儿又远，恐怕没有时间来。可是，伤员的伤势垂危，想见主席的心情殷切，怎么办？最后，医院决定给主席打个电话，就是来不了，让主席知道一下也好。

清早，叶子龙同志接听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便走进窑洞，告诉毛主席。

这时主席刚起床，当即决定到医院去探望这个伤员，并吩咐我们说：“赶快搞饭吃！伤员很危险，不知能不能看到他。”

我们4个警卫员立刻忙了起来，收拾东西，打洗脸水，端饭，备马，毛主席仓促吃了几口饭，就带着王能坤和我出发了。

按平时的习惯，毛主席总是出了城才骑马，而且走得很平稳。这次一出门，主席就跨上了小黄马，出了东城门，过了延河，就上了平坦的东关飞机场大道。主席迎着寒风，放马奔跑起来。不一会，便到达医院。这时，小黄马已跑得浑身淌汗，气喘吁吁。

毛主席走进医院，同志们感到十分意外，忙招呼主席休息，报告伤员的伤势和抢救经过。主席连水都没有喝，说道：“赶快去看看他吧！”医生们陪着主席进了沟口，向山坡上的病房走去。

窑洞里，伤员闭着眼睛，平静地躺在床上。主席在门口停了一下，示意大家不要惊动伤员，然后轻轻地走近床边。这时，有一个小护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兴奋地对伤员说：“同志，你不是想看看毛主席吗？毛主席来了！”

伤员猛睁开眼睛，看到毛主席站在他的床边。他用尽力气，想坐起来。主席连忙弯下身去，经心地扶住他，要他安静地躺着。伤员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两眼激动得闪出泪花。

站在旁边的人看到这一情景，也深受感动，眼眶不由得也湿润了。

伤员脸上浮现着幸福的笑容。他无力地垂下双手，缓慢地合上眼睛，停止了呼吸。

“同志，安息吧！”寂静的、被悲痛笼罩着的窑洞里，回荡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洪亮、坚强的声音：“你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埋葬烈士的工作，医院里事先有所准备。入殓时，毛主席默默地站在一旁，等装殓完毕，主席又随着烈士的灵柩走到山上的墓地。主席和同志们一起，站在烈士墓前，倾听医院代表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直到开完追悼会，主席才回到医院里。

毛主席来到拐峁村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野战医院，能动的伤病员纷纷走出窑洞，站在山坡上看望毛主席。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重伤员，也急得要求护士背他们前去看毛主席。主席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对医院的负责同志说，请伤病员同志回自己的窑洞，他要到每个病房去看望大家。主席不顾劳累，走遍了野战医院的每个病房，和伤病员们一一握手。伤病员们十分激动。

太阳西斜，我们跟随主席走出了拐峁村。一路上，主席沉思不语，任凭小黄马漫步走去。从早晨到现在，主席没休息一会，也没吃一点东西。

有一阵，毛主席接连几天没有睡觉，集中精力在写《新民主主义论》。

清晨，我走进窑洞去收拾东西，看到毛主席仍然伏在桌上，手中的毛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的一旁，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我忍不住轻声地说：“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噢，天亮了？”主席专心写作，竟连天亮都没有察觉。他迅速地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不停地写着字，一边回答说：“好，好，再等一会就睡。”

到吃早饭的时候，毛主席还在工作。我从厨房打来饭菜，对主席说：“主席，该吃饭啦。”

毛主席应了一声，要我把饭菜放在一旁。我怕影响主席工作，轻轻放下碗筷，便走出去了。约莫过了半个多钟头，我去收拾碗筷，只见饭菜原样未

动。我再次劝说：“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啊，我这就吃……”

主席这样说，身子却没动。我只得拿起凉饭冷菜，送到厨房里温热了再端回来。一顿饭热了好几次，总算盼得主席吃了几口。

毛主席只有实在太累的时候，才在布躺椅上靠一会儿，或是在窑洞里走几步，或是要我们弄一盆洗脸水，用湿毛巾擦把脸。接着，便又坐下去拿起笔来。眼看着这种情况，同志们真急得没有办法。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每次来看主席，都说：“主席呀，这样下去不行，要把身体累垮的！”主席只是笑笑，照样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工作。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就把情况向组织上反映了。组织上十分重视这件事情，责成陈龙同志召集我们开会，他口气坚决地说：“主席不休息不行，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你们可以对主席说：组织上请他休息。”

陈龙同志的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决心想办法让主席得到休息，照顾主席的身体。

这天晚上，毛主席依然在煤油灯下专心地写作。叶子龙同志第一个走进窑洞，劝道：“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组织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主席微笑着说：“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叶子龙同志走出来，等待了好一阵，只见主席桌上的灯光仍然亮着。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对我说：“你再进去试试看。”

我“动员”的结果，和叶子龙同志一样，不免有些灰心了。但是，陈龙同志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们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是啊，要是主席的身体累坏了，岂不是党和革命事业无可估量的损失吗？于是，叶子龙同志和我们再想“妙计”。“妙计”想了出来，但叶子龙同志和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去做，最后便把主意打在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的身上。

王来音走到主席跟前，坚决地说：“主席，你该睡觉啦！”伸手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主席睡觉的炕头上。

毛主席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缓慢地站起身来说：“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王来音坚持着。

在朦胧的灯影中，我们隔窗望见主席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

见主席在炕上躺下了，王来音高兴地窑洞里跑了出来。

王来音成功了，大家才安心地去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听到同志们正在谈论：“咳，主席昨夜又没有睡觉……”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王来音着急而又有些委屈地申辩着。

“你刚回来，主席就坐起来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写成《新民主主义论》的。

一天，毛主席午睡起来，对我说：“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关向应政委。”

老周是主席的汽车司机。那时，南洋华侨献给主席一辆救护车，能坐八九个人。我们随主席上了汽车，向中央医院驶去。

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整个医院就设在一座大山上，从上到下，是一排排整齐的窑洞——诊疗室和病房。八路军一二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患了严重的肺病，经过中央多次劝说，才从前线返回延安治

疗。关政委的病房，在这座山上最高的一排窑洞里。

我们随主席下了汽车，向山上走主。山高坡陡，又正是炎夏，毒热的太阳把山上的黄土都晒得发烫了。我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两次，才算爬到山上。

毛主席知道病人需要安静，所以动作很轻、很小心。他轻轻推开窑洞门，慢慢地走向病床。关政委正躺在病床上，身体消瘦。看到主席来了，他坚持着坐起来。主席握住关政委的手，亲切地问，“身体好些了吗？……”

毛主席和关政委正谈着话，门外忽然走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看到主席，愣了一下，像是觉得有些面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她也顾不上多想，走到主席面前就说：“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主席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政委说：“好吧，你安心养病好了。”说完，主席走出了病房。

主席放心不下，还想了解一些关政委的病情，转身走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同志，只有那个小姑娘在身后跟了进来。主席问她：“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回答说：“我姓刘。人家都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主席接着说。

小刘轻捷地移过一张凳子，请主席坐下。主席很详细地向她询问了关政委的病状和治疗情况，并且很关心地问了医院的工作、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然后才和小刘握手告别，向山下走去。

后来听说，当毛主席走后小刘去看关政委时，关政委对她说：“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几个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准，我有责任执行医生的指示，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政委看着小刘那副神气，不由得笑了，“那是毛主席！”

“毛主席？……”小刘吃了一惊，“哎呀，怪不得觉得面熟呢！”主席严格遵守制度的精神，使小刘深受感动。

枣园在延安的西郊。1942年，杨家岭建筑中央大礼堂，毛主席不能安静地工作，便搬到枣园来往。

1943年的春节来到了，老乡们都在欢欢喜喜地过佳节。主席决定在枣园礼堂请群众吃饭。

这一天，除了枣园的老乡，桥儿沟、新市场、城关等地的群众代表也来了。有的带着油馍油糕，有的提着米酒，枣园的群众还特地蒸了几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红旗，上写“为民谋利”四个字，献给毛主席。

礼堂里排着两行桌子，桌上摆着花生、糖果、香烟……中央机关的同志们热情地迎接着群众，招待他们坐在桌子两旁。忽然，礼堂内外爆发了掌声，毛主席来了！看到主席魁梧的身体，慈祥的笑容，乡亲们真是乐得心里开了花。主席和乡亲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然后和他们一起就座。

这时候，乡亲们一致请求主席讲话。毛主席便拉起家常来，嘱咐大家要变工互助，发展生产，不但要作到“耕三余一”。（即耕三年地，打的粮食够四年吃），还要作到“耕二余一”，使边区人人丰衣足食。老乡们争着回答说：“‘耕二余一’已达到了！”主席满意地笑了，接着问：“枣园村有

多少户人家？今年过年杀了几口猪？”

枣园的老乡说：“全村一共 25 户人家，过年杀了 18 口猪。”

毛主席说：“以后要多养猪啊。”

吃饭的时候，每席都有一位中央首长作陪。主席亲自给大家斟酒，不住地劝大家：“我们都是邻居，不要客气嘛！”

初二那大，吃罢早饭，主席要我们请乡政府的文书来，一同去给区、乡政府拜年。

区政府和乡政府驻在一起。干部们意外地发现毛主席进了大门，还没有来得及迎接，主席就进了房门，向干部们祝贺说：“过年好呵！”并且和每个人握手。大家急忙挪过凳子，请主席坐下。主席看了看屋子的四周，说道：“我是枣园村的居民，今天来给你们拜年。”

然后，主席向区、乡干部们详细地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平均每人有多少地，今年收了多少粮食，交了多少公粮，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这时候，主席看到李区长 9 岁的孩子，便拉起他的手问：“娃娃同志，你上学了没有？”

小孩说：“还没上学哩！”

毛主席像有什么感触，静静地想了一会，然后慢慢站起身来，对干部们说，陕北文化落后，教育儿童是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好好开展教育工作。我们的地方将来要扩大，中央不一定常驻在延安。那时一走，你们的担子就更重了。

毛主席再次和干部们握了手，走出了区、乡政府。

（贺清华：《跟随毛主席在延安》，《星火燎原》选编之五，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5—613 页。作者当时为毛泽东的警卫员。）

2 毛主席看我演剧

我们剧社的前身是红二方面军的宣传队，长征到陕北时，改名为战斗剧社。抗战爆发后，随一二 师部队转战在晋绥冀察等省的敌人后方。1940 年晋绥军区成立，又归晋绥军区政治部所属。贺龙师氏和关向应政治委员，一向对这支在战斗中成长的文艺队伍非常关心，这次是为了让剧社能在较好的环境中进行整训，才决定我们暂时离开前方到延安去学习的。

我们剧社踏进延安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每人得到一份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是在我们来到之前刚刚开完的。主席的这十讲话，全面地、系统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尽管我们当时一下还不能领悟其深远意义，但很直觉地意识到毛主席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和我们的工作有关系，和我们的思想有关系。学习讲话，好像找到了一把开心的钥匙，过去工作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突然找到了答案。一路走来，同志们不住地谈论着主席的讲话内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一份主席的讲话稿。现在刚走进延安的窑洞，立刻就看到了这个讲话的全文，真是如获至宝。

剧社来延安后，领导上就确定要演出些节目，让在延安的首长和观众看看我们的“货色”，然后才好倾听意见，求得具体指导。拿什么节目呢？最初大家的思想上并不一致。有的说：“延安有的是专家、名人，咱们那些‘小

玩意’、‘豆芽菜，可拿不出手来。”甚至有的说：“咱们得排几个‘名戏’，才能在这里露露脸。”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要显出我们的传统来，必须拿自己在前方创作、演出的东西。这些同志说：“只要是拿出我们在前方常演的节目，就是‘小玩意’、‘豆芽菜’也不怕。”在学了主席的讲话后，这个争论，很快得到了解决。剧社领导上决定拿反映前方斗争生活的东西来给延安当“见面礼”。于是挑选了几个在敌后曾多次演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另外还根据在前方所熟悉的生活和材料，组织集体创作，突击写了几个戏。先后演出的计有：“丰收”、“回头是岸”、“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求雨”、“自家人认自家人”等。这些节目除了话剧、儿童剧外，还有小型报告剧、活报剧等形式。演出之后，延安观众广泛地给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评。

特别使我们荣幸的，也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是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看了我们的演出。我深深地记得，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演出的那天晚上，演出刚要开始，一个消息传遍了后台：“毛主席来了！”“党中央的首长们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多人激动得泪都落下来了。几个同志在台上一演完自己的角色，脸也没来得及洗，就绕到台下去了，想就近一些好好看看我们的毛主席。

主席端庄地坐在观众席里，聚精会神地观看着剧中的每个细节，时而还和坐在旁边的其他首长低声交谈着。直到演出结束，我们几次谢幕时，主席仍站在台下不住地鼓掌和招手。

这一晚，我们好多同志久久不能入睡，窑洞里充满着欢乐，洋溢着幸福。更使我们难忘的是，这次演出后不几天，毛主席还亲笔给我们剧社写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莫大的鼓舞，巨大的光荣，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信，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直到今天，它仍然被珍惜地保存着。

（摘自刘伍：《在阳光雨露下》，见《星火燎原》6，第34—36页。作者为一二 师晋绥根据地战斗剧社演员。）

3 理发·抽烟·过年

1938年4月的一天上午，李秘书长在军委副官处招待所找到我，说：“小张，你去杨家岭给秘书处的同志理发，怎么样？”我当即回答：“好，我这就去。”说完之后，我携带着理发工具，和李秘书长一同徒步向杨家岭走去。

延安的4月，到处春意盎然，蜜蜂在路旁盛开的花丛中飞来飞去，在这春回大地，柳垂风和之际，一路上和风拂面，使人感到惬意。来到秘书处，根据李秘书长安排，先给两位秘书理了发。当我收拾理发工具，准备返回的时候，李秘书长从外面进来，笑盈盈地对我说：“毛主席也要理发。”我听了一愣，带着疑问的口吻问：“李秘书长，要我给主席理发？！”

李秘书长点点头：“对，主席听说你来了，正好有时间，要你给他理一理。”真的要我给主席理发？顿时，我心情开始紧张起来，心想：我这是第一次给主席理发，要是理不好呢？见了主席我说些啥？没去之前，怀里像揣只小兔，蹦蹦直跳。我有点犹豫了。“给主席理发，怎么好推辞呢？”李秘

书长看出我不安的心情说：“不要紧，你快去吧。”在李秘书长催促下，由一位秘书引见，我进了主席的办公室，由于心情过于紧张，进屋时竟忘了给主席敬礼，一手提着理发工具箱，另一只手不知放哪是好，十分拘谨，站着也感到不自然。这时，只见主席手里拿着一支红铅笔，聚精会神地在看书。我仔细环视一下主席办公室，室内陈设十分简朴。这是用石头砌成的普通窑洞，一张没有油漆的桌子，几把破凳子，一把弹簧椅子的灰色布垫已经破了。挨着墙壁有两个书柜，叠叠层层装满了书籍。毛主席穿一身灰色中山服已经褪色变得发白了。一顶白色毡帽，放在桌子的右上角。

秘书走到主席身边轻声说：“主席，理发员来了。”

“噢，好！”主席答应着，但眼睛仍然直盯在书上。我想：主席这样全神贯注，一定是在思考一个什么重要问题。秘书将一把椅子搬到光线较好的地方。主席这才放下手中的书和笔，缓步走了过来，一边解开上衣扣，一边微笑着问我：“你是哪里人？”

“四川省崇化县的。”

“姓什么？”

“姓张。”

在给主席理发之前，就这样主席和我一问一答地攀谈起来。看到主席待人这样和气，心情自然平静了几分，我准备好理发工具，轻声问主席：“是留长一点，还是剪短一点好？”

主席和蔼地说：“少剪一点吧。”我仔细认真地给主席理发。主席亲切地问我哪个单位的？到副官处多长时间等。我一一作了回答。

主席又同我家里怎么样？

我说：“不知道，因为不敢写信。”当我说家乡仍被蒋介石军队占领时，主席提高了声音，充满必胜的信心说：“用不了多长时间，抗战胜利了，就可以往家里写信了。”主席又询问我们副官处“小鬼”们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主席每天的文化课时间，大家都能自觉坚持。我们的张教员很有学问，他讲的课我们都能听懂，大家的学习热情可高啦。

主席听说我们都愿意学习，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好！好好学习，将来好做大事。”和主席这一阵谈话，我心中像抹了一层蜜，甜滋滋的。此刻，临来时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早已烟消云散了。

我给主席理完发，分手时，主席和我握了握手，还要出来送我，这时，真急得我手足无措，连事先想好的“请主席多保重身体”的话，也忘说了，只是说：“不用送！不用送！！”

从杨家岭返回的路上，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回到了副官处，逢人便说：“我给主席理了发……”

1938年初，军委副官处招待所里，住进一位李营长。他从一二九师来，和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吃饭，不久，互相熟悉了，在一起无话不谈。

李营长刚从前线回来，他弟兄仨一起参军。他们在战场上打仗都非常勇敢。可惜，两个哥哥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人。据说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这个人性格直爽，说话高嗓门，直来直去，给人的印象是：人是好人，就是办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不过，他和我们副官处的“小鬼”很合得来，每天见面总要打个招呼，或者亲昵地开开玩笑。

一天早晨，我正要去参加劳动，看到李营长情绪不太高，不声不语低头往前走，好像在合计着什么似的。我顺口问了一句：“李营长，干什么去？”

“从前线回来时弄的烟叶抽光了，烟瘾一上来，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出来溜达溜达。”他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和我说。

我看他犯了烟瘾，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也打心眼里同情他。我不会抽烟，拿不出烟来，只是随便附和着他：“那怎么办？到哪儿去弄点烟抽呢？”

他寻思一会儿说：“嗯，我找毛主席去。”

我一听他说话有点玄。因为没烟抽就去找毛主席，我从鼻子里只发出一个“哼”字，心想：“他敢找主席要烟抽？”

我跟他说：“你不就是一个营长吗？敢去跟毛主席要烟抽？！是真的，还是吹乎啊？”

我这么一说，他竟发了急，要跟我打赌。

“小张，你不相信，咱俩赌点啥，我要是见到毛主席，把烟要来了，你给买两根麻花，怎么样？”

看他那蛮有把握的神色，我还是不相信，于是，两个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叫起号来。“打赌就打赌。”说完，他真的往毛主席住的方向走去。走出不远，还掉回头来喊一句：“小张，一言为定啊，输了可要买麻花！”“放心吧，没人和你赖。”我还了他一句。

当时，毛主席住在延安的西山脚下，离我们副官处招待所约摸有二三百米。既然打赌，就得弄出个输赢来。我站在副官处的平顶房上看着。只见他走到警卫员跟前说了一阵话，大模大样地进去了。

因为我还有劳动任务，没有等他出来，就参加劳动去了。心想：反正决定输赢得看他是否从毛主席那儿把烟要来。

劳动一结束，我径直跑到招待所。李营长一看到我，没容我开口，就先喊道：“小张，你来的正好，什么时候给买麻花？”说着他随手把烟拿出来亮了亮，“你看这就是毛主席给我的烟，还是外地造的呢！”他很得意地笑了。我一看，他真的向主席要烟抽。接着他又说：“不是跟你吹乎，咱跟主席要烟抽可不是头一回，毛主席平易近人，军内军外谁不知道！别看咱官不大，有困难时，去找毛主席，他对咱可关心哩。”后来才知道，李营长真的不止一次跟毛主席要烟抽，毛主席的确非常关心这位为革命牺牲两个哥哥的李营长。

1941年农历腊月三十，街上不时传来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副官处的“小鬼”们，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室内外收拾得整整齐齐，高高兴兴地迎接新春佳节。

这年，我在招待处食堂做管理员工作，我们炊事班有一位年过60的老同志，姓高，我们都称呼他“老高头”，也有人亲切地管他叫“老班长”。他为人忠厚，全家6口人都参加了革命，又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劳动模范。因此，大伙对他像对长辈一样敬重。三十日上午，老高头正为大家忙着过年吃喝的东西，主席的秘书来找他。“主席请他干什么去？”大家都在猜想。一直到了晚间，我去看望老高头时，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我走进他的宿舍，只见他正坐在床沿上喝开水，看他乐呵呵的样子，真像遇到了什么大喜事。老高头平时少言寡语，只知默不作声地干活，这回我进屋，他赶紧给我搬了条板凳。叫我坐下，接着就告诉我毛主席请他们几位老人去过节的情况。

他说：“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毛主席的秘书何培元同志对我说‘老高头，主席请你去一起过年。’”我当时非常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毛

主席那么忙，我不能去打扰他！”何秘书说：“毛主席请你们一定去。”我实在推脱不过，就随何秘书一起去了。到主席住处一看，有给主席送水的老头，有给李作荣处长看孩子的老头，还有杨家岭的几位老人，总共十一二人，都是60多岁的。我们在毛主席的小食堂里坐着，不一会，主席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这时，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每个人打着招呼，并且一一握手，然后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我们这里的老年人，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为了抗日救国，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希望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累坏了，我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个年，祝你们长寿……”

接着，毛主席邀请我们吃他为大家准备好的面。我们品尝着，一片欢声笑语。我们祝毛主席新年好、身体好，这个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高头说到这里，话题转到了他从小给地主放猪，几十年当牛做马，没过去一天好日子，有时，一病几天不能吃东西，狠心的地主老财连看也不看一眼。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领袖，这样关心我们普通战士、老百姓。”说着说着老高头的眼睛湿润了，他用衣服袖子拭了一下泪水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们，我们都得好好干革命啊！”

（作者张永清，原题为《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见《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6期，第22—23页。作者当时为中央军委副官处招待所工作人员、食堂管理员。）

4 为“诅咒”自己的老乡记功

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岁月里，边区军民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就说吃盐问题吧，东、南两条路一卡，盐的来源就断了。盐啊！盐啊！这平时不起眼的东西，一旦没有了，就觉得它比什么都宝贝。在断盐的日子里，吃什么都没点味道，几天工夫，身子就打飘飘，眼睛看什么都恍恍惚惚的，手脚也觉得无力了。

生命少不了盐。战斗少不了盐。为了解决千百万人的吃盐问题，党中央、边区政府专门作了研究：东、南两路走不通，就在西北要。延安的西北边在宁夏境内有个盐池。于是，党中央、边区政府决定，部队所有的饲养员、牲口，以团为单位组成驮盐队，有毛驴的老百姓也组织起来，到盐池驮盐，解决党政军人员和延安群众的吃盐问题。

驮盐队不负党中央、毛主席和政府的重望，很快扭转了危局，把盐运回来了。机关、部队改变了清淡寡味的生活。市民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咸盐了。有了盐，小米饭也甜，野菜也有了味道。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云雾随之消散了。街谈巷议，无不赞颂共产党，有的说毛主席是真正的“及时雨”；有的说毛主席是我们穷苦人民的好领袖，是真正为我们人民办事的。他心里有天下大事，又想到群众的柴米油盐，真是人民百姓的贴心人……

在一片赞美声中，我们突然听说有人骂毛主席，而且骂的很不象话，诅咒“雷公劈死毛泽东”。直呼名讳已属不恭，还诅咒，这可不得了，不是反革命分子才怪呢！中央有关部门和边区政府立即派人追查。一查就清，说这些话的原来是一个驮盐的老乡。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里去了，他马上把中央机关和边区政府有关人员召去，交代说：“不要精神紧张，不能感情用事，既然是一个老乡说的，必有苦衷。任何事情，结论只能下在调查研究之后，而不能下在调查研

究之前，这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原则。”

调查结果是这样的：这位老乡赶着毛驴去驮盐，是时正值隆冬季节，塞北的冬天寒冷异常，到处是冰天雪地。但驮盐的人们知道，雪花虽白，当不得盐用。为了早一天把盐驮回，天气再恶劣，行程再艰苦，他们情绪却很高。从延安到盐池，好几百里路，紧赶慢赶，也得走半月左右，晚上要在途中投宿。可是，西北人烟稀少，村落零散，没有驿站实在是苦了行路人。投着了村，还有个避风雪的地方，投不着村，就只好在野地里过夜，人畜又冻又饿，饥寒交迫比什么都难熬。由于边区政府派出驮盐的人多，没有组织好，晚上占了所有的驿店；致使这位老乡未投着村，苦熬了一夜，肚子里就胀闷了。他连续三夜在冰天雪地里挣扎，这怨气就憋不住了，也顾不得天高地厚，骂人的话就溜出了嘴。

毛主席听完了汇报，严肃地说：老乡没有罪，应该给他记一功。他骂得好，骂中了我们的官僚主义。我在江西瑞金工农代表大会上讲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我很佩服这位老乡的勇气，我要见见他，听他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要向老乡道歉，请他批评我们的工作。

毛主席抽空接见了这位老乡，详细地向老乡询问了情况。过后，毛主席又召去边区政府有关人员，研究了运盐路上设置驿站的问题。在毛主席的关怀和组织下，驿站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此事发生后，毛主席还一再地告诫大家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一定要注意群众的情绪。毛主席在马列学院作报告时，又联系这件事对我们说：“唐朝丞相魏征很懂得民心民意的重要，他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人民的代表，人心向背是成败的关键，我们决不可以因为怨恨大小而分别待之，这个问题应当使每个共产党人都知道，都做到。”

毛主席亲自解决运盐驿站问题和教导我们注意群众情绪的话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韩世福，原题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见《星火燎原》杂志1983年第6期。）

第六编

防御进攻操胜券

一、争和平争民主奋起自卫

1 山城的轰动——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全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艰苦奋战，迫切要求和平与民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的强烈愿望，要把中国再度投入内战的深渊里去。蒋介石一方面命令他的军队向解放区“收复失地”，下令敌伪汉奸“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疯狂地抢夺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而对于积极抗战、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命令“原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蒋介石又代替了汪精卫，把中国从地下到天上，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在到将来，全部出卖给美帝国主义，换取飞机大炮，进攻中国人民。这些又招来了一个新的民族危机。

中国共产党已深知内战危机十分严重；但为了人民的最高利益，争取实现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在内战没有爆发前仍然采取了一切挽救办法，在8月间发表了著名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布了我党力最后挽救时局而奋斗的愿望，为和平而斗争的纲领。这一纲领的发表，马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这时蒋介石又要起他那流氓的两面三刀手法，他一面虚情假意地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到重庆商谈“团结建国大计”，一面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蒋介石认为毛主席是不会去重庆的，他想以此为借口，转移全国人民的愤怒，推卸掉一切责任，阴谋嫁祸于共产党。但是真正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抓住一切可以实现和平的机会，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

8月28日下午，天气晴朗，万里长空蓝得像海水一样，金色的太阳照射着大地，把重庆染得金碧辉煌，扬子江、嘉陵江显得特别清澈、秀丽。重庆，这座古老的山城从来没有过这样庄严、灿烂与年轻。成千成万的人拥病了重庆机场，几千几万双充满着希望的眼睛仰视着碧蓝的天空。他们等待着毛主席的降临。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马达声，北方的天边出现了一个黑点，人群沸腾起来，高呼：“来了！来了！”飞机降落了。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主席主出了机舱，接着周副主席、王若飞等同志也走下了飞机。毛主席身着一套灰布新衣，脚穿一双黑布新鞋，高大魁梧的身材，迈着壮健的步伐，右手频频地挥动帽子，精神焕发，微笑着向欢迎的人们致意。人们都围了上去，千万只手向他挥动，有些青年人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些民主人士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民歌唱得好：“葵花朝着红太阳，人民热爱毛主席。”重庆市人民听到毛主席来了，就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万人空巷，拥到街头来欢迎，掌声、歌声、欢呼声和扬子江、嘉陵江的流水声欢腾一片，在重庆山谷之间回旋震荡。不仅人民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开明人士也都敬佩毛主席。毛主席到重庆后，国民党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来拜访，主席诚恳地接待了他们。只有何应钦、陈诚、陈立夫这几个顽固分子不肯露面，毛主席就主动去拜访他们。主席这一举动，确实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这些人一面假请假意地迎接着主席，一面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惊慌。主席到了陈

立夫那里，同他谈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共产党的诚意，对会谈抱着信心，希望他能够支持，等等，陈立夫马上说：“国共合作，我是前辈，我是一定尽心效劳的。”主席就是这样为着人民的利益，在重庆辛勤地奔波。

在谈判期间，蒋介石用尽了各种流氓手段，恣意破坏。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本着真心诚意、委曲求全的精神，在下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了许多重大让步，包括撤出广东、浙江、苏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 8 个解放区和缩减 130 万军队为 20 几个师。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却在谈判会议桌外下令发兵，想用军事上的赌注捞得政治资本，最终逼倒共产党。他哪里想到事情并不按照他个人的意愿发展，政治上的一拖再拖，使得原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的民主党派坚定了起来，全国人民也进一步认清了他的阴险面目，蒋介石愈益孤立了。军事上的压力，更使他碰得头破血流。蒋介石调动了百万国民党精锐部队，指使了 50 万日伪军队向解放区进犯，但是不到半个月就丧失了十几个师。这一来，蒋介石慌了手脚，赶紧请美国大使赫尔利出面调停。赫尔利刚要插嘴，就被毛主席严词拒绝了，主席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蒋介石一看实在没有办法，再拖下去对他更为不利，所以又耍了一个流氓的手腕，假惺惺地向毛主席央求说：“家里搞乱了，少壮派打起来了，请毛先生回去维持维持吧！”同时，蒋介石硬着头皮，把会谈暂时肯定下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著名的“双十协定”。

9 月 2 日晚，毛主席、周副主席、董老和王若飞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而举行的鸡尾酒会。出席这次酒会的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特罗夫、武官罗申及沈钧儒、郭沫若、冯玉祥、李德全、邵力子，还有陈诚、陈立夫、吴铁城等，约 300 多人。本来这种集会在重庆是常有的，从来没有引起市民多大注意。今天由于毛主席参加了这个会，就大大不同了。这个会原是严守秘密的，甚至连被邀参加的人事先都不知道。但不晓得怎么走漏了消息，酒会刚开始不久，成千上万的人就聚集在黄家垭一带街口上。从七星岗到观音岩中间激荡着人海的波浪，千万双眼睛望着中苏友好的大门，所有的人都谈论着：“毛先生要来参加的！”“看到毛泽东多光荣啊！”“毛先生啊，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呀！”……这时细雨绵绵地下着，市民们个个脸上浮着笑容，挤挤簇簇，热心地等待着。

当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会时，全场的人热烈鼓掌，一片哄动，紧紧地跟随到二楼，楼下的人几乎全部拥到楼上来了。数不清的热情的子，说不完的盛情欢呼。毛主席的脸上闪耀着欢乐和感动的光彩。大家兴奋地举着杯，人人都要向主席敬酒，向主席表示衷心的祝福。主席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但是仍然有许多人等待着敬酒的机会。周副主席怕主席的健康受到影响，就决然代替主席，干完这一杯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各室巡历了一周，来到了一个小厅里。这里边坐着冯玉祥、谭平山、覃振等几位老先生。这几位老先生有的已经在机场上和酒会开始时见过主席两次了，但是主席来到这里时，他们仍像初见时那样热情握手、搀扶，干杯。过了一会，小厅里似乎稍微平静了些，主席被几位老先生招呼着坐下漫谈起来。这些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会见了，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会见啊！他们在怀念着旧情，在陈述阔别 20 年来的变化，在为中苏友好条约的缔结而高兴，在期待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诞生。冯玉祥老先生双手握住毛主席的手，谈着谈着，眼圈红润起来，流下了热泪，其他

的人也悄悄掏出手帕，默默地揩着眼睛。这又是何等动人的场面啊！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请毛主席早些回去，还有另外的约会要赴。主席向大家告辞了。人们用恋恋不舍的眼光送着他，许多人一直送到门口。

毛主席的汽车来到大门口，千万人的大海立刻沸腾起来！人们兴高采烈地喊：“来了！来了！”随即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毛泽东万岁！”“毛先生，欢迎你！”“欢迎！欢迎！”呼声如万钧雷霆从四面八方轰响起来，经久不息。许多人由于过于兴奋，眼眶里溢出了泪水；许多人由于看见了毛主席，感到无上光荣，连声欢呼：“我看见了毛泽东！看见了中国的救星！”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周副主席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曾亲自跟宪兵司令张镇特别交代过：要绝对保证安全。张镇派了一个宪兵排保卫主席，每次见到他们总是和蔼地点头打招呼，有时还和他们随便谈谈，这些士兵深受感动，对他们影响极大。其中有一个士兵对我们说：“共产党的领袖真了不起，是天上下来的。”

当毛主席要返回延安时，在上飞机前又和这一排宪兵一一握手告别。主席热情他说：“辛苦了！感谢你们！”当场，有许多宪兵被感动得流了泪来。主席走后，周副主席要我们请他们一次客，并送一些礼物给他们。我们都一一照办了。在宴请这些宪兵的席间，领导这个排的宪兵营长非常激动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毛先生待人真是天下少有！弟兄们跟蒋主席八年多了，连面都没有见过，而毛先生却跟我们的兵一一握手。将来的天下是毛先生的！”

毛主席重庆之行，使全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毛主席重庆之行，给中国历史写下了光辉一页，其巨大影响就像日月一样，永远存在人们心间。

（作者龙飞虎，原文题为《毛主席在重庆》，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32—37页。作者在毛泽东于重庆谈判及转战陕北期间任秘书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 洞悉奸计有备无患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从峨嵋山跑下来，抢地盘，摘“桃子”。目的很清楚：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内战乌云，布满天空。为争取和平，阻止内战，我党尽了最大努力，毛主席还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订立了“双十协定”。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极端仇视人民力量的阶级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所谓“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力量，迫我就范。他手里有数百万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美援”接济，有大半个中国的地盘，自恃消灭革命力量的“资本”，绰绰有余，决心不顾一切，掀起内战。“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调集重兵，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交出革命武装去当“官”，拿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坚决不能干。我们反对内战，力争和平，但蒋介石一定要

打，那就对不起，只好武装自卫，奉陪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决心，完全正确，下得及时，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党。在上党，在绥远，在邯郸，蒋介石的军队向我大举进犯，因为我党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坚决武装自卫，结果取得歼敌 10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上党、绥远、邯郸三个战役，虽然还不是全面内战的开端，但证明党的路线和自卫方针的正确性，证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保卫革命果实，增强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信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那时患病出院不久，身体较虚弱，住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有次和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谈到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我说：看来要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主席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下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

1946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160 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事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挈全党全军，积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就为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创造了条件。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北海沿岸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便于相互援应，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小块根据地孤立存在，遭敌众兵分割“围剿”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 120 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 200 余万，划分力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东、东北、晋绥 6 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 4 个月里，即歼敌 35 个旅，近 30 万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 3 至 6 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 34 个旅 25 万兵力，投入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 2 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11 月 18 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王光美，以及黄杰同志，共 20 多人，乘卡车先去绥德。随后辗转于 1947 年 6 月到达太行山区，6 月 13 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从此，我开始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704页。作者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3 上党显锐，邯郸破“梦”

回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去了，你知道吗？”

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把我同久别的战友们重逢时的喜悦情绪一扫而尽。“什么时间去的？”我有点吃惊地问。

苏政委说：“中央有一个关于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说，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陪毛主席一起去重庆。离开延安的时间嘛——后来听说是8月28日。”

蒋介石接二连三地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和谈”，只不过是欺骗舆论、掩饰其发动全面内战的一个幌子。所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赴重庆，不仅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也使他在政治上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地位。但蒋介石毕竟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8月29日，毛主席飞抵重庆的第二天，他一面“欢宴”我党代表，大谈和平；一面密令他的各个战区，重新印发他在1933年编就的“剿匪手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那从未停止过的内战准备。全国性的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我们是有准备的。毛泽东同志在日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1945年8月16日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重申了我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一贯立场。毛主席告诫全党：“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我们是十分希望和平的。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坚忍地抗争着，英勇地奋斗着，无畏地牺牲着，承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付出了世人难以估量的代价。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日本侵略者投降了。人民只希望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和统一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神圣的愿望。但我们也知道，人民的神圣愿望要变为现实，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和平往往需要通过最不和平的手段——战争——才能得到。这条被历史证明了规律，我们的体验真是太深了。

重庆在“和谈”。我当时所在的冀鲁豫西部地区，却感受不到我们十分向往的和平气氛。阎锡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在重庆谈判刚开始的时候，集中了13个师的兵力，同日伪军一起，先后从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等地出发，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并侵占了我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潞城及壶关等地，也就是古称上党郡的上党地区。

侵占上党地区仅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的真正目的，是控制同蒲、平津两条铁路，以便抢占平津以及整个华北，进而运兵东北，夺取东北，篡夺全国的抗战胜利果实。这样，作为南北交通大动脉的平汉铁路，必将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和敌我争夺的焦点。因此，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决定消灭侵犯上党之敌的同时，命令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集中于平汉线，结合大岳、冀南军区部队各一部，加紧肃清平汉线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以创造战场，配合上党地区的作战。

上党战役是9月10日打响的。太行、大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及地方兵团一部，在刘、邓首长的亲自组织和指挥下，首先攻占了上党地区首府长治周围的屯留、潞城、长子和壶关等地，使长治敌军陷入我层层包围的孤立境地。随后，一面合围长治，一面对付增援长治之敌，叫作“围城打援”。当援敌被歼，长治守军突围逃窜时，刘、邓首长又命令部队全力追击。“双十协定”就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追歼逃敌，胜利结束上党战役的前两天签定的。

毛主席对上党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关于重庆谈判》的重要报告中，讲到“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时，以上党战役为例，说：“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双十协定”签定后，毛主席返回延安。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仍在重庆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蒋介石利用继续谈判的机会，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变本加厉地扩大对我进攻的规模，仅华北地区就兵分四路向我们压来。其中一路，蒋军第一战区胡宗南的先头部队两个军已经同蒲、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后续一个军则进到闻喜（属山西省）以南；第二路孙连仲十一战区的三十军（军长鲁崇义）、四十军和新八军，在其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三十二军及伪军孙殿英部跟进，后续还有四个军，其中一个军已进至新乡，其余正准备由洛阳、开封等地向新乡开进；第三路沿津浦线北犯的先头部队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第四路沿平绥线进攻的傅作义部则已逼近张家口。粗略计算，仅这四路，蒋介石投入的兵力就达十二三个正规军之多，真可谓大兵压境，不可一世，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

针对蒋介石进犯的形势，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同志十分形象而明确地指出：向华北进攻的敌人，沿四条铁路齐头并进，像四只爪子一齐伸过来。主力在平汉线一路。双方争夺的焦点在平汉线的邯郸一带。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设在邯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实现其打通平汉线，运兵抢占东北的野心，必须控制以邯郸为中心的交通枢纽。毛主席1945年10月17日给刘、邓等晋冀鲁豫中央局同志的电报中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大重大。”号召我们“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刘、邓首长对打好以邯郸为中心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也有具体、详尽的指示。

这时，来犯之敌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正向北推进，敌人主力北渡漳河后，很快占领了距邯郸只百余华里的磁县，与他们原先盘踞的临漳、成安、肥乡等地形成对邯郸的扇形包围圈，并齐头向邯郸逼进。

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全力阻击敌人，参加上党战役的兄弟部队及杨勇同志率领的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日夜兼程向邯郸赶来。

经过军事打击和多方争取，10月30日，高树勋将军率新八军及由他指挥的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马头镇举起了义旗。

由于受到我军沉重地打击，和高树勋将军的起义，马法五和鲁崇义两个军的锐气严重受挫，他们无心恋战，企图想再渡漳河南逃。但这时的漳河已被我从上党战役赶来的部队控制。十几天前，“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北渡漳河时还大摇大摆，不可一世，此时，他和鲁崇义率部退到临漳的旗

杆漳便走不得了。漳河将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地。

对旗杆漳的总攻进展的比较顺利。黄昏发起战斗，拂晓前除少数守敌漏网外，绝大部分被歼灭了。

天刚放亮，我赶回纵队指挥所的时候，机关的同志报告说，三旅捉到了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

率领敌人北犯邯郸的两个最高指挥官，一个战场起义，一个被我活捉，部队大部分被我歼灭，平汉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平汉战役是继上党、平绥战役后的又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歼灭战，它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打通平汉线的“黄粱梦”，是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周密筹划，英明指挥的结果。战役之后，毛主席在分别发给周恩来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同志的电报中称该役为“血战十日”的“伟大胜利”。这既是对当时战况的真实写照，又是对战役准确的评价。

（摘编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320页。作者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于1945年9月，奉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4个旅和3个特务团共3.5万余人挺进东北，11月10日抵达冀东的三河、玉田一线，适逢连日降雨，道路泥泞难行，部队又无雨具，不得不就地休息两天，并补充粮食，准备出山海关进入东北。

这时，得知国民党汤恩伯部5万余人逼近山海关，已与守卫山海关之我山东部队杨国夫师接触。考虑到我部既然已难按原计划经山海关进东北，我便于11月8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改由山海关以西绕道经冷口出关进入东北。

11月11日，我接到东北局电报，命我率部直趋山海关，配合杨国夫师歼灭进攻之敌。13日又接东北局电令，要我部暂勿向锦州、义县前进，而改向义院口、驻操营前进，并要我统一指挥新四军第三师及山东梁兴初师集结于抚宁地区，待机歼灭正向山海关西北之石门寨及抚宁延伸并构筑地堡工事的国民党军。

11月14日，我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转报东北局，说明新四军第三师与山东梁兴初师全部集结于抚宁，尚需6天时间，且部队极度疲劳。军委前已电令我部迅速向锦州集中，现东北局又电令我部集结抚宁作战，究竟如何行动，请尽快指示。

当日即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电报，令我部与梁兴初师速分路平行前进，限24日到达锦州地区休整。15日，毛泽东又电示东北局：“我黄、梁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应令黄、梁两师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准备决战。”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我即率部从玉田出发，经丰润、迁安，

由冷口出关，又经青龙、建昌，于11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

在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部队到达东北之前，李运昌所部已先期一个多月由冀东进入东北，并很快收编了大批游杂武装。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陆续进入东北，向铁路沿线和大城市发动进攻，李运昌部被迫从锦州等地撤退。11月26日，锦州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我刚刚到达锦州江家屯，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我率部负责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

当时，我们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面临一系列困难无法解决，很难进行大规模作战。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之后，因为受到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约束，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不准我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当时的东北，土匪蜂起，人民群众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也没有地方党和人民政权的支持，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出去搞粮食需要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部队指战员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抵不住东北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先头部队第八旅指战员及先遣人员，因出发仓促，连薄棉衣也没有穿上，困难更大。加之在冀东三河境内向部队作进军东北动员时，对这些困难估计不足，此时部队的情绪出现了波动。我们只好重新作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部队同刚出关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在铁路沿线打硬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有鉴于此，我于11月26日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除报告我部已到达东北及部队所在位置外，着重报告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电报中讲了“七无”等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我在电报中说明，由于我刚到东北，与东北局的同志不熟悉，所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请示并提出建议。

11月27日，我又将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军委，并说明“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毛泽东回电指示我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11月29日，中央军委亦给我回电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但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我先后给东北局发了三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但始终未见回音。为了执行东北局原来给我部的作战命令，我便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一道，带领各旅干部去看地形。待看完地形回到驻地，恰巧李天佑奉林彪之命来我部联系。通过与李天佑交谈，我才知道中央已派林彪负责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的各部队。而林彪的总司令部高我们的驻地大约只有二三十华里。我立即与李天佑一起骑马去见林彪，当面向林彪陈述了我的上述建议。我说，部队现在的状况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敌人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林彪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并命令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线，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则同林彪会合，驻到义县附近的乡下。我就便又向他陈述关于建立根据地、打开东北工作局面的想法和建议。

正在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我根据自己的上述想法，拟了一份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即给毛泽东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给毛泽东回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向，对统一大家的认识，坚定信心，为最后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走了思想基础。

（选编自《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38页。作者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5 鏖战四平

四平保卫战，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是一个重要的战役，该不该打，至今人们还在议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谈论一个战役，不能不涉及当时东北的形势，特别是不能不涉及当时东北的敌我形势。

我们的优势是：党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先后调集10万部队，2万干部，2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4个政治局委员）先后开赴东北，比国民党抢先了一步；而当时的东北，又是苏军解放，这给我们在东北开展工作以一些便利。但我们也有比国民党处于劣势的地方；国民党开到东北的军队，除第十三军是半美械装备外，新六，新一，七十一，五十二军都是全部美械装备，是有相当强的战斗力的，还因为有中苏条约，苏军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加之，当时东北的群众根本未发动，正统观念还比较浓厚。这就使得，我们虽比国民党率先进入东北，却未能在东北站稳脚跟。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又是来自各个根据地，虽然总的在发展东北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思想、战斗和工作作风上则不尽一致；其中有些人，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还没有树立建设根据地的思想，还对和平抱有幻想，想单纯依靠大城市和苏军的支持。这是当时发展东北的一种不好倾向，曾大大影响发展东北的前进步伐。

我们要努力发展东北，甚至提出要独霸东北，而国民党则决心要同我们争夺东北，完全占领东北。东北的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在四平保卫战之

前，这个形势并没有改变；在某种情形下，还更加尖锐复杂。

1946年3月6日至8日，东北局抚顺会议讨论了东北形势和作战的指导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的问题。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作得好一点，有的则作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

这也是当时东北的形势。这对我军的作战是不利的。作战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仗打完了，伤兵没有人抬。当时的这种形势并没有改变，部队仍处于一种无根据地作战的状况。

根据我参加四平保卫战的回忆，不论是东北局或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的林彪，战前都没有说过或者计划过要来一个四平保卫战。四平保卫战是逐渐形成的。如按当时林彪的说法，是“且战且退”，是在“且战且退”中阻击和延缓敌人的进攻，给后方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在林彪的作战部署和作战指挥中，最初都没有一个要组织四平保卫战的计划。

直到4月6日党中央、毛主席给东北局发出关于保卫四平的指示，认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8日又电示：坚决保卫四平。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军于4月16日开始在四平外围作战。在八面城以南的金山堡、大洼消灭了敌人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首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除师长逃掉外，几乎是全歼。

由于在金山堡、大洼消灭了敌人一个师，说明美械装备的敌人不是不可以战胜的。这不仅提高了我军的胜利信心，也使敌人感到我军并不是那样好打的。由于第八十八师的被歼，打乱了敌人进攻四平、长春的部署，从而使沿中长路进攻四平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不能不考虑下一步怎么行动。此时，新一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我军阻击，伤亡不小，以致迟迟不能大步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孙立人离开了新一军，由郑洞国以副长官的名义代替指挥。郑洞国接任后，又进一步组织进攻四平。尽管进攻有些进展，最后进至四平城下，然而仍是攻不进去，四平街还是在郑洞国的望远镜之下。

5月1日党中央、毛主席致电林彪指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面同意的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以求得有利于我的和平。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

3日党中央、毛主席连续给林彪、彭真发出指示，要求坚决保卫四平。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保卫四平的胜利越来越大。“前总”估计杜聿明这时有可能把新六军调来加入进攻四平的行列，暂时放弃对南满的进犯，因此，决定要三纵由南满开到四平的右翼昌图、开原一带，构筑坚强工事，阻止新六军北上增援四平敌军。同时“前总”又令解放长春的七师，开赴四平前线参战，同时警卫长春。远在后方的三五九旅也奉命开来四平前线增援。前总还下令加强塔子山和三道林子的防线。塔子山是四平的制高点，如果敌人占领塔子山，四平的整个防御体系就要受到威胁，敌人就要封闭我军的退

路，使我军有被包围和歼灭的危险。

正面进攻四平前线的新一军，在郑洞国的率领下，虽然依仗美械装备，占领了四平西南角的一幢红房子，算是攻进了四平一点点，作为他们的依托。但整个四平城区，还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郑洞国此时也开始构筑工事，与我军形成一种对峙局面。这样旷日持久，不仅社聿明安心不下，在南京的蒋介石也不断来电催促。这时苏军早已撤走，蒋介石想利用中苏条约也无法利用，所以很着急。

这时从天空的情报（敌人的无线电讯）得知，新六军已奉命北开，第七十一军已补充齐备，准备随时加入战斗。在南满，除调云南部队的第六十军接替第五十二军的防线，守护从锦州到鞍山、海城的交通线，第五十二军也作为预备队加入进攻四平的战斗序列。“前总”预计四平将面临一场更大的战斗，严令四平的防守部队继续加强防守，尽量吸引敌人。同时电令三纵马上进入昌图、开原一带阵地、拦截新六军北上增援，而且一定要拦截住。还调七纵（万毅纵队）进入塔子山阵地，调新四军七旅、山东七师进入三道林子北上阵地。山东一师、二师和新四军三师的其他部队留在四平以西、八面城南北，以阻击七十一军的增援。

战局的发展和战斗的关键在三纵和新六军那里。当时三纵是打得英勇顽强的，给敌人以不少杀伤。但三纵没有估计到，“前总”也没有估计到新六军美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化运输的优势。他们以小部队和我三纵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悄悄地用600辆汽车装运强行通过，途中遇到道路翻浆，铺上钢板通过。等我军发觉，用炮火追击已来不及了。这样，新六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三纵的防线，进入四平的右侧，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进占哈福车站，并利用他们美械装备的优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直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

战斗十分激烈。我军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使敌人尸横遍野，几乎每个阵地的守军都是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一人。奉命增援塔子山阵地的部队，没有亲自下水试探，轻信群众意见，以为水太深就未徒涉渡过辽河，耽误了时间，使塔子山丢失。

不能不考虑从四平全线撤退了。林彪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在这之前，林彪向秘书口述命令：“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不久，他得到三纵的电报：“新六军攻占西丰、平岗后，于晚6时进占哈福站。”林彪于是又向秘书口述命令：“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情况确实万分紧张。林彪把陈正人（后方总政主任）和我叫去，要我们草拟为撤退四平告全军的电报，他说：

“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新六军军长）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他又继续说：“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他对这时站在他面前的所有的人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然后他把作战处长和情报处长叫来，交代

了下一步：

“七师于三道林子北山，七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最后，他亲自拟了个电报，把情况和决定报告了毛主席和东北局，并得到批准。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了。

整个部队在撤退中，虽然遇到了这种那种困难，但我军主力还是保存下来了，还保持了一定的旺盛的士气，所以不久才能在拉法、蚊河地区胜利地进行退兵一战，并成为尔后发展东北，建设东北，实行反攻的骨干力量。

（摘自陈沂：《四平保卫战》，见《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8页，作者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二、进退自如打退全面进攻

1 牵动人心的中原突围

国民党反动派在停战令生效以后，仍处心积虑地妄图消灭我中原军区部队，自1946年3月中旬起，即积极对我进行军事围歼部署，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4月底，蒋介石从西安飞到汉口，召见国民党武汉行辕党政军官员，直接谋划中原之战，并指使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同时进攻豫皖苏解放区以为策应，发动全国性的大内战。战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在中原部队同国民党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日日夜夜里，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给予中原部队指战员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根据当时极其复杂的斗争形势，对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周副主席代表我党肩负着从政治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以便为中原部队顺利实行战略转移创造条件的重大任务。鼓舞了6万健儿的士气，激发了斗争热情，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3月上旬，正当中原部队被围困的最困难的时刻，先念同志派我（肖健章——编者）跟随中原局代表任质斌同志以军调部执行小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部队情况，请求给予经济支援和请求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度过了不寻常的两天。临走时，毛主席请我们吃了晚饭。他首先问先念和位三同志好，并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原部队在敌人重重围困的条件下坚持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毛主席指出，中原部队要用最大的毅力拖住国民党最多的军队，尽量争取拖住敌人更长时间。还说，你们在那里艰苦奋斗，牵制国民党军队30多万，掩护各解放区工作的展开，将来各解放区打胜仗也有你们的功劳的。现在你们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将来即使你们突围时部队被消灭得一个没有，只要各解放区打胜仗，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主席还亲自在我的笔记本上题了“努力奋斗”4个字。

3月30日，毛主席派董必武同志到宣化店看望和慰问部队。董老给中原部队带来了大批金子、银元和药物，又通过在国民党湖北省担任救济总署署长的杨显东同志，运来了大批救济物资。杨显东同志还亲自到宣化店了解情况，商讨安排运送大米、白面、药物以及各种食品罐头。党中央、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对于中原部队政治上和物质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像春风一样，温暖着困难之中艰苦奋斗的6万中原健儿，更加激发了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

流血牺牲、誓同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

从1946年3月至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部署的同时，在中原也做好了围歼人民军队的一切准备。在刘峙的统一指挥下，部署了共计10个正规军（24个师），十几个保安团。6月下旬，敌调其十五军接替四十一军信阳至柳林防线的封锁任务，将四十一军调到罗山、光山一带，加强对我正北方向的监视，最后完成对我中原解放区部队的军事进攻准备，从6月26日起，开始向我发动围攻的前哨战斗。

为了争取时机，取得主动，按照事先制定的分路突围方案，6月26日黄昏，我们开始突围行动。部队像一条汹涌的巨流，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

傍晚，部队接近平汉铁路，只见敌人碉堡像鬼影般耸立在平原上，从枪眼里透出昏暗的灯光，四周静悄悄的。八团神速秘密地进入敌人封锁线，对北面柳林及南面辛店敌人派出警戒。我军顽强战斗，突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8月下旬，部队到达庆阳，陇东地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刘景范同志率领地委领导同志等在庆阳城外迎接。男女老少挤在满街满巷，家家户户在沿街摆着堆满食物的桌子。部队经过，群众都蜂拥上来给战士们戴光荣花，献上一杯杯香冽的美酒。

9月27日，我们南下支队指战员胜利回到了日夜盼望和思念的延安，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我们终于又回来了。每个人都像久别母亲怀抱的孩子，忍不住掉下一滴滴欢欣的热泪。

延安人民高举“威震华夏”4个大字的横幅标语，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来欢迎我们。震撼人心的口号声此伏彼起，长久地在延水和宝塔山上空回荡：

“共产党万岁！”

“八路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热烈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们胜利归来！”

“南征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王震同志提前一天回延安汇报。毛泽东同志听说王震同志来到枣园，立即走到窑洞门口迎接他。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握着王震同志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那长长的胡子，亲切地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最令人难忘的是第三天，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渴望的心情要求见毛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临大会。王震同志仪容整洁地带领指战员们含着热泪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含笑频频向大家招手、鼓掌。他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个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

朱总司令接着在大会上说：党中央把同志们欢送出去，现在又把你们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中央决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你们休息

好，得到整训和更好地发展。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讲话，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同志们的心情都感到无比欢欣和激动。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宴请三五九旅南征团以上干部。当晚，党中央、毛主席和当时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又陪同南征的全体同志观看了文艺演出。

（摘自王首道：《重返延安》、肖健章：《宣化店的斗争与中原突围》，见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编：《中原突围》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 页、35 页、53 页，115 — 116 页。王首道当时为“南下支队”政委。）

2 苏中七战七捷

1946 年 6 月 6 日，中央指示：“目前我们的方针是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6 月中旬，中央判断：“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对于大打以后的结局，当时中央作了这样的估计：“6 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敌人大举进攻在即，迫切需要制订我军的战略方针，于 6 月 22 日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全局破裂，国民党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山东、太行两区主力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要求我太行区的部队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尽可能攻取陇海路沿线南北十几个县城，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野战军则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力配合苏皖北部的部队攻取津浦路徐蚌间以及陇海路黄口、徐州段的各点，着重调动徐州之敌在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而我华中主力须对付江北之敌，予以配合。还考虑在形势有利时，两区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前进。

中央为了实施太行、山东主力向南出击的计划，6 月 26 日指示华中分局，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要我和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 15 个团之主力部队，兵出淮南，与山东野战军主力配合，一举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彻底破路，歼灭该地区之敌，恢复淮南（三、四分区）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并限于 7 月 10 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攻击。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个指示，于 27 日命令我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集中于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我于 6 月 27 日向中央军委和陈毅军长发电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并同华中分局的子恢、鼎丞、震林诸同志联名于 6 月 29 日再次上报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仍留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箝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一、第六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军委对此建议极其重视，次日复示华中：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情况在急剧变化。7 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指示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上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7月13日，军委电示：“苏北（按指长江以北的江苏北部）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边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后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军委还提醒我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这使我们感到，大战将从苏中开始。苏中战役实际上具有解放战争战略初战的性质。军委要我们“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实际上赋予了我们的作战以战略侦察的任务。

作战地区选定之后，就是选择打击目标和确定反击时机了。

敌军即将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在侮安、如皋一线严阵以待。7月10日，我们已确悉敌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第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师的第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堰，得手后，这几路敌人将会攻海安。整编第二十五师的另外两个旅在扬州待机。如我初战大利，他们可能沿运河线北犯邵伯、高邮。敌军还有两个整编师（第二十一师和第六十五师）在江南沿岸当第二梯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只有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最为有利。宣家堡是停战令生效后敌人违反停战协议侵占的，而泰兴城是停战协议即将签署时被敌人强占的，反击这两点我在政治上更为有理。而且，敌人占据不久，民心下顺，情况不熟，虽然临时赶修了一些工事，但远非南通、泰州可比，实际上是临时驻止之敌。打掉了这一路，西北路泰州之敌和东南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这一路敌人是整编第八十二师的前出部队，只有两个团，比较孤立、分散，利于我同时分别歼灭。

整编第八十三师原番号是第一百军，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基本部队之一，美械装备，美国教官训练，抗日战争后期曾作为远征军到过缅甸作战，战斗力较强。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战斗进程基本上和预期的一致，我军做到了出敌不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由于在老根据地行军作战，群众性的消息封锁做得很好，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刚到南通接任的敌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也莫测我军虚实。李默庵急令已开抵白蒲准备北犯的第四十九师主力于14日缩回平潮，以保南通。至15日，一绥区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四十九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15日晨，我第一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第六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一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抵抗。各阻援部队都打击了援敌。鉴于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胜利结束。但留下第六师少数部队继续围攻泰兴城内少数残敌，给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以作为下一次战斗的钓饵。这一仗，我攻城与打援部队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三旅一个营，

共 3000 余人。

这是苏中战役的首战，也是华中我军在解放战争迎击蒋军大举进攻的第一个胜利的战斗。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关注。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同志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

宣泰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指示我军在南线须准备连续作战。对于连续作战，我们是有准备的。在宣泰战斗的进程中，我们就分析了敌人可能的动向，筹划着下一步转用兵力的方向。此时，敌人虽遭到我军之打击，但他恃其兵力雄厚，又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便急调江南沿岸的整编第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的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第四十九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我们选敌第四十九师为歼击目标。7月15日晚，即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指：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确实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

16日上午，敌第四十九师分左右两路北犯。17日，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之鬼头街、田肚里；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

7月18日晚战斗发起，敌人果然仓皇失措。我第一师一部与第七纵队南北配合，攻击如皋东南鬼头街一带的敌第四十九师师部和第二十旅，19日，除了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率几个人逃入宋家桥外，全部被歼。第六师主力和第七纵队一部经十九、二十两夜的攻击，也歼灭了杨花桥、宋家桥之敌第七十九旅大部。

如南战斗共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1万余人，达到了预期的歼敌目的。

7月2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来电报：“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并指示我们：“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二梯队，立即又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分路由如皋、姜堰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敌人以为只要占领了海安，则从泰州经由姜堰、海安、李堡直达海边的封锁线就可以形成，苏中南部的占领区就可巩固，长江下游的通道就可确保，同时敌人还判断，海安战略地位重要，我军势在必争，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进而配合其北线的行动，解决苏北问题。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议，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华中分局把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得到了同意。

7月30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应付恶劣环境之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这个指示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中央战略方针和作战思想的理解。

其实，中央的这一精神早在7月20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电文中，就有过明确的指示，其中指出：“战胜蒋

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的指示，只有同当时的实际相结合，体会才更深刻。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4个团只有1个团打过仗。但是4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3000多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4天多，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1的新纪录。仅7月31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万余发。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敌人侵占了海安，认为他们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其后方。据此，我们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再北攻东台。骄兵轻进，必然有隙可乘。我们把主力集结在海安东北，无论敌人向北、向东，我军都可随机出击。

这时，我在苏中地区作战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了作用。人员、物资很快得到补给，伤员很快得到治疗，加上大批解放战士和缴获的补充，每个连队都比战前充实，武器也加强了。特别是民兵群众封锁消息、查缉敌探之严，更是难得。华中野战军机关及第一师、第六师3万人集结休整两星期之久，驻地距海安近者仅一二十华里，在那里出操上课，开会唱歌，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敌人却毫无所知。

8月6日，敌第六十五师及第一五旅果然由海安东进，连占西场、丁家所，将继续东犯。我立即于7日晨电报华中分局、军部和中央军委：歼敌良机即将成熟。

次日即获军委复示：“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预备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华中军区根据这一指示，在报告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将淮南第五旅和华中军区特务团调来。这些指示和决定，增强了我们歼敌的信心和决心。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7日占李堡，8日占角斜。我们又密悉李默庵决定调其整编第六十五师于9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的防务，10日又令新七旅从海安东开始接替第一五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

我们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

战斗于8月10日20时发起。我第一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一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11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中午又克蒋庄、杨庄，全歼守敌。由于我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都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11日晨，敌新七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一个团由海安踉踌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六师与第七纵队，立即利用高粱、玉米地作好伏击布置，第七纵队一部断敌退路，

会同第六师一部出击，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前后 20 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 9000 余人，又赢得了一个胜利。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对于外线出击方针和内线歼敌方针的得失利弊，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华中野战军主力使用的方向，不断进行着研究。

为执行南下作战计划，6 月 27 日，陈毅同志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第二纵队、第七和第八师等部，于 7 月 10 日以前南下，并指挥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约 5 万余人，担任徐蚌段之作战。7 月 14 日，陈毅同志鉴于敌人即将大举进攻苏皖，就山野主力南下作战的时机向中央军委提议：敌人的这次进攻，“是分区蚕食的狡计，苏皖现有力量难于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区暂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因此主张立即执行中央军委 6 月 22 日提出的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以全面大打的办法来制服蒋军分区蚕食的狡计。当时宣泰战斗已经打响，中央军委、毛泽东同东复电陈毅同志：最近几天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7 月 15 日，宣泰战斗刚结束，我们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这两个指示，表明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密切观察战局，研究战略方针的严肃态度和近期内还须内线歼敌的意向。

宣泰和如南两战胜利后，蒋军的有生力量虽受到我一定的打击，但进攻之势尚未减弱，继续增调兵力，向苏中重镇海安推进；而淮南解放区则已被敌人突破，华中形势日趋紧张。此时，陈毅同志再次从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考虑，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向中央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建议，态度极为慎重，回复陈毅同志：“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不日，中央军委给我来电：“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八月内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方案”。要我就以上两案表示意见。

当时李堡战斗正在进行中，谭震林同志已来到前方，我们共同商讨，意见一致。李堡战斗后，于 8 月 14 日向中央军委呈报了主张在苏中再打几仗的意见。在此前后，张鼎丞、邓子恢同志也表示了主张再在苏中打几仗的意见。15 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批准了我们的建议：“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战局助益极大。”陈毅同志也来电指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经过战争的实践和反复讨论，战争初期的作战方针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此后，中央军委鉴于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和内线歼敌的优越性日益显著，再次推迟了外线出击的时间，直到 1947 年 3 月，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这样，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然后转到外线作战的计划，已经发展成实行内线

的持久的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了。回忆这段历史，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依据战争的客观规律来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

李堡战斗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国民党军经过我连续 4 次打击，已被歼灭 3 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敌人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堰、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的“清剿”和海、如、泰之间的防御，以求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我两淮。

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士，加上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李堡战斗我军伤亡很少，而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五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8 月 13 日，中央军委发来指示：“苏中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

此时获悉蒋介石正筹备于 25 日在庐山开会，我们初拟进攻南通市，吸引如皋、海安之敌南下增援，歼灭官一二十旅，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我军影响。8 月 19 日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同志后，次日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报指示：“同意你们南下作战，但不必强攻城市”，“在攻占通如线后，敌人也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的可能。在敌人不敢增援的情况下，可以西进如（皋）黄（桥）公路，相机进占黄桥，来调动或逼退海安之敌，在运动中歼灭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分正确，十分中肯，当时进攻南通，条件不成熟。我们当即以黄桥为进攻方向，缩小进攻正面，不攻白蒲，从丁堰、林梓打开缺口，钻到敌人肚里去。估计那时敌人必将调兵回援，我则于运动中歼灭之。

8 月 21 日夜 11 时，丁堰、林梓战斗打响。又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进展甚快。22 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十一总队被我第一师围歼大部。我第六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五旅围攻下，大部逃入如皋，东陈被我攻占。

不出军委所料，各据点里的敌人都未敢出援。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 5 个大队及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共 3000 余人，缴获甚多。

当我军在丁、林歼敌，打开西进门户的时候，淮北方向由宿县地区东进的敌人已占领我雅宁，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二十五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也全部于 8 月 25 日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我着眼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定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十纵队（三个团）及第二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主力部队按原定计划，来一个“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我们除以第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瓣制性进攻外，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特务团继续大踏步机动作战，于 8 月 23 日夜间向敌人封锁圈的中心挺进。

由于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越通榆公路西进，敌一绥区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

皋。8月24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第九十九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25日，敌第九十九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六师遭遇，当即被第六师包围，展开激战。这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己南下到如皋的第一八七旅，加上第七十九旅一个团和第九十九旅的一营，急向西南增援第九十九旅，该敌又被我第一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当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我们总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3.5:1，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三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有时为了保证全歼和速决，还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四倍、五倍、六倍于敌之兵力。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我们立即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九十九旅两个团先行歼灭。8月26日，我们将第一师的第一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六师等部以10个团的兵力，5:1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九十九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六师和第一旅东调，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三个团。26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8月23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丁沟、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的部队虽然训练不多，弹药不足，但指挥员顽强灵活，动员工作做得深入，士气旺盛。他们依托工事和河流湖泊英勇抗击敌人。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各团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第二十五师猛攻了4天，我军工事大部坍塌，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虽然乔墅被突破，但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时，第九十九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一八七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2000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26日黄昏时候狼狈撤回扬州。进行了4昼夜的邵伯战斗遂胜利结束。这是第六次作战。

27日上午，我围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15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五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尤多。我第五旅衣服力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蓝色不同，而与当时国民党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敌军误以为援兵赶刊，欢呼跳跃，随即成了俘虏。继而第五旅乘胜利余威于31日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一六旅五个连缴械投降。

如黄路战斗，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1.7万余人。

苏中战役，从7月13日至8月31日，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作战7次，均获胜利，歼敌5万余人。它同后来华东战场的一些战役比较，其规模是比较小的，但它是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突围后的第一个战役，带有战略侦察任务，毛泽东同志亲自力军委起草的给各解放区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8月

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战役结束后，延安总部发言人就国民党军对苏中进攻惨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这个战役为“七战七捷”，并指出它对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9月3日至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胜利地进行了著名的定陶战役，歼敌4个旅17万余人，活捉敌整编第三师师长赵锡田。延安《解放日报》于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指出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定下来了”。

（选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394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3 宿北鲁南打胜仗

苏中战役即将结束时，我和谭震林于8月27日报告中央、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我军必须休整才能再战，故决定以包围如皋、海安形势，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八十五军一六师。”8月29日我们又建议，以第五旅攻占黄桥，第一、第六师部署于如皋、海安之西部，一面休整，一面对海安采取进攻姿态，暂时围而下攻。如果敌人不能在10天之内向海安增援，我则攻占海安，以争取补充近万参军战士和解决部队的冬衣；如敌人在10日内增援海安，我则打援。我们的这一部署是过渡性的，我们预期只要实现其中一个设想，均有利于下一步转兵他去；即使军委仍命令我们在原地作战，也比较主动。8月31日军委复电指示：“粟谭29日电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10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同日第五旅攻克黄桥，苏中战役结束。这时驻守于徐州之敌有逐步向东打通陇海线，并有威胁我淮阴、临沂的模样。其企图当是切断我华中与山东的联系，进而围歼我华中的主力。9月4日军委指示：“希望能于9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10月上旬攻取扬泰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可以看出，军委的设想是，山东野战军主力先给徐州东犯之敌以相当的打击，然后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从淮北、淮南两面夹击敌人。因此我们于9月7日和8日连电建议山野主力先在泗阳寻机歼敌；如必须北移作战，则苏中主力撤围海安，争取10天左右的休整后北移泗阳地区，以保障两淮的安全。9月9日5时，军委复示：“同意放弃（攻取）海安，休整10天，准备向北机动。”这是华中主力作战方向的一次重要调整，即：由原走向西机动，调整为向北机动。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9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获得大捷，全国振奋。军委于当日发电指示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巩固两淮开展局面。”为了使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向北机动之前得到兵员及冬衣的补充，我便于9日发电给中央和陈毅同志，建议在打下海安后

再北移。电报发出后。就接到陈毅同志于同日来电：“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即时出击，或在宿迁、沐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进攻瞄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沐阳、两淮、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要我们“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好”。华中分局的鼎丞、子恢同志也发电主张先攻占海安，“以免功亏一篑”。

但是，军委综观全局，于9日亥时来电指示：“粟谭部连战疲劳，亟待休整，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以放弃（攻取）海安，即时休整。”这时震林同志已赴华中分局，这一指示引起我的高度重视。虽然中央在10日又复电：“9日电悉。如你们以为攻占海安于大局有利，则可决心攻取海安。”但我体会到这是中央对战区指挥员意见的尊重，我们更应该认真领会军委9日亥电指示的精神，研究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时我们获悉敌汤恩伯将接替李默庵指挥苏北军事，并限于9月底完成一切准备，10月初开始第二期进攻。随即军委也向我们通报了这一情况。我分析攻占海安固然对坚持苏中和动员参军以及解决冬衣有所帮助，但预计要付出1500人左右的伤亡代价。从今后战局的发展来看，势须诱敌更深入一些，才便于大量歼敌，我如攻下海安，亦仍须放弃。不如放弃攻占海安的计划，将攻取海安所付代价，留作以后在运动中歼敌之用更为有利。我立即于9月10日将上述意见报告军委、陈毅同志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

此时，淮北敌情在急剧变化，敌第七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军向泗阳和两淮发起了进攻。陈毅同志电称拟率第二、第七、第八师及九纵坚决歼灭进攻之敌。军委赞同这一建议，并根据这一情况，于11日8时指示我们：“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于是我们立即收拢队伍，兼程北上。

针对敌军的动向，军委的意图是调动山野、华野两大主力，歼灭进犯两淮之敌。毛泽东同志于11日亲自拟电指示陈毅同志和我们：“1. 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灭全部；2. 同时张邓要注意邵伯、高邮、洪泽湖诸防务，严防敌偷渡进袭；3. 两淮工厂资材速迁安全地带。”但是，两淮战局的发展不如人意，敌人的攻势未能受到顿挫。

9月19日18时，我军在给敌人以一定杀伤后，力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

我军撤出两淮后，华中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苏中已成为敌后；另一方面则是我华中、山东两野战军靠拢，兵力更加集中。于是9月20日我们华中分局的几个同志，联名向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报告：“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在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成长蛇形，不利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

次日，陈毅同志复电：“我同意华中分局20日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22日，中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又来电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

政委，如同意清即公布（对内）执行。”

对于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同志9月28日亲拟一份电文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陈毅同志亲自来到华中分局，在他领导下，共同商定了以下各点：第一，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与沐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10月5日前后集中完毕，如敌此时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下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第二，在涟水、两淮、宝应地区设指挥所，作为籍制方向并掩护做冬衣。第三，部署盐阜、淮海、两淮，高（邮）、兴（化）、宝（应）各地之坚持斗争。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以及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10月1日，陈毅同志将上述部署报告了中央。中央随即复电：“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

但是，敌情又起变化，鲁南之敌进占峰县、枣庄，威胁临沂。陈毅同志提出山野回鲁南，华野留淮海区作战；或者全军人鲁作战的主张。10月14日，军委来电询问我们：“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如确有歼敌把握，自以去鲁南打较在淮海打为有利。因鲁南敌歼灭后，即可出陇海、淮汭对华中局面并非不利，问题是歼敌究以在何地为宜。”

我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经过各方面的郑重商讨，10月15日子时再次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军委。

同日12时，毛泽东同志来电：“十五日于时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我军撤出两淮，敌人十分骄狂。11月底12月初，蒋介石为配合伪国大召开后的声势，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军）28个旅，分4路（即由东台、淮阴、宿迁、峰（县）枣（庄））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计划，妄想切断我山东与华中的联系，聚歼我华中主力，在年底以前“结束苏北战事”。我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在四路敌军中以进攻沭、新一路对我威胁最大。只有集中主力歼灭这路敌人，才能取得主动，但目前我军阻击该路敌人的兵力比较单薄。为此，我与谭震林同志商量联名建议陈毅同志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路边的机动位置上，以便决心打进攻沭阳一路敌人时，能在约2日内赶到参战。

12月9日，陈毅同志复示，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八师于当夜移到郯城西北的码头镇以西地区，兼顾打击鲁南之敌，如需南下歼击宿沭地区之敌，两夜即可赶到。这样，集中兵力，先打宿沭一路敌人的决心，基本上定下来了。

军委对宿沭这个方向极为关注。12月9日军委来电要我待盐城作战结束，敌情完全明了后，考虑部署，提出计划，电报军委。12月11日下午，军委来电“庆祝盐城大胜”，并指示我“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我立即由盐城兼程出发，于12日到达陈毅同志处。13日，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尚未赶到陈总处，又再次给我和震林同志发电指示：整编第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整编第六十九师向沭阳进攻，只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中野战军主力即难以在苏北连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的可能，对此点的严重性必须估计到，并要我们将处理意见及作战部署报告军委。

我们密切注视着敌情的变化。13日，宿迁之敌分左右两个纵队沿宿（迁）新（安镇）、宿（迁）沐（阳）公路发起进攻，其左纵队先头部队占领晓店子、蟑山镇（宿迁以北），其右纵队先头占领曹家集、高圩（宿迁以北）等地。其左纵队为整编第六十九师，右纵队系整编第十一师。

我们于15日定下决心，即以24个团的兵力，除一部割裂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的联系，并阻击整编第十一师外，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之整编第六十九师于宿迁、沐阳、新安镇三角地区，尔后视战况发展，如有可能，再转移兵力会同北上的第一师（8个团）歼灭整编第十一师。为策应宿、沐、新方向作战，我们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它三路敌人。我们立即于14日午时将此决心与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报告我已按军委指示北返，与陈毅同志在一起指挥宿沐方向的作战。15日军委复示：“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5日黄昏，我军乘敌翼侧暴露，各师旅之间出现较大间隙之际，秘密而突然地向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发起攻击，主要突击方向指向该师左侧后，经过果敢勇猛的纵深插入，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已陷入重围，不断向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涟呼救。

17日，敌整编第十一师之第十一旅、第十八旅，在飞机、炮兵人力掩护下，由井儿头、曹家集等地向我蔡林、张林、高家洼一线阻击阵地进行了连续猛烈攻击，企图解整编第六十九师之围，但在我第一纵队一部兵力的顽强阻击下，激战终日，敌伤亡很大，未能得逞。接着我军又从傅家湖以南迂回其右翼，援敌则惊慌失措，立即回窜。当日18时，我第八师对晓店子守敌发起攻击，在炮兵人力急袭后，仅用25分钟即突肢敌防御阵地，并在5个小时内全歼了预备第三旅。敌整编第六十九师余部在我强大攻势下，继续收缩兵力，企图固守待援。我不给敌喘息，即令第一、第二、第九纵队及第七师的第五旅等部主力，向被分割包围于人和圩、苗庄、罗庄等地之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第四十一旅、第六十旅展开逐点攻击。

18日，敌整编第十一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我第一纵队和第八师各一部所击退。此时，敌见增援无望，即以飞机掩护李庄、罗庄之第六十旅仓皇突围，我军立即勇猛出击，将其全歼。人和圩之敌突围未成更加动摇，我第二纵队和第九纵队经充分准备后，于黄昏发起总攻，迅速突入圩内，战至午夜，全歼守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及第二六七团，师长戴子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就擒。

19日上午，困守苗庄之敌第四十一旅分两股向南北突围，除300余人逃跑外，全被我歼灭。至此，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全军覆没，我歼敌两2.1万余人，战役遂告结束。军委、毛泽东同志18日就来电，“庆祝宿沐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20日又来电指出：“歼敌2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

宿北战役的胜利，打垮了敌人4路中对我威胁最大的一路，从而使敌人不仅未能实现其切断我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的联系，实行各个击破“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企图，反而被我军切断了南北联系，分割成山东、苏北两蛇，暴露了翼侧，处于受我军攻击的威胁之中。当时国民党的伪国大尚未闭幕，宿北战役给了吹嘘所谓“胜利”的蒋介石一记响亮的耳光。

宿北战役的胜利，给敌人的一路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另外三路敌人的进攻。但就总的态势看，还只是把敌人的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

口并不很大，只要敌人作些调整，仍可恢复对我军的半包围态势。当时，敌徐州绥署主任薛岳认为，向我鲁南腹地深入的这一路军队有铁甲利器，我军对它无可奈何，因而对部署未作调整。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虽已感到孤军突出，但也自恃手中有坦克战车，天上有飞机掩护，可保无虞，只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沿公路两侧控制了一些山地要点，以坦克不断往返巡逻，防我攻击，并仍保持进攻姿态，企图伺机继续向临沂方向进犯。由此可见，敌人虽经宿北战役的打击，攻势顿挫，但并未改变其进攻企图。

还在九十月间，陈毅同志就曾经和华中分局的同志多次酝酿过西渡运河，恢复淮北，逼近津浦路及徐州，以调动敌人，寻机歼敌于运动中。在宿北战役结束前一天，我们把这一设想进一步具体化，上报中央军委。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宿北战役结束以后的第二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但中央对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很尊重，在接到我们建议进入淮北作战的电报后，即复电同意。

12月19日中午，宿北战役已接近尾声。这时获悉，薛岳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桂系第七军之第一七一师（同整编旅），由涟水向北进攻，限23日攻占沐阳。当时我们认为，如该敌果然按此令北进，势必孤军冒进，有利于我就近转移兵力将其在运动中歼灭。据此，我们决定，除以一部兵力北上攻歼邱县地区之敌外，主力先南下歼灭运动中的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但直到23日，该师仍在原地未动，并与第七军、整编第二十八师相衔接，企图等待欧震兵团到齐后，再继续北犯。鉴于敌人密集不易分割，我们立即政齐了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决定按中央军委的意图，主力回师鲁南，并即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迅即再次来电指示，如放弃打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计划，似宜集中25个团的兵力，歼灭鲁南之敌。

经过这样一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于在鲁南作战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如果分兵进入淮北，远离后方，不仅需要作好充分准备才能行动，而且不一定能调动进攻鲁南和苏北之敌回援。在战争进程中，我军统帅部及高级指挥员，对战局的变化发展往往是做出多种设想，从中选取最优方案，这是很必要的。在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始终纵观全局，经常征求和听取战区指挥员的意见，力求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准确地作出决断，把我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充分发挥战区指挥员的主观能动作用，最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军得以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军指挥关系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

当时，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之敌，仍停留于临沂西南地区。这一路敌人的部署是：整编第二十六师之第一六九旅配置于卞庄地区，第四十四旅配置于太子堂地区，师部及第一快速纵队（由第八十旅、中央直属榴弹炮兵第五团及第四团一个营、战车第一团第一营、搜索营、工兵营和汽车团组成）位于两旅之间的马家庄、陈家桥、贾头地区；整编第五十一师主力位于枣庄、齐村及其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三十余公里；整编第三十三军之

整编第七十六师和整编第五十九师，分别位于四户镇和邳县及其附近地区，与整编第二十六师相距也有三十余公里。此外，兰陵、洪山和长城一带，有敌地方部队驻守。

我们先拟打弱敌冯治安部之整编第五十九师，后来又改为打强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为什么要确定先打这个强敌呢？正如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所指示的，整编第二十六师系敌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治安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

依照上述意图，我们对鲁南战区的地形、民情以及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和战斗力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一致认为，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优势在我军方面。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即可集中 27 个主力团，打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 6 个团，兵力 4 倍半于敌，是绝对优势，可以实现战役上的以多胜少。同时，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军突出，态势不利，而且它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在它受攻击时，冯部很大可能不会来援。因此，我军有把握取胜。12 月 23 日，我们定下了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的决心，并随即命令第一纵队、第八师、第一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已由鲁中到达鲁南之第九师、第四师一个团，及原在鲁南方向作战之第十师、滨海警备旅和鲁南军区特务团，准备首先歼灭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作为战役的第一阶段；尔后再乘胜扩大战果，直下峰县、台儿庄，歼敌整编第三十三军一部或全部。另决定以第二纵队、第六师、第七师、第九纵队及第十三旅，由谭震林同志指挥，在沐阳东西地区进行防御，迟滞敌人北犯，并相机歼其一部。这一决心上报后，立即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准。他们在复电中还强调指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期望我们“打一个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明确具体，言简意赅，更加坚定了我们对此战必胜的决心。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非常关心，在战役发起前几小时，还来电询问我和第一师是否已到鲁南与陈毅等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在一起（因我和第一师走在北上部队的最后），勉励我们要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灭敌 3 至 4 个旅。中央的电报使我们倍觉亲切和深受鼓舞。

1947 年 1 月 2 日 22 时，我军提前两小时突然对敌发起全线攻击。敌人在我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封锁监视下，犹如瞎子，对我军的这一重大作战行动毫无觉察。敌师长马励武在元旦那天离开指挥位置去峰县过年未归。战斗一打响，敌军就失去了统一指挥。我军动作迅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各守备要点，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仓皇应战。经过连日激战，到 1 月 5 日下午 3 时，敌军除 7 辆坦克钻隙逃往峰县外，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 3 万余人全部覆灭。在我围歼这批敌军的过程中，枣庄和峰县之敌曾各出动部分兵力东援，均被我击退，并歼其一部。敌整编第三十三军也以一部兵力至横山一带略作骚扰即南撤。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按预定方案是乘胜寻歼敌整编第三十三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峰县。1 月 3 日中央军委也来电指示，歼灭整编第二十六师后，应彻底消灭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部及其所属整编第七十七师，然后看情况再将整编第五十九师歼灭或招降。但此时情况发生变化，敌整编第三十三军见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被歼，已于 5 日全部退缩到运河以南，背

靠徐州，依托原有工事防御。峰县、枣庄守敌也调整了部署，增加了兵力，加强了防御设施。此外，整编第六十四师一部已进抵韩庄，整编第二十师已接防临城（今薛城），整编第十一师正由宿迁向徐州东北转运中。战场敌情的变化，要求我军的作战计划也必须立即变更。我便向陈毅同志提出在战役第二阶段同时攻取晖县、枣庄的建议。陈毅同志立即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对下一步作战部署拟出了具体方案，我们的这一作战方案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攻打峰县的战斗进展顺利。1月9日晚发起攻击，至11日凌晨1时，全歼守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也在这里被俘了。

攻打枣庄是一场城市攻坚战。在战斗过程中一度比较紧张。当时攻枣进展缓慢，而敌欧震集团的3个整编师已推进到新安镇两侧，其中两个师距枣庄仅15至20公里。我在分析战场情况之后，决定增加兵力，首先攻克枣庄，尔后全力对付欧震集团，以避免两面作战造成两头皆失。恰在此时，军委来电指示我们以一部兵力打枣庄，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集团。根据当时情况，如这样变更部署，不但难以迅速攻克枣庄，而且也无足够的兵力歼灭欧震集团。我正在准备把上述想法上报军委时，又接到军委新的指示，明确提出推迟两周后再打欧震集团。这又一次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战场形势的了解是非常及时和准确的。于是我们按原定决心和部署，仅用了20小时就攻克了枣庄，全歼守敌。打下枣庄，使我军获得较大的自由。打，可以全力以赴；休息，可以从容不迫。我军休整了半个月后，战局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纵深发展。根据敌情新的变化，我们放弃了南打欧震集团的计划，实施大踏步后退，主力北上，胜利地进行了莱芜战役。

鲁南大捷，是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陈毅同志指挥下，山东、华中广大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这次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我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5万余人的新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在以后作战中，进行莱芜、泰安、孟良岗等战役时，就主动得多了。

（摘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97—450页。）

4 正太线上凯歌传

1947年，从保定南面的望都，经定县、新乐，直到石家庄北面的正定，约250里的铁路线上只有敌保安第五总队侯如精部6个团驻守，即使加上这些县的“自卫队”，力量仍很薄弱。于是，我们决定抓住这个战机，歼灭这部分敌人。

1月20日，四纵和独一旅的指战员们，在风雪中向保定南面的敌军据点发动进攻，从而开始了保南战役。这天正是旧历除夕，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军会在除夕出击，军官们正在花天酒地地过年呢！因此，我军一进攻，敌人就乱了阵脚，没费多大周折，王京和望都就被我军一鼓作气地攻克了。望都守敌一个团又一个营向东逃到于家庄地区，被我军歼灭。

当天，肖克、罗瑞卿同志和我一起乘吉普车到望都周围察看地形、了解情况。根据了解的敌情，我们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应该乘胜扩大战果，继续

挥师南下攻占定县，控制从保定到石家庄间的全部铁路线。聂司令员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决定命令第四纵队主力立即分路秘密南下至定县、新乐之间，歼灭敌侯如墉部，攻下定县县城，控制平汉线的保（定）、石（家庄）路段，以切断敌人运输线，并利于我军今后机动作战。接着，军区把这一行动计划以电报报告了中央军委。

不久，毛主席回电，就打歼灭战问题作了指示：

一、以小部兵力箝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箝制方面。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

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如何打歼灭战，讲得十分具体，这对我们以后的作战部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希望我们检查过去的作战经验，争取打几个大歼灭战，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鞭策。

28日，我第四纵队向定县县城发起总攻。城内守敌有第五总队的的一个团、县保安警备队和曲阳、唐县、定县、安国等地的“还乡团”，共约3000余人。我军发起总攻后，分数路突破敌防，攻入城内。敌人一看大势已去，便兵无斗志，慌忙出西门向北夺路而逃，被我第四纵队歼灭其一部于城郊；另一部2000余人继续向北逃窜，逃到望都东面的阳城地区，被我第二纵队全部歼灭。这样，我军解放了被汉奸侯如墉长期占据的定县县城。

在保南战役中，我军攻克了望都、新乐、定县3座县城，歼、俘敌共8200余人，控制了200多里铁路，切断了保定和石家庄敌军的联系及其补给线，并使我冀晋和冀中两个解放区联成一片。

敌人在保南失败后，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翻本，便把罪恶的目光转向保北。他们乘我军主力南下之机，于2月6日蠢然进犯易县。为了诱敌深入，便于围歼，我军主动撤离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敌九十四军进入易县西南的塘湖，五十三军则进到姚村策应。由于敌人两个军猥集一起，因此我们原定在塘湖地区歼敌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军区所在地从冀西迁到了冀中的安国。

安国的夜晚，十分宁静。军区领导所往的舍二村更是静谧得出奇，只有屋外哨兵的轻轻走动声，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革命的军营。

月光透过树枝和窗框，照在床前。我躺在床上，虽然身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总是翻腾着中央军委对我们的批评意见。

因为，我们来到安国后不久，就接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电报针对我们前一阶段作战的情况作出批评和指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应该学习和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十分重要，对我们的批评严肃而中肯，切中我们前一阶段作战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从去年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晋察冀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英勇作战，共歼灭了8万

余敌军，取得了自卫战争的初步胜利，但是，和其他战场上的兄弟部队相比，我们的战绩有较大差距，主要是歼灭敌军还不够多，没有打出对敌我双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胜仗。军区领导在学习和讨论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指示后，于2月23日复电军委，除检查了前个时期仗打得不理想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汇报了拟以两个纵队向北进迫平津、尔后转向青（县）沧（县）的打算。

于是，在聂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领导同志的指导下，参谋部门根据军区干部会议决定的作战方案，制定了正大战役实施计划，计划预定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以第二、第三、第四三十纵队全力进攻并歼灭石家庄外围（包括正大线东端的正定）之敌；尔后以主力向西攻歼获鹿、井陘、阳泉、平定、寿阳等地守敌，控制正大铁路，并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援兵。

4月8日，各纵队全部到达石家庄外围地区。次日凌晨1时，我军的炮火划破夜空，打响了石家庄外围的战斗。

在石家庄外围，驻守着敌第三军第七师的十九团，第三十二师的九十五团、九十六团及敌保安第五总队和保安团、还乡团共1万余人。这些敌人凭借着日伪时期构筑的数百个碉堡负隅顽抗。

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攻这些据点的守敌。

杨得志、李志民同志率领第二纵队，杨成武同志率领第三纵队，迅猛进攻滹沦河北的敌人各据点。守敌大部被歼，只有十九团的一部分溃兵逃入了正定县城。我军立即包围了正定城，控制了县城南面的滹沦河铁路桥，切断了敌军向石家庄逃窜的退路。

正定城距石家庄约30里，隔着滹沦河彼此相望，是石家庄北面的屏障。为了使战役顺利发展，必须迅速攻下正定城，一来拔掉这颗钉子，二来可以诱使石家庄敌军出援，以便歼灭援敌。11日，第二、第三纵队从四面合击正定守敌，仅用半个小时就突破了城墙。接着，我军迅速向纵深进击，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把残敌压缩到大佛寺、天主教堂和正定中学一带。12日清晨，我军发起总攻，到8时许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保安第五总队、第七师十九团残部及保安团等共6000余人，俘获敌第七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

与此同时，陈正湘、胡耀邦同志指挥第四纵队主力，在冀中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和冀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迅速攻克了石家庄东面札南面的多处敌人据点，接着，于11日攻克了位于石家庄东南约50里的栾城，俘敌800余人。四纵的十二旅则攻克了石家庄西北面的一些敌据点，破坏了从石家庄至获鹿间的铁路线。

第一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前指统计了各纵队报来的战果：经过约8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敌军1.5万余人，攻克正定、栾城两座县城和石家庄外围据点90多处，控制了平汉线上石家庄至新乐间的铁路约100里，胜利完成了战役计划的前期作战任务。

我军在石家庄外围的作战，把敌人搞得蒙头转向。石家庄守敌以为我军的攻击锋芒是指向石垣，因而其第三军主力龟缩在市区，频频向北平、保定呼援。孙连仲急忙派遣第四十三师、第一二一师、第二十二师、整编第六十二师、整编独九十五旅等敌军，向大清河北我冀中根据地的胜芳镇大肆进犯，企图吸引我军主力北移回援，以解石家庄之围。敌军在攻占胜芳后，又增派第五十三军向我方顺桥、望都地区进犯，企图袭击我军侧背。同时，孙连仲还把第二十师的第六十六团空运到石家庄，以安定陷入恐慌的守敌。

我们洞悉敌人的阴谋，决定不为其进犯所影响，依旧实施原定计划。我

们以冀中军区部队拖住大清河北的敌军，以冀晋军区部队阻击从保定南下的敌五十三军，而我野战军主力则在胜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按照战役计划迅速转入第二阶段作战。

聂司令员于4月20日将上述想法以电报报告了中央军委。22日毛主席回电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大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正在晋察冀视察的朱德总司令，对于我们的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也表示赞许，他说：“你们的这些想法，合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晋察冀来看，正大战役为尔后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从全局来看，正大战役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从东面打击了胡宗南。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肯定了我们的作战方针，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舞。

4月15日夜，我军攻克了石家庄西面的获鹿县城，守敌1300多人全部被歼。接着，三纵的第七旅和第八旅似两支利箭，迅速向西射向敌人的防御纵深。经过14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微水、井陘，占领了整个井陘矿区。

4月22日晚，我二纵的第四旅和第五旅从北面直插敌人纵深，对盂县、阳泉之间的燕龛、白泉镇、荫营等地守敌发动猛攻，到23日傍晚，已将这一地区的40多个敌人据点悉数攻占，从而把一支“利剑”直指正太路中段的重镇阳泉。

与此同时，我四纵从石家庄南面地区北进至井陘、微水一带，担任战役预备队。而三纵主力则自井陘西进，向娘子关守敌发起攻击。当我七旅攻占娘子关前沿要点南峪等地后，惊慌的敌人立即退守绵山。25日我军歼灭绵山守敌，占领娘子关。八旅乘胜攻克娘子关以西的敌人据点多处。九旅则包围了阳泉南面的平定县城。这样，我军就从北、东、南三面威逼阳泉。

阳泉有个煤矿，官和附近的黄丹沟铁矿一道，是山西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阎锡山军事工业的原料和燃料产地。所以，对阎锡山来说，阳泉既是军事要冲，又是经济命脉所在，决不能失守。为此，他将其精锐部队第三十三军的七十一师（欠一个团）和暂编第四十六师（欠一个团）急急忙忙从太原调到阳泉。这样，加上阳泉原来的敌第十总队以及由日军（日寇投降后被阎锡山收编的）组成的保安第五大队，敌军总兵力约有1.1万余人，由阎锡山的得力助手赵承绶任总指挥。同时，敌人在阳泉西面60多里的寿阳，也派驻了暂编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一师的一个团以及第八总队的两个团、第九总队的一个团，共约1.2万余人，与阳泉敌军相呼应。

根据敌情，我们作了如下部署：一、决定使用战役预备队，命令四纵主力自井陘地区迅速西进，绕过阳泉，占领芹泉、测石等地，切断阳泉与寿阳的联系，并从背后进攻阳泉。二、以三纵和二纵的第四旅从正面进攻阳泉；三、命令二纵主力经盂县向寿阳西北的宗艾地区实行战役迂回，并切断寿阳至榆次的铁路，阻敌逃窜。四、命令四纵的第十二旅留守获鹿、井陘地区，以防备石家庄敌军西援。五、命令冀晋军区独一旅向太原北面约150里的定襄县城发起进攻，同时，我以一部分兵力佯攻太原，以牵制太原守敌。

各纵队按照上述部署分别出击。三纵于27日占领平定县城后，队南、东

和东北三面包围了阳泉，二纵的第四旅在阳泉西北协同三纵封闭了合围口，四纵主力则在攻占芹泉、测石等地后从西面向阳泉之敌进击。二纵主力在攻克盂县县城后，又相继攻克了解愁、宗艾等敌据点，并打下了寿阳西南的上湖车站，从而对寿阳之敌形成威胁。

5月1日，我军向阳泉的敌人全线紧逼。这时，阎锡山被我进攻定襄和对太原的佯攻所迷惑，误以为我军“攻省城征候甚显”，命令赵承绶“速将阳泉部队集中寿阳”。赵承绶令由日军组成的保安第五大队留守阳泉狮脑山，其余敌军全部撤向寿阳。当敌军撤到测石驿地区时，被我军包围。我军奋勇歼敌，经过3天3夜激战，到4日，阳泉守敌除约有1000多人逃到榆次外，其余被全部歼灭，敌第十总队少将司令荆谊被我军生擒。留守阳泉狮脑山的敌保安第五大队大队长藤田信雄等500多名日军向我军投降。寿阳的敌人一见大势已去，便弃城落荒而逃。于是，我军相继解放了阳泉和寿阳。

接着，二纵主力沿铁路继续西进，攻克了芦家庄、段廷等车站，前锋直逼榆次。这样，我军控制了榆次以东的全部铁路线，正太战役随之胜利结束。

在这次历时一个月的正大战役中，我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共歼灭敌人的正规军第七十一师大部、暂编第四十六师、地方部队第十总队和一个日军保安大队，加上保安队、还乡团等，总数约3.5万多人，其中被我俘获的为2.5万多人。我军解放了正定、李城、井陘、平定、盂县、阳泉、寿阳、定襄等城市，控制了正太路上300多里铁路线和平汉路上约100里铁路线，使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并切断了敌人东西、南北之间的联系，从而使石家庄这个敌人的战略要点陷于孤立。这样，这次战役就全部实现了预期目的，使我区战局摆脱原先的被动局面而开始转入主动。

（选编自《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15—437页。作者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5 莱芜获大捷

1947年初，国民党军鲁南战役惨败后，以总参谋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向鲁南进犯。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并侦悉我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认为该城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全力固守；同时企图借助于军事上的胜利，对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起到一定影响，便急忙制定一个“鲁南会战”计划。在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共约31万多人，企图在临沂地区与我华野主力决战。

敌以11个整编师29个旅的兵力，组成南北两个集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我军。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20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城头一线，分3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未整编）由明水、周村一线，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另外，王敬久集团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企图阻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和华野西去。陈诚自以为兵力众多，夸口道：“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老母猪！”同时，他作了自称为“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的安排，每一路进攻之敌都以主力师为骨干，左路夹整编第十一师，中间夹整编第七十四师，右路夹整编第二十五

师等主力，平推前进，以为这就可以逃脱被各个歼灭的命运了。

在这种形势面前，1946年1月被迫反正的伪军头目郝鹏举，于1947年1月27日率部叛变，被蒋介石封为第四十二集团军，担任进攻临沂的翼侧掩护任务。

早在鲁南战役攻打枣庄时，陈毅、谭震林同志就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于打枣庄弓急需略事休整，尔后拟南下打欧震及七十四师。”而对北线王耀武部则“牵制之”。毛主席同意了 this 设想。1月下旬，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电报中央军委，报告了在临沂外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拟“先打敌右翼二十五、六十五两师，再引诱七十四师、十一师北进，再行歼击”的预案。毛主席鉴于华东我军连续获胜，一再告诫力戒急躁，不宜打得太早。1月28日电示，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来电说：“如果陈诚之进攻将于二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二月底或三月初，则我军不宜等待太久。”31日又电示：“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下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两电的基本思想，“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似宜诱敌深入”，是很清楚的。

我纵奉令于1月21日自峰县地区东开，于23日抵达马头、重坊一线。27日奉令以第二师展开于郯城以南一线，阻敌整七十四师北犯。2月1日，中路之敌攻我纵阵地，下午3时敌再度组织进攻，我即放弃邦城。2日，我纵奉令将防务移交第三纵队，北去费县以南一线。3日，第三纵队对敌展开顽强阻击，目的是要造成敌左右两路比较突出，以利我寻机先歼其两翼中的一路。谁知敌人非常谨慎，左右两路敌人不但不冒进突出，反而向中路靠拢。此计不成。

2月4日，毛主席电示：“……敌愈深入愈好，我愈打的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2月6日晚，野司命令我第二纵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7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敌右路军侧翼由伪军改编的第四十二集团军主力，生擒了郝鹏举，并有直取海州之势，以吸引敌人主力东援，再寻机消灭东援之敌。不料各路敌军竟置郝军于不顾，右路反而向后退缩，仍未能调动敌人。此计又不成。

南线调动不了敌人，野战军首长乃将主力撤到临沂以北休整，并毫不犹豫地放弃临沂，决心挥师北上，首歼自胶济线出动占我莱芜、新泰之敌。毛主席批准了这一部署。

2月8日，北线之敌继续南犯，第四十六军占新泰，第七十三军进至颜庄，第十二军进至莱芜、吐丝口镇。不但孤军深入，而且兵力也比较分散，加之第七十三军是蒋介石嫡系，第四十六军属桂系，第十二军原是东北军，内部矛盾较大，利于我军歼灭。

2月10日，华野前委决心歼灭李仙洲集团于新泰、莱芜地区。

是日，除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全军模样，于南线采取宽正面的防御，节节阻击敌人外，我军主力分三路隐蔽地兼程北上，于2月16日前，进至莱芜周围地区集结。同时，部署地方武装进逼充州，并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军将西渡运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企图。

2月15日，我军主力放弃临沂城。敌人得意忘形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在南京叫唤：“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吹嘘：“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追剿中。山东之大局指日可定。”一片喧闹声中，坐镇济南的敌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却对我军的行动发生了怀疑。他又从空中侦察中发现了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他既怕我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仙洲集团，又顾虑济南兵力空虚。遂于16日命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但是，蒋介石和陈诚却相信“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十六个旅”的谎言，判断我军放弃临沂是由于“伤亡惨重，不堪再战”、“东临大海，西际湖山，局踞一隅，流窜非易”。蒋介石并给王耀武亲笔信，判断我军“现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并有窜过胶济路、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为了吸引敌人，下使北渡黄河得有喘息的机会，而在黄河南岸将敌歼灭，以振人心，有利我军以后的作战。切勿失此良机，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17日，王耀武按照蒋介石、陈诚的命令，复令第四十六军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的第一九三师进占颜庄；第十二军除新三十六师由蒙阴寨退至吐丝口镇外，该军主力则由莱芜、口镇退至明水。王耀武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总算保存下了第十二军的主力。听蒋介石的命令，没有不打败仗的！

虽然两次敌情变化，我军仍坚持原作战方针，对新泰敌第四十六军割而下围，对李仙洲兵团部及第七十三军围而下攻，对吐丝口镇的敌新三十六师则围而歼灭之。

19日，王耀武发觉我军攻新泰、莱芜意图后，又令敌第四十六军及第七十三军第一九三师自新泰、颜庄地区星夜北撤，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迅速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根据这第三次敌情变化，野司对战斗部署稍作调整，以第八、第九纵队为右路军于和庄歼灭敌第七十七师。预定20日下午3时开始战斗，避免过早打响，影响整个战局。其余各纵队则于20日黄昏后进入战斗。但第八、第九纵队却于20日下午1时就提前打响，2时正式投入战斗，于是情况又起了变化。

敌发现其第七十七师在博山以南至和庄地区挨打，即令第四十六军于当晚自颜庄星夜撤向莱芜，并拟以一九三师两个团于21日上午自莱芜来援，接应第七十六师归建。野司遂命令第四、第七纵队于当晚插至莱芜、颜庄之间，截断敌第四十六军退路，第四纵队并参加攻击莱芜。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结果敌四五万兵力猬集莱芜城。

野战军首长得知李仙洲集团全部已猬集莱芜城后，立即调整部署，以四、八纵队为右路军归八纵队建安司令员指挥，进至莱（芜）吐（丝口）公路以东，右路军（一、二、七纵队）归我指挥，位于吐丝口及莱吐公路以西。由于二、七纵队距离尚远，要求我纵无论如何要坚持到第三天中午左右各纵赶到后，才能放敌人出城逃窜，让敌人先头到达吐丝口，后尾已脱离莱芜时，我军左、右两路大军在莱吐公路两侧夹击，在莱芜至吐丝口之间将该敌全部歼灭之。按照野司部署，一纵坚决完成赋予的任务。23日上午敌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与我纵前哨接触。我即通知六纵队在吐丝口部署拦截堵击逃窜之敌，至中午12时放开大路让莱芜之敌北窜。敌人仓皇逃窜，不成队形，拥成一团。下午2时许，敌先头还未到吐丝口，后尾已离莱芜城时，我集结位于莱吐公路两侧左，右两路军勇猛出击，我四纵队立即抢占莱芜城和矿山，切断了敌军退路，我六纵在吐丝口拦阻敌人。敌军拥挤在莱吐公路之间，被

我军猛烈炮火轰击，到处乱窜。我纵在西面一压，敌人向东面溃窜，我右路军及六纵队张开口袋，将敌人全部网住。仅仅两小时时间，即干脆彻底全歼了李仙洲集团，俘敌4万余人。

莱芜战役共歼灭敌1个指挥部、两个军部、7个整师，共5.6万余人。我军乘胜解放了胶济路西段南北县城10余座，控制铁路200余公里。

（选编自《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9—420页。作者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昆它纵队转成陕北

1 诱敌北来活全局

太阳正在下山，晚霞染红了西北高原的半边天空。

壮丽多彩的晚霞，把延安城装扮得分外妖娆。霞光洒在延安周围的千山万壑上，使这莽莽高原显得更加瑰丽辉煌；霞光抹在清凉山的宝塔上，使这名扬遐迩的古塔显得愈加巍巍多姿；霞光落在奔腾西去的延河水中，使这生气勃勃的河水泛起一江色彩斑驳的涟漪。

这是1946年11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延河边毛主席经常散步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毛主席的到来。

我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

毛主席来了。他穿一身灰色的平布棉衣，头戴便帽，脚穿布鞋，健步走来。我迎上前去，问候毛主席。

我们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问：“同志们情绪怎么样？”

我知道，毛主席问的是大家对撤离延安的看法。

对延安的守与撤，我们平时已有议论和猜测。同志们都清楚，我军历来的战略思想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党中央的意图看样子是要放弃延安的。可是，延安——这是延安啊！这不是一般的城市。它是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是革命进步的象征，是全国人民瞩目的地方。我们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延安呵！我们决不离开延安，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延安！于是，我如实向毛主席反映说：

“部队有情绪，大家都不愿离开延安。同志们认为，丢掉延安影响不好！”

“有什么不好？有什么舍不得？不就是几眼窑洞坛坛罐罐嘛？”毛主席轻松地笑着说：“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解释说。

“我们放弃贫瘠的延安，让罗贵波同志在晋东南好搞到一块肥肉。这不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

“不过，延安可是块硬骨头罗。胡宗南想啃这块骨头，是不好啃的呢！搞得不好，可要崩断他的牙齿，或是哽住他的喉咙呢！”毛主席幽默地补充说。

听着毛主席的精辟的分析和风趣横生的比喻，我很快就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毛主席说话就像他写文章一样，他可以通过一两个形象的比喻，把深刻的道理很通俗地表达出来。

“我们准备放弃延安，引胡宗南进来。”毛主席看了我一眼，“当然，

此事还要做好同志们的工作，要做好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要告诉同志们看得远一些，想得透一些。”

毛主席停下步来，眺望着远处的延安城。他那饱含深情的双眼，似乎有点湿润。看得出，他虽然劝我们对放弃延安要想得通，但一旦真要放弃延安，他自己也是恋恋不舍的呢！

放弃延安，战略撤退，胡宗南一进来，延安可就要受蹂躏了，我不由得愤愤地骂了一声：“这该死的胡宗南！”

“怎么，你不喜欢胡宗南？”毛主席脸上恢复了平静，微笑地问我：“你不喜欢胡宗南来延安城？”

“当然不喜欢！”我不假思索他说，“您也是不会喜欢胡宗南真来延安的。”

“不！我喜欢。我巴不得他早点来，来多一点人才好呢！”毛主席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略带忧虑他说：

“胡宗南如果是聪明的，就不会来，如果是愚蠢的，就肯定会来。他要真不来，我还要想办法请他来呢。”

听毛主席这么一说，胡宗南要是真的不来延安，我们这“骨头换肥肉”还换不成呢，刚才我还怕胡宗南进延安，现在也有点愁他不来了，毛主席见我真犯愁了，便笑着安慰我说：

“你放心。胡宗南貌似有点小聪明，其实是个蠢家伙。”

毛主席顿了一下，右手用力一劈，作着结论说：“反动派都是愚蠢的！”

“引胡宗南进来，关起门来打狗。”我体会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此仅其一。”毛主席指出，“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牵制敌人，牵着胡宗南的鼻子，让他按我们的意图走。

说着，毛主席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又摸出一盒边区生产的人柴。他拿着人柴盒看了看——似乎是在欣赏什么工艺品似阶然后将烟点着。以前有人送打火机给毛主席，毛主席坚决不要，他说，我要带头用我们边区生产的产品。此刻，他捏着燃烧着的火柴棍。一直到火苗快要烧到手指头时才扔掉。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所以，胡宗南进边区后，我们不要立即切断他的后路，要让他多进来一点。同时，也不要急着打他，我们要拖住他，跟他打蘑菇战。要知道，胡宗南可是30万兵啊，拖住他，就可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毛主席分析了刘邓大军挺进黄河以东的战略意义，但也为他们担心：

“刘邓大军已经开始向大别山区挺进。远离后方，孤军深入，历来是兵家一忌。可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他们还是勇敢地向敌人后方挺进了！”

毛主席登上一个小土坡，凝视着远方，似乎是在怀念和祝福着战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多拖住胡宗南一个兵，就给刘邓大军减少了一分危险。他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挺进大别山，打开新局面！”

啊！原来是这样！听完毛主席一席话，我又一次为毛主席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为了实现刘邓大军的战略转移，为了解放战争的全局，毛主席宁愿自己多拖住些敌人，以减轻战友的负担。

望着巍巍宝塔山，看着毛主席的魁梧身材，在阳光的辉映下，我仿佛觉得毛主席的身影更高大了。

（选摘自《回首当年——方志纯回忆录》，江西人民出

版社 1987 年版，第 311—314 页。作者时任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2 用一个延安换得全中国

1947 年 3 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白白送掉 65 个旅之后，仍然野心不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仅陕甘宁边区，敌人就调集了胡、马军 23 万多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毛主席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直到一年以后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的时候为止。

3 月 10 日下午，我们新四旅所属的十六团突然接到命令，星夜开赴延安，准备歼灭胆敢空降的敌人伞兵。

这时，延安早已开始了有组织有秩序的疏散，医院、学校、商店都撤退了，群众正进行坚壁清野；但是看外表，延安的模样并没有什么改变，宝塔巍然屹立，延水悠悠长流，民兵整队操练，驮骡运送物资，还有人赶着毛驴往地里送粪。一切井井有条，从容不迫。熟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还没走哩！”以此互相鼓励。这一句简短的话，充分地体现了人民对领袖的信赖和必胜的信念。有毛主席在，人们心里就更踏实，任何艰辛困苦也能承担得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却也给我们增加了心事：担心领袖的安全。3 月 13 日，前方传来消息，胡宗南军队沿着咸榆公路，全线北犯。随着，敌机即对延安狂轰滥炸。14 日清晨，又有 40 多架敌机闯入上空，轮番投弹扫射。延河喷着水柱，遍地雾气狼烟。轰炸目标集中在毛主席的住地王家坪。听说主席还没走，我们越发不安。旅和团的指挥员们怕有意外，便冒着敌机的狂炸，到延安周围的山上去视察工事。民兵也都上山警戒。可是，敌人的伞兵并没敢来。太阳落山，敌机走后，我们回到旅指挥所，正要探问主席的情况，电话铃忽然响了，毛主席要接见新四旅团以上干部。刹那间，我们一切的担心、挂虑，都为这一喜讯所代替了。

初春天气，仍有余寒。背阴地，还堆着积雪。我们顺着延河，到了王家坪。虽然我见过毛主席好多次，然而在敌人即将兵临城下的时刻，又一次亲聆主席的教导，使我感到难言的激动。原来听说白天大轰炸，河滩上飞来好几块石头，把主席院里的老槐树削去了一大块皮。但当我们来到的时候，这里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了。

警卫员把我们引进屋子。那是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窑洞，最触目的是墙上满匝匝地挂着地图，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记号，纵横交错。不一会儿，毛主席笑吟吟地从里间出来了。主席走到我们跟前，跟大家握手，和蔼可亲他说：这次叫你们来，是为对付敌人伞兵。不过，敌人的伞兵可能不敢来。这里有我们的军队，又有广大群众，他们来以前，先得想一想，能不能回去！他来也好，不来也好，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这叫有备无患。

主席神采焕发，看上去比前两年健壮，在他的目光里，带着深沉而亲切的微笑。而此刻，主席那种安详泰然的神态，就像磁铁一样，紧紧抓住了我们。随后，主席开始询问部队情况。旅政委黄振棠同志回答说，部队经过西华他战斗，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战士们坚决表示要狠狠打击进犯的敌

人，哪怕战到最后一人，我们也要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主席听到这里，点头微笑着说：这个决心很好啊！延安是要保，我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要有这个决心和勇气，才能打胜仗，现在要给全体同志们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保。于是主席又反复说明，作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席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史实为例，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反五次“围剿”时，我们有些同志，把不放弃一寸土地的政治口号用在战术上，不管自己的力量大小，和敌人生杀硬拼，这是错误的。寸土必争是对的，但是要看怎样争。主席又接着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真理。从全国战局、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看，暂时放弃延安，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过去8个月内，蒋介石已损失了60多个旅，他能用于进攻解放区的机动兵力已越来越少，因此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在解放区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行“重点进攻”。这正表示蒋介石已走进穷途末路，离灭亡之日不远了。主席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个账：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共218个旅，过去8个月，平均每月被歼8个旅，如果以后几个月，还保持这个平均数，那末，等到歼敌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主席问道：“一月歼敌8个旅，你们看有把握吗？”我们连连点头。只是想到延安可能暂时要放弃，心头微微感到一些沉重，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这时，十六团团团长袁学凯同志忍不住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主席笑了：“你完全可以放几枪！‘运输队长’要来，我们总要放几枪欢迎他嘛！……”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继续说：几个窑洞，你们都舍不得，将来人家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都给你们，就会舍得吗？那些大城市，都是我们的。蒋介石心疼也没有办法！

于是主席又十分详尽地为我们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敌人侵占延安后，可能要趁机宣传他们的“胜利”，去迷惑无知的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大好形势。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已异常深刻化，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办法，都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目前全国正面临着人民大革命高潮的前夜，我们要用百折不回的毅力，去克服所有的困难，促进新的高潮很快到来。听到主席精辟透彻的分析，我们的心胸随着也变得开阔了，那种沉重的心绪，霎时一扫而光！主席专注地看着大家，他又说：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夺得主动，山东经过莱芜战役，情况也好转了。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所以我们宁可负担重些，把敌人拖住。不让它走，还要歼灭它！

在座的同志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都活跃起来，互相交换眼色，并且敏感地猜测着，是否会从别的战场调部队来。只听主席说：消灭敌人就靠你们！敌人有23万，我们才2万多。2万多人要消灭20多万人，是有困难的。要战胜敌人，得有正确的作战方针。现在，就靠你们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让敌人围着团团转。这种办法就叫“磨菇”战术。陕北山高路隘，你们牵上敌人去爬吧，等它爬够了，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它。一月歼灭它一到两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不同了。你们一定要拖住敌人，让它们陷在这里拔不出脚。……我们都一起留在陕北。说到这里，主席看出我们有点担心的样子了，又笑了笑说：你们一定会担心我的安全，这不必要。陕北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完全有保障。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听了这些话，我们周身热呼呼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虽然讲了很多话，主席始终毫无倦容，话语里时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主席在跟我们倾心交谈中，不论是什么问题，总是谦和地问问大家：“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我们心里，有时我们还不明确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听了主席三两句话，立刻豁然开朗。后来，主席又问起西华他战斗的情况。我们曾听说，战斗打响那天，主席整夜守着电报机，没有合眼。我们部队那天夜里冲进敌人阵地，捣毁了敌人的指挥部，把敌人赶得到处逃窜，最后 1000 多人，躲进土产公司。天明，毛主席传令嘉奖。这时，我们才知道，敌旅长已被击毙，副旅长、参谋长都受重伤。主席得到胡宗南委派新旅长的消息，又立刻转告我们。可是我军已开始撤退了。现在提起这次战斗来，我们仍感到有一些不安。我说：“虽然缴获很多，击溃了敌人，但是仗没打好，没有全歼敌人，对不起边区老百姓！对不起党中央和主席！”主席说：你们打得很勇敢。如果能坚持到最后 5 分钟，敌人就跑不了。又说，西华池敌人已挖好工事，不利我们进攻。我们部队善于野战，敌怕野战，如果选择合水与西华池之间，在运动中发起攻击就好了。主席又说，一个指挥员，不仅要善于捕捉战机，而且要善于坚持最后 5 分钟。最后 5 分钟，常常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主席深刻的分析，简直是给这次战斗作了全面的总结。从这里，主席又谈到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以及一些战术问题。根据敌我条件，我们今后仍然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个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当时我们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思想，愿意打强敌，打硬仗，觉得这才能对战局起决定作用。主席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主席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劣势，因此就决定我们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孤立的，后打集中强大的。你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好比三个人，有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打倒，剩下一个，前后失去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变成弱手，一打就倒。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主席每句话，都这样浅近明白，然而又这样发人深思，里面包含的革命辩证法是多么丰富，又多么深刻！以前学习主席著作，许多道理当时好像也很明白，但每次深入钻研，总还会发现新的东西。主席亲切的教导，今天又大大扩展了我们的眼界。

整个晚上，电话电报不断，秘书们出来进去。主席处理完一件事情，又全神贯注地跟我们交谈。如果不是警卫员一再提醒去吃晚饭，谁也不愿离开座位。饭桌上除了几样素菜，主席还特地嘱咐为我们做了些腊肉。我们知道主席平日生活极其简朴，受到这样的款待，心里深感不安。主席说：这些东西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样样自己动手，做到丰衣足食。可是胡宗南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来打我们。他要来延安，就请他来吧！我们把窑洞扫干净，桌子椅子放端正，茶壶茶杯摆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

饭后，主席又留我们坐了一会，谈到一些具体问题，主席指示我们，要带好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也是农民，是受压迫的。要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了解了为谁打仗，就会勇猛杀敌。还要注意纪律检查，加强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要把党的政策跟战士们讲清楚，革命战士只有用党的战略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打胜仗。主席事事体察入微，给我们留下亲切难忘的印象。不知下觉，时间已过了夜里 12 点，主席仍不知疲倦他讲

述着。我们感到温暖、愉快，一点舍不得离开。可是时间太晚了，主席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处理，我们只得起身告辞。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又谆谆嘱咐说：“回去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

这一晚上，我们感到脑子里就像滤过的清水一样，明澈、纯净。领袖不仅为我们展出了胜利的前景，而且也指明夺取这个胜利，要通过什么途径。我们坚信，纵使敌人还占着暂时的优势，我们也有办法有把握打败它。因为引导我们的，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节录自程悦长：《记陕北三战三捷》第一部分，见《星火燎原》8。作者当时为西北野战军新四旅副旅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3 难忘的一次谈话

1947年的春天，我们西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日日夜夜和进犯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匪军战斗着，保卫着亲爱的党中央、毛主席和革命圣地延安。保卫延安的战斗，已经激烈地打了6天6夜。我们新四旅在陇东西华池战斗胜利结束以后，正驻守在延安近郊，掩护党中央、各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3月18日下午，我正在团指挥所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忽然接到电话说：毛主席要接见旅首长和我们。开始我真以为自己听错了。在这样紧急的局势下，有多少重大的事情要主席亲自处理呵！主席怎能抽得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呢？

原来，那天上午，从我团调到党中央做警卫工作的阎长林同志来看望我们。闲谈间，大家流露了渴望看到毛主席的心情；谁想主席知道后立刻就答应接见我们。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我立刻向旅首长报告了，并安排了一下工作，急忙和同志们一起向王家坪走去。

延安虽然经过敌人几天的疯狂轰炸，但除了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些弹坑以外，看起来比以往更加雄伟可爱了。宝塔山上的宝塔还是那样高高地耸立，延河水照旧哗哗地流着，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延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镇静地、非常有秩序地疏散。扛着各式各样武器的民兵游击队迎面而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老乡们吆着驮载粮食、物资的牲口，不慌不忙地走着。……不知怎的，一想到我们很快就要撤离延安，心里总有一种难言的滋味，不甘心白白把延安让给敌人。感到好像对党、对毛主席没有尽到战士的责任似的。毛主席最近身体怎么样？一定很忙、很辛苦。……我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毛主席的住所。

阎长林同志飞快地跑了过来，笑嘻嘻地敬了礼。大家见了又兴奋，又埋怨他：“我们不过是说说，你倒认了真，给主席找麻烦。”阎长林辩解着：“我也只是随便向主席谈起，谁知主席立刻就答应了，要我马上通知你们。”说着到了门前。江青迎了出来，把我们让进房里，一面拿烟倒水，一面说：“主席正在批阅文电，不能亲自来接待大家，请大家稍等一会，他说很对不起你们。”主席多么忙呵！我们听了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天色暗了，房里点燃了一盏油灯。灯影底下，我看出这是陕北最普通的那种房子，里面通着窑洞。房内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都已半旧了；两只延安造的沙发，看来也已经使用过多年；墙上挂着一张地图，

上面画满了用红蓝铅笔作的记号。陈设虽然简单，却又非常整洁，适宜。主席就在这里待客、吃饭、工作；我们最亲爱的领袖，就在这样最简朴最普通的房子里，做着震惊整个世界的伟大事业！

忽然，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从房里走了出来。当他那魁梧的身材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的眼睛顿时明亮了，房间里也好像忽然明亮了，我的心激动得怦怦地跳起来。主席顺手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子上，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让你们久等了。”随即又幽默他说：“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说着就爽朗地大笑起来。主席的胸襟是这样博大开阔，由不得我们也跟着笑了。

两位旅首长曾在党校学习过，听过主席讲课，想不到主席还清清楚楚地记着他们的名字。旅首长见过主席以后，又把我们介绍给他。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炯炯明亮的眼睛，亲切地端详着每一个同志。我双手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一股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血液沸腾，千言万语涌到心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座以后，主席像待亲人一样请大家吸烟：“两种烟随便吸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给咱们的呢！”说着又愉快地笑起来。主席的笑声立刻感染了我，使我原先的紧张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这时看清主席的身体很健康，穿着一身延安织造的粗呢制服，圆口布鞋；虽然工作那样劳累辛苦，脸上却没有一丝倦容，神采奕奕，透着健康的红润。

主席点燃了一支烟，问旅首长部队在西华池打得怎么样，伤亡大不大？战士们情绪好不好？旅首长——作了回答，并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了部队目前的情况。主席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轻声地插问一句。听到战士们打仗英勇顽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延安的决心很大时，主席连连赞许说：“好！”然后又问大家：“我们要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些什么意见？”旅首长告诉主席：指战员们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保证绝不让敌人进延安。主席听着听着，好像是看见了我们的心，接着就问：“你们又有些什么想法呢？”我老实地回答主席：“一枪下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主席听了笑着说：“你可以放枪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停了片刻，主席又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说到这里，主席又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里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蔑视。笑声感染着我们，大家也跟着欢畅地笑了。主席接下去说：“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听到这里，我真感到有些惭愧，自己的眼光太短浅了！只听主席继续说道：“你们这些干部，首先要把问题想通，然后才能给战士把道理讲清楚。只要战士们认清了目前战争的形势，懂得了党的战略，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胜仗。”主席接着给我们仔细讲解了目前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谈到从1946年7月以来敌人损兵折将的数目，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不得不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又谈到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失败和危机，谈到中国人民的胜利下会很远了。……主席的分析是那样精辟、

透彻，说得又是那样通俗动听，时而插上句把幽默的笑话，那样引人入胜，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很高的思想境界。大家都生怕听漏掉一个字。一句话，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自己。直到有人来请主席去接一个要紧的电话，大家才又回过味来。

曾经听人说过，听一次好的谈话，要胜过读十年书。对于我来说，听了主席的谈话，岂止是胜读十年书，而是学到了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到了无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使自己感到立刻聪明了许多。原来纠缠在头脑里的许多问题，撤离延安的那种不愉快情绪，一下干都无影无踪了。顿时眼也明了，心也亮了，浑身无比舒畅。

主席接完电话回来，兴致还是那样高，问我们：“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大家齐声回答说：“主席分析得极好。”主席又燃着一支烟，笑盈盈地望着我们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人民永远都是我们的，我们怕什么！你们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望着主席，都愉快地笑了。主席接着说：“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暂时都会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主席又举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许多生动事例，说明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历来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必然取得胜利。望着主席宽阔的前额，智慧的眼睛，聆听着他的亲切教导，我好像已经看见胜利的红旗在到处飘扬，心里感到十分兴奋。

这时，阎长林同志已经再一次催主席用晚饭了。主席邀请我们和他共用晚饭。

晚饭端到桌子上，大都是一些素菜：土豆、萝卜、白菜，只有一两盘里面看得到有几片肉，再就是小米干饭和黑面馒头。主席望了望这些菜，又诙谐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过得怎么样？吃的是不是有点特殊呵？”这一次我却笑下出来，心里不禁暗暗埋怨起阎长林同志来：为什么下把主席的饭食调治得好一些！谁知阎长林听了主席的话，反而忍不住在一旁悄悄地告诉我们：“这还是为了待客额外做的，主席平时连这样的菜都不许做呢……”我听了真心痛，止不住眼睛发酸，看不清主席的面孔了。只听见主席慈父般体贴地问：“战士们生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广旅首长激动他说：“战士们生活很好，请主席放心。”主席一面点头，一面又嘱咐说：“一定要注意战士们生活，让战士们吃好，睡好，讲卫生，不生病。”

主席一碗饭还没有吃完，又有人来请他审批一件急电。主席立刻放下碗筷，离座去处理。看到这种情形，谁也吃不下去饭了。

主席日日夜夜为党、为人民操劳辛苦，废寝忘食，自己的生活却还这样的艰苦朴素；对人民军队、对战士、对同志却又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慈爱如父母，亲如骨肉兄弟。主席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真是我们全党全军最好的学习榜样呵！

用毕晚饭，已是九点多钟了。心里还想在主席这里多留一刻，但是看见主席这样辛苦，工作这样忙，又想早些离去，好让主席好好休息，大家便向主席告辞。主席连说：“不妨事，很愿意和同志们多谈谈。”又谆谆教导我

们说：“要好好学习。你们都是些老同志，作战勇敢，革命事业心很强，一切都好，就是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低一些。如果不好好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又说：“做一切事情，干部都要走在前面，今天打仗是这样，将来建设也是这样。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打胜仗。”临别的时候，主席再一次嘱咐我们要给战士们讲清撤出延安的道理：“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

怀着万分依恋的心情，我们向主席告别，请主席早些休息。主席一面和大家握手，一面满脸笑容他说：“好呵，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出了主席的住所，一路走，大家一路回头，两眼直直地望着主席房里的灯光，直到一点也看不见的时候。谁都不说一句话，大家都在默默地回想着主席的接见，回想着主席的声音笑貌。回去以后躺在床上，我反复地温习着主席的教导，一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上午，我军便主动地撤离了延安，部队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胡宗南“三天占领延安”的吹嘘破了产，只是在7天7夜激烈的战斗以后，胡宗南付出了伤亡5000多人的重大代价，才得到了一座空城。走在路上，我们听见延安传来猛烈的炮声，胡宗南还以为那里屯有解放军的重兵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早已按照毛主席的预定计划，埋伏在青化砭一滞，等候胡宗南匪军前来送死了。

毛主席的教导传到部队以后，指战员们也像我们一样，立时增添了无比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仅仅在撤出延安8天以后，我军就在青化砭一举歼灭了胡匪的三十一旅，活捉了旅长李纪云。20多大以后，敌一三五旅又在羊马河被我歼灭，旅长麦宗禹也被活捉。又过了20大，我军又攻占了胡匪的补给要地幡龙镇，歼灭敌人最精锐的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的命运也是当俘虏。不过短短40天时间，三战三捷，就取得了歼敌2万多人的伟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年月，主席一直没有离开陕北，是他亲自在这里指挥着西北战场和全国各战场的战事。有时听说主席在隆隆的炮声中部署作战，有时听说主席在火线上慰问伤员，有时又听战士们说见到了主席。每当我们想到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勇气百倍地去夺取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仅仅过了一年一月零几天的时间，延安就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也仅仅是两年的时间，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胜利地进入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了。主席的预言是多么灵验呵！主席的军事思想有着多么巨大的威力呵！

（袁学凯：《英明的预见——记毛主席在1947年撤离延安前的一次谈话》，《解放军文艺》1960年10月号。作者当时任新四旅十六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4 撤离延安前夕

敌人已经进到金盆湾、南泥湾一带。前方部队为保卫延安，正在激烈战斗，枪炮声终日可闻。

敌人离得这么近了，毛主席还是泰然自若，丝毫看不出要转移的意思。他看战报，批电报，给前线部队写慰问信，或者对着地图抽烟沉思，就是不说什么时候离开。

1947年3月18日清晨一起床，彭总就找我和龙飞虎同志到他的住处谈

话。他见了面就问我：“你们警卫排的人都打过仗没有？”

我回答：“我们大多是从前方调来的，都经过几年的战斗锻炼，在最近的防空中表现得勇敢、沉着。”

彭总很严肃，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没有任何表示，继续问：“你们都有些什么武器？”

“都是20响的驳壳枪，还有苏式冲锋枪。”我说。

彭总似乎满意了，疲惫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说：“人勇敢，有好枪，就一定能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我就放心了。”

我表决心似他说：“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彭总微微点了一下头，说：“敌人已经很近了，我们今天晚上就撤离延安，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河东，可是他不同意。他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中央还没有最后决定，你们务必做好留在陕北的准备。你们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意志，直接保卫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龙飞虎秘书和我几乎同时点头回答：“是！”

我心想，怪不得毛主席这几天夜里工作时间缩短了，睡的也比较早些，昨夜就是3点钟睡的，他是在改变自己的习惯，适应战争需要吧。

彭总又说：“主席一向不顾自己，你们要特别注意。在紧急情况下，他不走也得劝他走，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只要安全就行。”

我们离开时，彭总还再三嘱咐：“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一定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啊！”

离开彭总后，我们立时感到肩头担负着千斤重担……

突然，从毛主席的窑洞里传来争吵声和碗筷的哗啦声。他今天9点钟就起床了，正在吃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想着就跑过去，一进门惊呆了。饭桌被掀翻，菜饭和摔碎的碗碟撒了一地，毛主席气呼呼地抽烟，江青把李讷搂在怀里，泪水流了满脸。

原来，早上李讷在院里玩，一个警卫员逗她说：“李讷，你还不早点走哇。你听，前边正在打炮，我们跟主席马上就走了。这次走不能坐汽车，你早点走还有车坐，晚了就没有汽车了。等敌人打来，我们都去照顾主席，不能背你，阿姨又背不动你，看你怎么办？”

李讷信以为真，回去对江青说：“妈妈，刚才警卫员叔叔说，叫我早点走，还说敌人来了，警卫员叔叔只管爸爸，不管我们。”

这显然是逗小孩子的笑话，江青竟然也相信是真的，在饭桌上哭着对毛主席说：“现在敌人没有打到头上，警卫员就放出风了，把我们当成包袱，说不想管我们，连个六七岁的不懂事的孩子也不管了。我不愿意成为你们的包袱，我跟李讷先走好了。”

毛主席解释说：“他们是和孩子开玩笑，你不要当作真的嘛。”

江青边哭边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可不是开玩笑，是他们真实的思想。”

毛主席有些生气了，大声说：“我就不相信他们到时候不管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们不管，我来管，到时候我背李讷，行了吧？”

这已经够耐心的了，可江青还是听不进，哭着说：“你这么说根本实现不了，你能背得动李讷吗？不管你怎么讲，我现在就要把李讷送走。”说着，

就要拉李讷走。

一见江青这样子，毛主席真生气了，猛地把饭桌一推，说：“你怕死，你滚蛋！小孩子不能走，我就叫她在这里听听炮声。”

这样的话，毛主席几天前就说过。他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李讷答。

“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往这里打炮，你怕不怕？”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听炮声，也是个锻炼。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看到我进去，毛主席就朝外走。我也跟着走出来，陪他在院里散步。看着他气呼呼的面孔，听着房间里江青的哭声，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从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我对江青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尽管她爱打扮，任性傲慢，不少同志有意见。有时她也和毛主席闹点口角，记得一次毛主席正在写文章，不知江青说了什么，毛主席顿时火了，抓起砚台就朝江青打过去。当时，我还觉得毛主席有点太过分了。可是这一次，我在心里埋怨江青，仗已经打起来，毛主席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啊，你怎么能在这时候把玩笑当真话，制造麻烦呢？

还好，刚过午王震司令员来了。他率领的二纵原在山西吕梁军区，刚由河东调到河西，已隐蔽在指定地区，准备打好我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给胡宗南一点颜色看看。

王司令员穿一身灰棉军衣，风尘仆仆地跳下卡车，就走进了毛主席的窑洞。

没想到，江青在毛主席、周副主席跟王震司令员谈话时，又去提出先把李讷送走。周副主席不知道上午发生的风波，就同意了，说：“派一辆车把李讷送到永平镇，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到后再一起行动。”

毛主席不好说什么了，他皱一下眉头，对我说：“你叫一辆车，帮助把孩子的东西准备好，请保育员李文芳同志带孩子先走。”

当一切准备妥当，就要开车时，毛主席走出来，和孩子握手，又抱住她亲了一下，说：“在路上好好听阿姨的话。”

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又劝毛主席也早点走。他不高兴他说：“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敌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送李讷的汽车开走后，毛主席又回到窑洞里，与周副主席一起继续同王司令员交谈。这时，有情报说，敌人主力部队已经过了劳山，正逼近三十里铺。远处枪炮声已响成一片。

太阳快落山时，司机们把一辆深蓝色和一辆绿色的美式吉普车开到院子门口。前一辆是美军观察组留下的，机器新，力量大，由周西林和颜再生两位同志轮流开，另一辆的司机是钟步云同志，另外还有一辆拉东西的卡车。我们忙把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东西装上车，将房内外检产一遍，该埋的埋了，该烧的烧了，又给毛主席搞来饭，想利用他吃饭的机会催他出发。他却说：“不要急，枪声还远得很嘛。把晚饭准备好，谈完话再吃。”

黄昏时，东南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敌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吴家枣园一带，离这里很近了。彭总跑步前来，焦急他说：“主席怎么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呆了。”

龙飞虎同志说：“我们已经催了几次也不顶事，还是彭总去催一催吧。”

彭总走进谈话的房间，大声说：“主席快走，敌人已经很近了。”

周副主席也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王震同志问：“主席在延安还有什么事要办吗？”

毛主席笑着说：“没有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了。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们部可以知道。”

王震同志听了，便劝说：“早一点出发吧！”

毛主席这才说：“好吧，吃饭！”

饭菜早已装到饭盒里，准备带到路上吃。听毛主席说要吃饭，我们忙又把饭端上去。秘书们趁这个机会把办公桌清理好了。

毛主席吃着饭说：“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带不了的书籍可以留下，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

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中间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毛主席吃过饭，缓缓地站起来，环顾一下屋子，不声不响地走出窑洞，来到汽车旁。我们警卫人员早已列队在汽车旁边等候。他打量着周围的每个人，眼神里流露出深情。半晌，他才像征求意见似他说：

“怎么样，咱们走吧？”

我忙打开车门，老周赶紧启动发动机，马达轰隆隆响了起来。

毛主席背着手，依然站着不动，久久注视着宝塔，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此刻，延安比我们平日见到的还要美丽，蓝色的天空，静静的群山，清清的延河，这一切仿佛都在无声挽留我们。

毛主席忽然转过身，问道：“你们愿意走吗？”

该怎么回答呢？延安是革命的灯塔，人民的希望。它已成为我们真正的家了。延安的精神，延安的光辉，将永远照耀前进的道路。可是，为了最后战胜敌人，我们不能不暂时离开它。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只有一斗信念：这不是撤退，这是出发！是新的胜利的开始！

毛主席看看站在身边的周副主席，意味深长他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本来我要在这里青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是彭总说，让部队代我看，那就这样办。同志们，上车吧，我们还会回来的！”

司机立即加了油，挂了档，汽车轮子转动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工司令员为了谈话方便，坐第一辆车，江青也坐这辆车。其他人员坐第二辆车。后边还有一辆大卡车，拉着电台，警卫部队，毛岸英同志也在这辆车上。

这是晚上6点半钟。汽车过了清凉山和弯曲的延河，缓缓向飞机场方向驶去，层层叠叠的窑洞，从人们眼前掠过。暮色已经降临了，河谷里升起了烟霭。灰茫茫的三彩上面，闪耀几颗星星，光芒投射在延安宝塔的尖顶，显得格外明亮、庄严。

（摘自阎长林：《警卫毛主席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49—55页。作者当时任毛泽东的警卫排长，
后改任毛泽东的卫士长等职。）

5 临危授命

从1947年3月11日起，蒋介石、胡宗南不断派飞机轰炸延安。13日多达25架次。14日以后，分头对富县、甘泉、金盘湾等地发动进攻。延安实行紧急疏散。

国民党飞机的炸弹给我们作了“动员”，群众很快实行疏散和“坚壁清野”，让敌人来了没有吃的。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加强对迁移至后方的党政机关和学校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边区政府成立了后方办事处，主任马锡五，委员史唯然、习仲棋、高登榜。办公地点在安塞真武洞，组织撤离工作。边区政府从13日开始，逐步撤离延安，主要负责人仍坚持岗位。

3月14日晚，毛泽东在接见守卫延安的教导旅、新四旅干部时说：“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来的。”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我军在南泥湾一线阻击胡宗南的进攻。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陕甘宁晋绥的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第三纵队（许光达旅）、第四纵队（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新编骑兵第六师）、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彭德怀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

毛泽东、周恩来在即将撤高延安时，找我谈话，要我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毛泽东说：延安的疏散工作做得很好。以后野战部队转战边区，后勤工作仍然要靠边区政府，你要全力以赴做好后勤工作，中央决定由你担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我说：后勤工作由联防军后勤部做就行了。毛泽东说：光靠联防军后勤部不行。今后的战争是长期的、全面的，后勤工作变得更重要了。只有动员全边区人民才能完成，所以决定由你来做西北野战军的后勤工作。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更有利于调动边区的力量。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任务。

3月18日晚上，彭德怀、习仲勋和我，住在王家坪。第二天，天未亮，部队撤离以后，我们最后离开。在晨曦中，我们登上了清凉山，用望远镜可以看见胡宗南的部队，从十里堡接近延安。我们翻过清凉山，过桥儿沟后沟，再翻一条梁，到达丰富川。

当胡宗南占领延安时，延安是一座空城，无一群众，除了窑洞以外，什么也没有。我们撤离时，有几垛杂草，来不及运走，也把它烧掉

3月20日，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在丰富川正式组成：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为副主任；我为后勤司令部司令兼政委，方仲如为副司令（联司后勤部长），万成章任参谋长，王士英任秘书长。

胡宗南的大军侵占延安以后，害怕我军袭击，不敢分散活动，总是以集团的方式行动，像擀面一样，一来就是一大片，而且都是沿大道行动。西北野战军当时只有2.5万多人，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采取了“蘑菇”战术，等待时机消灭敌人。3月25日，在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消灭了敌整编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歼敌2900多人，取得了序战胜利。4月14日，在羊马河伏击成功，全歼敌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共4700余人。5月2日，我军乘敌人主力北进之机，对蟠龙的驻敌发起攻击。经过三天激战，全歼敌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共6700余人，其中生俘旅长以下5700多人。蟠龙是胡宗南的一个重要补给兵站，缴获了大批弹药、武器和面粉1.2万袋，军衣4万套。

这三次战斗中的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困难。战争开始不久，粮食富足，随便到边区什么地方，动员几十石粮食不困难。伤员也不多，青化泛一仗，只有 100 多人伤亡。幡龙战斗缴获的东西，大部分分给了部队，剩下的一部分，我们从从容容地运走了。

8 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蒋介石于 8 月 7 日飞到延安，命令胡宗南在志丹、安塞地区的十个半旅 6.3 万多人迅速北上支援榆林，并要整编三十六师轻装捷径，星夜兼程，驰援榆林。8 月 12 日，三十六师接近榆林城郊，敌人的其他部队也陆续来援。我军主力主动撤出战斗，集结榆林东南、沙家店以北地区隐蔽待敌。

但情况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敌人来得很快，整编三十六师 13 日入榆林，第二天就掉头南下，15 日敌主力在绥德会合，除一部分守备绥德以外，5 个整编旅统归二十九军军长刘勘指挥，16 日由义合镇地区向佳县方向推进。

在佳县乌龙铺，有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医院，伤员较多。这个医院，本来是我们的一个后方医院，但在围攻榆林时，又变成了前线的野战医院。由于敌人迅速到来，情况万分紧急，医院需要立即转移。正值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于 8 月 16 日进入佳县地区。周恩来在乌龙铺视察工作，亲自指挥了医院的撤离工作。我们动员大批担架，连夜把重伤员转移到晋西北去。

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自恃援榆林有功，骄傲异常，远离主力，孤军冒进。17 日三十六师一部向沙家店以东的乌龙铺前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沙家店地区歼灭三十六师。18 日，西北野战军三纵队一部与三十六师一部在乌龙铺以北地区接触，展开战斗。困天降大雨，山洪爆发，部队行动不便，未能全歼该敌。

8 月 19 日，毛泽东到佳县前东原村西北野战军总指挥部，参加总指挥部的军事会议，进行作战部署。彭德怀、张宗逊、张文舟、王震和我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撤高榆林是正确的，围城的目的是要打援，一定要在沙家店把敌人消灭。毛泽东还问我吃粮是否有困难。我表示，困难可以克服。我们动员米脂、镇川等地的几千名民工和上千头毛驴，冒着敌机的轰炸，把附近各地粮站的粮食，迅速集中到沙家店一带。沙家店地区的群众，把自己埋藏在地里的粮食挖出来，把庄稼地里未熟的南瓜摘下来，供给部队。许多群众把尚未完全成熟的谷子，一穗一穗的剪下来，连夜炒干磨碎，给部队送去，保证了部队的供应。

（摘自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0—163 页。作者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建国后任监察部副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

6 巧施“蘑菇”战术

1947 年春，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被迫改为向山东、延安重点进攻。毛主席坚定而英明的方针是：“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很明显，中央的目的是要以较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敌军大量主力部队。为了鼓舞全国解放战争胜

利，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继续指导全国解放战争；同时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战争，滞留胡宗南部于西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敌我兵力大概是十与一之比：敌军 24 万左右，我军 2.5 万余人。胡部是蒋嫡系，经过长期整训补充，部队比较充实，装备也是头等的，有一定的战斗力。1947 年 3 月胡匪主力正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准备向延安进攻。

我赶到酃县，向该部队同志讲了全国各解放区战争形势很好；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意义重大。大家听到保卫毛主席，劲头很大。当时，部队正在开陇东战斗检讨会，我未参加完，即到防卫延安的主要阵地南泥湾检查教导旅设防情形。听了罗元发同志的介绍，就是子弹大少，平均每枪不到 10 发。同他们商量了部署，认真研究能防御几天，他们说 5 天。我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余裕时间。以后证明，也守了 7 天。如果有充分的弹药，当然还可能延长守备时间。以后，我仍回到酃县。

3 月 12 日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贺龙同志在晋绥，不在延安。我向毛主席说，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 2 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主席说：“很好！”同意了我的意见。以后中央又任命习仲勋同志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我为司令员，贺龙同志为西北军区司令员兼管后方。这时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撤销，周恩来同志等已从南京撤回延安。党中央秘书长为任弼时同志，军委参谋长由周恩来同志兼。此后，我离开了军委，从西北局调了张文舟同志作参谋长。我要三局配备了两个手摇马达小电台，调了几个参谋、译电员，组织了一个小司令部，全部人员五六十人。此时，胡宗南已在向洛川、宜川集结兵力，并向北推进。西北局召集了群众大会，习仲勋同志和我讲了话，动员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对敌人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号召拥护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消灭胡宗南匪军。这次动员大会是开得很好的。

在敌人进攻南泥湾的第三四天时，告新四旅即刻派人到青化砭预伏地区详细侦察了地形。撤出延安的前一天，教导旅也作了同样的侦察。他们在南泥湾的防御战斗和保护主席安全通过拐峁中，都尽了很大的责任。

3 月 17 日，毛主席已由枣园搬来王家坪住。毛主席对我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于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18 日黄昏，主席离开延安，我们悄悄地送到飞机场。敌进迫离城约 7 里处，也即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主席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向青化砭前进时，沿途都可听到延河南岸敌之枪声。在主席离开王家坪后，我即到西北局、联防司令部、杨家岭等地检查：房屋都按照主席吩咐打扫得还干净，家具也摆好了。约 9 时许，我回到了王家坪，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特别要三五八旅大摇大摆地向安塞以北撤退。我以小部兵力诱敌向安塞（延安西北）进攻，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之青化砭地区。

我军撤出延安是最有秩序的，这也证明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人民军队是何等镇静，何等可佩呵！我率小司令部从王家坪东面一条小路爬上山，向青化砭前进，当天午后到达。敌从南泥湾、甘泉进到延安大概用了 7 天。3 月 19 日胡宗南进占延安。

毛主席在 1947 年 4 月 15 日提出“蘑菇”战术的指示，要我军在瓦窑堡、清涧、青化砭地区周旋一月。从 3 月 19 日敌占延安时起，到现在一月余的时

间里，在青化砭、洋马河、幡龙打了3仗，消灭5个团、3个旅直属队。主席指示要“磨”得他十分疲劳，现在还只磨得他七八分疲劳，一仗还不能顺利地消灭敌两个旅。把打和磨，磨和打灵活地结合起来，整垮胡宗南的信心是大大地增加了。

1947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摘自《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250页，彭德怀当时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7 沙家店战役前后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梁家岔。

这里距沙家店20里路，靠山顶的东坡，只有六七户人家，一下子来了几百人，简直没有插足之地，勉强给毛主席等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崖畔上，大树下，以至老百姓放东西的小土洞洞，都住满了人。

就在中央机关夜以继日地行进时，战局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是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就已听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消息。当时毛主席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就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大反攻的号角已经响了，我们正置身在一个伟大的事变中。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它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然而在当时，仍是敌强我弱，异常艰险复杂。敌人自认为占着压倒的优势，狂妄到了横行无忌的程度。敌三十六师一到镇川堡，立刻派一二三旅向东进犯，企图与刘勘会合，迫我军背水一战，或是把我军赶过黄河。敌人得意忘形，哪里知道我军已在沙家店布下了天罗地网！

住下以后，毛主席就在窑洞里和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开会。电话排的同志争分夺秒地架线，电话很快就通了。

时间不长司令部和西北野战军总部接上了联系。原来他们就在离梁家岔十几里路的东原村。

电话机放在外窑的木桌上。我拿起电话听到是彭总的声音，就去请毛主席接电话。正在开会的毛主席十分高兴，大步走到跟前拿起电话就说：

“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是毛泽东！”这声音沉着而坚定，饱含力量和信念。自从撤出延安以来毛主席一直是使用代号，和别人交谈时也以李得胜自居，今天才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这说明陕北形势大大改观了！我们守在窑洞前的人又惊又喜，像严寒过去听到的第一声春雷。

彭德怀司令员报告了敌三十六师被围的情况时，毛主席又大声说：“好！一定要抓住他！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打好这一仗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首长们继续开会，饭也顾不得吃。墙上挂满了地图，炕上、桌上也都铺

满了地图。毛主席守着电话机，随时听取敌情变化的报告，发出战役部署的指示，随后又往作战地图上作着标记。因为随身带的蜡烛点完了，屋里只点了一盏棉油灯，灯光幽暗，查看地图非常困难。

入夜，又下起了暴雨，其势凶猛，我们的头上无遮无盖，只好顶起被子，几个人围坐在下面。谁也没有睡意，即将到来的胜利喜悦，使人忘却了一切劳累。大家谈论说笑着，不知不觉到了天亮。

雨仍未停，隐隐听见雷声。有人说是打炮，大家将信将疑，这么早就开始了吗？索性撇开顶在头上的被子，跳出来一看，一个个都变成了泥人。细听雷声，却又沉寂下去了。

窑洞里，依然亮着灯光，电话铃一阵阵响着。毛主席等首长们都是通夜未睡，作战参谋拿着资料出出进进。几乎所有的人，都围上去探听消息。作战参谋只笑嘻嘻地摆手。毛主席听见了，放下电话，走出窑洞，神采焕发他说：“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这时，敌三十六师前卫部队一二三旅向乌龙铺一带进犯，钟松发觉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于是慌忙命令一二三旅回援。一二三旅回头进入常家高山一带，我预先埋伏在这里的两个旅当即发起攻击，两个小时之内就全歼了敌一二三旅，活捉敌旅长刘子奇。我另一部，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所部阻击在佳县一带。钟松恐慌万状，急着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的把钟松大骂了一顿，叫他“固守待援”。刘戡因为“援榆不力”刚受过申斥，这一次胡宗南又令他星夜援救钟松。刘戡遭到我军阻击，生怕被消灭，迟迟疑疑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火了，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正式的战斗还没打响，敌人就乱做一团了！

得到毛主席的指示，我领着几个人飞奔上山。过时雨过天晴，一轮红日喷薄欲出，草叶上的水珠闪闪烁烁。四野静寂无声，敌机不断在头顶兜圈子。大家怀着难耐的心情捱到黄昏，仍没有听见战斗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

来人换我们回去吃饭。我回到住地，见毛主席正跟彭总通话。他整天没有离开电话机，时刻听着前线发生的一切变化。我听到毛主席正在电话上问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工事挖得怎样。

我走进去报告说：“还没有听到炮声。”

毛主席移开电话筒笑道：“不要着急，还不到时间呢！这就快了！你先去吃饭吧。”

我正吃饭的时候，西南方向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无数巨炮一齐怒吼，震得窑顶刷刷落土。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响声也能听到。人们都兴奋地吆喝、欢呼起来，首长们也走出了窑洞。山上瞪望的人，一路飞跑，兴奋地叫道：“打响啰！打响啰！”

“好！我看这回胡宗南怎么交代！”

这是毛主席的习惯语，每次取得战斗胜利，他都这样说。

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在屋内接电话，不时出来向毛主席报告，一会是敌人全部落网；一会是正在清查钟松……仅仅两个小时，就全歼了敌整编三十六师。胜利，在人们的期盼和预料之中到来了！至于它的伟大意义，正如新华社为此发表的评论说的那样：“三十六师的被歼，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到自食其果的时候。”

我知道毛主席要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去开会，就去看他休息了没有。见

他正忙着看地图，思考着，既没睡觉，也没吃饭。经我们一再提醒，才少进了些饮食，又匆匆赶到了野司驻地东原村。

彭总、习政委和其他首长们远远地迎了出来。毛主席见了面第一句话就说：“打得好啊！”

人们都围过来和毛主席握手，有个首长说：“主席瘦了！”

毛主席笑吟吟他说：“瘦了走路方便！”

有个旅长说：“主席啊，你们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真担心呢！”

毛主席说：“我也替你们担心呢！那么多敌人，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个旅长说：“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它拖死！”

又一个旅长说：“我们的胃口也大了，敌人以为我们只能吃它小股，都往一处集中，恰好叫我们吃上大肉，只是便宜了刘戡！”

“不会便宜他的！还得把他拖住，来个会战。原来我们计划消灭它十几个旅以后，就可以反攻，现在还没有消灭这么多，看来敌人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恶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打我们没一点办法！我们打了这么多次，就没吃过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们想的行动。”毛主席说着挥了一下手，“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哪样想，他就哪样办，当然要吃亏了。”

首长们哄然大笑着进了窑洞。

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还挤在门外面。毛主席坐下，点上一支烟，就说：“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坳，最吃力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说到这里，他扳着手指，数着：“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已经吃掉它六七个旅，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军，活捉了他四大金刚中的三个。他们四座‘金缸’，被我们搬了三座。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座缸，叫什么……”

会场活跃起来，后面有人喊道：“叫李日基！”

毛主席打趣说：“对了，叫李二吉。这次没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还许抓不住，再算一吉；第三次可就跑不了啦！”

会场里又哄声大笑起来，有人用力地鼓掌。

“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但终究很不吉，不管他们逃至何处，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讲到这里，他提高了声音问道：“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他又做一下手势，接着说：“我们一定把他们缉拿归案。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主要是在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这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上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

大家又哄笑起来。

毛主席接着说：“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漂亮的胜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接着，他又详细分析了全国战局，提出了新的任务，也讨论了转入外线

作战的问题。

中午饭，毛主席是在野司吃的。这顿饭是面条，毛主席本来不喜欢吃，但看到部队领导们抢着吃，也吃了不少。

饭后，毛主席又到村南制高点，视察了歼灭敌三十六师的阵地。彭总递给毛主席一架望远镜，同时还在一旁讲述歼灭敌三十六师的经过，诸如敌人开始在什么位置，发现我军运动时又在什么位置等。毛主席连连点头，举起望远镜看了一会，称赞地形选得好，对我军有利。还详细地询问了战斗进行、火力配备的情况，才和野司及部队的首长告别。

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机关全部转移到朱官寨宿营。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正等着，因此毛主席没有停留，就又起身上路

顺着河沟，全是石头子路，夜黑天光，马蹄时时碰出火星，一路上跌跌撞撞，20多里路，好像老走不完似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江青骑的那匹大青马的铁掌磨掉了。马没有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骑在马上当然不舒服。江青又特别爱这匹马，便下来步行。没走几步，她又说她的鞋底薄，石子硌脚，就坐在路边不走了，还哭了起来。

一时又找不到别的牲口，我心里很着急。一个女的，能跟着一起行军，走了下来，也就不容易了。可又不敢对她说什么，怕引得她发脾气。

毛主席从后边过来，在马上问清了情况，说：“骑上马走吧，很快就到了。”

可江青还是坐在地上，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毛主席看看没有别的办法，就下了马，说：“好吧，你骑老青马。”

真没想到，江青竟然站起来，骑上了老青马。

有人劝毛主席骑大青马，他摆了摆手：“我是不骑那匹马的。”

江青这样做，可把我们都气坏了。心想，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沙家店战役，毛主席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实在疲劳时，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瞌睡，电报电话一来，又把他叫醒。刚才骑在马上，他还打瞌睡呢！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没有马呀！可我是敢怒而下敢言。

没有了马，毛主席只得和我们一样步行。由于过度劳累，走起路来脚步有些打颤，看得出来，他是极力忍耐着坚持的。一个同志又劝他坐担架，他仍是不肯。我就打开手电，为他照路。这一次，他没有反对。

好不容易到了住地朱官寨，可号房子的同志说：“主席的住处在后沟，还要走二里路。”

毛主席说：“为什么到那里去住啊！”

号房子的同志说：“那里房子好，也安静。”

毛主席坐厂不走了，固执他说：“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你在这里给我找一个房子就行啦，我不愿去住好房子，”

看到这种情况，就临时腾出一孔窑，可是毛主席刚休息一会，便又召集首长们开会。

看着毛主席窑洞里的灯光，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在极度的紧张和劳累之后，甚至连片刻的安睡都难得到。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摘自阎长林：《警卫毛主席纪事》第164—172页。）

8 为警卫人员做红娘

那次江青去黄河东岸接回女儿李讷时（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周恩来安排人把李讷送到黄河东岸永平镇——编者注），带来一位负责照料李们的18岁的姑娘韩桂馨。

小韩原在卫生部系统的中央洛杉矶幼儿园工作，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李讷已经7岁，动荡的战争生活使她无法上学。毛泽东牵挂这件事，于是卫生部副部长博连漳给出了个主意，由韩桂馨负责照看李讷，以便教她读书识字。

见面那天，毛泽东照例问韩桂馨愿不愿意在他身边工作。韩桂馨回答说：“主席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事忙不过来，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地为人民办实事，我愿在主席身边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夸奖说：“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韩桂馨说：“上过高小。”

“是个女秀才么。你家是哪里的啊？”

“河北安平县。”

“银桥，是你的老乡么！”毛泽东朝我叫着，“这也叫缘分，你们握个手吧！”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立刻烧红了。

“小韩阿姨，他是我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也是安平县人。”毛泽东介绍说，“他也是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

就这样，我与韩桂馨认识了，一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接触多了，我发现她积极热情，喜欢学习，工作责任心强，人也老实贤惠。渐渐便有了一些好感。

1947年10月底，毛泽东移居杨家沟。进村时，路边有许多石碑。毛泽东每到一座石碑跟前总要停下一会，看看碑文，和我们说笑几句。

有一座石碑上刻的都是古老的篆字，我们看不懂，韩桂馨也不会看那种古字。大家请毛泽东看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抑扬顿挫地念了几句，笑着说：“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说着回过头，对韩桂馨说：“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

大家都哄笑着逗小韩。

毛泽东忽然小声问我：“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我和韩桂馨相识不久，彼此只是有好感，并没想到那种男女爱情的事。因此，我不假思索，随口应道：“不错。”

毛泽东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他说：“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我心里涌起热浪，低下头没言声，只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知心，可亲近。

毛泽东的声调变得温和而亲昵，像父亲同孩子说悄悄话：“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呀。”

我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心里十分感激。可是到了实际中，除了谈工作，我实在不会也不好意思谈那种事。

1948年5月来到河北西柏坡后，生活安定，我与小韩接触也多起来。韩桂馨除了带李讷，还帮毛泽东做些针线活。

毛泽东的衣服全是穿了多年，补了又补的，所以针线活不少。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敢给他换新衣服，甚至连买条新毛巾都不行。他擦脸擦脚只有一块毛巾。我曾劝他买条新毛巾，擦脸和擦脚的分开。他想了想说：“不要分了，现在整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分开就不平等了，脚会有意见的。”

我噗哧笑出声，说：“那就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

毛泽东仍然摇头：“帐不能那么算。我多用一条毛巾可能费不到哪里去，可是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

唉，谁也劝不动他。

毛泽东原来有一件毛衣和一条毛裤，也不知穿了多少年头，上面有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卫士们拿着去求韩桂馨。

韩桂馨抖开毛衣毛裤，看一眼就叫起来：“这么破了还让主席穿呀？今年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条件这么好，西柏坡离石家庄很近，那里毛衣毛线都有。如果买现成的怕不合身，你们就买毛线来，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叫主席穿上。”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没有毛泽东同意又不能买。阎长林便说：“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你年龄最小，什么话你都可以讲。”

这是实情。有次小韩的一位战友江燕来看她，说想见一眼毛主席，照一张相。小韩说：“那还不容易，你跟我来。”她就直接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推开门冒冒失失叫一声：“主席，你出来，跟我们照张相。”毛泽东居然听她的话，放下手中的笔和文件，走出窑洞同两位女战士合了一张影。

可是，这一次韩桂馨没有马上答应阎长林，她说：“这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小李讷的事。这些都是你们的事，不应该由我去问主席。”

阎长林说：“你跟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

韩桂馨瞟我一眼，不作声了。

我说：“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要等主席吃饭、休息或散步的时候再说。”

阎长林嘱咐我：“先侦察侦察、有机会就说，别拖。”

于是，我和韩桂馨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见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书，我们便进去谈了买毛线的事。

毛泽东望着韩桂馨说：“小韩阿姨，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找缝缝补补，帮了我的大忙。我作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小韩说：“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算能补上，穿到身上多难看呀。”

毛泽东笑着说：“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挡寒就行。”

我明白没什么希望了，就朝小韩递眼色：不要再耽误主席的时间

毛泽东见我们要走，忽然说：“你们两个就为这件事来的吗？还有没有别的事呀？”

小韩嘴快：“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

毛泽东转望我，问道：“银桥，你今年二十几啦？”

“21岁。”我回答道。

“小韩，你今年19了，对不对？”毛泽东又问小韩。

“对，19岁了。”小韩答道。

毛泽东忽然一笑：“那很好么，你们应该互相多帮助。”

我的脸立刻红了。我相信，小韩的脸一定也红了。

第二天，我陪毛泽东散步时，他悄悄问我：“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窘得光是笑。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拉住我的手，鼓励地拍拍我膀子。

我又何尝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数女同志自然就成了众多男同志竞相瞄准的目标。我知道有不少男同志托江青向小韩捎过话，而我却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托人……

终于，毛泽东帮我找到了一次“突破”的机会。

正当此时，家乡来信说，父母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拿了信去找毛泽东：“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完信，反问道：“你说怎么办？”

我低头说不出来。

毛泽东哈哈笑出声：“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你就不会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正好借口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我心里顿时一亮。毛泽东不但善于办大事，就是谈恋爱也比我有办法啊。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我找到韩桂馨，小心观察她看信的神色，试探着问：“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她越说越气短，脸孔也越红。

我的胆子便大起来，盯紧她问：“你代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

她低着头，嘟囔着：“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答应，就等……我就，就答应……”

我长长舒口气，笑了，说：“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哼，主席就喜欢你，叫别人都是叫警卫，就叫你叫银桥。”韩桂馨说着，声音忽然低下来：“现在女同志少，将来进城了，女同志多，你，你可不能变心。”

我说：“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呀。好歹我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教育别人呀。”

韩桂馨轻轻说道：“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

回到毛泽东身边，我把经过原原本本他说了一遍。毛泽东像办成一件喜事那么高兴，把我的手一拉：“走，银桥，散步去！”

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走到室外，另一只手抚摸我的胳膊，轻声说：“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

1948年12月10日，我和韩桂馨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没两天，中央办公处和各位领导在报告上写满了批示，都表示赞成或庆贺。不过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

1949年初进城后，毛泽东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他忙中抽空，对我说：“过去条件不行，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

我说：“现在多紧张呀，要建立新中国了，仪式就免了吧。”

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于是，我们便选定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举行仪式。毛泽东听说了，频频点头：“好，这个日子选得有意义。”

可惜，那天毛泽东连续开会，接见民主人士，未能喝我们的喜酒，但是吃了我们送去的喜糖。如今，我们的孩子都有了孩子。但我们永远忘不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恩情。

（节选自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

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0—107 页。作者曾任毛泽东的卫士、卫士长、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公安部干部局副局长等职。）

四、战劲敌粉碎重点进攻

1 诱敌待机，“御林军”灰飞烟灭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的 8 个月中，占领了我解放区 105 个城市，却被消灭了 71 万兵马，这就相当于每占一座城市，即须付出 7000 兵力的代价。敌军由于深入我解放区，与我解放区的全体人民直接作战，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在各个战场都陷于被动。从 1947 年 3 月起，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将进攻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再占领华北和东北。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 60 个旅，约 45 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敌人的号称“五大主力”王牌部队中的三支部队：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都部署在山东战场。整编第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御林军”，第五军则号称“主力中的主力”，分别配属于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个兵团内。首先占我鲁南山区，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继分路印临沂、泰安之线并肩进犯鲁中，寻找我军决战，妄图聚歼我军于沂蒙山区。

敌人向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 1947 年 4 月 6 日，3 个兵团并肩北犯，重心在新泰、蒙阴地区。我华东野战军原拟以二、七、八纵队南开，组成左翼兵团，出击郯城、马头地区，围歼敌六十五师，切断陇海路徐州以东交通，调动汤恩伯兵团南援，造成歼敌良机。我纵亦奉令南下，任务是与其它纵队配合，歼敌于运动之中。谁知敌军侦悉我军主力南下，立即调整部署，相互靠拢。野司紧紧抓住各路敌军尚未靠拢之际，决心集中主力，向敌两翼出击。4 月 26 日，西翼我三、十纵队攻占泰安城，歼敌七十二师；我纵攻占宁阳城。东翼出击青驼寺。歼敌六十七师 3000 余。野司拟集中兵力歼敌整十一师，我纵奉命兼程东返，谁知赶到新泰附近，突然遭敌第五军袭击。情况变化，此计又不成。

原定第六纵队和我纵、第七纵队南下鲁南、苏北，威胁敌后，创造战机。可是第六纵队经卞桥进入鲁南敌后以后，敌人除在临沂、海州间局部变动，准备阻截我军继续南下外，正面进攻的敌人还是继续进犯。南下调动敌人未成。这时候，毛主席及时指示华野：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也希望华野能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电示也指出：青驼寺一仗，“但因一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七十四师等部，失去一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耐心待机这是很对的。”

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接受了前阶段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再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我纵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

我军的这一行动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沂蒙公路一带我主力已转至泰安地区或淄川、博山地区。于是中路敌军汤恩伯兵团猖狂起来，想抢头功，前出到三路敌军的先头。其整编第七十四师更是头脑发热，他们进攻解放区

以来，还没有受到过重大打击，十分骄傲，放肆地突出本兵团序列十多里，进入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企图抢占沂水、官县县城。这就为我提供了打其一股的有利战机。

野战军首长决心打小路敌人，下这个决心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按一般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是先打强敌，这在我军战史上是少见的。而且这次战役，敌军总兵力45万人，我军只有20余万人。孟良崮战役就是不同于一般规律的特殊战役，这就显示了战役组织者和指挥员的魄力和军事艺术。敌人的弱点是明显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突出于其友邻部队之前，到达岸堤；整编第二十五师一个团进到黄斗顶山，主力在桃墟尚未出来。所以，野战军首长原拟歼敌整编第七师及整编第四十八师，改变意图为先歼整七十四师和整二十五师。最后，野战军首长的决心改得更为明确：集中力量歼灭整七十四师，宁愿放走整二十五师全部，不愿放走整七十四师一个连！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将起极大的政治影响和心理影响。整七十四师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王耀武任军长（原番号为七十四军）时，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是该军五十八师师长。日本投降后最先空运南京受降，系国民党陆军总部直辖南京卫戍部队，深得蒋介石宠爱，指该师为典型部队，命令其它部队一切训练教育以该师为标准，号称“模范军”。整七十四师全部为美械装备，较他部为优。辖3个旅，3.7万多人，兵员足、战斗力强。该师前锋占但埠、岸堤、黄鹿寨一线后，5月13日又退缩孟良崮山区，其两侧的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五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相距并不远，特别是整二十五师紧靠孟良崮地区。要歼灭该师，就必须把它从敌人第一线八个整编师中剝割出来。敢不敢吃掉它？如何吃掉它？是对华东野战军的一场考验。

5月13日黄昏，战斗开始。我一纵二师、独立师沿沂蒙公路越过重山口向纵深穿插，一师攻占塔山、尧山。至此，我一纵切断了敌整七十四师与整二十五师的联系，打退了敌整三十五师的进攻。5月14日2时，独立师攻占天马山、界牌，将敌整七十四师围在孟良崮。

5月14日整天战斗火炽。塔山、尧山被敌重占，又复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不时告急。蒋介石得战报后，亲自指挥作战。敌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狂妄地提出，要坚守孟良崮，以他为“磨心”，拖住我军，四面围攻，企图“碾”碎我一纵。于是，蒋介石严令敌整二十五师、整六十五师、整八十三师和第五军等部，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我纵各阵地均遭受敌军迭次进攻，血战竟日，整天笼罩在烟火里……

5月15日拂晓，独立师第一团和第二师第六团夺回三三高地和二八五高地，重占围攻孟良崮的有利阵地。我各友邻部队亦进逼孟良崮：第九纵队攻占孟良崮高地一处；第八纵队正围攻卢山；第六纵队已进抵垛庄；第四纵队前锋直逼五二高地。但敌各路部队在蒋介石严令下，不断向我军进逼，情况趋于紧急。敌整七十四师遭我各路大军压缩于孟良崮荒山后，在各路进援部队的呼应下，企图以五十八旅掩护向西南突围。我即令第一师第一团进抵北庄，第二师第四团进抵石王河集结，以截敌突围。张灵甫发觉我大部队抵达其周围，后路已为我军切断时，则改变为固守孟良崮及以西之六五四、五二一带高地坚守待援。

陈老总给我来电话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整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十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整七十四师这个轴心

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边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

我把陈司令员的指示转达后，纵队的几位领导同志都感到担子沉重，也感到我纵两面作战，兵力不够。我掂量了一下陈毅同志讲话的分量，下决心说：

“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一面挡住‘百万大军’，一面取‘上将首级’！我们一定要做到！”

谭启龙、何克希、张翼翔等同志都同意这样办。研究了具体部署后，我抓起电话，亲自向各师师长交代任务。

这天晚上，已是10点多钟，陈老总与我通了电话。他说：“敌整九师、整十一师已靠近蒙阴，第五军已到新泰，整六十四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十六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七十四师，则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陈老总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七十四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陈老总授权我统一指挥第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他果断地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我承担了这个指挥任务。粟裕副司令员接过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好总攻？”我回答：“需要两个钟头，下半夜一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纵、六纵已接通电话，但第九纵队同我电话还没联上，请总部通知它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1时，总攻开始，各纵队协同很好。2时，我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六团，独立师第一、三团与友邻第四纵队所部攻占五二、五四一线高地；第六团也配合出击，拂晓占领附近山头。

总攻开始以后，野战军首长几乎每隔5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战斗空前激烈，情况变化多端，电话铃声也就不断响着……

敌整七十四师不断告急，西面敌整六十五师、整二十五师在蒋介石严令下拼死支援。我纵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终于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5月16日拂晓，前线各路大军密集，哈气成云，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强大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像火山爆发。下午6时，敌整七十四师被我全歼，狂妄的中将师长张灵甫的尸体也抬下山头，山谷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敌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后，进犯鲁中的敌人全线溃退，吓得40余天不敢出战。蒋介石不怪自己无能，总是迁怒部下。战役结束后，敌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押到南京“军法会审”，敌整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也被撤职留任，“带罪立功，以赎前愆”。

（摘编自《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437页。）

2 分兵南下，沙土集凯歌高奏

1947年5月举行的孟良崮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顿挫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人暂时转入守势。但是，蒋介石尚未放弃过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继续在第一线调集了9个整编师、25个整编旅，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50公里的战线上，准备发动新的进攻。5月8日，中央军委曾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了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冀鲁豫、豫皖苏，进而进击中原的战略计划，要求华东我军在6月10日前集结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

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孟良崮战役胜利后，军委于5月22日来电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这时，蒋介石起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台进”。敌以三四个师（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了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6月19日，我们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军委22日复示：“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运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6月25日，敌军开始全力东犯，28日进至鲁村、南麻（今沂源县）、大张庄、朴里庄一线，妄图迫我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由于当面之敌十分密集，无论是寻歼侧翼之敌或直取中央之敌都缺乏条件。为避免无把握作战，我们打算以第六纵队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第四纵队奔袭费县，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以第七纵队佯攻汤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东里店一线待机。这一计划即将实施之时，接到军委29日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此电指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推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方，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这个指示，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我们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

我们立即对军委这一指示进行了研究，决定立即执行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具体部署是：（一）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这一部署在6月30日上报军委的同时，命令各部队立即于7月1日执行。这就是华野“七月分兵”的开始。

在华野兵分三路出动后，接到军委7月2日来电，除复我们6月30日电指出分兵部署甚好外，还要求陈士榘、唐亮率领的三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

“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此后，军委又决定叶飞、陶勇率领的两个纵队也向鲁西南挺进。

到了8月4日，即华野5个纵队已进入运河以西的鲁西南，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3天，军委进而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8月11日军委又明确指出：“总的意图，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显然，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当此重要时刻，华东战区面临三重艰巨任务，既要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又要支援刘邓大军进击中原，还要不大时机地转入战略进攻。

在军委8月4日的指示中，还提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

此时，我深感责任重大。自从华野执行分兵出击的新方针后，作战条件起了变化。7月上旬打得比较顺手。7月中旬以后，雨季聚然到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以致七月份中、下旬的几仗都打成了消耗仗。仗没有打好，我作为战役指挥的主要负责人，引咎自责，于8月4日午时发电向军委作了检讨。

我接到军委8月4日要我去鲁西南统一指挥的电示后，向陈毅同志提出下列意见：

（一）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是在外线，请陈毅司令员和我们一同西去，以加强领导。（二）现在西线的5个纵队，实力有所下降，为进一步集中兵力，达成战役上的优势，建议增调第六纵队到西线。（三）留在山东内线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力量可以制敌，建议组成东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二同志指挥。陈司令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将上述意见联名上报了军委。

6日，中央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决定陈毅同志和我率华野机关及第六纵队、特种兵纵队赴鲁西南，统一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种兵纵队及配合华野作战的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统称西兵团。并批准组成东兵团。

同日军委复电：“粟裕支（四日）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并且指出：“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

我们立即投入新的行动准备。我们选择的路线是，北渡黄河至山东惠民地区，从禹城附近越过津浦线，至阳谷、寿张地区。这一路都是老解放区，是我军的后方，没有敌人阻拦，由此南渡黄河至鲁西南前线。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行动中的兵力消耗，又可以隐蔽我军动向。陈毅同志还亲赴渤海军区部署。对于西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我于8月18日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建议为更有力地支援刘邓，将西线兵团作战地域扩展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并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8月24日，毛泽东同志来电答复：“粟裕同志十八日西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这样

中央军委赋予华野西线兵团的作战范围又扩展了，恢复与扩大豫皖苏解放区，与刘邓、陈谢共同经略中原的战略任务便明确了。电报中并指出：“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地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大，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赋予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

8月30日，我们接到毛泽东同志来电：“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足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接到这个电报后，陈毅同志和我认为应立即下定决心，争取早打。

9月3日晚，我们率野直、第六、第十纵队渡河，4日渡完，5日在邻城及附近集结并与第一、第三纵队会合。至此，我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特纵及晋冀鲁豫之第十一纵队均已集结于沙土集南北地区，完成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战役布局。

9月7日，敌整编第五十七师积极北犯，与整编第五师之间出现了20公里的空隙，我们抓住时机，发起攻击。令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向沙土集、双庙攻击前进，令第四、第八纵队由南向北发起攻击，实施南北夹击。敌整编第五十七师发现我军这一行动，迅速向南撤退，龟缩于沙土集地区。

沙土集一带，地形平坦开阔，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无隐蔽的开阔地上英勇奋战，冒着浓密的炮火，勇往直前，士气十分旺盛。当天晚上，我军达成对整编第五十七师的合围。

9月8日夜晚6时，我们对沙土集之敌发起总攻。经过半小时的炮火准备，第三纵队首先从北面突破沙土集围寨，进入村内与敌展开巷战。9日凌晨2时，第八纵队从东南方向突入，第六纵队从西北角突入，三十纵队逐步缩小合围圈，敌数次反扑及企图突围，均被我击退。我军一面猛烈进攻，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促敌放下武器。该师中将师长段霖茂率100余人化装逃跑，突围寨不远，被我俘虏，其余敌人纷纷放下武器。至9日凌晨3时，攻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之战胜利结束。

在攻歼整编第五十七师时，郟南阻击战打得十分激烈。我第十纵队及第六纵队之十七师，以野战阵地阻击敌整编第五师、第八十四师及第六十八师的进攻。当整编第五师进攻受挫后，曾一次出动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装甲汽车的支援下，向我八里河、侯庙一线阵地猛攻。我军英勇拼搏，予敌以重大杀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八里河、侯庙一线阵地，始终保持在我军手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

此仗打得干净利索。乱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其所辖之两个旅全部被歼，并给援敌以相当的杀伤。计毙伤敌2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段霖茂以下7500余人，缴获榴弹炮、野炮、山炮20余门，轻重机枪数百挺，尚有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仅2300余人。战役后，我军人员、武器、弹药都得到了补充。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区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4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9月11日，中央来电鼓励全军，指出：“那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中央在电报中要求我们努力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

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并且指出，“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的电报，使全军深受鼓舞。我们抓紧战后休整期间，组织学习了中央9月1日《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经过整顿思想，整顿组织，进行了南下豫皖苏的动员准备工作。9月下旬，除以第十纵队、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继续留在鲁西南箝制敌人外，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了豫皖苏。这样，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和华野外线主力部队，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10月8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文中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48个旅，约40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

1947年7月至9月，不仅是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整个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华东野战军在这一伟大的事变中，胜利地实现了本身的转折。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08—532页。）

3 明示战法，卫胶东扭转危局

1947年6月，解放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第一年作战，全国战场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军共计112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一方面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广泛的失败情绪。另一方面振奋了全国人民，为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为此，党中央、毛主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我军第二年作战方针和任务，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按照党中央规定的战略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下，于6月30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大别山区，揭开了战略大反攻的序幕。

我华东野战军胜利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之后，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以8个纵队组成西线兵团，由陈毅、粟裕同志率领，向鲁西南和豫、皖、苏边区进军，配合刘、邓大军，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另以二、七、九、十二等4个纵队和两个师组成东线兵团（后改称山东兵团），由谭震林同志和我率领，在山东境内执行内线作战任务。此时陈赓兵团由晋南挺进豫西地区，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也相继转入战略反攻。伟大的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我各路大军的进击面前，蒋介石惊恐万状，为了尽快结束山东战事，不惜一切，拼凑了在胶济线上的整编八师（原八军）、五十四师（原五十四军）、九师、二十五师、六十四师、四十五师等6个整编师20个旅的部队，组成“胶东兵团”，制定了进犯胶东的“九月计划”，

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总指挥，在海、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胶东，妄图一个月内消灭我内线主力，占领烟台、威海沿海一线，切断我山东与东北的海上联系，破坏胶东内地兵工建设，摧毁我战略后方，以便尽快抽兵支援其他战场，挽回危局。

中央军委给予我东线兵团的任务是：钳制和逐步消灭山东境内敌人，保障外线部队对敌进攻，保卫胶东后方，并逐步收复山东失地。

进犯胶东的敌总指挥范汉杰，接受以往蒋军被歼的教训，无论其兵力如何优势于我，都不敢贸然突进。他以第八、九、二十五、五十四共4个整编师并列为前梯队，两个师紧紧尾随，采取了齐头并进、密集平推的“梳篦战术”，分4路向胶东腹地逼近。9月中旬，敌人付出惨重代价后侵占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莱阳等15座县城，范汉杰得意忘形地吹嘘起“胶东胜利”来了。

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人步步“推进”，这时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150华里、南北不到80华里的狭小地区。这里聚集了华东局和胶东军区机关、部队、伤病员、随军撤退的群众和大量军用物资，越来越拥挤，造成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敌人的进攻，夺取战场的主动权，就成了扭转胶东战局的关键。

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来电向我们指示了粉碎敌人进犯胶东的作战方针。来电说，你们一部应位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歼敌，只要你们打一二个胜仗，敌人就不敢深入胶东，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就可保全。根据这一指示，我们研究决定，各分区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在胶东内地继续坚持内线作战，兵团率领九纵、十三纵掩护着华东局机关向外穿插。任务确定后，各部队都进行了动员。当时有少数同志对形势产生悲观情绪，对保卫胶东缺乏信心；有部分同志有埋怨情绪，认为主力打到外线去，不要胶东了；还有的想跟主力一起出去打个痛快，不愿坚持内线作战。经过传达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绝大部分同志克服了错误认识，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指示，执行兵团的决定。

我们选择从敌九师、八师的结合部突出去。9月22日夜，部队开始行动。在漆黑的夜里，几万人马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听不到一句说话声，看不到一点火光，只能听到蚕咬桑叶似的沙沙的脚步声。敌人的封锁线越来越近，沙沙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轻，使微风习习的夜晚更加寂静。天快明的时候，先头部队在大泽山东北方向与敌九师侧翼部队相遇，我军坚决突击，将敌击溃，几万人马安然通过。一夜急行军上百里路，从敌人的“夹缝”中穿越而过，转到了敌人后面的大泽山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和牵制敌人，兵团决定：十三纵留大泽山坚持斗争，九纵继续向西南跃进。此时，谭震林同志亦率二、七纵队由诸城北上。29日夜，二纵横扫胶济路潍县、高密段，歼敌1500余人。10月1日，二、七、九纵胜利会师于高密以西之朱阳地区，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范汉杰之流企图聚歼我胶东部队主力的狂妄计划。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时，称“这一英勇行动，扭转了胶东的战局”。

胶东内线我军突围而出，完全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骄狂的范汉杰妄断我军主力避战溃逃，不堪一击。所以，仅以九师、六十四师分两路尾追我军，其余敌人继续向胶东腹地进犯。为了彻底扭转胶东战局，减少胶东内地损失，兵团决心诱敌六十四师主力进胶河以西饮马一带，集中二、九纵将其包围歼灭；以七纵、四纵十师、独立师阻击九师及潍县、诸城、高密可能来援之敌；

十三纵则在大泽山区，北攻掖县，以为策应。

10月2日，敌六十四师先头部队进至饮马附近，主力（欠一个旅）到达胶河东岸三户山、范家集一带。我二、九纵迅速出击，经过激烈战斗，攻下三户山，包围范家集。行将就歼的敌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眼看危在旦夕，急得团团转，在报话机上用明语大声呼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被他们称为“避战溃逃”的胶东共军，会在他们的包围圈外杀他个“回马枪”，而且攻势是如此之猛，跑亦难跑，防不胜防，只能拼命固守待援。

这一着打到了敌人的痛处，果然调动了敌人。范家集之敌六十四师岌岌可危，范汉杰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只得放弃进犯胶东的计划，急忙调兵遣将分三路回师救援。一路以九师由亭口向北迂回，进攻我红石山阵地；一路以四十五师二一一旅，由潍县东渡潍河，占领山阳庄，向三户山增援。另一路以六十四师的一五六旅和四十五师的二一二旅，由高密沿铁路线向西进犯。

敌变我变。根据敌情变化，我同谭震林政委研究，决定围点打援，除留一部监视范家集之敌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阻援作战。

二纵首先迂回包围对我军威胁最大的西路援敌二一一旅。九纵的一个团南下配合。7日将该旅包围在山阳庄。二纵打得英勇顽强，经过一大多的激战，全歼该敌，活捉旅长以下8000余人。从高密西援的一五六旅和二一二旅，刚刚进至张家庄和穆屯附近，即被我七纵分割包围在几个村子里动弹不得，歼其一个团。敌整九师一开始就被我七纵十九师、九纵二十七师阻击于红石山一带。敌人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多次对我军阵地发起轮番攻击，阵地工事几被摧毁。我军指战员众志成城，人在阵地在，坚守4昼夜，使援敌与六十四师隔山相望，前进不得。范汉杰此时急不可待，又抽调进攻胶东内地的八师、五十四师等部火速增援。

至此，我军调敌回援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十三纵在配合作战中，攻克掖县，全歼守敌2700余人。四纵十师及滨北地方武装乘机南攻诸城，歼敌3000余人。10月10日，胶河战役胜利结束，我军收兵南下景芝地区休整。

从敌人进攻胶东开始到胶河战役止，我军共歼敌3.5万余人，给敌人以狠狠打击，终止了敌人最后的绝望的进攻，扭转了胶东战局，受到华东局传令嘉奖。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强调指出：“在这个战场上，我军已转入反攻。”

（选编自《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82—494页。作者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五、洞察全局部署大反攻

1 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

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经过一年的战争，敌人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但是，无论在数量上或者装备上它都还占着优势。蒋介石还在继续获得美帝国主义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有广大的统治区可供搜刮，以支持其军事进攻。敌人对我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还在继续进行：集中了31个旅共20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集中了56个旅共40万人压在山东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敌人虽已被迫采取“全面防御”，但也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兵力。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延安、临沂和张家口等还沦陷在敌人手中。当时，从表面上看，可说是乌云依然弥漫天空，局势依然严重。

但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指出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早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战争打了3个月之后，毛主席又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大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一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到1947年的2月，毛主席更进一步地指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事实正是这样，经过一年来的军事较量，敌人被我军歼灭了正规军97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余万人，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基本上成熟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的意图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看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因而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应当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主席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担负进军大别山的光荣任

务。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样式，是史无前例的。不难设想，要实现这样伟大的战略计划，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毛主席既估计到跃进大别山的有利条件，又充分估计到了到外线作战的种种困难，提出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告诫我们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除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外，还由陈毅、粟裕等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

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实施进攻，企图将南线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然后果而歼之。在其联系荫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种兵力部署，很像一个哑铃，两头粗，中间细，其中央部分就成了要害和薄弱部分。毛主席正是要我们在这里实施中央突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把渡河地点选定在鲁西南的濮县至东阿之间。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这一天险可抵“40万大军”，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用两个师直接扼守河防，另外摆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机动。为了迷惑敌人，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和支作战、主作战相配合的打法。发起渡河作战的前几天，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以转移敌人的视线；我野战军主力则隐蔽地、神速地从豫北开赴渡河地点，并派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偷渡黄河，以接应主力南渡。6月30日夜，正当豫北、豫皖苏两战场我军虚张声势、积极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东阿至濮县横宽300里的地段上，突然发起了渡河作战。在南岸我预设部队的接应下，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我一、二、三、六等4个纵队共12万大军，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敌河防部队立刻全线崩溃。

我军突破黄河天险后，经过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和4个师部共5.6万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取得了战略进攻的初战胜利，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

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不甘心于这一失败，又纠集其原在鲁西南的和新调来的5个集团共30个旅的庞大兵力，分5路向郟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施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这个被我打开的缺口。蒋介石还准备了更毒辣的一手，再打不赢，就由开封附近掘开黄河堤坝，水淹我军。当时，我军打了胜仗，士气高涨，我华东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结束了在津浦线上的攻势以后，也转出外线，开进到鲁西南，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所以，好些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权衡了整个战局，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指示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开始行动。为了

利于我主力隐蔽地突然地实施跃进，以新编成的十一纵队在黄河边佯动，造成我军渡河北迟的声势，吸引敌人继续合围；以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并决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出信阳以西，作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之敌。同时华东野战军的5个纵队也积极捕捉战机，打击敌人，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南进。8月8日夜，正当各路敌人向我合击的包围圈将拢未拢，而由南向北进击的一路已越过菏泽、巨野公路，陇海路两侧完全没有敌人正规军的时刻，我们突然甩开敌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驰，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

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国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它对大别山的围攻，形式上虽然同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围攻相似，实质上则完全相反。过去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进攻，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围攻，是敌处于战略防御，我处于战略进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而只是敌人垂死前的回光反照。同时，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在全国各兄弟战略区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援下，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围攻，把大别山根据地巩固起来。

如何粉碎敌人的围攻？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由大别山的我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向平汉、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寻机歼敌，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

正在这时，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下，及时地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援：增调来了两个纵队的兵力，送来了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还带来大批弹药、药品和银元。这真是雪里送炭，使我们更增强了粉碎敌人围攻和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信心。

敌人本来是想抓住大别山不放的，开始，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兵团在平汉线上几乎打烂了敌人的屁股，敌人还是咬着牙忍着痛不肯回师救援。但是，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月，敌人不但在大别山碰得焦头烂额，丧师减员，毫无所得，而且丢掉了桐柏、江汉和淮西广大地区，使他们的长江防线、武汉重镇和信阳基地直接暴露在我军的攻击面前。平汉、陇海两线又连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兵团的严重破击，蒋介石眼看中原不保，就不得不从大别山的周围先后调走13个旅的兵力去应付其他地区的失败局面。这样，敌人便只得退守据点，从而陷入线线被切断、点点被包围的态势。敌人在中原的全面防御体系遭到了粉碎，被迫转为分区防御，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经过严重的斗争，我们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我中原三军互相

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 19 万余人，解放县城 100 余座，在 4500 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逐鹿中原的斗争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跃进大别山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主席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非凡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

（作者刘伯承，选摘自《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82—207 页。作者当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挺进豫西

1947 年 6 月，党中央叫我到陕北去，部署四纵队下一步的行动。7 月 19 日，我到了中央的住地——靖边县小河村，晋见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这时，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我军已歼灭敌正规军 97 个半旅；敌人不但被迫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山东、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并且这种重点进攻也已遭到重大打击；我军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也在迅速前进；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敌军虽仍在数量和装备上优于我军，但士气更加低落，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后方十分空虚。敌人为了挽救其颓势，加紧了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企图把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破坏与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党中央毛主席为了破坏国民党的这个反革命的战略方针，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使敌人转入全面防御，我军转入全面进攻，决定实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我晋冀鲁豫军区刘邓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已经突破黄河天险，正在鲁西南大量地歼灭敌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并准备向大别山跃进。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也准备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挺进中原。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说明了这些情况和中央的决策，并且改变了要我四纵增加到陕北战场的原议，决定以四纵、九纵、三十八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

对于挺进豫西的行动，毛主席给了极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刘邓率领我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主席还向我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将要渡河的地方，要我们以最大的决心勇气打出去。最后，主席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现在部队上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正是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主席笑着说：“对么！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

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么！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么！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做一定能胜利。

以后，在我们进入豫西不久，接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毛主席在这个指示中，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战争形势，阐明了我军第二年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指针。

争取胜利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方针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只有使广大指战员都能认清形势，明确方针，才能上下一致，齐心努力，取得胜利。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在出动前进行了整训，深入地传达了毛主席对当时战局的分析、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讨论了打到外线去的胜利条件，并以刘邓首长亲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打出去的英勇无畏的事实教育部队，号召向主力学习，跟着打出去。同时，展开了诉苦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认清革命战士不仅要保卫解放区，而且要解放全国的阶级弟兄。

我们渡河的地带是在三门峡左右，河水湍急，渡口很少，又值秋汛，水大浪高。对岸敌人筑有坚固的河防工事，又加强了警戒。他们不仅把渡船集中烧毁，驱使其士兵日夜在河防工事中守备，而且强迫黄河南岸的居民组成河防队、听水队，有的地方甚至把狗都集中起来，随其士兵一齐巡逻，叫做狗兵。但是敌人的这些措施是挡不住决心打到外线去的人民军队的。

渡河是分左、右两个集团进行的。8月22日夜和23日拂晓，右集团在茅津渡以东，左集团在垣曲、济源间，先后发起了渡河作战。左集团的指战员，机智地利用了黑夜和连天大雨，河水猛涨，浪大声喧，对岸看不见、听不清的机会，登舟起渡。在渡船将近对岸的时候，才发起了火炮轰击。这样巧妙地把偷渡和强渡结合起来，登上对岸。右集团在渡船很少的条件下，战士们制造了十几个大油布包，权当渡船，一面射击，一面划进，冲过敌人的火力封锁，把敌人的守军打垮。有些精通水性的民兵，还组织了葫芦队；肩下系着葫芦，浮在水面，手中端着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渡船前进。由于动员深入，士气高昂，这次渡河战斗，两个集团都只用了半小时的时间，就突破了黄河天险。

当部队突过黄河后，刘邓首长所率我野战军主力已经跃进到大别山，好像一把利剑，直插蒋贼心脏。蒋介石正忙于招架，我们随后又杀进一刀。他一面被迫从尾追我野战军主力的部队中抽调三师、十五师、二零六师等部西援，和原在洛阳地区的守敌组成第五兵团；一面将分布在陕县以东的新一旅、一三五旅和二零六师一部及由潼关以西赶来增援的部队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东西夹击我们，堵住这一缺口。

这时，毛主席连续发来几个电报，指示我们要力求运动战，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并具体指出：洛阳地区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向西，乘胡宗南在西面尚未完成部署的机会，抢占陕县、灵宝、阌乡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然后以一路出陕东南，一路出伏牛山，在豫西、陕

南、鄂北建立根据地。

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反而丧失时机，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难于展开，难于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挺进，开辟广大的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认清了这种局势，对于挺进豫西的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西向作战的结果，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英明。由于执行了这个指示，我们在半个月中就全歼了敌人的陕东兵团等部 3 万多人，控制了从新安到潼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敌人的东西联系，直接威胁了西安。蒋介石急忙在 20 日飞到西安，表面上还吹嘘“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彻底打通陇海路”，实际上是提心吊胆地部署防御。他慌忙又从进攻大别山的部队中抽出六十五师，空运西安，并从陕北战场调回了一部分部队，在西安潼关间集中了十个半旅的兵力，防我西进。这样就更多地调动了进攻陕北的敌人回头，迫使敌人在陕中布防，有力地配合了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

敌人在陕中布防后，毛主席指示我们以一部出陕南，开辟陕南根据地，主力转向东进，寻歼敌第五兵团，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路以西各县，开辟豫西根据地。我们执行这个指示，又出敌人的意料之外。当我们的主力隐蔽东移到渑池以东时，敌人第五兵团还茫无所知，仍以十五师向新安、铁门，第三师向宜阳前进。10月2日，我们就势在铁门歼灭了敌十五师的六十四旅。随后，又在韩城镇一带给了回窜洛阳的第三师以重大杀伤。

此后，敌在洛阳集中了三师、二十师等 10 个旅，在潼关集中了一师、三十八师等 8 个旅，妄图再度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恢复陇海路的交通。这时，毛主席指示我们除留一部在陇海路牵制敌人外，主力应从陇海路南下，歼灭豫西各县的反动武装，开辟根据地；如敌人跟踪南下，则寻机分别歼灭之，但要打有把握之仗；并指出不要怕敌人占领陇海路，只要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灭敌人，胡宗南虽占陇海路，但兵力分散，我即能再歼敌军，重占陇海路。

主席的这个指示又是十分英明的。如果我们当时就和敌人争夺这一段陇海路，会陷于被动，难于发展。转师向南，乘虚歼灭豫西各县分散守备之敌，开辟广大地区，既能创立广大的根据地，使作战有所依托，又能东向平汉路，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这是从中原大局着眼的极为有力的一种安排，并且敌人占领陇海路后兵力分散，又便于我回师歼灭。

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10月底开始南下，11月1日至5日连克宝丰、鲁山、南召、方城、叶县、临汝、郟县、登封诸城。这样，我们的主力就胜利地在伏牛山东麓展开，歼灭敌人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到11月底止，先后建立了豫陕鄂边区行政公署和7个专区、31个县的人民政权，7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豫陕鄂根据地初步形成。

这一段作战，根据主席的指示，把进占陇海路的敌人抛在后边，把尾追的敌人扯散，开辟了广大的地区，歼灭了大量的地方反动武装。进占陇海路的敌人，由于我们留下的牵制部队的活动和铁路的彻底破坏，并未能达到恢复交通的目的，并且正如主席所预料，当我们在东面南面打开局面，大量歼敌以后，1948年3月我们回师陇海路，就配合了华东野战军一部，歼灭了洛

阳的敌人，重占了陇海路。主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等作战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使我们得到胜利。

我们在豫西展开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配合华东野战军破击平汉路，斩断敌人在中原的南北动脉，吸引大别山的敌人回援，配合我刘邓野战军主力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主力东向平汉路，并以十一旅南向桐柏，接应我十纵由大别山向桐柏展开。

12月13日，我们配合陈粟大军开始了平汉路的大破击。我们首先破击了郟城到许昌段的铁路，解放了临颖县城。接着又转向郟城以南，连克漯河、西平、遂平等城。

平汉战役，陈粟大军和刘邓大军胜利会师，我们也归还主力建制。这次战役，斩断了平汉路，使平汉路东西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并调动了敌十一师等部从大别山回援平汉路，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的战斗。从此，中原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挺进豫西，是毛主席在挺进中原中所安排的右后一路。在我们杀进豫西以后，毛主席指示我们首先西向作战，既造成继续展开的有利形势，又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进攻；然后转师向东向南，开辟广大的地区，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实践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种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在我们作战中，主席又指示我们灵活机动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当有分散之敌易于歼灭的时候就首先歼灭这些分散之敌；当敌人集中兵力的时候就设法分散敌人、消耗疲惫敌人；当敌人被分散、被消耗疲惫了以后，就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我们忽东忽西，忽散忽聚，完全主动。敌则疲于奔命，遭受歼灭。敌人陕东兵团的被歼，十五师的被歼，第三师的被歼，和以后洛阳守敌的被歼，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执行了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结果。

挺进豫西的胜利，还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

我们挺进豫西后，在连续作战的同时，积极地进行了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

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思想，指导我们把作战和发动群众统一起来。我们根据主席的这个思想，在保持主力的条件下，先后抽出了12个团作为地方武装的基干，又抽调了2000多干部作地方工作，并且发动整个部队作群众工作。当时团上都成立了工作队，各连都组织了民运小组，有的连队每个班还有民运战士。这样，就不仅迅速地铺开了摊子，并且立即展开了极广泛的群众工作。

面对着豫西官匪不分的反动统治，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必须大力地剿灭敌人的地方团队和土匪。毛主席曾指出消灭地方的反动武装，和消灭敌人正规军同样重要。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4个多月中，结合政治攻势，大力地进行了剿灭敌人地方武装和土匪的战斗。豫西的许多地区都是经过多次剿灭地方反动武装的战斗以后，才巩固起来的。

党的政策是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的武器。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我们经常地用这种思想教育部队，使部队自觉地执行

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广泛传播《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广大的农村中，党的土地改革等政策得到了农民极大的拥护，在漯河中山路上，当战士给几个贫苦的女人和小孩找来棉衣和粮食的时候，旁边的一位老先生感动得流下泪来。他向我们的战士说：“老百姓从今天起要过新日月了，这都是你们，都是这位先生给我们的呀！”他说到这位先生时，用手向墙上指着，那是我们宣传队写下的12个大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部队在发动群众工作上也有过偏差，这就是有一个时期普遍实行分地主浮财的办法。这种办法虽一时鼓舞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且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使军队粮食供应发生困难。毛主席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中，就针对着这种急性病指出，“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

毛主席关于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是争取胜利的关键之一的指示，使我们充分地认识了执行政策、发动群众的重要。以后，毛主席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就更使我们增加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能够纠正偏差，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政策的胜利。

1947年12月，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我们参加了这个伟大的转变，从自己的实践中，从挺进豫西的这个小的局部中，深刻地感到这个伟大的转变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胜利。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大量地歼灭了敌人，造成了有利的战争形势，但敌人仍在进行重点进攻，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优于我军。这时，毛主席不是等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等我军装备和数量超过敌人以后，再进行战略进攻。而是抓紧了有利的形势，果敢地实行中央突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在内线、外线的密切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推动历史车轮前进。这是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革命军队的威力，以有力的进攻来根本改变战争局势的极为英明和果敢的决策。战争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决策的正确、伟大。如果当时我们继续在内线作战，虽仍能大量歼灭敌人，但战争继续在解放区进行，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会继续受到耗损，而蒋介石则可在其统治区继续搜刮人力物力，支持其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会推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主席又充分地估计到了当时敌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优于我军的情况，因此又决定突入中原不是立即攻占敌人有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而是首先占领敌人守备薄弱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多打胜仗，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继续大量歼灭敌人，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这就在战略进攻中继续运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先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聚集力量，削弱敌人，改变敌我态势，以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思想。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所制定的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和策划，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创造，是古今战争史上的空前创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又一个光辉的发展。

（作者陈赓，摘自1961年1月1日《人民日报》。陈赓当时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

军衔。)

3 纵横中原，豫东连续破强敌

1947年6月底和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略进攻。到1947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3路大军犹如3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1948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34个整编师，共79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8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3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经过一个

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3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城市，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得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台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奋斗，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转战数省，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1/2。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威胁。第二，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4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

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共10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再则，我3个纵队在渡江后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敌3至5个整编师。两者对比，我3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4月18日我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中央在接到我的建议报告后，立即来电要陈毅同志和我一起到中央去当面汇报。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同志在那里召开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我着重汇报了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听了之后，当即进行研究，并同意了这个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对我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这个消息对我真是太意外了，我非常着急，当即再三要求让陈毅同志仍回华野。毛泽东同志又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最后我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这时我想，陈毅同志去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工作，责任重大。为了服从全局利益，我不能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了。

中央军委在作出华野3个纵队留在中原作战的决策后，5月5日下达了中原战场我军近期的作战任务，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6个纵队，全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箝制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5月23日，我们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

在进行上述部署的同时，我反复考虑到，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4个旅，并指挥10个快速纵队和10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猥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6个主力纵队，3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6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用4至5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

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之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歼灭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我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开封是当时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军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能打乱敌人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决战的部署，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第二，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当时都在100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第三，开封守敌虽有3万余人，但战斗部队中只有一个被歼后重建的正规旅，其余都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指挥不统一，或有矛盾，总的说来战斗力不强。我使用两个主力纵队近6万人攻城，在兵力数量上虽然优势不大，但论战斗力则占很大优势。第四，攻打开封这样一个有40万人口，并经过日伪军和蒋军长期设防的城市，在华野来说虽是首次，但我军在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攻克过敌重兵守备的枣庄、峄县（今峄城）、泰安、莱阳、许昌、洛阳、潍县（今潍坊市）等城市，积累了较丰富的中小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攻坚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部队熟练地掌握了炸药爆破技术。炮兵建设有了相当规模，华野有10个特种兵纵队，每个主力纵队有炮兵10个营至10个团，每个师有炮兵10个连至10个营，每团有10个炮兵连。炮兵的射击技能也有提高，不仅能进行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而且学会了间接瞄准射击。部队指挥员也初步懂得了炮兵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能根据炮兵的特点赋予任务，发挥炮兵支援步兵作战的作用。同时，第三和第八纵队长于城市攻坚战。因此，攻克开封还是有把握的。

5月24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野战军计划向淮阳方向前进。敌邱兵团果然被我军吸引南下。5月30日、31日，黄河以北我各纵队南渡黄河。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西南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六十二师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这样，敌集中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将达到9至11个整编师，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我难以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这时，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如就势转用于突然攻取开封，可打敌措手不及。战场情况的变化表明，打整编第五军的条件尚未具备，而实现先攻开封后歼援敌腹案的条件却已成熟。于是，我们当机立断，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并于6月15日定下了转向豫东作战的决心。即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的一路。

由于对这一作战方案早有准备，所以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6月17日晨，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上述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我军攻打开封的这一着棋，完全出敌人意料之外。

6月15日，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开始向开封急进，17日晨突然兵临城下，对四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我军强大攻势打得惊慌失措，一面仓卒应战，凭关顽抗，一面向蒋介石和徐州“剿总”紧急呼救。

激战至22日，敌据点被完全攻克，开封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灭开封守敌3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约4万人，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上吹嘘开封“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5昼夜就攻占了。

开封战役不仅歼灭了大量敌人，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调动和引诱援敌就我范围，使我军进一步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6月23日，党中央给华东、中原我军全体指战员发来祝贺开封大捷的电报说：“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3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党中央的贺电，给全体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为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歼灭更多的敌人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惊慌，一片混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以进至徐州之整编第二十五师改援兖州外，令邱兵团（调出整编第七十五师，调进整编第八十三师）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继续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该旅归第七十五师指挥）组成1个兵团，以区寿年任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现在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我们的“动敌”之计。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在两路援敌中，以围歼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更有把握。我们对突击集团歼灭区兵团提出了两个作战预案。第一方案是：如敌继续由睢县、杞县间向河阳镇、长岗集攻击前进，就将其合围歼灭于以马头集为中心的的地区。第二方案是：如敌徘徊于睢县、杞县地区，我各纵队则分别跃进，将其分割包围于民权、睢县、杞县之间地区，予以歼灭。这样，不论区兵团是前进还是徘徊，都将难逃被歼的命运。

上述战役决心和部署，于24日、25日两次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下达给各纵队预作准备。中央军委于25日10时和26日3时两次复示，指出：“部署甚好。”“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6月26日晨，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按预定计划，由开封城郊向通许方向转移，诱邱兵团西进开封：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向杞县以南傅集东西地区隐蔽集结。这时，伪国防部又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误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一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我第三和第八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结果，两路援敌在我挥师南下的引诱和迷惑下，一路向西向南疾进、一路踌躇不前，从而很快拉开了距离，形成了40公里的间隙。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我们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27

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作战命令。当晚，突击集团各纵队即按预定的第二作战方案，乘敌犹豫徘徊、立足未稳之际，从四面八方向敌发起猛烈进攻，边打边查明敌情。在对敌进行大包围的同时，我军猛烈楔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部署。至 29 日晨，已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其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第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敌整编第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集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 20 公里之杞县至王垵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 日晚，我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整编第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至 7 月 1 日中午，将敌整编第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激战至 2 日凌晨 3 时，将区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 1 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

睢杞战役结束后，7 月 11 日，党中央又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号，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他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 1948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为了使被接见的同志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还以左手握拳，手背向上，用右手食指沿着弧形手背越过拳头顶端比划过去，形象地表示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已经越过山的顶端了。1948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更加令人鼓舞地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并说：“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毛泽东同志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历史的事实，早已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预言。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第 534—573 页。）

4 临汾攻坚积经验

我晋冀鲁豫部队、西北二纵队和根据地群众，在庆祝运城解放的欢乐气氛中，迎来了 1948 年。

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拔除这个据点，对配合西北

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重要意义。我们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邓批准。刘、邓同意。2月18日，军委复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这次战役，历时72天。我军共歼敌2.4万余，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以下近2万人。至此，晋南全部解放。我军北上晋中，与敌决战的日子，就在眼前。

攻坚临汾的战役计划，毛主席完全同意，并一再来电，要我们坚持到底。

临汾战役我军虽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换来的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我当时用“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9个字，评价这个战役。毛主席对临汾战役的经验也十分重视，战后立即向其他部队推广：“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7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临汾战役的宝贵经验，有重要历史价值。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12—731页。）

5 两个“横扫”显神威

1948年春，全国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反革命计划，已经彻底破产。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正向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春季作战。

整个山东战场的敌人，在我军的严重打击下，从“重点进攻”、“全面防御”被迫转入“点线防御”，以济南、兖州、潍县、青岛、烟台等城市为主，加强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上的防御兵力和工事，固守津浦路中段、胶济路的济南到潍县段，以及青岛沿海一线。

敌人的意图很清楚，它是想凭借这些坚固设防城市和设防地带阻挡住我军的攻势，以保持东北、华北集团与徐海集团的联系，支撑残局，维持蒋介石摇摇欲坠的反革命宝座。

党中央、毛主席洞悉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依据全国各个战场形势的发展情况，及时向全党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不让敌人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要求我山东兵团在1948年度的作战中，先扫胶济路之敌，再扫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然后内外线兵团适时会师，攻取济南，解放山东全境。

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山东我军所规定的这一作战任务，正是要求我们认清当前敌我形势的重大变化，紧紧掌握住战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内，向敌人发起连续不断的进攻。不仅要敢于和善于打运动战，而且要把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起来，进而发展到能组织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有步骤地扫清胶济路和津浦路中段各城镇守敌，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大片收复

敌人占领的土地，大批夺取敌人的武器装备以武装自己，最后集中全力攻克济南，完成解放山东全省的光荣作战任务。

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山东兵团于1948年3月发起了周村战役。3月11日，我七纵首先包围张店。守敌见势不妙，弃城而逃，被七纵在野外堵截全歼，俘敌4400余名。此时，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对我意图有所觉察，乃仓促决定收缩兵力，命令第一四一旅、第三十六旅放弃长山、邹平等地，连夜向周村开进。

此时，敌人将主力收缩，周村兵力由二三千人骤然增加到1.5万人，但是，敌人显然是仓促集中，部署混乱，立足未稳。我九纵各部连夜冒雨向周村发起攻击。

午夜时分，战斗打响。由于远道奔袭，隐蔽接敌，行动突然，直至周村城下打响，敌尚不知我攻击部队的番号、兵力，敌人兵力部署紊乱，防务交接不清，即仓促应战。在战斗发起后，周庆祥匆忙召集各旅、团长开会，研究周村防务，但已为时太晚，敌师、旅、团之间有线通讯仅通话一次，被我炮火炸断电线，指挥遂告中断，正当敌人一片混乱之际，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由东门突破。我主攻、助攻部队一共选择10个突破口，突破7处，敌各级指挥官未能返部，我指战员已勇猛杀进市区。各点守敌失去指挥，兵无斗志，我军乘胜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敌成连成营弃械投诚。经22个小时战斗，周村为所克，除周庆祥化装潜逃外，守敌1.5万人全部被歼。

周村被克，胶济路西段之敌全局动摇，周围各城镇守敌纷纷弃城逃窜，恰如我兵团于战役前所预料的，出现“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大好局面。我各部乘胜四面出击，扩大战果，横扫胶济路两侧。渤海一部及鲁中军区部队攻占桓台。七纵在肃清淄川外围之敌后，二十一师六十一团首先突破东门。敌人组织疯狂反扑达20次之多，始终未能夺回突破口。七纵以5个团的兵力，由此突破口投入纵深，全歼该城守敌8000余人，胜利捷报，飞传四方。远离战场一二百里的莱芜、蒙阴、沂水诸敌，胆战心惊，望风而逃，具有战略意义的沂蒙山区，全部获得解放。

我军在胶济路西段的作战行动，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国民党蒋介石急调整编第七十五师由河南商丘车运济南，会同整编第七十三师，共5个旅，东援胶济路西段作战。20日，援敌进至明水一线，遭我阻击。旋因淄川为我攻克，加之冀鲁豫军区部队积极配合作战，破袭津浦路，连克东阿、肥城等地，威胁济南，援敌不得不撤回济南。至此，胶济路西段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这一仗，历时12天，痛快淋漓歼敌3.8万余名，连克张店、周村、桓台、淄川等14座城镇及广大地区，时间短，伤亡少，俘获大，缴获的武器装备可以装备一个新的纵队，打碎了敌人在胶济路的防御体系，锻炼了部队攻坚作战的能力。

接着，我们于4月初，挥戈东进，强攻昌潍。至4月27日，敌人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潍县“金城”，完全为我所破，敌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第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亦被活捉。罪恶累累的反动地主武装头子张天佐被击毙。潍县自卫总队1500余人宣布起义。安邱、昌乐、寒亭、仓上诸敌，闻知潍县已破，固守无望，纷纷弃城逃跑，大部为我截歼。整个战役，共歼敌4.6万余人。

我兵团在连克周村、张店、潍县之后，略作休整，即挺进津浦路，展开夏季攻势。

津浦路中段夏季攻势，自5月29日至7月15日，历时48天，歼敌6.3万余人，我们攻占了兖州，拔除了敌人在津浦路中段的战略要点，控制徐、济间铁路线700余里，完全孤立了济南，打通了山东腹地与鲁西南的联系，为我内外线兵团适时会师创造了条件。在兖州及其外围和泗水、曲阜、邹县地区，歼灭地主、恶霸、还乡团反动武装2万余人，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头蛇的反动气焰，有力地支援了鲁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部队的攻坚战术、技术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为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党中央、毛主席战略方针指引下，我山东兵团于1948年3月至7月，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先挺进胶济路，由西向东横扫胶济路500华里；接着进军津浦路，由北向南横扫津浦路700华里，连战皆捷，声威大振，歼敌14.7万余名，解放了张店、周村、淄川、博山、潍县、邹县、兖州等数十座城镇及其周围大片地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摘编自《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536页。）

6 “保卫麦收”晋中获大捷

1948年5月，我军解放晋中名城临汾。这时，阎锡山还占据有晋中地区南起灵石、北至忻县15座县城和附近乡村；有正规军10万余人，22个保安团，21个保警大队，第八、九、十3个总队。第十总队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丧心病狂到极点，在日寇投降时授意阎锡山留用以屠杀中国人民的数千名日军组编的；此外又强迫人民组织“民卫军”，由阎锡山的特务组织控制，为美蒋阎充当炮灰。阎匪利用太原兵工厂，大肆造枪炮、弹药，抓丁扩军；利用太原钢铁厂、水泥厂的生产，大肆构筑钢筋水泥碉堡。晋中各县城、重要市镇、村庄和山区边沿要地均建为据点，把晋中形成了由千万个高碉堡低碉堡、千百个大据点小据点组成的要塞地区。阎锡山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曾自吹武装了人，武装了地，每个阵地能抵1万发炮弹，5000个堡垒足抵50万精兵，永保晋中，万无一失。美帝国主义对阎锡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大力赞赏，曾派美国记者到太原参观，并在报章上为阎匪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大肆宣扬。

晋中平原，经过阎锡山30多年的反动统治，日寇8年的残酷压榨，日寇投降时，阎锡山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支持下，与日寇勾结，窃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又由陕西之秋林重返晋中，施行“兵农合一”、“白日转生”、“三自传训”、“肃清伪装”、抓丁杀人、苛捐杂税等残酷恐怖统治，晋中已成为人间地狱。晋中人民含着眼泪、抱着仇恨，到处流传着“兵农合一好，遍地长青草”、“兵农合一聚宝盆，又没粮食又没人”、“地里蒿草多，村里病人多，家里女人多”等民歌，来控诉阎匪的血腥统治。

1936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军渡过天险黄河东征抗日时，曾派一支红军到晋中方面活动，给晋中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晋中人民进行8年英勇抗战，八路军一直与晋中人民一起打击日寇。日寇投降后，有些乡村曾经一度得到解放，进行过反奸、反霸、减租、反贪污的斗争。因而晋中人民深爱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

1948年五六月麦收将届的时候，晋中人民望着滚滚的麦浪说：“麦子麦子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麦子麦子慢慢长，解放军来了你再黄。”这是何等的渴望共产党、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啊！

1948年6月初，中央军委、华北局、华北军区根据总的形势和晋中情况，决定组织晋中战役，保卫麦收，大量削弱敌人的实力，创造攻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华北局并发出进入晋中地区的指示，指示初期不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团结各阶层人民，废除阎锡山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人民政府合理的税收政策，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宣言，安定社会秩序等问题。参战部队有华北第一兵团，华北军区炮兵旅一部、各区地方部队，晋绥军区各独立旅、各区地方部队等，共6万余人，由华北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同志统一指挥。北岳、太行、太岳、吕梁等区党政军民组织全力参加此次战役，每个地区都有大批民兵参战，仅太行、太岳两区先后参战民工就有23.7万多

军委、华北局、华北军区组织领导这次战役，是完全贯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执行毛主席对战役的指示的。

要进入敌人兵力比我众多、装备比我优良，而且碉堡、据点林立的晋中地区作战，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遵照毛主席的“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这一战术思想，先派晋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出现于汾阳、孝义地区，接着派十五纵队出现于灵石地区，以制造敌人的错觉。兵团主力（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由临汾附近迟数天出动，然后到平遥东南地区隐蔽，准备给敌人以不意的攻击、以争取初战必胜，争取主动权。

6月11日，独立第三旅、第七旅出现于汾阳、孝义以西之阳高镇地区，12日，第十五纵队攻占灵石县城。灵得很，敌人听我们指挥了。13日，敌“闪击兵团”（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六十一军各一部和亲训炮团共13个团组成，由三十四军军长高卓之指挥）分别由汾阳、孝义、平遥、介休出动，以所谓“三只老虎爪子”战术合击阳高镇地区。14日至17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在阳高镇地区坚决抗击敌人，拖住敌人。18日，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以隐蔽突然动作攻破平遥以东山边敌各据点，19日攻克元台沟、菩萨村、北汪港、金庄、岳壁、段村、洪山等据点，完全突破了阎匪晋中要塞边沿阵地，进入了晋中平原，向铁路线进逼。围攻我阳高镇地区之敌“闪击兵团”，遂仓皇转回平遥、介休方面应战。我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的有力配合下，第八纵队、第十五纵队于21日歼灭敌亲训师（第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团于平遥西南地区；24日，第十三纵队歼灭敌第四十师于平遥西北地区。

这时，阎锡山有些慌了，但蒋介石指示阎锡山说，我军主力均已开到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战场，晋中仅有地方部队数万人，要阎锡山大胆与我决战，保卫晋中。阎锡山乃令太原绥署中将副主任兼山西省保安副司令兼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绥和元全福（原名原泉馨，系前日寇驻长治之独立第十四旅团长，是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投降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授意阎锡山留用并授予中将军衔，委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前方指挥官兼山西野战军副总司令）率第十总队由太原前来指挥，并采取攻势，寻机与我决战，以掩护其抢粮抓丁。

26、27日，当敌人向我采取攻势时，我以少数部队应战，迷惑敌人，诱引敌人。敌人兵力分散后，我集中第一兵团全部和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拟于29日诱敌第三十四军到平遥东北地区歼灭之。因为有些部队没有占好阵地，致第三十三军与第三十四军得以靠拢。不好打了，遂放弃歼灭第三十四军的计划。至此，在平遥、介休地区消灭敌人已极困难了，故决定调动敌人，另创战机。

此时，晋中平原现出一片一片的金黄色的麦浪，人民正在忙于收获长年辛勤所得来的麦子。阎匪为着掠夺人民的劳动果实，制定了快抢快运（运到太原）的抢麦计划。人民针对着阎匪的抢麦计划，提出“快收快藏”的口号。我们为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消灭敌人，夺取要点，保护群众麦收，打击敌人抢麦运麦，决定全部兵力转到榆次、祁县、交城敌人守备空虚地区，威胁太原。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转到文水、交城方面；以第十五纵队和晋中部队（由北岳二分区、太行二分区共五个团组成）在榆次、太谷间破坏铁路，打断敌与太原的交通线，攻其必救。这一着打中了敌人要害，敌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第十总队均由平遥地区向北调动了。

战役发起时，徐向前同志派我去军委、华北局、华北军区，请示关于华北第一兵团的组织和晋中战役问题。

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西柏坡晋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晋中战役给了极重要的指示，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灵石解放了，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再打掉一两个，敌人就会慌乱了。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主席又说：要达到消灭敌人、保卫麦收的目的，要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行。不但要善于打运动战，而且要善于打阵地战；不但要会攻，而且要会防。主席还指示加强部队政策教育、纪律教育等问题。主席这个指示，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我回来时，兵团主力已调到太谷、祁县地区作战。兵团指挥机关驻在祁县东南之下八洞村。我把毛主席的指示向徐向前同志报告，他很细心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并把毛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进行传达。部队听到毛主席的指示，全军更加奋起，到处都听到战士们喊出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的口号。

为逼使敌人离开碉堡林立、据点众多之铁路线，以达到在运动战中消灭之目的，我以第十五纵队和晋中部队控制太谷、榆次间铁路线，以第十五纵队一部固守太谷以北之董村，使太谷以南之敌不能沿铁路线返回榆次、太原。7月3日至6日，赵承绶、元全福亲自指挥两个师、两个总队、炮70余门、铁甲车3列、装甲车5辆、飞机数架，连续向我董村阵地猛烈攻击。我守军第十五纵队第一二九团和第一二二团一个营，英勇顽强地击退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当敌飞机四架掩护装甲车五辆突破我前沿阵地冲进村口，情况很为危急时，第四连战士徐英战斗小组登上房屋，以炸药包炸毁敌装甲车，巩固了阵地。敌人连日进攻董村失败，又伤亡了1000多人，在我军进逼下，感到处境危险，于6日夜离开董村和铁路线，转向榆次、徐沟间夺路北逃。

我们根据毛主席的“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的战术思想，于7日早以第十二纵队和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强行军先敌插入徐

沟以东北郭村、史家社、东堡、西堡地区，切断敌向徐沟北窜的道路；晋中部队、第十五纵队迅速进到车辆、的音村地区，与第十三纵队衔接，切断敌向榆次北逃的道路，把赵承绶集团（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四军共五个师和第十总队）完全包围于西贾村、东贾村、大常镇、戴李青、杨李青、温李青、南庄、西范、南席村、新戴村、小常村地区。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6日攻占交城，7日渡过汾河，进占榆次西南永康镇、怀仁镇地区，担任打援堵溃。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第二十四旅7日黄昏攻破祁县城，全歼守敌第三十七师和民卫军，8日进到徐沟东南张楚王、东西怀远地区。兵团指挥机关进到徐沟以南粮家庄。这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这一指示去做的。我们占领了祁城和交城后，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5县之敌，与太原完全隔断了，当时晋中人民称为“腰斩阎锡山”。当地人民纷纷起来参加战斗。我军既有众多人民为依靠，又有广大地区可机动，创造了消灭赵承绶集团的有利条件。

7日，晋中部队进到车辆村时，部队把学过的“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落到实处，干部、战士见人就做宣传工作。车辆村一带群众纷纷向部队控诉阎锡山的罪行。部队赶做工事时，车辆村一带很多群众都自动来帮助，所以在7日夜间就把车辆村很多防御工事都做好了。8日至10日，优势敌人在飞机配合下，不断向车辆村进攻，向北突围。战士们坚守阵地，击退敌人无数次陆空配合的进攻，毙伤俘敌一千余，始终保持车辆村阵地，使敌不能越雷池一步。

8日，天还没有很亮，敌第四十六师在7架飞机掩护下，向敦坊村进攻，企图向徐沟方面突围。我守军第十三纵队第一一七团坚决抗击敌人。该团第八连以无比的英勇顽强坚守阵地，在激烈战斗中，连长、指导员牺牲了，排长、班长全部伤亡，全连只剩下10个人，有些人想退却，第一班王副班长挺身而出，鼓励大家说：“党教育我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我们现在还有十个人，一定要坚守阵地，完成战斗任务。”这9个不同排班的战士，都一致拥护王副班长的意见，在王副班长的指挥下，同心同德，英勇顽强，打退敌人许多次进攻，终于保持了敦坊村阵地。

同日，敌另一部由戴李青、东楚旺向徐沟方面突围。我第十三纵队第三十八旅旅长安东原同志在徐沟以东之史家社指挥该旅坚决抗击，敌人始终不能与徐沟城之敌接通，使我军站稳包围赵承绶集团的有利态势。安东原同志负重伤，光荣牺牲。

由于我军连日从各方面阻击，敌人突围计划失败了。但敌人已将占据的十几个村庄都建成了临时据点，各个村庄都能独立作战，村沿有地堡、野战工事、交通壕，村中各高大房屋均加强工事，能够独立固守。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息地由太原起飞空军协助防守，大量投下美帝国主义送给阎锡山的重型、轻型炸弹和燃烧弹，阻止我军运动和攻击。敌人又有仅距10余里之徐沟县城、太谷县城和仅距30里之榆次县城为依靠，我军要消灭这么大一股敌人，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部队掌握了毛主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应用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终于消灭了赵承绶集团。

10日拂晓发起总攻击。部队采取集中步兵和炮兵逐村攻击，战斗小组逐屋爆破、逐屋夺取的战术。第十三纵队由西北、第八纵队由西南为主攻，第

十五纵队由东南、晋中部队由东北为助攻。10日至12日午夜，第十五纵队攻占西贾村、东贾村、大常镇，完全消灭敌第三十四军军部（仅军长高卓之负伤后化装潜逃）和第七十三师；第八纵队攻占戴李青、杨李青、温李青、南庄，消灭第四十四师全部和第十总队大部。

7月12日，正当我攻击第三十四军、在南庄村里与第十总队日寇白刃肉搏的时候，文水敌第六十一军军部和第六十九师，汾阳、孝义敌第四十三军军部和第七十师，平遥敌第十九军一部，均集结于文水以北地区，声言要开到徐沟地区，协助三十三军、三十四军攻击我军。榆次敌人声言太原大军即要到来，解三十二军、三十四军之围。榆次城、太谷城之敌也准备出城增援。

兵团指挥机关不断地从电话、电台以及骑兵侦察员、通信员嘴里得到各种情报，情况很复杂，战况很紧张。一方面要消灭赵承绶集团不让它跑掉，一方面要防太原、榆次、太谷方面敌人的增援，一方面又要对付集结于文水以北地区之敌。我们用毛主席的“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一思想作指导，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问题。断定文水以北地区之敌，有增援赵承绶集团和逃回太原的两种可能性，后者可能性较大。对这两种可能性都作了准备，调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十旅、第八分区部队来对付；依照原定计划加紧对赵承绶集团的包围，加紧对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的攻击。所以激战至12日午夜，将第三十四军、第十总队歼灭。

13日，文水以北地区之敌，沿太（原）汾（阳）公路及其以西之山区向太原逃走。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七旅、独立第十旅、第八分区部队和第二十四旅，截击于太原、交城之间地区，共歼敌1万余，仅敌第六十一军军部和第六十九师等残部逃回太原。在战地访问的我新华社记者3人也参加了战斗，他们俘虏了敌排长以下37人，缴大炮两门、轻机枪两挺、步枪10多支。13日，太谷守敌第九总队弃城逃走，也为我全歼。

15日，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旅、第三十九旅和第二十二旅攻占西范村，击毙敌野战军副总司令日寇战犯元全福。同日，第十五纵队攻占南席村、新戴村。敌1万余人全部集结于小常村，加强防守，以作最后挣扎。

战役已进行1个多月，不断行军、不断战斗，部队极其疲劳，有些部队伤亡又相当大；敌人还没有完全歼灭，战斗还要继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战斗意志，士气旺盛。但也有些部队表现出畏难情绪，想休息一下。兵团及时发出指示，号召全军贯彻毛主席的“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以达到全歼敌人，取得全胜的目的。全军响应了这一号召，各级党委、政治机关都派人深入连队，进行政治动员，改变了有些部队的畏难情绪，全军更加奋起，人人奋勇投入最后全歼赵承绶集团的战斗。

自7日起围攻赵承绶集团，已经战斗了8天，大军云集，日夜激战，弹药、粮草消耗很大，前输后送非常繁忙。老解放区人民大力支援，大批民兵协同作战，出现许多英勇事迹。在战场地区，我军各部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此，又得到战场地区厂大人民的积极支援，帮助我们侦察敌情、瓦解敌军、打击敌人、筹集粮草、运送弹药。广大人民的支援，也是我军能够消灭赵承绶集团的因素之一。

16日16时，正当我军发起总攻小常村的时候，敌人飞机7架低空向我

猛烈扫射轰炸，小常村敌人拼命向榆次方向突围。同时，阎锡山以第四十五师、第四十九师组成南援兵团，进到怀仁镇、马村一带接应。我以第十二纵队、第十五纵队各一部和晋中部队打敌南援兵团；以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主力围歼突围之敌和守在小常村之敌，一举攻入小常村，敌人一群一群地放下武器，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被我活捉，躲在小常村一个地洞里的赵承绶，也派出副官打着白旗要求投降。至此，赵承绶集团被我全部歼灭了。

小常村里，有我们的负伤人员，也有敌军的负伤人员，当地群众很快就将我们的负伤人员送到医院，但是坚决不愿意抬敌军负伤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对群众解释说：“你们痛恨敌人是应当的，是对的，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负伤了就应当收容他们，给他们治疗。毛主席数十年前就制定了对敌军负伤人员与我军负伤人员一样收容治疗的政策，我们一直是执行这个政策的。”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解释，群众才把敌军负伤人员送到医院。后来，他们伤愈出院时，有些人感动得流泪，不愿离开医院；有些人发誓说：此生绝不会忘掉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赵承绶集团被我歼灭后，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又大力支援阎锡山守太原。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最得力的凶手美帝国主义的陈纳德，又帮助敌人由西安空运援兵，7月17日起，把第三十师陆续运到太原。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在忻县方面之警备第二旅、独立第十二旅接到兵团给予消灭第三十九师的战斗任务时，部队中掀起贯彻毛主席的歼灭战思想的热潮。政治部进行政治动员时，引用了毛主席历次关于歼灭战思想的指示，毛主席早就说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要求此次战斗务必将敌全歼，不使漏网。21日，该两旅和第六分区部队全歼向太原逃走之敌第三十九师于小豆罗村一带。我军各部从四面向太原进逼，晋中地区全获解放，阎匪仅据守由5000多个碉堡构成的太原百里防线了。

晋中战役，由6月11日起至7月21日结束，共歼敌8个整师和

1个野战军总司令部、4个军部、两个总队、4个整团以及游杂武装等10万余人；击落敌机3架，缴野炮、山炮、迫击炮300多门，六零等小炮3000多门，轻重机枪2000多挺，长短枪3万多支；解放了灵石、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孝义、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徐沟、晋源、忻县等14座县城。

晋中战役获得如此辉煌战绩，是由于我们在军委、华北局、华北军区领导下，掌握毛主席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应用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发扬毛主席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执行毛主席对晋中战役的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的指示的结果。

（选编自周士第：《晋中平原上的一个歼灭战》，《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190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 秉夜畅谈中国革命

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过来的。听说，中途遇雪，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4月10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安排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上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

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上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喝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一野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据点，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据点。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 this 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精神感人。这年

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由蒋管区或国外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选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69—676 页。作者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8 城南庄遇险

书记处会议结束后的一天早晨，毛主席吃了安眠药刚睡下不久，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突然响起防空警报。我的心里特别紧张。这里离北平很近，军区大院有一排一排整齐的平房，目标也很大，而且离防空洞还有 100 多米的距离。如果行动迟缓，那将是很危险的。

我们急忙跑到了毛主席的住房跟前，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就看见 3 架敌机飞到了城南庄的上空，转了一个圈，就吼叫着向北平方向飞去了。

我判断敌人很可能会来轰炸城南庄，应该马上叫醒毛主席，请他赶快到防空洞里去，可毛主席吃了安眠药睡下不久。叫醒他吧？敌机如果一时不来轰炸，就要影响他的睡眠。不叫醒他吧？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这时，聂荣臻司令员派范秘书来和我们商量，决定暂不叫醒毛主席，先做好一切防空的准备工作，把人员组织好，把担架放在门口，如果敌机来轰炸，就抬上毛主席往防空洞跑。

我还把人作了临时分工，有的留在门口，注视着天空；有的从毛主席住房的门口往防空洞那里跑，看这段距离需要多长时间。我们跑了一趟，看了看表，用了两分多钟。我想，如果抬着毛主席跑，大概 3 分多钟的时间就够了。

上午 8 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又拉响了。我立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急忙推开房门走到了毛主席的床前，一边喊一边扶他坐了起来。

毛主席最不满意别人打扰他睡觉，不耐烦地问：“什么事嘛？”

我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 3 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里去防空。”

“敌机丢了炸弹没有？”

“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的。”

“给我点支烟吸。”

这也是他的习惯，起床后先抽上一支烟。

还没容我想点不点烟，就听见江青在外边喊，“快！快！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

我顾不上让毛主席吸烟，也来不及和他多说什么，果断地对石国瑞、孙振国和李银桥说：“快走！快走！”我们架起毛主席就往屋门外跑，顺手往他身上披了一件棉衣。

刚跑出屋门，迎面碰上聂荣臻司令员。他正在吃早饭，听到警报声就来了。见到我们就大声喊：“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本来，我们是想叫毛主席躺在担架上。因为已经听见飞机的吼叫声，担心来不及就扶着他往防空洞跑去，披的那件棉袄也掉了，跟在后边的同志只

好拣起来跟着跑。敌机丢下的炸弹在大院爆炸了，升起滚滚的浓烟。

一见敌机丢了炸弹，我们跑得更快了。毛主席不想跑，他说：“放开我！不着急，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出了院子就安全了。”

“快呀！敌机又丢炸弹了！”聂司令员边跑边催促。

我们这些平时最听毛主席话的人，此刻也不能听他的了，架着他继续跑。快到防空洞的洞口时，又听到了一声巨响。

到了防空洞的洞口，毛主席便站在那里不动了，回身看着军区大院。我们怕他着凉，给他穿上了棉袄。

“看，我一来敌机就把你的大院炸了。”毛主席这时还和聂司令员开玩笑。

聂司令员可顾不上开玩笑，催促说：“主席，快到防空洞里去吧。”

“好。”毛主席嘴里这么说，但还是站着不动。

聂司令员又说：“主席，快进防空洞吧。”

“等一等。在这里保险，飞机的炸弹炸不到这里，在这里看飞机丢炸弹最清楚。”

“主席，你必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聂司令急了。

毛主席看看聂司令还未完全镇定的惊慌神色，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任性，才转身进了防空洞。

敌机丢完炸弹，吼叫着往北平方向飞去了。

我们回到大院，发现毛主席住房的附近落的是几颗杀伤性炸弹。屋里飞进了不少弹片，两个热水瓶也被震坏了，倒了一地水，还有些家具也东倒西歪。看到这些，我真有些后怕。如果不是及时地硬把毛主席架走，哪怕再晚半分钟，后果也是很难设想的。

事情发生后，聂荣臻司令员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找来军区保卫部的许建国部长，询问了有关情况。

“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今天飞机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副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好几天，敌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房子炸坏了几间，人没有受什么损失，还好。”

“其他房子完好无损，只把主席住的房子炸毁了。看来是有坏蛋告密。要抓紧破案。”

据后来查的结果，这次敌机轰炸，确实是有坏蛋告密。

那天，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和李涛等首长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会时，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特务分子孟宪德，就急急忙忙到了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的家里。他们密谋后，把情报送到了保定的特务机关，保定的特务机关又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这样，敌人才派飞机来轰炸的。

还是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到达城南庄之前，刘从文就被特务分子孟宪德拉进了特务组织，他们曾经企图谋害聂荣臻司令员及其他军区首长。孟宪德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叫他把毒药放在聂荣臻司令员等军区首长的饭菜里，因为怕被发现，当时没有敢下毒手。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到达军区司令部以后，为了保证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聂荣臻司令员专门派可靠的人给中央首长做饭，并且采取了防范措施。这样，特务分子也就无法实现毒害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罪恶阴谋。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送情报，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

此案破获以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那两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

“现在让主席到哪里去住呢？”许部长问。

聂司令考虑了一会，说：“还是到花山村一带去住吧。那里的空气好，就是条件差一些，不过山高沟深，好防空。给主席临时安排一个住处，搞得好一点。”

第二天，聂荣臻司令员向毛主席说了他的打算。

毛主席说：“到哪里去住我都没有意见，由你安排就行了。不管条件怎么样，总比在陕北打游击好多了。”

去花山村之前，毛主席又到他原来往的地方看了看。往大院里走的时候，有的同志说，在院墙外边有一颗没有响的炸弹。

“对，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丢在那里的炸弹没有爆炸嘛。走，咱们看看去。”

我说：“不要去了，那有什么好看的。”

“你这样就不对了，你们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呢？”

“敌人丢的也许是定时炸弹。”

“是定时炸弹也不怕。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就去看炸弹呢？没有事，你们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没走多远，就看见了一个深深的大坑，没有响的炸弹像死猪一样，一动不动地呆在坑里面。

毛主席说：“敌人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住，那就再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在路上，我对毛主席说：“花山村在山里，很隐蔽，房子也不错。”

“聂司令员不会亏待我们的，他安排的地方，一定不错。”

聂司令员笑着说：“条件差一些，环境还可以。有山有水，适宜休息。”

走到大院门口，我指着哨兵对毛主席说：“在敌人的飞机丢炸弹的时候，我们警卫班里的哨兵和带班的两个同志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利用院内的流水沟作掩护，没有受伤。”

“很好嘛。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丢了几颗炸弹就跑了。看来他们是没有炸弹了。如果他们的炸弹多，又发现了我们这个目标，就会把这里炸平。这样，他们才好到蒋委员长那里去领功受奖呀！这次来了几架飞机，才炸坏了两间平房，连个哨兵也没有炸到。这说明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等着我们去收拾他们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陪送下，毛主席到了花山村。

这里山清水秀，有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在小河南面的一座山根下边，有几间宽大亮堂的平房，毛主席就住在这里。

（摘自阎长林：《警卫毛主席纪事》第291—296页。）

9 一次未执行的“特殊任务”

1948年4月15日，接到聂司令员电报，指定要我立即到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司令部，说有要事相商。我于4月16、17日，乘汽车赶到。

阜平，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它位于太行山北部、晋冀两省交界的地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聂荣臻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一

五师独立团及骑兵营等部共 2000 多人，挺进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 年，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展到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 5 省各一部的广大地区，阜平成了根据地的中心。1947 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进驻阜平城南庄。

一进军区司令部的门，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同志就对我说，毛主席来了，他有事和你商量。

我立即洗脸、吃饭。之后，聂司令员带着我和赵尔陆同志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和聂司令员合住一个院子，中间有一个过厅，毛主席住东房，聂司令员住西房。我跟着聂司令员走进毛主席的卧室。

毛主席当时已经休息，半坐半躺，和我握了手，说：成武，你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我一边回答，一边瞅了瞅毛主席。看来，他身体不大好，有些消瘦，但精神很好。看到他，我非常兴奋。我已经 11 年没有见到他了。在这以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红军大学毕业典礼上，那次他出席了毕业典礼，比现在要年轻得多，身体也好得多。毛主席真够辛苦的了！八年抗战刚刚胜利，他又以一身系国家安危，不畏风险，深入虎穴，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全面内战爆发以来，他指挥全党全军打了数以百计的大小战役，在大西北的窑洞里度过了那么多的不眠之夜。特别是敌人发动重点进攻以后，他留在陕北，带着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在陕北高原上与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周旋，指挥一野，指挥全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歼灭了大量敌人，致使战局基本改观。为了加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他才离开陕北，来到晋察冀。他为了中国革命，操心劳力，身体有了很大损伤。

我坐下后，毛主席问了部队的情况。他谈笑风生，非常兴奋。关于打大同、打集宁、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大的情况他都知道。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他也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

我一一作了回答，在汇报部队情况中，着重谈了刚刚结束的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的实施情况和经验教训。

毛主席听完我的汇报，给我谈了当前的大好形势。他说，解放战争已经转入到一个新的进攻的阶段了。南线，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过陇海路。陈粟大军转入鲁西黄河南岸和豫皖苏地区。陈谢大军也渡过黄河进入豫皖鄂地区。北线，东北我军从去年春季攻势以后即转入反攻，经过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东北敌人被孤立长春、沈阳、锦州 3 点。陕北我军在沙家店消灭敌三十六师以后，也转入了反攻。晋察冀我军取得大清河北的胜利后，又取得清风店、石家庄的胜利，也转入了进攻。如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处于被动地位。

毛主席说完这些以后，提出了新的具体任务：让我负责，选一个我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

在高度兴奋中，不知不觉已经是夜间 12 点多钟了，我们这才离开。

我在军区司令部住下，聂司令员、赵参谋长和我连夜商量，挑选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部队，决定调战斗力很强的第二纵队第四旅前往。挑选这支部队护送毛主席，我们是放心的。

接着，我们又研究了行动路线，选择了过平绥铁路的地点。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毛主席那里，报告了我们昨夜研究的情况，毛主席表示同意。我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了。我这才离开了城南庄。

我乘坐汽车，经曲阳、唐县、易县、涞源，回到“野司”驻地广灵县暖泉镇，即向“野司”前委汇报了在毛主席那里接受的任务，汇报了毛主席询问的各种情况。我们对护送毛主席的任务进行了慎重、仔细、认真的研究，统一了意见，然后呈报毛主席和聂司令员。

过了十几天，毛主席来了个电报：同我谈的任务撤销。

后来我从聂司令员那里知道，当时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斯大林邀请他去苏联疗养。他原拟由我带一个旅护送他到东北，他从东北转赴莫斯科。关于这件事，毛主席曾与聂司令员商量，征求聂司令员的意见。聂司令员认为斯大林相邀固然是一番好意，但在那时还是不去为好。毛主席经过斟酌，决定不去苏联了。

毛主席在城南庄期间，召开了座谈会，研究、部署了1948年土改和整党工作，还和晋察冀、华东军区负责同志研究了军事形势和作战部署；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5月16日，他移居花山村，后来到了西柏坡。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到来，更加强了对华北的领导。毛主席这时做出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指示，号召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左派”幼稚病。这些指示，对部队建设，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有着巨大意义的。

毛主席的到来，他直接培养和指挥华北的部队，把华北部队放到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位置上，实施战略指挥，使我们能在夺取最后胜利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毛主席到晋察冀，到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不过是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他身在晋察冀火热的斗争前线，总观全局，统率全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节选自《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54页。）

第七编

运筹帷幄大决战

一、大决战的前夜

1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

1948年夏，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关心，来电要我去后方休息一下，并说有些事情要谈。8月中旬，我从榆次动身，去石家庄，往进了从延安迁到那里的和平医院。9月初，我就出院去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

会议从9月8日开始，至13日结束，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31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转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大约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报告，大家进行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作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同志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具体说来，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能不能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详细论证了中央作出这一战略预想的依据，充分肯定了能够实现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存在着有利的国际条件。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但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制止战争的进步力量还在发展；世界人民有可能争取10到15年的时间，制止战争的爆发，消除世界大战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有利的国内形势。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近200个旅，占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2/5。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毛主席指出，困难也要充分估计，好有精神准备。一是大战爆发；二是天灾，即“七大”说的，大旱三年，赤地千里；三是军事发展不顺利，战争延长，明年打不过长江去，只能在江北打；四是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出来“组阁”，另成立政府，搞个曲折。对于这些，我们有了准备就不怕，立脚点放在打上，放在应付各种困难上。“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提法，有一个“大约”，有一个“左右”，还有个“根本上”，就是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的，充分考虑了实现的可能性，也考虑了出现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

第二，打倒国民党，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毛主席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力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

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我们就要打倒他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三，如何加强纪律性，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过渡？过去，我党我军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的自主权，发挥了积极性、主动性，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及地方主义、游击主义。新的形势要求建军 500 万，从游击化向正规化过渡，党的工作重心也将从乡村逐步转移到城市，因而必须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以保持全党全军的高度统一。早在 1 月间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4 月间，又强调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重大的统一，”“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会上，毛主席批评了那种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不执行中央政策等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大家也都作了检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以保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保证党和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

第四，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战争的胜利？随着战局的发展。战争需要和人民负担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出来。一个是军队向 500 万发展，需要大量补充兵员，但过多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势必影响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中央曾多次指示要大量留用俘虏，解决兵员补充问题。会议认为，我军现有 280 万人，“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要求今后 3 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 170 万人，动员农民参军 200 万人，除去作战消耗，达到建军 500 万的目标，另一个是作战物资的供应问题，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不能使人民负担过重，以免造成新的危险，影响战争的持久进行。会议认为，一方面要取之于敌，另一方面要靠大力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来解决。同时，大家还提出了一切缴获要归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尽力减少机关开支等措施。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训练和准备大批新区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以及加强工会、青年、妇女工作等问题。

党中央计划解放战争第三年，歼敌 128 个旅左右。根据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先解决东北、华北、山东之敌，以便抽出半数以上的兵力向南推进，

渡江作战。规定我华北一兵团歼敌 14 个旅（包括 7 月已歼敌 8 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二、三兵团歼敌 12 个旅，配合东北部队作战。会议期间，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我们攻打太原的设想。

西柏坡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和我谈过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问题。他说：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就尽力争取，阎锡山如同意和平解决，你们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我说：恐怕不大容易，他连老师都给杀了，可见顽固得很。我们的立脚点放在打上，但也不放松争取工作、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吧！毛主席完全同意。

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我的身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都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和调养，会后，我回石家庄休养一段时间，于 10 月上旬返回太原前线司令部，投入了攻打太原的战斗。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62—774 页，作者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5 年 9 月授予元帅军衔。）

2 真攻济南，十万敌军化尘埃

1948 年 9 月，山东战场上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华野外线部队北上和山东兵团会合了，后来，又将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调山东，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 15 个纵队共 32 万人，敌人是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统率 9 个正规旅、5 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 10 万余人死守济南，同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邱清泉、李弥、黄伯韬 3 个兵团伺机北援，这 3 个兵团机动兵力约 17 万人，因此，攻打济南就成了我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

我们采取了“攻济打援”的崭新战法，特点是在保证有足够的兵力攻下济南的前提下，以大部分兵力用于打援，求得在攻济的同时，歼敌援军一部，这是达到攻济目的的必要手段。

这一新的战法，是军委、毛泽东同志经过反复思考才确定的。

早在豫东战役期间，敌军原定北上增援兖州的第二十五军在黄伯韬指挥下掉头南下增援豫东，为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创造了条件。1948 年 7 月 13 日兖州攻克，济南已成孤城。次日（14 日），军委给我来电：“拟令许（世友）谭（震林）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清泉）黄（伯韬）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

这时，我和野直机关尚在豫皖苏地区，经过考虑，我们于 7 月 16 日电复军委：“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军委于 23 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要我们待休整完毕后，或转外线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提出作战计划。

我和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同志讨论后，于 8 月 10 日联名向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新）

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个方案是“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第三个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即战役分力：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全军以13个纵队计算）抢占济南机场而巩固之后，在济敌反夺机场中，尽力歼灭其反击力量，以削弱其守备兵力；同时以其余11个纵队打援，则兵力足够（敌援可能性很大，如敌不援则以攻济南为主）歼灭敌人援兵之一路（首先以歼五军为目的）或两路，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有保障。第二阶段则于歼灭敌之主要一路后，以一部任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济南”。三个方案各有利弊，我们在报告中倾向于第三方案。关于打援问题，我们将打援战场选择在汶可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间地区，阻援战场选择在鲁西南金乡、巨野、嘉祥地区。

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于8月12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即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同时又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第三方案“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11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清泉、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10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心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于战局以影响”。并且指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

接到军委上述复示后，又得悉敌人空运第十九旅至济南，增加防守兵力。这时，我已率野直机关及部分纵队干部到达曲阜与谭震林同志会合，我们商量后认为，为确保攻济必克，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但是又感到不论打援与攻坚，手中兵力尚非绝对优势。于是，我们于8月23日联名报告军委，要求调苏北主力部队（除留一至两个旅在苏北坚持外）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除第三十三旅、第三十四旅留在苏北外，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们取得了优势。

军委对战役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根据山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8月26日指出，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28日又指示我们：“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6个旅、8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72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

军委着重提出集中最大兵力阻援打援和真攻济南，给我很大启示，在中国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已发展到了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

期，应以新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大城市的辩证关系。以往，不论“攻城阻援”还是“围城打援”，都是为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济南战役则不仅为了歼敌有生力量，而且为了将大城市永久地巩固占领之。这样，我们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更大兵力去争取前所未有的更大胜利。

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军委的指示，我决定将参战兵力44%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56%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6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14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领导机关作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18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毛泽东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9月10日，许世友同志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次日，毛泽东同志发电给他，对攻济打援方针作了很好地说明，指出：“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济南是山东省会，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险要。蒋军在日伪时期的原有工事基础上，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性的城市防御体系，易守难攻。济南敌人的防御阵地，由外围防御地带与基本防御地带构成。外围防御地带以齐河、长清、崮山、张夏、中宫、王舍人庄等为警戒阵地；沿鹊山、中店铺、峨眉山、大庙屯、兴隆山、砚池山、茂岭山、华山线构筑主要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由160余个支撑点组成。基本防御地带由三线阵地组成：商埠为第一线阵地；外城为第二线阵地；内城为核心阵地。王耀武自恃工事坚固，认为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

面对敌人的防御情况，我着重从兵力部署上分析敌人守城的重点。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是杂牌军吴化文部。国民党军历来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界限是很明显的。济南守敌既然将中央军置于东线，显然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六十九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可能在战场起义，这就可使敌防线出现缺口。同时敌人的机场在城西，攻下机场，可切断敌人空中的补给线，不但断绝敌人兵力和物资的来源，而且给敌人精神上以严重打击。为此，我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这个问题涉及到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

我们将攻城集团也分为东、西两个兵团，由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形夹击。西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十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4个团）及冀鲁豫军区一部兵力组成，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东兵团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6个团）及渤海军区一部兵力组成，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统一指挥。此外，以第十三纵队为攻城预备队。特种兵纵队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给东西兵团。

至于打援集团，我们采取“夹运（河）而阵”的部署。在运河以西配置第四纵队、第八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依托水洼地带，构筑多道纵深的工事，坚决阻击由鲁西南北犯之敌；而将打援集团的大部配置在运河以东，

由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十二纵队、中野第十一纵队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组成，拟在邹县以南集中30个团歼援敌3个旅，而以其余22个团箝制援敌的其余各部，尔后再依情况发展而定下一步作战。

济南战役定于9月26日开始。在开始前3天（即13日夜晚），我南线江淮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开始破击徐州至商丘、徐州至蚌埠、徐州至运河站的铁路线并威胁徐州，迫使敌人分兵以防徐州。同时，我们指示淮南部队破击蚌埠至浦口的铁路线，留在苏北的第三十三旅向运河线进袭，以配合济南战役。

以上作战计划，得到军委批准。

16日夜，天高气爽，月明星稀，我军在月光下向敌外围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我军根据敌外围防御地带支撑点虽多，但纵深长，空隙大的特点，不是正面平推，而是采用穿插迂回，大胆楔入，打开口子，突入纵深，分割围歼的战法，以支解敌人的防御体系。激战至17日，我西兵团攻占长清、双山头等地，18日，占领古域、玉皇山、党家庄等地，迫近吴化文部所据守的阵地，并以炮火控制了机场，迫使敌人停止了空运。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占城东屏障茂岭山、砚池山、回龙岭等要点，17日又乘胜攻占窑头、甸柳庄，并继续向前发展。

19日晚，吴化文率3个旅约两万余人起义，将飞机场及周围防区移交我军。使王耀武的西部区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我西兵团接替了吴化文的防区，乘机疾进，至20日拂晓，把商埠西面的外围阵地全部占领。与此同时，东兵团攻克了燕翅山等要点，主力迫近外城之下，积极准备攻城。

至此，王耀武宣称可防守半个月的外围防御地带，仅经4天，就被我全部占领。

当晚6时，我西兵团使用第三、第十、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从南、西、北三面对敌基本防御地带之第一线阵地——商埠，展开猛烈攻击。敌稍加抵抗即向东后撤，据守坚固楼房，企图进行顽抗。我4个纵队并肩前进，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楼房之战。战至22日中午，将商埠之敌2万多人全部歼灭，抵近外城西门。与此同时，东兵团已扫清了城外敌人的地堡群，准备攻城。

我军乘敌人惊慌和调动混乱之际，对外城发起攻击。我东、西兵团22日18时30分，向外城发起总攻。经1小时激战，从多处攻入外城，与敌展开巷战，战至23日，我占领外城大部，逼近内城。

为了乘胜迅速全歼敌人，并减轻敌人对城市的破坏，发挥我军特有的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善于连续作战的特长，我们决心立即于当天（23日）晚上，向内城发起总攻，彻底消灭顽抗之敌，结束济南战役。24日之25分，东兵团九纵队之七十三团，首先突破成功，占领了城东南角，巩固了突破口，把“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旗帜插在城头东南角的气象台上。拂晓时，东兵团主力进入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西兵团十三纵队第一一团，在一九团在城内坚持战斗的两个连的接应下，从城西南角再次突上城墙，控制了突破口，掩护西兵团主力源源进入城内。

我入城部队东西对进，直逼伪省政府。王耀武见失败已成定局，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化装潜逃。黄昏时，我攻占伪省政府，全歼内城守敌。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他们察知我强大援兵团

严阵以待，又惧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援集团交战，至我军攻克济南时，敌第二兵团方进至城武、曹县地区，第七、第十三兵团尚在集结中。我军担任打援的这 8 个纵队，便成为打下一个战役的生力军。由济南化装逃走的王耀武、绥区副司令牟中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都被我地方武装及民兵捕获。

这次战役；共计敌 10.4 万余人（包括起义 2 万人），活捉国民党将领 23 名，缴获各种炮 800 多门，坦克和装甲车 20 辆，汽车 238 辆。济南解放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敌军便仓皇弃城而逃。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9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济南，歼敌十万的伟大胜利。你们这一勇猛、果敢、敏捷的行动，并争取了吴化文将军所率九十六军的起义，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军，解放全华东人民而战。解放济南战役中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经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修改后。毛泽东同志最后修改审定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果然，此后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纷纷落入我手。在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手中虽有 3 个兵团，但不敢坚守设有坚固工事的徐州，他们害怕徐州成为第二个济南，是一个重要原因。

济南战役结束了，这仅仅是一个序幕，更大的胜利正在等待我们去争取。

（选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5—595 页。作者时任华东人民解放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3 奇兵引敌东西窜

1948 年秋，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把聂荣臻同志和我召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面授予进军绥远的任务。这次接见和谈话，使我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 35 年，但毛主席当时的音容笑貌，及他那战略家的风度，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雄才大略，他那光辉的军事思想，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1948 年 7 月下旬，我们华北军区所属的晋察冀野战军的一部，正在保定以北地区顺利进行保北战役，取得了歼敌一个旅，占领定兴、高碑店、北河店一线的胜利。7 月 31 日，接到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的电报，要部队立即收兵到易县、涞源、狼牙山地区进行集训，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并要我马上赶到军区，随同聂荣臻司令员去中央接受任务。赶到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后，聂司令员告诉我，现在我军准备在东北同敌人进行决战，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将华北的敌人拉住，积极配合东北作战。他说：“毛主席找咱们一起去谈。”

听了聂司令员的话：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从 1946 年 7 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

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两年来，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不仅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到了1947年底，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现在，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将东北敌人会歼在东北境内，迅速解放全东北。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形势啊！

8月3日上午，我随聂司令员骑马沿滹沦河北上，来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周副主席首先接见了我们。他说：“下午三点，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跟你们一块谈。”

聂司令员带着我准时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个住处是一间房子外加接出去的一个棚屋。那棚屋几乎跟瓜棚一样简陋，两侧各树起三根立柱、架着横梁，上覆苇席。左边的立柱砌在墙里，靠有的立柱还暴露在墙外。

我们走进棚屋，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四面摆着四条长凳。毛主席坐在靠里面的一边，左首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右首是刘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主席招呼我们在他的对面坐下，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水。接着，他便拿起一份电报，说：“你们先看看。”

聂司令员看完后递给我。这是1948年7月22日中央军委发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关于东北战场作战要求和注意事宜的电报。主席带着征询的口气问我们：有没有意见？同意不同意？我们表示完全同意。接着，主席又递给我们另一份电报。这是3天前中央军委对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的复电，明确指出，东北战场首先“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

等到我们看完电报，毛主席就站起来，伸出两个指头，操着浓重有力的湖南口音说：晋察冀野战军6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野战军二、三两个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二纵队的一个旅，组成第二兵团，并统一指挥冀热察的地方部队，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耿飏同志任参谋长。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两个旅、第六纵队组成第三兵团，并统一指挥晋绥的第八纵队、内蒙古的两个骑兵师以及晋西地区的地方部队，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天焕同志任副政治委员。毛主席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你们第三兵团准备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的作战。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你们把傅部的主力拉住在平绥线，调动他向归绥转移，使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与此同时，第二兵团则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配合东北作战；另一部在北平、张家口线行动，配合你们三兵团在绥远作战。徐向前、周士第同志的一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我军作战的胜利。主席说到这里，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在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

我脱口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给的任务。”

毛主席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一一作了分析，指出：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他在那里经营了20来年。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对解放军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那里的粮食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供给到前线也很不容易。傅作义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搞坚壁清野。过去，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两次出击绥东，都没有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2000人。

现在是个兵团，4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10多万人，都要吃饭呀，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

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是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思想。现在，他把困难摆得那么具体，问题点得那么透彻，我们很受教育，很受感动。全国有多少个战役需要他去运筹，对各个战场上的每一着棋，他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要完成出兵绥远的任务，确实像主席说的那样困难不少。主席为使我们对困难有足够的重视，又对我们讲，傅作义一辈子只经营了两个兵团，这是他的全部老本。你要消灭它，他一定要和你拚。毛主席讲到这里，郑重地对我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少奇同志接过毛主席的话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毛主席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为了保证出兵绥远取得胜利，他不仅反复给我们讲清楚了困难的因素，又详细地教给我们战胜困难的办法。毛主席要求我们：一、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把困难想够，想透，最大的困难充其量有多大，统统摆出来，同全体指战员一条一条地讲清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遇到困难就吓不倒。你们回去后开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请聂荣臻同志去讲一次话，困难可以讲10条，甚至12条，有利条件最多讲5条。要明确告诉指战员，怕困难的可以不去。如果到了傅作义地区又跑回来，就不好了，那就有生命危险，而且泄露秘密。二、要做好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就赶紧补充。绥远那个地方只要有银元，就能搞到粮食。要薄一波同志给你们10万现洋。

听到有这么一大笔现洋，我犯难了，忙说：“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么带得动啊！”

朱总司令笑了起来，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没有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这时，周副主席也插话说，解决粮食困难，除了靠现洋，另一个办法是，晋西北、晋察冀组织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地方工作团到绥远发动群众，还可以带一批支前民工、担架队。

接着，毛主席又给我们提出了另外三条要求。他说：第一，要首战必胜。第一仗必须打好，你们可以用两个纵队，以六比一的兵力，首先歼灭集宁那个师，占领集宁城。然后，各个纵队以归绥为目标，由东向西进军，占领包头以及附近其他城镇。打好集宁、包头这两仗至关重要。第二，必须严格执行俘虏政策。国民党蒙骗他的部队，说和共产党、八路军作战，当了俘虏就被杀掉，一个不留。所以，揭穿他们的欺骗性很重要。你们俘虏了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军官，一律优待，愿去者赠送盘费，愿留者欢迎参加解放军。让俘虏帮我们做瓦解敌军的工作。第三，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工作做好。要宣传我军的政策，我军的主张，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工商业政策，帮助群众治病、挑水、扫院子，让群众知道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来帮助他们解放的。占领了一个地方，就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部队作战。

毛主席讲完这三条要求后，看了看表，说：你们今天不要走了，就住在这里。你们想一想，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可以和恩来同志再谈一谈。他稍停之后，又叮嘱我们：再说一遍，你们进军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把关

内的敌人拉住，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胜仗，占领绥远后。还要在工作团的配合下，把绥远变成解放区。

小小的棚屋，气氛庄重而又活跃。在毛主席给聂司令员和我作指示的时候，周副主席、少奇同志、朱总司令、任弼时同志都有重要插话，连战士御寒的棉衣，行军走路的鞋子，行进中的隐蔽，部队宿营和争取战役的突然性等具体问题，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使我们对完成进军绥远的任务充满了信心。

这天晚上，我们就在西柏坡住下了。聂司令员和我共住一间房子。我们两人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作的指示回忆了一遍，并逐一作了研究。我们深深感到，毛主席这许多重要的指示，都是他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这天晚上，聂司令员对我也作了许多具体指点。我想到这次任务重大，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最好由两人分担。我考虑李井泉同志是晋西北的书记，有很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政治工作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地方工作团和繁重的支前工作也都得靠他。于是，我向聂司令员提议由李井泉同志来当政委，他表示同意。

西柏坡的夜，一片静谧。偶尔传来几声“王刚哥”鸟的啼叫，间或响一阵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这时，部队和老乡们都已酣然入梦，但毛主席那间平房还闪着灯光。深夜，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二兵团领导人发出了通报：“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得志、罗瑞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20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聂司令员向周副主席汇报了头天晚上我们研究的贯彻意见，并说：成武建议，请李井泉同志担任兵团政治委员，我认为很好。

周副主席欣然同意。于是，他带着我们又到了主席办公的那间棚屋。周副主席、聂司令员向主席作了汇报，并向主席谈了要李井泉同志任政治委员的理由。主席当即表示赞同：“就这么办。马上下命令，要李井泉同志在朔县等三兵团部队。”

临走时，毛主席又加拨给我们一批布匹，以备饿肚子的时候换粮食吃。

8月5日，我们回到了华北军区。聂司令员叫我向军区领导汇报了到中央接受任务的情况。聂司令员、薄一波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等军区领导同志又给我作了具体指示。第二天，我带着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托和军区首长的期望，回到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狼牙山东麓的易县远台村，立即着手进行各项具体准备工作。4天以后，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来远台，我们召开了全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请聂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报告。聂司令员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详细地给大家讲了国内外形势，讲了毛主席亲自决定的这一战役行动对东北我军作战的重要意义，讲了作战部署，提出了对部队的要求。聂司令员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到会同志的斗志，大家都异常兴奋，情绪激昂。回去以后，各纵队都开了誓师大会，进行了思想动员。随之，进军绥远的战斗准备和战前练兵，就紧张而有序地在各部队全面地展开。

秋季，狼牙山区红叶烂漫，层层梯田上，高粱谷子熟了，一派丰收景象。8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三兵团各部队从易县、涞源地区分路出发

向雁北开进。经过一周的行军，到了朔县地区，与李井泉政委带领的工作团和晋绥八纵队的姚喆等领导同志会合了。南北两路行军队伍，也都按期赶到，在预定的朔县、山阴、代县地区集结。兵团前委在朔县米西马庄召开了有晋绥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作战计划。

9月4日，部队继续向绥远进发。各纵队分别向集宁、归绥展开。为了隐蔽行动，部队昼宿夜行。虽是中秋时节，塞外已是北风呼呼，寒气袭人。指战员们负重七八十斤，长途行军跋涉，不少同志脚上打起了泡，肩上磨出了血。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鼓舞着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勇往直前。绥远地区村落稀少，宿营困难，为了不惊动群众，部队多在屋檐下、门洞内、矮墙边、草堆里甚至街头过夜。连队还利用行军间隙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打扫院子，挑水推磨，宣传我党政策，使沿途群众打消了疑惧。共产党的好政策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像春风一样吹拂着寒冷的塞北大地，温暖了广大群众的心。

在进军中，各部队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想了很多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毛主席批给我们的银元、布匹，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部队都是用它换取小米、土豆和一些蔬菜、牛羊肉。一路上，李井泉同志带领的工作团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踊跃支前，本着买卖公平的原则，做到有粮给粮，有肉给肉，保证了部队基本上能吃饱。

按照毛主席首战必胜的指示，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用一、八两个纵队包围了集宁城。集宁，是绥东重镇，是连接张家口、大同的要地，城围八里，城高二丈五，宽一丈余，外有六尺宽的护城河。城东南有老虎山，城西是卧龙山。敌人在这两个制高点构筑有钢筋水泥工事。面对坚城，我军将士勇猛顽强，机动灵活，不到一天就攻下了集宁，歼敌一个旅，俘虏敌旅长，传出了进军绥远的第一个捷报。与攻打集宁的同时，我军以破竹之势，用4天时间解放了绥南、绥东的广大地区，又歼敌6500余人，控制了从丰镇以北到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全线。就在这时，我二纵队攻占了包头城，并向西追击逃敌200余里，歼敌大部。我骑兵部队沿大青山向绥北发动了进攻，接着解放了绥西和绥北的广大地区。这时候，天空下起鹅毛大雪，夜间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同志们的眉毛都结上了冰霜，戴着口罩呵出的气很快变为“冰须”。部队忍饥耐寒，顽强拼搏，横扫塞外，乘胜包围了孤城归绥，直逼傅作义的老窝。

三兵团的这一行动，使傅作义大为震恐。他看到后院起火，便慌慌忙忙地把他驻扎北平、张家口的嫡系部队步、骑兵约10个师旅星夜西援。情报传来，我们便留下一个纵队和地方部队监视归绥，控制包头。主力立即挥师东进，集结在丰镇、集宁、凉城地区，准备打击西援归绥之敌。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向北平、承德、张家口地区进逼，策应三兵团的作战，这时，傅作义又不得不命令援绥的10师之众，掉头东返，疲于应付。这样，中央军委、毛主席关于拉住傅部主力不使其出关的战略意图终于实现了，保证了东北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并为随后取得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杨成武：《毛主席指示我们进军绥远》，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高瞻远瞩首战辽沈

1 伟大的战略决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整个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全面地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科学。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120万人增加到280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减少为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余万人。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2/3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在这时候，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

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线，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

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 47 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转入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夫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峰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强调了这一部署原则。从一般情况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 55.5 万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华北的部队。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绥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

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人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我军执行了上述方针，华北敌人即被我军斩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反动军队 52 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组织决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历来的军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泽东同志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针，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

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节录于叶剑英《伟大的战略决战》第一、二部分，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08—222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等职，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关门打狗首攻锦州

在战略上东北国民党军孤立突出，除了华北战场可能抽调少量兵力增援而外，别处无兵可抽。东北战场上双方兵力对比，不论数量、质量和其他作战条件，人民解放军都占显著优势。东北战场，已经明显的形成了对解放军有利的决战局面。所以，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东北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然而，什么时间，首先在哪一点上突击，由于林彪决心一时难下，和中央军委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此时东北已无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大点中选择。仅从东北看，先打长春便于我集中兵力，便于解放区支援，如果敌人增援或突围，在漫长的 300 公里范围内，也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下长春之后，我军解除了后顾之忧，更便于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可是从战争全局分析，情形就不尽然了。国民党之所以没下决心撤出东北，长春 10 万大军救不出来是原因之一。如果打掉长春，敌人卸掉了一个棘手的包袱，就可能迅速下决心向关里撤退，借以保住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所以，早在 1948 年 2 月 7 日，东北冬季攻势尚在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即曾致电林、罗、刘，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样，则要考虑南线作战，首先控制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以及山海关、滦县段。此方案，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敌人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的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毛主席对战争全局的雄略，符合客观实际。可林彪对到敌人要害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却有顾虑；如果久攻不下，敌人援兵上来，再像 1947 年攻四平未下一样，定将影响战局。所以，再三提议先打长春，强调打长春的条件有利，南线作战有诸多困难。1948 年 4 月 18 日电报军委，准备集中 9 个纵队打长春，7 个纵队攻城，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打援，其他三个纵队置锦州、沈阳、四平之间，钳制敌人。并说，“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也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1948 年 4 月 24 日，军委同意了攻打长春的提议。5 月下旬，“东野”用二个纵队作了试打，歼敌 6000 余人，攻占了大房身飞机场。但由于敌人设防坚固，我军战斗组织不够周密，没有实现预期目的。试打之后，则察觉对长春敌人战斗力下降情况估计过高，打长春不是一个猛攻可下的。于是从 5 月 24 日开始，对长春敌人改用围困，部队就地练兵休整。6 月 25 日开始，对长春采用“久困长围”的方针，同时加紧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以求把敌人困到“山穷水尽”，尔后解决问题。

1948 年 7 月 20 日，东北局讨论决定，放弃勉强打长春的计划，而执行南下作战的决策。1948 年 7 月 22 日毛主席回电指出：“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同时指出，不要将向南作战的困难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

失去主动性。应当鼓励和坚定全军指战员向南作战的意志和决心。南下主要打击目标是锦州范汉杰集团。傅作义的部队，均在对付华北野战军，不会妨碍你们行动。建议争取8月中旬，在北宁路打响。东野指挥机关，也应先期南下，以利掌握情况，开阔眼界。

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之地。所以，先下锦州是战役的关键。然而，林彪对南下作战还是未下决心，认为锦州六七个师，工事已经完成，不是急切可下的。因而提议打了北宁路上锦州、山海关间几个小点之后，去打已经划归傅作义指挥的承德第十三军。毛主席多次电报敦促，指出：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并且指出，目前北宁路正好打仗，你们应当迅速出动。

直到9月初，东北野战军领导才明确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决心，并向全军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发扬高度的英勇精神，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以积极精神运用技术和战术，争取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给全国战场以配合，但在兵力部署上，仍准备以7个纵队、6个独立师，置于新民、沈阳及长春之间，以便应付沈阳敌人出来增援和长春敌人突围。而北宁路作战，事实上成了偏师，反映了对北宁路作战的决心不大。9月7日毛主席致电林、罗、刘，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也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春、沈阳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春、沈阳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之敌，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收缩于锦、唐两点，变力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使自己陷入被动。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

经过5个月的折中，毛主席多次致电林彪，至9月上旬才基本解决了辽沈战役首先从北宁路打起的问题。

1948年9月12日，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

战役开始虽然攻势凌厉，但在是否先打锦州问题上，林彪仍未完全打消顾虑。9月26日电报军委，说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毛主席9月27日回电：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回头再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至此，林彪才准备攻打锦州，进一步孤立锦州，并下书锦州守敌云南部队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晓以大义，劝其停止抵抗，以免无谓牺牲，但为卢浚泉所拒绝。

这时，“东野”指挥机关行军途中在彰武暂停，获悉国民党军将以六十二军和独九十五师，由山海关和天津海运葫芦岛，增援东北。4个师的敌情变化，对我军北宁路作战影响不大，但又使林彪增添了新的顾虑，以所谓“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为由，于10月2日致电军委，考虑放弃北宁路作战，仍然回师打长春。罗荣桓政委再三考虑，认为不妥，攻锦计划已经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展开，而且部队士气正盛，再改变计划，不仅违背军委意图，还可能造成不好后果。于是他说服了林彪撤回这个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政委便亲自起草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路作战

兵力的电报报军委。这个电报刚发出，即收到毛主席 10 月 3 日的批评回电。回电指出：“四五月间长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敌第八军、第九军已经调走，你们又因六十二军和独九十五师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这样，林彪才最后下定首先攻取锦州的决心，并且在兵力使用上作了进一步调整，以二、三、七、八、九等 5 个纵队和六纵十七师、炮纵主力攻打锦州，四、十一两个纵队在锦西方向塔山一线打援，一纵（缺三师）进高桥地区作为战役总预备队，五、六（缺十七师）、十等三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十二纵加 9 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毛主席回电，“甚好，甚慰。这才算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了，纠正了长时间内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的坚持实施”。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也于 10 月 8 日进到锦州以北牯牛屯，野战军领导曾多次亲到前沿察看地形，组织攻锦作战。在战役组织过程中，决策人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是允许的，虽然不违背组织原则，有其各方面的考虑，但实践已经证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战役的决策是正确的，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历时 52 天的辽沈战役，至 11 月 2 日胜利结束，共解决国民党军 47.2 万人；我军也付出了 67397 人伤亡（其中牺牲 14010 人）的代价。11 月 9 日和 12 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之敌，分别由海上和陆路撤向关里，东北全境解放。

1948 年 11 月 14 日，毛主席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为新华社写的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战役的正确指导。通过对战争全局的科学分析，首先由东北进入战略决战，而且对初战从哪里打起，因势利导，由一个胜利推向另一个胜利，部作了适时的英明决策。毛泽东主席的运筹帷幄，尤其显示了他的非凡指挥才干。战役发展，尽管情况变化多端，但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统盘运筹进行的。

（摘自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见《辽沈决战》（下）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140 页。作者当时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阻击西援兵团

1948 年 9 月锦州被围，打中了敌人的要害。蒋介石见东北局势严重，于 10 月 2 日亲飞沈阳，一来给他的部属打气，坚定信心；二来协调在增援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在沈阳方面如何增援锦州问题上，蒋介石、卫立煌、廖耀湘各有打算，意见分歧。蒋介石要沿北宁路直接打向锦州，因为西进兵团是东

北国民党军精锐，有全国五大主力军中的两个，新一军和新六军一定可以增援上去。卫立煌要集中兵力守沈阳，利用沈阳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壮大自己，争取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他说与共军对阵，我们都不是生手，锦州攻城决不会不考虑打援，增援兵团出得去可就回不来了。为此，他同敦促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多次争执，甚至起誓说：“出辽西肯走全军覆没，不信我同你划个十字！”廖耀湘同意增援，但不沿北宁路直趋锦州，以免陷入我军口袋，而是沿中长路打向营口，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这样，增援得手固然理想，增援不上去屁股坐在营口也不致失去主动。三种主意各不相让，反复争论。蒋介石也难武断行事，在沈阳高级军官会议上，心情沉重地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我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过去你们要找共匪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青，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这个会议最后形成的方案，是一个折衷方案：西进兵团立即行动，由新民出彰武、新立屯，切断我军后方补给线，借以影响锦州攻城。

蒋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团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后，以最快的速度，直接驰援锦州。可是廖耀湘的援锦部署和行动，正如毛主席指出：“是很胆怯的，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他的西进兵团不敢远离沈阳直援锦州，而是采用取巧的方法，把兵力指向彰武方面。彰武，是我军供应锦州、保障运输的后方补给线的重要据点。敌人以彰武地区我兵力空虚，没有主力部队，容易攻占；而占领彰武，既可避免被汗又可切断我补给线，引我军回援，借此便可解锦州之围。

毛主席及时洞察了敌人的企图，当即发电指出：敌人进占彰武置于无用武之地。卫立煌想用取巧的办法引我回援，借以解锦州之围。只要你们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人进占彰武并非不利。待锦州打的激烈，彰武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了时间。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即是其他目的均未达到，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野司也指示我们纵队，要认真按毛主席指示执行。于是，我十四师主动撤高阵地，隐蔽地分批渡过新开河，转移到新的作战地区。

我第五纵队，于10月3日奉命由开原、昌图一带经过通江口、法库，迅速隐蔽地行进到彰武地区，与第六纵队（欠一个师）并肩战斗共同阻击廖耀湘兵团西进。

10月14日我攻锦州的部队发起了总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锦州，全歼守敌范汉杰以下10万余人。此时的蒋介石，却像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仍然梦想捞一把，妄图再占锦州，打通沈阳与关里的联系。他歇斯底里地命令援锦的东、西两路兵团，加快向锦州攻击前进的速度。

面对敌人这两路进攻，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根据毛

主席电示，我们纵队认真地进行了研究，认为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诱廖耀湘兵团深入。行动上要与敌人纠缠扭打，使它感觉不到前进有覆灭的危险；同时也要打痛它，打得坚决，使它看不出我是在诱其深入。根据这个作战思想，我在新开河、绕阳河地区部署完毕后，就用侦察分队沿新开河两岸活动，引它过河。果然，敌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渡过了新开河。10月15日下午，其主力沿铁路两侧，向我各阵地发起了进攻。

10月19日，长春的敌人，在我强大军事力量的围困下，加之政治攻势的威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迫率部投降，长春全部解放。这时，北宁线上我军攻克锦州之后，榆关以北地区，只剩下锦西、葫芦岛还有几个师的敌人在那里观望。卫立煌率周福成兵团蹲在沈阳不敢妄动，廖耀湘兵团在绕阳河两岸处于不进不退状态。此时卫立煌困守沈阳还是弃城逃跑，举棋难定；而蒋介石仍然坚持他原来的计划，梦想恢复锦州，打通北宁路，把廖兵团和沈阳的10余万人撤回关内。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看透了蒋介石的企图，并顺着他的想法，把廖耀湘兵团诱至大凌河以北地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于是，命令我攻占锦州的各纵队，迅速向四周疏散，搬运物资，扬言要进关作战，同时要北宁线上的十一纵队和各独立师动员群众，准备粮草，完全摆出就要入关作战的态势。野司命令我纵队，要让廖耀湘兵团向去锦州的道路前进，我军则转移到务欢池、阜新以西地区待命，做好下一步的作战准备。自诩为全面军事家的蒋介石，对我军如此大的部队转移行动，却另有一番见解。他对卫立煌、杜聿明等将领们说：据连日空军侦察，锦州的共军主力已经向北票、阜新撤退了，留下的部队很少，看来共军经过锦州苦战之后，伤亡很大，必须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休整补充，才能再战。于是，他决定抓紧时机，让东、西两路对进的兵团迅速行动，廖耀湘兵团全力向锦州攻击前进，锦西、葫芦岛的兵团亦向锦州攻击。从10月20日加快对进开始，杜聿明到葫芦岛督战，卫立煌在沈阳指挥。

经过26、27两日一夜的激战，整廖耀湘兵团5个军全部被歼灭，俘廖耀湘以下8.7万余人。敌人在东北的主力被歼灭了。据有关材料记载，蒋介石在北平得到这个消息后，坐卧不安，气急败坏，顿时口吐鲜血，飞回南京。

辽西地区廖耀湘兵团被歼，注定了东北全境解放即将到来。

（分别摘自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肖剑飞：《围歼廖耀湘兵团》，见《辽沈决战》（下），第117—118页，第461、469—473页。肖剑飞为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指挥员，安东军区参谋长，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

三、气势磅礴淮海大成

1 淮海决战的前夜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9月会议刚刚结束，毛主席关于继续歼灭蒋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号召正在深入人心，全国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华东战场上，济南城头插上了红旗，徐州地区的敌人已经完全暴露在我军的强大攻击矛头之前。

记得孟良崮战役之后，我们初次读到毛主席关于“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的指示，当时，同志们联想到2000年前楚霸王垓下被围的故事，兴奋地说：“那垓下属于古彭城，不就在现今的徐州附近吗？”有人说：“垓下不是徐州，是安徽省灵璧县东南。”“不管它是不是徐州，看来，打到徐州已经不是太远的事了！”真没有想到，只过了一年半，当我军遵循毛主席的英明指示，转入外线作战，取得新的胜利之后，这种形势就出现了。

在济南战役的时候，野战军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针原则，野战军的兵力，除了以足够的力量攻击济南以外，还组织了一半以上的力量，准备歼击徐州地区增援的敌人。但是，由于我军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而济南又迅速攻克，王耀武全军覆没，只身逃至城东被俘，徐州地区之敌，没有敢来增援。蒋介石部署在徐州地区的六十几万“精兵”便呆在那里了，其中包括游动在商丘一带的邱清泉第二兵团，曹八集地区的李弥第十三兵团，新安镇地区的黄伯韬第七兵团，郑州附近地区的孙元良第十六兵团，民权附近的刘汝明第四“绥靖”区部队，东海的李延年第九“绥靖”区部队，临、枣地区的冯治安第三“绥靖”区部队，以及“徐州剿总”匪首刘峙的直属队。他们以徐州为中心，以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为骨骼，好像是蒋介石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划下的“十”字。

1948年9月下旬，济南战役刚刚结束，我华东野战军便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下一步应精心组织淮海战役。并且具体指出，全战役要分三次来打，第一仗，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之线为目标；以后依次歼灭两淮和新、海、连地区的敌人。

当时，华东、中原战场上，蒋介石军队的全面防御被我军粉碎以后，敌人转而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其主要办法，是集中兵力控制几个大的战略要点，控制铁路交通干线，每个战略要点控制一个以至于三几个机动兵团：我攻其一点，周围机动兵团即来增援，使我一下子难以迅速吃掉他的一个兵团，而争取喘息时间进行整顿。在陇海线上，敌人相互靠近的就有三四个兵团，我军要打掉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必须把它的帮手拖开，隔绝起来，才能赢得时间，取得主动。因此，毛主席又指示：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之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这一指示是十分英明的，不仅是取得第一次作战胜利的根本方针，也是取得全战役胜利的根本方针。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和十分审慎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的伟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统一作战意志，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开始举行会议，在前委会议的进程中，安排了时间，召开了作战会议。

10月9日晚上，各纵队的首长在曲阜孔林南面的小楼上会合了。陈士榘参谋长介绍了前委研究的作战方案后，首长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

参加会议的各纵队的负责同志一致认为，毛主席指示的拖住两个打一个、首先吃掉黄伯韬兵团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当时在徐州战场上，敌人在数量和装备方面还优于我军，如果首先吃掉了黄兵团10万人马，斩除了徐州集团的右臂，我军即将完全转为优势。同时，黄兵团右接东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其同伙当中，是比较孤立薄弱的一个，我军已经摸透了它的底细，完全可以隐蔽集结，以几个休整较久的纵队，加强火力配备，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突然发起攻击。我军既然能够在没有老根据地依托的条件下，在睢杞战役中歼灭区寿年兵团，又在8天的连续攻击中打开城防坚固的济南，现

在集中了华东全军，并有鲁中南和苏北根据地的支援，消灭一个黄兵团是有把握的。

古老的孔林，在这小阳春季节里活跃起来了。白天自然是车马不绝，即使在深夜，也常是轻骑来去，伴和着电台急促的发报声，驱散了孔林惯常的幽静。

我们司令部作战科的同志们，都被即将到来的胜利鼓舞着，以能参加这样的工作而感到荣幸。许多同志都怪白天的时间太短，而蜡烛在夜间又这样不经烧。

正当野战军首长领导我们拟订作战计划时，军委发来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毛主席十分具体地指出：要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人一个师（军）的办法，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兵团3个师（军），要用一半以上的兵力牵制、阻击和歼灭援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军）的目的，否则就没有可能。

会场始终笼罩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首长们一会围着地图，用铅笔和手指在图上比来划去；一会又离开地图，暂时陷入沉静的深思之中。高声谈，低声议，每个指挥员所设想的，不只是自己的部队怎么行动，而且想着敌人会怎么行动。有人说，指挥员的心血，在枪响之前，已经倾泻在他的计划上了。这话千真万确。我们这些长期在司令部作具体工作的人，都有这么一个体会：中央军委的参谋部，不仅在毛主席身旁，而且还远在各个战斗的前线。毛主席拟订的每一个战役计划，像明灯照亮着各级指挥员的心；而指挥员的具体指挥，又从各个方面充实着来自最高统帅部的计划。

讨论一直继续到深夜，最后粟裕同志综合概括了大家的意见，并提出在北面以两个纵队包围临城，迫使敌人起义，主力直攻韩庄，控制运河桥梁，乘胜进逼利国驿及贾汪；另以两个纵队攻台儿庄，捣毁冯治安后方，迫其起义或调离台儿庄，如果敌人回援，就在运动中把它歼灭，控制运河以南阵地，阻歼由徐州向北增援的敌人。如果徐州的敌人被迫这样行动，则歼灭黄兵团的条件便形成了。

扩大的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9月会议决议，学习了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示，直接地大大地加速了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当庞杂的准备工作完成时，我军便分路从济南、泰安、临沂等地区齐头南下了。整整大半个山东，人在飞奔，车在追赶，骡马嘶鸣，黑夜也成了白天。

敌人察觉到我军移动的某些迹象，估计我军将向苏北行动，便相应地调整部署。我前线指挥部一面按原定方案，在江淮、豫皖苏、冀鲁豫地区公开宣传我军要攻打商丘、徐州，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一面召集了第三次作战会议，准备以一部在鲁西南暴露佯攻，迷惑敌人，叫敌人回头。同时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正面阻援兵力，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成功。

毛主席立即批准了这些部署。于是，我军要打徐州、商丘的消息到处飞传，搞得敌人做梦也在大叫：“徐蚌会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的时候，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部队：应坚决执行已定部署，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大胆，愈能胜利。第一仗，力争歼灭以黄兵团为主的21个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

个形势即将改变；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即有可能向徐蚌线逼进，打第二仗，歼灭正在北援的黄维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的指示更加坚定了前线指挥员的决心。11月6日晚，我各路大军一齐出动，横扫陇海路北侧敌军阵地。首先在鲁西南方向，有我两个纵队及部分地方兵团约3万余人出动。敌人却误认为我军有6个纵队南下，几次调整防御部署。正在犹豫中，其他各部敌人已同时受到我各路部队攻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惶惶无主，举棋不定，互相不能照顾，一时又查不出我军的主攻方向，无法互相增援。以致郟城守敌被我东路部队全歼，敌第三“绥靖”区三十半师2.3万多人在我中路部队威逼下起义。我军乘隙穿过台、枣，直插徐州东侧，指向陇海路。经由滨海迂回至陇海路南向睢宁地区北上的我军一路，也向徐州疾进。黄兵团等不及部队集结整齐，便忙着向西逃窜。我军主攻集团各纵队日夜迫赶，把它搞得稀烂。黄兵团赶过运河，就被我南北对进的几个纵队堵住。接着就被我几路大军团团包围起来。

淮海决战的时机成熟了。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一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继辽沈战役之后，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进行了又一个大规模的决战。

这是敌人即将死亡和中国人民革命更加接近胜利的决死战，战斗空前剧烈；甚至一个点、一条线都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拚杀和争夺。但是敌人那一套极端反动而又极其蹩脚的战略、战术方针指导下的作战部署，已被我军分割得支离破碎，顾此失彼，一切都成为绝望的挣扎。我军全体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的指示，英勇奋战，一个连着一个的胜利，在血与火中诞生了。

（作者谭旌樵，选摘自《星火燎原》（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0—117页。）

2 碾庄首战断敌一臂

发起淮海战役，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1948年9月24日首先向中央军委及华东局、中原局建议的。刘伯承、陈毅司令员接此电后，在河南宝丰附近大张庄研究了差不多一天，我也在场。9月25日上午，刘陈首长和我电告军委并华野：“粟二十四日七时电悉。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势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二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毛主席拟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并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同日，中央军委又电刘、陈、邓、李（达）：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刘、陈、邓首长遵循中央军委的上述指示，研究拟定了攻击郑州的作战计划。10月13日，中央军委即予批准，同意“按你们所规定的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打援”。同一天，邓小平政委在军区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旋即，中野首长召集第一、三、四、九纵

队领导干部，在郑州西南的宝丰县皂角树村开会，专门研究部署攻打郑州的方案，10月18日，颁发了郑州作战的基本命令。杨勇、苏振华、陈锡联、阎红彦、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李春芳等分率各纵进入指定地点，在华北军区十四纵及附近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准备发起郑州战役。陈毅、邓小平和张际春于19日下午，从皂角树出发，驰往郑州前线四纵司令部指挥。至21日夜，我军实施对郑州之敌的包围，22日拂晓，郑州守敌十二绥靖区四十军一六师、九十九军二六八师和郑州警备司令部等万余人弃城北逃，被我九纵全歼于郑州以北之老鸦陈地区，生俘敌少将参谋长余辉廷。郑州宣告解放。

开封敌慑于我军之威力，24日弃城东撤。我豫皖苏军区部队收复开封。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解放郑州极为关注，连电嘉勉：“占领郑州甚慰。”“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此祝贺。”开封收复后，中央军委指出：“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小平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中央军委曾于10月22日电示陈、邓：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东进。复于25日3时，指示陈、邓率中野主力到蒙城地区集结，然后攻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埠段铁路。陈、邓根据敌我态势，进行了反复研究，于当天下午急电军委，建议把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10月26日，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个建议，毛主席拟电复示：“同意你们二十五日申电，以十天行程于十一月四日集结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28日进一步指示：“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并指出：“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得知中野不出淮南，于10月31日23时向中央军委建议，淮海战役即将发起，这次战役规模很大，请已到达前线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

同一天，陈、邓向军委提出了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方案，表示“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钳制邱、孙两敌之任务”。代表了中野全体指战员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复陈、邓、粟，同意“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此时，华野正在部署割裂、围歼黄伯韬兵团，佯攻徐州。刘伯承司令员则指挥二、六两纵（包括陕南部队4个团、一纵的二十旅、豫西一个团），分别经由西平、驻马店中间地区和花园、宣化店，向息县方向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造成与华野合攻徐州的态势，以迷惑敌军。

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和准备已告完成。

11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邓子恢副政委和我在豫西研究落实军委指示时，着重讨论了截断徐宿线的时机问题，向军委及陈邓建议：“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斩断徐、宿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可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

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陈邓首长当天正在拓城西北的刘楼，于深夜进至亳县。军委、毛主席于5日电示陈、邓：“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

整个战局的发展很快。淮海战役发起时，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华北、西北我军已全面展开攻势，平津战役已在部署。在淮海战场，中野主力在解放碭山之后，向徐蚌线逼进，两大野战军已经靠拢。敌黄伯韬兵团遭华野分割追堵之际，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二将军率部在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开放了台儿庄一带的运河通道，使徐州东北大门洞开，刘峙之邱、李、孙三个兵团慌忙向徐州收缩。军委和毛主席当机立断，于11月9日作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主力，勿使南窜”的重要决策。又于9、10、11三日连续数次致电陈、邓：“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并指出：“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足见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完成对徐州的包围，对于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1月10日，刘司令员率中野前指从豫西东进淮海前线，同陈司令员、邓政委会合。他们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攻打宿县和切断徐蚌线的问题，并决定于12日发起徐蚌作战。

我四纵和华野第三、两广纵队在徐州以南的夹沟地区，迫歼从宿县北撤的孙元良兵团四十一军军部及所属一二二师，俘敌3000余人。军委、毛主席13日指出：“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14日，该部在三堡地区又歼三绥靖区残部七十七军军部和三十七师4000余人，并逼近徐州。我三纵于12日包围敌交通补给基地宿县城。守敌恃高厚的城墙、坚固的永久工事和宽深的护城河进行防御。15日17时，我三纵在九纵一部协同下，发起攻击，经数次强行架桥，连续爆破，突入城内。击退敌人多次反扑，逐街争夺，激战至16日凌晨，终克宿县。计歼敌第二十五军之一四八师、交警十六总队等1.2万余人，俘敌津浦护路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豫皖苏独立旅、军分区部队和豫西两个团。攻占蚌埠以北的固镇，破击了曹村至固镇间的铁路100公里。

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华野全歼黄伯韬兵团，解放徐州东、北广大地区；中野攻占宿县，斩断徐蚌联系，解放徐州西、南广大地区。从而陷徐州之敌于孤城，使援敌黄、刘、李兵团不能靠拢徐州，力淮海战役顺利发展，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摘自李达：《回顾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见《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1988年版，第2—9页。作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包围徐州的重要一仗

攻取宿县，由南翼截断徐蚌线，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的重要一仗，是中野三纵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22日，毛主席两次电示中野：“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并提出：这一行动“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当时正在指挥部队攻击郑州的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10月22日复电军委，“于二十五日开始东进，出商丘，或直出徐、蚌、钳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中野一、三、四纵队，于10月27日由郑州地区沿陇海路及其南侧东进。11月5日，进至永城西北会亭、白庙及亳县以东地区。正在豫西的刘伯承司令员、邓于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于11月3日建议：“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律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3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盖如此，则不仅孙兵团可能北援，便于我在运动中给以歼击，即邱兵团亦可能被迫南顾，减轻其东援之压力，对整个战役帮助较大。请陈、邓切实考虑，机断行事。”中央军委、毛主席于11月9日，10日电告陈、邓，提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至要至盼。”“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11月10日刘司令员来淮海前线与陈司令员、邓政委会合后，他们着重研究了从速攻取宿县截断徐蚌和如何对付黄维兵团的问题。

当日野司下达徐蚌线作战命令：中野四纵队、华野三纵队、两广纵队，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向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以我三纵队和九纵队一部攻取宿县城；九纵队主力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沿津浦线固镇蚌埠段向南推进，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援；一纵队位宿县西北为预备队。11月11日晚，野司在临涣集文昌宫召集各纵队领导同志的会议，邓政委指出：此次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从正面扑向津浦线，夺取宿县，控制徐州、蚌埠段，对直接配合华野歼灭黄伯韬兵团，对防止徐州敌重兵集团南逃，特别是对阻止由平汉线确山东进急援徐州之敌黄维兵团，都有重大意义，我们占领了宿县城，控制了徐蚌两侧广大地区，就有了战场，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黄维兵团。最后邓政委指出：淮海战役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大胆地去夺取战役的胜利。我们三纵队在西二铺以西连夜召集各旅领导同志开会，传达了首长指示和野司部署，认真讨论了作战方案。

部队接受任务后，在行进中进行战斗动员和各项战前准备工作。陈毅司令员打电话指示，部队行动越快越好，这一仗关系重大，只准打赢，不准失败。部队在大雨滂沱中昼夜兼程，直扑宿县。全体指战员都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决战，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夺取胜利。

宿县城有高厚的城墙，坚固的工事，环城有宽约三丈、水深没顶的护城河，易守难攻。该城四关，特别是东关，日寇修筑的兵营，方圆占地三里，

称“小东京”，连接火车站，构成宿县的外围据点。城墙已经改造，筑有多层暗堡。城内街道筑有路障、地堡等工事，与各驻守要点配套，构成若干能独立作战并能以火力相互支援的支撑点。敌人用十多辆装甲车，配置在各要点和主要通道上，既可掩护步兵冲击，也可固守要点，阻我前进。守备之敌共1.3万余人，建制庞杂，难于协同，但成员受反动教育影响较深，必将固守。

各旅按纵队部署，急速向宿县地区开进。

14日晚，七、八两旅由城东发起进攻，在炮火支援下，以迅雷之势突破东关敌人防御。各夺关部队密切协同，于14日4时在关厢西端会合。至此我全部攻占四关，宿县守敌陷入严密包围之中。

11月15日17时，总攻开始。为迷惑敌人，担任南、北两关佯攻的部队，提前15分钟开始行动。接着，东、西关攻击部队开始了半个小时的火力准备，一条条火龙准确地射向目标，打得城墙、城门砖石横飞，地动城摇，敌军阵地上一片浓烟火海。到16日晨3时，全歼宿县守敌，战斗胜利结束。除毙伤外，计俘敌津浦路护路中将副司令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以下官兵1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攻克宿县，截断徐蚌，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攻占宿县、截断徐蚌，斩断了蒋介石大本营与其徐州集团的联系，摧毁了敌陆上唯一的补给线，吸引了徐州之敌南顾，减轻了东援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华野主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作战；使麇集徐州的刘峙集团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成我军又一次“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既可防止徐州敌之南逃，又可构成宽厚正面，抗击蚌埠之敌北援，不仅可粉碎敌“南北对进，打通徐蚌”的企图，而且形成了淮海决战的格局，使敌首尾不能相顾，为尔后我各个歼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战役态势；我控制了以宿县为中心徐蚌两侧广大地区，也为战役第二阶段聚歼远道而来、孤军深入的黄维兵团，准备了广阔的战场。

（摘自陈锡联：《截断徐蚌线会战双堆集》，见《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12页。作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4 建特纵为虎添翼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军事形势发展很快。豫东战役结束后，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准备组织空前规模的大战役，在西柏坡召见厂华北、华东野战军炮兵主要负责人，检查了解炮兵部队的情况。毛主席接见时，以十分形象的语言，向我们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解放战争好像爬这座山”，他举起拳头对我们比划着说，“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当时国民党军队数量还超过我军，毛主席已对敌我双方军

事力量对比已起转折性变化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还指出，今后要打更大的歼灭战，要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夺取大城市，炮兵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定要把炮兵工作做好，一定要把炮兵打大仗的准备做好。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周副主席对炮兵建设的关怀、重视和对炮兵所寄的希望，对我们鼓舞极大，是最有力的动员，时间过去一个多月，战争形势又有新的发展，我华野一举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辽沈战役和全国秋季攻势正在顺利发展，敌人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1948年10月，华野前委召开曲阜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九月会议决议。会议后期召开了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军委毛主席和华野前委关于举行淮海战役的意图和作战方针，到会的同志异常兴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

华野特纵，是华野前委遵照党中央1947年2月1日关于“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的指示精神，于1947年3月18日在鲁中沂水正式建立的。创建特种兵纵队时，华东军区和野战军抽调了技术干部，又从各步兵纵队抽调了300多名有战斗经验的步兵班长分配到美式榴炮团当炮手，增强了特纵的骨干力量，缩短了特纵的组建过程，并继承了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淮海战役战斗规模之大，兵力兵器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战役开始时敌我炮兵兵力对比为1.3:1，敌人略占优势。我炮兵的任务艰巨、繁重。要压制并消灭敌人前沿、纵深的有生力量和轻重武器，要破坏敌人的防御设施，要袭扰敌人的指挥和通信系统，还要和敌人的坦克和空军作战，并压制其停车场和临时野战着陆场等，目标纷呈众多。因此炮兵必须集中使用，统一指挥，才能形成战役局部和战斗的火力优势，发挥炮兵的威力。这时，我军炮兵在装备技术上、指挥能力上，都有了进步，可以打单炮直接瞄准射击的近战，也可以打炮兵连间接射击的远战，而且观测、通信器材也有增加，这些都为集中使用统一指挥炮兵具备了条件。实践证明，炮兵集中使用统一指挥的原则是完全正确，可以做到的。

在淮海战役中，以炮兵为主体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配合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步兵，“为虎添翼”，取得了伟大胜利，完成了总前委、华野前委赋予华野特种兵的战斗使命。经过大决战的考验，华野特种兵受到步兵指挥员的赞扬，提高了部队的威信和自身的兵种荣誉感。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总前委和中野、华野首长重视和各纵的支持。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适时地提出，“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华东野战军前委在贯彻执行中央这个指示时，决心大，气魄大，成立特种兵专门机构来加强特种兵的领导，结合华东我军实际在诸特种兵中突出炮兵建设，同时采取从各纵队调火炮，调牵引汽车，调炮兵干部，调有战斗经验的班长到美式榴弹炮团当炮手等有力措施；野战军各纵队英勇善战，打歼灭战缴获的车炮，服从大局，积极支援纵队建设；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人民，为建设“我们自己的快速纵队”（群众指称摩托化美式榴弹炮兵）乐于贡献力量，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特纵。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带决定性的基本条件，要在1年零8个月的短短时间里，拿出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技术兵种炮兵参加决战，供华野前委和总前委作预备

炮兵使用，这是不可能的。饮水思源，永远不能忘记上面这些基本原因。而其中，最基本的乃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总前委和华野、中野首长的正确决策和指挥。这是胜利的根本。

（摘自陈锐霆：《为虎添翼——淮海战役中的华野特种兵》，见《淮海战役》第2册第409—411页，422—423页。作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建国被授予少将军衔。）

5 决胜于千里之外

1948年的秋天，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号召，给了我们具有决定意义的指示。祖国南方的广大人民在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仍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迫待解放。祖国的北方，解放区的人民在我党的领导下，正喜气洋洋，忙于生产支前；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胜利消息鼓舞下，斗志愈加旺盛，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向南进军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的作战预先号令下来了，他指示华东野战军迅速处理济南战役的善后工作，然后立即南下，并提出关于下一步战役具体行动的建议，要我军南下组织淮海战役，消息传到纵队首长以后，大家高兴地说：“好极了”，“又有大仗打啦！”

10月11日，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

由于战局迅速发展，敌军主力都向徐州集中，毛主席曾指示：第一仗力争歼灭黄伯韬、李弥等21至22个师，如果能够达成这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华野、中野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如果敌人不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我们就可以打第二仗歼灭黄维、邱清泉，使徐州的敌人完全孤立起来。根据情况的变化，毛主席又迅速作了决定性的指示，调整部署，由陈毅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直接指挥中野四个纵队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华野两个纵队（三、广纵）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中野部队联结，如徐州敌人向南总退却，就集中6个纵队歼灭之。华野我军以3个纵队由北向南，1个纵队由南向北，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控制徐州运河车站间的铁路，运河以东的主力则歼灭黄伯韬兵团。这样就把蒋介石的兵力割裂开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占领徐州。毛主席要求我两大野战军按照这个方针坚决执行，而且鼓励同志们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鉴于南线决战时机成熟，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书记，总领导与指挥华野、中野两军，在原拟淮海战役计划基础上，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准备以3至5个月的时间各个歼灭敌人于淮河以北地区。并责成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全力组织支援。

当时淮海战场交战双方兵力，敌人虽有5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共约80万人，但矛盾重重，军事上屡遭失败，士气低落。我军方面，华野16个纵队36个师，约42万人，中野7个纵队20个旅，共13万余人，另有军区武装21万分散在各地。在兵力对比上，我军稍处劣势，但是我军经过整党和新式整军，战斗意志空前高昂，不仅有广大人民的支援和地方兵团参加决

战，而且两大野战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总前委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取得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不过，说实在的，如果按我们原计划先占海州、连三港，控制陇海东段，后占两淮（淮安、淮阴），打开华中粮仓，再进击徐蚌段，孤立徐州相机夺取徐州，抑或仅就黄伯韬兵团当时现有态势，以新安镇为中心围歼敌人，那么，就只能歼灭蒋介石少部分有生力量，而且徐州解放也要推迟。然而，由于毛主席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了及时的恰当的处置，确定第一仗歼灭黄伯韬兵团后，即转向徐蚌，围歼黄维、邱清泉等兵团，并以高度的军事艺术，巧妙地使用兵力，把蒋介石以徐州为首脑的 80 万重兵肢离体解，一个阶段紧接一个阶段，一环连套一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从而使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获得的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这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战略战役指导的灵活性。诚如毛主席所说的“……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

华野与中野主力，根据毛主席的意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徐州东、南、西、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敌人估计我先夺徐州。东面的黄伯韬兵团，原以为能够机动截击我军南下，沿陇海铁路向东可以支援东海方面战斗，向西可以屏障徐州，控制陇海东段，分割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毛主席令华野前委以华野 10 个纵队向新安镇方面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敌黄伯韬兵团，以三个纵队经徐州东北的贾汪地区向徐州东侧的曹八集方向实施辅助突击，割裂黄与徐州的联系，并阻击徐敌东援。战役一开始，黄伯韬即仓皇西逃，不敢应战。黄伯韬兵团 4 个军，和原驻陇海铁路东端新浦、海州之敌第九绥靖区司令部所率的四十四军，企图靠拢徐州。

这时，毛主席对战役第一阶段的既定决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在整个淮海战场上，黄伯韬比较孤立突出，兵力部署比较薄弱，“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正可以首先从歼灭黄伯韬下手。更重要的是歼灭黄伯韬，可以打通山东与华中的联系，利于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所以，当黄伯韬开始西逃时刻，华野前委立即重申全歼黄伯韬的决心：要求主要突击集团排除万难，勇猛追击，辅助突击集团迅速猛插徐州东侧，堵击黄伯韬西逃，同时阻击徐州之敌向东接应。并指示全军不为小股敌人所牵制，务必日夜兼程，飞兵前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追到哪里！

为了隐蔽首歼黄伯韬兵团的企图，毛主席指示中原野战军于战役之前，即在河南南部采取战略佯动，以 3 个纵队在平汉线上吸引黄维、张淦两兵团向西。战役开始时，中野又以 4 个纵队和华野两个纵队，由豫东和鲁西南转入徐（州）、蚌（埠）线作战，由中野负责攻占徐州南面的宿县，切断徐蚌线，对徐州完成战略包围。

中野一、三、四、九纵和华野三纵、两广纵队，11 日即进至徐州西南地区，由西、南两面威胁徐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这里是一个机动地带，往东北可攻击徐州，往东南可攻宿县。中野部队与华野两个纵队联结，又可构成阻击地带，成为战略上的强大阻援与打援集团，阻止徐敌南逃和阻击敌人由南或西来的增援。

13 日，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广纵向徐州逼进，占领徐州西侧的萧县。按原定计划，我中野部队于 15 日攻占了安徽宿县，全歼该城守敌 1 个师，完

成了切断津浦路的任务，军事重地的徐州至此已完全置于我两大野战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战役开始不久，蒋介石急令原属武汉方面的黄维兵团增援徐州。黄维带着他的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一共12万人马，从河南南部的确山出发，日夜兼程东进。遵照毛主席指示，战役之初，中野已有两个纵队先在平汉线上看住它、留住它，它开始东进增援时又立即先敌机动，走在它前面拦住它。我中野二纵、六纵及地方武装一部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自平汉线起，沿途侧击、尾击黄维兵团，阻滞它的行动，并于15日越过黄维兵团，先到安徽北部的涡阳、蒙城地区，阻其前进。

11月22日，经过17天运动战和阵地战，蒋介石嫡系的第七兵团黄伯韬部4个军及其指挥下的第九绥靖区1个军，共10个师，约近10万人，至此即宣告全军覆灭。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之初即战栗哀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纠集其全部可能集中的兵力，幻想在最后挣扎中获胜。不料第一仗便丧失徐蚌地区兵力1/4以上。初战既败，于是一面再求洋爸爸美帝国主义给予直接军事保护，一面想把徐蚌兵力撤守长江以南，以便卷土重来，毛主席早已预见敌人这一着，在战役第一阶段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使徐州敌人陷于我战略包围之中。此时，徐州守敌恐慌万分，赶紧制造所谓“徐州会战大捷”，强令各报馆出号外，以稳定人心，掩饰败迹，并为预防导入黄伯韬的复辙，迅速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紧缩徐州，加强防御，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南线李延年兵团遭到我严重打击后，惟恐被歼，迟迟不敢北进。而这时，黄维兵团已进入我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中了。

毛主席根据战局发展的有利形势，决定乘胜扩大战果，采取南北堵中间围歼的方针，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华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围歼敌黄维兵团，毛主席特别指出，在黄维兵团被围以后徐州敌人可能倾巢南逃。毛主席重申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决心，指示总前委和华野要对此作出妥善的部署，以便贯彻分割敌人，各个歼灭敌人，坚决不让敌人跑掉的既定方针。

华野接到毛主席这一指示以后，司令部作战室忙碌起来了，粟裕副司令员向司令部同志提出徐州敌人今后几种可能，要大家讨论分析。

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围住的一大堆敌人，都是建制较完整、兵力很大的精锐兵团，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辖4个军，其中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杜幸明更是蒋的亲信，两个兵团中也有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蒋介石的所谓五大主力，其御林军七十四师已于山东战场被歼灭，新一军、新六军于东北战场被歼；现在就剩这两个本钱了。蒋介石从空中每天大量接济这两大堆人，空军轮番的向我轰炸袭击，包围圈内的敌人在空军的掩护下以步兵坦克协同，不断向我实施反扑。

毛主席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形势，为加速战役进程，决心采取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阻住李延年的方针。刘伯承司令员又明确指出，这是“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方针。遵照此指示，华野首长当即决定对杜聿明采取东北攻击，西南守备，先打弱敌，再歼强敌，逐步削弱敌人的方针。陈毅司令员从总前委电话嘱咐我要华野部队把西南堵好，不然将影响南线作战。我坚定地答应他：“司令员请放心，一定堵住它，只要你下命令，我们就可各个消灭它。”他又叮嘱说：现在不要急，首先缩小包围圈，还是车干水来捉大鱼吧！最后他愉快地放下了话筒。陈司令员指挥作战非常干脆，

气魄大，洞悉全局，判断情况正确，善于发挥各个部队特点，调动各级干部积极性。以往凡是华野在作战问题上有争论时，只要他一席话，大家就都心悦诚服地按照去做了。从外线出击以来，毛主席命令陈毅司令员随中野行动，以便统一指挥华野外线作战兵团，因而较长时期，我们只是从电报中得到他的指示，现在直接从电话中得到他的指示，多么亲切啊，更加鼓舞了我们的信心。

经过 20 多大的激烈战斗，黄维兵团终于被我中原野战军彻底、干脆地全部歼灭了，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为我生俘。黄维兵团的被歼，是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被歼后遭到的又一次致命打击。它不仅使蒋介石丧失了包括“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在内的 12 万精锐之师，而且也最后地孤立了被围在徐州西南的杜聿明集团，造成了我迅速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大好形势。诚如刘伯承司令员所说：歼灭黄维之战，是整个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中原野战军的这一伟大胜利，大大鼓舞了正在围歼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我们决心以彻底歼灭杜聿明集团，争取战役全胜来和中原野战军展开革命竞赛，并以此庆祝中原野战军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的进程，又一次说明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的英明和无比正确。

黄维兵团被歼后，我们机动的兵力愈来愈多了，蒋介石所下的杜聿明这一着棋好像围棋一样已成为死子了，所谓徐蚌南北对进更加渺茫了。

12 月 17 日，总前委随中野行动的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司令员来到萧县东南的蔡凹，开了总前委会议。当时，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未成为主要议题，主要是研究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建议，与部队整编方案（纵队改军）。会后，刘、陈首长赴中央开会，接受中央、毛主席的指示。

12 月 22 日，毛主席电示：只要杜部不突围，应休息到 1 月 5 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毛主席为什么指示围而不攻呢？当时，不少同志存有疑问，因为敌人已是釜中之鱼，我完全可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举加以歼灭。可是大家细想以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概是放长线钓大鱼！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继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黄维兵团又遭全歼；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 60 多万国民党军队，为东北野战军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惊，加之大沽与天津间交通已经全被截断，赶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于 12 月 20 日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从速完成江防准备，又指示刘峙将总部不必要人员及笨重辎重适时南运，企图将主力转运至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对华北方面的敌军，蒋介石打算“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这在蒋匪军将要南撤而未实行的时候，我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兄弟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为呼应，推迟攻击，“缓和”局势，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暂缓攻击好比是一颗“定心丸”，可以麻痹敌人，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促其幻想在江北“拚”下去。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互相配合，达到大量各个歼敌的目的。而我暂留杜聿明余部，又好比是扔出一块“鱼饵”，因估计在我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际，李延年兵团可能再次北上救援，届时我担

任南线防御的中野各部，便可诱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加以时届严冬季节，加强对敌围困，可以利用天时进一步造成敌人困难，我则可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

毛主席教导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获取战争全局性的胜利，是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自1949年1月6日16时起至10日16时止，经过4昼夜96个小时的激战，全部肃清了徐州西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88个村庄中据守之杜聿明所部邱李两兵团及孙兵团之残部，计1个战区司令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20个师，约20万人。其中有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五军在内。平均每天歼敌约5万人。坚决、迅速、干脆、彻底、全部大量地歼灭敌人，是这一大歼灭战的特点。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共65天，根据毛主席的计划，我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歼国民党精锐部队22个军、56个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共55.5万人，并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防御计划，至此我华东、中原和华北三个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它的胜利连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继续盘踞中国大陆的信心，为我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我反复地重读了淮海战役方针，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淮海战役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所参加的最大一个战役，它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取得胜利的，官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总前委的直接组织下进行的，尤其中原野战军英勇顽强地执行了毛主席所发布的战略进攻的命令，开辟了豫皖苏鄂根据地，进行了中原逐鹿之战，使敌人疲于奔命，为我组织淮海战役直接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给了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无限的生命力，淮海战役几乎是各种战斗类型的综合，我们是从阵地进攻突破开始，接着是追击，是阵地防御，继而转到攻坚，最后又是追击，什么尾追呀，平行追击呀，拦头堵击呀，一句话，除了没有空降外，追击中的各种战斗样式我们部采用了，而且把追击与包围结合起来，以包围、分割、大块围、小口吃、大块割、大块吃、阵地攻坚战而告终。总的来说，当时就敌我总兵力对比来看，蒋军还多3万人，在装备上更超过我们好几倍，他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在这些方面我们是完全处在劣势的，但我们贯彻了毛主席规定的淮海战役作战方针，运用了毛主席指示的十大军事原则，在战斗中，又不断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与启示，灵活地运用了战略战术，充分发挥了我人民军队的人的因素作用，贯彻了人民战争的方针，取得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支援，因而克服了物质技术装备的弱点，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们心情愉快地欢呼：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

（摘自张震：《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役方针——回忆淮海战役》，见《红旗飘飘》第1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68—130页。作者当时为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四、文武结合留取平津

1 文章从西线做起

194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通知，要我立即赶往平津战役指挥部工作。这之后，于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罗荣桓和我组成中共平津战役总前线委员会。

辽沈战役结束不久，毛泽东同志就要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准备发起平津战役，与华北部队一起，共同歼灭华北的敌人。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这个指示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一样，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出发以前，就曾到西柏坡受领任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同志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平津战役的全面形势，又十分正确地规定了我军的任务和部署。我觉得，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毛泽东同志是从西线做起的。

那时候，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华北战场上的敌人，屡遭我军沉重打击之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的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傅作义指挥的部队，大约还有60余万人。他的主力部队4个兵团，12个军，52个师，部署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在具体兵力部署上，傅作义是煞费苦心的。他有意把蒋系部队摆在北宁线，把傅系部队摆在平绥线，一旦东北我军入关，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傅系部队在不利情况下，可以向绥远逃之夭夭。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敌人在于津固守，还是从平津撤退，在蒋介石、傅作义和美帝国主义三者之间，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蒋介石是既想让傅作义固守华北，迟滞我大军南下，又想把华北兵力全部南撤，巩固江南防务，举棋不定；傅作义也脚踩两只船，想看看形势变化，平津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西逃绥远，不得已时就向南逃跑，但又摆出固守的架势，想捞取美援，扩充实力；美帝国主义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从援蒋武器中拿出一英寸，直接供给傅系部队使用，好让傅作义固守平津，维护美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敌人的心理状态，认为傅作义虽有西逃、南窜两种可能性，但西逃的可能性较大，因为绥远是他的老窝。

这时候，东北我军主力尚未入关，如何在他们入关之前，将敌人抑留在华北，不使其南窜或西逃绥远，这是当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考虑的中心问题。经过一再分析、研究，决定从二十兵团包围张家口、宣化入手。毛泽东同志指示杨成武，李井泉主动撤围归绥，不使傅作义感到太紧张，随后又迅速包围张家口、宣化，诱使傅作义派兵西援，以便掩护东北我军秘密入关。

由杨成武同志率领的二十兵团，以3个军的兵力进入张家口附近地区，形成对张家口、宣化敌人的包围态势。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着很灵，傅作义果然着了急，立即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五军，驻守怀来的第一四军，分

别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以便形势不利时能够保住逃往绥远的通路。

这样，傅作义的大部分嫡系部队共约 10 万人，已被我军钳制在平绥线上，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我军人关的第一步计划。

这时候，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长途行军，分别经喜峰口、冷口，越过长城，陆续隐蔽入关，先后到达迁安、丰润、遵化、玉田、蓟县地区集结。

东北我军主力一入关，傅作义又作了错误判断，他认为我军会直取北平，遂急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为打通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敌人从东西两个方面，倾全力向沙岭子猛攻，然后向新保安方向撤退，企图缩回北平。

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同志一面令杨得志等同志率领第十九兵团主力，由易县经涿鹿迅速向宣化、下花园地区开进，以隔断怀来与宣化的联系，一面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由蓟县经密云向怀来、南口急进，以隔断怀来与北平的联系。这一步，我军总的意图是将傅作义的西线兵力分割包围，既不让第三十五军缩回北平，也不能让北平的敌人接应第三十五军，然后，待机将他们分别歼灭。

经过激战，我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2月8日，我第十九兵团将敌第三十五军严密包围在新保安，使其动弹不得。12月9日、10日，第十三兵团先后歼灭了企图救援第三十五军的第十六军和第一四军。我第二十兵团也多次击退了张家口敌人突围的企图。

第三十五军被我包围在新保安之后，前线指挥员都想早日动手消灭它，但毛泽东同志指示暂缓攻击，两个星期内“围而不打”，因为东北入关的部队，正在进行战役展开，对于平、津、塘的敌人，尚未完全隔断、包围，如果先攻击新保安的敌人，不但会使张家口的敌人向西突围，还会使张家口以东的敌人决策逃跑。所以，不仅西线部队“围而不打”，对平、津、塘的敌人也“隔而不围”，以便在敌人难以觉察之中，完成整个平津战役部署。

毛泽东同志还指示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在两个星期时间内，淮海战场不作最后歼敌部署，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敌人的决心。中央又命令山东部队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做好准备，防止敌人可能从青岛方向逃跑。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华北军区所属的冀中、冀南等军区，也动员部队和广大民兵，分别在平南、津南、沧县、德州等地区，迅速构筑起数道阻击阵地，以防敌人从陆地上逃跑。当然，从那时候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甚至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防止万一罢

这样，我军就撒开了天罗地网，使平津的敌人插翅难逃。

我作为华北军区的负责人，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战略部署，以及许多具体指示，真是由衷地感到敬佩。

在完成了对全线各点的敌人分隔之后，根据既定的部署，在西线先由第十九兵团，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开刀。

12月22日晨，我军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第十九兵团的指战员，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尽管第三十五军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全歼了第三十五军 1.9 万多人。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军，在新保安找到了自己的坟墓。

全歼新保安敌人之后，我第二十兵团 3 个军，北岳军区的部队、骑兵第三师和东北野战军的第四十一军，紧接着向张家口发起了攻击。

在此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敌第三十五军被歼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有向绥远逃跑的可能。所以，我军在完成包围张家口之后，在周围四五十里内，构筑了3至4道阻击阵地。

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我军全歼新保安三十五军之后，张家口的敌人惊恐万状，决心突破我军包围，妄图向绥远方向逃跑。12月23日夜，他们先朝西南方向佯攻，主力却偷偷地从西北方向突围，但很快被我军截断了去路。敌5万余众，被我军包围在张家口以北名叫朝天洼的一道大沟里，步兵、骑兵、骡马、大车，乱成一团。第二天拂晓；敌人倾全力向西北方向冲击，由于遭到我军顽强堵击，突围企图落空，经我军一昼夜奋勇冲杀，全歼了敌十一兵团部、一五军全部、一四军的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和两个保安团共5.4万多人。只有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漏网，带领少数护卫侥幸逃往商都去了。

我军在西线的胜利，彻底堵死了傅作义西逃的退路。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也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完成了对天津、塘沽的包围，解放了唐山等地。这样，傅作义已经陷入绝境，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

（选摘自《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692—699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2 平绥线上缚苍龙

历史的车轮走进1948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1946年7月以前的120余万人（包括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等），增加到将近250万人；国民党军队由430余万人减少为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正规部队只有160余万人。敌人“全面防御”已经彻底破产，被迫改用“重点防御”，企图以现有的兵力和工事为战略点线，以精锐部队为核心，收拢兵力，猬集一团，进行垂死挣扎。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这一伟大的战略决战首先从东北战场打起。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经过50天激战，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

当时，我晋察冀解放区已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力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以董必武同志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以聂荣臻同志力司令员，薄一波同志为政委，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同志为副司令员的华北军区。华北军区下辖第一、二、三3个兵团，冀中、太行、冀南、冀鲁豫、晋中、北岳、太岳等7个二级军区。我们原晋察冀野战军改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扩编为第二、第三兵团）。

辽沈战役期间，我们华北军区部队沿太原、绥远、平绥一带布防，其目的是防止东北敌军向华北靠拢，并阻止华北敌军向东北增援，从而把敌人的东北和华北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华北敌军的最高指挥员是傅作义。因为，自石家庄战役后，蒋介石把孙连仲作为替罪羊，撤了他的职，而将华北战场全部交给傅作义指挥，以便利用傅作义的力量来支撑华北的危局。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从阜平的城南庄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司令部，确是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指挥着伟大的战略决战，周恩来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个大决战的指挥部：“我们这个司令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下发武器，不发弹药，就是天天发电报，指挥着世界上少有的大决战，叫前线天天打胜仗。”

西柏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庄，滹沱河穿流而过，清一色的瓦房整齐有序，村头高大的树上，挂着一口大钟。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指挥着著名的三大战役。

11月2日，辽沈战役告捷，东北我军开始入关作战。

11月6日，淮海战役揭开序幕。

我们多少有些着急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东北打完了，华东又包了“饺子”，那末，我们华北是不是该动手了？华北有60多万敌军，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果然，西柏坡精干的“小司令部”里，正在研究华北战场的兵力部署。

11月18日，我们收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有关平津战役的第一封电报：

杨、罗、耿所部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李、李阻止敌人逃跑。

该电文中的“杨、罗、耿所部”即我们华北第二兵团。“杨、李、李”即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同志指挥的第三兵团。

24日午夜，我们又收到了毛主席发给第三兵团并转告我们的电报。命令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秘密东进，以奇兵突袭的方式进至张家口、宣化一带，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同时，中央又命令第一兵团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以集中兵力进行平津战役。

我们华非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就这样进入了平津战役的洪流里。

11月26日，毛主席又给我们发来电令：

着杨罗耿率二兵团于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至涿县、涑水以西地区待命。……七纵受杨罗耿指挥，应由保定北边迫近敌人活动。

27日，上述命令正在执行中，毛主席又来电命令我们：

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

紫荆关是冀中平原西面太行山区的一个关隘。“关”的本身只是一段残败的长城。这一带千山万壑，作战地图上满是曲曲弯弯的等高线。从这里往北出动，不易暴露作战企图。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的一个个电令分析，二兵团隐蔽待命，东北我军秘密入关，无疑，这是两支即将突然投入战斗的奇兵。

11月30日夜，我们按时完成集结。从不断收到的电报中，我们了解到：三兵团一纵占领了沙岭子，切断了张家口与宣化敌军的联系；二纵攻占柴沟堡、左卫；六纵攻入万全城、郭磊庄。我们还得知，将投入这次战役的我军

部队有东北野战军两个兵团的 12 个纵队，1 个铁道纵队及待种兵；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的 7 个纵队及 1 个炮兵旅；连同冀热察、内蒙、冀东、北岳、冀中、冀南军区的部队和晋绥军区 1 个纵队，共计 100 余万人。为了统一指挥作战，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组成平津前线委员会，总揽全局。华北地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前线战斗。

毛主席要我们在紫荆关隐蔽待命，这是因为北平敌人的动向尚未明朗，如果敌人为了从海路南下而向东逃跑，我们第二兵团就要到天津、唐山一线去截击敌人，或者切断敌人平津之间的通道；如果敌人向西逃跑，我们就要到张家口一带去阻击西逃之敌。

同时，毛主席命令第三兵团进攻张家口，吸引北平敌人西援，从而抓住敌人，使其不能东逃。

12 月 1 日，我们得悉，三兵团对张家口的突然进攻，果然按预定计划调动了敌人。驻守北平的傅作义“王牌”第三十五军、驻怀来的第一四军，分乘火车、汽车向西增援。

12 月 2 日，我二兵团全军上下都知道了敌三十五军已经被“调了出来”的消息，干部战士普遍发出了“跟三十五军算老帐”的呼声。正在这时，秘密入关的我东北大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东北的密云一带。而毛主席又命令张家口的第三兵团“围而不打”，把由北平向西增援的敌三十五军牢牢拴在了战车上。那几日电报频传，军情如梭，敌我双方都一步步按照毛主席的部署行事。当然，我方是自觉地执行命令，而敌方则是不自觉地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罗瑞卿同志一边看我标图，一边对杨得志同志说：“毛主席调出北平的敌人，把敌军分割开，以便我们各个吃掉，这一着很英明。”我说：“这回可抓住傅作义的命根子了，傅作义心疼，说不定会亲自出马来救。”杨得志同志意味深长地说：“这篇‘文章’嘛，大得很来！”

也是在 12 月 2 日，军委以“4A”级电报，命令我第二兵团：兵出紫荆关，直逼平绥线！

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部署，平津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将敌军的一字长蛇阵截成数段；第二，先解决两头，即依次歼灭西面的张绥（张家口、归绥）之敌和东面的津唐（天津、塘沽、唐山、滦县）之敌；第三，最后解决北平之敌。有的同志把这个部署形象地叫作“腰斩长蛇，砍头断尾”战术。

然而，这条“长蛇”毕竟是由 60 多万美式装备的敌军组成，长达千里。要切断并吃掉这样一子“长蛇”，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只有毛主席这样杰出的战略家，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这个军事上的壮举。

毛泽东同志再一次表现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把我军指挥得“神出鬼没”，把敌军调动得“神魂颠倒”。我军缓攻太原，撤回归绥，使傅作义感到西线尚有可为而舍不得东逃；同时，毛主席指示淮海前线暂不总攻，又使蒋介石下不了命傅作义南逃的决心。这样，就使敌人的心理天平向“暂守平津”倾斜。而我军对张家口围而不打，又使傅作义不得不派出救兵，以保住西窜之路。所以，敌人派出其三十五军援救张家口，正是不自觉地“听从”了毛主席的调遣。

据说，郭景云在离开北平时，完全是一副即将“马到成功”的样子了，一连说了几句“去去就回来”，似乎他不过是去赶大集而已。他确实走得很快，但到达张家口后，能不能回到北平，就由不得他了。

12月初，傅作义得到密云告急，知道我东北解放军已开始进关；又得知我第二兵团已从紫荆关出动，才感到情况不妙。于是，急忙飞往张家口，密令郭景云火速回北平保驾。

毛主席注意到了傅作义的举动，洞悉他此行的目的是丢卒保车，宁肯失掉张家口，也要使郭景云部退保北平。于是，在12月4日一天内，给正在向北急进的我第二兵团连续发来三封电报，一封比一封紧急，真是急如星火，军令如山。这些电报的措词，至今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估计暂三军尚在怀来及其以东地区。我杨罗耿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暂三军与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十二月四日凌晨二时电）

毛主席还指示：只要我们川断北平、怀来之敌和张家口、宣化之敌的联系，张、宣地区的敌军就不会西逃。

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四日午后四时电）

4日夜9时的来电中，毛主席特别强调：

杨罗耿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电报的最后，毛主席还关心地询问：“杨罗耿明（五）日是否能到宣（化）怀（来）线？”而此时，我们第二兵团的绝大部分部队还在太行山区的崎岖山路上行军。这山路不光崎岖难行，而且曲曲弯弯，从地图上量只有10里的距离，走起来20里也不止。

为了不让敌人跑掉，部队不顾一切地全速向北、向北……宣传鼓动员们扯破嗓子，用快板，用口号，用标语，拼命地喊着“抓住三十五军！”“堵住三十五军！”“追上三十五军！”“逮住三十五军！”走路，对我们二兵团来说，本是“小菜一碟”，但是，任务如此紧急，终究要靠时间。连日来每天行军为八九十里，4日开始改力强行军，部队凌晨2时出发，全力向北开进。

12月5日晨7时毛主席又发来电报指示：

杨罗耿应迅速控制宣化、怀来（不含）段，完成东西阻击工事，防止张、宣敌向东及怀来、南口敌向西，并相机歼灭下花园、新保安诸点之敌……

经过一天急行军，到晚上8时，我们决定稍事休息后再连夜开进。一宿营，我就给正在平绥线上拦截敌三十五军的冀热军区詹大南同志和十二旅王昭同志发电，让他们固守沙城、土木堡，阻击敌人，等候主力到达，并要他

们立即查告下花园、怀来、康庄、新保安等处敌情，以便兵团指挥各部接敌。詹大南和王昭同志坚决执行了命令，在下花园一线节节抵抗，并组织民兵破坏了铁路、公路，使美械化的三十五军寸步难行。

凌晨，兵团部进至大洋河南岸。杨得志、罗瑞卿和我立即下马来河边。但见洋河在夜色中冷峻地横在面前，河上没有桥，河面上结了层冰，冰结得不厚，透过冰层，可以听到水流声。

我们正要下令组织渡河，这时参谋送来一封电报。

电报是毛主席打给第三兵团的，并转发我们第二兵团和平津前线其他领导人。电报说：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一 一军之二七一师，一 四军之二五 师、二五八师，一 五军之三一 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家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则不但张家口集敌九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家口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

从电报上看，毛主席命令第三兵团坚决隔断张、宣之敌的联系，同时十分焦急地在等待我们第二兵团到达平绥线，加入战斗。所以，我们必须赶快渡过洋河，和第三兵团并肩作战。

“报告参谋长，河水不深，只齐到胸部。”侦察员过来对我说。

杨得志司令员挥了挥手：“不要耽搁，赶快组织过河。”

罗瑞卿政委沉着有力地说：“过河的时间越短越好，多争取一分钟，就多一分主动。”

我叫过作战参谋询问，了解到附近没有桥，要临时架桥电来不及，就立即命令：徒涉！

战士们立即跳进冰河。随着“嘎支嘎支”的响声，冰层被踩裂了。于是，后面的推前面的，前面的拽后面的，很快在冰河上“犁”出一条条通路。1小时后，部队全部蹚过洋河，等最后一名战士上岸后，刚刚蹚开的水面又无声无息地冻上了。我听见一个团的政委在队列里喊着：“快跑呀！跑跑就暖和了！”这就是当时部队唯一的取暖办法。当时，许多战士的棉裤冻成了直挺挺的筒子，不能打弯。但是，战士们还是一股劲地往前跑。

天空飘起了雪花。又是一封电报传来了毛主席的命令：

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地区后，即以一个有力纵队开至宣化、张家口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击破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利尔后歼灭。……杨罗耿其余两纵位于宣化以东，隔断宣化、

怀来两敌之联系。

不久，敌情起了变化。敌三十五军已经越过宣化，向下花园、新保安方向逃窜。于是，一封急电又送到我们手中。电报除了严厉批评兄弟部队“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外，特别明确地指示。

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冬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电报中的严厉口气，反映了军情紧急，事关重大，也反映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这时参谋报告说：“据侦察，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直奔新保安了！”

“什么？”我急得额头上冒出了汗珠，立即向杨得志和罗瑞卿同志说：“情况紧急，从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30里路程。”这句话引起一阵沉默，也许大家都在想：30华里对于郭景云部的十轮大卡车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只要三十五军一过新保安，形势就将变得对我军不利。也就是说，二十五军可以向东逃，怀来的一四军亦可向西靠，要是他们一旦合在一起，再要歼灭他们就十分困难了。

隔了一会，罗瑞卿同志问道：“下花园和新保安之间的鸡鸣驿，离下花园多远？”

我回答：“约20里。”接着，我又补充说：“鸡鸣驿附近有詹大南同志的3个团，可以挡一阵，但是他们已经连续战斗了4天了。”

杨得志同志以拳击掌：“给王昭发电报，让十二旅无论如何要堵住敌军。”

参谋立即拟电没往四纵十二旅。我立刻补充说，“同时发电给三纵、八纵和四纵的十旅、十一旅，要他们加快速度，要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赶路。”

罗瑞卿同志严肃他说：“告诉全体指战员，如果让三十五军逃过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不好交代！”

“那我们就将铸成大错，影响整个战局！”杨得志同志补充说。

电报发出了，我的心也不由地飞向了新保安。十二旅能顶住吗？三纵、八纵和四纵十旅、十一旅，能否及时赶到？

王昭同志果然不负众望，来电告捷，我十二旅在新保安抓住了敌三十五军。

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王昭同志不愧是一员骁将。他在收到兵团的命令后，立即率十二旅抢先赶到新保安。这时，敌三十五军的400辆“大道吉”，还在詹大南同志给他们制造的重重阻碍中，艰难地喘息在鸡鸣驿。

王昭他们利用双方混战，敌我间隔特别小的机会，冒充敌人赚开了新保安的西门，只用了20分钟，就把睡在梦里的守敌歼灭干净，从而控制了新保安。我们把这个胜利立即电报毛主席。

大洋河北的平绥路两侧，到处是马不停蹄、兼程前进的洪流，这一股洪流旋风般汇向弹丸之地新保安。

敌三十五军从张家口东撤后，一路上遭我地方部队袭扰和阻击。从鸡鸣驿出发东进后，又遭我十二旅顽强抗击。傅作义派飞机助战，也不能打开一条东逃的通道。后来，还是我们十二旅，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决定放开一

条路，让出新保安，让敌军进城，以便稳住该敌。等敌人一进城，十二旅即在新保安以东的新保安车站构筑三层阵地，从而把敌三十五军牢牢地围困在新保安。

接着，我二兵团各部队陆续到达新保安外围，完全切断了敌一四军（即暂三军）和敌三十五军的联系，实现了对敌“王牌军”三十五军的包围。

这时，毛主席一方面命令程（子华）黄（志勇）兵团包围怀来、南口一线的敌人，并控制康庄、青龙桥、八达岭等要点，准备阻击自北平西援的敌人；一方面又命令我们第二、三兵团：

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家口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诸敌之部署。

对西面的敌人“围而不攻”，以便完成对东面之敌的包围，这是毛主席指挥艺术高明的又一个光辉体现。

新保安是北平到张家口中间的一个小城堡。有 2000 多户人家，很早就是通往塞北的驿站。明朝中叶，原名李家堡，本是“拉骆驼”商人休息打尖的地方。明万历年间在这里修筑城墙，改名新保定。清代康熙年间才又改称新保安。又有一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在此平安无事地住过一夜，于是她便赐了这个名字。新保安是个镇，但是清代把府衙建在这里。它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地势低下，城堡像在锅底上一样。平绥铁路、平张公路从城墙北边穿过，火车站在城的东北角上。这个面积仅为一平方公里的小城，却建有高 10 米、厚六七米的城墙，城内以玉皇阁为中心，东西、南北大街贯通，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它不设北门的原因是为防止从北面来的侵略。城内的钟阁楼有大钟一口，听老乡说，钟声能够传到方圆 60 里以外，可作报警之用。钟阁上刻有“锁钥重地”字样。这“锁钥”两字，表明新保安扼北平和张家口交通的要道，也像八达岭的“北门锁钥”一样，表明它是北平通向塞外的咽喉。据说，1644 年李自成起义军曾以此为据点，发起进攻北京的战役。城内还有清真寺、耶稣堂、河神庙，有 7 所学校，1 个发电厂。可见，这是个颇具规模的城镇。

从敌三十五军被围那天起，干部战士中就响起一片“跟三十五军算老帐！”的吼声。这个跟我们周旋多年的老冤家，几次都从我们枪口下逃脱了。不久前的怀来战役，我们狠狠地揍了它一下，曾使他大伤元气，军长鲁英麟自杀。但它又依靠美国装备重新组建了起来，继续与人民为敌。这次，绝不能再让他溜掉。

我们共有 9 个旅（相当于敌军的 9 个师）；敌三十五军有两个师，再加上一些杂牌部队。所以，我们和敌人相比，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而且，我们的部队士气高涨，各纵队都要求早日拿下新保安，歼灭敌人的“王牌军”。通往兵团部的电话线，几乎都被请战的呼声占满了。我们把广大指战员的求战要求，多次反映、上报中央军委，但是毛主席一面表扬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一面再次指示我们要“围而不打”。记得当时的战地小报上登过一首诗，充分表达了指战员对“围而不打”的认识：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

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
越烧越煮越绵软。
同志们，别着急，
山药蛋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
时间一到就攻击。

罗瑞卿同志看了这首诗后，笑着说：“说得对，不过这只是说了我们二兵团这口‘锅’，毛主席那口‘锅’里，可不光是‘山药蛋’，那里是既有‘海’（天津），又有‘山’（燕山），还有北平的金銮殿哪。”

敌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毛主席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从而走活了整个平津战役的一盘棋，实现了把敌人抑留在华北全部歼灭的谋略。现在，三十五军被扣在了新保安，傅作义可真有点惶惶然了。因此，他决心尽全力救出三十五军，急令一四军和十六军西进，接应三十五军走出困境。

12月8日，增援而来的一四军向土木堡进攻，遭我冀热察军区部队阻击。于是，他们当晚改道迂回至新保安东南的下湾子、宋家营和东西水泉地区，又遭我三纵和四纵痛击。9日，一四军出动12架飞机，与我军反复争夺宋家营。至下午3点，好不容易才推进到马圈子，实在不能再越雷他一步了，便呼叫郭景云突围。

郭景云更是一分钟也不愿呆在新保安。所以，他进入新保安的当天，便开始了突围。这位一向自认为“所向无敌”的中将军长，死到临头仍然傲气十足。他曾对部下吹嘘说：“我们三十五军是吃钢咽铁长大的，守城是我们的看家本事。当年直奉联合阎锡山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时候我们守过涿州，抗战中我们守过太原，‘剿匪’中我们守过归绥和包头。除了太原外，每次我们都打胜了。现在守个新保安，算得了什么！再说，新保安这地名对我们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现在来到新保安。长安、永安、保安是二十‘安’，有了这‘三安’，保证我们三十五军不出3天安全返回北平。”

牛皮可以随便吹，但是几次突围都没有得逞。于是他又把希望寄予傅作义的增援上。他认为：不要说三十五军，就是那400辆“大道吉”汽车，傅作义也不能不管！

然而，几次突围败北，终究大大挫败了郭景云的锐气，因此，当敌一四军丢下漫山遍野的尸体，好不容易进入马圈子，向郭景三呼叫，计他突围的时候，这位“常胜将军”竟不敢出城一步，一定要一四军进城接他。正在这两支部队你要我出城接应，我要你进城保护的时候，我东北野战军四纵在康庄将另一支增援的敌车——敌十六军一举歼灭，占领了康庄、盆道、青龙桥一线。这样，一四军也陷入重围。敌一四军一看大事不妙，“难弟”也顾不上“难兄”了，掉头东逃，被我东北第四纵队和第十一纵队在镇边城一口吃掉。至此，平绥线完全被我切断，敌人西援无兵，东突无力，敌三十五军就此陷入绝境。

新保安成了孤岛，四周被人民解放军像铁圈箍桶一样围得严严实实。这时，傅作义只给了郭景云一封八个字的电报：轻装突围，撤回北平。当郭景云下令破坏装备、扔掉伤员、销毁文件、捣碎电台，准备离城时，傅作义又

令他固守待援。于是，他只好驱赶士兵和百姓，抢修工事，做起了死守的打算。

到12月13日，我军在平绥线上已歼灭敌人两个军5个师。被围的敌人，除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新保安外，敌第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军部和7个师（旅）也被围困于张家口。西线的失利，迫使敌人将驻在天津、塘沽地区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两个师）和第六十二军的一七五师调至北平以西。

敌人的这一系列行动，完全实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围而不打”，防范“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的意图。新保安像个大包袱背在傅作义的身上，使他的指挥思维完全混乱了。

完成对平津之敌的分割包围措施后，毛主席指令先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开刀。

12月22日晨，我军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下午5时整，三纵、四纵、八纵各进攻部队胜利会合，信号弹飞上天空。从此，敌“王牌军”三十五军在他们的军队序列里永远消失了。

下午6点，我们向毛主席发出新保安大捷的电报。毛主席复电：

二十二日十八时电悉，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休整十天，准备行动。

新保安之役，敌三十五军的一个军部、两个整师，全军覆没，郭景云在我军突破城垣后自杀身亡，副军长王雷震以下官兵8000余人被我俘获。400辆美式卡车、20多辆被三十五军从张家口抢来的“丰田”、“吉斯”等民用小卧车，以及郭景云专用的那辆蓝灰色“雪佛兰”轿车，还有数不清的武器弹药，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就在我们全歼新保安之敌三十五军的第三天，从张家口又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华北第三兵团一举歼灭敌人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整师，计5.4万人，张家口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于二十四日深夜给我们华北第二、三兵团发来贺电：

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的伟大胜利。

（摘编自《耿飏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523页。作者时任华北第二兵团参谋长。）

3 腰斩长蛇战张垣

解放战争第三年，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首先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指向东北，取得了初战——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紧接着，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也先后开始。从战略部署和指挥来看，这三大战役是密切配合着进行的。辽沈战役结束后，在关里，为了稳住华北的敌人，使它难定西窜、南逃或从海上逃跑的决心，我军先打华东，后打华北，以待全歼。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便成了关键的一着棋。

1948年11月1日，即沈阳解放前一天，我们纵队与十一纵队奉命在东北二兵团指挥下，先遣入关作战。

这种情况，完全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料之外。他们以为我东北野战军至少要经过3个月的休整才能进关。后来我才得知，林彪当时曾借口部队休整，又说东北战上不愿离开家乡，妄图拖延入关时间。林彪的打算，如果得逞，将正中蒋介石和傅作义的下怀，严重影响我全歼平津守敌。后来我看到了11月19日东北野战军总部转发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电报，批评他说：“你们是早点入关，抓住敌人，把敌人歼灭在平津地区呢，还是等平津的敌人跑了，你们再去追击，追到很远的地方去歼灭它？……”由此可见，林彪在入关作战问题上是很被动的。

我们四纵从锦州以南驻地出发，行军路线是虹螺岬、江家屯、六家子、喇嘛洞、干沟镇、马圈子，然后横越长城，由冷口、喜峰口分路入关。

从关外到关里，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连续行军，纵队于11月8日到达北平以东之石门、马伸桥、赵各庄一带隐蔽集结待命。

集结待命期间，部队经过短期休整，纵队召开了一系列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战备训练，布置了政治工作。军事方面，还重点研究了傅作义部队的战斗力和作战特点，指出他的战术有两条，一是“快速袭击”，二是“一点围歼”。傅作义的骑兵多，汽车多，一夜之间便可奔袭远隔一两百里的我方营地，挥马劈刀，速战速决；一点围歼就是一点突破，四面包围。针对以上特点，我们在战备训练中专门增加了打骑兵的训练，除了卧射、跪射外，还要练习立射，战斗时，人和马一齐打，子弹密度大。同时我们还调查了傅作义部队的装备和编制，造出他们团以上指挥员的花名册，以便抓住俘虏时好点名对照。政治方面，深入进关作战的动员，提出“到华北打响第一炮”、“解放华北立大功”等口号。因为又补充了3000多名冀东战士，连同东北参军的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尚未进行诉苦教育；便结合进关作战和战备训练的动员，在全纵队普遍开展了一次诉苦运动。有的连队邀请冀东群众一起诉苦，使战士们得到更多关内群众受国民党迫害的感性认识，收到良好的效果。许多军事干部都认为，诉苦运动就是战斗动员，就是战备训练的动员，那时的军政干部是分工不分家的。

这期间，还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实行统一整编。我们第四纵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11月23日，在马伸桥召开第四届士兵代表大会，并以响应毛主席关于“军队向前进”的号召为中心内容，动员部队迎接新任务，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彻底歼灭蒋匪军，解放全中国；坚决革命到底，提高战术素养。二、巩固团结部队。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这是我们军队长期以来政治工作的三大内容，在当时新的作战任务中的具体化。

进关后，急盼的第一个作战行动终于来到，12月3日夜，我军在东北第二（先遣）兵团指挥下，为配合华北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由蓟县地区出发，尾四十八军（原第十一纵队）渡过白马河；因四十八军奉命攻打密云，5日，我乃改为先行，日夜兼程，向平绥线急进。

绥远是博部常驻之地，张家口是他们西逃的必经要道。所以当我华北三兵团扫清张垣外围时，傅作义慌忙令其主力二十五军（欠二六二师）、一四军（欠二五八师），于11月28、29两日先后由丰台、长辛店、昌平等地，北开怀来一线；其三十五军（欠二六二师）于30日继续增援张垣，一四军

原守怀来之二五八师于12月1日北增宣化。至此，傅作义赖以起家的主力部队，除三十五军之二六二师留在北平外，其余都分布在平绥路沿线。

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平津战役的战役开进阶段，以我军的部署和行动，“调动”敌军就范的一大杰作。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在进关途中。我们一方面要把敌人抑留在华北，一方面又要使傅作义在北平、天津、张垣、塘沽摆开的一字长蛇阵，不能连成一气，首尾不能相顾，以利战局的发展。中央军委采取先西后东的步骤，即令华北部队先打张家口外围，目的是抓住张家口的敌人，使其不能西走，并借此吸引北平之敌增援，将北平傅部主力尽量向西拉汗；同时，拖住蒋系部队于平津地区，攻歼芦台、塘沽守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迫使傅作义难下撤退或是坚守的决心。我则采取分割平、津、张，塘一线守敌各个击破的方针，以求在不久时间内予以歼灭。这就是平津战役的主要指导思想；而傅作义也不知不觉顺着这条线上了钩。

傅作义正在调兵遣将之际，发觉我大军向北平、张家口两侧集结，平、张全线吃紧。敌三十五军两个师害怕被我围歼，在12月6日奉令乘汽车300余辆，在飞机掩护下，向北平回窜。途中，被我进至琢鹿地区之华北二兵团围困于新保安。前往接应之敌一四军，也被堵击于怀来、新保安之间。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傅作义的方寸就已经乱了。他除命令一四军的5个团继续从怀来沿公路向西攻击外，并令嘴口的十六军赶紧向西接应三十五军，企图拼全力把该军拉出去。

我军的作战任务，就是要迅速切断敌人西窜的道路，不让敌人在南口的十六军与被我国困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靠拢，拦腰斩傅作义的长蛇阵。

这一仗关系重大。如让傅作义的一四军及十六军主力接应三十五军的行动得逞，就会形成对我华北二兵团的东西夹击的形势。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如此，敌人若解开新保安之围，就将影响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平绥线上的敌人不能被分割包围，平绥路不能被切断，给傅作义留下西窜之路，就会影响整个平津战役的进程。因此，我军能否及时赶到平绥线，拦腰切断接应傅部三十五军之敌，其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军情十分紧迫。在向平绥线进军途中，我们曾收到军委、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电令，要我军加快前进速度。部队轻装走小路，抄捷径，穿过无人区，翻越内长城，在崎岖的石路上行走，星夜插向延庆地区，直指平绥线上的康庄和怀来。这一带是过去的古战场，荒野茫茫，干沙荡荡，战士们顶着长城内外的风沙，抢渡即将封冻的河水；太阳的光和热似乎也无济于事，西北风掀起的沙雾，变得白惨惨的。这一段急行军，比进关的路途还要艰苦得多。然而，干部和战士都明白肩上的重任，个个都象咆哮的雄狮，朝平绥线飞奔而去。现在的关键是要抓住战机，我们以一当十的战士们，定能夺取事半功倍的辉煌战果！

遵照中央军委电令，为迅速抓住傅作义主力，我四十一军必须于12月8日切断康庄、怀来与康庄、南口敌军的联系，并包围康庄守敌。途中，军长吴克华和我，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等同志，研究了作战部署。全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9日拂晓，我军的三十师出敌不意突然出现在平绥线上的怀来、康庄、八达岭一带，随即按作战部署进入战斗。

担任切断敌人康庄与怀来之联系的我军一二二师的先头部队，在康庄西面的小王庄与敌十六军一部遭遇。康庄在延庆南面，我们部队过延庆后，背着寒冷的西北风，向南挺进。敌人则从东往西行进，迎着扑面的风沙，一个

个把帽耳扎得死死的。那时正是仲冬时节，天还没有亮。远远地，我三六五团参谋长刘云庭同志跟着的尖兵班，发现前面有灯光，并且听到炮车响。部队进至小工庄村西头的铁路公路交叉处，刘云庭即令六连抢先占了小王庄。敌先头部队约有一个连的兵力，在公路北侧行进。战斗打响后，我们抓住俘虏，带到村里老百姓家中审问，俘虏在蜡烛光下看到我们的服装跟华北解放军穿的不一样，便傻了眼。我们没费多少口舌就把敌情摸清楚了。原来敌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已有两个营进至怀来；他们这个营和团部在这里与我们遭遇了。刘云庭同志马上让通信参谋报告团指挥所，把二营调到公路以南，一营在公路以北，三营为预备队。一场遭遇战变成了伏击战。敌人塞满了公路，成四路纵队急行军向怀来前进。我们用猛烈的火力袭击，只 20 分钟便解决了战斗，俘敌 500 余人。一二二师当即将情况报告我们。

敌情有了变化，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在奔袭途中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我和吴克华同志的心情都有点不安，生怕抓不住敌人，完不成战斗任务。正在这时候，担任包围进攻康庄敌人的一二一师也来了电话，得知十六军的大部分队伍，都还没有过去，被该师包围在康庄了。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我不觉笑出声来：“不要紧了，敌人跑不掉了。”紧接着，担任切断敌人康庄与八达岭之联系的一二三师也打电话说：他们占领阵地后，击退东来装甲车一列，并保证不让敌人西进一步。我们总算把这条长蛇的身子给掐住了，只待挥刀将它斩断。这真是兵贵神速，如果不是上级督促得紧，部队拼命急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敌十六军主力就可能全部开进怀来地区，那样事情就麻烦

被围在康庄的敌十六军，由军部率一九师全部、九十四师一个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的两个营。由于西行受阻，已成瓮中之鳖，更加无心恋战，他们害怕被我歼灭，便想溜之大吉。10 日凌晨，他们想乘我军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的机会，寻找我军包围空隙，冒险向南突围东窜，企图经南口逃回平郊。

9 日午夜，我三六二团即发现被围在康庄的敌人有突围逃窜的征候，但团、师电话不通。待师里获悉这个情况后，敌人已全部向南口方向逃窜。情况紧急，我三六二团政委刘玲同志没等师部命令，当即带领第三营迅速沿公路跟踪猛追。三六一团得到师部的命令随后也沿康庄东北角南下追击。刘玲身边只有七八个参谋干事，他们在公路上追到一股敌人，大家便扯着嗓门对敌人喊起话来：“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枪！”懵头转向的敌人，一个个把枪都扔在地上，一堆一堆放好；后来一看我们没有几个人，有的敌人就重新操起武器抵抗，我们的一位参谋因此负了伤，但这时我三营七、八连紧跟上来，很快就把企图逃窜的敌人消灭了。

当时，敌人在康庄设置了严密的防御工事，深沟壁垒，鹿砦刺网，如果负隅顽抗，还会多浪费我们一点时间，但他们却弃壕逃跑了。当我三六二团追击的先头部队于外泡村西北追上逃敌后尾时，恰当全部敌人被我一二三师堵击在炮儿山、杨岭一带；敌逃不得，又想回窜康庄。这时，我各路部队便勇猛地插入敌群，再加上两侧包抄，前后夹击，除敌十六军军长带领一小部分队伍，乘夜暗和敌我混战之机脱逃外。共歼敌 6600 多名。

这时，怀来方向又传来炮声。我向吴克华同志走去，他正用电话询问一二二师前沿部队，接电话的是三六五团参谋长刘云庭，刘云庭同志正登上长城的烽火台，观察怀来的情况。据他报告，三家子火车站起火了，敌人的大

部队从怀来涌出来，正在渡河，向十八家子逃跑。

吴克华同志问道：“什么时候敌人开始从怀来出来的？”

电话里回答：“老百姓做饭时。”

吴又问：“你没有表？”

回答：“没有。”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军的几个领导同志参照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怀来方向敌一四军（欠二五八师），从12月2日至8日，即向西轮番攻击，遭我一五九师及詹大南部两个独立团于土木及土木以北坚决阻击，未能得逞；该敌于9日又以全力由怀来沿铁路西进，企图接应被我包围于新保安之三十五军（欠二六二师）突围，台力东撤，但我华北二兵团阻于沙城以东，不能前进一步。同日早晨，我们军突然将怀来至八达岭一线分割数段；康庄守敌突围覆灭，该敌（一四军军部、二十六师、三十一师及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主力、六十六团一部）即于10日上午仓皇回窜怀来，并即由敌一四军军长安春山率领，于10日中午刚过（也就是老百姓做饭的时间）弃城逃走。他们是被华北兄弟部队从新保安方向打回来的，沿铁路东撤的道路又被我们堵住了，铁路以北也是我重兵所在。怀来的敌人只剩下城南的一条路可逃，那里有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可通北平，道路地形也比较隐蔽，而我们的兵力又比较薄弱，只有一个骑兵旅（察骑）部署在那个方向。

本来我们军的任务是切断平绥路，阻击敌人西窜。但现在情况变了，难道能眼睁睁地让敌人跑掉吗？军长吴克华同志迅速地把敌情及我情进一步作了分析：康庄敌人被歼后。怀来之敌又决意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南口、昌平地区的敌人用大兵力西犯的可能性不大；我一二三师在八达岭方向，以坚守塔山的精神定能继续完成阻击任务，他们只要再坚持一大多，四十八军就可以赶来支援；而怀来城南只靠我兄弟部队一个骑兵旅的力量，绝对抓不住万人之众的逃敌；如果我们只抽一部分兵力配合，也难完成任务，吴克华同志果断地决定用两个师去追击企图逃窜的敌人，我完全赞同他的分析和意见。

太阳偏西了，逃敌突破了我察骑阵地。我们一面把部署情况向上级报告，一面指挥部队立即行动。一二二师由十八家子向南跟踪追击逃敌；一二一师抄近道经大山口，从左侧取小道直奔长城边上的横岭，拦头堵住敌人回北平的去路。正当此时，四十八军经居庸关逼近南口，将那里的敌人歼灭并占领了南口。我军指挥部即率领一二三师也从康庄沿大山口平行追击而来。

怀来追歼战是紧接着康庄追歼战胜利后开始的，充分体现了我军下怕艰苦疲劳接连作战的战斗作风。一二一师连战场都来不及打扫，便投入了新的战斗。有的团队做了3次饭（第一次水刚烧开，第二次卡已下锅，第三次已闻到饭香了），但都来不及吃又背着空锅紧急向前转移。一二二师来不及集结队伍，刚从阵地跳出来就向前追击；其先头部队三六五团刘云庭参谋长率领的三营，更是扔下背包就跑，边跑边整理队伍。他们像一支离弦的箭，直射向长城的横岭。他们追到庙官岭，内长城以北一带，便和逃敌打响了。敌人在这里以一个营的兵力掩护其主力逃窜。我们的战士瞅着满天乱飞的曳光弹，心里高兴地想，总算把敌人的后尾抓住了。

刘云庭同志带领的部队同敌人战斗近1小时，三六五团团团长、政委率领团主力也赶到了；政委尼少久带着一营又追到最前面去；当三营与敌激战中攻占一个阵地后，三连即从敌侧射火力下，在塞满了公路的大批弹药、物资、

汽车、散兵中插过去了，变成了全团追击序列中的尖兵连。

远看追击的前方，有一排大山的黑影，齿形的山峰，衬托着淡墨似的夫幕；天幕下蜿蜒着古老的长城，那些垛口、城堡，遮挡着阴暗的天空，使山峰显得更加陡峭、险峻。

一二一师先头部队于当日午夜即进至横岭一带。三六三团二营尾三六一团三营前进。当他们在横岭接受拦腰切断逃敌的任务后，刚进到山地时，就发现三六一团三营方向已经打响，并传来敌人汽车的马达声。三六三团二营迅速占领与控制了西侧的有利警戒阵地，完全切断了敌人的去路。

这时，三六五团尖兵三连，也已逼近敌人的主力。他们由大道的左侧冲向敌人和车马最拥挤的地方，象尖刀似地插进去，并将各种轻重火器布置在就近的高地上，然后迅猛开火，把一股企图向山上逃窜的敌人用火力压在沟底。敌指挥首脑机关——四军军部与军直属队，被我们打得乱成一团，其他部分的敌人乱得更像一盆浆糊了。在我军追击和堵击部队的互相配合下，敌人溃不成军，散兵遍山。我各部队继续搜山抓俘虏，于11日上午基本解决战斗。

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堵击窜敌的先头部队于水涧、马跑川地区，全歼该敌。至此，怀来追歼战全部胜利结束。

不到3天，我们接连打了两仗，在康庄、怀来，把掐住的这条长蛇连砍了两刀，平绥路被我们拦腰斩断了。这样一来，北平的蒋军再不能西去，被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那就更不能东逃了。

按照毛主席的平津战役作战方针，采取“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办法，把傅作义摆下的一条长蛇阵切成数段后等待有利时机，然后再一段一段把它吃掉。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这个有利时机到来了。这时候蒋介石在上海集中了几十条大船，他一只眼睛盯着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一只眼睛瞅着北平的傅作义。杜聿明是他的嫡系，当然要亲些；但是如果把傅作义的几十万人马撤到华东，在固守长江以南半壁江山时还可以派些用场，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先是切断平绥线后，留下张家口、新保安不打，以免傅作义下从海上狂跑的决心；并在淮海战场延缓最后歼灭杜聿明残部，而平津战役的整个部署业已完成。在蒋介石决定不了救杜还是救傅的时候，我军在华北战场即依“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先吃小点，后吃大点”的攻击次序，来解决华北的敌人了。

康庄、怀来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即奉令占领南口、八达岭一线的阵地，阻击北平的敌人西窜并威胁北平。我军部驻居庸关。1948年12月17日中午，我们正在南口看地形，收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转来军委急电，命令我军暂归华北三兵团指挥，立即出发配合华北主力歼灭张家口的敌人。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很快就要开始了。

党中央、毛主席这个决定又是一着高棋。攻张垣前整个华北战局的态势是，由于我在800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出击，将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全线的敌军，分割包围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5个孤立据点，并且歼灭了敌人5个整师及两个师的大部，使傅作义这个长蛇阵从此宣告瓦解；而傅部嫡系除被歼者外，其主力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个孤立据点上，傅作义本人则被困于北平，与其嫡系部队完全失去联系。我们的围歼阶段先从傅部主力开刀，即使傅作义想南逃也没有力量。这样，利用蒋

傅矛盾再加上强大的军事打击，就有可能为保护北平这座古老的文化古城，创造一条和平解放的途径。党中央、毛主席把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使傅作义西逃的梦想完全粉碎。

12月21日，我们到达张家口外围。我们军主要接替华北三兵团一纵主力在张家口东南的阵地（华北一纵则与华北二纵靠拢），以加上对张垣的包围及攻击力量。

一二一师、一二三师进至张家口以南的宁远堡、榆林堡地区。部队进入阵地后，马上进行进攻准备，并准备阻止敌人逃窜和增援新保安。一二二师将南口的防务交给四十八军后，于22日进至花园附近地区，继续向张家口急进。这时，被困在新保安的敌三十五军两个师，已被我华北二兵团歼灭。在张垣的敌军孙兰峰兵团更加孤立，获援的希望已完全断绝，于是决定突围向绥远方向逃命。

23日上午，吴克华同志和我正带领师、团长到山上阵地看地形，遭到张家口孙兰峰部队的炮兵袭击，幸而没有伤亡。接着他们派出一股兵力进行试探，被我们的炮火打回去了。

当时的情况有些异常，看来敌人准备逃跑。

快到中午时，留在军指挥所的副政委欧阳文和参谋长李福泽同志，收到一二一师的报告，他们在11时许，接华北一纵（即六十六军）转三兵团电话：“张垣之敌全部向北突围，先头八个团已进到西店子，令军驻宁远堡之部队可沿十三里茶房、七里茶房，向张垣攻击前进……”当时，华北三兵团的整个追击部署是，敌先头8个团遭我一九八师的迎头痛击所阻止；敌主力继续向北突围，我六十六军率一个师、北岳军区一个旅及两个骑兵师，迅速插到汉诺坝、麻地营子地区，以截击向西突围之敌；六十八军随即由朝天洼、大境门间向南突击；六十七军由黄土梁也向大境门突击，并给予向孔家庄方向佯动的敌骑兵部队以迎头痛击，迫使他们折返张家口。

军部当即命令各师作好追击准备，以神速的动作由南向朝天洼方向突击，与各兄弟部队对逃敌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下午我军进占张家口市。一二一师、一二三师继续沿铁路两侧，直奔张家口北面；一二二师从右侧迂回过去，向乌拉哈达方向截击逃敌。

敌人分两路逃窜：一路向陶赖庙，一路向二道井子。这个地区是一条宽1里半、长20多里的大山沟，大山沟里还有不少小山沟。从二道井子出去，就是公路，那里有我华北兄弟部队重兵把守。陶赖庙、向却是山路，只有一个狭小的山口通向张北大草原。孙兰峰部有5万多人，如果同时涌向那里，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挤出去。所以，只要我军紧追不舍，敌人是难以逃窜的。

这又是一场秋风扫落叶的战斗！溃退的敌人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向前涌，我追击部队像浪涛一般往前追。好一幅汹涌澎湃的景象啊！

24日上午10时，整个战斗结束，孙兰峰的部队只有少数逃了出去，其余大部被歼灭。一夜之间，张垣5万多敌人就被华北兄弟部队和我军迅速解决了。许多老战士说，到革命队伍里来，从来没有碰上这么好打的仗。你的劲头还没使出来呢，它那里就完蛋了。真是豆腐兵！敌人望风披靡，一是震慑于我军战士的英勇作战，二来是整个战局的变化像一股洪水急卷着敌人。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敌人，只能是这个样子。

新保安、张家口的解放，傅作义西逃的梦想完全被粉碎，他的本钱也全部输光，半个月来，我们配合友军，打了二十大胜仗，纵横驰骋800多里，

歼敌 5 万余众，接着就要解决平津的问题了。巡视战场所看到的一切，令人更加坚信，今后我们不论面临任何形式的战斗，都将会夺取新的胜利。

北平和平解放后，军部率直属队进驻西卑报子胡同。

到了午夜，爆竹声、歌声还不时随风传来，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今天，继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平津战役也胜利结束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战争史上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宣告了蒋家王朝将彻底覆灭，也预示着新中国即将诞生！想到这里，3 个月来的战斗生活，一幕幕又重现在我眼前：1948 年 11 月 1 日，我们四十一军（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先遣入关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平津战役。我们火速入关，进至平绥线，配合华北兄弟部队切断平绥路，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方针，暂时稳住平津之敌。随后，又令我们攻占张家口，彻底断敌西窜之路，待南面的淮海战役决战后，即令围津部队强攻天津，活捉了天津守敌陈长捷；继而迫使傅作义接受我们的和平条件。仅仅 3 个月的时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啊！如果不是能够扭转乾坤的巨手，怎能指挥这般伟大的战争？重温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使我更加感到我党我军战略思想的英明正确和指挥艺术的高超，真是用兵如神，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啊！因此我们赢得了又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选编自莫文骅：《二十年打个来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作者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后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军）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张家口网敌战果硕

1948 年，当我们眼看就要拿下归绥，解放绥远全境的时候，毛主席指示我们缓攻归民撤围归绥，东进融断和包围张（家口）、宣（化）之敌。这又是一个有着全局意义的举措，是极其英明的决策。

为什么这样说呢？

眼下，华北敌军正举棋不定。蒋介石既想叫傅作义部固守华北，迟滞我大军南下，又想把华北的敌军全部南撤，建立江南防务。傅部打算看看形势，（北）平、（天）津、张（家口）能守则守，不能守就伺机西逃绥远，或从海上南逃，但表面上又摆出固守姿态，以取得更多美援，扩充其实力。美帝国主义见蒋介石大势已去，便从援蒋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直接给傅作义，想让他固守华北。

鉴于这种举棋不定的情势，傅作义把 60 万军队，东从滦县西至柴沟堡，沿铁路摆成一字长蛇阵，蒋系部队在东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西边，为的是东北我军入关时使蒋系部队首当其冲，一旦战局不利时，自己的嫡系部队可西逃绥远。

党中央和毛主席洞察敌人动向，认为傅作义部固守平、津、张对我最为有利。这样，我们可以集东北、华北主力歼敌于平、津、张地区，使蒋介石无法组成江南防线，从而加速蒋家王朝的崩溃。如果敌人放弃平、津、张，全部南逃，或者蒋系南逃，傅部西逃，则在全局上会延迟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时间。显然，敌人南逃，障碍重重，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傅部西逃则比较容易。

问题在于，如何把敌人滞留在平、津、张地区，就地歼灭。当时，我们的兵力还没有集中起来。华北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围攻太原，第三兵团围攻归绥，第二兵团在曲阳地区准备赴太原作战，东北的第十二兵团刚刚进到冀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人决心逃跑的话，我将难以阻止。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命令我们缓攻归绥，撤围归绥，一兵团缓攻太原，使敌人不致感到孤立，给敌人以情况缓和的错觉。毛主席并命令我们火速东进，突然包围张家口，不是立即夺取之，而是吸引敌军增援；然后，协同第二兵团和东北第十三兵团腰斩平绥铁路为数段，把傅部主力分割、包围在平绥线上。这样，既抓住了傅部，又拖住了蒋系；既堵住了傅部西逃的退路，又使傅部不能舍弃其嫡系部队而率蒋系部队南逃。突然包围张家口，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全局斗争的一个重要焦点。我们的行动，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有利于我东北主力隐蔽入关。再次，毛主席命令东北我军迅速隐蔽入关，不走北宁线，而取道热河，夜行晓宿，并指示新华社在两星期内多发表东北解放军大规模整训和庆功的消息，以此麻痹敌人，免得敌人迅速决策逃跑。

我们当即从绥远秘密地迅速东转，奔赴张、宣地区。向东、向东！毛主席在电报中要求我们6天时间赶到张家口，唐延杰、旷伏兆率领的第一纵队行程最远，也都按时赶到了沙岭子南边洋河南岸地区；韩伟、李志民率领的第二纵队也准时到达平堡一带；文年生、向仲华率领的第六纵队以3大半天时间进抵张家口西南的洗马林地区。部队到达作战地区后，按照军委指示，首先包围张家口、怀安、柴沟堡、周家河之敌。11月30日夜，第一纵队涉渡洋河，部队踏破薄冰，在齐腰深的水中前进。至拂晓全纵队完成涉渡，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同时，占领怀安，切断了张、宣敌军的联系。我第二纵队占领柴沟堡，第六纵队占领万全、郭磊庄，歼敌2000多人。至此，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我们这一突然的进攻，果然调动了敌人。在北平附近的敌第三十五军（第一一师、第二六七师）和在怀来的第一四军（即暂编第三军）第二五八师，30日分乘火车、汽车增援张家口，并向万全反扑；怀来的第三一师增援宣化，这个时候，敌军在张家口集中了一个兵团部，两个军，6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两个保安团；在宣化有两个师、一个保安团。我们于12月1日黄昏，以一个团占领李庄子车站，切断下花园与宣化间的铁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大部被我们包围和牵制在张家口地区。

我们三兵团3个纵队8个旅，包围了这么多敌人，真像是做包子时薄皮包了大馅。这样一来，包围和反包围，将是一场严峻的较量。

毛主席电令我们：在包围张，宣之敌后，即应迅速完成阻击之事，务使敌人不能逃跑，任务是包围几部敌人，抓紧构筑工事，切实包围好，不使跑掉，并准备和进攻之敌作多日顽强战斗，保证切断张、宣联系。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里，东北我军分路经冷口、喜峰口越过长城陆续入关，向平津急进。

东北我军的行动，使傅作义大为震惊。他以为我军将会直取北平，急令几天前西援张家口的第二十五军撤回北平。

12月2日，敌人急攻沙岭子，张家口方面出动两个师和部分骑兵，宣化方面又积极策应，两面夹击，激战竟日。

12月3日，敌人增加了一倍的兵力，向南面突围，也没有得逞。

12月4日，敌人以4个师的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从一早打到黄昏，占

领我部分阵地。5日拂晓，一纵一旅调整部署，将部队转移到沙岭子铁路两侧，致使敌三十五军两个师于6日晨乘400多辆汽车向东撤去。时逢降雪，北风呼啸，雪花漫天飞舞，地上的积雪被狂风卷了起来，张、宣公路两侧树木虽多，但树枝上也都积满雪花，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听不到。尽管如此，敌沿途仍遭我冀察热军区和其他兄弟部队的阻击。敌三十五军的两个师到新保安后，即被我5日占领新保安阵地的二兵团第四纵队十二旅迎头挡住，从拂晓打到天黑，敌人只前进了4公里。7日拂晓，二兵团主力经过长途急行军，赶到了下花园，见敌三十五军已经东撤，便猛追，是日晚赶到新保安，于8日将敌团团包围。

为了接应第三十五军，博作义命令第一四军、第十六军西进。12月9日，当进至新保安东4公里的减滩时，遭我二兵团第三纵队顽强阻击。这时，我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纵队赶到平绥线，在康庄、岔道歼灭敌第十六军指挥所、第一九师和第二十二师大部；敌一四军见后路被抄，便置三十五军于不顾，掉头东逃，于途中被我军歼灭。

在此之前，毛主席于12月6日来电说我们4日拍去的电报，他刚收到，并严肃地批评我们，说：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不是确实切断张、宣联系，孤立张宣两处之敌，反而提议将一纵控制于张宣两侧洋河两岸地区，让宣化之敌可能向张家口会合，使以后攻击张家口感到困难；你们不是将二纵部加到一纵那里去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已占阵地，反而提议二纵马上加到张家口西北。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4个师（一四军之二七一师，一四军之二五八师，一五军之三一一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家口是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9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尔后难于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4个师，再歼灭张家口5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当日下午，毛主席接到我们的电报，得知张、宣之敌大举向东突围时，于12月7日先后给我们发来两份电报，让我们以一个纵队监视张家口之敌，以两个纵队向逃敌猛追猛击，并同意我们的部署，即：除以1个旅参加下花园作战外，其余7个旅全部包围张家口之敌（4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而且再次指出，我们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2个师竟敢乘车300余辆（实际是400多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视，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我们的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

对于让敌三十五军走掉这个错误，兵团承担了责任，向军委做了检讨。我们当即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给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敌人从哪里突围，哪里的部队要负全责。各部队立即行动，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包围。我们兵团命令第一纵队必须于7日晚全部占领沙岭子和飞机场一

带，完全截断张、宣通路。第一纵队接到命令后，一举歼灭敌第二七一师，俘虏该师师长，而且乘胜解放宣化，迫使敌第三一师逃进张家口。同时，张北与张北地区部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紧缩包围圈。继之，各纵队占领轿顶山、西甸子、十二里营房等外围据点。我兵团一部和北岳军区地方部队及内蒙骑兵解放张北、康保、商都等地，随后他们又扫荡张北以北地区二敌。这样，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形成了第一道包围圈；内蒙的骑兵师和北岳军区的地方武装，形成了第二道包围圈；李井泉政委率领的晋绥第八纵队和晋绥的地方武装，占领集宁、丰镇、卓资山一线，形成了第三道包围圈。张家口之敌，被我军严密地包围起来了。敌人曾多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

到12月13日为止，我军在平绥线歼灭了敌人2个军5个师。敌第三十五军军部和2个师，被我二兵团包围在新保安。敌十一兵团部、第一五军军部和7个师（旅），被我三兵团包围在张家口。我军控制了南口、八达岭要地。这样就迫使敌人将天津、塘沽地区的第九十二、第九十四（两个师）和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调到北平以西布防。

这时，为了稳住敌人，毛主席指示我们：暂缓攻击张家口和新保安，并且要我们在两星期内“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由西而东逐次将敌人抓住。因为这时东北我军正在进行战役开进，没有对平、津、塘的敌人完全分割、包围，如果先歼灭新保安、张家口的敌人，不仅会使张家口的敌人向西突围，还会使南口以东的敌人迅速决策南逃。毛主席还指示东北野战军对平、津、塘的敌人施行“隔而不围”，只做战略包围，隔断诸敌的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这主要是为了在完成整个战役部署以前，使敌人难于察觉，以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为了麻痹敌人，防敌南逃，毛主席还命令中原和华东野战军两星期内在淮海战场上不作最后歼敌部署，使蒋介石难以下达从海上撤退平、津、张敌人的决心。同时，命令山东我军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路上预作准备，防止敌人窜往烟台、青岛方向，从海上逃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冀中、冀南、北岳、晋绥、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和民兵分别在津南、平南、沧县、保定、德州、石家庄东西地区构筑了数道阻击阵地，以防止敌人从陆上南逃。这样就撒下了天罗地网，使傅作义部不知不觉地完全陷入我军的掌握之中。

“围而不打”，就是不宜即打，又不能叫敌人跑掉，这真是一种特殊的战斗，每个指战员都要格外提高警惕。我们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取得了战绩。正如毛主席12月10日来电：我杨李兵团（一纵从）数日前曾于张家口、宣化间歼敌1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九）日又英勇击退张家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二纵）。12月11日，毛主席来电：你们昨日又击退敌人一次进攻，甚慰。12月17日，毛主席又来电：攻克张北甚慰。

毛主席统帅军队赏罚严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全体指战员心悦诚服。

12月20日，东北我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到达宣化，由三兵团统一指挥。东北第四纵队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围困张家口的力量。

自12月1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的七纵以及冀中、冀东地方部队以突然的行动，分别将北平、天津、塘沽的敌人隔断，至12月20日，将华北“剿总”和两个兵团部、6个军部、22个师，25万多人包围在北平；将两

个军部、11个师，13万多人包围在天津；将1个兵团、1个军部、5个师隔断在塘沽。

这样，平、津、张的敌人，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起来。毛主席指示：“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各个歼灭被包围的敌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12月21日，我华北第二兵团对新保安敌第三十五军首先开刀。敌人的王牌军由于面临灭顶之灾，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二兵团的指战员坚决果敢，粉碎了敌人的反扑。战斗到22日黄昏，把敌第三十五军1.9万多人全部歼灭。

在此之前，我判断，新保安的敌第三十五军被我军歼灭后，被包围在张家口的敌人为了逃脱灭亡的命运，就会立即择路突围。

果然不出所料，当新保安敌第三十五军被歼后，张家口的敌十一兵团已部署突围：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正西，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敌骑兵在孔家庄一线发现我集结了重兵而且工事坚固，并且察觉到他们上司的突围计划是牺牲骑兵掩护步兵，便折回大境门。这样，敌人就只有一个向北突围的方向了。

拂晓，敌主力出大境门向北，遭到我第六纵队十六旅的顽强阻击；十七旅奉六纵队的命令，经菜市、稍道沟，抢占四岔、西甸子一线有利地形，以便堵住敌人；与此同时炮弹在西甸子、朝天洼第一纵队二旅的阵地上爆炸了。好家伙，敌人真是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了。从大境门以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敌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辐重马匹，象赶庙会似地挤成一疙瘩。敌人的整个大队人马，全涌到这里来了。攻击的敌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引路。在挥舞着大刀的督战队的驱赶下，密密麻麻地扑向我一旅阵地。

看样子，敌人下了决心，非杀开一条血路不可。

针对敌情，我下达了围歼敌人的命令。

命令一纵三旅和六纵全部坚守西甸子、朝天洼阵地。二纵队从黄土岭向大境门出击，一纵队三旅归六纵队指挥，内蒙两个骑兵师插到五十家子、麻地营子、汗诺坝、甸门口、广土坝及其东南地区，构成第二、第三道堵击线；东北四纵队一个旅插到朝天洼、西甸子东南，与六纵队形成南北夹击；另两个旅和一纵队、二纵队并肩由东南、西南向张家口市攻击。这样，就构成了天罗地网，把敌人置于绝境。

敌人用两个师的兵力，疯狂地进攻了8个钟头，仅仅占了几个小村庄，其余阵地都未能突破。敌人向来不敢夜战。随着白昼的结束，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气力蹦达了。

突然，张家口市内枪声四起。消息传来，我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东北第四纵队，已突进张家口市，经过巷战，跟踪逃敌追出大境门，将敌拦腰切断，俘敌万余。

这样，前堵后截，最后将几万敌人压缩、包围在大境门外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子之间一条宽不到1公里、长不到10公里的山沟里。敌人车辆、人马争相夺路逃命，骑兵踏倒了步兵，大车翻进了人群，一大排无法带走的汽车付之一炬，火光冲天，人仰马嘶，乱作一团。23日夜下起了大雪，敌人虽然还在东突西窜拼命挣扎，但建制已乱，失去了战斗力，陷入了绝境。

12月24日我军对敌人展开了全面的围歼战。各部队纷纷插入敌群，纵横厮杀。从大境门至西甸子、朝天洼，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步兵。骑兵那

么多，乱成了一锅粥。战马炸群，四处乱闯，把敌人自己的逃路都堵塞了。

敌人很快就被分割成无数小块。由于我们动作迅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使得敌人简直没有招架之功。我们许多部队成百上千地俘虏了敌人。到下午 3 时，围歼战宣告胜利结束。

连同外围作战在内，张家口战役历时 25 天，我们兵团共歼灭敌人 6.5 万多人。我们自己伤亡 2900 人，以小的代价，打了个大歼灭战。

至此，大同以东，直到北平以西，全被我人民解放军控制，傅作义向西突围已不可能。

当日，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华北二、三兵团：庆祝你们在几天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选摘自《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3—263 页。作者时任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5 斗智斗勇打谈结合

平津战役，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经历了两年半，战争的发展已经进入决战阶段的时候进行的。当时，国民党军除后方部队外，在各个战场上采取集团防御的，计有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 6 个重兵集团。其中沈阳集团已被我军歼灭，徐州集团正被我军围歼中，太原集团已被我军包围，北平集团战略上的弱点已完全暴露。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迅速下降到 290 万人左右，我军的总兵力则上升到 300 余万人。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分析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无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经陷入瓦解状态。为了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和一切反动势力，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在辽沈战役刚告结束，淮海战役将获全胜的时候，在华北战场发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共有 4 个兵团、12 个军、52 个师，约 60 万人，分布在山海关至归绥一线。其中以北平为中心。

对于上述敌军，毛泽东同志曾经作了如下的分析：“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他又指出：“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华北敌军在我军的胜利声威面前，预感到我东北野战军同华北解放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因而惊恐异常。是守是逃，蒋、傅之间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矛盾重重，难以达成一致，下定最后决心。但是，他们又认为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至少要休整 3 个月才能进关，所以仍想暂时在华北战场上看一下。直

至发现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入关，他们才赶忙将兵力收缩于平、津、张、唐沿铁路一线，一面派人跟我谈判，一面与蒋介石信使往返不绝，准备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同时准备负隅顽抗，作最后挣扎，希望得到美帝国主义对我的直接干涉。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指示我军：必须将华北敌军就地歼灭，不许它南逃或西窜。华北我军必须首先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打敌一翼，不让敌人西窜，并拖住敌人使它不能由海上南撤。东北我军必须迅速兼程入关，与华北我军共同歼灭该敌于平、津、张、唐地区。

为了完成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役任务，解放华北全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东北和华北我军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同志组成的平津前委和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华北我军2个兵团、7个纵队及地方骑兵步兵部队，20余万人，迅速从平绥线上展开；东北我军12个野战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80余万人，在辽沈战役后，不待休整，不顾疲劳，迅速挥师入关作战。于是，我百万大军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长达1200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战役行动。

平津战役初期，毛泽东同志采取了由西向东逐一抓住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各点之敌的作战方法。这一作战方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既能防止敌人向西逃跑，又有吸引敌人由东向西增援，以达抑留敌人于平、津、张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除将华北主力集中使用于平张线外，又将东北先遣兵团使用于这一线，而不使用于北宁线，去围攻如唐山等地之敌。这就避免了因我在北宁线先打唐山，致将敌人北平地区之兵力调向东去，集中到津、塘地区作战，背靠海岸，既不利于我军各个围歼敌人，又有迫使敌人从海上跑掉的危险。

战役开始时，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华北第二十兵团，从1948年11月29日起，首先在平绥线上以拖住一批敌人（即抓住包围不攻击）不使其逃跑为目的，展开了对张家口外围的作战。这样，北平至张家口之间除新保安以外，全线为我军所控制。傅作义的主力7个师、两个骑兵旅则分别被我军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点，使平、津之敌难以定下弃张、新两敌于不顾而单独逃跑的决心，从而就造成了我军抑留敌人于平、津地区予以各个歼灭的先决条件。

东北我军主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预定计划，以神速荫蔽的行动分由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向关内急进。经喜峰口进关的第一、三、五、六、十纵队，自12月12日起由蓟县、三河、丰润、羊坊等地区向北平攻击前进，形成了对北平包围之势。经冷口和山海关入关的我第二、七、八、九、十二纵队和炮兵纵队，自12月13日起沿北宁线向天津、塘沽间急进，完成了对天津守敌的包围，割断了津、塘守敌的联系，打乱了敌津、塘地区的防御体系。上述我入关各路大军，协同华北我军出击作战，行动之迅速，完成作战部署之快，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这就实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将平、津、张一线各点之敌一概加以包围的指示，置敌于欲战无力、欲守无能、欲退无路的完全被动的地位；造成了我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将平、津之敌逐一消灭的有利态势。

我军完成了对平、津、张一线各点之敌包围之后，即遵照毛泽东同志规定的“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攻击次序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

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作战原则，对业已被围、被隔之敌，实行各个歼灭。当我军计划首先攻歼新保安之敌时，毛泽东同志即指出：新保安攻克后，张家口之敌有可能向西突围，北平之敌也育向东突围的可能。因而他指示在未打新保安之前，北平方面必须作好防敌突围的部署，张家口方面必须加强兵力。12月22日，我华北第十九兵团将新保安之敌傅作义的精锐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一举歼灭。该敌被歼后，果然不出毛泽东同志所料，张家口之敌5个师、两个骑兵旅于24日不顾一切地由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拼命突围，我华北二十兵团及新增加的东北第四纵队在密切配合下对突围之敌进行了围歼合击，奋战竟日，终将敌第十一兵团所属的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共5.4万余人，歼灭于张家口地区，24日解放了重要的战略城市张家口。

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同志再次指出：北平敌军向西突围已没有可能，但会合天津之敌沿津浦、平汉铁路南撤，塘沽之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他要求我军除须加紧部署、严密阻击和准备追击外，还应尽快包围歼灭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敌人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守敌。我军本拟首先攻歼塘沽之敌，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守敌侯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因此我军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改变预定计划，首先歼灭天津之敌，只以一部兵力对塘沽之敌加以监视。我军于1月14日10时开始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八十六军、六十二军的两个师，九十四军的一个师及其他新编师团共13万余人，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于1月15日解放天津。塘沽、大沽5万守敌见势已去，狼狈乘船从海上南逃，塘沽海港即告解放。

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解放后，我百万大军云集于北平地区。北平敌人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20余万人，完全处于我军严密包围之中。北平已成为陆上孤岛。

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城免遭破坏，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早在战役开始时，我军就向傅作义将军提出放弃无谓抵抗，接受我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办法。傅作义将军却提出种种困难，以及含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条件，以拖延时间。同时一面令各被围敌军负隅顽抗，一面暗示组织所谓“北平民众和平代表团”，请求我军不要攻城。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同时指示我军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努力，对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消灭。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这时，平津前线我军已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和塘沽等地，傅作义的嫡系主力在平绥线东段已被歼殆尽，北平敌军已成囊中之物。1月16日，我平津前线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治委员向傅作义将军发出公函，严正地指出他执行蒋介石祸国殃民的“剿匪勘乱”的伪令，及其反人民的罪行，说明继续抵抗下去已毫无作用，并提出两个条件任其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之安全；二是如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同时指出：如以文化

古城及 200 万人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顽抗到底，我军将用精确战术，实行攻城；破城之日，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由于我军的强大和胜利，北平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敌军广大官兵的厌战，傅作义将军终于接受了我军提议，表示愿意按照我军提出的第二种办法令所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从 1 月 22 日开始，北平国民党军按照我军指定之地点开出城外接受改编，至 31 日移动完毕，我军进入北平。平津战役即告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是抑留敌人，不使脱逃，然后加以各个歼灭的一场艰巨而复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华北敌人的情况和动向，指出：如果敌人采取固守平洋的方针，这对我军是有利的。如果敌人采取放弃平津的方针，不论他们是南逃，或者傅作义率领他自己的几个军逃回绥远，蒋系各军逃至南京一带，我军虽然可以不战而获平津，但从战略上来看，对我军是不利的。并指出：敌人如果南逃，从海上将受船只的限制，从陆上则须经过我辽阔的解放区，均非容易，而沿平绥路西逃绥远则比较容易达其目的。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从不使敌人逃脱，就地加以歼灭着眼，制定了一个英明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在这一方针中，他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战略意图和作战思想，而且估计到整个战役的发展趋势，对作战任务的规定是那样清楚，对作战步骤的安排是那样明确，对作战方法的运用是那样巧妙，结果是战役的实际进程和预定的完全一致，敌人无论怎样狡猾也无法逃避全部被歼的命运。这在一战役中，毛泽东同志以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指挥艺术，采取了一系列的极其英明的战略措施，自始至终驾驭着战役的发展。如战役发起前，命令我军缓攻太原，撤围归绥，以免太原过早攻克或归绥告急，促使敌人决心南撤或西逃。战役发起时，命令华北我军集中兵力，打敌一翼，首先从平绥线上切断敌人西逃的道路，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使平津之敌不能立即定下从海上南逃的决心。同时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不顾疲劳，以荫蔽的行动，不走北宁线，取道热河，迅速入关作战，并采取许多佯动的措施，麻痹敌人，以免敌人迅速决策奔逃。当我军业已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控制了平绥线东段，东北我军主力即将完成战役开进的时候，他又具体规定了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并且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在我军各个歼敌的攻击次序上，规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同时还组织了全国有关战场的配合。如命令淮海前线我军留下杜聿明指挥之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命令山东方面我军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所有这些，都紧紧围绕和贯穿着一个目的，就是必须把华北敌军就地加以歼灭，不许它南逃或西窜。我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从而使这 100 万大军的作战行动完全收到了出敌意外之效。毛泽东同志预定的计划得到了完全的实现。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之一。

（节选自刘亚楼著《平津战役的胜利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

光辉》，见《平津战役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13 页。作者当时为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6 “绥远方式”的实现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从北平回绥远不久，旧历年来临。除夕前，绥东人民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同绥远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 60 里的陶卜齐车站地区发生冲突。绥远局势顿呈紧张。我立即电告傅作义先生，经傅和华北局联系，转达了毛主席的“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绥东前线部队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停止向绥远军队的进攻，2 月 11 日又将主力部队撤至卓资山一线。于是绥远局势便趋平静。

2 月 22 日，傅作义先生偕邓宝珊先生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先生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当傅先生问毛主席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主席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作过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于 3 月间在北京饭店宴请傅先生时，经贺龙将军提出商定了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同志；绥远方面傅先生派周北峰、阎又文二人。3 月 23 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第一次商谈。先就划定绥蒙姚结部队与绥远部队停火线问题进行商谈。周、阎来电，让我提了划定停火线的意见，往返几次才定下划线问题。尔后，就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双方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兑换、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等问题又进行了反复商谈。于 6 月 8 日在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双方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绥远问题的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陶铸同志。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毛主席批准了《绥远和平协议》，于 6 月 8 日正式生效。7 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上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

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方面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去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他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分别作了个别谈话。同我谈话，我只能不即不离的虚与委蛇。他们同孙、刘的谈话，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买、分化等一类鬼名堂。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世珍的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我这样做，对南京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 1900 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签字后，华北人民政府依据《协议》，责成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丰镇组成了联络处。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的组成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 20 余人。潘纪文同志任联络处处长，鲁志浩同志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银行工作组、铁路工作组。

中共联络处的人员进驻归绥后，随即开展了工作。当人们看到街上出现了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说明绥远解放指日可待，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同时，也说明我们的起义已经完全明朗化，进入成熟阶段了。可是特务们感到朝不保夕，已面临末日，对联络处的工作十分仇视，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顿起杀机。7 月下旬的一天，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几位同志从旧城回车站时，事先埋伏在“纯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掷手榴弹，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炸伤，当即送省立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立即亲自到联络处驻地表示慰问和致歉。潘纪文同志认为工作人员的生命没有安全保障，难以进行工作，要把联络处全部撤走。

我对特务的罪行十分气愤，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我当即电报傅先生转报中共中央。毛主席接见了傅先生，转来指示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仍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毛主席还说：“绥远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我收到傅先生转来的毛主席的指示后，焦虑的心情才平息下来，并深切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

绥远起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和斗争，到8月下旬，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但还有一些事宜尚未料理稳妥。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傅先生向毛主席汇报了绥远的情况后，毛主席委托傅先生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推进绥远起义。毛主席的这一重大决策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做是“放虎归山”。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

8月28日，傅先生从北平前门火车站乘专列出发来绥。9月10日，我随傅先生进驻包头，一面说服打通军政干部的思想，一面同各种反起义势力作斗争，同时着手拟写绥远起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通电稿。9月15日，傅先生着他的秘书阎又文拟写的初稿完成。

晚上10点钟，我到皮革厂，阎秘书将电稿交我看，我看后觉得电稿没有充分表达出我们起义的意义。当时我也没说什么，把稿子装在衣兜里，返回包头银行，找我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研究改写电稿。李说：“有事吗？”我说：“阎又文写了个通电稿，大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光骂管什么事？”李说：“那就研究另写吧。”我说：“我们起义跟共产党走，和共产党共事，要讲明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我们多年抗日，牺牲了多少人，受尽艰难困苦，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国家、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必须把这点讲明白，这是大义所在。”第二天，我和李吃过早点，坐车来到皮革厂，到西楼上李世杰、张濯清、王克俊住的房子，我向他们说：“昨天夜里又文给我的通电稿子我看了；觉得不太合适，我想让忠孚另写一写。”李世杰等连声说：“好！好！让忠孚再写写吧。”我说：“要把我们多年来的抗日，如长城战役、百灵庙战役、五原战役……奋斗牺牲，艰难困苦的情况写出来，表明我们为国家为人民的立场……”于是李执笔另拟，将近12点，电稿拟成。这天中午邓宝珊先生宴请徐永昌，邀我们参加起义的将领和李世杰等作陪。我对李忠孚说：“我们赴宴去了，你把稿子交又文送总司令审阅。”我们就走了。李把稿子交阎送傅先生审阅，傅同意了。阎、李把稿子各分一半，迅速誊清，以便速送电台发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阅。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通电稿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在电稿上写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我们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签字后发出。

9月19日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附近的第二十二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我们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包头，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发出起义通电。

9月20日下午，我正在省府机关处理公务时，接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

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我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

起义之后，一切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还没有改变，解放军也没有进驻绥远。下一步怎么办？我心中急切盼望中共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快些来归绥，以便早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

10月初，我给傅先生打电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傅先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提出今后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应遵循四个原则，三个步骤。这四个原则是：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工作。毛主席十分赞同。

10月2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在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的绥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克林、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等同志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先生。毛主席就绥远今后和平合作问题和他们作了长时间谈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之后，傅先生即打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毛主席说：“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正规军、地方军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省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

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上，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频、张灌清、姚喆、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璧、杨叶澎等16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为副主席，周北峰、李居义、李世杰、秦丰川、胡凤山、张立范、常佩三、张淑良、杨令德、辛崇叶、康保安、张国林、苏谦益、张如岗、张庆忠、王建功、阮慕韩、李维中、靳崇智、刘秀梅、武达平、杨叶澎等22人为委员。12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月中旬的归绥市，已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很少有人上街。12月17日上午，绥远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从丰镇出发来归绥市。

绥东来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建立友谊，于19日下午2时，在联谊社设茶话会，与驻归绥市军政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各领导，蒙、回各族代表及知名人士联欢。我和孙兰峰等70余人应邀到

会。高克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致词，说明了茶话会的意义，是互相认识，以便在今后工作中亲密团结。号召大家警惕蒋、阎匪帮特务钻空子进行破坏。姚喆、杨植霖、苏谦益等相继发言。我在茶话会上着重讲了起义后3个月里所做的几件工作。孙兰峰在发言中生动叙述了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说：“九一九起义后，我赶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主席对我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的话使我感动得从头热到脚心，掉下了热泪。在当晚的欢宴会上，各首长对我的亲密和关怀，使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毛主席又走到我的桌边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干一杯。’毛主席的两句话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茶话会上充满团结亲密和愉快的气氛，使我激动不已。在茶话会临结束前，我这个年届半百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兴奋地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伟大政策！”“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历时3小时的茶话会，愉快和热烈温暖的气氛，使我忘掉了室外还是冬天，忘掉了街上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在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向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进程中，我和高克林同志奉中央、华北局电令，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毛主席和我的谈话，至今不忘。

我曾在起义前从归绥来北平见傅先生。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和高克林同志3月底乘火车离开归绥，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和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19号他原来的住宅里。住宅为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藤萝满架，花香四溢。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首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以及曾士先3人起草报告。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又做了详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月13日夜11点半，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14日上午8时，傅先生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为：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6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地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他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

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得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觉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4月17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激动得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1950年4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周总理，宋庆龄、张澜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下午6点钟，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晚，我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7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训示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辞，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19号住处，已11点多了，我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

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听了毛主席的训示后，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由于我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新制度、新作风，尤其是民主作风了解不足，在起义后总认为军队仍是我带，行政仍是我负责。而原指挥所与军区合并后，觉得军队的一切联系不上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绝大多数公文看不到了，不知道这是分工负责制，反认为军队是革命武装，我若经常过问，恐惹起对我的怀疑，自卑地把自己置于主人翁之外。故从1月份以后，军队的事过问不多，行政的事看到多少说多少，忘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毛主席和我谈话之后，我觉得仍以旧思想、旧意识看待新事物，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殷切希望，确实不够开诚布公，不够心口如一，应该对本职工作积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该说就说，不容旁贷。尤其是在北京看到各方面秩序良好，处处显示新气象，与旧社会截然不同，使我异常激动，对新中国的未来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一切工作。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选摘自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第254—345页。作者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绥远起义后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7 初会傅作义

天已经亮了，毛主席还在他的办公室里。

秘书轻捷地走进去，递给他一份电报。他接过去，极快地看了内容，呼地站起来，大声说：“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特大喜事呀！”

到这时，他仿佛才发现秘书站在面前：“告诉机关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和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毛主席说着迈步走到院子里，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了协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同志。”

……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将军和邓宝珊将军乘飞机从北平抵达石家庄。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有关领导，去石家庄迎接他们到达西柏坡。

傅作义将军一到西柏坡，就受到周副主席的热情欢迎，他说：“傅将军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本人有罪，本人有罪！”傅将军连声说。

下午，毛主席起床以后，周副主席就来说：“主席，傅作义将军已经来到了西柏坡，住在后沟，我已经和他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你什么时候见？”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嘛。”

“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还是我去吧，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

季节虽然已进入2月，天气还很冷，毛主席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乘坐一辆中吉普去后沟。

傅作义将军在周副主席陪同下早已等在门口。车一停下，他向前迈了几步，双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第一句话就说：“我有罪！”

毛主席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走进会客室，毛主席向邓宝珊、章士钊等问候，赞扬他们为人民办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当时在坐的还有邵力子等，他们是要求以私人的名义来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的。

坐下以后，毛主席对傅作义将军说，“北乎和平解决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团圆。如果打起来，大量的官兵要伤亡，家庭要遭破坏。北乎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打起来，把紫禁城打毁了，文明古都被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是会骂我们的。”

在场的人都点头赞成。

“当然，打起来我们也有准备。”毛主席挥了一下手，说：“我们的炮兵在几个地方布置了炮火，只要打十几分钟，就可以打毁几段城墙。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不打紫禁城，不打古建筑，不打居民区，专门消灭抵抗的部队。文化古都的名胜还是要保护的，城市人民也是要保护的。和平解决北乎最好，你带了个好头，立了个大功。今后，这样的事，可能还不少。你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决，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和人民解放军一样看待，绝不受歧视。你知道，我们历来说了话是算数的。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部队的战士，有不少是国民党军队里来的士兵。全国的形势你都知道了，现在长江以北基本上全解放了。蒋介石在1月21日宣告引退，把李宗仁推出来代理总统。但还是蒋介石说了算，掌握军政大权。”

当有人提出蒋介石愿意进行谈判时，毛主席说：蒋介石在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但他又提出了先决条件，要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他这还是想继续打仗，不是和平谈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谈判。

傅作义将军说：“请问主席，我是回北乎还是住在这里？”

毛主席先是一愣，接着笑了：“你现在住在北乎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乎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到北乎以后，就要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和华侨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也将被邀请参加会议，你有功，也有代表性。”

傅作义将军激动地说：“我回到北乎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教和关心，一定要在共产党和部队首长的领导下，做好部队的和平整编工作。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

弥补过去的过错。”

“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呀！那黄河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我们的朱总司令、彭德怀、刘伯承和贺龙等，过去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也是很出名的，现在都是我们最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我们能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中做具体的工作了，我们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傅作义将军走后，散步时我问毛主席：“主席，傅作义将军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曾经说过，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共不可能在中国取得胜利；如果中共在中国真的能够取得胜利，他甘愿给你当个小小的秘书，这话是真的吗？”

毛主席说：“听说他讲过。不过，他给我当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留在政府里当官，因为他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他带了好头。在解放战争后期，有不少地方也可能要和平解放的，他起了个样板的作用，影响很大，这就减少了损失，减少了破坏，特别是对大城市的破坏。破坏容易，再建设起来就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北平和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有功者要赏，这是我们的政策。”

（摘自阎长林著《警卫毛主席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366页。作者当时任毛泽东的警卫排排长。）

8 亲切的接见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奉令前去接收改编入两广纵队的傅作义部独立第二十四师。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决定迁往北平，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我感到非常荣幸。离开西柏坡以后，周恩来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坐他专用的吉普车前往，他很健谈，谈到他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工作的情况，谈黄埔军校，谈东征作战，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景，使我深受教益。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同志介绍我见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见了我就问：“你就是在广东打教育厅那个曾生吗？”我回答说：“是的”。他老人家高兴地说：“打得好”。对于1936年打压制学生抗日运动的教育厅，过去广东党内曾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毛主席作了肯定，是对我们的极大支持。毛主席很关心两广纵队的建设。他问：“你们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如何编法，要官还是要兵，还是官兵都要？”我答：“主要要兵，按周恩来同志指示整编为两个师。”上了火车后，毛主席又来到我的身边，和我亲切交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在广东工作，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他考问我：“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我当时答不出来。毛主席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

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我很惭愧，自己是广东人，但对广东的历史知道得不多。全国解放后，我在广州市工作时，查考了一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就设置了南海郡，治所就在番禺，即现在的广州市。赵佗是河北省真定（今正定）人。秦朝时，他初为南海郡龙川令，后为南海尉。汉高祖刘邦曾赞扬过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秦末，他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自封南越武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臣服汉朝，“奉汉约”，正式受封为南越王，因而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毛主席当时和我谈赵佗的故事，意思就是要我们在解放广东后，要把广东治理好，建设好。

（《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64565 页。作者时任第三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五、南征北战追穷寇

1 毛主席命令我们下江南

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是我人民解放军继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重大打击。这时，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丧失殆尽，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机构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要再向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作若干次重大的打击，它就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早在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向我们指出：“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所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们第四野战军就开始了南下进军的准备工作。

3 月下旬，我参加了野战军在北平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会上，大家都为我们党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而欢欣鼓舞，也更进一步明确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大家一致认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历来的反动统治者，也决不甘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一再空喊“和平”，就是为了取得喘息时间，企图卷土重来，实现其扑灭革命的阴谋。我们决不会像古代希腊寓言中的农夫，对毒蛇怀着好心肠，怜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必须把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作美女的蛇彻底清除掉。

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什么都计划好，安排好了，就等待我们大军南下去解放全部国土了！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要在北平西郊的香山，接见我们四野的师以上干部。

七大以后，我就离开延安到东北，已经快 4 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当敌人重点进攻陕北的时候，我们曾日夜地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担着心。曾几何时，毛主席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野战军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更指挥了全国各个战线不断胜利，进入反攻，取得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新局面。

4 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乘车去香山见毛主席。

车子疾驶，过了颐和园，从青龙桥驶上了去香山的路面。离毛主席越近，心情也越发激动。虽然我不止一次地见到过毛主席，当面聆听主席的教导，但那时是在长征的路上，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而今天，却是在北平西郊的香山呵！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跨上一个新的高度。不再是“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而是“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了。在这个地覆天翻的时刻，能见到敬爱的毛主席，当面聆听教导，遵循着他指示的方向前进，对我们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呵！

香山，真不愧为风景优美而又幽雅清新的所在。这里地高树密，殿宇、亭台、楼阁、廊榭、塔坊和青松翠柏之间，到处是盛开着的桃花、杏花，含苞欲放的丁香、梨花……五色缤纷，一片芬芳，真令人心旷神怡。这里处处焕发着青春光彩，正象征着中国人民的春天已经到来！

我们走进一座不大的礼堂。在这里碰到了许多熟悉的老同志，他们如今都在中央机关工作，整天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和他们谈着毛主席的健康，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又兴奋，又热烈。

毛主席来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等中央首长都来了。

礼堂里立即肃静下来，我们几百双眼睛，都集中在毛主席身上。

毛主席进来的时候，我们都恭敬地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着毛主席。

毛主席神采奕奕，情趣盎然。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同前排的同志一一握手。

当毛主席摆手叫我们坐下时，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热烈鼓掌，希望主席能给我们一些指示。主席微笑着说：

“好吧，大家要我讲，我就讲几句吧。”

毛主席简单他讲了讲时局，他说：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过程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

毛主席强调说，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意志。应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主席以热情洋溢的口气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暴风雨般的掌声，响彻礼堂，经久不息。

“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这伟大的号令，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语句，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鼓舞着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定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打过长江去，完成历史的使命！

当我们驱车从香山回部队时，夜已经根深了，一盏盏汽车灯光，划破了郊野的黑暗。远远望去，公路像一道天河，两旁房屋里的电灯和油灯，恰似天河两岸的星群。我几次回望香山，那里还是灯火辉煌，又明又亮。

正如毛主席所料，国民党反动派拒绝了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他们玩弄的“和平”阴谋，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毛主席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们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千军万马，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南下进军。全军战士，高喊着“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向长江南岸，向祖国的海疆，向祖国的边境，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进军！去把残余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

（作者李天佑，摘自《星火燎原》（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23—327页。作者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八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彻夜不眠等捷报

事实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不过是个幌子，并无诚意。他们在谈判桌上翻云覆雨，死拖硬抗了许多天，最后撕破了和平的假面具，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引退”在奉化从事幕后指挥的蒋介石又发出了反革命叫嚣：“不惜一切牺牲，与共党周旋到底！”

4月20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了长江前线，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命令用巨大的红字标题油印出来，从军部传到师部，从师部传到团，传到营，传到连，传到战士们的手里。全军上下，到处响彻着雷鸣般的呼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接到兵团指挥部的电话后，我和军长成钧等同志立即来到前沿指挥部。兵团指挥部首长见各军指挥员到齐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来了。”他们走到军用地图前，手落在敌人防线上：“据我军先遣渡江侦察营报告，汤恩伯正调动善于防守的二十军西移繁昌、铜陵一线，接替八十八军，企图加强防线中的这个薄弱环节。现在敌二十军和八十八军正在办理交接手续。毛主席指示我中路兵团紧紧抓住这个十分难得的战机，打过江去！”

从来都是这样：毛主席总是最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的弱点，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汤恩伯这个自作聪明的部署，恰巧造成了他的弱点，又让我们的毛主席给抓住了。我们都为毛主席这个英明的决定而感到无比的兴奋。

按照预定的部署，我们军的第一步行动，是从姚王庙到大套沟一线过江，突破对岸头栅、王家套、夏家湖之间的敌军防线，占领横山桥、铜山、岳山和羊山尖等制高点，然后再根据情况扩大战果。

时针一秒一秒地朝着那伟大的历史时刻跳动，夕阳淡淡地蒙上了一层金黄色。我们把命令传达下去后，军里几个同志连晚饭也没吃，沿着江堤后的堑壕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大炮一门又一门虎视长江南岸，突击队、水手队正在作紧急的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挎包带上摆动着一一条条雪白的毛巾，每条毛巾的头上都印着七个大红字：“将革命进行到底！”许多新参军的战士，把从家里带来的“渡江鞋”穿上了。在这些鞋上也都有他们的母亲或爱人精心绣制的两行字：“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许多条战船，覆盖着绿色的树枝，悄悄地隐蔽在大堤后面。

傍晚时分，我从前沿刚刚返回到指挥所，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话筒里传来兵团首长的声音：“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开船的命令！”

“告诉部队的同志们，”兵团首长提高了声音，“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坐在总部等候我们的捷报！”

这个消息顷刻传遍全军，好像一条看不见的红线，在一刹那间把远隔千里的北平和长江连在一起，把全体指战员的心和毛主席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守在电话机旁，耳机放下了又拿起来，话筒里传来突击团、突击营一声声响亮的回答：“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我们保证

迅速打过长江，让毛主席早一点休息！”“用胜利回答毛主席！”……

国民党反动派曾经幻想，依靠长江天险，依靠他的美国主子撑腰，加上一条从天空到水底的“立体防线”来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他们吹嘘：“共产党想过长江，除非会水上跑步。”现在，他们的一切幻想全都化成了泡影。长江天险不能挽救他们，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也不能挽救他们。敌人苦心经营的“天险防线”、“立体防线”，我军只用了30分钟就给它撕开了一条长达20里宽的口子，先头部队向敌纵深勇猛地插了进去！

21日拂晓，我军7个主力团渡过长江，控制了铜山、岳山、羊山尖等制高点，直叩繁昌城守敌的大门。由于我军进展神速，勇猛穿插分割，把敌人弄了个晕头转向。当我们的一支部队黑夜向纵深猛插时，迎面碰上敌人一个军官。这家伙神气十足地叫着：“乱跑什么！共军没有翅膀，他们还远着哩！”战士一听他把我们误认为他的溃兵了，忍住笑跑上去，一把把他扭住说：“有翅膀你也飞不掉了！”

21日黄昏，我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全线发起猛攻，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渡过长江，敌人的江防全线瓦解。23日传来消息：东路兵团解放了南京城，残敌正向杭州方向溃败。三野首长命令我们不顾一切疲劳向吴兴疾进，配合东路兵团截歼南京、镇江逃敌。此时正逢江南梅雨季节，部队冒雨出发，以一昼夜160里的速度前进。全军的意志集中在一个字上：追！24日黄昏，我军在湾址地区一举歼灭了蒋介石江南残余部队中的一支“王牌”——二十军，敌军长杨干才在逃跑中被我追击部队击中毙命。随同二十军被歼的还有九十九师（缺一个团）和一个保安旅。

27日，我各路大军会师吴兴，切断了京杭公路，把南京、镇江逃敌团团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在这次围歼战中，先后歼灭敌人8个整军和4个军的一部分，俘敌8万余人。

（摘自黄火星：《大江重渡》，见《星火燎原》（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32—336页。作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五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3 飞渡长江，狂飙直下上海市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揭开以后，中央曾对华野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

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军委提出“叶、陶两纵队（指华野第一、第四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广纵队随同南下。在刘邓大军决定提前进入大别山，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纵队转入鲁西南后，中央军委认为在鲁西南需要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南下，分散南进，对全局不利，放弃了这一计划。

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我率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5月初，中央同意了我提出的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黄淮地区歼敌的建议。要求在4个月至8个月内，华野主力在汴徐线南北地区歼敌。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在黄淮之间确有大量歼敌的条件，军委于7月13日电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一九四九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4日提出华野“争取冬春夺取徐州”，九月中央会议又决定

解放战争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作战。这就又一次推迟了渡江时间。

第三次是 1948 年 10 月 11 日军委改变了“冬春夺取徐州”的计划，提出：淮海战役（当时，战役目的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结束后，估计此时“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华野“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并指示 1949 年 1 月休整，2 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3 月至 7 月协同刘邓开始上述作战，“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关于渡江问题，我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也经常考虑。我是把它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豫东战役的胜利证明，适时扩大战役规模，组成更为强大的野战兵团。以对付敌人的高度集中，比以较小的野战兵团，寻歼较小目标的敌人，对我更为有利，发展下去，势将成为我军同敌人主力的决战。济南战役，敌人南线 3 个兵团在我前沿徘徊，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是在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也说明我对敌进行决战的有利条件已逐渐成熟。同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保障条件。我认为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又以在徐蚌地区决战为最有利，因为徐蚌地区不仅地形宽阔，通道多，适宜于大兵团运动；而且大部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背靠山东和华中老根据地，距华北也不远，人力物力的支援将更为充裕和便利。但是，是否在江北决战，还要看全局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这个现实性显示出来了。于是我们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辰时电报中央军委，提出如果各老解放区尚能对战争作较大支持，以迫使敌人在江北与我决战为有利。我们于歼灭黄伯韬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我们的建议符合中央军委的意图。9 日毛泽东同志为军委起草的复电指出：“齐（八日）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重大决策将大大有利于我军尔后的渡江作战和在长江以南的作战。因此，当决战胜利即将到来之时，接到中央军委 12 月 12 日的来电，军委决定大约在 1949 年 5 月或 6 月渡江。中央指示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并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这次军委渡江决定与以前几次不同，这是在南线同敌人进行了战略决战，将南线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之后渡江。我不禁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决策的英明和战局发展的顺利而感到格外振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

崩溃的境地。国民党军在两年多的作战中，共损失 495 万人，蒋介石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我歼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不足 150 万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政治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逼迫蒋介石下野。一些高级将领公开要求蒋介石停战言和。经济上财政已山穷水尽，物价飞涨，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怨沸腾，发炭不可终日。总之，国民党当时的形势是军事上主力被歼，士气丧尽，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失尽，经济上财政崩溃，力量耗尽。

我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多的作战，已经由 120 多万人增加到 400 万，其中野战军已发展到 218 万人，装备进一步改善，士气高昂，大兵团作战经验更加丰富。南方各省游击队武装也有很大发展，总兵力达 5 万余人。两年来，我军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总面积达 260 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有 2 亿。

我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不少地方实力派也与我党进行联系。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编组训练部队，以便卷土重来，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21 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后，先后召见、任命一些高级将领，并布置了长江防线。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 1949 年元旦，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 月 14 日，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3 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还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总之，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是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和平谈判成功了，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用战斗的方式渡江。所以党中央在准备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要求我军加紧进行以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

从 1949 年 1 月起，国民党政府在和谈烟幕下，加紧修建长江防线，将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驻在武汉的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共同负责长江防御。其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持淞沪，然后待机反攻。”敌人

防御部署是：汤恩伯指挥的 75 个师，约 4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 800 公里的地段上（重点置于南京、上海之间），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 54 个师，位于浙赣路上担任第二线防御的有 21 个师。白崇禧指挥的 40 个师，约 25 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 1000 公里地段上，其中在江防第一线的有 27 个师，在第二线上有 13 个师。另以江防舰队和第二舰队共 130 余艘舰艇，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 300 余架飞机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敌人防御的明显特点是第一线兵力单薄，纵深空虚。

在此期间，我们组织全军学习毛主席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中央政治局会议 1949 年 1 月 8 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广泛展开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进行纪律教育，为我军渡江南下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4 月 1 日，总前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在 4 月 3 日得到军委批准。纲要指出：我军的战役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渡江战役预定 4 月 15 日发起。

4 月 10 日，军委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发来电报说：“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 4 月 15 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我当即召集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报告了长江下游水情——如延长一月，则江水上涨，又临雨季，现我方小船占 2/3 在江水上涨情况下难于在江中行驶，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或将渡江重点置安庆、南京段，江阴下游实施佯渡，但如此不易截断敌向沪杭退路。”同日，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总前委则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于 11 日复电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4 月 12 日，我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 22 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4 月 18 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 4 月 20 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当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总前委还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 月 20 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晚 20 时，我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突击。第一梯队 4 个军（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21 时许，攻占了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并逼近南岸，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发展。敌人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 日我军攻占了铜陵、顺安、繁昌等城镇。我中集

团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派机动部队第九十九军前往增援，增援部队甫抵宣城，敌江防部队已放弃阵地，第九十九军即向杭州逃窜。22日中午，中集团突人敌人防御纵深已达50公里。23日，中集团第二梯队的各军也全部渡到南岸。

21日夜东集团在三江营至张黄港段，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我第十兵团第一梯队之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之后，于22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进击。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内应下宣布起义，我第二十九军占领要塞，控制了所有的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日，占领常州、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

我第八兵团之第二十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日占领扬中岛，23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纵深发展。该兵团位于南京、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23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留在南京的部分政府机构，在李宗仁率领下，已仓皇撤向广州。

西集团（第二野战军），由马当至贵池段强渡成功，占领了贵池、彭泽等地，主力直趋浙赣线，迅速割裂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

国民党的海军除第二舰队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外，一部分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另一部分逃往上海。

南京是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达22年之久的政治中心。南京解放的伟大意义，正如中共中央的贺电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我军神猛迅速，一举突破江防，敌人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随即，我们组织了郎溪、广德围歼战，这是一大胜利，因为如果不将这10万敌军歼灭，让它进入杭州，这座名闻中外的秀丽古城将遭受一场浩劫。当时我还很耽心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受到破坏。所以再三嘱咐要抢占钱塘江大桥，我先头部队到达时，敌人来不及爆炸大桥就为我消灭了。三野在郎广围歼战中加上在长江南岸边及追击途中歼灭的敌人共13.9万余人。江防之敌仅第五十四军及第五十一军之一部，在我追击部队到达之前逃到上海。

在我围歼郎广地区之敌的同时，我第七兵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进占浙江省会杭州，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渡江作战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郎广围歼战结束之后，我就把指挥的重点转到攻占上海这方面来了。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考虑，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要求我第三野战军暂不要进攻上海，而且也不要靠近上海，不要惊动敌人，不使其过早地退出上海，以免仓促进去，陷于混乱，同时令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线休整，随时准备支援我三野作战，并准备应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这时敌军退守上海的部队，有 8 个军，25 个师，加上军舰 30 余艘，飞机 120 余架，共约 20 万人。

由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尚未做好，我们不得不推迟了攻占上海的时间，敌人却利用时间在上海大肆抢劫物资从海上运走。5 月 6 日，中央军委指示，为了阻止敌人劫运物资，可先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切断敌劫运物资和退逃之路。但不改变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要我们部署进行。

军委的这一指示，与我们设想的第三种打法不谋而合。我们于 5 月 7 日已时上报了作战方案；以第二十九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第三十一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并预定 12 日、13 日发起攻击。5 月 8 日，军委给我和张震同志的复电说：“（一）同意七日已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了总前委。

根据军委指示，我于 5 月 10 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自我钳击吴淞以后，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吴淞及高桥 3 个军，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很有利的，完全符合我们在战前的设想。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我兵力展不开，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战役时间拖长，而市区虽然已经空虚，因受接管准备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5 月 8 日辰时，我与张震同志联名向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第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惟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 日，又得到中央军委电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五月二十五日前后开始攻城。”于是，我们制定了总攻的部署，并于 21 日午时上报了军委。部署将总攻分为三步：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区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这个部署上报后，军委于 22 日复示：同意 21 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26 日，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 日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9—628 页。）

4 提前入闽奏凯歌

解放上海之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中央和毛主席来了电令：提前入闽。任

务交给了我十兵团。

为什么说提前入闽呢？因为中央原决定解放福建的任务是 1950 年。

毛主席从来是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对于解放全中国，早有通盘打算。1948 年 12 月 12 日，淮海大地战斗正酣，黄维兵团尚未歼灭；平津战役正在毛主席具体电令下包围北平，攻击天津，切断塘沽。而毛主席却告诉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同志，解放全中国的具体打算是：1949 年五六月间进行渡江作战，三野、二野协力经营东南；四野协同华北主力解决平津之敌后，则于 8 月渡长江，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第二步夺取两广；一野与华北主力夺取绥远、宁夏，再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之敌，然后入川。

1949 年 1 月 10 日，淮海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 55.5 万人的巨大胜利告捷；1 月 14 日解放天津，歼敌 13 万余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1 月 18 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确定“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对福建来说，是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一些地区，1950 年再解放全省。当时考虑，虽然“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基本地打倒了。”但是我军渡江占领京沪杭长江三角洲后，需要一段巩固时期。这里是蒋介石的老窝，江浙财阀的发源地，丢给我们的烂摊子要收拾起来，复苏起来，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的。然后，我们才能依靠长江三角洲这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而且指示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对上述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周总理看到形势发展比预想的快得多，渡江很顺利，全歼了南京地区的敌军，上海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口分五裂，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敢动手。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危险，中央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5 月 23 日毛主席、中央军委电示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并电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并且指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对一野、四野都作了相应的部署。

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策，这是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胆略，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要半途而废的思想。早在1948年12月30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了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4月，胜利渡江解放南京后发表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个思想就表达得很清楚了。

5月27日中午，解放上海之战甫告结束，我十兵团就接到三野首长电示：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兵团部及所属三个军随即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入闽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主席要我带部队回福建，早就有这个打算，因为我熟悉福建。同样，毛主席要张鼎丞同志去福建，外线出击时就有这个打算了。张老在福建影响很大，特别是闽西，老百姓把他叫“土地爷”的。

7月2日，韦国清政委和我率十兵团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冒暑南进。

全歼闽境残敌，策应各战场作战，当然是首歼福州地区之敌，尔后乘胜南进，解放漳（州）厦（门）。福建全境的敌军，共有15万之众。其中龟缩在福州地区的有：福州绥靖公署、六兵团朱绍良、李延年所辖的二十五军、九十六军（位于城西北闽江西侧地区）、七十三军（位于福清及平潭岛）、七十四军（位于连江、琯头一线）、一六军（防守福州市区）等5个军14个师6万余人。蒋介石企图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他还是那个战略意图，总想拖美国下水；也有人说，他想保住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反扑。朱绍良自知兵力不足，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差，主张放弃福州，力主保住海上的退路。敌方对守不守福州有争论，蒋介石严令坚守福州，朱绍良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能擅自撤守，但也没有派部队前出到古田。我也不占。古田成了缓冲地带。十兵团全部到达建阳、建瓯之线集结后，决定先攻取福州。

福州战役的作战部署：以三十一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以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与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之联系，断敌从陆上南逃之任务；以二十八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占之任务。左路军于8月13日晨向丹阳守敌施行攻击，10时占丹阳；继而向连江方向攻击，16日攻取连江城，歼敌七十四军一部、二十五军大部；继而攻下闽安、马尾，歼敌二十三师、二一师一部，完全控制闽江北岸，以炮火封锁闽江，断敌水上逃路。并即由马尾向西向福州攻击前进。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陆路，并向南构筑工事，实施警戒。中路军，16日下午，攻取福州外围的徐家村，勇猛迫近市区，由西郊西洪门向市区攻击。我三路军，密切配合协同动作，配合得很好。所以当我左路军由东向西攻击，中路军由西向东对福州发起总攻时，敌人即向闽江以南溃退。我右路二十九军已先敌占领阵地，迎头一兜，全歼在逃敌人。逃走的只有少数，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计5万余人，而我军伤亡不足500人。我军于

8月17日占领福州。可惜，只差半个小时，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跑掉了。

福州战役的胜利，为迅速解放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我率兵团主力继续南厂，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六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八兵团、胡璉十二兵团和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二十九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三十一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3万余，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也回到青少年时代上学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土。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1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它部队，共5.1万余人。

（摘编自：《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68—596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5 乘胜直下太原城

伟大的平津战役以我们的全胜宣告结束，几乎同时，淮海战役也以蒋介石的失败告终。1949年2月初，我们浩浩荡荡开进北平，举行了轰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在那些日子里，北平城到处洋溢着动人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在胜利的锣鼓声中，我们没有被鲜花和赞扬所陶醉。全军上下都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元旦献词（即《将革命进行到底》）。全国还有半壁河山没有解放，华北的太原还在敌人手中，我们不能怜悯那条“冻僵的蛇”，一定要实现毛主席庄严表达的“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

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推翻掉”的决心。

还在进入北平以前，1949年1月24日，毛主席就给我们发来电报：

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这将是华北战场的最后一战。

早在1948年10月，徐向前同志就指挥华北第一兵团（1949年1月15日以后改称十八兵团）包围了太原。至11月底，他们已陆续攻占了许多外围要点。为了策应平津战役，中央决定对太原实行“围而不打”，争取在1949年春天解决问题。

阎锡山为了显示他死守太原的决心，又是打棺材，准备“抬椁死战”，又是备毒药，似乎要效法希特勒，实际上，这正暴露了他色厉内荏的本质。

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军。用战士们的话说，“老大哥把太原的饺子包好了，就等着我们上去会餐了。”这是多么高昂的士气啊！

但是，这时候有个问题：我们第二、三兵团都要溶编一个原驻北平的国民党整编军，这需要时间；而中央军委要求我们尽早出发。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杨罗耿”于2月14日致电军委请示。

按原规定华北二、三兵团均应于十九日或二十日出发，但两个兵团均各需溶编一个由北平出来的国民党整编军，现尚未到手。因此，时间似乎仓促一点，是否可稍为推迟，请军委规定即示，以便准备。

2月15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

两兵团如等候溶编国民党军，则需时将甚久，攻取太原后又又要休整。因此，不要等候溶编，应派出溶编部队之干部率领溶编部队跟进。两兵团则于十九日按时出动，三月上旬到达太原附近，争取于三月中旬解决太原问题。

于是，我们按命令离北平出发，向石家庄集结。3月份，我们从石家庄向太原开进，经井陘、阳泉、寿阳、榆次，到达太原附近。这一路我们个九兵团真是浩浩荡荡，红旗飘飘，战车隆隆，气势非凡。兵团新组建的炮兵团，也给我们增添了军威。

一到太原前线我们就去看望徐向前同志。他当时身体不大好，但是仍在抱病指挥着太原战役。一见到我们，徐老总就风趣他说：“欢迎十九兵团来！咱们一同来打我这个老乡吧。”原来，徐向前同志是山西丘台县人，阎锡山也是五台县的，所以称作“老乡”。

4月初，我们华北野战军“兄弟三个”（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汇集太原周围，加上第一野战军的第七军（即西北野战军七纵）、第四野战军的炮兵一师和晋中军区部队，共二十五六万人。

太原是山西首府，历史上叫并州，位于晋中盆地北部，西濒汾河，东面和北面都有山岭起伏，地形险要。阎锡山在这里盘踞了30多年，是军阀割据时间最长的。市内有兵工厂、机械厂和钢铁厂等数十个重工业工厂，阎锡山

依靠这些工厂制造枪炮，作为他镇压人民、维持其土皇帝宝座的本钱。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太原就修有永久性防御工事。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的名义，收编日寇战俘 3000 多人为“军事顾问”，增筑了数千个碉堡，对城防工事进一步修复加固，因而使太原成为坚固设防城市，在国民党中被称为“反共模范堡垒”。

蒋介石为保住这个反共堡垒，在我十八兵团围攻期间，曾从西安空运第三十军军部、第二十七师和第三十师八十九团等共 1.1 万余人增援太原，加上阎锡山在太原城内郊外到处抓丁，强迫民众为他充当炮灰，逐渐恢复在前阶段作战中被我十八兵团打垮了的部队，并新编一些部队，从而拼凑了由 13 个步兵师、3 个总队、5 个特种兵师以及一些保安团、民卫军组成的守城部队，总兵力约 10 万人。其中包括被阎锡山收编的日寇官兵 1000 多人。敌人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战时动员工作团”，专门从事抓丁、拉夫、掠夺、杀人。敌人还编有 300 人的手枪营和有 9 辆轻型坦克的坦克营，负责保护总部。

尽管以徐向前同志为首的太原前线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争取按照“北平方式”来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在南京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听了阎锡山的汇报后，迫于形势，曾表示愿意按“北平方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但阎锡山这个人很善于遥控指挥，他在几十年行伍生涯中，不乏这样的先例。现在，他在南京遥控太原，指挥其部下一面打出免战牌，一面又在城里大肆叫嚷“凭坚死守”。

关于太原问题的和谈破裂。4 月 17 日，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复电太原前线总前委，同意所报作战计划。电报里特别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这里所说的“不受任何约束”，意思是和平解放太原已无可能，可以放手地打。

19 日，我们兵团领导同志到总前委所在地即十八兵团司令部开会。会上，明确了战斗分界线和协同事项，同时，总前委宣布了中央军委关于人事方面的命令：徐向前为总前委书记、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调任总前委副书记兼太原前线副政委，周士第为总前委副书记兼太原前线副司令，罗瑞卿同志还兼任十九兵团政委（太原战役后调李志民同志任十九兵团政委），司令员仍为杨得志，我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4 月 20 日，太原外围清扫战开始。

阎锡山将太原外围划分为北面、东北、东南、南面和西面 5 个防区，将其总兵力的约 80% 部署在外围防区。

总前委将我攻城部队的任务区分为：十八兵团从东面进攻；十九兵团从南面、西面进攻，并负责攻下东南角的双塔寺；二十兵团及第七军从北面进攻。

当时各兵团所属纵队已改编成军，我们十九兵团下辖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 3 个军。我们将六十四军和晋中军区部队部署在太原西面。进攻开始后，他们和从西北面进攻的第七军十九师一起，沿汾河西岸分两路向敌人猛攻，指战员勇猛作战，频告得手。六十四军健儿们在百多门火炮的掩护下，连续攻占南屯、南上庄、新庄、沙沟等点，在敌人的西面防区打开了缺口。接着，又攻占了敌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上庄和敌西面防区指挥部所在地大王村，击毙敌西面防区总指挥、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

到 20 日晚 9 时，西面外围的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将守敌六十一军军部、六十九师、七十二师、工兵师和“坚贞师”全部歼灭。只有敌八十三师因在

我发起进攻之前就逃入太原城内，侥幸多活了几天。

在南面，我六十五军和六十三军分别和守敌六十六师、七十三师交手，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垂死的敌人施放了毒气，但也不能逃脱灭亡的命运。经过激战，敌六十六师全军覆没，七十三师损失惨重。我军在扫清了南面的敌外围据点后，下午5时，六十三军会同六十二军的一八六师包围了东南角上的双塔寺。

双塔寺“要塞”是敌东南防区总指挥部所在地，为太原东南面的屏障。敌人在该处阵地上筑有三层工事和数十个碉堡，周围还有天然沟和人工壕围绕，易守难攻。守敌为四十三军军部、一个暂编师，另外还有几个团。

22日晨，六十三军的一八七师和一八九师对双塔寺守敌发起总攻。我们炮兵团的尊尊大炮，瞄准了敌人。我命令炮兵：狠狠打！但是只准打塔周围的工事、碉堡，把敌人的通讯设备、交通壕、火力点统统打烂，不准打那两个塔。我们的大炮“发言”了。那么多炮，打得那么准，摧毁了敌人的地面工事、高堡，而双塔寺内未落一颗炮弹。这样，这座有着许多碑刻的明代古刹双塔寺，就在密集的炮火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接着，进攻部队乘势冲击，突破外壕后，爆破突击手们以连续爆破摧毁了敌人的地堡群。我军占领了塔西南部的阵地后，接着进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直捣敌人核心工事，全歼守敌，生擒敌东南防区总指挥、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

与此同时，第十八、二十兵团的勇士们也相继扫清了北面、东北和东面的敌外围据点。

太原的城防，被敌人吹嘘为“百里防线，固若金汤。”但是，它的外围防线已被我军摧垮，80%的守敌已被歼灭，遍布城外、特别是集中于南面、西南面的数千个碉堡已被摧毁，现在敌人只有依靠残部守卫四面被围的危城。为了给敌人一条生路，我军于22日向城内守敌发出最后通牒，令其立即投降。但是，至死不悟的敌人仍然负隅顽抗。于是，我军一方面颁布缉拿守敌头目梁化之、孙楚、王靖国和日寇头目今村中将、岩田少将等战犯的命令，一方面准备攻城。

我们兵团部署第六十三军攻击城东南的首义门，第六十五军进攻城西南的大南门，第六十四军和晋中军区部队进攻城西面的水西门。

23日晚，兵团部接到前线司令部发来的攻击令。杨司令员和我研究后决定由罗贵波同志率领独立旅对西门的守敌作牵制性进攻，由六十三军首先主攻首义门。

我们指挥部已移到双塔寺。双塔寺距首义门不远。首义门上的守军是阎锡山的所谓决死队。他们仗着有自己的兵工厂，把枪弹、炮弹像水泻般地往下打，我军几次攻击，均未得手。我们计算了城墙高度，确定火焰喷射器可以喷射到城楼上，就下令把1945年在张家口缴获的4具日本的火焰喷射器抬来。

4具火焰喷射器很快前出到攻击位置，各尖刀队一个齐射，压住了城墙上的敌军火力，操作手奋勇向前，4条火龙飞上首义门。顷刻间，猖獗的敌人呼爷喊娘，死的死，逃的逃。接着，一八八师指战员迅速登上城墙，攻占了首义门。

这时，西面的我军也发起了进攻。六十四军的五七四团在水西门和旱西门之间奋勇登上城墙，然后打开水西门，使主力部队如怒潮般冲入城内。

在大南门，我们的大炮正在“啃烧饼”，数十门榴弹炮抵近射击，炮口

摇平，对着女墙打集火射击。那可真是一炮一个洞，一炮一层砖。一排排炮弹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地把城墙炸开、掀走，不到 10 分钟，城墙上硬是开出一个可进四路纵队的大口子。硝烟未散，六十五军的战士们已经呐喊着冲进去了。

各路指挥员纷纷报告得手，请示攻击方向，我们回答：六十四军沿街向东，接应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其余部队冲向市中心“绥靖公署”——阎锡山的老巢。

24 日晨，我军三个兵团的主力汇集太原市中心，包围了“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仅用不到半个小时就占领了太原守敌的指挥中心，击毙了代理阎锡山行政职务的特务头子梁化之，活捉了敌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和十兵团司令王靖国。那个手枪营也全部被我们俘虏。

是役，仅我们十九兵团就俘虏敌军 3 万余人，缴获了 300 多辆卡车、电台 200 多部，连阎锡山“绥靖公署”那些漂亮的小卧车，也完好地缴获了。

接着，我们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电中“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的指示，离开了华北战场，踏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程。

（摘编自：《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6—538 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6 西北决战的杰作

1949 年 6 月，我们十九兵团和十八兵团一起，近 20 万大军，从太原地区出发，冒着酷暑，渡过黄河，经过 1000 多里的艰苦行军，与西北兄弟部队会合，揭开了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匪军决战的帷幕。

这一重大的战略部署，是早在当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经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决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因指挥太原战役的徐向前同志，在胜利地扫清外围，准备向太原城发动总攻时突然卧病，彭总奉毛主席之命，来到太原前线，临时接替徐总的指挥。在各兵团首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彭总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匪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彭总要求我们，在攻打太原时，注意摸索和总结阵地攻坚战的经验，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大西北的决战中打几个硬仗。

1949 年 4 月 28 日，即解放太原后的第 4 天，毛主席把彭总从太原前线召回北京，进一步商讨如何解决西北的问题。毛主席根据迅速发展的国内革命形势，指出了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同时强调指出，要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首先必须经过军事上的决战，消灭胡、马主力。

这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军的精锐主力已丧失净尽，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面临绝境。1949 年 4 月 21 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过长江的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相继解放了南京、上海及江南的大片领土，并开始了向东南、中南、西南的进军。国民党反动政府成了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

重庆逃窜。败局已定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对华东、华南的信心已完全丧失，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马匪部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匪部身上，妄图保住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帝国主义支持，争取时间，重整旗鼓，待机卷土重来。

敌人进攻咸阳、西安失败以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渭河南北地区，青、宁二马主力集结在乾县、礼泉地区。这时候，我军应当首先向何处开刀，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为此，彭总曾多次向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提出作战方案，毛主席也多次给予指示。根据当时西北战场的整个情况来看，毛主席和彭总都认为，胡宗南匪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当时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远比让其逃回老巢再打为有利；其不利条件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质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而华北兵团经过千里进军，已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十九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当毛主席和彭总正在考虑如何向敌人开刀时，敌人得悉我华北兵团入陕，青、宁二马主力从乾、礼地区迅速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我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

7月6日，我们来到西安参加前委会议。彭总一见到我们就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要马上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说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盲目轻敌情绪。要严防敌人绕到背后袭击，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这也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说着，彭总递给我们一份电报，是毛主席于6月26日发来的。电报写道：“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兵团，逐级传达讨论了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结合作战任务，仔细地研究了青、宁二马的特点和惯用的战术以及我们对付的办法，并针对敌人的特点，抓紧时间进行战术技术训练，特别着重了打骑兵和拼刺刀的训练。通过普遍深入的思想动员，使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克服轻敌观念，防止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

1949年7月6日，即扶眉战役以前，毛主席在《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对青、宁二马应予区别对待：首先打击马步芳，马鸿逵是傅作义将军的拜把兄弟，曾派人向傅作义将军表示有向我求和之意。毛主席设想在歼灭马步芳后，对马鸿逵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同时，鉴于青马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彭总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青马。

当时，纵观青马动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兰州同我决战，二是退守青海老窝。如敌逃回青海，将造成我进军作战之严重困难，势必延长西北全部解放的时间；而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之枢纽，虽然攻打兰州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所以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同青马决战于兰州，而严防敌人逃回青海。

进军兰州之前，我军进行了打击胡宗南部的扶眉战役。7月11日拂晓，主力部队开始向胡匪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二兵团，由胡匪与马匪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敌侧后；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一兵团从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胡宗南原曾估计我华北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一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以5个军集团配备使我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我军向马匪进攻时，全力向我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烈攻击，使胡匪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我团团包围，经两昼夜的激烈战斗，除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我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扶眉战役的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由相对优势一变而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

毛主席在扶眉战役开始以前，曾于6月26日指示彭总：“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根据毛主席这一指示，我军在消灭胡匪主力后，暂时不去占领汉中，而乘胜发起了对青、宁二马的追击战。这时，毛主席给彭总来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1949年8月4日，彭总发布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8月20日，我兵团与许光达同志率领的第二兵团会师于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兰州战役前后的十几天内，彭总几乎每天都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前线情况，并多次得到毛主席的指示。8月23日，毛主席指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彭总遵照毛主席指示立即调整了部署，并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情况，于24日报告毛主席：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从兰州上游迂回兰北。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二兵团和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毛主席接到彭总报告后，26日电复彭总，指出：如你们25

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如 25 日不得手而宁马来援，则请照你们 24 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通过兰州决战，实现其在大陆保住一块反革命基地的计划，不借挖肉补疮，派飞机连日向兰州运送军事物资。胡宗南掏出最后的血本，调集 4 个军于徽、成、两当及川陕公路，准备配合青马袭击我后方。宁马也深知兰州战役的成败将决定自己的命运，集结主力，摆出支援青马的姿态，企待有利时机出兵攻击我侧后。青马更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匪首马步芳参加国民党中央政府召集的西北联防会议后，于 8 月 19 日从广州乘飞机匆匆赶回兰州，亲自部署一切。

25 日拂晓，我军向兰州发起总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勇猛地冲向敌人的阵地。经过激烈的搏斗，二兵团第四军首先攻占了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中、下狗娃山。下午 17 时，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在我兵团范围内，第六十二军之一八九师于 16 时攻占敌主阵地豆家山，第六十五军之一九三师于当晚攻占古城岭、马架山。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我发动反冲击。我军攻占敌人每一道壕沟、每一道峭壁和每一个阵地，都经过了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多次拼刺刀，同敌人肉搏。兰州敌军总指挥马继援仍梦想以拼死坚守挫败我军的进攻，争取时间，等待宁马、胡匪和空军出动。当日下午，据守兰州城郊的敌军主力伤亡惨重，阵地相继失守，城中又没有预备队，等待宁马、胡匪和空军来援无望，随即对坚守兰州失去信心，又深恐我军向西宁乘虚而入，剿其老巢，断其退路，于是慌张地决定撤出兰州，退至黄河北岸，重新部署部队。16 时，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各部队开始向黄河北岸撤退。青马的主力大都在阵地上，因怕我军发觉，不得利用天黑夜暗，秘密撤走。由于敌人在危急情况下才被迫仓促决定撤退，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一片混乱。

当夜，我军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时，发觉敌人逃走，立即发起追击。二兵团之第三军首先攻入城内，和敌军展开巷战。一部向黄河铁桥猛扑，消灭了顽抗的敌人，夺取了黄河铁桥，截断了敌人的唯一退路。撤出南山的敌军主力正在城里集中，当即被我歼灭。此时，第六军也已攻入城内。我兵团之六十三军、六十五军追击 20 余里，直插东稍门，消灭残敌。到 26 日 12 时，我军已占领城内外各要点，把敌人全部肃清，并越过黄河铁桥，占领白塔山，兰州宣告解放。

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我军则可以纵横自如，横扫残敌。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西北战场再也没有严重的战斗，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此后，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9 月 5 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分两路向甘肃河西走廊进军，会师于张掖，围歼敌两个军的大部，然后乘胜西进，直指新疆边境，沿途歼灭马步芳 3 万余人。我兵团进军宁夏，迅速消灭了敢于抵抗的敌军，慑于我强大军事威力，宁马八十一军于 9 月 19 日接受我军改编，一二八军、十一军、贺兰军残部派代表于 9 月 23 日签订和平协定于中宁。当日晚，我军进占银川。从进军开始不到 1 个月，即解放了宁夏全境。9 月下旬，我一、二兵团进逼新疆，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由陶峙岳将军率领通电起义，以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

受即将成立的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10月20日，我军进驻乌鲁木齐，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保守西北地区作为大陆最后一个反革命基地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西北战场，我军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接着又乘胜迅速地横扫残敌，解放了西北5省全部地区。我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快的胜利，从而创造了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一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次决战，在作战指挥上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利用敌人矛盾、各个击破敌人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针对敌人的特点和情况的变化确定作战方法的高度灵活性。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彭总的精心运筹、机智果断，将帅之间的密切联系、互相信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摘自杨得志、李志民：《毛主席和彭老总的又一杰作——西北战场的决战》，《兰州战役》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2—15、20—24页。作者杨得志当时分别为十九兵团司令、政委；1955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7 对三区革命的崇高赞誉

1949年9月，以新疆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各族代表团，应毛主席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途中，不幸飞机失事遇难牺牲。以后，又应毛主席的邀请，于9月15日，我率领第二个代表团来到北平。

新疆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为了在新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争取民族平等和自由而爆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精神 and 毛主席的文章，认定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还听到有关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大量传奇般的传说，早已在我们的心目中树起了崇高的形象，因而，我急切地盼望尽快见到毛主席。

9月17日晚，我们去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排的中间。演出开始，在阵阵锣鼓声中，只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轻盈地迈着碎步，步入戏台中央。她的出现，引起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她的唱、念、作，是那樣的动人、传神，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使我入了迷。这时，陪同我们的一位同志指着戏台上的女子说：“他叫梅兰芳，是个男的。他以善长男扮女装演京戏而出了名。”他的话，更使我惊奇不已。他的介绍和眼前的现实怎么都协调不起来。我半信半疑，谛听着梅兰芳的唱腔和审视他的每一个动作，想找出属于男子的特征，但都是徒劳的。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挡住了我的视线。正在我看不到台上的演出而焦急时，周总理出现在他的身边。对我说：“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我定睛细看，只见毛主席面带笑容，慈祥地向我们走来。我急忙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他说：“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我由于紧张、激动而又兴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谢谢！”

在毛主席身边又出现了一位笑容可掬的人，把手向我伸过来：“欢迎你

们！”周总理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总理热情和蔼的态度使我无比感动。我由于过分激动，除了不断地重复着“谢谢”外，一时未找到比这更好的语言。

毛主席和其他代表一一握手后对我说：“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告别后，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周总理一边向我告别，一边说：“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并握着我的手说：“明天见。”说完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走了。

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代表阿里木江看着毛主席他们的身影，呆呆地站在那儿，许久说不出话来。当他反应过来后，深有感触地说：“呀！他就是毛泽东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留学美国，在苏联工作过一段的代表涂治教授用钦佩的口气说：“布尔什维克人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的人！”

大家都陷入幸福的遐想之中，却忘记了是在看戏。我的思想情感完全被毛主席吸引着了。我的心在急速地跳动着，久久平静不下来。我想：蒋介石、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对各个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承认中国有少数民族存在，而且给予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的权利。我们做为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代表，被特邀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我越想，心情越加激动。

戏演完了，人们往外走去。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来看戏的，但戏的情节和结局，我什么都说不上来。在返回住处的途中和回到住处以后，大家仍激动地谈论着自己的感受。

夜深了，我还不能入睡，便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一难忘的感受。看看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了。

第二天，周总理谈了昨天晚上毛主席来看望我们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毛主席非常喜欢看京戏。当演出开始，场内的灯熄灭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才入场就座。毛主席问我们是否也来看戏了。周总理告诉他，我们已经来了，毛主席就起身要来看望我们。周总理提醒说：“不是已安排明天接见吗？”毛主席边走边说：“我知道，先去看看他们。”这时朱总司令和周总理也跟着过来了。

听了周总理的讲述，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来看我们，这是对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亲切关怀和重视，对我们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怎能不使我们感动呢？这更使我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可爱。当然，这一殊荣是属于新疆各族人民和三区革命的。

9月17日下午3时，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中南海接见厅。早已等候我们的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见到我们来了，便离座肃立，以沉痛的心情，向阿合买提江等死难烈士们致哀。整个接见厅，变得极为庄严、肃穆。入座后，毛主席悲痛他说：“阿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10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这一切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毛主席等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对阿合买提江等人的牺牲如此悲痛，如此真诚。也没有想到，将阿合买提江

等人的牺牲，看作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我更没有想到，对三区革命给了高度评价，说它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一部分”。听到这些，我内心的感激之情由衷而生，激动的泪水如泉涌。这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

毛主席的话，使我这颗既感激又激动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我不断用毛主席的话告慰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所有在三区革命中献出自己生命的烈士们：你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是光荣的。你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请你们安息吧。我急于想返回新疆，向三区人民和全疆各族人民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对阿合买提江等烈士的哀悼之情和对三区革命高度公正的评价。以此来鼓舞教育各族人民，使他们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由于长期受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三区革命时期，我就渴望做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因为无法与党中央取得直接联系，而且在新疆没有党的组织，我的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这次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第一次接触后，我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心情更加迫切了。10月23日，我正式向毛主席呈递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毛主席看后很高兴，立即建议批准吸收我为正式共产党员。并批示彭德怀同志待新疆分局成立后再办理组织手续。这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毛主席是我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

（选编自赛福鼎·艾则孜：《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第7—1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作者时任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八编

武装保卫新生政权

一、挥师进军大西南

1 庄严的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清晨6点，周恩来已经是第3次把电话打到我们卫士值班室。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么，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我走进毛泽东办公室，屋子里烟味不小。毛泽东仍在伏案办公。

“主席，休息吧。”我小声劝着，把周恩来讲的话报告给他。

毛泽东不作声，继续看着写着。直到写完，才立起身，走到院子里散步。

这是睡觉前的活动。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澡，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我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责毛泽东的休息，通宵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的休息，晚上可以睡觉。

那天我是正班，一上午没敢合眼。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不会很早入睡的，辗转反侧，思绪不断很可能到午前才能入睡。所以，我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下午1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作了一个深呼吸。

“1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浏览起来。

毛泽东历来起床后都不会马上下地，总要在床上呆一个小时左右，喝茶读书。今天要参加开国大典，他也不改这一习惯。

我轻手轻脚地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主席，1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他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打量，将衣服神平理顺，请他去吃饭。

毛泽东吃饭很快，不一会儿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

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

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愉快地交谈起来。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的门口出发，出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便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那时，没有电梯，我便搀扶毛泽东从城楼西头的楼梯，一步一级上了100个台阶，登上了天安门。途中，毛泽东不时停下来，等后边年纪比他更大的领导人。3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听到播音员激动的喊声：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大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汇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五彩缤纷，像精工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庄严神圣，按照预定程序，他按动装在城楼上的电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了起来。

毛泽东望着广场上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在军乐声中惊天动地地鸣响了。那是由54尊大炮同时发出28响，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54尊大炮代表了全国54个民族（现为56个），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那28响则代表28年，即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到1949年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礼炮响过，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阅兵式开始了。由朱德担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担任总指挥。

朱总司令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以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下达阅兵令。他的左右站了四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率领，4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金水桥边走过。

由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临上空时，30万人的广场沸腾了。人们挥动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阅兵式进行3个小时，直到黄昏。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于灯火齐亮，花炮竞响。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的群众开始游行。当群众队伍经过天安门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万岁声一阵高过一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说让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可是，周恩来又走进来了，

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起身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把香烟熄在烟缸中，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了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晚上，城楼下遍地点起灯笼，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的希望在广场上跳跃闪烁。群众举着灯笼婉婉蜒蜒，交互环绕，就像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样起伏不停，最响亮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

面对群众的欢呼，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服务员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下，他不肯坐。从午后3点到晚上10点（除吃饭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越响越高时，毛泽东情不自禁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高声和他们讲着亲切的话，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拼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在城楼上激动地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城楼上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气氛之中。

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大嗓门：“看了这，总算此生不虚度！”

大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菊香书屋，激动他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节录自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56页。作者当时为毛泽东的卫士。）

2 “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制定

1949年春末，伪国民政府拒绝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太原、西安等重要城市后，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甘心。它们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下，绝望地进行挣扎。伪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积极筹划“坚持”，蒋介石又从幕后跳到幕前，在美国议员诺兰的陪同下，时而台湾、广州，时而南宁、重庆，到处活动。他准备把退集在华南、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队，全部组织起来，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仅有的集团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在华南地区，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队，组织“湘粤联防”，阻我进军两广。在西南地区，以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的部队扼守秦岭、巴山，防我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打算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一旦上述计划破产以后，即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亡外国。

毛主席指示全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毛主席并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在作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

军之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指挥，于1949年10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直扑成都外围，会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于四川盆地。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是使蒋介石100万人马腾翅难飞的一着。为圆满实现毛主席所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必须首先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因之，在军委统一部署下，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邓、贺诸首长指挥下，并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迷魂阵”。

蒋介石原来就有这样的判断：认为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他认为：在川贵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他判定：“共军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我各兄弟部队从6月开始以来在鄂东、陕南的一系列行动，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原来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它的主力集团胡宗南三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两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罗广文兵团控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并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我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正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地区急进，打算夺取广州，并准备在衡（阳）宝（庆）地区，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这时我第二野战军的部队，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乘机以秘密和公开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向西南进军了。我四兵团由赣南向广东进击；五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隐蔽地开向湘西；随野战军指挥机关北上的三兵团，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四兵团和五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这时二、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在武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们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点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的翼时下，实现出奇制胜的企图。

蒋介石正心神不定，四野在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部。在此同时，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三、五兵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仍按兵不动。待攻占广州，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后，才开始向预定方向开动。而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则仍佯动，作试探性的进攻。但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则又进展迟缓，以至攻而不破，以稳定蒋介石的固川心理。被装进“迷魂阵”中的蒋介石，这时仍望眼欲穿地注视着川北的秦岭、巴山防线。

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决策。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迟关。正如我们所料，10月14日晚，当南线我军刚刚占领广州不久，李宗仁和反动政府的残余，便急忙逃到重庆。其他各地乱

七八糟的敌人，也像一群失散的鸭子，纷纷向西南流窜，甚至连过去远在东北地区的“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总指挥赵洪文国等部，也先期逃到四川了。我们秘密隐蔽在湘西地区的野战军主力，大张挞伐的时机到了。按照毛主席的预先部署，刘、邓首长立即命令五兵团结合三兵团的一个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令三兵团主力结合四野一部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集团；我四兵团部队则从广州乘胜西进，迂回向广西逃窜的敌人，断敌逃往海上的通路，协同四野主力全歼白崇禧于广西境内。

11月1日，我二野的五、三兵团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敌人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黔、川部分，突然挺进。于10日之内，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秀山、西阳、恩施等城。这时蒋介石才慌了手脚，急令罗广文兵团向川东增援，以配合宋希濂集团，依托乌江，阻我西进；令何绍周兵团坚决死守，确保贵州。但是，为时已太晚。我各部队不仅行动突然，而且轻装疾驰，每日以百里以上的速度，昼夜不停。排除各种困难，克服一切障碍，越过许多云雾弥漫的山峰，涉过急湍的河流，从敌人认为不可通过的地区，杀奔贵阳和遵义，逼近川、鄂边境；并在咸丰、黔江地区，歼敌十四兵团大部，俘敌兵团司令钟彬。蒋介石这时一面勒令宋希濂和罗广文凭借乌江天险阻我前进；一面又将孙元良兵团由川东急调重庆外围布防，同时又将防守川北地区的胡宗南一个军，车运重庆。并准备在防不胜防时，向云贵撤退。

当蒋介石布防重庆之际，白崇禧则在他的家乡——广西境内，正在遭受着我四野大军的围歼。这时，我从左翼对敌实施战略迂回之五兵团等部队，在击退敌何绍周兵团的抵抗后，以突然神速的动作，于11月15日，攻占了贵阳市；接着我军越过层层大山，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于21日，攻占了遵义城。然后一步不停，按照毛主席“插至敌后，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的指示，向川南实施兜击。

骄横一时的胡宗南，不久以前还向蒋介石表功，说他三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说什么“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被突破”。他原来不知，秦岭防线不是我军不能突破，乃是实行既定方针的“突而不破”，目的是牵着他的鼻子，不让他过早地南撤，以便南线各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胡宗南看见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方知上了大当，这才放弃他坚守近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急令他的三个兵团，向成都地区撤退，准备负隅顽抗。

这时，我屯兵秦岭北麓的华北寸八兵团等部队，分兵三路，在贺龙司令员亲自统率下，如猛虎下山，从秦岭猛扑下来，紧跟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越秦岭，跨巴山，攀摩天岭和米仓山等山脉，进入四川境内。时逢大雪纷飞，战士们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但也奋不顾身地猛力前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沿途人民特别是川北通、南。巴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热情支援下，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各追击部队的行列中到处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足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李白著名的诗句：“蜀道之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条路。原想依托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天险、隘路，却都变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由于我从北面扑下来的

部队猛打猛追，终将南逃之敌后尾 8 万余人，尽歼于川北地区；接着我追击部队又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我军便从四面八方，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关死在成都盆地。

毛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曾向我军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即以“北平方式”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后必然要出现的，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军政兼施解决残余的敌人，是毛主席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当南线我军关闭了逃敌的大小门户之后，刘、邓首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 11 月 21 日，适时地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逃到成都的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南线白崇禧集团大部覆灭后，他更加没有指望了，只好命令胡宗南猬集在成都附近的部队，准备来一次最后的决战。当时他还抱着另一线希望：想由西昌退向云南，但几天之后，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2 月 9 日，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我党中央的长期争取和刘、邓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分别在昆明、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得此消息之后，唯恐自身难保，便把大权统统交给胡宗南，于 13 日偷偷爬上飞机，带着他的“政府”和美国顾问，向台湾逃窜了。

被紧紧压缩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数十万军队，四面楚歌，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它们是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垂死地进行挣扎。

12 月 21 日，被围中的“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敌人全部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在十六兵团起义的第二天——22 日，在新津召开了紧急的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他故作镇静，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并表示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而且还作了向雅安、西昌突围的部署。哪知会议的第二天，这位在两年前因占领我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长官”，也像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飞机，夹着尾巴溜走了。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敌人，更加混乱动摇了。

26 日拂晓，我军向被围在新津地区的敌五兵团等部，发起全线攻击。全体指战员在“打好大陆上最后一仗”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人纵深猛插、直冲，有的部队，就连上火线送饭的炊事员，也掂起枪来投入战斗。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杀声，激战至黄昏，枪声平息了，李文的五兵团，终于成了“无兵团”。连李文自己也成了 5 万多俘虏中的一名。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集团的 30 万人，和退集成都地区的其他数十万残敌，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我消灭在成都地区。

正当成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我四兵团和四野一部，在滇、桂、黔边区纵队协同下，于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企图向国外逃窜的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并活捉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同时，我军又以有力部队，在成都围歼战结束之初，迅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敌贺国光部万余人；我另一部并在江安地区活捉化装潜逃的伪四川省主席战犯王陵基。至此，退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被我歼灭。

整个进军西南的作战胜利结束。共计消灭敌 90 余万人（包括起义、投诚的各色武装）。解放了川、康、云、贵 4 省。西南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进军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艺术、军政兼施政策的光辉结晶；也是当时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同志领导全军坚决而又有精巧措施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

（摘自李达：《解放大西南之战》，见《星火燎原》（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75—485 页。作者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 千里跃进战广西

湘西作战配合衡宝战役，历时整整 1 个月。第四野战军在衡宝地区歼敌桂系主力 4 个师之后，李宗仁、白崇禧即将其剩余主力撤退至全州县、桂林及以南地区，并继续向南逃窜。此时，友邻部队进行的广东战役已胜利结束。白崇禧部队成为最后残剩在华南的一个孤零零的集团；而我湘西、湘南、广东三路大军；紧跟敌踵，形成了由北、东、南三面对李宗仁、白崇禧老巢广西的包围，将其完全置于我军攻击矛头之中。我军对广西之敌作战局面，已呈现风卷残云、横扫落叶的态势。

和白崇禧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因为白崇禧的本钱小，占地利，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军决战。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个战略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1949 年 11 月 5、6 日，我担任西路战略迂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自湘西南方洞口、武冈向西秘密出动，取道黔桂边之苗、壮族地区，在我地方党及游击队的配合下，预定直取百色、果化和南宁，阻敌西逃。位于湘桂路两侧之我中路军，则配合迂回动作，按兵不动，尽量“示弱”于敌，使敌不受惊动。南线粤境我友邻部队陈赓同志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四兵团一部正分头西进，占领廉江、信宜、封川之线，主力则荫蔽集结于罗定地区。此际，白崇禧见其东、西两面情况均已暂行缓和，南线我军孤军深入，认为是我薄弱方面，遂决心部署南线攻势，企图集中主力，联合余汉谋集团残部，夹击我南路军，以保持其雷州半岛的退路。11 月 7 日，敌主力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鲁道源兵团），由桂东北向玉林、容县方向秘密调动；逃至合浦、北海、灵山地区之粤系余汉谋集团残部 2 万余人也回头东进，预定 11 月底向信宜、茂名、廉江一线进攻，夹击我南路军突出部队，进而控制雷州半岛，接取美援，待机反扑。敌此一企图，为我野司识破，决定将计就计，诱歼此敌，随即布置了聚歼白崇禧主力于粤桂边境地区及占领全广西的作战计划，野司当即令四兵团十二军配属十四军四十二师集结于廉江、化县之间地区，构筑阵地，坚决阻击敌人；令四兵团主力迅速进至信宜、茂名南北地区荫蔽集结。广州地区十五兵团之四十三军，日夜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城一带集结。西路军一部改向思恩、柳州方向急进，尔后突过红水河，攻取宾阳，直插广西心脏地区；一部则继续向果德、百色前进，追歼西窜之敌，截断蒋桂军残余西窜道路。北路军则在西路军将出现于柳州地区、南路军作战

开始的同时，即速大举南下，向梧州、荔浦、思恩攻击前进。接四野司令部命令后，我十三兵团指挥所正经衡阳向桂林一线运动中，因此，得以及时指挥我兵团担任战略迂回之两个军（时均已进入桂北）。除令三十八军之先头师继续向百色前进外，由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治委员率领的主力转向德胜前进；兵团副司令兼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率领的三十九军则停止西进，立即南下；军主力分路向柳州、宾阳急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求得在由桂林南逃之敌的前进道路上，布设层层拦截。一一五师以1日150里的急行军抢占了珠玉塘渡口，搜集了船只，保障主力顺利渡过浔江，继续向南急进。

友邻吴克华司令员、欧阳文政委率领的四十一军，于11月22日解放桂林。接着，由钟伟军长等率领本兵团的四十九军进入桂林，控制桂北。由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率领的四十军，于25日占领梧州。本兵团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于25日解放柳州。12月4日，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解放南宁。12月初，兵团司令部即进入桂林。

前面说过了，我们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敌人则一秒一秒向烂的方面转化，路途所见敌军溃败之象，真是难以言状。白崇禧的部队可以说是出尽洋相了，他们被打散的军官、太太，以及残兵游勇，无一不被路遇的群众剥得赤条条的。有的被捆绑起来，弃置路旁，脖子上没加上一刀，算是万幸的了；有的用稻草围着腰部，跟在我们进军的队伍后面，不敢离得稍远——他们害怕当地的百姓甚于我们部队，并认为只有我们部队才能给予保护。从这里也可窥见广西人民受迫害之深和对敌人仇恨之烈。

我们兵团司令部的车队，在途中埋锅造饭，周围便有不少这等赤，身露体、饥渴不堪的人们，颤巍巍地伸过手来，每餐不知要“接待”多少。回想20年前，他们的军队不知有多少人尾追过我们的队伍，那时他们作威作福，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岂料也有今日！历史真是无情的裁判官。

友军在粤桂边境聚歼桂系主力三、十一兵团之战斗，自11月27日至12月2日，经过6天激战，告一结束。这一决战性的战役取得胜利后，广西全境作战急转直下，残敌全面走向崩溃，向钦州、南宁间及以西地区溃退。白崇禧急忙从海南岛乘舰北返龙门港，亲自指挥总撤退。为彻底粉碎残敌自钦州入海逃窜的企图，野司除以十五、四十一军留置容县、北流与玉林、陆川、博白地区清剿溃散之敌外，集中十三、十四、四十、四十三、四十五、三十九等6个军，于12月2日开始，分别从廉江、博白、容县、武宣及南宁以北之线，日夜兼程向钦州方向猛追，以每日前进一百数十里的速度沿途抓歼逃敌。我南路十三军于3日占领合浦，渡过钦江后，协同十四军于7日晨占领钦州。与此同时，我四十、四十五、四十二、十四军等追击部队，将逃敌聚歼或截歼于钦州以北地区及灵山东北地区。我西路兵团之三十九军于4日攻占南宁，次日渡过巨江，沿邕钦公路南追至中越边境。三十八军于5日占领百色、都安。继之，沿海边公路向西追击前进之我十三军，于8、9日先后解放防城、东兴。我三十九军亦于8、9日先后攻占上思、思乐，并于10日解放明江、宁明。11日解放凭祥和越边防重镇——镇南关（睦南关）。13日解放隘店。11月13日至12月5日，我粤桂边纵队相继扫清了雷州半岛之敌。至此，以长程追击为特点的广西战役即告结束。通过二野各兄弟兵团特别是四兵团的密切协同，第四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忍受与克服了重重困难，猛打穷追和积极地完成任务，是取得战役胜利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的胜利。

总之，我兵团参加解放广西的作战，纯属风卷残云之势，一路乘胜追击，摧枯拉朽，沿途缴获无数；同各兄弟部队共毙伤敌正规军、地方军 2800 多人，俘敌 58000 多人。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巢已被彻底掀翻。

（摘编自莫文骅：《二十年打个来回》，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7—368 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4 迂回包围廓南疆

1949 年 5、6 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已经夺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都城南京，并且已经解放了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我党中央一方面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指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在 1949 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当时在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绝大部分猬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等省的地方军阀。这几个集团的军队总数还在 100 万以上，并且互相勾结，组织所谓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企图建都广州、重庆，进行顽抗。

必须迅速地歼灭这些残余的敌人。但是怎样去歼灭这些敌人呢？毛主席在进军的指示中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对西南的作战，又强调地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一个极为英明的决策。这个方针，和那种赶着敌人，放走敌人，使敌人逃至海外或云贵地区得以负隅顽抗的办法完全不同。因为，这些残余的敌人虽然还有 100 万以上，但是，整个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他们是抵抗不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的；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他们很可能逃往海南岛或猬集云贵；这样，那就会增加以后解放海南岛和云贵地区的困难。采取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先切断敌人的逃路，才能全部彻底地消灭这些敌人，免遗后患。

怎样来实现这个作战方针呢？毛主席还精心地规划了整个的作战计划。根据我们当时接到的一些电报来看，毛主席所规划的这个作战计划的概要；首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争取于 10 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 11 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贵，又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 12 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集团，而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以后，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解放云南。

毛主席所规划的这个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周密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以后战争的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计划的顺序、时间和预想进行的。

在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计划中，第四兵团担负了由

江西到广东，到广西，再到云南的大迂回的任务；

第四兵团的大迂回任务的第一步是协同兄弟部队，进军广东，歼灭敌余汉谋集团。

余汉谋集团在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中是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等3个兵团，共约12万人。在我们进军前，这个敌人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就是以湖南衡阳、粤北韶关等为重点布防，以保障两广。我第四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十二兵团、十三兵团等部在湘南衡阳、宝庆地区发起衡宝战役，寻歼白崇禧集团一部；同时，以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韶关等地，然后直下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以便下一步全歼白崇禧集团。

9月上旬，我兵团各部先后开进到江西南部。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兵团各部就在这个伟大的节日，万众欢腾地由江西南部开始向广东进军。

这时，四野主力已开始衡宝战役，正在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一部。原在湘粤赣边布防的白崇禧的另一部被迫北调增援。这样，粤北余汉谋的部队就孤立了，其所谓湘粤联防就破碎了。因此，当四兵团和十五兵团跨过五岭出现在粤北时，韶关等地的敌人即弃城南逃。

敌人弃守韶关等地，广东的门户洞开，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即分路追击，直向广州前进。

这次追击作战，两个兵团齐头竞进，各部队每天行程都在130里以上。在我这种猛烈的追击下，敌人虽已在许多重要桥梁上安放了炸药，准备破坏桥梁，迟滞我军前进，但是大部来不及爆炸，我们的追兵即到，准备炸桥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散。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进击；敌人还企图在清远、沅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但这种部署尚未完成，又为我分路追击的部队所击破，部署防御的敌人转而溃逃，广州的敌人也不得不仓皇逃走。10月14日早，李宗仁乘飞机逃走，14日晚，我两个兵团就进抵广州，十五兵团的部队进入广州市区，提前完成了毛主席争取于川月下半月占领广州的计划。

迅速占领广州，对于下一步作战和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还必须歼灭逃跑的敌人，免遗后患。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十三两兵团已为我歼灭一部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还未遭受打击。必须迅速地判明这些敌人的逃向，加以歼灭。

还在解放广州以前，我们即估计广州敌人逃跑的方向有两个：一是沿西江向西，逃入广西；一是沿广东海岸，逃向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因此，当我军各部冲破敌人在清远、沅潭一线的防御后，我兵团一个军的主力就果敢地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160里，直插广州西面的三水、高要等处。这一着非常重要。由于这一着，我们就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并且在占领三水、高要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查明了敌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这样，我们既取得了追歼逃敌的有利地位，又查明了逃敌的去向。

10月17日，毛主席亲自来电指示我们要乘胜直追，歼灭逃敌，既便于以后解放海南岛，又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条件。

四兵团各军从江西南部出发，已经连续进行了半个月的作战，部队相当疲劳。但是传达了毛主席的乘胜直追的指示以后，士气十分昂扬，又以惊人

的顽强精神，继续以一天 150 里以上的行程，进行了 5 天的大追击。终于在 24 日，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

逃敌二十一兵团等部共 4 万余人，当发现我已追及以后，即将大批辎重和汽车焚毁，向西夺路逃跑。我追击的先头部队，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抢占要点，阻敌逃跑。经 24 日的激烈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而我追击的后续部队都已赶到。25 日，我调整部署，组织对被围敌人的进攻。敌人为了逃命，在这一天又以 3 个师的兵力，向西发动了 8 次绝望的进攻，都在我指战员英勇坚决地阻击下，横尸遍野。于是敌人乃转而向南，企图在海滨乘船逃跑，我即就势分割包围。又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到 26 日，全部歼灭了敌人，胜利地结束了广东作战。

广东作战，以勇猛的进击、追击开始，以大围歼告终，是我们协同兄弟部队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第一个胜利。在作战中，指战员接受了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思想，又受到了毛主席乘胜直追的指示的鼓舞，因而能够克服一切困难，顽强地进行了连续 26 天的作战，终于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的主力这个胜利，不仅摧毁了国民党军队残酷压榨华南人民借以苟延残喘的海滨巢穴，关死了美帝国主义从海上援助国民党残部的一条通路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而且完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的包围，对于解放海南岛和解放广西部有重大意义。

四野的主力在衡宝战役中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一部，陈兵在湘桂边境；我兵团和十五兵团在广东作战中，歼灭了余汉谋集团的主力我兵团陈兵在广东西部；这就形成了能够南北合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

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六等 5 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 17 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主席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我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时，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已经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11 月上旬，西路十三兵团迅速前进，我兵团也在 10 日由阳江地区开进。22 日，我兵团到达廉江、信宜一线布防。这时，十三兵团已占领金城江，正向百色前进，追歼敌十七兵团；中路十二兵团等部也已开始进攻，解放了桂林。白崇禧看到其退往云贵的道路已被切断，就以其第三、第十一兵团为先头，以第一、第十兵团为后继，在逃向廉江以西的余汉谋的第十三兵团残部配合下，向我兵团发动所谓“南线攻势”，以夺路向海南岛逃窜。

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成溃败。敌人的这个“南线攻势”，又正好是我们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从 11 月 25 日开始，敌以集中的兵力，向我各军的阵地连续猛烈地攻击，敌人的飞机配合其步兵的进攻，多次轰炸我前沿阵地和后方，拚命夺路。但是，在我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抵抗下，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受了重大的杀伤，不得不遗尸而退。27 日下午，敌人进攻的气势已经下降，我们即开始进

行反击，而这就使进攻夺路的敌人转向了全线溃退。

回忆这一战役，深感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当时林彪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这种部署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如果按这种部署，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

夺路逃向雷州半岛不成，白崇禧即先乘飞机逃往海南岛，并命令其部队迅速逃向合浦、钦州，乘船逃命。这时，我兵团即沿着粤桂边和广西的海岸，开始猛烈追击，四野主力也分路兼程南下。

这次追歼作战，比阳江、阳春追歼战还要猛烈。在追击过程中，不为少数溃敌所逗留，抓到俘虏只留少数人看管，部队继续前进，遇到大股的敌人，就以一部分部队迅速地组织战斗，歼灭敌人，其余的部队就绕过去继续前进。这样，我们就首先配合四野的兄弟部队，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容县、博白、廉江地区，追歼了敌第三兵团、第十一兵团和第十三兵团的残部，活捉了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涂，控制了合浦；接着又向钦州急进。这时，敌华中长官公署和第一、第十兵团离钦州只有400里，并且由北向南，有公路，有大道；而我们离钦州还有600里，并且由东向西，要翻越许多由北而南的山脉和河流，没有大道，小道也崎岖难行。但是我指战员继续以惊人的顽强精神，翻山涉水，猛烈急进，从2日到5日，4天前进600里，在敌长官公署刚到钦州后，我先头部队就赶到了钦州。6日，我兵团以一部围攻钦州，歼灭了敌长官公署；另一部在钦州以北的小董圩、大寺圩地区配合四野主力歼灭了敌第一、第十兵团。接着又以一部分部队分路插入十万大山，寻歼残敌。

全歼白崇禧集团是四野主力在我兵团配合下，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一个伟大胜利。

毛主席在指挥华南和西南的大歼灭战中，曾多次指出不能让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指出如两敌或两敌之一退入云南，则不仅易于逃向国外，并且由于云南的地理形势，我不可能派几个兵团入滇作战，歼敌就要拖延时日。因此，毛主席就十分强调首先夺取贵州，既切断敌胡、白两集团的联系，又防敌退入云南。我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敌人这两大集团都未能退入云南，这就形了解放云南的有利条件。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滇桂黔边区纵队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已开创了滇东南、滇西、滇西北、滇南等广大的根据地，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1949年12月上旬，敌白崇禧集团被歼，胡宗南集团已陷于我二野主力 and 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卢汉将军在昆明宣布起义。但是，盘踞在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企图进占昆明，控制云南，为了打击敌第八兵团的这种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五兵团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

敌第八兵团进攻昆明不成，即南下退集于蒙自、个旧地区，控制滇南，准备负隅顽抗。这时敌人离国境线只有100多里，并拥有蒙自飞机场，自以为抵抗不成，逃跑亦很方便。毛主席为了能够歼灭这些敌人，除令驰援昆明的部队暂行停止前进以麻痹敌人外，即令驻百色的四野的一个军以一部就近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断敌向越南的逃路，又令我兵团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主席就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的作战计划。

经过广东作战，广西作战，我兵团在南宁附近作了短期的休整。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在 1950 年 1 月 1 日，即以一个军昼夜兼程向蒙自前进。南宁到蒙自约 2000 里，要翻越许多大山，但部队轻装急进，半个月就到达蒙自，袭占了敌人的飞机场，使敌人不能由空中逃跑。

敌人原来估计我军最快也要 1 个月才能到达，其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刚由台湾飞来，准备把其第八兵团的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但他的部队还没有飞走，我们的部队即已赶到。这就使聚集在蒙自地区准备飞跑的敌人惊慌失措，纷纷向西、向南逃窜。我兵团的一个军即配合已经到达河口的四野的部队和滇桂黔边区纵队进行追歼，先在个旧、屏边地区歼灭了敌二十六军，又向西向追击向滇西南逃跑的第八军。

滇西南地区山高路小，形势险峻，利守难攻，大部队行动、作战都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追击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分多路追击。经过了 10 多天的艰苦作战，终于在沅江、镇沅地区歼灭了敌第八军，活捉了汤尧。汤尧被俘以后，苦笑他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据他说，当敌第八兵团南撤到蒙自、个旧地区时，他还在台湾。伪国防部认为这是他们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劲旅”，就决定派飞机来蒙自，并且临时把他由陆军副参谋长提升为副总司令，叫他负责空运二十六军到台湾，而由他统率第八军在滇西“坚持”。但是他飞来以后，不仅二十六军没有飞跑，第八军没有“坚持”，就连他本人也当了俘虏。

第四兵团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给予的大迂回的作战任务，经过广东作战、广西作战、滇南作战，胜利结束。有的同志曾作了粗略的统计，从 1949 年 10 月初到 1950 年 2 月初，在 4 个月中，部队行程约 8000 里，歼敌总数约 15 万人，俘虏敌人的将校级军官即达 1000 人以上。这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后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后期为歼灭华南、西南的敌人所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是非常英明的。第四兵团的行动只不过是执行这个方针和计划的一个较小的部分，但是从这个较小的部分中也已经显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的伟大。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针，就不可能这样迅速地歼灭敌人。如果余汉谋集团的主力、白崇禧集团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就会大大地增加解放海南岛的困难；如果白崇禧集团或胡宗南集团逃入云南，也会大大增加解放云南的困难；就是滇南的敌二十六军、第八军，如果大部跑到台湾或国外，也会造成许多不利影响。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使得这些敌人被歼在大陆，这是人民解放战争后期的伟大胜利。

（选摘自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迫歼战》，《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23—135 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5 跨海之战

1949 年 12 月，两广战役刚刚结束，我军立即开往雷州半岛，准备与兄弟部队共同跨海南征，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号称“南中国海的门户”。蒋介石任命薛岳

为“海南防御总司令”，把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和两广战役漏网的残敌共约 10 万人纠集在一起，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凭借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作为“反攻复国”的跳板。薛岳恬不知耻，竟以自己的臭名命海南岛为“伯陵防线”。仗着他拥有 10 万残兵，50 多艘军舰，30 几架飞机，吹嘘什么“海陆空立体防御”、“固若金汤”。每天出动飞机向我沿海轰炸，向广州、武汉骚扰。同时加紧“围剿”我岛上的琼崖纵队。

为了实现全国彻底解放，趁敌人立足未稳，我们必须尽快地登上海南岛。可是茫茫的大海拦住了道路，我们一无海、空军，二无海上作战的经验，全国大陆刚刚解放，国民党留给我们一堆烂摊子，要想在短期内建成海、空军是不可能的，摆在面前唯一的办法是：变陆军为海战部队，用木帆船跨越海峡。

把陆军变成海战部队，完全用木船航海战胜拥有现代海空军的敌人，这不仅在我军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世界战史上也找不到。这个空前的难题，应该如何着手来解决呢？

毛主席适时地给我们指示了方向。主席指示说：渡海作战与我军过去所有的战役、战斗不同，必须注意潮汐和风向，必须充分准备船只，求得一次能载运足够的兵力，敌前登陆的部队，要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要能独立进攻，不依后援，要研究渡海作战的经验……

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成了我们行动的指南，是渡海作战取胜的法宝。我们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中共中南局和野战军、兵团首长的统一领导下，以巨大的努力，展开了征服海洋天险的准备工作。这时摆在全军面前的真是困难重重：没有船只，没有经验，没有器材，不懂海洋气象，不熟悉海情，一句话，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而且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争取在 3 个月内完成，因为每年从正月到清明，多东风和东北风，对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时而东，时而西，一过谷雨，则转为南风，逆风渡海，那是不堪设想的。而在 3 个月之内，要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熟悉海洋，学会一套航海、作战的本领，又要筹备到足够的船只，真是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我们在军部驻地海康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全军团以上干部参加。会中，首先深入地学习了毛主席对渡海作战的指示，然后对木船能不能渡海作战的问题，摆开让干部讨论。通过自由的讨论，大家更进一步认清了当前的困难和有利的条件，大大地激发了干部的主观能动精神。有的同志意气蓬勃他说：“三年多，我们从松花江打到了南海边，多少困难都战胜了，今天怎能让一条海峡挡住！”许多同志过去认为“旱老虎”下海，使不出威风，现在感到方向明确了，有了办法，增强了信心，说：“旱老虎一定要变成水蛟龙。”

军党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坚定了依靠木船渡海作战的思想。一场海上练兵的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军师领导机关和团营指挥所都移到海边，搭起草棚，同战士一块学习，一块下海。大家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史料，访问被称为“特约顾问”、“活气象台”的老渔民、老船工。就连；日书摊上无人过问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买了来研究参考。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走浪桥，练摇橹，学掌帆。“要做大海的主人”这句话，响彻在每个角落。指挥员们吃着饭，也

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当帆船，以饭桌当海，研究起航海队形来。许多人带病参加海练，劝不动，拦不住！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日夜苦练，部队中基本上消除了晕船的现象，学会了一套海上行船的本领。这种奇迹使许多船老大惊叹，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的大军真是神兵！神兵！”

经过上级批准和严密而紧张的准备之后，3月5日黄昏，师参谋长苟在松等同志，亲自率领800名壮士，登上了14只战船。约下半夜2时半左右，隐约看到远处有一片黑色起伏的山峦，这时，战士们忘记了极度的疲劳，不约而同地高呼起来：

“海南岛！”

敌人挤出最后的力量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猛烈开火，企图阻止我军登陆。当整个船队进入了敌人稠密的火力网时，所有船只分不出什么指挥船、战斗船，一面猛烈射击，一面急速地前进，有如千百条火龙直向岸边冲去！当先锋船离岸有五六十米时，战士们纷纷跳下齐胸的海水，向陆地扑去。

不到6小时，全军登陆完毕，除少数船受伤外没有一只被击沉，没有一只掉队。这时，西南方向七八里处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我琼崖纵队和潜渡部队已按计划从敌后进攻，占领了登陆地段内唯一的制高点——敌人纵深防御的枢纽阵地临高山。

海南岛东线的万宁、西线的北黎、最南端的榆林等港，军舰海轮进出邵较方便，便于敌人多路撤退，我又没有海空军可以到海上拦阻。而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这时却又成了我军多路平行追击的障碍。眼看敌人就要跑掉，群众办法多，急中生智，一个好主意出现了：组织“快速部队”赶到敌人前面去。于是迅速把敌人丢下的各种汽车搜集起来，又动员了不少商车；没有司机，就到俘虏群去找，动员他们立功赎罪。很快，一支“快速部队”组成了。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按战斗编组乘车，分秒不失，沿着公路追歼逃敌。同时，我们又命令土炮艇大队立即由海上开往北黎港堵击敌人。此时，两个军的二梯队已陆续登陆，也立刻投入追击。步兵、“快速部队”和土炮艇一齐出动，这几乎不是战斗，而是和敌人赛跑了。

第二天上午，追上了大股敌人。灰扑扑一眼望不到头，一见我军追到，顿时大乱，不到一小时就抓了2000多俘虏。跑在最前的敌人，发现我“快速部队”追击，就大肆炸桥、破路，但千般诡计也挽救不了他们灭亡的命运。桥路破了，人民群众很快帮我们修好。俘虏数字急剧增加，2000、4000、8000……沿途设了三四个收容站，加上自动找上门来的，迅速达到1万多人。

沿途两旁村庄的人民群众，听说解放军到了，挑着糖水，抱着椰子、菠萝以及熟饭团子，请战士们吃喝。五指山里的黎族同胞，挑着米、菜、鸡、狗、猫（狗、猫是黎族高贵的食物礼品）和赶着耕牛，爬过重重的山岭，赶到公路上，迎接我们的部队。不接受他们的礼品，是难以通过的。

4月底的海南岛，已经热得出奇，中午时刻，树叶子晒得打卷。我涧的徒步追击部队，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了。从师首长到战士，脚上都打了血泡，大家都置一切艰难困苦于不顾，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穷追苦赶，先在黄竹市追上敌人六十二军两个师和两个团，不到两个小时就将其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副军长罗懋勋。26日，我步行部队几乎和“快速部队”同时赶到万宁港。成千上万的敌人正蜂拥着往舰上爬。我军的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舰上的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落水；岸上的敌人则全部当了俘虏。

兄弟部队在北黎港也追上了大股敌人，全歼 1 个整师。

4 月 30 日上午，我军和兄弟部队共同到了三亚、榆林等港。迎着兽蓝的大海，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的海角。

（作者韩先楚，选摘自《星火燎原》（十），第 486—501 页。作者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6 毛主席派来“菩萨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的广大僧俗人民，更加迫切地盼望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前去解放西藏。当时居住在青海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也打电报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赞助西藏僧俗人民的迫切期望。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西藏人民历来极为关怀，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里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全体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这时祖国大陆只有西藏尚未解放，力解放西藏人民，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巩固西南国防，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刘伯承、贺龙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主席充分考虑到西藏的特点，对西藏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示我进藏部队，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作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首长们要求我军很好地担起这个艰苦而重大的担子，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邓小平政委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于我们进军解放西藏具有决定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的隔阂和成见，去把康藏广大的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在党的密切关怀和各兄弟部队以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下，我们全军顺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1950 年春天，在全国胜利声中，全军热气腾腾，开始了伟大的历史进军。

昌都是西藏东部的门户，是我军人藏的咽喉之道，是祖国高原地区的战略枢纽地带，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针对敌人的军事部署，我军根据毛主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指导原则，部队分为两个集团行动。

10 月 19 日，为反动统治者盘踞了多少年的古城昌都升起了五星红旗，迎风飘展，万众欢呼。昌都战役从 10 月 7 日发起，进行大小战斗 21 次，歼敌 5700 余人。这个严重的军事打击，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政治上迅速地起了分化。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伟大民族政策的感召，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来京谈判，取道昌都于 1951 年 4 月到达北京。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和协商。5 月 23 日，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共同签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签字的当天下午，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主席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思想生活情况，要我们很快进军拉萨，为全部实现十七条而努力。毛主席又指示我们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主席指示组织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并决定由张经武同志率领代表团人员，从海上绕道到亚东，先往拉萨安定人心。我和谭冠三政委等带领部队分数路向拉萨进军，并派出先遣支队先行出发。西北军区也先后派出了两支部队，一支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支部队从新疆南部向阿里前进，担负着进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参加昌都战役的云南军区部队已经进驻察隅。

依据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指示，此时青藏公路已动工修建，康藏公路突破了关山阻隔，已越过了甘孜，筑路部队正为劈开雀儿山而日夜搏斗。

跨过了大山大水，饱尝了千辛万苦，战士们脚底板走成了厚厚的茧子，部队的一些“白面书生”也变成了黑红黑红的汉子。我们终于来到了久久渴望的拉萨。来到了这座祖国西部边疆的古城。

拉萨城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他们在房顶上点燃起松枝青草，升起了缕缕青烟，这是藏族人民欢迎远道亲人的表示。人们捧来滚烫的酥油茶，为我们扫除风寒，道着亲切的问候。当我们的腰鼓队穿过街道时，欢迎的人群忽然发出狂热的欢呼：“文成公主来了，文成公主来了！”藏族人民长期以来就与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结成了亲密的兄弟关系，远在唐朝初期，唐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嫁吐番王松赞干布。元宪宗时，西藏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中有过光荣的贡献。对于我军的到来，人们早从昌都战役被释放回来的藏军官兵和商人口里，了解到党和毛主席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我军的严明纪律，秋毫无犯等种种事迹，知道这就是毛主席派来的队伍，就是他们多少年来焚香祷告的“菩萨兵”来了。他们象从黑暗的深渊忽然望见了”明亮的阳光照射到眼前，怎不使人满心喜悦和兴奋？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跟反帝爱国的藏族人民完全不同的阴暗面目，那些站在高高楼台上的反动分子朝欢迎人群和我们的队伍投石子、吐口水、咒骂我们的腰鼓队是“魔鬼”。

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军区首长都在密切关怀着我们的处境，一天几个电报，连粮草、工事等准备情况都一一问到。中央还组织运输力量，向拉萨运粮，解决供应困难。毛主席在电报中这样指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对于反动派的挑衅，采取“不打第一枪”的方针，后发制人，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同时应有充分准备。要把协议精神和事实真相告诉人民。毛主席对于西藏复杂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和高瞻远瞩的英明指示，像大海上光辉的灯塔，照亮了我们整个斗争的前进道路。我们在西藏的整个工作期间，正是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步步前进的。

（摘自张国华：《西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见《星火燎原》（十），第526—537页。作者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军长，继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工委书记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7 五星红旗插上喜玛拉雅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第二野战军于1949年11月1日，发起了向西南进军的战斗。当时，我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进军西有的战斗虽依旧频繁紧张，情况仍复杂多变，但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不论从全局还是从西南局部来看，胜券已经在握。这时，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1949年10月13日关于由西南局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指示，着手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了。

1949年12月中旬，党中央转来了毛主席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的信，信的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元旦过后，党中央又转来毛主席从莫斯科给刘邓贺首长的电报，要求立即研究部署进军西藏问题。提出进军兵力只需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应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进军。为此，指示进藏部队应迅速进驻打箭炉（今康定），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12月8日，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打电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并决定以18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1950年元月10日、15日，刘邓首长在西南局驻地重庆曾家岩，接见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伯承司令员说，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

9月上旬，中共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第二年进军拉萨的指示，在甘孜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昌都解放后的有关政策及工委机关的建立。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了仁至义尽。1950年1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遵中央指示给西藏当局写信，阐述中央方针政策；5月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绕加措发表广播讲话，希望达赖速派代表团赴京谈判。之后，又由西康、青海派遣和谈使者，并通过我国驻印度使馆多次敦促西藏当局，派代表协商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8月22日，和谈使者格达活佛被害于昌都，劝和的“青海藏族代表团”被软禁于黑河（今那曲）。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希望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他们的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以军事手段进占昌都。尔后，再做和平解决西藏的努力。

张国华说，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青藏高原气候特点，期于我军10月解放昌都。并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们能于10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张国华说，毛主席对我军解放昌都后将主力撤回月“孜，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的部署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0年10月6日，我军发起了昌都战役。18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推动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进程。达赖及其官员感到，目前依靠外国势力支持，搞所谓的“西藏独立”已不可能，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祖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凝聚力，在期待他们回到祖国怀抱。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和谈的办法，并委任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年1月底，以阿沛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指派的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双方代表本着友好团结的精神，经过20多天的协商谈判，圆满达成协议，于5月23日正式签字。

当夜，我们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的电报。消息不胫而走，军民奔走相告，机关、部队连夜座谈，欢呼这是党中央、毛主席解决国内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光辉胜利，祝贺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各民族友好合作的大家庭，祝贺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携手走上团结、进步的道路。

协议签字的第3天，毛主席发布了“我人良解放军为了保证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派必要兵力进驻西藏”的训令。我军高举着和平解放西藏的旗帜，开始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

军前指于8月28日由昌都出发。这是一次极其艰苦的、历时两个多月的长途行军。疲劳、饥饿、高原不适应时刻威胁着人们，几乎每天都有战士、干部默默地长眠在行军途中。我们的部队毕竟是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英雄部队，依靠各级党组织坚强的政治工作，依靠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团结互助，发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顽强跋涉3000里，胜利完成了进军任务。

10月26日，军前指进入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2万多人的隆重欢迎。进藏以来一直担任先遣任务的154团，在团长郟晋武、政委杨军率领下，接受了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领导和阿沛、然巴、夏苏、绕克夏等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检阅，举行了入城式。

我们到拉萨的第3天，中共西藏工委、军党委与张经武代表一起遵照毛主席9月13日的指示，讨论了部队工作方针。毛主席指出：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购买则对藏民不好，故须实行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毛主席还指示，为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开展工作，应改变明年不进驻日喀则和江孜的决定，要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上述各点，并在这些地方进行生产。

西藏和平解放，政治形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统治之后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团结、进步、发展，就成了我党我军和西藏人民共同奋斗的任务。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根据西藏特殊的社会形态，科学地分析了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内外形势、指示我军在西藏的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中心任务是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以争取达赖

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为方针，本着有团结有斗争、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维护祖国统一，扩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阵营，争取将动摇于内向与外向之间的上层人士稳定下来和分化、争取亲帝分子和分裂分子，使其中多数与帝国主义割断政治上、经济上的依赖和联系，逐步地向爱国方面转化。通过团结教育上层，增加助力，减少阻力。同时，相应地进行影响群众工作，逐步实现协议，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创造条件，为我党我军站稳脚跟而奋斗。

1951年1月10日，毛主席致电党中央和刘邓贺及西北局，指示西南局拟定一个负责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构及委员人选。中央于1月24日批复了西南局的报告，同意组成由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的中共西藏工委。

为了加强党对西藏的统一领导，1951年12月19日，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成员的调整方案。不久，中央通知张经武为工委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为副书记。1952年2月10日，在与西藏上层人士充分协商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西藏军区。

西藏工委、西藏军区遵照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在统一部署下分工负责，和噶厦政府官员和各地土司、头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团结了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然而，达赖集团的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惧怕17条协议的实行，他们于3月10日又以反对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为借口，召开所谓“人民会议”，发动武装骚乱，指使藏军包围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住宅，向张经武代表“请愿”，提出“解放军撤出西藏”等无理要求，并恫吓、袭击呵沛等爱国进步人士，性质十分严重。这是一场关系到祖国统一与分裂的重大政治原则的较量。

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的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首长对我军处境十分关怀，一天几次电报，连粮草、工事等情况都一一问到。毛主席为我平息这次伪“人民会议”事件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指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要把协议精神和事实真相告诉人民。工委和军区遵照毛主席指示，高举反帝爱国旗帜，以坚持17条协议为原则，本着团结争取上层中的多数、促进反动营垒内部分化、利用反面教材教育群众的指导思想，对以鲁康娃为首的反动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其阴谋和反动面貌已经暴露于众时，达赖喇嘛在张经武代表表明我严正态度后，不得不撤销首要顽固分子鲁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职务，宣布解散伪“人民会议”。当其分子已受到打击后，我们在工作上也做了适当调整，确定目前不改编藏军，不成立军分区，也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照旧，把协议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以团结达赖集团中的多数，争取他们回到反帝爱国方面来。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党中央、毛泽东英明领导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关怀和支援下，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为维护祖国统一、建设西藏所创造的英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摘自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5辑，第80—102页。作者当时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

处处长、二野十八军（进藏部队）第二参谋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二、抗美援朝高举国际主义旗帜

1 毅然决策援朝鲜

从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至 9 月上旬，朝鲜人民军已解放了朝鲜南部 90% 以上的地区和占人口 92% 以上的人民，将美伪军压缩到了洛东江以东 1 万平方公里的狭小的釜山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

美国为挽救在朝鲜半岛的败局，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之后，于 9 月 15 日，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在美国第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以第 10 军所属之陆战第 1 师、步兵第 7 师等部队共 7 万余人，在 300 多艘军舰和 500 多架飞机掩护、支援下，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行登陆。

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便立即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

9 月 16 日，在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的指挥下被围困在釜山的美伪军 10 个师开始向北反攻。朝鲜人民军处在两面作战的不利情况下，被迫转入战略退却。9 月 23 日，从洛东江北进的美骑兵第 1 师与在仁川登陆后向东南突击的美第 7 师在水原附近汇合，形势的变化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不利。9 月 28 日，美伪登陆部队攻占汉城。两天后，美伪军越过了三八线，疯狂北犯。

10 月 1 日，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携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飞到了北京。朴宪永当面向毛主席、周总理恳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支援。

深夜，金日成首相在平壤又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军武（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对美国侵略。

10 月 2 日，麦克阿瑟按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9.27”命令，下达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第 2 号作战命令”。令美第 8 集团军从陆地推进，占领平壤；美第 10 军在元山登陆，两支部队在平壤一元山蜂腰部汇合，切断人民军退路，继续北进。

朝鲜战局的形势已经急剧恶化，需要中国及时出兵支援。我们第 13 兵团的领导和部队已做好了出兵的准备。只要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可以向朝鲜出动。

10 月 8 日，中央来了电报。电令是这样写的：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 13 兵团及所属之 38 军 39 军 40 军 42 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于北京

当夜，我们从安东乘火车赶到了沈阳。

第二天早上，我和邓华先去彭总下榻的大和旅馆见了彭总。一见面邓华就说：“欢迎老总，有你出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彭总说：“我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可是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

彭总笑了一会儿，说：“4日上午，我正同西北的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开发大西北的规划，北京突然派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我连家也没回，连洗漱用具也没有带就上了飞机。我猜想很可能是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所以急匆匆地从办公室拿了一摞开发西北的资料。没想到是讨论朝鲜战争问题。”

我们又笑了一阵，他接着说：“下午4点多到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援助朝鲜出兵问题。当毛主席让大家摆了出兵的不利情况后，主席讲：‘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但内心是觉得应该出兵援助朝鲜。”

彭总接着说：“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其他同志发言后，毛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当天，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并决定我去朝鲜。主席讲：‘原来是想让林彪去的，他对4野熟悉，可是他说病了，去苏联治病去了，所以想让你去。’毛主席问我同意不同意，我没有推诿，临危受命，怎么好推诿呢？从爱国主义讲，从国际主义讲，我彭德怀都不能说一个‘不’字。”

我们向彭总提出：原来中央决定的先派两个军过江，现在看起来，一是两个军过去力量大少，兵力不够；二是美军的飞机已多次飞到鸭绿江，他们已发现了我们在江边集结，一旦他们把江桥炸掉，部队再过江就困难了。是不是考虑4个军一起过江？彭总认为这个意见很好，答应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委报告。

10月11日，彭总抵达安东，当天听取我们兵团领导汇报情况。

汇报完情况后，彭总告诉我们，他已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毛主席已同意了我們提出的4个军一齐入朝的意见。他问我們还有什么意见。

邓华和我们都提出，即使是先头4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

根据我们的分析，由于我军的火力弱，与敌人的火力相差得太悬殊，歼灭美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两个军；歼灭伪军一个师，我们需要一个军。因此，还需要向中央建议，赶快增加部队。中央原来已从华东和陕甘调动的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的24个师，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和第三批兵力，预计是在明年春季才逐步使用的，现在看起来应该尽快提前调来。

彭总说：“你们这个意见很好，第13兵团虽然战斗力强，但兵力毕竟有限。根据我军一贯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原则，其他部队应该继续赶来。我马上向中央报告。”

彭总向中央提出建议后，中央很快确定宋时轮同志率领的第9兵团昼夜兼程赶上来。

接着，我们又向彭总提出：“我们这4个军开到前面去后，谁维护后方呀？没有部队维护后方，后方供应怎么保障呢？应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

彭总认为这个意见考虑周到。当时，有的部队在剿匪，剩下的部队都在搞生产、搞营建，一时都抽不出来。比较起来还是在天津的第66军离得最近。所以，中央又电令把66军从天津调来。

10月12日晚8时多，彭总和我们接到了毛主席的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廿时

彭总看了电报，皱起双眉，显出一副忧心忡忡的神色。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返回北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刚刚下了要出兵的命令，又要暂缓呢？直到三天后，彭总又从北京飞到安东，听彭总讲了暂缓的原因，我们才解开疑团。

自从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就决心要占领北朝鲜了。这以后斯大林和毛主席都看出完全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所以，中苏两党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的问题。

斯大林担心出动苏军支援朝鲜与美军对抗，将会把战火引向欧洲和世界各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不愿意出兵，想让中国出兵。可是我们也有困难呀，我们刚刚解放，国力很弱。我们部队的武器装备很差，都是常规武器，没有空军掩护，面对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美军，要下决心出兵也不容易。经过反复协商，最后两党达成了协议，由我国出兵援朝，由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我军。

根据这个协议，我党中央于10月初正式决定出兵援朝。10月2日，毛主席把我党的决定打电报告诉了斯大林。电报说：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接着，我党中央又于10月8日做出了正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兼政委的决定。

就在这时，斯大林突然通知我们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后来我听彭总讲，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有怀疑。他看到我们真的决定要出兵了，而且美国准备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就犹豫了。

斯大林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没有底。觉得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一旦我们被打败了，就把他们给卷进来了，苏联就会有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于苏联态度的变化，毛主席和彭总都感到很突然。友好的国与国之间哪有这样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的，又临时改变？但到了这时候，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毛主席一面马上派周总理去苏联与斯大林进一步协商，一面召集彭总等人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这就是毛主席12日发那封暂停电报的缘由。

周总理到了苏联，没能说服斯大林改变主意，斯大林仍没答应按预定的协议出动空军支援我们。

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就不再对苏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抱希望了。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气魄非凡。他经与彭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商量后，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决定刚一作出，毛主席就给周总理发去了如下指示：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总理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再次约见斯大林。斯大林见周总理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约见，以为我们又要和他讲条件呢，没想到只是通知他：中国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照样出兵援朝。斯大林听了这个消息，深感意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摘编自：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27 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于上将军衔。）

2 点将彭德怀挂帅

1950 年 10 月 1 日国庆节后，4 日午，北京突然派来飞机，令我立即上飞机去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当日午后 4 点左右到达北京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讨论出兵援助朝鲜问题。听别的同志告我，当毛主席让大家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情况以后主席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刚到，未发言，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同志把我送到北京饭店。当晚怎么也睡不着，我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想着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宫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如果美国决心同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如果把它同朝鲜处于危急时刻联系起来考虑，那就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散会后在南海畔，有人向我说：“看来还不服老哟！”

（摘自《彭德怀自述》，第 257—258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3 送子上前线

1949 年 9 月，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了，决定过一些日子结婚，随后，又征求刘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意见。

婚期初步定下以后，毛岸英来到父亲这里。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大家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人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

毛泽东看了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

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里举行。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晚饭前都赶到了中南海。毛岸英穿的是平常穿的衣服。刘思齐穿的是灯芯绒上衣，裤子是半新的，只有方口布鞋是新买的。

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只准备了一桌饭，首长们并没有都来吃饭，但是都表示祝贺了。还给毛岸英和刘思齐送了礼物。礼物也很简单，只是枕套之类的日用品。

婚礼结束后，毛岸英和刘思齐临行时，毛泽东送给岸英一件呢大衣，并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晚上可以当被子盖，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考虑出兵不出兵，连续几天不能入睡。吃安眠药也睡不着。开会那天，他的东屋里坐了一屋子人，除五大书记外，记得还有高岗、彭德怀、林彪、彭真等人。满屋子烟雾腾腾。从五六点钟开始研究，一直到后半夜。最后研究决定派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安眠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我请他坐，他不肯坐，在屋里转着圈走来走去。我见他急得坐不下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然睡不着，不停地翻身。我就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

毛泽东闻声坐起身：“我起来吧。”

我忙帮他穿好衣服。他两脚一落地，就朝东屋走。

聂荣臻见主席来了，上前一步立正敬礼：“报告主席，志愿军已经过江，前线的形势……”

我只听到这么半句就退了回来。

半小时左右，聂荣臻走了。毛泽东没露任何神色，只交待一句：“我睡觉吧。”

我送他上床。毛泽东没有再吃药，躺下工夫不大就睡着了。鼾声均匀，睡得很香。

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这期间聂荣臻几乎天天来。一个是军委主席，一个是代总参谋长，联系不能断。

毛泽东决定送儿子出国参战。江青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曾劝阻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不要去参战了。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那一句话：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告别结婚刚一年的妻子，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前线，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彭德怀给毛泽东、党中央发来了电报。

机要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忙同周恩来、江青研究一番，没有告诉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办完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休息时，叶子龙和江青才把消息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里。听到消息，先是一怔，盯着江青和叶子龙一声不响。

江青和叶子龙不敢说第二遍，也不好说什么劝慰的话，不约而同垂下了头。

于是，毛泽东眨了一下眼，目光开始缓缓移动，望着茶几上的烟盒。

他去拿烟，两次都没将烟从烟盒里抽出来。我忙帮他抽出一支烟，再帮他点燃。

屋里静了很长时间，谁也没说一句话。能够听到的只有毛泽东咿瞠的牙缝往里吸烟的声响；陕北农民吸烟都喜欢发出这种咿咿声。

大概烟雾熏了毛泽东的眼睛，大概他想起了儿子许许多多的往事，我见到毛泽东眼圈陡然一红，湿润了。

叶子龙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

又沉默了很久，毛泽东吸完第二支烟，把烟头熄灭在烟缸里，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发出催人泪下的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我顿时泪溢眼堤。

毛泽东没有哭，又点燃一支烟，开始听江青汇报儿子牺牲的经过。大意是敌机轰炸，扔燃烧弹，被烧死了。

毛泽东最后只交待一句：“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

此后不久，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志愿军人朝作战情况时，心情沉重地谈了毛岸英的牺牲。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抽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缓慢他说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毛岸英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里。

这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胸怀！

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公开后，毛泽东对刘思齐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格外疼爱刘思齐，时常亲自过问她的衣食住行。在每次去信中，总是称她为“我的大女儿”，“思齐儿”，“娃”。

1961年，毛岸英牺牲已经10年了。29岁的刘松林（刘思齐已改名），

仍是孤身一人。毛泽东更加关心她，希望她尽早成立一个新的家庭。

不久，刘松林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相识。刘松林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杨茂之早她一年到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指挥。他们在中国留学生的集会上见过面，但没有说过话，更没有想到对方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伴侣。

1962年2月，他们结婚了。毛泽东抄录了一幅他刚创作的《咏梅》词，算作贺礼。另外给了300元钱，叫刘松林代买礼品。

婚后个把月，刘松林和杨茂之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那次，毛泽东和杨茂之谈得很投机，他对杨茂之似乎颇为满意。

（节选自李银桥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163页。作者当时任毛泽东的卫士、卫士长。）

4 雄赳赳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8日，军委命令飞向东北边疆：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宏大胆魄发布了这一庄严的命令。尽管这一命令对当时的世界是保密的，但在历史上，它终将留下最惊心动魄的一页。正是它敲响了侵朝美军的丧钟。

1950年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卫祖国，支援朝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

19日17时半开始，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分3路先后渡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第四十军由安东过江，向宁边、球场、宁远地区运动。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一一六师、军直从安东，一一七师从长甸河口过江，向龟城、泰川地区前进。第四十二军由辑安渡江，向社仓里、五老里地区运动。尾随第四十二军从辑安渡江的第三十八军在江界地区集结。

继4个军之后渡江的是第五十军（9月6日编入边防军序列）、第六十六军（10月编入志愿军序列）。

为了保密，部队都是在黄昏开始渡江，拂晓即停止。

我们站在鸭绿江边，指挥部队过江，几个月来的疲劳一扫而光。两个多月的紧张战备不就为着这一天么？往事在我脑子里翻腾着。

我们出国作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出来的。

早在6月28日，即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出兵朝鲜和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就发表声明，严正斥责美国政府的这种侵略行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7月，我全国各地发动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宣传运动，对美帝的侵略行径，从政治上进行了声讨。

8月27日，周恩来外长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美国飞机连续侵入我东北领空，扫射我国人民，造成严重死伤，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对我国的侵略行为，并使美国撤退侵略军。但这以后，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和扫射、轰炸中国人民的罪行仍有增无减。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明确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周总理又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明确转告美国政府，如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不管。

但是，美帝国主义把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声明、谴责、警告，一概视为恫吓，认为我软弱可欺，不予置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作过这样的自白：“十月三号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也打来同样的报告。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先生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不顾我国政府的警告，命令其武装部队悍然越过三八线，分三路大举向北进犯，直指我国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出动的。出动前，以团为单位（分散部队以连为单位）普遍召开了誓师大会。“打好出国第一仗”成了广大指战员的共同誓言。我们召开誓师大会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第六十六军随后入朝时，毛主席曾要我们将志愿军誓师大会誓词、口号及其它办法交给他们。

站在江堤上，我又想到了北京，想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一定隔着千里关山，注视着这东北边陲，等着我们过江的消息。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们一定会胜利。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却常常问自己：我们的胜利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人们往往只记得10月25日。那一天，我志愿军第四十军在阻击北犯之敌中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中共中央批准志愿军政治部的建议，把这一天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又想，10月8日，10月19日，也是很有意义的日子。那是党中央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和跨过鸭绿江的日子。试想，如果不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旗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那么，在中国，以至在整个东方，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吗？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2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5 组建二十三兵团赴朝作战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

鸭绿江边，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实现扼杀新中国的狂妄野心。1950年8月27日，美帝派飞机非法侵入我国东北领空，残杀我人民。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美国空军和赔偿一切损失，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制裁美帝，撤退侵朝军队。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侵略行径，傅作义先生十分气愤。他当时正同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同志等在黄河中游查勘，制定修建三门峡水库计划。他当即给毛主席、周总理打电报，表示对美帝的侵朝，不能置之不理，要积极地对朝鲜进行支援。回到北京，他又上书毛主席，详细陈述美帝侵朝的暗算是妄想扼杀新中国。对美帝的侵略行径，我们不能坐视观望，必须予以打击。他根据多年的经验，坚决他说：“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不但应当抵抗它，而且一定能够战胜它。”此时，我党对是否出兵抗美援朝，意见尚不一致。有少数同志觉得新中国刚刚成立，各项建设刚刚开始恢复，需要休养生息。美帝又有新式武器装备，打起来胜负难卜。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不出兵后患无穷，应立即抗美援朝。毛主席看了傅作义先生的信后，十分赞赏他的意见。当即将信的全文印发给中央、政务院等部门领导同志参阅。又请傅先生在政务院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抗美援朝利害关系。毛主席逢人就说，你们看，傅宜生先生都坚决主张出兵，我们还有什么疑虑的呢？

10月份，我国正式宣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员的带领下，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绥远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请求开出绥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书、请战书，成批地送到省军区机关。对这种要求，除军区报告华北局、华北军区和党中央外，我还向傅先生作了汇报。傅先生于11月上旬，向毛主席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到朝鲜前线参战。这样能使这支部队受到新的锻炼，新的考验，进一步实现解放军化。同时，对绥远地方实现解放区化也更为有利。毛主席批准了这一建议。

12月10日，傅作义先生从北京来绥远。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做为抗美援朝的二线兵团。任命我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兵团政治委员，姚喆、边章伍为副司令员，王克俊任副政治委员，边章伍兼任司令部参谋长，袁庆荣任副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张升初任后勤部长，潘瑞征任副部长，三十六军副军长王建业代理该军军长。

部队在东进的一路上，干部、战士情绪高昂愉快，全兵团没有发生叛逃的事。在绥西检查群众纪律，赔偿损失费用约两亿多元（折合人民币20余万元），受到群众的称赞和表扬。对于部队的进步，我十分高兴。兵团于1951年1月20日将部队的这些进步情况，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阅后，非常高兴，即转傅作义先生阅，在报告上写道：

宜生兄：

廿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阅。阅后请予掷还。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对部队的关怀和称赞，使我的精神为之振奋，增添了带好部队的信心和干劲。

2月19日，我和高克林同志到华北军区开会，接受军委要我们兵团在半年内完成入朝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指示。会后，我们分别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和紧急会议。决定：在团结改造的总方针下，加强阶级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发扬民主，争取早日完成解放军化的任务。同时，努力完成部队整编，骑兵下马，补充新兵，改换武器，军事训练等任务。

8月底，我们完成了出国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1日，毛主席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我兵团于9月3日，由景县驻地出发入朝，担任泰川、院里、南市三机场的修建任务与后方警戒任务。命令中对兵团入朝后行军路线作了详细规定。还命令兵团副司令员姚喆同志率必要的参谋人员，电台一部，提前于9月2日，由北京乘飞机到安东，与军委空军司令部后勤部政委杨尚儒同志以及空军联司进行会商，联系兵团入朝后执行修建任务等具体问题。

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兵团军政委员会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进行了传达布置。我记得三十六军于9月3日早6时从景县乘火车出发；三十七军于9月5日乘火车出发；兵园直属队于9月8日下午5时乘火车出发。9月间，整个兵团渡过鸭绿江，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斗。

（摘编自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三、敢战敢胜打败美帝纸老虎

1 缜筹划首战告捷

10月19日，即我军入朝的当天，美第一军的3个师占领了平壤。20日，美军第一八七空降团便在肃川、顺川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

这时，侵朝敌军和李伪军的兵力已达42万人，拥有飞机1100余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地面部队拥有5个军15个师零两个旅，23万余人。其中，美军3个军6个师（每师装备有坦克154辆，57毫米—155毫米口径的火炮352门）12万余人，另有其他国家军队1.2万余人。

平壤的陷落，使敌人更加趾高气扬。他们认为这已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认为中国不但不敢出兵参战，而且出兵的“有利时间早已过去了”。麦克阿瑟为了实现在感恩节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除以部分兵力对付朝鲜人民军的北撤部队和游击队以外，还集中了4个军10个师零1个旅和1个空降团，总计13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于东、西两线（主力置于西线）分兵多路，向朝甲边境疯狂冒进。

这时，敌人以为已经没有人阻挡他们了，以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军事上的空白”之地，毫无顾忌地以师甚至以团或以营为单位，分路向中朝边境高速冒进。敌军在分兵冒进中，采取了以李伪军为先导，美军殿后，以车载步兵为前驱的行动样式，实施穷兵猛追，长驱直入。

至 20 日，西线伪第二军之伪第六、第七、第八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我球场、德川、宁边等预定防御地区仅有 70—100 公里。东线伪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达到了我预定防御地区。

这时，我已渡过江的 5 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新义州以东的朔州、满浦地区，距离预定防御地区尚有 120—270 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我预定地区。但有利条件是敌人仍未发现我大军入朝，因此还在公路上放胆前进。他们的兵力比较分散，而且中路伪军 3 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两线之间又敞着一个 80 余公里的大缺口。这一态势便于我军利用敌人的判断错误和分兵冒进的弱点，从运动中对敌人实施突然攻击，确实是我军出其不意、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极好时机。

据此，毛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 10 月 21 日凌晨，连续 3 次电示我们：放弃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

毛主席在 21 日凌晨 2 时半发给彭德怀并告邓洪韩解的电报中指出：“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二）估计伪首都、伪三两师要 7 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箝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21 日凌晨 3 时半，毛主席又发来给邓华同志并告彭及高的电报。电报中说：“（一）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十三兵团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他还着重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我志愿军出国的第一仗确实关系甚大。当时毛主席的电报不仅十分频繁，而且指示都十分明确具体，连细节问题都不厌其烦，都提醒我们务加注意。

21 日凌晨 4 时，毛主席又给彭邓发来电报，指示我们在战役部署上：“（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去为要。”同时还指出：“（二）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三）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第一次战役，我军统帅部的决心是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才可以看出指挥的英明。当时情况很复杂，瞬息万变，部队不断在调整部署，不如此，就适应不了战场情况。

10 月 25 日凌晨 2 点多钟，司令部作战值班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参谋长解沛然正守在值班室里，电话是一一八师司令部打来的。

解沛然问：“什么事？”

一一八师说：“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

由于同敌人不期而遇得如此之快，以致解沛然都不相信，他大声地问：“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没搞错，确实是敌人，说外国语，听不懂。”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

“在北镇至温井的公路上，刚刚离开北镇不远。”

“敌人有多少？”

“不清楚。”

“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不清楚。”

“继续监视敌人，有情况随时报告。不要暴露自己。”

这时，解沛然把我叫起来了，因为敌情重大，我们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没过多久，电话铃又响了。我接过值班参谋的电话问：“你是谁？”

“一一八师师长邓岳。”

“我是洪学智，你们前面的敌人到底是美国鬼子还是伪军？”

邓岳：“看起来不像是美国鬼子，像是伪军，我们的侦察人员已经听到他们说话了，都是讲朝鲜话，可能是伪第六师的。”

我说：“是伪军就再往里多放一放，等敌人钻进口袋坚决歼灭之。”

邓岳：“知道了。”

25日上午9时许，志司接到了四十军一二师的电报。电报说：“7时许，伪1师之先头部队在1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的公路北犯，遭到我一二师三六团的迎头痛击。”

这是人朝以来我们和敌人的第一次接火。

12时，邓岳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上午10时20分，伪第六师第二团一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镇进犯，当进至我第一一八师三五四团在丰中洞、两水洞之间所设下的埋伏圈时，在第三五三团的配合下，我军当即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而猛烈的攻击，将该敌大部歼灭，活捉了他们好几百人，其中有3名美军顾问。”

当晚，一一八师、一二师主力又乘胜占领了温井，切断了已进至楚山、古场的伪第六师第七团的退路。

但是，直至28日，敌人只派出两个营援助被围的伪第七团，主力滞后观望，我们诱敌北上的企图没能实现。

这时，毛主席来了电报。

彭总看了电报，说：“毛主席指示我们：‘目前战投的关键是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跑，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迅猛有力，保证歼敌。’”

28日晚，我军按照预定作战部署开始行动，四十军主力当晚即向温井以东之敌发起了攻击，激战至29日晨，将伪第六师两个营、伪第八师两个营共4个营大部歼灭，随后继续向南突击。

伪第六师大部、伪第八师两个营遭我歼灭后，敌人虽然已发现我军人朝，但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象征性”出兵，因此仍未放弃其迅速占领全朝鲜的企图，一面调整部署，一面继续冒进。

西线敌军虽然调整了部署，但其兵力仍处于分散状态，且对我军情况尚不明了。我军对敌军兵力和部署则已基本掌握。敌人在清川江以北仅有5万余作战人员，我们则可集中10—12个师，12—15万人入作战，是敌人的两到三倍。因此，我们决心仍采取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战

法，首先消灭伪第八、第七、第一师，然后。再看情况歼灭美英军。彭总把这个想法电报毛主席后，毛主席马上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说：“此战只要我三十八军全部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它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

2日19时，毛主席根据战役发展的情况电示我们：“注意使用三十八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坚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由平壤）北援兵力及伪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

2日22时，毛主席又电示我们此役“全局关键，在于我们三十八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消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要紧的”。

但是，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特别是院里已被我军攻占，其侧翼受到了严重威胁时，深恐价川、新安州再被我控制，退路被我切断，从而使其在清川江以北的各部被我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为摆脱其十分不利的态势，自3日凌晨起，敌人在大量空军、炮兵和坦克的掩护下，同时以伪第一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二师、伪第七师及伪第六师在价川、军隅里地区掩护，迟滞我军进攻，实行了全线撤退。

11月6日晚，鉴于我西线反击作战已经结束，东线第四十二军主力已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我志愿军司令部乃决定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其严重、我军仓促入朝的情况下，投入交战的。是我军与敌军的一次遭遇战。在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彭总的正确领导下，我军由于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和指挥上的灵活性，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不断改变作战决心与计划，再加上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给了伪第六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了伪第一、第八师和美骑兵第一师。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取得了初战胜利，初步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摘编自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9—60页。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 释战俘开展政治攻势

为了从政治上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政治部的同志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收效比较直接、明显，影响最大的，是释放敌军战俘的工作。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为我军规定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多少年来，这一政策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宽俘政策在敌军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明显的效果。现在从序战中敌军好打难俘的情况来看，美军和李伪军的广大士兵还很不了解我军的这一政策。为了揭穿敌人诬蔑我军杀害俘虏，以至挖眼睛、割鼻子等欺骗宣传，在其士兵中扩大我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我们必须接受序战的经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宣传宽俘政策，加强敌军工作。

在国内战争中，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报告。但现在是在国外，情况变了，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可以仿效的先例。我们在朝鲜，不仅是打军事仗，而且也是在打一场政治仗。考虑到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将来交换战俘怎么办？但目前从军事上考虑，为使敌军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又必须快放，思来想去，主意难定，所以我向彭总建议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

彭总略一沉思，指示说：“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这件事，你负责把它办好！”

我当天就草拟了电报，经彭总审阅后上报军委。

第二天上午，我们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彭总看完电报后对我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越好！”

“今天就放？”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总肯定他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我一下子明白了彭总的意思，这次释放战俘，也是对敌人的一次迷惑。

彭总很风趣他说：“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入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的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我望着彭总，会心地笑了。

我们挑选了103名俘虏，计有美军俘虏27人（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1人，第八团21人，美第二十四师4人，美化学迫击炮团1人），李伪军俘虏76人（第六师54人，第八师22人）。

战俘收容所的同志对这些战俘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让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给他们加了几个菜，还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

志愿军首释地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1950年11月23日在报道中承认，被释放的美国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国士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它私人的东西。”

这些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关于我军宽待战俘真相的一些片断报告，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封锁消息，并对被释俘虏加以监视。据美联社称：“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令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称：俘虏的释放“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的不安。”他们确实把消息扣压了38小时，美国新闻处甚至要求禁止发表最有意义的详细情况。美国的通讯社的首脑们尽量把这说成一件小事……另一方面，这27个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1个美国将军和3个上校陪着，好象是非常照顾他们似的。”很显然，这些战俘回去仅仅因为说了一些实话，已被美国军事当局剥夺了自由。

尽管美军当局企图封锁消息，并且不久就把这批美俘送回美国本土，但我军的宽俘政策还是不胫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开了。收效之快，连我们也始料未及。

在第二次战役中，在军事压力下，积极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与敌人进行火线谈判，出现了百人以上美军集体向我投降两起。

我军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了毛主席的鼓励。他在11月24日的来电中指出：

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了敌军工作。在志愿军政治部增设了敌军工作部门（开始是敌军工作科，隶属宣传部，后来又扩编成敌军工作部），颁布了严格遵守宽俘政策的命令，对执行宽俘政策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奖励，对违犯宽俘政策的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情节严重的并酌情给了处分。通过这种分清是非，晓以利害，严明赏罚为内容的宣传教育，使我军广大指战员做到了对战俘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查属于私人的物品。用战士的话说，就是做到了“眼不红，手不动，俘虏人格要尊重”。

志愿军对敌军工作的加强，扩大了我军在美国士兵中的政治影响。美军陆军宣传处也不得不承认：我军的宣传“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共产党会洗脑筋”。美军的士兵们由开始怕当俘虏，到后来认为“当俘虏比作战安全”。

从第二次战役首释战俘之后，遵照毛主席和彭总的指示，我们政治部在以后的各次战役中又陆续放了几批战俘回去，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1页。）

3 妙香山上战旗妍

第二次战役中，三十八军在扭转战局中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阻击和牵制了数万美、伪军。被围之敌除一部西折安州，侥幸逃脱外，余敌均被歼灭。他们以极小的代价，为西线我军换来了歼敌2.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英雄不朽的业绩，激动了祖国的文化战士。记者李庄满腔热情，书写了《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一文；作家魏巍在采访松骨峰等战斗事迹时，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著名通讯；诗人未央在战地面对烈士的遗骸，悲愤地写道：《枪给我吧！》；文艺战士们用壮烈的《火人》来歌颂我们的英雄……

从此，一支被人们称之为“万岁军”的部队，蜚声军内外，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

记得刘西元同志（时任三十八军政治委员）告诉我：1951年春他同邓华副司令员一起回北京向军委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毛主席久久握着他的手说：你们三十八军在朝鲜打了胜仗，把美国佬给打痛了，名气可大哪！美军装备好，仗着它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们的办法，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同美国人打运动战，打近战夜战，把敌人调动开，分散开，

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地，一股一股地把它吃掉。

尽管运输供应状况的极端困难，影响了胜利的更加圆满，但是这次战役胜利之大，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敌军主要集团，歼灭了敌有生力量 3.6 万多人（其中美军 24269 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东海岸襄阳一隅）广大地区，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半岛，迫敌退到三八线以南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志愿军出国前，毛主席曾经设想在平壤至元山的公路以北构筑阵地坚守，半年以后再谈攻击问题。现在，志愿军出国两个多月就打到了三八线，毛主席是很高兴的。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颜闚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积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这是毛泽东同志 1950 年 11 月写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抗美援朝前线捷音频传的喜悦心情。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118—125 页。）

4 新年攻势占汉城

1950 年 12 月初的一天，暮色深沉，狂风大作。西线敌人狼奔豕突，向三八线撤退。我 6 个主力军即停止进攻，集结于安州、价川、凤鸣里、鲜仓里、北仓里地区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安排好部队休整后，彭总就和我们一道，分析当前战争的基本形势和发展前途，谈谈对下一仗如何打法的设想。

中央来电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争发展前途的看法和意见。毛主席说：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要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这对促进美帝国主义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主席关于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的指示，几个人在发言中都表示受到了启发，完全同意。认为我军虽然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敌人主力并未被我歼灭。要最后打败敌人，还须作艰苦的努力。

下一步怎么打？何时发动第三次战役？根据战争是长期的，敌人在三八

线预有准备，我军连续作战，急需休整补充等实际情况，大家的想法是第三次战役可放在明年春季。

出乎我们意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要求我们把第三次战役提前到明年 1 月上半个月。毛主席在给彭总的电报中说：从 12 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过多揣测，民主战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于 1 月上半个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电示，志愿军司令部赶制了新的作战计划，限各休整部队于 12 月 12 日开始向三八线开进。

12 月中旬，志愿军 6 个军和人民军 3 个军团组成的中朝人民反攻大军，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疾进。步兵、炮兵、运输队、担架队……滚滚人流，挤满了大路小道，拥向无数个江河的渡口。

12 月 13 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发动新攻势的电示：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游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 6 个军和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然后再战。

在学习毛主席指示时，我们回忆了敌人此次玩弄假停真战阴谋的来龙去脉，深感我党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政策十分正确，非常英明。

敌人遭我第二次战役沉重打击，溃退到三八线以南后，在敌人内部笼罩着一派失败情绪，引起了异常混乱。美国舆论界把这次失败称之为“恶梦”、“悲剧”，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就其失败的责任，互相攻击。有的要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要撤换国务卿艾奇逊，“彻底打扫国务院”；有的议员还建议国会罢免总统杜鲁门。美国政府为了挽回败局，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一伙认为，现实的危险在亚洲，主张增加朝鲜战场的军事力量，甚至把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去，包括空袭中国本上内的军工企业及其设施，封锁中国海岸，派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并对大陆进行牵制性的进攻。蒋介石对此很积极，多次企图出兵参战。另一些人则坚决不赞成，认为欧洲是战略重点，不能因为朝鲜战争而削弱了欧洲的力量，主张放弃朝鲜，把力量集中在欧洲。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等国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害怕美国把力量陷入朝鲜而削弱其在欧洲的力量，更害怕扩大战争范围，妨碍自身利益。他们主张在三八线停下来，谋求通过政治谈判结束战争。当杜鲁门声明在朝鲜战争中“不排除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时，英国朝野大为震惊，英国首相艾德礼不得不于 12 月 4 日专门跑到华盛顿去找杜鲁门，协商两国侵朝政策。杜鲁门在会谈中重申坚持侵略战争，又不得不假意表示“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从此，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放风，说要进行停战谈判了，一场假停战、真备战的闹剧就这样开场了。

美国在鼓吹假停战的同时，却在加紧真备战。就在杜鲁门向全世界公开

宣布“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为”的第二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各地总司令下达指示：“加紧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态势”。12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将美国保持18个地面作战师的计划，由1954年6月提前到1952年6月完成。12月16日，杜鲁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

透过美国当局制造的重重雾障，我们党中央洞察其罪恶目的，进行了公开的揭露。

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发表声明，揭露所谓在朝鲜停战的建议，实质上“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的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声明指出：“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和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三人小组——就地停战——和平谈判——大举进攻。这一马歇尔公式对中国人民极不生疏，因为在一九四六年马歇尔将军曾经帮助蒋介石如此反复地进行了一年之久，最后始宣布失败而去。中国人民在一九四六年既受过教训，又得到胜利，难道今天还会钻上这个圈套么？不会的，马歇尔将军的故伎在联合国是不能重演了。”

12月19日深夜，彭总亲自起草了给毛主席的电报，陈述他对第三次战役的意见。他说：因为种种原因，我8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到暂下越过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知你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过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攻击受阻和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首先歼灭伪第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

12月21日，毛主席复电同意彭总的作战部署及方针，并强调指出：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说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感到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12月26日，毛主席再次电告彭总：现在的形势与11月间的形势已经改变了。11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线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六度线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彭总与金首相商定，集中9个军（军团）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既设阵地的防御。

在时间上，为保持战役的突然性，根据西方国家对阳历年比较重视的特点，定在 1950 年的除夕之夜发起全线进攻。

新年攻势总攻的时刻来到了！当时针指向 17 点的时候，一串串耀眼的信号弹飞向阵地上空，我们的大炮向敌人射击了。顿时，一片闪动着的红光，带来一阵阵天崩地裂似的轰响，撕破了战场周围一片死静的空气。大炮轮流吐着长长的火舌，成群的炮弹风暴似的飞向敌人工事，在巨弹穿过夜空的嘶叫声、爆炸声中，敌阵地陷入了烟雾火海之中。江南岸在颤抖，土地在颤抖，敌人在颤抖！

就在这一夜之间，麦克阿瑟的所谓必须固守的“三八防线”即被突破，守敌像一群受惊的鸭子，狼狈而逃，溃不成军。

新到任不足一周的美第八集团军军长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追述了李承晚军队从三八线溃逃时的真实情景：“敌人的攻势在大除夕黄昏后两小时来了。那一夜，南韩第一师和第六师的败讯，不断传进我的指挥所来。在元旦拂晓，我乘了吉普车，去找这支溃退的部队，要是可能的话，我想设法阻止它一个劲儿直冲后方去。在汉城北几里路，我碰到了第一批败兵，他们想尽快逃到汉城去。他们把武器抛掉了，只有几个还带了步枪。我把吉普车横在路中心，阻止这条人流，然后设法找到他们的长官来。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希望以后再也不做这种事，因为要设法阻止一支败军，就等于拦住一次雪崩一样。”

美军溃逃的情景怎样呢？南朝鲜《韩国战史》中也有详细的描写：“联合国军士兵扔掉了所有的重炮、机关枪等支援武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挤得连个小孩都不能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把那可怕的敌人甩掉几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

1 月 2 日，枪声稀疏，敌人开始实施全线撤退，中朝部队向敌展开了排山倒海的追击。

向着汉城！前进！

消灭敌人！前进！

1 月 4 日下午，风雨潇潇。我志愿军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六师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进占汉城。这座重要的战略城市、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又重新回到了朝鲜人民手中。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后，为不使敌人据守汉江南岸，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以威胁汉城，妨碍我军春季攻势的准备，联司命令人民军第一军团留一个师担任城防，各主力部队一鼓作气，迅速渡过激流滚滚的汉江，继续追歼敌人。战斗至 1 月 8 日，中朝人民大军收复了三十六度线以北全部城市和广大乡村，共歼敌 19000 多人。结束新年攻势。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 138—167 页。）

5 挫败美帝“绞杀战”

1951 年 1 月，我们着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的组建工作。在军委空军领导的指示和支持下，经过 1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于 3 月 15 日在安东（今丹东）正式成立。我任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儒任后勤部长、金生任工程部长。

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由于是新凑集的“班子”，我和干部都没有组织指挥空军作战的经验，困难是不少的。我们鼓励干部要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克服工作中的思想障碍，振奋精神，善于学习新的事物，掌握新的本领。当时摆在面前的中心工作就是幢全机构、学习业务，尽快担负作战指挥任务。

志愿军空军初建，当时不仅部队数量少，而且训练时间短，战术技术水平都远远落后于敌人。为了掩护北朝鲜铁路运输线，在必要和可能时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有效打击敌人，要求空军迅速成长，以担负面临紧迫的战斗任务。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下，志愿军空军是等待各方面训练完全成熟再去作战，还是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到实战中锻炼提高，求得在战斗中成长呢？遵循毛主席关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建，边打边练的指示，志愿军空军采取了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不仅要认真学习苏联空军的先进经验，而且要以高度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敢于同强大的侵朝美国空军较量，从实战中锻炼提高，吸取经验，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打败敌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来，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上级的正确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有人民解放军几十年作战的丰富经验，有毛泽东思想培育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大批从陆军调来的骨干，一定能够学会自己所不会的东西，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战争中成长壮大。人民军队的优越政治条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勇敢加技术战术，就能打胜仗。战斗力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战斗环境里一定能迅速成长起来。这就是确定贯彻在战斗中成长的重要思想基础。

集中使用兵力，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条通则。毛主席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中曾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我认为这个精神也完全适用于志愿军空军。在美帝国主义具有强大空军的情况下，我新建的不大的空军部队，如果零零碎碎地同敌人进行空战，和敌人拼消耗，这对于我们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当采取稳当而有效的办法，将力量积蓄起来，达到一定数量时，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地、分批地使用出去，每次集中兵力在一个空域，必要时至多两个空域解决一定的战斗任务。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侵朝美军为了加强谈判地位寄希望于空中优势，企图发挥空中力量，窒息中朝军队的运输补给，以阻止中朝军队再次发动决定性的地面进攻。8月中旬，美国空军开始了“绞杀战”行动，集中轰炸宣川至肃川之间、熙川至顺川之间的铁路干线和桥梁，重点反复轰炸新安州、西浦、顺川之间的“三角地区”。我志愿军空军于9月开始从实战锻炼进入为掩护我铁路运输线而进行反“绞杀战”的阶段。

侵朝美国空军开始“绞杀战”行动时，他们的兵力已增至19个联队（大队），作战飞机达1400余架，其中有F—84 300架，当时最先进的F—86 75架。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增加了，而且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也有很大提高。

经过初战锻炼的我军空四师，在认真总结了前一段的战斗经验后，于1951年9月12日再次进驻浪头机场。25、26、27日3天，敌我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大机群空战。25日15时许，敌机5批112架，其中战斗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102架，轰炸机10架，高度4000至8000米，活动于顺川、安州、

平壤等地上空，企图对我方铁路、公路运输线进行轰炸破坏。我方起飞 144 架直奔战区。空四师十二团一大队长李永泰迅速发现敌机，率先冲向左下方 8 架 F—84 战斗轰炸机，二号机、三号机、四号机紧紧相随，五号机、六号机掩护，向左下方四架敌机扑去。敌人见势不妙，急速四散摆脱，这时，敌 F—86 8 架分别从左右后方袭来，我令李永泰立即爬高占位准备反击，但飞机突然中弹，另 4 架 F—86 敌机也从后上方俯冲过来，处境非常危急，僚机权太万马上向敌猛冲，将敌机驱散。在李永泰长机组与敌激烈混战过程中，僚机组陈恒、刘涌新奋不顾身进行掩护，激战中队形分散，刘涌新单机与敌 6 架 F—86 展开格斗，死死咬住 1 架敌机穷追不放，一阵猛射，将敌击落，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 F—86 飞机的战绩。他不幸随后被敌击中，壮烈牺牲。李永泰摆脱了困境，驾驶着负伤 56 处的飞机安全返回了基地，后来被同志们称为“空中坦克”。26、27 日，又连续两天进行了大规模空战。3 天内共击落敌机 26 架，击伤 8 架。敌空军连日受挫，他们称“这三天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式飞机战斗”，不得不承认我方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10 月 2 日，毛主席看到战报后，当即写了“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的批语，给予志愿军空军极大鼓舞。

侵朝美国空军改装 F—86E 型战斗截击机后，妄图凭借装备优势，组织一二百架大型混合机群对我侵袭。当时我考虑年轻的志愿军空军经过一年的空战锻炼，已迅速壮大，指挥机关和参战部队都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战术技术上，我们不仅能打敌 F—84、F—80 战斗轰炸机，也敢打敌最先进的 F—86 战斗截击机；不仅能打小机群，也敢和敌大机群交锋。空三师参战后，我要求他们坚决打敌大机群，在 12 月 2、5、8 日的空战中，该师参加了敌我双方达 300 架喷气式飞机的大规模空战，指战员越打越强，再接再厉，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11 架的战绩。1952 年 2 月 1 日，毛主席看了战报后，欣然写道“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空三师和志愿军空军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决心继续勇敢杀敌，争取更大胜利。

截至 1952 年 5 月底，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共有 9 个师 18 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锻炼，出战中计有 85 批 1602 架次进行空战，击落敌机 123 架，击伤敌机 41 架，我机被敌击落 84 架，击伤 28 架，敌我损失比为 1.46：1。

美国空军连遭打击后，在清川江以北的空中优势受到很大削弱，被迫放弃对“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美方还承认“米格曾把战斗轰炸机逐回清川江以南”，“对铁路线进行历时 10 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接受联合国军等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绞杀战是失败了。”

（摘自《刘震回忆录》，第 338、342—343、350—352、355—357 页。作者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6 “零敲牛皮糖”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以后，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经过 5 次大的战役，联合国军损兵折将 23 万人之多，被迫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地区。美国第八集团军军长瓦克丧了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了

职。美国统治集团开始觉察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志愿军总部内，彭德怀司令员和我们也对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作着抉择。五次反击战役的实践，使我们能够清醒地面对着现实：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想一口吃掉敌人几个师，一下子打到釜山，把敌人赶下海，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当务之急是，必须树立持久作战思想，逐渐削弱敌人，不断改善我军装备，从打小歼灭战过渡到打大歼灭战，争取最后胜利。

早在1951年3月1日，毛主席就明确提出了持久作战思想。在给志愿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毛主席指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主席还为坚持长期作战提出了在朝鲜轮番作战的方针：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

对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关于长期作战的思想，我们志愿军政治部当时领会不深。加之，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战役间隙短，也来不及向部队进行关于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的系统教育，以致部队的速胜思想占了上风。“朝鲜话不用学，过了半年用不着”，即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由于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因而受了点挫折就波动。譬如第五次战役后期收兵受挫，一个师受到严重损失后，就有部分同志思想一度混乱，由速胜转为对战争前途表示怀疑。

5月27日，我们收到解方同志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在北京召见了他和陈赓同志，重点指示了如下几个问题：

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

应加强政治工作。对朝鲜战局长期性、艰苦性有充分认识与准备。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

看完解方来电，彭总特别对“零敲牛皮糖”的比喻感兴趣。解方同志回京前，彭总曾有交代：根据前五次战役的经验，在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后，必须在当夜把敌人消灭。不然，到了第二天，敌人有大量空军支援，敌我力量对比就要起变化，我们就无法吃掉敌人。意思是让解方向毛主席汇报：打歼灭战不能张口太大。现在毛主席形象地归结为“零敲牛皮糖”，彭总当然高兴。他笑着说：“主席还没忘了家乡的牛皮糖啊。”说罢，当即将解方的来电批转三兵团王近山、王蕴瑞；九兵团宋时轮、陶勇；十九兵团杨得志、李志民诸同志阅。因此电机密性大，特别指出要他们阅后焚烧，不要保存。

不久，邓华同志去北京向毛主席当面汇报朝鲜战况，毛主席又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指导方针：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这是综合分析双方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形势后而采取的正确决策。

（选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260—263页。）

7 关怀与教导

1951年4月下旬，我奉令回国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志愿军前线后方供应

的情况。

汇报结束，我站起身要走时，周副主席说：“马上就到‘五一’了，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吧。”

我看看自己的一身破旧的军装，笑着说：“我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呀？”

周副主席说：“怎么不能上，穿这衣服好呀，你代表志愿军么！”

我还是笑着推辞。周副主席说：“这样吧，我告诉杨立三，给你做一套新军装。”

“五一”节，北京市人民举行了盛大游行，体现了国家空前的团结、强大。

我上了天安门城楼以后，工作人员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你。”

我问：“什么时候接见？”

他说：“你等着，到时候我来带你。”

不一会儿，我就被带进了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见到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洪学智同志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是志愿军的代表。”接着毛主席问，“彭总的身体怎样？”

我说：“彭总身体很好。”

毛主席又说：“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海军的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朱总司令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毛主席说：“你们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接着又问我，“你回来汇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说：“已经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已做了安排，他还要找我谈一次。”

我临回朝鲜以前又到总理那去了一趟，将前线需要解决的问题，又进一步做了落实。

1951年冬，我从朝鲜前线回北京总后勤部汇报情况。一天晚上，毛主席接见了，我是晚上7点多钟去的。

开始，毛主席向我详细地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证情况。当我谈到朝鲜前线供应上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听到有的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时，毛主席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切他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

我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敌机轰炸得也很厉害，弄不好，就打碎了。”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办法嘛。”

我说：“好吧。”以后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内往前线运送鸡蛋粉，供应部队。

在谈到朝鲜战局时，毛主席明确指出：“朝鲜战争，要做持久打算。”

毛主席还说：“你回去以后对彭总讲，你们要经常向金日成同志请求汇报。如果彭总工作太忙，走不开，邓华和你就去汇报。”

汇报中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两次进来催促说，时间不早了，请主席休息。主席都没同意，一直同我谈到了晚上11点多钟。

（选编自：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

版社 1990 年版，第 176—177；第 212—213 页。）

8 赴朝前夕的召见

当第二十兵团开赴朝鲜战场的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毛泽东主席要去找我去谈话。于是迅速地从天津赶到北京。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毛泽东主席要在中南海接见我。同我一起进入中南海的还有第二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同志。

中南海是全国人民的领导中心，也是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领导中枢。

在工作人员的指点下，我来到中央领导同志办公处丰泽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内见到了毛主席。

在我向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致以军礼的时候，毛主席很随和地打了个手势，说：坐下吧，请坐。

落坐后，未等我汇报二十兵团准备出征的情况，主席就说起赞扬的话来：我听军委的同志说了，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的准备，这很好。

我向主席报告：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接着，我简要地汇报了部队待征的概况。

主席说：是的，我们要有准备，思想的准备，物质的准备，再打它几个胜仗。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继续在全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主席谈到朝鲜战场的局势时说：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尤其是今年 4 月（即 1951 年——编者注）22 日起，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粉碎了和正在粉碎着“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平壤、元山一线的计划，战争双方已转入了战略对峙阶段。这一形势的出现，正如斯大林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所说的，并不在于美军指挥员的能力，而在于他们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了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多么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呀，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咯，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我们军队的同志，头脑要清醒，不能有速胜的想法。五次战役都证明了即使一次包围了敌人一个整师或者一个整团，也是很难歼灭的。要看到，我们是有过用兵过猛，张口过大的教训的。现在就是要作长期准备，争取早日结束战争。我们的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在进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斗争的同时，争取和谈，以汀促谈……

我向主席保证，坚决按主席和军委指示办。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我们对这场战争不能持摇摆的态度……美国要像当年德、意、日那样，称霸世界，世界人民不答应，我们也不答应。当然，如果它不派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来，我们是不会同美国作战的。要知道，建国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出兵朝鲜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美帝国主义要侵略，要打仗，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所以我们还得准备打它几仗。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后要“采取轮番作战的方

针”，准备以 21 个军分三番在朝鲜轮番作战。你们这次去，对部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我代表第二十兵团指战员向主席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男儿堕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主席边抽烟边喝茶边谈。他时而拿一支烟，并不马上抽，而是说着话，手上捏弄着烟，捏弄一阵子，把烟捏松。那烟是四川特制的雪前，比一般的雪前烟短，比普通香烟略粗。当几句话告一段落，才拿根火柴，使劲擦着，点上雪前，接着抽下去。他有时喝一口茶。当一缸子茶喝完，只剩下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咽下去。他还保留着湖南人吃茶叶的习惯。所有这些动作使谈话产生一种特有的节奏。我们都无拘无束，随着主席的谈话，自由地插话，整个气氛融洽、热烈。

主席说：呵，是的，你们是京津卫戍部队。主席以浓重的湖南乡音，伴以自然、简单的手势，回到朝鲜战争的话题上来。论战局如聊平常事，千军万马犹从眼底过。当一位工作人员走进门来，在主席耳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话，主席忽然挺身而出，对我们说：吃饭，我们一起吃饭去。

毛泽东主席要留我们吃午饭，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有点为难，说：主席，你吃饭去吧，我们走了。

不，吃了饭再走，一顿便饭。主席边说边以手势招呼我们往门外走。

时间将近正午，颐年堂门外阳光灿烂。门前的空地上搭着一个简易席棚，席棚下的阴凉里有一张木质方桌，桌上已经摆好了碗筷饭菜。看情景，这顿预先没有料到的午餐，是推辞不了的。

你和你们的兵团就要入朝作战了，这顿饭算是为你们饯行吧。主席领着我和张南生走向席棚下的餐桌。

毛主席要为我们入朝“饯行”，使我顿生一种甜润之情。

这是全国胜利后，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之前，主席对我的召见。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在重要时刻，我多次聆听主席的指示，每次见面，我都觉得主席总是这么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总是这么平易近人、宽怀大度的。

红军长征途中，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去他那里受领任务。在当时的党中央临时驻地毛尔盖，在普通的藏民住房内，毛主席指示我们，说：你们红四团还是先锋团，你们必须从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决定的。如果我们掉头南下，那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整编后的团结，就是一、四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他对我们先锋团前去探路作了几点重要提示，并让我去见徐向前总指挥，听取具体的交待。见过徐总指挥，我遵嘱又回到主席住处。这时，邓发同志端来一盘六个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说，你一天没有吃饭了，这里离你们团部还有几十里，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我不知道这就是主席的晚餐，吃了两个青稞面馒头后，一听说这顿饭是主席让给我的，我怎么也不肯吃了。当晚，我赶回了部队。后来，经过几天几夜的艰难行程，我们团在充满死亡恐怖的水草地里，终于踏出了一条北上的路。

12 年后，即 1948 年在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毛主席通知我，他有事

要和我商量。见面后，主席先是高瞻远瞩地谈了一番战争形势，然后他让我选一个我熟悉的师，由我带着准备护送他到东北去。我们遵嘱迅速制定了护送方案，次日即向主席做了汇报。过了十几天，毛主席电告我们，同我谈的任务撤销。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主席身体不大好，斯大林邀请他去苏联疗养。主席原拟取道东北赴苏，后因故未能成行。

同年8月，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一起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我交代任务时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央军委决定在东北、华北和华东进行战略决战，突破口选在东北，争取首先全歼东北之敌，解放东三省。为了配合东北作战，军委的战略部署是“东北打，华北牵”。随后，毛主席对我说：你们华北第三兵团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傅作义必救。你们不但要占领绥远，还要经营绥远，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使之不出关、少出关，以保证东北野战军的胜利。并提醒说，这可不同于毛尔盖过草地，那时你带一个团，不过两千人。现在是个兵团，有四个纵队，还有骑兵师、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总之，你们必须把困难想够、想透，向指战员讲清楚，东北、华北是一盘棋，你们是间接地参加东北的作战。这是第一点，叫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第二点，就是要做好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就赶紧补充。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我护送他到山海关。他回国时我又到山海关去迎接他，与他同车赴京。火车开动后，他把我召到他的车厢，谈到了傅作义将军。傅作义对于北平解放建树了大功，他所发表的《通电》堪称赤诚之言，高远之见。主席说：人家对我们任用傅作义有意见，地方上的同志有，军队的同志也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呢，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新革命，还有什么革命不如反革命啦。主席问我：杨成武同志，有没有听到这种说法？

我如实回答：我听到过这种反映。

对不对呢？

当然不对咯。

是的，这种说法不好。我们建立了新国家，就像建了一座很好的大厦，非常好的大厦。主席接着说，有了非常好的大厦，里头总不能空空洞洞的嘛，必须有很多好的陈设：沙发、桌子等；也要有古董；还要挂上字画，摆上花，安排得当，才不是单单调调、简简单单的嘛。对不对呀，成武？可是，我们有的人哪，就只要他自己的陈设，不要别人的陈设。

主席说这一番话时，我认真地听，默默地记。他关于“大厦”，的比喻既形象，又很深刻。我理解，他是劝戒我们要善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各方面的力量，以利于建设新中国，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更加兴旺。

主席还说：革命当然比不革命好咯，革命总是革命的，不革命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老革命贡献是大嘛，新革命也有贡献。说革命不如不革命，这样的话不好嘛，是不是？

最后，主席又特地叮嘱：要讲清道理，我们的同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这个道理的。

主席安全地回到北京。

我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执行接送任务的情况时，转达了主席在途中一番谈话的内容。为宣传和贯彻主席的谈话精神，华北军区的《华北解放军

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

在我们入朝作战前夕，主席对我的谈话和款待，寄予了对兵团指战员的殷切希望。我和张南生一起随主席来到席棚下的餐桌边。这时，我们看到江青。她招呼着我们吃饭。

桌上的菜是几碟家常菜，特别一点的就是摆了一瓶酒和几个酒杯。酒是红葡萄酒，杯子是高脚玻璃杯。

主席举起一杯酒。说：我祝你们一杯酒！

我立起身来说：主席，应该是由我们来敬你的酒。

不，我来祝你们的酒！祝你们到了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共同打胜仗！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侵略的，是为了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

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主席连连用手示意，让我吃菜，又接着刚才的话头说：抗美援朝，也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志愿军要尊重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谦虚谨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他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这是胜利的基础。要和朝鲜人民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

我记住了主席的叮嘱。

主席第二次举起一杯酒：再来一杯！

我饮了第二杯酒。

主席说：经过几次战役，我们的战略反攻已经完成了保家卫国、援救兄弟邻邦的主要任务，现在实行战略防御就是要巩固前一阶段的战果。入朝后一定要眼观全局，在全局上有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准备持久作战，准备打阵地战，同时争取和谈，以达到这场战争的结束。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自从5月21日开始所谓的“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中朝部队已于23日向北转移。24日，在我主力北移之际，美一、九、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以坦克为前导向北猛插。形势陡然间严峻起来。面对此情况，彭德怀同志准备组织三道防线节节抗击，坚持到7月底。他估计，敌人很可能在北朝鲜中部东海岸港口元山登陆，南北对进，届时平壤、元山一线亦将难守。为此，你们二十兵团必须在此之前赶赴朝鲜前线，以稳定战线。你们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要坚持这个战略方针，不能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不能轻易后撤……换句话说，你们二十兵团入朝后，在朝鲜东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

我说：主席，我们都记住了。我想代表第二十兵团全体指战员，向他敬上一杯酒，刚要举杯，主席却第三次举起了酒杯：来，干了这杯酒。

主席喝第三杯酒时说，要注意战场上的局势，注意军事的和政治的形势。你们给“志司”（即志愿军司令部——编者注）的电报，重要的要报军委……

三杯美酒，几番叮嘱。每番叮嘱都包含了重要的内容，每一杯酒都渗进了殷切的希望。主席的接见和饯行，增添了我们出征的豪情和完成作战任务的信心。“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人王翰的《凉州词》。王翰是晋阳即今太原市人，我们兵团参加过解放他家乡的战役。对于古人的这一诗作，尽管后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我初读它时就觉得不错，不失为一首真切动情的边塞诗。此刻，我觉

得它格外豪爽、大度。也许，是由于注入了我的主观情思吧。

饮了酒，吃了饭，我向公务繁忙的主席告别，离开了颤年堂，离开了中南海。

当我坐在车上返回驻地时，心潮仍在起伏，我思索着毛主席的指示，思索着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

抗美援朝确实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壮举。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力量非常菲薄，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巨大的磨难，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需要休养生息、重整家园；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年征战，相当疲劳，需要休整，需要建设，需要改变单一步兵的现状，即组建海军、空军、炮兵以及装甲部队等等。而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者，拥有强大的海军、陆军、空军，拥有威慑世界的原子弹，锋镝甚盛，且挟持十几个国家军队，威胁鸭绿江边，第七舰队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公然与中国人民为敌，进行疯狂的挑战，企图先占领朝鲜半岛，作为尔后进攻我国的桥头堡。在这样严峻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支援我们的邻邦，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和伟大的气魄，作出了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的战略决策。曾几何时，经过几次战役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使全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刮目而视。

我这样想着，回首西望时，中南海醒目的红墙已经被楼群遮盖了。我不禁想：有如此英明的统帅，有如此伟大的军队，我们的正义的抗美援朝战争必胜！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败！

这天深夜，我回忆着主席的教诲和他对出征部队指战员的期望与关切，倍感亲切和责任重大，思绪联翩，竟夜难眠，禁不住披衣伏案，写成小诗一首：

如火电令催东征，
领袖召见紫禁城。
一席妙语明方略，
三杯美酒寄深情。
热血滚滚翻激浪，
豪气漫漫贯长虹。
不负主席不负党，
此去誓将敌虏平。

（摘自《杨成武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66—379 页。作者当时任第二十兵团司令）

9 归国观礼的遐想

1951 年 9 月，我率志愿军战斗英雄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

回到北京后，一连几天是座谈、参观、游览，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张。到处是热情的笑脸，到处是欢迎的鲜花，我们一直在感情的波谷中起伏。9 月 30 日下午，一个更大的喜讯在等待着我们：晚上去怀仁堂参加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

7 时多一点，军乐队奏起《东方红》，毛泽东主席健步走进了宴会厅，

我们都一齐起立向毛主席鼓掌，毛主席向应邀出席宴会的代表挥手致意。

国庆宴会于晚7时半正式开始，毛主席举杯向来宾祝贺，代表们和外国来宾也都起立向毛主席敬贺节日。席间，工、农、兵、学、商、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纷纷起身去向毛泽东主席敬酒。我和另外9名同志，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代表团的代表被推举去向毛主席敬酒。我斟上满满一杯，激动地来到毛主席面前说：“我代表彭德怀司令员，代表全体志愿军，敬祝主席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毛主席微笑着和我碰了杯，说：“祝贺你们的胜利，为彭德怀同志，为在朝鲜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全体将士干杯！”干杯后，我想和毛主席多说几句，但后边排队敬酒的人实在太多，只好让位。新闻摄影局的陈正青同志，把我向毛主席敬酒的情景拍了下来，并在国庆节那天的《人民日报》上刊出。

向主席敬酒以后，我又转身向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陈叔通、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了酒，因为兴奋，又多喝了点，回到饭店后，怎么也睡不着，到代表们的房间转了转，他们也和我一样，正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毫无睡意。王芝荣同志激动他说：“毛主席进来时，大伙儿都站了起来，把我挡住了。我真恨自己个子太矮。后来一使劲，挤到张孝才前面去才看清楚了。”王有根同志更是兴奋地不能自己，连说带比划：“真想不到，我这个旧社会要饭的穷小子，今天不但见到毛主席，而且还和毛主席一块吃饭，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变了，我们老百姓变得值钱了，和领袖平起平坐，我这辈子真是修下福了。”有趣的是沈树根同志睡到半夜，在梦中大喊：“毛主席来了，快起来！”使得有的同志还信以为真。

听着他们的议论，我不禁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情景：

1930年6月，组建红军第一军团时，我所在的红军第六军已改为红军第三军。归建之前，在离永丰县城几十里处的一块大草坪上，黄公略军长集合全军同志讲话。他以很重的湖南口音说：“同志们，我们红灯（军）就要大会合啦！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总部的四军、十二军的同志们，正在永丰城等着我们。此后，我们就直接归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指挥啦！我们红灯（军）要打大仗了，会有更大的胜利了……”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因为朱、毛在当时江西、湖南一带名声很大，许多人都把朱毛当成是一个人。记得那天到永丰后，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去偷看朱德和毛泽东。候了好久，见两个三四十岁模样的军人送我们军长黄公略出门，一个年龄大些，一个较年轻。我们几个猜想可能是朱、毛。问军长，才知道高个子年轻一些的是毛泽东，年龄大些的是朱德总司令。

我第一次请毛泽东主席给部队讲话是在1935年10月下旬。那时我在红军一军团无线电队任政治委员。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我们电台已直接跟随毛主席行动。记得在下寺湾附近一个村庄里，天下着小雪，部队已集合，正等着跟毛主席出发。毛主席一到就先问大家：“冷不冷呀？”“不冷。”大家齐声回答。当我请毛主席讲话时，毛主席跨上一个土墩，向全队人员微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我们的长征已经胜利结束了，马上就要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了。你们见到红十五军团的同志后，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要骄傲……”

我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是在1949年3月。当时，北平已和平解放，党中央和毛主席从西柏坡搬进北平。当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汽车上，在

西郊机场检阅部队时，我望着毛主席高大的形象，端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难忘的历史镜头。没有想到，我这个业余摄影爱好者的作品，竟成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今天，在庄严热烈的中南海，又增加了一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给毛主席敬了酒。同年轻的战斗英雄们不一样，我早已不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了。但是当我端着酒杯，站在毛主席面前时，仍然同样感到光荣和幸福。这是因为20年的战斗经历告诉我，听毛主席的指挥就是胜利。国内战争如此，11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也不例外。从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到制定5个战役的正确作战方针，都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当时的毛泽东就像一面胜利的旗帜，人们一看到他，就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在北京期间，我们20位战斗英雄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他的讲话，给了我们一种信心和力量。他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在高度评价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的重大意义后，明确指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听到这里，我们志愿军20位特邀代表与到会全体代表一起，拼命鼓掌。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战争，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感到无上光荣；因为毛主席动员全国人民从各方面支持我们，感到力量无比，胜利在望！

政协会议开完以后，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接见了我们参加政协会议的志愿军的特邀代表，并亲切地同我们合影留念。毛主席笑着对几位女同志说：“中国自古多巾帼英雄，我们志愿军中也有花木兰呀！”照完像后，毛主席把我单独留了下来。毛主席亲切他说：“你回去见了彭总，问他好。”随后，主席对我谈起了国内正在开展的抗美援朝活动。他要我回去告诉彭总：目前志愿军采取的总方针是正确的。10月中旬，邓华同志曾来北京汇报，中央已将目前阶段关于志愿军的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西海岸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胜利，表示欣慰。毛主席强调说：目前，国内的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都全力以赴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现在困难甚多，当然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要志愿军全体同志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毛主席说这番话时，非常自信。这使我更加坚定了志愿军必胜的信念。也就是在那一次，毛主席要我回去告诉彭总：“林彪现在身体不好，让他休息，不管事了。”我当时不很明白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只是如实地将原话告诉了彭总。彭总听后没有说什么，但从他的神情看，似乎很理解。

坐在车厢里，肖华副主任的话在我耳边响着：志愿军人朝后，军以上干部回国，毛主席都要亲，自接见，一则了解朝鲜前线情况，二则鼓励好好打仗。每次接见，均由肖华同志陪同，然后看一场电影，游览一个公园。毛主席为我们做好志愿军政治工作树立了榜样。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0—331 页。)

10 科学预见赢得谈判主动权

1953 年春，有消息表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正为摆脱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寻找出路，朝鲜序战谈判僵持的局面正在悄悄解冻。

1 月 20 日，艾森豪威尔在就职演说中说了要和平的话：“我们寻求的和平，不只是让大炮停止轰鸣，减轻战争的痛苦；也不只是避免死亡。和平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平不只是精疲力竭的人们的歇脚站，它更是勇敢者的希望。”

然而，10 天以后，他却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主张不惜冒扩大战争的风险，来赢得这场战争。他在 2 月 2 日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中立化”，妄图动用蒋介石的武装威胁中国大陆，说什么“我们确实没有责任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2 月 3 日，他又同出兵朝鲜的各国的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的问题。从外电透露，他扩大战争的内容还有轰炸中国本土，直至包括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这一套对中朝人民来说，并不新鲜，更没有什么威胁作用。毛泽东主席 2 月 7 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艾森豪威尔继续扩大战争的冒险政策，在统治集团内部也遭到了反对。许多人主张在战俘问题上寻求妥协，以求实现停战，激烈指责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扩大战争会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实力；更多的人指责他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也表示，不同意使用蒋介石的武装而导致朝鲜战争扩大。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

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也并不妙。1 月 29 日结束的“丁字山”战斗，敌我伤亡比例是 9:1。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时的同学范弗里特哀叹说：共军阵地十分坚固。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也惶惶不安他说：“不管采取什么方法，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更长。”2 月 10 日，在朝鲜呆了 22 个月之久的范弗里特垂头丧气地被退役回国，接替他职位的是美国陆军部主管作战和行政的副参谋长泰勒中将。

泰勒也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等待他的是更惨痛的失败，仅 3、4 月间，我军就胜利出击 100 余次，歼敌 3 万人以上。其中一次歼敌 1000 到 2000 多的战斗就有 4 次。例如 3 月 3 日夜，我军在周密准备之后，仅 4 分钟就占领了涟川西北上浦防东山（老秃山）的主峰，两个半小时就全歼了守敌两个连。在以后 4 天 4 夜的激烈战斗中，我军共歼美军及哥伦比亚军 2000 多人。被俘的美军第七师士兵悲哀他说：“金化前线的秋天是可怕的，‘老秃山’前线的春天也是可怕的！”

更叫艾森豪威尔头痛的，是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作了充分的抗登陆

准备，美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再演仁川登陆的如意算盘，也难以实现了。

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代表团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动向的分析。他说，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倒吓倒了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艾森豪威尔要想法子使自己下台了。

于是，我们收到了美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信件，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很明显，这是美国方面发来的恢复谈判的试探信号。我们没有立即答复，先把它晾了一个月。因为，据我们分析，联合国大会决定2月24日复会，在联大复会前的前二天，美国方面发来这样一个信件，是否诚心诚意，尚有待事实证明。

一个月过去了，美国没有再玩什么新花样。金日成和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克拉克马上响应，表示愿意恢复谈判和交换病伤战俘。

6个月僵持的局面终于打破了。艾森豪威尔被迫放弃了扩大战争的道路，令其代表团再回到谈判桌前。

4月19日，谈判双方在联络组会议上同意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时间定于4月26日。

谈判恢复前两天，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谈判代表团发来指示：为准备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有如下3个关键问题需要加以考虑：

一、未被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交给中立国，是送到中立国去，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接收和看管。

二、这批战俘在中立国管理下的时间上有无限制。

三、这批战俘经过有关方面解释后，仍未得到解决的，应如何安排。

对以上3种情况，毛主席提出了下列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几个亚洲的中立国去，在规定的时间内（譬如半年或者3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第二方案：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移到经双方协议的地点，交给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4个中立国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在规定时间内（半年或者3个月）派人前往解释，使之各回祖国。在规定期满后如尚有在中立国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草案中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两个方案最关键的不同点，在于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中立国看管，还是由中立国在朝鲜看管这一条。

毛主席说：在这两个方案中，我们倾向于第二方案，因为这一方案较第一方案简便易行，且易为中立国所接受。但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进退余地，在谈判恢复后，先行提出第一方案，估计对方接受这个方案的可能性较小，在弄清对方全部意图后，可准备以第二方案与之妥协。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复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谈判策略，在这次会议一开始，我代表团就先打出了第一方案。不出所料，哈里逊对我们的建议采取拒绝协商的态度，反对将不直接遣返战俘送往中立国，

并且拒绝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唇枪舌剑，我们认为打出第二方案的时机已成熟，报经毛主席同意后，在5月7日的谈判会议上提了出来。

对我们的第二方案，正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美国方面没有断然拒绝，而只是提出一连串的询问。这说明美国方面有可能接受我第二方案。

但是，美国方面误认为我方谈判立场有所改变，于13日提出了一个冗长的长达26个段落的“反建议”，无理要求将3.5万名朝鲜籍战俘于停战日在南部朝鲜“就地释放”，只将非朝鲜籍战俘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看管和“解释”。

美国这个方案中的大部分建议都不符合关于由中立国看管未遣返战俘这一基本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才是停战谈判得以恢复的基础。当哈里逊刚读完这份包藏祸心的冗长文件，我方代表马上站起来将其驳回。美国方面顽固地坚持了一天，但他们理屈心虚，只好宣布休会4天。以后要求延长休会5天。5月25日复会后，他们终于被迫撤回他们的建议，并要求谈判转入秘密行政会议。

6月8日，双方就第四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并且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5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9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如果90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其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

至此，阻碍停战谈判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克了，停战的曙光在升起。

（摘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593页。）

11 倾听下情善安排

1953年3月初，北京来了电报，让我火速回国，接受一项新任务。是什么任务呢？电报上没说。到北京后，从接待我的王炳南那里，才知道是要我担任驻朝鲜的大使。

事情来的突然，我思想上毫无准备。这使我犹豫了好久。思之再三，觉得自己不是做外交官的材料，还是不去为好。

我先去中南海见了彭总，想请彭总出面帮忙。彭总见我来了，很是高兴。他听我说不愿去朝鲜当大使，便问为什么。我对彭总说：“我这个人你了解，脑子来得慢，不用说外交，内交都搞不好。见了熟人还可以，见了生人就没什么话说了。外交场合回答问题要快，而我遇事喜欢思考思考，一思考，时机就错过了。再说，我抽烟喝酒都不会，又不会交际，应酬不了场面上的事。”

彭总见我说得恳切，就答应说：“我同毛主席说说看吧。”

在招待所等了好几天，仍无消息，只好出去串门。串到李克农同志住处，

他惊讶地问道：“怎么有空进京？”我便把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并说可能毛主席太忙，等不上了，准备先回去再说。克农同志劝我说：“既然彭总报告了主席，主席不会忘记，我可以问问，你还是等一等。”记不清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接到李克农同志的亲笔信：“奉主席谕，请你在京多住几天，待命再决定行期，特此转告。”

过了不几天，彭总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要见我。我不知彭总同毛主席说的怎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进了丰泽园，穿过一座庭院，便是毛主席的会客室。公务员送来一杯清茶。我等了一会，秘书便来招呼，说主席请我进去。我进去时，主席正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忙招呼：“杜平同志，坐吧！”

我向主席敬礼后，在桌子一侧坐了下来。

主席亲切地望着我说：“坐近点，坐近点。”

主席首先询问了朝鲜西海岸抗登陆的备战工作。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西海岸防御的准备情况后，主席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点着头说：“你们辛苦了！”他还说：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艾森豪威尔现在是骑虎难下，欲打力不从心，欲和于心不甘。所以我们现在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采取行动为止。

我静静地听着主席的分析，估摸着板门店谈判有可能重开。这时，反而不好意思提自己不想当大使的事了。

我正犹豫着，主席倒先开了口：“彭德怀同志对我说，你不想去朝鲜当大使？”

我急忙说，不是不想，而是怕当不好。接着又把向彭总说的理由对毛主席重新说了一遍。主席听后，沉思一会，问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5岁。”我回答说。

“不大，不大，还可以学嘛！”主席笑着说。

说实在的，我并非对工作挑肥拣瘦，而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考虑。有的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外交，外交，无非是喝酒跳舞，“无可奉告”。我却认为不这么简单。大使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干不好会直接损害国家的形象。

中朝两国是1949年10月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我国驻朝首任大使是倪志亮。1952年初，倪大使因病卸任回国，使馆的工作一直由甘野陶代办负责。甘代办在朝的工作是卓有成绩的，我觉得由他继任驻朝大使要比我合适得多。

我把这个意见同主席谈了。主席沉思片刻说：“好吧。既然这样，我给金首相写封信，你带给他。回朝鲜后，你仍到开城代表团工作。金首相什么时候有事要找你，你就随请随去。没事，就在开城工作，也很方便。怎么样？”

我一听，如释重负，高兴他说：“服从主席命令。”

3月中旬，我离京返朝。在平壤以西人民军总部驻地，我将毛主席的信交给了金首相。他看完信，望我笑了笑说：“好哇！就按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办吧！”又热情地留我吃了饭。

（选编自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71—575页。）

当停战谈判显露曙光之时，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6月18日，即军事分界划定的第三天晚上，李承晚集团竟然以所谓“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多人离开战俘营，押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李承晚集团的这一行径，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对，各国舆论纷纷谴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的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甚至要求美同换马。英、加、澳等国还抗议李承晚“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

6月19日，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致函质问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指出这是“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去实现其久已蓄意的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实现的预谋，我们认为你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质问克拉克“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朝鲜停战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

6月20日，彭总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定签字事宜，途经平壤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

毛主席：20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6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21日见金首相，22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毛主席接到彭总的电报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美国也有些头痛，极力洗刷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罪责。克拉克在29日复信承认李承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事件”，并一再保证：联合国军总部及有关之政府，当努力获得李承晚集团的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我们分析，美国方面急于停战，而李承晚却不甘心就此罢休。

7月12日，汉城传来消息，艾森豪威尔派出的特使罗伯逊与李承晚会谈结束，发表联合声明。李承晚迫于美国的压力，虽然保证不阻碍停战协定的实施，但没有就这项保证提出任何时间限制。并且公然声称：他保留退出和平会议和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

看来，李承晚仍然一意孤行，破坏停战。我们不客气了，预定的金城反击战役在7月13日夜开始了。

7月13日晚，浓云低垂，天色昏黑，闷热异常，我军1000多门火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敌人猛轰。我卡秋莎火箭部队2个师，向敌人连打了3个齐放，接着我20兵团的3个集团同时向敌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迅猛的突击。

1小时后，全线突破敌人阵地。

富于传奇色彩的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进攻中。第六十八军

突破敌人阵地后，一面迅速歼灭当面之敌，一面以第六九团一个加强营组成渗透迂回支队，疾速向敌纵深插进。该团副排长杨育才带领的一个“化装袭击班”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头戴李伪军的钢盔，穿着李伪军的服装，按事先侦察好的情况，大摇大摆直扑二青洞附近的伪首都师第一团（白虎团）团部。

前进中，他们抓了个白虎团的俘虏。那个家伙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稀里糊涂地跟着跑了半夜，敌人打照明弹时，杨育才发现队伍后多了这么个尾巴。从这个俘虏嘴里，套出了白虎团当晚的口令。

他们机警地闯过了敌人设在勇进桥头的岗哨，仅用10分钟就解决了白虎团团部。白虎团团长和一个美国顾问也当场毙命。伪团部和通信联络被捣毁，使其无法再组织抵抗和增援，该团很快溃乱，被全歼。

这次金城战役，是我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敌军的防御阵地已连续加修了两年，布满了盖沟、坑道、地堡、火力点和铁丝网、鹿砦、地雷等防御体系，在22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上，有4个师的重兵把守，单是一五榴弹炮就有25个营。战役发起后，我军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突入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随即又粉碎了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亲自飞往前线所组织的10个师1000多次反扑，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比彭总预料的歼敌1.5万人超过4倍以上），

我军在全线攻击了敌人39个目标，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造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态势。

毛主席对这次战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说：“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在我军猛烈的反攻中，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损失惨重。对于这种情况，《美国第8集团军简史》中是这样描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国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

我军作战的节节胜利，使敌人处境更加不利。他们不得不向我作出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

6月29日，美侵朝总司令克拉克给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怀司令员复信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7月13日到7月19日，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作出保证，“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的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条款”，“我们已从大韩民国政府那里得到了必要的保证，它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火的实现。”“对大韩民国军队违反停战协定的任何侵略性行为，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不予支持。”“在共产党方面针对大韩民国的侵略，采取必要的防御性行动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继续遵守停战条款。”“根据停战条款，联合国军司令部将保证韩国负责监督遣返战俘的中立国代表和共产党代表以及红十字会代表的安全。”“不再允许扣留战俘。联合国军司令部将尽力找回已被韩国卫兵‘释放’的2.7万名战俘。”

在我军惩罚性的打击下，李承晚终于夹起了尾巴。

我方鉴于美方已向我作出保证，而且有关各方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尽管我军还可以乘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

了美方希望尽快签字结束战争的要求。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双方谈判代表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及其临时补充协议。随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协定于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生效。

经过长期苦战，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摘编自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27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603页。

黄克诚论毛泽东

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的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像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例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当团长。他带着队伍由武昌出发，本来是要参加南昌暴动的。由于途中听到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了，部队已经撤离了南昌，他就在黄石港上了岸，然后辗转经阳新、靖安、奉新来到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武装。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后，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不单是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还有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经验不足，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于的就剩下毛主席领导的这一

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那时，南昌暴动有3万多人，在三河坝打了一个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老总和陈毅同志收集了残兵八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与滇系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将队伍改编为范的十六军的一个团。朱老总后来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兵力要比毛主席领导的武装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朱老总那支队伍就没有归宿，就难以生存并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的部队，主要是武汉军校分校的学生改编的教导队。汪精卫政变后，这支队伍由张发奎带到广州，改为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为团长。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军事技术、政治素质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那两支武装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垮了。鄂豫皖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他们也是在井冈山红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虽然经历了曲折，受了损失，但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

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

大概在 1929 年间，在上海的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班，以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非要我们离开不可，那就请派刘们承、恽代英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快军阀战争就爆发了。毛主席那首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部队，那么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 年在闽西的斗争，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红军到了闽西，在路线上争论很激烈。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拥护朱德同志的；一种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主要是陈毅同志。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养病。结果部队到了广东梅县，打了一个大败仗。只好派人请毛主席出来。毛主席说，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开党的代表大会，他来作报告。后来按照他的意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对我军后来的建设起了很伟大的作用。在闽西时期，毛主席的这些见解都是起关键作用的见解，都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决策。

1930 年立三路线来了，集中了红军的主力想夺到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当时，大家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他就派周以粟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1931 年，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第一次“围剿”粉碎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朱老总也当军委副主席。这是在上海的中央决定的。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打垮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一带，东固的山上堡垒都修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便果断地下令出击。毛主席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里面讲“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当时的情况。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敌人公秉藩的二十八师是我们三军团打的，把公秉藩给活捉了。毛主席当时以政治部

主任的名义下命令指挥了部队。别人没有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糕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毛主席不好讲，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央局书记。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几十个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内部的不同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给我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的口号。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注意这件事。当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些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夺取中心城市”。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赶下台。后来毛主席写了一篇《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讲的许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的争论。恩来同志当中央局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曾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帮助中央指挥军队。1933年博古也来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军事指挥权。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8万人，过草地时就剩了2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了6000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毛主席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下台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填填词，写写字，看点书，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都是这时候填的。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战斗遭受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县，毛主席才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的领导问题。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

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又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走，那么红军就可能全军覆没。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 8 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少到 3 万。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 2 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了陕北。

1936 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讲共产国际的问题，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毛主席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肯执行毛主席让他们过长江挺进敌后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将部队带到长江以北，队伍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 4 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选编自《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0—382 页。作者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编后记

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党领导下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始人。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这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出奇制胜，赶走了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伟大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建军原则，

高超的指挥艺术，灵活善变的战略战术，凝结成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思想加以提炼总结，对于当今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素质，建立坚强的国防体系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研究、阐述毛泽东及其思想，尤其是军事思想。但总的看来缺乏生动可读、真实感人的上乘之作。今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我们特编辑此书，力图通过跟随毛泽东征战几十年的老帅老将们的亲身经历，以独特的风格，生动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宏伟画卷，作为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的献礼。

毛泽东指挥百万雄师、率将统帅的超群才能、杰出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活动，是通过无数次的战争、战役、战斗体现的，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指挥下的将帅们对此体会最深刻，通过他们的叙述，最能客观、准确、形象地反映毛泽东的韬略、胆识、气魄和胸襟。本书从浩瀚如海的将帅回忆录、谈话录、报告、文件、日记、报刊上的文章中，摘录选编有关反映毛泽东重要军事活动和军事思想的精粹资料，并按时间、事件划分，依不同情况、不同侧面编排。这些大量珍贵的资料，全面真实地再现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智慧和才能，灵活的策略原则，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精辟深邃宏大的思想，以及那敏锐有神的目光，深入浅出而风趣诙谐的谈话……

本著的选材以早年跟随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南征北战，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授予军衔的将帅们的回忆材料为主；对那些曾在毛泽东身边战斗过、在人民军队中任过职，而在新中国建立后未被授衔，但担任过高级职务的老同志的回忆材料也适当选取一些；同时也选用了少量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的回忆材料。本著的时限为，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起，到抗美援朝取得胜利止；其内容主要反映毛泽东当年指挥驾驭革命战争惊心动魄的经历，军事思想，以及丰富多采、动人心弦的战争生活等。为了确保其真实性可靠性，本著选用的绝大部分为公开出版的材料，每个选题后面均注明详细的出处及作者当时任职、建国后授衔和主要任职情况。由于许多将帅未留下与毛泽东交往或记述毛泽东活动的材料，或因个别材料我们没有掌握，我们在翻阅现有材料的基础上，选取了 100 多名将帅或老同志的有代表性的材料编成此书。

在摘编过程中，我们力求使本书全面真实、生动可读，融学术性、通俗性、可读性于一体，既严肃又活泼，使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军事思想活灵活现，更加吸引读者。但为保持资料的原貌，除个别明显的错讹加以注明或需要衔接外，对原资料一般不作改动。因篇幅容量有限和不失可读性，本著对选用的大量浩繁的资料作了文摘或删节处理，即将与本著有关的阐述、段落摘编到一起，个别题目将阐述同一内容的两个或更多的作者的材料编到一起，对选用的单篇文章大部分作了删节。为了保持体例统一和便于阅读，本书按照现在的有关出版规范标准进行编辑处理。其中的各级标题，绝大部分为编者根据内容拟定的。

由于联系不便，时间仓促，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对于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家属，我们未能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在这里，我们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外，还要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此外，由于资料庞杂，工作量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本书的编选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老同志、已故将帅家属及读者指正。

本书由杨成武主编，参加编辑及事务性工作的有任贵祥、李东朗、张晖、

刘银冬、白秀珍、刘云、吴坚、李建华、李建清、冯振国、于化民等。

编 者

1993年5月17日于北京

